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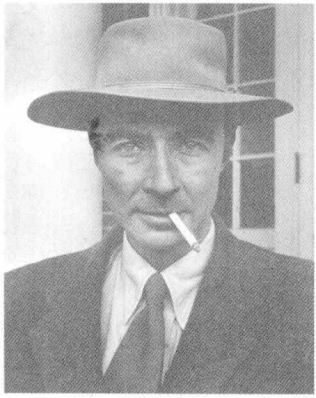
American Prometheus

奥本海默传

“原子弹之父”的美国悲剧

[美国]凯·伯德　马丁·J.舍温　著　李霄垅　华夏　裔祖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American Prometheus

奥本海默传

“原子弹之父”的美国悲剧

[美国]凯·伯德　马丁·J. 舍温 著
李霄垅 华夏 裔祖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本海默传／（美）伯德（Bird, K.）,（美）舍温（Sherwin, M. J.）著；李霄垅,华夏,裔祖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2
书名原文：American Prometheus
ISBN 978-7-5447-1000-8

Ⅰ.奥… Ⅱ.①伯… ②舍… ③李… ④华… ⑤裔… Ⅲ.奥本海默,J. R.(1904～1967)—传记 Ⅳ.K837.1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4651 号

American Prometheus by Kai Bird and Martin J. Sherwin
Copyright © 2005 by Kai Bird and Martin J. Sherwin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126号

书　名	**奥本海默传——"原子弹之父"的美国悲剧**
作　者	[美国]凯·伯德　马丁·J. 舍温
译　者	李霄垅　华夏　裔祖
责任编辑	陈　锐
原文出版	Alfred A. knopf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25
插　页	16
字　数	378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000-8
定　价	3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苏珊·戈德马克和苏珊·舍温
并以此纪念安古斯·卡梅伦和琼·迈耶

现代版的普罗米修斯再次奇袭奥林匹斯山，为人类带回了宙斯的雷电之火。

——《科学月刊》，1945 年 9 月

普罗米修斯偷来了火种，把它送给了人类。当宙斯得知此事后，他命令火神赫菲斯托斯把普罗米修斯的身体钉在高加索山上。于是，普罗米修斯在山上被缚了许多许多年。每一天都会有一只神鹰扑向他，啄食他的肝脏，而每一夜他的肝脏都会新生出来。

——阿波罗多罗斯：《书库》，第 1 卷第 7 部，公元前 2 世纪

前　言

1953 年圣诞节的前四天，奥本海默的生活——他的事业，他的声望，甚至他的自信心——突然失控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太不可思议了。”他坐在车里慨叹着，两眼瞪着车窗外面。汽车正带着他向他的律师在华盛顿特区乔治城的住所飞奔。一旦到达那里，他就得在数小时内做出命运攸关的抉择：他应当从政府顾问的位置上辞职，还是反击那封信里对他的指控？信是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突然交给他的。这封信通知他，有关部门重新审查过他的过去和他给政府提供的政策咨询，他被认定有安全嫌疑，信上罗列了三十四条罪状，既包括可笑的指控，也包括政治性的罪状。例如“有人报称，你被列在 1940 年‘中国人的朋友’资助者名单上”；“1949 年秋及以后，你曾坚决反对研发氢弹”；等等。

事有蹊跷，自从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以来，奥本海默就一直有一种莫名的不祥预感，感到某种霉运正要降临到自己头上。几年前，也就是 20 世纪 40 年代末，他已在美国社会里地位显赫，是他同代人里德高望重、万众瞩目的科学家和公共政策顾问——他甚至上过《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的封面。这期间，他读过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说《丛林中的野兽》。奥本海默对小说中一直折磨着主人公的忧心忡忡的情绪深感震惊。小说里的主人公被一个不祥之兆困扰着，他“心里一直被一件怪事缠绕着，这事情可能大得不得了，可能十分可怕，而且迟早会发生”。不管这是件什么事，他知

道这事会“吞没”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反共势力的日渐增长，奥本海默渐渐看出来了，那个“丛林中的野兽”正在等着他。他被国会清共调查委员会传讯，美国联邦调查局窃听了他家和办公室的电话，有关媒体报道了他的政治历史和政策意见，随即这些变成了恶意的谣传。凡此种种，使他感觉自己成了被追赶的猎物。20 世纪 30 年代期间，他在美国的伯克利参与过左翼活动。二战之后，他坚决反对空军使用核武器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的计划——他称这项计划是种族灭绝计划。他的这些行为激怒了华盛顿内部许多权势人物，其中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和刘易斯·斯特劳斯。

那天晚上，在乔治城赫伯特·马克斯夫妇的家里，他对自己何去何从考虑良久。赫伯特不仅是他的律师，也是他的挚友。赫伯特的妻子安妮·威尔逊·马克斯在洛斯阿拉莫斯给他当过秘书。那天晚上，安妮所看到的奥本海默几乎“濒临绝望的边缘”。然而，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奥本海默最后决定，不管麻烦有多大，他决不能对这项指控听之任之。他的这一决定既是信念使然，也有破罐子破摔的色彩。于是，在赫伯特的指导下，他起草了一封致“亲爱的刘易斯”的亲笔信。奥本海默在信中说，斯特劳斯是在怂恿他辞职。“你认为，我请求（原子能）委员会中止我的顾问合同，也许会是个皆大欢喜之举，因为那样就会蒙混过关……”奥本海默接着写道，他认真考虑过这个选择，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就等于说我同意了自己不适合为政府服务的看法，而我到现在已经干了差不多十二年。我不能这样做。如果我果真不称职，那么我就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工作这么长时间，也当不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主管，也不会在众多场合代表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学科发言”。

深夜时分，罗伯特身心疲惫，绝望至极。他喝了几杯饮料，上楼进了客人房间。几分钟后，赫伯特的妻子安妮和罗伯特的妻子基蒂——罗伯特的妻子跟他一起来到了华盛顿——听到“可怕的坠地声”。她们冲上楼去，发现卧室里没人，但卫生间的门紧闭着。安妮说：“我推不开门，罗伯特也不应声。”

奥本海默瘫倒在卫生间里，神志不清，身体抵住了卫生间的门。众人一点点把门推开，把昏迷的罗伯特挤到了一边。安妮回忆道，罗伯特醒来之后，“他喃喃自语”。他说他吃了一片基蒂的安眠药。“别让他睡觉。”医生在电话里嘱咐他们。于是在医生到来之前，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架着罗伯特走来走去，劝他喝下几口咖啡。

罗伯特的“野兽”向他发起了攻击，那场将要结束公共服务生涯的考验开始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考验的结果不仅提高了他的声望，也保住了他的遗产。

罗伯特从纽约市走向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道路——从无名之辈到声名显赫——使他得以参与许多领域里的重大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这些领域包括20世纪的科学、社会正义、战争和冷战。他的向导是他超凡的智慧、他的父母、他的道德文化学校的老师们和他青年时期的经历。在专业上，他的发展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在那里他学习了量子物理学，当时他就喜爱上了这一新兴学科，并成为其信徒。30年代，他在美国伯克利的加州大学。当他正在建设美国最大的量子物理研究中心时，他为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后果和法西斯在国外的兴起所震动，他和朋友们——许多人是志同道合者和共产党人——积极投身到争取经济正义和种族正义的斗争中来。那些年是他一生中最为开心的日子。十年之后，这些时光被用来堵住他的嘴。这提醒我们，要让我们所呼吁的民主站稳脚跟是多么不易，民主这个字眼多么需要精心的呵护。

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奥本海默在1954年所经历的痛苦和耻辱并非罕见，但作为一个被告人，没人能和他相比。他是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原子弹之父”，在战争年代，他率领科学家们为这个国家努力从大自然中夺取了可怕的太阳之火。之后，他明智地指出这种火的危险性，也指出它潜在的益处；再之后，他声色俱厉地批评核战争的建议，而这些建议正在为军方所采

纳,为学术界的战略家们所鼓吹:“如果一种文明总是把伦理认定为人类生活的基本成分,但却除了谈论博弈论术语或防御之外对毁灭所有人的前景三缄其口,那么这样的文明又意味着什么呢?”

20 世纪 40 年代末,美苏关系恶化,奥本海默就使用核武器的实质性问题不断提出的质疑,令华盛顿国家安全机构颇感头痛。1952 年,共和党重返白宫,斯特劳斯之流主张大规模核报复的官员们开始掌权。斯特劳斯及其同伙决心封住那个人的口,他们害怕奥本海默会令人信服地挑战他们所制定的政策。

为了诋毁奥本海默的政治和专业判断能力——实际上是对他的生活和他的价值观进行诋毁,奥本海默的批评者们于 1954 年揭露了他性格中的许多弱点:他既野心勃勃又缺少安全感,既才华横溢又幼稚可笑,既意志坚定又胆小怕事,既以苦为乐又心存困惑。原子能委员会的人事安全听证会的笔录——《关于 J. 罗伯特·奥本海默事件》——密密麻麻地记了长达一千多页,暴露了他的许多性格。然而,这份听证笔录也显示出,这个性格复杂的人从早年起就开始在自己周围铸造起一层掩盖自己情感的盔甲,他的对手很难穿透这层盔甲。本书力图挖掘隐藏在盔甲背后的神秘性格,这种性格从 20 世纪初罗伯特在纽约上西区的童年开始,一直伴随他到 1967 年去世。本书是一部非常个人化的传记。本书的研究与写作依据这样的理念:人一生中的个人经历决定了他的公共行为和他的决策(在奥本海默的案例中,甚至包括科学决策)。

本书的写作历经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从美国国内和国外的档案材料和个人回忆资料中查找了成千上万件原始记录。本书参考了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奥本海默本人的大量文件汇编,也调阅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对奥本海默进行监视留存下来的数千页记录。公职人员很少有人受到如此严密的审查。读者会“听到”联邦调查局录音并整理成文字的他

的讲话。不过,书面记录也只能道出一个人一生的部分真相,我们还采访了将近一百位奥本海默的亲朋好友和同事。许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接受过采访的人现在已经去世,但是这些人讲述的不同故事却绘成了一幅相差不大的肖像。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的肖像,他把我们带进了核时代,并且为找到一种根除核战威胁的方法坚持不懈地努力着。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因为我们仍在做着同样的努力。

奥本海默的故事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身份与核文化休戚相关。E. L. 多克特罗曾经说:"自1945年以来,原子弹就在我们的心里扎下了根。原子弹先是充当我们的武器,后来变成我们的外交政策,现在成了我们的经济政策。我们怎能设想具有如此巨大杀伤力的东西不会在四十年之后成为我们身份的基本要素呢?我们制造出来用以对付我们的敌人的核怪物成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核文化——包括它的逻辑、理念和看法。"奥本海默自己是释放核威胁的人之一,但他却努力限制这种威胁,勇敢地站出来,试图让我们避开核弹文化的侵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是他的一项控制原子能的国际计划,这项计划就是后来的"艾奇逊—利林塔尔报告"(但实际上主要是奥本海默构思和撰写的)。这个报告是核时代唯一的理性榜样。

然而,美国国内外的冷战政治使得此项计划无法实施,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美国和其他越来越多的国家都热衷于制造核弹。冷战结束后,核毁灭的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核战争与核恐怖在21世纪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我们更近。

在9·11事件之后的岁月里,特别值得记住的是,在核时代的初期,"原子弹之父"就告诫过我们,原子弹这种武器六亲不认,它一旦出现,美国就更易成为毁灭性攻击的目标。1946年,在一次参议院的小型内部听证会上,有人问他,"三四个人能不能把(原子)炸弹偷运进纽约市,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他明确地答道:"当然可能,能彻底摧毁纽约市。"一位参议员大为惊讶,接着问他:"如果在一个城市的某个地方藏有原子弹,你能用什么仪器把它侦

测出来?”奥本海默不无讽刺地回答:“用螺丝刀(撬开每一只木货箱或手提箱)。”唯有杜绝核武器,才是对核恐怖的有效防范措施。

没人听从奥本海默的忠告——最后他被封住了口。就像希腊那个不屈的普罗米修斯神一样——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偷来了火,送给人类——奥本海默为我们带来了原子之火。然而,当他想控制这束火时,当他竭力设法让我们明白原子之火何等可怕、何等危险的时候,当权者像宙斯一样勃然大怒,狠狠地惩罚了他。正如原子能委员会听证会里的反对者沃德·埃文斯所言,拒绝为奥本海默恢复名誉是“国家之盾上的污点”。

引　子

“见鬼，我偏偏深爱着这个国家。”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67年2月25日，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六百位朋友和同事——诺贝尔奖得主、政治家、将军、科学家、诗人、小说家、作曲家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熟人——顶着东北部地区的刺骨寒风，不顾天气恶劣汇聚到一起，共同哀悼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去世，追思他的一生。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老师，他们亲切地称他“奥比”；另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于1945年成了“原子弹之父”、民族英雄、作为国家公务人员的科学家的榜样，但人们也不无痛楚地记得，就在九年之后，新一届共和党政府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宣布他是国家安全的隐患——使罗伯特·奥本海默成为美国反共运动的头号受害者。因此，他们带着沉重的心情缅怀一位天才，他不平凡的一生有胜利的喜悦，也充满悲剧。

前来凭吊的诺贝尔奖得主有，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伊西多·I. 拉比、尤金·威格纳、朱利安·施温格、李政道和埃德温·麦克米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女儿来了，奥本海默曾是她父亲在高等研究院的上司。罗伯特·塞

培尔来了,20 世纪 30 年代他在伯克利当过奥本海默的学生,后来是他的亲密朋友,也是洛斯阿拉莫斯研究所的元老。康奈尔大学的大物理学家汉斯·贝特来了,他的研究揭示了太阳的内部活动规律。1954 年,奥本海默受到迫害之后,曾在宁静的加勒比群岛的圣约翰岛盖了一座海滨度假屋,当作他们一家人的避难所,格林是他们的邻居。此时,格林和美国外交政策界的显赫人物并排坐在一起:律师兼总统常任顾问约翰·杰伊·麦克洛伊、曼哈顿工程的军方总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海军部部长保罗·尼茨、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来自新泽西州的参议员克利福德·凯斯。林登·约翰逊总统派他的科学顾问唐纳德·霍尼希代表白宫参加了追悼会。霍尼希也是洛斯阿拉莫斯研究所的元老,和奥本海默一起参与了 1945 年 7 月 16 日进行的首次"三位一体"原子弹爆炸试验。在科学家和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中间,也能零星地看到作家和文人:诗人斯蒂芬·斯宾德、小说家约翰·欧哈拉、作曲家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和纽约市芭蕾舞团团长乔治·巴兰钦。

奥本海默的遗孀凯瑟琳·P. 奥本海默(人们都亲切地称她"基蒂")坐在普林斯顿大学亚历山大会堂的前排参加了悼念仪式。在许多人的回忆中,这次追悼会气氛凝重,甘苦混杂。和她坐在一起的是她们的儿女:年方 22 岁的托尼和 25 岁的皮特。坐在皮特身旁的是罗伯特的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他曾是一名物理学家,他的物理职业生涯被麦卡锡主义的风暴给摧毁了。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安魂曲》的旋律回荡在会堂里。去年秋天,就是在这座会堂里,罗伯特·奥本海默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就马上喜欢上了。汉斯·贝特第一个致悼辞——他认识奥本海默已有三十多年。贝特说:"在提高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的地位方面,他的成就超过任何人……他是一个带头人……但他并不霸道,他从不命令人们做什么。他激发了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就像好主人款待客人一样……"在洛斯阿拉莫斯,在同德国人进行制造原子弹的比赛中,奥本海默领导了成千上万人,把一片荒地变成了一座实验室,把一支庞杂的科学家队伍带成了一支高效的团队。贝特和其他洛斯阿拉

莫斯的元老们深知，如果没有奥本海默，他们在新墨西哥建造的初级“玩意儿”就不可能在战争中及时完成并派上用场。

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的邻居、物理学家亨利·德沃尔夫·史密斯第二个发言。1954 年，史密斯是原子能委员会五名委员中唯一一位投票赞成为奥本海默恢复名誉的人。奥本海默经受了秘密审问的“安全听证会”。作为现场的证人，史密斯完全明白这是一场闹剧：“如果这种冤案永远得不到平反，我们历史上的这个污点就永远不会被抹掉……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他为他的国家所作的巨大贡献得到了这般吝啬的回报……”

最后轮到乔治·凯南发言。他是一名老外交，当过大使，是美国二战后对苏扼制政策的策划人，也是奥本海默在高等研究院的长期同事和朋友。再没有什么人比奥本海默更能让凯南意识到核时代带来的巨大危险了。作为朋友，没人比奥本海默更亲密。奥本海默为凯南的成果辩护。当凯南跟美国军事化的冷战政策唱反调而沦为华盛顿的贱民时，奥本海默领导的高等研究院接纳了他。

凯南说道：“人类最近征服自然所获得的能量，已远远超出其道德力量所能掌控的限度。从来没有人像奥本海默这样不得不面对由此所产生的严酷问题。没有人比奥本海默更加清楚地看到，这种不断扩大的道德和能量的比例失调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险。这种担忧从未动摇过他的信念，他坚信寻找各种形式的真理，不管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都具有很高的价值。然而，他比任何人都更热诚地渴望能够为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导致的巨大灾难尽一份力量。在这里，他想到的是整个人类的利益。作为一名美国人，并通过其所属于的这个民族共同体，他看到了实现这些愿望的巨大可能性。”

凯南接着说道：“在 50 年代早期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当厄运接二连三地从四面八方向他扑来的时候，当他发现自己身处争议的漩涡中心的时候，我提醒他，国外有一百个科研中心欢迎他去工作，问他是否想过到国外定居。

他含着热泪回答我，‘见鬼，我偏偏深爱着这个国家。’”

罗伯特·奥本海默是个谜。作为理论物理学家，他展示出了领袖的魅力；作为美学家，他很讲究含蓄。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里，有关他的一生众说纷纭，有人把他的一生说成神话，有人觉得他的一生无比神秘。在像日本的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博士那样的科学家看来，奥本海默是“一个当代核物理学家悲剧的象征”；在自由主义人士看来，他是麦卡锡大清洗中最有名的牺牲品；对于他的政敌来说，他是地下共产党员，确凿无疑的骗子。

事实上，他是一个很富有人性的人，天资极高，性格却极为复杂；他出类拔萃，却又天真幼稚；他积极伸张社会正义，为政府咨询不知疲倦。他致力于让正在失控的军备竞赛悬崖勒马，因此他得罪了有权有势的高官。恰如他的朋友拉比所说，他除了“非常英明之外，还愚蠢透顶”。

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罗伯特·奥本海默身上看到了更为深刻、更令人痛苦的矛盾之处。奥本海默把毕生献给了科学与理性思考。然而，戴森认为，奥本海默决定参加研制种族灭绝的武器，就是“一种浮士德同魔鬼做的交易……当然，我们每个人仍然生活在这种交易之中……”，而且奥本海默还像浮士德一样企图跟魔鬼重新谈判交易的条件——他遭到了拒绝。他曾经率领众人致力于释放原子的能量，但是，当他想警告他的同胞们原子能的危险所在，抑制美国人对核武器的依赖时，美国政府开始怀疑他对国家的忠诚，并把他送上了审判台。他的朋友们把他的奇耻大辱与1633年另外一位科学家伽利略所受到的中世纪教会法庭的审判相提并论。还有人在这起事件中看到了丑陋的反犹影子，也使人想起19世纪90年代法国的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的冤案。

但是在这些类比中，没有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罗伯特·奥本海默本人，以及他的科学成就和他作为核时代设计师所扮演的独一无二的角色。本书要讲述的就是他的人生故事。



第一部分

1 | “任何新生事物在他看来都是完美的”

“我是一个淘气却又听话的好孩子!”

——罗伯特·奥本海默

20世纪初期,科学给美国带来了第二次革命。由于内燃机、载人飞机以及大量其他发明的出现,原本以马车为交通工具的美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新工具的发明很快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一群隐秘的科学家正在酝酿一次更加深刻的变革。理论物理学家正在改变我们理解空间和时间的方式: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亨利·贝克勒尔发现了放射现象;马克斯·普朗克、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等人进一步阐释了他们对自然界原子的看法;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他的相对论。瞬息之间,整个世界因此发生了改变。

科学家成为了繁荣经济、复兴理性主义和社会精英阶层的新英雄。在美国,改革向旧的秩序发起了挑战。西奥多·罗斯福用激进的口吻说道,只有利用科学技术才能为国家创造新的繁荣,只有这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

1904年4月22日,在这个充满希望的世界里,J.罗伯特·奥本海默降生了。他出生在一个移民美国的德国裔家庭。从种族和文化渊源来说,奥本海默一家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并不参加任何犹太人的集会。他们并不是否认自己犹太人的身份,而是把自己的身份限定为“道德文化社团”的成员。“道德文化社团”是犹太教在美国的唯一分支机构,他们宣扬理性主义和激进的人文主义。这也是当时迁居美国的移民解决其所面临困境的新方法。然而,罗伯特·奥本海默一生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一直持矛盾的心理。

就像“道德文化社团”的名字所暗示的一样,它并不是宣扬宗教,而是宣

扬一种反对自高自大、促进社会公正的生活方式。因此，这个在提倡自主研究、经验探索、自由思想和科学价值的社会里长大的小孩，后来成为享誉全球的“原子弹之父”并不是偶然的。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奥本海默把一生献给了社会公正、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而最后给社会带来的却是蘑菇云下的累累残尸。

罗伯特的父亲，朱利叶斯·奥本海默于1871年5月12日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东一个名叫哈努的小镇上。朱利叶斯的父亲本杰明·奥本海默是一个没上过学的农民，也是一个谷物贸易商。据罗伯特说，他的爷爷在“一个近乎中世纪的德国村庄”中的一间小屋里长大。朱利叶斯有两个兄弟和三个姐妹。1870年，本杰明的两个表兄弟通过结婚移民到了纽约。在几年的时间里，这两位年轻人——西格蒙德·罗斯菲尔德和所罗门·罗斯菲尔德——联合另外一个亲戚斯特恩开了一家进口男士西服衬套的小公司。公司在成衣制作方面的业务做得很好。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罗斯菲尔德兄弟曾告诉过本杰明·奥本海默说，公司为他的儿子们留了职位。

在大哥埃米尔去纽约的几年后，朱利叶斯于1888年的春天来到了纽约。这个高大瘦弱的年轻人被安排在公司的仓库里工作，负责分配衣服的拉链。尽管来到这家公司时他身无分文，而且不会说英语，但是他决定从头学起。他对颜色非常敏感，因而在这个城市里获得了一些声誉，成为最了解“纺织品”的人物之一。埃米尔和朱利叶斯安全度过了1893年的经济危机，并且在世纪之交朱利叶斯成为了罗斯菲尔德—斯特恩公司的全面合伙人。朱利叶斯穿着得体，他总是穿一套西装和一件白色高领衬衣，系一条很不显眼的领带。他的举止与他的穿戴一样完美。快30岁时，他通过自学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此外，他阅读了大量的有关美国和欧洲的历史。作为一名艺术爱好者，他把周末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游览纽约的艺术长廊上。

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认识了一位年轻的画家埃拉·弗里德曼。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褐色皮肤的女子，拥有苗条的身材、炯炯有神的灰蓝色眼睛和又长又黑的头发。美中不足的是，她有一只先天畸形的右手。为了遮住她的缺点，埃拉总是穿长袖衣服并且戴一双羚羊皮手套。在用来遮住她右手的手套上有一个粗糙的修补装置，这个装置通过一根弹簧与一根假拇指相连。尽管如此，朱利叶斯还是爱上了她。拥有巴伐利亚犹太血统的弗里德曼家族于19世纪40年代就定居于巴尔的摩市。埃拉1869年出生，家里的一位

朋友曾这样描述她:她是一个温柔、文雅、苗条、蓝眼睛的女人,非常机警而且很有教养,她总是想着怎样令人满意、令人高兴。在埃拉20岁时,她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巴黎研究早期的印象派画家,回来后她在巴纳德学院教艺术课。就是在那个时候,她认识了朱利叶斯。那时她已是一位小有成就的画家,有自己的学生,并且在纽约的一所公寓里有自己的工作室。

1903年3月23日,朱利叶斯和埃拉结婚了,并且搬进了第94街西250号的石质房子里。一年后,在历史上最冷的春天,34岁的埃拉艰难地生下了一个男孩。朱利叶斯原本打算给第一个儿子取名罗伯特,但是由于祖上的规定,他在最后一刻决定在罗伯特前面加一个字母"J"。实际上,这个孩子的出生证明上写的是"朱利叶斯·罗伯特·奥本海默",这表明朱利叶斯曾想过给孩子取与自己相同的名字。这些都无可厚非,但是给孩子取与在世的任何亲戚相同的名字都是违反欧洲犹太人传统的。但无论如何,这个孩子的名字是罗伯特,而且令人不解的是,这个孩子总是坚持说他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没有任何意义。显然,犹太传统在奥本海默一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罗伯特出生后不久,朱利叶斯把家搬到了位于河畔大道155号第十一层的一间宽敞公寓里,从那里可以眺望位于第88街西侧的哈得孙河。整个楼层都是他们的家,里面摆放着欧洲风格的精美家具。这些年来,奥本海默一家收集了由埃拉挑选的源自于法国后印象派和野兽派作家的作品。

周末的时候,奥本海默一家会背上背包乘车到乡下去兜风。当罗伯特还是十一二岁的时候,朱利叶斯在长岛的湾岸购置了一套价值不菲的度假别墅,罗伯特在那里学习了怎样驾船航行。在楼下的码头上停靠着朱利叶斯买的40英尺高的游艇。这艘华丽的"罗蕾莱"号游艇上配套设施相当齐全。就像这个家庭的一位朋友说的那样:罗伯特被父母宠着,他有他想要的一切,也可以说他成长于奢华之中。然而,尽管如此,罗伯特小时候的朋友没有一个会说他被宠坏了。"在金钱和其他物质方面,他非常慷慨,"哈罗德·彻尼斯这样回忆道,"他绝不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在1909年,当罗伯特还只有5岁的时候,朱利叶斯第一次带他横跨大洋到德国去看他的爷爷本杰明。两年后,他们又踏上了同样的旅程。那时候,爷爷本杰明已经75岁了,但他给孙子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罗伯特回忆道:"很显然,对爷爷来说读书是他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但是他已经不可能再去上学了。"有一天,当看到罗伯特在玩木砖时,本杰明决定给罗伯特一本建筑百科全书。他还给了罗伯特一套精美的传统岩石收藏品。这是一个装有二十

四块岩石样品的盒子，而且每块岩石上都贴有德国的标签。“从那以后，”罗伯特后来回忆道，“我变成一个热心但又带着孩子气的矿石收藏者。”回到纽约后，罗伯特说服父亲带他参加了断崖采集矿石的探险活动。河畔大道的房子里很快堆满了罗伯特的石头，每一块石头都整齐地贴着它的学术名称。朱利叶斯鼓励儿子培养自己独特的兴趣爱好，并且为他提供相关的书籍。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据罗伯特自己说，他对岩石的地质起源已经不感兴趣，而是着迷于水晶体的结构和极光。

从7岁到12岁这段时间里，罗伯特有三个独特且奢华的爱好：收集矿石、读写诗歌和搭积木。他也许会这样说，他之所以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这些活动上，并不是因为在其中可以找到伙伴，也并不是因为它们与上课所学的东西有关，而只是为了追求刺激。12岁时，他就已经使用家里的打字机与许多当地知名的地理学家通信，探讨他在中央公园学到的有关岩石形成的问题。

朱利叶斯对于孩子的这些成人化的兴趣持坚决鼓励的态度。他和埃拉都清楚自己的孩子是个天才。“他们羡慕他，担心他，而且爱护他，”罗伯特的堂弟巴贝特·奥本海默这样回忆道，“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始终被给予优越的机会，这使得他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节奏行事。”有一次，朱利叶斯给了他一副质量很好的专业望远镜，它很快便成了这个小孩最喜爱的玩具。也许罗伯特将来会这样说：“我认为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宽容、最仁慈的人之一，在父亲的心目中，对别人最大的帮助莫过于让他人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对于罗伯特来说，他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从孩提时代开始他便生活在书籍和科学的世界里。巴贝特·奥本海默还说道：“他是一个梦想家，对自己这个年龄段摸爬滚打的生活并不感兴趣，因此他经常被别人戏弄和嘲笑。”随着他逐渐长大，他的母亲时常为此担心。罗伯特说：“我知道她一直试着让我与其他的男孩一样，但却没达到预期的效果。”

1912年，当罗伯特8岁时，埃拉生了另一个男孩——弗兰克·弗里德曼·奥本海默。此后，她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这个新生儿的身上。这样的年龄差距使得兄弟俩在以后的生活中很少相互敌对。罗伯特后来说，因为年龄的差距，他不仅是弗兰克的哥哥，或许还是他的父亲。弗兰克的童年与罗伯特一样被父母宠爱着。弗兰克回忆道：“假若我们热衷于某事，我的父母便会去迎合我们的兴趣。”读高中的时候，弗兰克对乔叟的书很感兴趣，朱利叶斯立即到外面给他买了一本乔叟1721年版的著作。当弗兰克想吹长笛时，他的父母请来全美国最优秀的长笛演奏家乔治·巴雷尔教他。

1911 年 9 月，在第二次去德国看望爷爷回来后，罗伯特进入了一所独一无二的私立学校学习。几年前，朱利叶斯已经成为了“道德文化社团”的一名积极分子。因为费利克斯·阿德勒博士——社团的领导者和创建者——的缘故，他和埃拉才走到了一起。从 1907 年开始，朱利叶斯成为了该社团的理事。朱利叶斯的孩子们理所当然地到该社团在中央公园西开办的学校里接受小学和初中的教育。学校所奉行的理念是“行动高于信念”。这个于 1876 年创建的社团一直给它的成员们灌输着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思想：人必须对他所选择的生活和命运负责。费利克斯·阿德勒以及与他志同道合的那些优秀的老师们，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智力上都对罗伯特心智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1857 年，拉比·塞缪尔·阿德勒的儿子费利克斯·阿德勒在 6 岁的时候就跟着家人从德国移民到纽约。作为德国犹太改革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的父亲开始领导美国最大的改革社团——伊曼纽尔犹太教社团。费利克斯原本可以轻易地继承父亲的志向，但是年轻的他却回到德国进入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接触了许多关于上帝的全能性以及人对社会的责任等激进思想。他读了达尔文、马克思等很多德国哲学家的著作，这其中包括拒绝相信摩西五经出自神启的费利克斯·威尔豪森。费利克斯于 1873 年回到父亲的伊曼纽尔社团，并宣扬他倡导的“犹太教的未来”。年轻的费利克斯·阿德勒认为，为了在现代社会里生存下去，犹太教必须重新定位它的“狭隘排外思想”。犹太人必须站在劳动阶级的立场上，根据他们的社会问题和客观实际来定位自己，而不要简单地自认为是《圣经》上所说的“上帝的选民”。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费利克斯带领大约 400 名伊曼纽尔的成员离开了这个成熟的犹太人团体。在约瑟夫·塞利格曼和其他德裔犹太富商的资助下，他创建了一个名叫“道德文化”的运动。他们在周日上午举行集会，其间费利克斯会进行演讲。集会时会伴有管风琴音乐，但是没有祈祷者和任何的宗教仪式。从 1910 年开始——那会儿罗伯特刚好 6 岁，社团开始在第六十四街西二号的一间宽敞的会议大厅里举行集会。

“道德文化”是犹太教改革派的一个分支。这一运动起源于 19 世纪一些精英分子试图将犹太上层阶级融入到德国社会当中去的实践活动。费利克斯关于犹太人身份认定的激进思想，给在纽约的犹太富商们造成了很大冲击，因为他们正在与 19 世纪美国的反犹主义思潮作斗争。

费利克斯坚持认为，解决反犹主义的方法是在全球推广理性文化。有趣的是，费利克斯批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犹太独立运动的一个倒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具有分裂倾向的典型代表。对费利克斯来说，犹太人的未来在美国而不是巴勒斯坦。他这样说道："我会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洒在富贵草和落基山上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而不是徘徊在耶路撒冷山上的落日余晖，尽管它非常美丽。"

为了把他的理想转化成现实，费利克斯于 1880 年为工人的儿女们创办了一所免费学校，学校的名字叫作"工人学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 1890 年，由于学校的学生太多，费利克斯不得不靠招收一些自费学生来贴补社团的预算。当时许多好的私立学校都不招收犹太人，大量的犹太富商只有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工人学校去。到了 1895 年，阿德勒增开了一所高中并且把学校改名为"道德文化学校"。（几十年后，学校又改名为"菲尔斯通学校"。）当罗伯特 1911 年进校时，只有大约 10% 左右的学生来自工人阶级家庭，但是学校一直保持着开放和对社会负责的态度。这些来自于相对比较富裕家庭的孩子们被灌输着这样的思想：他们是准备去改造这个世界的，他们是现代道德思想的先锋。在学校里，罗伯特是一个明星学生。

毋庸置疑，罗伯特在成年时期对政治的敏感性，源自于他在费利克斯·阿德勒所创办的这所非同寻常的学校里所接受的进步教育。在他整个童年和受教育的形成时期，他被一群把自己看成社会进步的催化剂的人所包围。在世纪之交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道德文化社团"的成员在种族关系、劳动权利、公民自由和环境保护主义等政治性问题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例如在 1909 年，"道德文化社团"的重要成员亨利·莫斯科维茨博士、约翰·洛夫乔伊·埃利奥特、安娜·加林·斯宾塞和威廉·索尔特，都曾帮助筹建了"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莫斯科维茨在 1910 至 1915 年爆发的服装厂工人罢工运动中还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的成员还帮助创办了"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前身。尽管他们没有采取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社团的许多成员都是旨在社会变革中大显身手的务实激进分子。他们坚信一个好的世界需要勤奋工作、毅力和政治团体。1921 年，罗伯特刚从"道德文化社团"的高中毕业，费利克斯鼓励学生们去发展他们的"道德想象力"，去发现事物应有的状态而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

与许多德裔美国人一样，当美国卷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时，费利克斯感到非常沮丧和矛盾。当一艘德国潜艇击沉美国客轮"路易斯安娜"号时，他

支持对美国商船的武装，然而他反对美国介入军事冲突。但是，当威尔逊政府于1917年4月宣布参战时，费利克斯劝说社团的成员忠于美国。同时，他宣称不会把德国当作唯一的犯罪者。作为德国皇权的批评者，他对皇权统治的衰退和奥匈帝国的倒台表示欢迎；但是，作为一个激进的反殖民主义者，他公开谴责了英、法帝国主义之间虚伪的和平。因而，许多批评家指责他站在德国一边。当时对费利克斯十分敬仰的朱利叶斯·奥本海默作为社团理事，也同样对欧洲的战事和自己的德裔美国人身份感到矛盾。然而，没有证据显示年轻的罗伯特对此次冲突有怎样的看法，而他在社团学校的老师约翰·洛夫乔伊·埃利奥特则激烈反对美国的参战。

埃利奥特1868年出生在一个提倡废奴主义和自由思想的家庭。埃利奥特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个人生活上都非常坚强。1938年，当两名奥地利籍的社团领导人在维也纳被希特勒的盖世太保逮捕时，70岁的埃利奥特到柏林为了他们的获释同盖世太保商谈了好几个月。埃利奥特运用贿赂的手段成功地将这两个人解救出纳粹德国。

奥本海默兄弟在班里经常与其他人进行讨论。高年级的时候，罗伯特开始讨论国家的作用。他们的课程包括“政治伦理的简短问答”，这其中包括“忠诚和背叛”。这是一门教授处理社会关系和事务的非同寻常的课，它在罗伯特的内心深处扎根，并且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结出丰硕的果实。

“我是一个淘气却又听话的好孩子，”罗伯特回忆道，“我的童年生活并没有让我做好准备接受这个充满残酷现实的世界。”他这种躲避在家的生活，为他成为一个“混蛋”提供了一条“非正规的途径”。然而，这却造就了他内在的韧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对自身欲望的控制。这一点也许罗伯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作为父亲，朱利叶斯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走出家门与其他的同龄人融合到一起，于是朱利叶斯决定送14岁的罗伯特去参加夏令营。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科宁格夏令营是一个充满欢笑和友爱的人间天堂，但是罗伯特却把它看作一种煎熬。夏令营里有一帮以攻击害羞、敏感或是与众不同的学生为乐的少年。罗伯特在夏令营里的表现使他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其他人开始把他称为“美人儿”，并且无情地嘲笑他。然而，罗伯特并没有做出反击，他尽量逃避做运动，而且还是跟以前一样捡他的石头。

随后，罗伯特犯了一个错误，他写信告诉父母说，他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夏

令营，因为“其他的孩子正在教他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在收到信后，奥本海默一家立即到夏令营看望罗伯特，这使得夏令营营长宣布禁止在夏令营里讲色情故事。罗伯特被指泄密，而且在一天晚上被带到夏令营的冰屋里，衣服被脱光后还遭到其他人的拳打脚踢。最后，这帮孩子还把他的屁股和生殖器浸到绿漆里。罗伯特光着身子在冰屋里被整整关了一夜。他的一个朋友后来谈到这件事情时说，罗伯特曾经受过“折磨”。罗伯特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他既没有离开夏令营，更没有任何怨言。“我不知道罗伯特是如何度过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的，”他的朋友这样说道，“没有多少孩子能够做到，但罗伯特做到了。这真是太难为他了。”正像他的朋友发现的那样，在罗伯特看似脆弱而又稚嫩的外表下，隐藏着一种倔强自傲和坚强的性格，这种性格贯穿于他的一生。

回到学校后，罗伯特这种具有高深修养的个性被学校里体贴的老师们培养着。所有这些老师都是阿德勒博士细心挑选的作为进步教育运动榜样的人。他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老师阿尔贝塔·牛顿回忆说，教他是一件快乐的事，“任何新生事物在他看来都是完美的”。他阅读了柏拉图与荷马的希腊文版本著作以及凯撒、维吉尔和贺拉斯的拉丁文版本著作。

罗伯特总是很优秀。早在三年级时他就开始做试验，到五年级时已经10岁的他开始学习物理和化学。他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如此之大，以至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同意作他的导师。因为他跳了好几级，所以大家都认为他很早熟同时又非常不可多得。当他9岁的时候，别人无意中听到他对他的堂姐说：“用拉丁语问我一个问题，我用希腊语回答你。”

与罗伯特同龄的孩子们觉得他有时很孤僻，他总是忙于自己所想和所做的事情。他的同学回忆道，他呆呆地坐在教室里，就好像没有吃饱或喝足似的。还有一些同龄人认为他不善交际，不知如何与其他孩子一起相处。

在整个高中期间，赫伯特·温斯洛·史密斯是罗伯特的老师。史密斯在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于1917年到学校的英语系工作。才智聪明的他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被学校聘请来做教学工作。他对道德文化学校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以至于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坎布里奇。史密斯愿意终生在道德文化学校工作，最后他成了学校的校长。胸肌发达且喜欢运动的史密斯是个热情文雅的老师，他总是能够发现每个学生的兴趣所在，并把它联系到现实的谈话中。上完课后，学生们总是围在他的桌子旁，希望能够跟他多聊一会儿。尽管罗伯特的第一爱好是自然科学，然而史密斯还是发掘了他的艺术

爱好。他认为罗伯特的写作属于“华丽的散文体”。有一次,当罗伯特写完一篇关于氧气的趣味性散文时,史密斯暗示道,我认为你将会成为一个自然科学作家。史密斯成为了罗伯特的良师益友。“他对待学生非常和蔼,”弗朗西斯·弗格森回忆说,“他对我、罗伯特还有其他人都关爱备至,了解我们的困难并且建议我们该怎么做。”

还是高三学生的罗伯特,在上了奥古斯塔·克洛克的物理课后取得了重大进步。“他非常优秀,”罗伯特说,“上了他一年的课后,我非常高兴。我决定暑假期间和他一起为下一年的课程制作设备,到那个时候我将会有化学课。我们一个星期有五天的时间在一起,偶尔我们还到外面做采集矿物的郊游,并以此作为对自己的犒劳。”他开始做电解质和传导的试验。“我深爱化学,与物理相比,化学源于事物的内部,而且能很快把你所见到的和一些非常笼统的想法联系在一起,这些想法也许能够以物理的形式存在,但却很难被理解。”罗伯特非常感谢克洛克把他带到科学这条大道上来。“他喜欢在崎岖的道路上寻找某些东西的乐趣,他喜欢激发年轻人的这种兴趣。”

即使是在五十年之后,简·狄狄逊对于罗伯特还记忆犹新。“他非常容易脸红,”她回忆道,“非常腼腆、害羞,当然也非常有才气。大家很快都承认他非常与众不同。再加上优异的学习成绩,他一切都很好。”

在十六七岁的时候,罗伯特有了一个真正的朋友——弗朗西斯·弗格森。弗格森来自新墨西哥州,靠奖学金上了大学。在四年级的时候,他们俩成了同班同学。当弗格森和他于 1919 年秋天相遇时,罗伯特正在学滑翔。“他只不过是玩玩而已,只是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弗格森回忆说。除了历史、英国文学、数学、物理课之外,罗伯特还选修了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课程。“他一直得 A”,毕业时,他是代表他们班致告别辞的学生代表。

除了徒步旅行和收集石头外,罗伯特最主要的体育活动就是帆船运动。据说,他是个大胆且技术一流的帆船运动好手。因为年龄小的缘故,他只能在小船上磨练自己的技术。然而,当他 16 岁时,朱利叶斯给他买了一艘单桅帆船,他把它命名为“三甲基”号——这个名字源于一种叫环丙烷氧化物的化合物。他喜欢在夏天的暴风雨里航行,驾着帆船乘风破浪,从法尔岛的入海口径直冲向大西洋。在回长岛大南湾的返航途中,弟弟盘坐在驾驶舱里,而他却站在舱外,双腿夹着舵柄,对着狂风暴雨高兴地大声叫喊。

弗格森永远不会忘记他第一次和罗伯特一起航行的情景,那时两人都刚过 17 岁。弗格森回忆说:“那会儿正值春天,风很大很冷,海湾到处都是海风

卷起的小波浪,天还下起了雨。我有点害怕,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航行。但是他做到了,他已经是一个技术非常熟练的船员。他的母亲透过楼上的窗户看着他,非常地担心,但是他说服了母亲。虽然母亲很为他担心,但她必须忍受。风和海浪把我们全身都弄湿了。那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1 年春,罗伯特从道德文化学校毕业。那年夏天,朱利叶斯和埃拉带着两个孩子到德国去度暑假,罗伯特自己到柏林东北部的几个老煤矿进行了几个星期的矿石勘探。(有趣的是,四十年后德国人正是从这个地方为他们的原子弹工程挖掘铀矿。)

在那崎岖不平的地方露营了一段时间后,他带回了一大袋矿石标本,自己还染上了能够致命的战壕痢疾。他病得卧床不起,而且这使他不得不推迟秋季到哈佛大学的报到。为了让他恢复身体,他的父母强迫他待在家里。痢疾还使他得了大肠炎,这种病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困扰着他,而且如果多吃辛辣的食物就会使病情恶化。作为一个病人,他并不是很配合。那是一个长冬,被禁锢在纽约公寓的他有时表现得非常粗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于母亲的服侍置之不理。

到 1922 年春,朱利叶斯认为罗伯特已经康复并且可以出去了。最后,他还说服赫伯特·史密斯暑假带罗伯特到西南去旅行。这位道德文化学校的老师曾在去年暑假带另一个学生进行过类似的旅行,而且朱利叶斯认为,这次西部旅行将会使儿子的身体变得更硬朗些。史密斯很赞同朱利叶斯的想法。然而就在他们出发前,罗伯特的一个问题使他大吃一惊:他问史密斯先生能否同意他以史密斯弟弟的身份来进行这次旅行。史密斯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他无能为力,但他认为罗伯特是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感到不安。罗伯特的同学弗朗西斯·弗格森后来也同样推测,罗伯特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财富以及他和东方的联系很敏感,他去新墨西哥州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逃避这一切。另一个同学珍妮特·米尔斯基也觉得罗伯特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感到不安。"我们都这样觉得。"米尔斯基说。几年后,在哈佛大学的罗伯特似乎不再那么敏感了,他对一个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朋友说:"我们都是乘'五月花'号来的。"

罗伯特和史密斯从南部出发,越过了新墨西哥州的台地。在阿尔伯克

基,他们与弗格森一家待了一段时间,罗伯特在他们的陪伴下过得很愉快,这也铸就了一段长久的友谊。弗格森把他介绍给了阿尔伯克基的另一位同龄小伙伴保罗·霍根,这位同样早熟的少年后来成了一名成功的作家。

离开阿尔伯克基后,史密斯带罗伯特和他的两个朋友保罗与弗朗西斯,来到位于圣达菲东北二十五英里处的一个名叫"洛斯皮诺斯"的牧场。牧场主是一个名叫凯瑟琳·查韦斯·佩奇的28岁女士。这位端庄迷人的女士后来成了罗伯特一生的朋友。然而,一开始罗伯特就对凯瑟琳一见钟情,他被这个刚结婚的凯瑟琳所深深吸引。就在前一年,凯瑟琳病得非常严重,在她弥留之际,她嫁给了一个和她爸爸年龄相当的英国人温斯洛普·佩奇。佩奇是芝加哥的一位商人,他很少待在洛斯皮诺斯。后来,凯瑟琳奇迹般地康复了,她还和罗伯特成了好朋友。据弗格森说,他一直给她送花,而且只要一见到她,就会去奉承她。

那年夏天,凯瑟琳教他骑马,并且和他一起骑马到牧场周围的荒野里探险,有些时候这种探险要花五六天的时间。史密斯惊叹于罗伯特的耐力和在马背上的适应力。

史密斯在罗伯特14岁时就认识他了,罗伯特过去一直身体娇嫩,情感脆弱,但是现在,看到罗伯特能够在这种崎岖山间的艰苦环境里野营,史密斯开始怀疑一直以来困扰罗伯特的大肠炎是不是由于心理的影响才造成的——只要罗伯特听到别人在说犹太人的坏话,他的大肠炎就会发作。史密斯认为,罗伯特已经养成了"能够在艰难时刻排除不良因素干扰"的习惯,这是一种心理机能,史密斯觉得"越是危险的时候,越要让他吃苦"。

史密斯还想到最近弗洛伊德关于小孩成长的理论,而且根据和罗伯特在篝火边的谈话,史密斯得出的结论是:罗伯特有恋母情结。"我从未听他说过母亲的不好,"史密斯回忆道,"但对他父亲的批评却是一大堆。"

有一天晚上在篝火旁,罗伯特告诉了史密斯在科宁格夏令营里发生的冰屋事件。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对父亲开的服饰公司很敏感,他把它看作传统的犹太人的贸易。史密斯回忆1922年的西部之旅时说,当他们整理行装时,他让罗伯特把一件夹克叠起来放进手提箱里。然而,罗伯特却狠狠地看着他说道:"的确,裁缝的儿子就应该知道怎样做,难道不是吗?"

这些都过去了,史密斯认为,在洛斯皮诺斯牧场的这段时间,罗伯特无论在情感和自信心方面都成长了许多。他知道凯瑟琳肯定会相信这一切的,她的友谊对罗伯特来说尤其重要。

有一天，罗伯特、凯瑟琳和牧场的其他一些人从洛斯皮诺斯骑着驮马外出。他们从菜豆村西的里奥格兰德河出发，向南骑行，攀登到一万多英尺高的帕哈里托高原。他们穿越大峡谷——位于赫梅斯卡尔德拉境内的十二英里宽的碗状火山坑——往东北方向走了四英里的路程，他们来到了另一个大峡谷——洛斯阿拉莫斯。这个名字源自于长在该流域内的一条小溪边上的棉白杨的西班牙语读音。此处唯一的居住地是数英里之外的一所寄宿制男校。

物理学家埃米利奥·塞格雷看到后写道，那是一处“美丽的世外桃源”。这里草木葱郁，牧场学校矗立在北边两英里长的山顶上，它的南边是陡峭的大峡谷。1922 年，当罗伯特第一次来参观时，学校仅有二十五个男孩。大部分是有钱的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儿子。他们整年都穿短袖且睡在并不暖和的阳台上。每个人负责照看一匹马，他们经常到附近的杰米兹山背包旅行。罗伯特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这与他在“道德文化社团”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以后的时间里，罗伯特经常回到这个荒凉的地方。

罗伯特结束了他的暑假，离开了新墨西哥州荒凉而又美丽的山和沙漠。几个月后，当他听说史密斯又在准备去“霍皮人村庄”旅行时，罗伯特写信给他说：“当然，我非常羡慕。我看见你骑着马从充满沙尘暴危险的沙漠来到洒着落日余晖的山间，我看见你在佩科斯的草场上度过夜晚。”

2 | “独自的囚室”

“我正沿着一条清晰的轨迹前进的想法是错误的。”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22年9月，罗伯特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他被分到位于斯坦迪什楼面向查尔斯河的一个新生宿舍单人间。19岁的罗伯特已经长成了一个特别的美男子。他身体的每一个特点都发展到了极致：紧绷着的健康白皙皮肤之下是高高的颧骨；美丽明亮的一双碧眼，配上两道乌黑浓密的眉毛；粗犷、卷曲的头发上面长、两侧短，这使他看起来要比实际上高，也使得他那五英尺十英寸的瘦长身高更显挺拔。他是如此的轻——从没有超过一百三十磅——因此他总是给人一种瘦削的感觉。他笔挺的罗马式鼻子、薄薄的嘴唇和厚实略呈尖状的耳朵，勾勒出一个过分夸张而又精致的形象。他说的话都是完全合乎语法的，并且带着母亲教给他的词藻华丽的欧式礼节。但是当他说话的时候，他长长的瘦削的双手却使他的动作有些扭曲。他的样子看起来令人着迷，同时还有些许古怪。

随后三年在坎布里奇的生活，丝毫没有削弱他的外表所赋予的勤学刻苦、不善社交和不成熟的年轻人的印象。如果说新墨西哥的生活使他的性格变得开朗，那么坎布里奇的生活又将他赶回到从前的内向性格中去了。在哈佛，他的学识得到了发展，但是他在社交方面依然毫无建树，或者说至少对于那些了解他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哈佛就像是一个热闹的学术集市，充满了对思想的启迪，但它不能给罗伯特提供任何谨慎的指导和道德文化经验的培育。罗伯特自行其事，并由此退回到他的强大智力所确保的安全感。尽管他不想炫耀自己的古怪，但自己却无能为力。他的晚餐通常只有巧克力、啤酒

和菊芋,午餐也通常是"黑加褐"——一片顶端加巧克力糖浆、涂着厚厚黄油的吐司。大多数同学都觉得他很不合群。幸运的是,弗朗西斯·弗格森和保罗·霍根那时也都在哈佛求学,所以他至少有两个深交的朋友。但是他几乎没有交到新朋友。杰弗里斯·怀曼算是一个。他在波士顿受过良好的教育,正准备开始生物专业的研究生学习。"他(罗伯特)发现社会交际的调整非常困难,"怀曼回忆说,"所以我认为他常常不开心。"

内向而又睿智的罗伯特已经开始阅读诸如契诃夫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而他最喜欢的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霍根多年以后回忆说:"罗伯特在年轻的时候很忧郁,他会在某些时候从感情上囚禁自己一两天。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一次到两次,我很纳闷,不知道这是由什么引起的。"

在罗伯特大一时的那年春天,他和弗雷德里克·本海姆建立起了友谊。本海姆是一位医学院的学生,比他晚一年毕业于道德文化学校。他们在科学方面上有着共同的兴趣,他们甚至与弗格森一起准备依靠罗兹奖学金前往英格兰。罗伯特不久就把本海姆当作了新朋友。不像大多数的大学同龄人——他们趋向于有很多的点头之交,但是却没有几个深交的朋友——罗伯特的朋友很少但他们的友谊却很深厚。

1923 年 9 月,大二伊始,他和本海姆就决定共同分担坐落在奥本山大街 60 号一所老房子边的两个房间的房租,房间紧靠《哈佛克里姆森报》的办公室。罗伯特用他从家里带来的东方地毯、油画和蚀刻版画来装饰自己的房间,并且还一定坚持要用烧炭的俄国茶壶来煮茶。

与其说本海姆被他朋友的古怪所惊扰,倒不如说因为罗伯特的古怪而使他觉得有趣:"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是你身边令人觉得舒服的人,因为他总是给人感觉他在思考着非常深层次的东西。当我们在一起住的时候,他会连续数晚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尝试去解决一些有关普朗克常量或是类似的问题。我对他有种预感,他会突然之间一跃成为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而我在这里仅仅是为了能够顺利从哈佛毕业。"

与罗伯特住在一起往往会"有一点点紧张"。本海姆写道:"因为你不得不根据他的标准或者心情进行一些调整——他才是真正的主宰者。"不管艰难与否,本海姆与罗伯特一起度过了他们在哈佛的最后两年,这对本海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激励了他后来在医学研究领域的事业发展。

在这段时期,只有一个哈佛学生会不定期地拜访他们在奥本山大街的寓

所。威廉·克劳泽·博伊德是在化学课上认识罗伯特的,随后便立即喜欢上了他。“我们之间除了科学之外还有许多共同的兴趣。”他回忆说。他们二人都尝试过创作诗歌,有时是用法语,甚至模仿契诃夫的风格写过一些短篇故事。罗伯特经常叫他“克洛泽”,故意将他中间的名字拼错。博伊德打算在三年内完成他在哈佛的学业,因此他也像罗伯特一样为之不懈努力。但罗伯特很明显是花了很长时间在房间内学习,博伊德却只记得“他非常小心地不让别人在这方面赶上他”。他认为罗伯特会很聪明地跟他兜圈子。“他的思维非常敏捷。比方说,当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他在给出正确答案之前就已经给出了两到三个错误的答案,而此时我只能想出一个答案。”

刚开始的时候,罗伯特并不知道他应该选择哪条学术道路。他上了许多毫不相干的课程,其中包括哲学、法国文学、英语、微积分绪论、历史和三门理化课程(定性分析、气体分析和有机化学)。他简单地考虑了一下建筑学,但是因为他早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了希腊语,所以他也曾突发奇想地想成为一个古典学者,甚至是一个诗人或画家。“我会沿着一条很清晰的轨迹走下去的想法,”他回忆说,“是错的。”但是数月过后,他将自己最热衷的化学定为自己的专业。在决定要在三年毕业后,他选择了所允许的最多课程——六门,但是每个学期他又会旁听两到三门其他课程。他读了吉本所著的长达三千页的经典历史书《罗马帝国衰亡史》,同时他也广泛阅读了许多法国文学作品,并创作了一些诗歌,其中的一些曾出现在名为《猎犬和号角》的学生期刊上。“当我得到灵感,”他曾写信给赫伯特·史密斯说,“我草草写下一些诗,就如同你曾经清楚地说过,它们从来就不是为了让别人,也不适合让任何人去品味,因为那就好像强迫别人过度自慰一样。但是我会把它们锁在抽屉里一段时间,如果你想看的话我会把它们给你寄去。”在那一年,T. S. 艾略特的《荒原》出版了,当罗伯特读了之后,他立刻悟出了作家所具有的零星存在主义。他自己的诗以孤独和忧伤为主题。他在哈佛的早期曾写下了以下的诗句:

黎明赋予我们欲望,
而暗弱的晨曦却背叛了我们。
当天空中那一缕藏红,
渐渐退去直到灰暗,

当日光沦为一片贫瘠，
当烈焰将我们摇醒，
我们发现，
每个人都身处自己孤独的监狱里，
而交流的渴望变得
既珍贵，又渺茫。

在20世纪20年代的哈佛大学，政治文化完全是保守的。就在罗伯特入学不久，大学强制增加了学生配额以此来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到1922年，犹太学生的数量已经升至学校的21%。）1924年，《哈佛克里姆森报》在首页报道说，哈佛前校长埃利奥特曾公开讲过，“犹太民族”和基督徒通婚数量的增多实在是“太不幸了”。他说没有几例这样的婚姻最后证明是幸福的，因为生物学家发现犹太人具有“遗传上的优势”，因此这样的婚姻生出的孩子“只会像犹太人”。当哈佛开始接受为数不多的黑人学生时，劳伦斯·洛厄尔校长坚决反对他们在一年级的时候和白人学生同寝。

奥本海默对于这些事情是很警觉的。事实上，1922年秋天的早些时候，他加入了三年前初创的名为“学生解放俱乐部”的社团。该社团的初衷是为学生谈论时事和政治提供方便。1923年3月，该社团公开表示反对学校歧视性的招生政策。尽管社团以激进的观点赢得了自己的名声，但是罗伯特对此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他给史密斯写信称其为“愚蠢而夸耀的解放俱乐部”。

直到一年级期末，罗伯特才意识到选择化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是一个错误。“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就认为自己对化学的喜爱程度与物理一样，”奥本海默自己说，“很明显，当你开始阅读物理化学的著作时，你就会开始钻研热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的问题，并且想去解决它们……这是一幅非常奇妙的画面，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上过一次物理基础课。”尽管他是化学专业，那年春天，他还是想办法申请从物理系毕业，因为这样他就可以选择高级别的物理课程。为了证明他对物理有所了解，他列出了自己已读的十五本书的名字。几年过后，他听说教师委员会在商讨他的申请书时，其中的一个名叫乔治·华盛顿·皮尔斯的教授曾经调侃说：“很明显，如果他（奥本海默）说他读过这些书，他就是一个骗子。然而，单单就凭他知道这些书名，他就应该拿到博士学位。”

他的物理启蒙导师珀西·布里奇曼后来成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我认为布里奇曼是一位非常伟大的老师,”奥本海默回忆说,“他从来就不会满足于事物外表的状态,他一定要做深入探究。”布里奇曼则评价奥本海默说,他是“一名非常聪明的学生”,“他掌握了足够多的知识来解答问题”。但是当布里奇曼给他布置了一项化学试验作业,要求他用自制的熔炉来提炼一块铜镍合金时,奥本海默却“分不清焊铁的一端和另一端”。奥本海默在操作实验室里的检流计时是如此笨拙,以至于每次在他使用过装置后,别人都不得不重新替换里面精准的悬浮液。然而,罗伯特却一直坚持着,而布里奇曼发现结果足够有趣就会将它们刊登在科学杂志上。罗伯特在性格方面既很早熟,同时也很焦躁易怒。

1923 年 10 月,当时著名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在哈佛做了两场讲座,罗伯特两场全都参加了。在此之前,玻尔曾以“在原子结构和原子放射方面的发现”赢得了诺贝尔奖。奥本海默后来曾经说过,“很难想象我是怎样崇拜玻尔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奥本海默对玻尔的印象十分深刻。布里奇曼教授也写道:“玻尔给所有见过他的人留下的都是一种超乎寻常的愉快感觉。我还从来没有遇见一位像他这样思想单纯,没有任何狡诈的教授……在整个欧洲,他已经被当作科学之神来崇拜。”

奥本海默学习物理的方法有点随意。他专注于这一领域内最为有趣、最为抽象的问题,在最为枯燥沉闷的基础知识上面纠缠。多年以后,他直言不讳地说,在自己知识领域的空白部分他有种不安全感。“直到今天,”他在 1963 年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每当我一想到蘑菇云和弹性震动我就会感到惊慌失措。事实上,这里什么都没有——仅仅是一点皮毛而已。同样的道理,即使在那个时候,我的数学公式也是非常浅显……我上了利特尔伍德的数论课程。我感觉非常棒,但那并不是为了职业的物理研究而学习数学的途径。”

当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来到学校以后,只有罗伯特和另外一个在校生有勇气来选修这位哲学家和数学家的课程。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钻研怀特海和伯特兰·罗素合著的三册《数学的基本原理》。“我度过了一段非常令人激动的时光,”奥本海默回忆说,“怀特海已经忘记了《数学的基本原理》,所以和他一起学习这本书的时候,他既像一个老师也像一个学生。”尽管有了这些经历,奥本海默却依然认为自己在数学方面的知识还差之甚远。“我确实没有学到很多东西。我可能以一种不能积累多少学分的方式学了很

多,也就是说,通过和别人接触……我本可能学到更多的数学知识。我认为我会非常喜欢这种方式,但事实上,它却被我一直忽略,我缺乏耐心是一部分原因。"

即使在他的教育里面有空白,他和他的朋友霍根也承认哈佛让他们受益匪浅。1923 年的秋天,罗伯特给霍根写了一封充满挖苦的信,在信中他以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奥本海默)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你都想象不到哈佛是如何改变他的。我担心这样强迫他刻苦学习并不好。他谈论着最令人害怕的东西。就在几天前的晚上,我还和他发生争执,我说你不是相信上帝吗?但是他说他相信热学第二定律,相信汉密尔顿原理,相信伯特兰·罗素,而且也会相信弗洛伊德。"

在哈佛大学的这些日子,罗伯特和他在道德文化学校的老师们以及他在新墨西哥州的导师赫伯特·史密斯一直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1923 年冬,他试图用反讽来详细介绍他在哈佛的生活:"宽泛地讲,你问我在这里做什么?"奥本海默给史密斯写信说,"除了上星期在那令人恶心的短信中已经提到的活动中我出了力,我还写了不计其数的这样的便笺、诗篇、故事和其他类似的垃圾;我还去了数学图书馆,也去了哲学图书馆,这样把我的时间平均花在伯特兰·罗素和一位最为美丽、最为可爱的夫人身上——她正在写一篇关于斯宾诺莎的论文。多么迷人的讽刺,你不认为吗?我把不同的三个实验室都搞得很臭,听阿拉德(路易斯教授)讲关于拉辛的流言蜚语,和一些迷失的灵魂喝茶聊天。在周末外出,将低级的精力花在大笑上,最后精疲力竭。我还阅读希腊文,承认我的失礼,在我的书桌里翻来翻去寻找信件,希望自己已经死掉。看吧!这就是我的生活!"

尽管有点黑色幽默,但罗伯特依旧承受着周期性的抑郁之苦,其中的一些插曲是由他家人来坎布里奇所引起的。弗格森还记得有一次陪同罗伯特与他的家人——但不是他的父母——共进晚餐,作为他的朋友,他可以看见他因为过度礼貌,紧张得脸色都已经变绿了。事后,罗伯特拽着弗格森狂行数英里,一路都在以他平静的甚至听起来都有了生理问题的声音谈话,看起来散步似乎是他唯一的治疗方法。

回顾从前,他所有的朋友都注意到这些年来他似乎一直在与心魔抗争。奥本海默随后谈及生命中的这段时间时说:"我对自己的感觉,是最令我不满意的。我对别人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在现实面前也没有什么怜悯之情。"

不能得到满足的性欲，也隐藏在罗伯特的一些问题之中。在20岁的时候，他仍然是单身。他周围的朋友没有几个看见他与女人之间有过交往，并且更没有人记得罗伯特与女人有过约会。怀曼回忆说，罗伯特“太热衷于”学问“而无暇考虑女孩……我们都已经经历了许多风流韵事（在头脑里面）……也许我们缺少一些能够使生活变得轻松的世俗的风流韵事”。当然，此时的罗伯特内心澎湃着感情的欲望，这表现在他在这一阶段写下的一些有关性爱的诗句：

今夜她身着豹皮披肩，
那浸没水中的美腿，
闪烁着黑钻般的光芒，
连同那诱惑而隐约的闪烁，
激起一丝欢愉的渴望。

在1923年和1924年的冬季，他写下了自己称之为“我的第一首情诗”，向“一位正在写关于斯宾诺莎的论文的最美丽、最可爱的女士”致敬。他在图书馆远远地凝视这位神秘女士，但是很显然他并没有与之交谈过。

因为不能主动与之发展关系，他一直充满孤寂与期待，就像诗里面所写的，年轻的女孩会主动出击，“你必须来和我交谈……”，他感到“一丝微弱的期望和失望掺半的复杂感情”。当然，这种复杂的强烈感情，对于他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来说是很不寻常的，但是周围的人还是认为罗伯特并不孤独。

一次又一次地，每次当他陷入悲伤之中，罗伯特都向他多年的恩师寻求帮助。1924年的晚冬，一些感情危机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之中，因此他给史密斯写信。这封信并没有保留下来，但是我们却留下了罗伯特给史密斯回函的安慰信。“我想给我最大安慰的是，”他告诉史密斯，“你感觉到我的痛苦与你所经历过的有些相似。对我而言，从没有被别人经历过的事情此时正发生在我身上。这样的事情，无论在哪一方面对我来说都是如此无瑕和令人羡慕……事实上，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有这么多的好人我不认识，这么多的乐趣被我错过。但是有一点你是对的，至少对我而言欲望不是必需的，而是不适宜的。”

1925年6月，仅仅通过三年的学习，罗伯特就以最高荣誉的化学学士身

份毕业。在主任的名单上,他是被选中的三十名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成员之一。在那年给赫伯特·史密斯的信中,他半开玩笑地说:"每周我都要坚持不懈地读完五到十本科学著作,假装在钻研。以后即使我患了晚期老年失语症,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我仍然坚持认为,在大学时那样做是必要的。"

在数十年后,当他回顾自己在大学数年的生活时承认:"尽管我喜欢学习,但我要同时兼顾很多课程,因此很多都是蒙混过关的;所有的课程我都得了A,但是我觉得不应该。"他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迅速浅显又充满渴望地通晓物理学的一些方面,但同时又充满了许多空白并缺少实践和系统的理解"。

参加完学校的毕业典礼,罗伯特和两个朋友博伊德、本海姆私下里在寝室用实验室的酒精庆祝了一下。"博伊德和我当时都喝得醉醺醺的,"本海姆回忆说,"我记得罗伯特只喝了一杯就不行了。"之后周末,罗伯特带着博伊德来到湾岸的度假别墅,并驾着他心爱的帆船去法尔岛游玩。"我们脱下衣服,"博伊德还记得,"沿着海滩一直散步直到把皮肤晒得黝黑。"罗伯特原本是可以留在哈佛的——因为学校已经给他提供了毕业留校资格——但是他却有着更高更远的理想。虽然他学的是化学专业,但是物理学却在召唤着他,同时他也清楚,英国剑桥"更加靠近中心"。罗伯特期望杰出的英国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他在1911年以首先制作出原子核模型而闻名——能够将其收为门下,于是说服他的物理学教授布里奇曼写了一封推荐信。布里奇曼在信中坦率地写道,奥本海默"有着完美的领会能力",但"他的弱点是进行试验。他的头脑更善于分析而不是物理操作。他不适于在实验室里操作试验……我认为猜测奥本海默能否成功有点像在赌博,但如果他确实做到了,那将会是不同寻常的成功"。

对当时来说不同寻常的是,布里奇曼最后写到了奥本海默的犹太人背景。"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奥本海默是一名犹太人。他是一个高个子、长相俊朗的年轻人,且有着迷人的含蓄。我认为您会毫不犹豫地考虑他的申请。"

想到布里奇曼的推荐会让他进入卢瑟福实验室,罗伯特在他心爱的新墨西哥度过了整个8月份。他带着父母来到这里,并向他们介绍了他的天堂。奥本海默一家一度在圣达菲郊区主教的集会场所进餐,随后北上来到了凯瑟琳的洛斯皮诺斯牧场。"看来父母很喜欢这里,"罗伯特在给史密斯的信中自豪地写道,"他们准备去骑会儿马。奇怪的是,他们竟会喜欢这里繁琐的礼

节。”

刚从哈佛大学回来过暑假的霍根和罗伯特以及罗伯特的13岁的弟弟弗兰克一起在山上骑马。霍根回忆起当时他和罗伯特一起在圣达菲租到马匹，而后驰骋在湖岸，翻越了克里斯托山脉到达考尔斯。“我们在暴风雨中到达了山顶……那真是一场骤雨。我们躲在马匹身下吃午饭和橘子。我们都湿透了……我看了看罗伯特，突然发现他的头发因为静电原因都竖了起来。太有意思了。”

罗伯特很可能是在这些长途旅行中有了吸烟的经历。佩奇告诉孩子们要轻装上阵，尽可能减少负重。有一天夜里，罗伯特发现他的食物吃完了，于是有人递给他烟斗来抵御饥饿。烟斗和香烟迅速成为了他一生的嗜好。

当罗伯特回到纽约拆开新信件时，才得知卢瑟福拒绝了他。“卢瑟福不要我了，”奥本海默回忆道，“他不看重布里奇曼的推荐，并且我的证明看起来很奇怪。”卢瑟福把罗伯特的申请转给了他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继任者约瑟夫·J. 汤姆森。69岁的汤姆森已经因发现电子而获得过190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以工作勤勉著称。1919年他已辞去了行政职务，到1925年他偶尔会去实验室并指导个别学生。在得知汤姆森同意指导他后，罗伯特显得无比兴奋。他已经选择物理作为自己的职业，并且信心十足地相信他和物理学的未来在欧洲。

3 | “我步履维艰”

“我现在的状态不是很好，我不敢见你，因为我害怕一些戏剧性的事情发生。”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26 年 1 月 23 日

在哈佛学习对于罗伯特来说是一段纷繁复杂的经历。他在智力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他的社会阅历仍然使他的情感生活异常紧张。他以前的生活和日常工作曾为他提供了一种保护，他一次又一次地成为班上的超级明星；而现在，这种保护已经消失，他即将经历一系列近乎于灾难的危机，这些危机将从那年的秋天一直持续到 1926 年的春天。

1925 年 9 月中旬，他登上了驶往伦敦的轮船。他和弗格森约定两个人在位于英格兰西南多塞特郡的一个名为斯沃尼奇的小村庄见面。弗格森整个夏天都与母亲在欧洲游历，现在急切地需要一名男性同伴。整整十天，他们一直沿着海岸悬崖行走，互相倾诉最新的历险。他们尽管已经有两年没见面了，但是依旧通过信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当我在火车站遇见他的时候，”弗格森后来写道，“他看起来更自信，更强壮，也更挺拔……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困窘了。我在后来才发现，这些都是因为他与新墨西哥州一位迷人的非犹太女孩相爱的结果。”然而，弗格森感觉到，罗伯特虽然已经 21 岁，但仍然对性生活茫然不知。

那个时候，弗格森作为获得罗兹奖学金的研究生，在牛津已经度过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弗格森一直就要比罗伯特成熟，而现在罗伯特却发现自己正被他朋友的放松和社交的圆滑所困惑。一开始，弗格森有一个相处了大约三年的女朋友——她是一个名字叫弗兰西斯·姬莉的年轻女孩，罗伯特在道德文化学校时就认识她。罗伯特发现自己很嫉妒他朋友的圆滑世故。他们选

择了不同的道路——一个前往牛津,一个去往剑桥——两人约定在圣诞节假期时再相见。

罗伯特到达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时候,正是物理学界值得庆贺的时期。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一些欧洲的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和维尔纳·海森堡,以及其他的一些著名物理学家——正在构建一个被称为量子物理(或是量子力学)的理论。简单来说,量子物理就是研究适用于极小级分子和原子级现象的变化规则。量子理论不久就取代了经典物理学而被用于解释亚原子的现象,比如说电子围绕氢原子核旋转。

然而,如果说这是欧洲物理学家的激情年代,那么奥本海默和其他的美国物理学家则对此一窍不通。"我当时对这个不甚了解,"奥本海默回忆道,"直到我来了欧洲后,我都对电子的旋转一无所知。在美国也是直到 1925 年的春天,我才相信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

罗伯特住进了一间条件极差的公寓,后来他戏称其为"悲惨的洞穴"。他一日三餐均在学校吃,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汤姆森的地下实验室的一隅。他在那里尝试着制作薄薄的铍膜,以便对电子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因为它要求将铍汽化到火棉胶上面,之后还要人费力地把火棉胶去掉。这个笨拙而又不适合他的工作,使得罗伯特不久就选择开始远离实验室。他花时间参加各种各样的研讨会,阅读大量的物理杂志。他发现自己的实验室工作"形同虚设",但是这里却为他提供了与著名物理学家如卢瑟福、查德威克和 C. F. 鲍威尔见面的机会。"我见到了我非常喜欢的(帕特里克·M. S.)布莱克特。"奥本海默二十年后回忆道。布莱克特——在 1948 年赢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不久就成为了奥本海默的导师。他是一位对社会主义政治了解颇深的高雅直率的英国绅士,布莱克特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在剑桥完成了他的物理学业。

1925 年 11 月,罗伯特给弗格森写信道:"这个地方很富有,而且到处都充斥着甘美的财宝。"但是他也放下架子承认:"我过着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实验室的工作很无聊,而且我做得很不好,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自己是否能学到东西……连讲座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他在实验室工作上的困境,是由他糟糕的情绪状态所引起的。有一天,有人发现他正盯着一块空白的黑板看,手里还攥着一支粉笔,嘴里不停地一遍又一遍地念叨:"关键是……关键是……关键是……"他在哈佛的朋友怀曼

当时也在剑桥，就已经发现了奥本海默情绪抑郁的征兆。有一天走进他的房间，怀曼发现罗伯特躺在地板上，一边呻吟一边滚来滚去。另一次类似的情况是，怀曼说奥本海默曾经告诉他，“他在剑桥感觉很糟糕，很不愉快，以至于他经常会躺在地板上滚来滚去——他就是这样告诉我的”。还有一次，卢瑟福亲身经历了奥本海默一头栽倒在实验室地板上的情形。

对他来说，他的一些密友过早地被家庭生活所羁绊使他很不舒服。他在哈佛的室友本海姆也在剑桥，遇到了一个很快成为他妻子的女人。罗伯特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和本海姆的友谊正在渐渐消失。

罗伯特对朋友的要求太多了。“在某种程度上，”本海姆说，“这就像是一种放松……他的专注和压力经常会使我有一点不舒服。”同样的，罗伯特也很惊奇地得知，他在道德文化学校的同学简·狄狄逊已经结婚了。罗伯特一直都很喜欢简。他也常常会想起这个与他同龄的女孩已经嫁给了一个法国人，并且还有了孩子。

到那个秋季学期末，弗格森得出结论，罗伯特已经患上了“一级抑郁症”。他的父母对于自己的孩子陷入抑郁的事情也略有所知。据弗格森说，罗伯特的抑郁“日益加深，而且通过他与母亲的争斗而变得明显了”。埃拉和朱利叶斯现在坚持要跨过大西洋与他们处于困境中的儿子见面。“他需要她，”弗格森在日记里写道，“但是又感觉到他不应该鼓励她来……为此，他要踏上开往南安普敦的火车，在那接他的母亲，他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

弗格森在接下来的冬天里见证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但是很明显，弗格森记录中的一些细节极有可能是源于罗伯特本人的叙述。罗伯特用生动的想象力来为自己的故事增色。弗格森的《罗伯特·奥本海默欧洲旅行的描述》只是简单地注明“2月26日”，书的内容说明是写于1926年2月。无论如何，弗格森直到罗伯特死后多年才公布他的秘密。

在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下，罗伯特还是在原定时间前往码头去接他的父母。他在甲板上看见的第一个人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在道德文化学校的同学伊内兹·波拉克。伊内兹在瓦萨的时候，罗伯特与她通过信，而且假期中在纽约偶遇过她。在几十年后的一次访谈中，弗格森说，他认为埃拉“看见过罗伯特和这个女人在纽约一起出现过，而她尝试过让他们在一起，但是未能如愿”。

在他的“日记”里，弗格森写道，当看到伊内兹在船甲板上时，罗伯特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转身就跑。“很难说谁更恐慌，是伊内兹还是罗伯特。”据弗格

森的回忆,在当时,埃拉原以为伊内兹对她的儿子来说"毫无价值",因此当她一见到罗伯特实际上对这个女孩感兴趣的时候,她就立马把罗伯特丢在一边,而去跟伊内兹说话,问其旅途是否劳累。

伊内兹陪同奥本海默一家人到了剑桥。罗伯特忙于自己的物理学,但是到了下午他会同伊内兹一起漫步于小镇。据弗格森说,罗伯特经历了向伊内兹的求爱行动。他"做到了一次出色的、看似深情的模拟倾情,而她也以好意相回应"。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这一对情侣至少是非正式地订婚了。接下来的一个晚上,他们去了伊内兹的房间并一同躺在床上。"他们就躺在那里,随着冰冷的寒意袭来而颤抖,惊恐地不敢做任何事情,然后伊内兹开始哭泣,接着罗伯特也开始哭。"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人敲门,然后他们听到奥本海默太太的声音说:"让我进去,伊内兹,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我知道罗伯特藏在这里。"埃拉最终生气地跺着脚离开了,然后罗伯特怀着可惜与羞愧的心情也离开了。

伊内兹随即去了意大利,随身带着准备送给罗伯特作礼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的《群魔》。自然地,这段关系的破裂更加深了罗伯特的抑郁。就在课程因圣诞节而中断的时候,他给赫伯特·史密斯写了一封非常忧伤的信,为他的沉默而道歉。他解释说:"我确实曾为生计而忙于工作……我没有写作,仅仅是因为我不敢担保能否写出像样的文章来。"

在他的亲戚朋友看来,罗伯特的精神状况一直在恶化。他好像也惊讶于自己的乖僻、缺乏信心和顽固不化。在他众多的抱怨声中,他常提到他与导师布莱克特的糟糕关系。罗伯特喜欢布莱克特而且渴望得到他的肯定,但是布莱克特作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总是强迫罗伯特做一些他不擅长的实验室工作。布莱克特没考虑过这些事情,但是在奥本海默看来,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危机。

1925 年的秋末,罗伯特所做的一件相当愚蠢的事情似乎证明了,他无法承受那么大的精神压力。抑郁和强烈的嫉妒驱使他用从实验室带回来的化学药品做了一个毒苹果,然后把它留在布莱克特的桌子上。怀曼后来说道:"不管这是一个假想的苹果,还是一个真实的苹果,不管是什么,这都是一种嫉妒行为。"幸好,布莱克特发现了这件事,并没有吃那个苹果,但学校行政部门还是得知了这件事。两个月后,罗伯特自己向弗格森承认是他下的毒,这好像不真实,但他就是这么说的。而且他说,他是用氢化物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来做的。

当时，罗伯特的家人仍在剑桥，学校的领导马上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朱利叶斯费尽周折，最终说服了学校不要提起刑事诉讼，在经过受保护的谈判之后，最终达成协议让罗伯特留校察看，并参加英国哈里街著名精神病专家的治疗。正如罗伯特早年在道德文化学校的导师所说的，“他被留校察看了一段时间，仅仅是由于他要定期看心理医生”。

罗伯特到伦敦旅行是为了上定期的治疗课程，但这不是个好的经历。一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专家诊断他是早发性痴呆症，是一种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古老症状。他的结论是奥本海默无可救药了，“更多的治疗只能有害无益”。弗格森有一天去看奥本海默，那时罗伯特刚结束了一次心理治疗。“当时他看起来很疯癫，我见他站在拐角处等着我。他的帽子是歪的，看上去明显有点怪，他像是在漫无目的地走走晃晃，又像是准备要跑或是做什么激烈的事。”两个老朋友走在一起，罗伯特以他奇怪的步伐行走，他的双脚夸张地扭成一个角度。“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有人愚蠢地跟踪他，并且说他比医生更真实地了解自己的处境。”弗格森那时仍不知道毒苹果事件，所以他不明白是什么导致了他的精神疾病。虽然他朋友的情绪很低落，但弗格森对他的朋友很有信心，认为他一定能战胜挫折。

但是危机并没有过去。圣诞节期间，罗伯特沿着坎卡尔村的布列塔尼海岸散步。他记得父母曾带他来这里度假。那是一个下着雨的沉闷的冬天。几年之后，罗伯特说他有一种清晰的意识：“我当时快要爆炸了，这是慢性病。”

1926年新年过后，弗格森打算去巴黎和罗伯特会面，因为罗伯特的父母让他在巴黎度过剩余的六星期寒假。在巴黎的街道一次漫长的散步中，罗伯特对弗格森敞开了心扉，并对弗格森说了是什么促使他来伦敦找精神病专家。在这时，弗格森认为剑桥不会让他回去了。弗格森回忆说：“我很沮丧，但是他能谈论这个说明他已经克服了困难，但他和他父亲之间还有点问题。”罗伯特知道他的父母很担心他，他们试图帮助他，但没什么效果。

弗格森说，罗伯特每天只睡一小会儿，他还有点同性恋倾向。有一天早上，他把他妈妈锁在房里然后离开了。他母亲埃拉很生气，她坚持要给他找个心理医生。几次诊断后，医生说罗伯特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还伴有性挫折感。他说他是性挫折加上性欲旺盛。几年后，弗格森说，那时罗伯特已经彻底失去了他的性生活。

罗伯特的感情很快发生了另一个转变。有一次在旅馆，弗格森看着他的朋友处于一种极端失落的情绪中。为了使他高兴，弗格森让他看了女朋友姬

莉写给自己的信。弗格森说她开始接受他了。罗伯特听了这个有点发呆，然后他一下子爆发了，当我弯下腰捡一本书时，他一下子骑到我身上，把一根皮带缠到我的脖子上。我被勒了一会儿，我们肯定弄出了许多声音，后来我把他摔倒在地上，他趴在那里哭了起来。罗伯特肯定是嫉妒他朋友的恋情。他曾因为本海姆有了女朋友而和他绝交。在相同的情况下再失去一个朋友会让他接受不了。弗格森发现，罗伯特看他女朋友的眼神带有威胁的意味。

弗格森明白，他的朋友受了精神上的打击，但他觉得罗伯特一定能站起来。“他明白我知道这是一个暂时的刺激。如果我不清楚他变得有多快就会更加担心。我非常欣赏他。”两个人仍是一生的好朋友。在那次打击后的几个月里，弗格森变得更加谨慎。他搬出旅馆，但当罗伯特坚持要他在春天来剑桥看他时，他显得很犹豫。罗伯特无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困惑，弗格森也是。罗伯特给他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说：“你不应该仅仅写信，你应该把剑桥当作朝圣地，穿着朝圣衣，在雪地里和其他的朝圣者一起前往。但是，我会保持我的懊悔和感谢，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惭愧，直到我能做些对你有帮助的事。我理解不了你的自制和善心，但是你应该知道我不会忘记它们。”经过所有这些事后，罗伯特变得更了解自己的心理，并且有意识地努力控制他那脆弱的感情。在1926年1月23日给弗格森的信中罗伯特说，他的精神状态不是太好，现实和自己的无能为力使他变得疯狂。他坦白地说：“我现在的状态不是很好，我不敢见你，因为我害怕一些戏剧性的事情发生。”

排除了疑虑之后，弗格森最终同意了那年早春去剑桥。“他把我安置在隔壁的房间，我记得我曾经想过最好确保他夜里不会突然出现，因此，我拿了一把椅子堵在了门后。然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个时候，罗伯特好像正在康复之中，当弗格森轻描淡写地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他不需要担心，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事实上，罗伯特去见了另一位心理医生——四个月当中的第三位。在这个时候，他也已经读过了许多关于心理分析的内容，并且据他的朋友约翰·埃兹尔说，他十分严肃地对待这件事。他还认为，他的这位新的心理医生比他在伦敦和巴黎所看过的所有医生都更加聪明，更加明智。

直到1926年春天，罗伯特都一直坚持做心理治疗，但是在这之后，他和医生的关系破裂了。6月的一天，他拜访埃兹尔的住所时告诉埃兹尔，“继续做心理分析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赫伯特·史密斯后来在纽约时遇到了一个朋友，他是精神病方面的专

家。他知道这件事，并对史密斯说，罗伯特在剑桥治疗时，“给他的医生唱了带有侮辱性的歌，并且跳了令人不能容忍的舞……问题就在于，他把自己当作一个比给他做治疗的医生更具才干的精神病专家，而周围再也没有其他人了”。

1926年3月中旬，罗伯特离开了剑桥开始了一段小小的假期。他的三个朋友怀曼、本海姆以及埃兹尔说服了他与他们一起去科西嘉岛。在这十天的日子里，他们沿着岛屿骑车，夜晚住在小村庄的旅馆里或者露营。这个岛上陡峭的山和光秃秃的台地，也许使罗伯特想起了新墨西哥州的崎岖美景。罗伯特的抑郁心情会偶尔反复，并且还会时不时地讲讲他的沮丧心情。最近几个月，他阅读了大量法国和俄国的文学著作，当他们爬山时，他很有兴致地和埃兹尔争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优缺点。有一天晚上，被一阵雷暴雨淋湿了以后，这些年轻人在附近的一个小木屋下面找了块避雨的地方。当他们把湿衣服挂在火堆旁边并且挤成一团时，埃兹尔坚持己见说：“托尔斯泰是我最钟爱的作家。”“不，不，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好，”奥本海默说道，“他洞悉了人们内心的灵魂和痛苦。”

后来，当谈话转向了他们各自的未来时，罗伯特谈论道：“我最崇敬的是那种在很多方面都很杰出，但是脸上却始终还是带着泪痕的有情感的人。”

在科西嘉岛，怀曼认为罗伯特“正面临一场很大的情感威胁”。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数十年以后怀曼回忆道：“有一天，当我们快结束科西嘉之旅的时候，我们住在了一栋小木屋里面，我们三个人——埃兹尔、奥本海默和我——正在一起吃晚饭。”侍从走到奥本海默身边告诉他下一班去法国的轮船离开的时间，埃兹尔和怀曼都很吃惊地问他为什么要赶在计划之前匆匆离开。“我实在不想谈论此事，”罗伯特回答道，“但是我必须得走了。”晚上，他们喝了一点酒之后，他的态度变得温和了一些，说：“也许我可以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要离开，因为我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把一个有毒的苹果放在了布莱克特的桌子上，所以我必须回去看看情况怎样。”埃兹尔和怀曼都惊呆了。“我一直不知道究竟这是真的还是他的想象。”怀曼回忆道。奥本海默没细说，但他的确提到他被诊断为早发性痴呆症。先不考虑毒苹果事件是不是在那个秋天确确实实地发生了，怀曼和埃兹尔认为，罗伯特是在一时的嫉妒心的驱使之下才做了这件事。但埃兹尔随后补充道：“他，也就是罗伯特，在讲这件事的时候有一种逼真感，我和怀曼都觉得这一定是他的幻想。”

数十年以后，毒苹果事件的真实性已经由于冲突的原因而变得更加模糊了。然而在1979年与马丁·舍温的会面中，弗格森把它明朗化了，他说这件事发生在1925年的深秋，而不是1926年的春天。“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他（罗伯特）第一次去剑桥的时候，也正好是我在伦敦见到他将要去看精神病医生之前。”当舍温问及他是否真的相信“毒苹果”这件事时，弗格森回答道：“是的，我绝对相信。后来他的父亲为了这件事游说了剑桥的管理层。”1976年，弗格森与艾丽丝·金博尔·史密斯聊天的时候还提到，“当他试图毒害他身边的人时……就在那个时候或是晚一点的时候，在巴黎他告诉了我事实。我总是认为这可能是真的，但我不确定。他那个时候做了很多疯狂的事情。”

奥本海默那困惑的青年时代终于快要结束了。在科西嘉短暂停留的那段时间，他身上发生了某些近似于觉醒的改变。无论是什么事，奥本海默都肯定留下了一种尚待发掘的神秘，也许是一段转瞬即逝的艳遇——但可能性不大。几年之后，他对戴维斯的疑问这样回答：“在科西嘉，那位精神科医生只能算是接下来所发生一切的序曲。你想知道我是否会告诉你整个故事，或者你自己也一定会把它弄得水落石出，但没几个人知道此事，就算他们知道也不会告诉你。这是没办法查清楚的。你所要知道的是，这件事绝不单纯是一场艳遇，根本不是艳遇，而是真爱。”这次意外的邂逅对奥本海默来说有一种神秘感，堪称超凡的意义：“今后，我所知的离别只是地域意义上的，但对于我来说，这其实算不上什么真正的离别。”他对戴维斯说：“这是一件我生命中的大事，此中珍贵和持久的部分，现在对我来说更加重要。而当我在晚年回首往事时，它甚至会变得比现在还要重要。”

那么在科西嘉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奥本海默故意把戴维斯提出的问题回答得模棱两可，难以捉摸，以此来刁难这位为他写传记的作家。他含糊其辞地称其为“爱”同时又不是一次“单纯”的艳遇。显然，两者的差别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在他的那帮朋友当中，他并没有同谁来过一场真正的艳遇。但是，他确确实实是读了一本书，看上去是此书给他带来了一次顿悟。

这本书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一本神秘和存在主义的典籍与奥本海默备受煎熬的灵魂相契合。之后，他对伯克利的朋友哈康·希瓦利埃坦言，在科西嘉徒步旅行的那段日子里，在夜晚摇曳的烛光下读着那本书，曾是他生命中宝贵的经历之一。这本书把他从自己的消沉中解救出来。普鲁斯

特的这部著作是一本关于内心自省的经典小说，给奥本海默留下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距奥本海默第一次读普鲁斯特十余年之后，希瓦利埃惊讶地发现，他竟能全凭记忆背出第一卷中一段有关残酷的论述：

> 如果她能从自身中看出，其实同所有人一样，自己对给别人造成的痛苦持有一种冷漠之态，那么或许她就本不该把邪恶看成是如此罕见、非同寻常而又遥不可及的状态，并认为到此便万般释然。正是那种内心的冷漠，无论人们冠于它何种称谓，都是一种可怕且永恒的残酷。

作为一个在科西嘉的年轻人，罗伯特无疑将这些话语铭记于心，因为他从自己身上看出了这种对给别人造成痛苦的冷漠之态。这是内心自省后的痛苦顿悟。一个仅能在人类内心层面上思索的人，或许洞察出他那阴暗且载满负罪感的意象可以拥有一种诠释并留下某种真实的印记。正是记录在此书中的印记，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罗伯特心灵的重负。他欣慰地得知自己并不孤独，因为这是人类的一部分现状。他没有必要摒弃自身，他能够去爱。或许这些能帮我们清除疑虑，特别是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罗伯特可能告诉自己是那本书——而并非一个精神病专家——把他从自我绝望的黑洞中拯救了出来。

奥本海默带着一种对人生更轻松、更释然的态度回到了剑桥。“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宽容、更平和了，”他回忆道，“现在我可以同其他人相处了……”当他看不起那些实验室的工作，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不适合做一名实验物理学家后，他就明智地转而研究起抽象的理论物理学。甚至在那漫长如严冬般的消沉中，他仍尽可能地去阅读，他认识到整个领域正处于一种动荡变革的状态之中。

1926 年初，他在读了德国青年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的一篇文章之后，意识到自己脑中正浮现出一种有关电子运动方式的全新思维模式。几乎是与此同时，一位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埃尔文·薛定谔发表了一项关于原子结构的全新理论。薛定谔提出设想，电子的运动方式更近似于在原子核周围做曲线运动。同海森堡一样，他用数学方法精心演绎了自己的流体原子论并称其为量子力学。读了这两篇文章之后，奥本海默猜想，在薛定谔的波动力学和海森堡的矩阵力学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联系。事实上，他们的看法只不过

是同一个理论的两个不同版本。

量子力学那时已经成了热门话题。奥本海默回答说:“我们才刚刚开始,但我越来越感兴趣了。”那年春天,他还同时遇上了一名年轻的物理学家保罗·迪拉克。保罗当时正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候,他已经在研究量子力学的根本性问题了。罗伯特很客观地评价了迪拉克的工作。这些工作不容易理解,他也不是很关心这个问题,我认为他很伟大。与此同时,奥本海默拜见了丹麦著名的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他已经参加了玻尔在哈佛大学做过的演讲。玻尔比奥本海默大十九岁,并且与罗伯特的气质相像。与奥本海默一样,玻尔出生在一个上层家庭,书籍、音乐和知识包围着他。玻尔的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而他的母亲出生在一个犹太银行世家。

“玻尔身材高大挺拔,浑身充满运动气息,为人宽厚、热情并富有幽默感,玻尔被全世界的人所尊重,他总是淡泊名利。”这是爱因斯坦在1920年的春天给玻尔的评价。

“在那个时候,我忘记了化学,忘记了电影,毅然决定学习做一名理论物理学家。那时候,我很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段非常时期,伟大的事物即将诞生。”那年春天,伴随着他精神上的不断好转,奥本海默致力于撰写他的第一部有关物理理论的著作。这篇著作是关于“碰撞”或者“连续光谱”的问题。那是一项很有难度的研究。有一天,他走进卢瑟福的办公室,看见玻尔坐在椅子上,卢瑟福从办公桌前站起来向他的学生介绍玻尔,这位有名望的大物理学家很有礼貌地问:“进展如何?”罗伯特很迟钝地回答说:“我遇到困难了。”玻尔问:“是数学问题还是物理问题?”罗伯特回答说:“我也不清楚。”玻尔说:“那就糟糕了。”

玻尔清晰地记得他们的邂逅——奥本海默看起来是那么年轻,当他离开房间之后,卢瑟福还特意跟玻尔说他对那个年轻人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几年以后,罗伯特回忆说,玻尔的问题——“是数学问题还是物理问题?”——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这把我的思路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层面,而这个层面是我一直感到困惑的问题,我也没有回过头来仔细想想他们是不是和这个物理问题有关。”之后,他意识到有些物理学家几乎完全依赖数学语言来描述自然的真相。任何文字上的描述只是“为了让人更加容易理解而已,那仅仅是为了教学用的。我认为迪拉克的创意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文字,而是为了代数”。相比之下,他认为一位像玻尔这样的物理学家“是把数学视为一种迪拉克所认为的文字,也就是让他自己在别人看来更加睿智的一种方式……因

此,也就有了一个非常宽泛的视角,(在剑桥)我只是简单地学习,但学到的不多"。从气质和才能来看,罗伯特是一位非常有文字表达才能的物理学家,这一点正好与玻尔相同。

那年春天的晚些时候,剑桥大学为来自美国的物理系学生组织了一次去莱顿大学进行为期一周的参观访问。奥本海默也一同前往,并结识了几名德国物理学家。"那简直太美好了,"他回忆说,"我感到我们冬天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可能被英国的风俗给严重化了。"马克斯·博恩是哥廷根大学物理研究所的主任。他对奥本海默很感兴趣,可能是因为这位 22 岁的美国人对海森堡和薛定谔最近发表的几篇物理学论文产生了质疑。"奥本海默跟我很像,"博恩说,"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在那年冬天快结束的时候,奥本海默得到了博恩的邀请去哥廷根继续深造学习。

对于罗伯特来说,在剑桥的日子是痛苦的。他从"毒苹果"事件九死一生的困境中逃出来,在他的人生中,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在智力上没有优势可言。与此同时,他最亲密的朋友也多次目睹他的感情挫折。但是,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和沮丧,现在他已经准备好在智力领域再次大展宏图。

4 | “我发现工作很难，可仍要高兴地感谢上帝”

“你会喜欢哥廷根的，我认为那儿的科学工作要比剑桥好得多。总体而言，可能是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我发现工作很难，可仍要高兴地感谢上帝。”

——罗伯特·奥本海默给弟弟弗兰克的信

1926 年 11 月 14 日

1926 年的夏末，罗伯特——与一年前相比精神更好而且相对成熟——从下萨克森州乘火车来到了哥廷根。哥廷根是一个以拥有可以追溯到 14 世纪的市政厅和几个教堂为荣的小城镇。在步行街和犹太人街的角落，他可以在有着四百年历史的容克贵族的大厅里吃上维也纳肉片，也可以坐在俾斯麦的钢铁雕像下被三层斑斑玻璃所包围。哥廷根坐落在莱茵河畔，乔治亚奥古斯塔大学是其主要吸引人之处。这座大学是由一位德国王子在 18 世纪 30 年代所创。根据传统，这所大学的毕业生都要蹚水走进位于古代市政厅前面的喷泉，去亲吻放鹅女——喷泉中心的少女铜像。

如果剑桥可以声称是欧洲实验物理学的中心，那么哥廷根无疑是理论物理学的中心。

奥本海默的好运气使他赶在了理论物理学大革命结束之前来到了哥廷根：普朗克发现了量子（光子），爱因斯坦的伟大成就——狭义相对论，玻尔对氢原子的描述，海森堡对矩阵力学的完善，还有薛定谔的波动力学理论。伴随着博恩关于因果性和随机性的论文在 1926 年的诞生，这段极富创造力的时期开始走向尾声。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和玻尔的互补性理论的形成则使这段时期在 1927 年划上了句号。罗伯特离开哥廷根时，后牛顿主义物理学的基础已经打下了。

博恩作为物理系的主任，培养指导了海森堡、尤金·威格纳、沃尔夫冈·泡利和恩里克·费米的工作。博恩在 1924 年创造了“量子力学”这个词，还

建议量子界交流的任何成果都应由偶然性决定。1954 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博恩是个坚持和平主义的犹太人,在学生眼中,他是个非常热情而有耐心的老师。对一个拥有像罗伯特那样柔和纤弱禀性的年轻学生而言,他是个理想的导师。

在那个学术年头,奥本海默发现自己身处一大群科学家中间。曾与罗伯特共同学习过的詹姆斯·弗兰克,是一年前获得诺贝尔奖的实验物理学家。另一位名叫厄恩斯特·帕斯库尔·乔丹的德国物理学家,当时正与博恩和海森堡合作制定量子论的矩阵力学版本。年轻的英国物理学家保罗·迪拉克——奥本海默在剑桥曾见过他,那时也在从事早期量子场论的研究,并在 1933 年与薛定谔分享了诺贝尔奖。乔治·尤金·乌伦贝克是出生在印尼的荷兰人,他与塞缪尔·亚伯拉罕·古德斯米特一起在 1925 年发现了电子自旋的概念。罗伯特很快就吸引了这些人的注意力。在前一年春天,在他为期一周的访问莱顿大学期间,他已经拜访了乌伦贝克。"我们很快就相处得非常好。"乌伦贝克回忆说。罗伯特对物理学如此投入以至于对乌伦贝克而言,"我们就像是老朋友一样"。

罗伯特寄居在一栋私人别墅里,这栋别墅的主人是一位由于玩忽职守而被吊销医学执照的哥廷根医生。卡里奥一家曾经非常富有,现在他们在靠近哥廷根中心的地方有一幢拥有几英亩院内花园的花岗岩大别墅——但是他们没钱。随着这家人的好运被战后德国的通货膨胀带走,他们不得不租房给寄宿生。罗伯特的德语说得很流利,很快就洞悉了魏玛共和国正在削弱的政治氛围。后来他推测卡里奥一家"有着典型的纳粹运动所依赖的仇恨"。

在大学外面,罗伯特发现对大多数德国人而言日子并不好过。"尽管这个(大学)社会非常富有、温暖且对我有帮助,但它只是停留在一种糟糕的德国模式中。"他发现许多德国人"怀有敌意、闷闷不乐……愤怒和充满着所有这些因素的各种情绪最终会导致一场大灾难,这一点我感触颇深"。

生活对美国侨民而言——特别是对罗伯特而言——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首先,他从不缺钱。他 20 岁时,就能随意穿着用英国最好的羊毛织成的带着鲱骨式图案的衣服。他的同学们发现,在衣物行李方面奥本海默与他们不同,他把私人物品装在了昂贵的、闪闪发光的猪皮大衣箱里。当他们溜达到黑熊啤酒吧喝鲜啤酒或者去卡隆兰兹咖啡店喝咖啡时,通常都是罗伯特付账。他变了,变得自信、激动而专注。物质占有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得到他人的羡慕才是他每日所追求的。为达目的,他将运用他的智慧、博学和其他好

品质去吸引那些已经被他列入他的仰慕者行列的人。乌伦贝克说:“这么说吧,他显然是所有年轻学生的中心……他确实是那种善于出主意的人。他懂得很多,虽然很难让人理解,但他的反应非常快。”

在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罗伯特的智力追求只能在书中获得;而在哥廷根,他第一次意识到他可以从别人那学到某些东西。“对我而言——而不是对大多数人——有些重要的事情开始发生,也就是说,我开始与别人有所交流。我想是他们逐渐给了我感觉,或许往后还给了我物理学的兴趣。如果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这些。”

与他一同寄居在卡里奥别墅里的是39岁的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卡尔·T. 康普顿。康普顿后来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院长。他对奥本海默的多才多艺感到胆怯。当与这个年轻人谈论科学时,康普顿毫不示弱,但当罗伯特开始谈论文学、哲学乃至政治时,康普顿则感到无所适从。

总而言之,罗伯特在哥廷根成长了起来。那年秋天,他激情昂扬地给弗格森写信道:“我想你会喜欢上哥廷根的。与剑桥一样,它具有独特的科学氛围。许多哲人都待在这儿,他们都普遍对认识论的似是而非的论点或者说法很感兴趣。这儿的科学氛围比剑桥好得多,整体而言,这里可能是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大学了。他们工作努力,既有不可思议且顽固不化的形而上学式的不坦诚,又有墙纸生产者那样志在必得的信念。结果就是,那些已完成的工作虽然缺少一种合理性,但却非常成功……我发现工作很难,可仍要高兴地感谢上帝。”

大部分时间他觉得自己情绪上很稳定,但也会有暂时性的旧病复发。有一天,保罗·迪拉克看到他昏倒在地板上,与前几年在卢瑟福的实验室一样。“我还没完全好,”数十年后罗伯特回忆说,“那年我还经受了几次打击,但随着工作的开展,它们对工作的影响越来越小了。”

随着他渐渐恢复了自信,罗伯特发现自己已经声名远播。在离开剑桥之前他所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就是向剑桥大学哲学系呈递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关于振动旋转波的量子论》,另一篇是《关于双体问题的量子论》。第一篇论文涉及了分子能量级的问题,第二篇则考察了在氢原子内连续体状态的转变过程。这两篇论文都代表了量子论方面微小但很重要的进步。奥本海默得知在他抵达哥廷根时剑桥大学哲学系已发表了这两篇论文后感到非常高兴。

罗伯特以热情地参加研讨会的讨论来回应发表文章所带给他的赞誉——这样的放任举动常常会激怒他的同伴。“他是个极有才能的人,”博恩

教授后来写道,“而且他很清楚他的这种优越会以某种方式给人带来尴尬并给自己招致麻烦。”在博恩关于量子力学的研讨会上,罗伯特总是打断正在说话的人,也包括博恩,然后拿着粉笔走到黑板前,用他那带着美国口音的德语讲道:“以下面的方式来做的话,效果会更好……”尽管其他学生对这些打断多有怨言,但罗伯特却忘记了对教授的礼貌而并未认真地努力去改变他的这种行为。然而有一天,玛丽亚·格佩特——一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递给博恩一份写在厚羊皮纸上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由她本人和研讨会的大部分成员签字,内容如下:除非“神童”有所收敛,否则同学们将联合抵制研讨会。博恩仍不愿意面对奥本海默,但决定把这份文件留在他的桌上,这样当罗伯特下次来讨论问题时就不可能不看见它。“为了更加保险,”后来博恩写道,“我安排自己被别人叫出去几分钟。这一计划奏效了,当我回来时发现他脸色苍白而且不像刚才那样健谈。”从此以后,他就不再有打断别人的习惯了。

不久博恩与奥本海默开始了合作。奥本海默在写给一位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埃德温·肯布尔的信中对他们的工作做了真正的概括:“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家似乎都在研究量子力学。博恩教授打算发表一篇关于隔热定理的论文,海森堡则发表了一篇关于波动的论文。或许最重要的观点是沃尔夫冈·泡利的,他认为常用的薛定谔 ψ 方程只是特殊情形,而且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分光镜的条件下——才能给出我们想要的物理现象……我研究有关非周期现象的量子理论已有一段时间……我和博恩教授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原子核周围 α 粒子的运动方向规律。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多大进展,但我想马上就会有的。当这项研究完成时,他的理论不会像以血细胞动力学为基础建立的理论那么简单。”肯布尔教授印象很深,在哥廷根待了不到三个月后,他以前的学生似乎沉浸在了揭示量子力学秘密的喜悦之中。

奥本海默办事缺乏技巧,这使得别人对他怀有戒心。因为他在这一刻可能会风采迷人、替人着想,而下一刻却粗鲁地打断别人的话。在饭桌上,他极其正式而且有礼貌,但他似乎不能够容忍平庸。“麻烦就在于奥本海默对关键因素的反应太快,”他的一位同学爱德华·U. 康顿抱怨道,“因此他总是让别人陷入不利的境地。而且见鬼,每次都是他对,至少算得上是正确的。”

保罗·迪拉克在 1927 年冬抵达了哥廷根,他也在卡里奥的别墅租了间房。奥本海默喜欢与迪拉克接触。“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奥本海默曾经

说,“就是迪拉克的到来和他给我的有关放射量子论的论文校样时的那一刻。”然而,这位年轻的英国物理学家对他朋友毋庸置疑的多才多艺感到茫然。“他们告诉我说你的诗像你的物理研究一样出色,”迪拉克对奥本海默说,“你是怎样做到的呢?在物理学里,我们试图让人们理解从前没人理解的某些东西,而诗歌则完全相反。”奥本海默对这样的赞誉只是付之一笑。他知道,对迪拉克而言生活就是物理学,别无其他,而他自己的兴趣却十分广泛。

奥本海默依然喜爱法国文学。在哥廷根时,他抽出时间去读保罗·克洛岱尔的喜剧《青春少女维奥莱纳》、菲茨杰拉德的短篇故事集《感性的东西》和《冬日之梦》、安东·契诃夫的戏剧《伊万诺夫》,以及约翰·荷尔德林和斯特凡·茨威格的作品。当奥本海默发现有两个朋友经常看拉丁文的但丁的作品时,他一个月没去哥廷根的咖啡馆,再来的时候他已经学会了足够多的拉丁语用来朗读但丁的作品了。迪拉克并不为此感动,反而老是嘀咕:“为什么你要把时间浪费在这种垃圾事上?”

哥廷根并不仅有物理学和诗歌。奥本海默还发现自己迷上了夏洛特·里芬施塔尔,一位来自德国的物理系学生,她是校园里最漂亮的女人之一。他们在去汉堡的旅途中相识。当里芬施塔尔站在火车站月台上,目光落在成堆的行李上时,一个既不是由便宜的硬纸板也不是由破旧的棕色皮革做成的行李箱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多漂亮啊,”她指着那个泛着闪亮的黄褐色的猪皮旅行箱对弗兰克教授说,“这是谁的箱子?”

“除了奥本海默的还能有谁。”弗兰克耸了耸肩说道。

在返回哥廷根的火车上,里芬施塔尔叫人指给她看谁是奥本海默。当她在罗伯特旁边坐下时,他正在看一本法国当代小说家安德烈·纪德写的小说。他的作品总是关于个人对于世界事务的道德责任感。令奥本海默惊讶的是,这个漂亮女人居然读过纪德的作品而且讲得头头是道。抵达哥廷根时,里芬施塔尔随意提及她非常喜欢他的猪皮旅行箱。奥本海默接受了这一赞美,但感到困惑的是,有什么人会无聊到去喜欢他的行李箱。

后来里芬施塔尔把这段对话重述给一位同学听,这位同学预言奥本海默很快就会把这箱子送给她。所有人都知道,在奥本海默所有的怪癖中有一条就是:一旦自己的东西为他人所喜欢,奥本海默就觉得有责任把这东西送出去。奥本海默对里芬施塔尔一见钟情,并且尽其所能地用他那种不知变通、过于拘礼的方式去追求里芬施塔尔。

奥本海默有个同学也是这样做的，他叫弗里德里希·吉奥格·豪特曼斯，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以一篇有关恒星能量产生的论文而闻名。与奥本海默相似，他在朋友眼中是“失常的”——或者说是“失败的”。他是带着家庭信托基金来到哥廷根的。他父亲是荷兰银行家，母亲是德国人，有着一半犹太血统。事实上，豪特曼斯一点也不怕到处张扬，对权威不屑一顾，而且拥有着令人敬畏的智慧。他对他的非犹太朋友说：“你们的祖先生活在树上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在伪造支票了！”作为一个在维也纳长大的青年，他因公开阅读劳动节那天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而被驱逐出体育馆。他和奥本海默实质上是同辈，都将在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他们都深爱着文学——还有里芬施塔尔。正如命运所安排的那样，奥本海默和豪特曼斯都在发展原子弹方面做研究——只是豪特曼斯在德国。

物理学家们为推动量子论研究已做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努力。1925年到1927年的一系列引人瞩目的突破，使得建立一个有关量子力学的基本而紧凑的理论突然有了可能。新发现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文献资料都不能与之保持一致。奥本海默在哥廷根以外的地方共发表了七篇论文，这对于一名23岁的毕业生来说是个很惊人的产量。泡利开始称量子力学为男孩子的物理学，因为发表如此之多论文的作者都是那么年轻。1926年时，海森堡和迪拉克只有24岁，泡利26岁，乔丹23岁。

可以肯定地说，新物理学颇具争议性。海森堡在1925年写的关于矩阵力学的论文，是对量子现象极为认真的精确描述。博恩把这篇论文的复本给爱因斯坦时，他对这位伟人略有戒心地说，这篇论文“看上去很神秘深奥，但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意义深远”。然而那年秋天，爱因斯坦读完这篇论文后，写信给保罗·埃伦费斯特说：“海森堡在量子研究方面搞出了个大成果。哥廷根的那些人对此深信不疑。（我不信。）”1927年，爱因斯坦给博恩的信里写道：“心里深处有个声音告诉我，这并不是真的雅各布。虽然理论的成就很大，但并没有让我们与他的秘密更近一步。不管怎样，我坚信，他不是在投骰子。”

量子物理学很明显是年轻人的科学，所以年轻的物理学家们认为，爱因斯坦固执地拒绝接受新物理学，是因为它标志着爱因斯坦时代的终结。沿着这条路走了几年，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拜访了爱因斯坦——他对爱因斯坦不再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在写给弟弟的信里，他用一种狂妄而不恭的口气

说:“爱因斯坦是个十足的疯子。”

奥本海默在哥廷根写的第一批论文表明,量子理论使得测量分子波段频谱的频率和紧密度有了可能。到1927年2月,博恩对奥本海默在处于持续过渡中的量子论的应用方面所做的工作印象颇深,以至于他在给麻省理工学院院长S. W. 斯特拉顿的信里写道:“我们这有许多美国人……其中一人非常优秀,他就是奥本海默先生。”由于其出色的才华,奥本海默的同龄人把他同迪拉克和乔丹相提并论。“这儿有三位理论方面的天才,”一位年轻的美国学生说,“对我而言,他们一个比一个聪明。”

奥本海默养成了整晚工作、白天大部分时间睡觉的习惯。哥廷根潮湿的天气和较差的供热系统,使奥本海默原本就虚弱的身体深受其害,他总是一边走一边咳嗽。朋友们认为,他患慢性咳嗽是因为他经常感冒或者不断抽烟。但就其他方面而言,在哥廷根的生活是令人愉悦的田园式生活。

有一年,海森堡经过哥廷根,奥本海默特意与这位德国最聪明的年轻物理学家见了面。虽然海森堡只比奥本海默大三岁,但他在与同龄人争论时口齿伶俐、富有魅力而且坚忍不拔。两人都拥有天生的思维能力,而且都对此心知肚明。作为一位希腊语教授的儿子,海森堡与泡利曾在慕尼黑大学同窗学习,后来又与玻尔和博恩一道完成了博士后的工作。海森堡能够凭直觉触及问题根本,这点与奥本海默相似。他还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他惊人的才智博得了大家的关注。据说,奥本海默很钦佩海森堡而且尊重他的工作。他还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几年两人会成为难以捉摸的对手。奥本海默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正在考虑海森堡对战时德国的忠诚,并想知道这个人能不能为希特勒造出个原子弹来。但在1927年的时候,奥本海默正以海森堡在量子力学上的发现为基础做研究。

那年春天,奥本海默得到来自海森堡的鼓励,开始对用量子论去解释“分子何以成为分子”产生了兴趣。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简单方法。他把便笺给博恩教授看时,博恩既吃惊又高兴。随即他们同意合作写一篇论文,而且奥本海默许诺当他在巴黎度复活节时,会根据便笺写出初稿。当博恩收到从巴黎寄来的一篇显得很多的四五页论文时,他感到了“恐惧”。奥本海默回忆说:“尽管与他接触不深,但对我来说却完全必要和正确。”博恩给论文添枝加叶,扩充成了三十页。奥本海默却认为,他增添的东西都是毫无必要或极其明显的定理。“对此我并不喜欢,但让我去向一个更高层次的作者抗议显然是不可能的。”

《关于分子的量子论》在那年的晚些时候发表了。这篇包含着“博恩和奥本海默相似点”的论文——实际上只是奥本海默与自己的相似点——被认为在用量子力学去解释分子变化方面做出了重大突破。奥本海默已经意识到分子里轻点的电子比重点的原子核运行快得多。通过把更高频率的电子运动综合起来,他和博恩就能对核震动“有效波动力”现象进行计算。这篇论文为高能物理学在此后七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那一年的晚春,奥本海默递交了博士论文,其核心包括一种对氢原子和X射线里的光电效果进行计算的复杂方法。博恩建议这篇论文应该被“有区别地”接受。几年后,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汉斯·贝特评论道:“在1926年奥本海默必须靠自己完善所有的方法,其中包括连续体内波动能的规范化。当然,他的计算后来有了进展,但在当时他准确把握了在K边缘的吸收系数和其周围的频率依赖性。”贝特总结道:“即使在今天,这也是复杂的计算,超出了大多数量子力学教材的范围。”一年以后,奥本海默在相关领域发表了第一篇描述量子力学中“打隧道”现象的论文。通过“打隧道”,粒子的确可以穿过障碍。这两篇论文都是令人惊叹的成果。

1927年5月11日,奥本海默参加了答辩,几小时后拿着优秀的成绩走出了考场。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是其中一位考官,事后他对同事说:“我及时逃离了考场,因为他都开始问我问题了。”

那年6月,埃德温·肯布尔碰巧正在哥廷根访问,不久之后就给同事写信说:“在哈佛大学时,我们就发现他很有才华,而他现在正变得愈加才华横溢。他工作完成得很快,而且同在这儿的一大批年轻数学物理学家相比毫不逊色。”

看到奥本海默离开,博恩心灰意冷。他对奥本海默说:“你对自己的离开没有任何感觉,我却不一样。你给我留了太多的作业。”奥本海默送给导师的临别礼物是《解析力学》的珍藏版。数十年后,也就是博恩被迫逃离德国之后,他在写给奥本海默的信中说道:“很幸运,这本书在革命、战争、移民和回国等诸多剧变中被保存了下来。这本书既属于科学的范围,又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总体智力发展的一部分。我很高兴这本书仍在我的图书馆中,因为它很好地反映了你对待科学的态度。”从那以后,奥本海默大大超过了博恩——尽管是在坏名声方面,而不是在科学成就上。

奥本海默作为一个走向成年的年轻人,取得第一次真的成功就是在哥廷根。他在成为科学家后说道:“就像在隧道里爬山一样,你根本不知道是否会

爬出山谷，或者是否会爬出隧道。”对于处在量子革命尖端的年轻科学家而言，尤其如此。奥本海默更大程度上是这场剧变的见证者而不是参与者，然而他依旧表明了自己拥有着使物理成为终生工作的天生才智和意向。在短短的九个月中，他已将学术成就、人格再生和自身价值观融合为一体。一年之前，影响深远的情感缺陷威胁着他的生存，而这种缺陷现在已被伟大的成就和由此产生的自信打败了。世界正在召唤他。

5 | “我就是奥本海默”

“上帝知道我并不是最单纯的人，但与奥本海默相比，我非常非常单纯。”

——I. I. 拉比

在哥廷根的学习进入尾声时，奥本海默明显表现出了思乡的情绪。他无意中谈及德国的东西时，口吻就像个本国至上的美国人。“他做得太过了，”一位荷兰学生抱怨道，“在奥本海默看来，一切都是美国的好，甚至花都是美国的香。”临走的前夜，他在寓所举行了派对。跟其他人一道，拥有一头黑发的可爱的夏洛特·里芬施塔尔也来道别。奥本海默特意把那个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里芬施塔尔就喜欢上的皮箱送给了她。她把这包保留了三十年，就叫它“奥本海默”。

和迪拉克一道快速到了莱顿后，在1927年7月中旬奥本海默从利物浦乘船到了纽约。回家的感觉真好，他不但活了下来，还取得了成功，带回了得之不易的博士学位。理论物理学家都知道年轻的奥本海默拥有着有关欧洲在量子力学方面最新突破的第一手资料。从哈佛大学才毕业了两年，奥本海默就已经是他的研究领域里的新星了。

那年早春，有人鼓励他接受由国家研究院颁发的旨在激励年轻物理学家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博士后奖学金。他接受了这笔奖学金，而且决定在去加利福尼亚的帕萨迪纳之前，先在哈佛大学度过秋季学期。位于帕萨迪纳的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已给他提供了一个执教的位置，这所学院是一流的科研中心。因此，奥本海默还在河畔大道的家中拆行李时，就知道眼下的未来已经注定了。在此期间，奥本海默还有六周时间与15岁的弟弟弗兰克叙叙旧，并且陪着父母到处逛逛。

令奥本海默感到遗憾的是,朱利叶斯和埃拉已经在去年冬天决定要把在纽约湾岸的房子卖掉。但是他那艘叫作"三甲基"的帆船,依旧在房子附近停泊着。奥本海默与弗兰克一道,沿着长岛的海岸疯狂航行,过去他们经常这样。8月份,兄弟俩和他们的父母在楠塔基特岛度过了一个短假期。弗兰克回忆道:"我和哥哥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用颜料在画布上画沙丘和长满草的小山。"弗兰克景仰他的哥哥。与奥本海默不同,弗兰克手很灵巧,喜欢摆弄东西,把电动马达和手表拆下来又装好。他现在在道德文化学校,也着迷于物理。奥本海默动身去哈佛大学时,把显微镜给了弗兰克。有一天,弗兰克就用它来观察自己的精子。弗兰克说道:"从未听说过精子这回事,这真是个了不起的发现。"

夏天快结束时,奥本海默听说里芬施塔尔已经打算在瓦萨学院执教,他感到很高兴。9月份,当她乘的船抵达纽约港时,奥本海默就在码头边等她。跟里芬施塔尔一道来的还有两位事业成功人士——在哥廷根时的校友古德斯米特和乌伦贝克——此外还有乌伦贝克的新婚妻子。奥本海默知道两人都是成绩斐然的物理学家。古德斯米特和乌伦贝克两人合作,在1925年发现了电子是不断旋转的。奥本海默在纽约慷慨大方地尽了地主之谊。

古德斯米特回忆道:"我们都得到了奥本海默的真诚招待,但实际上是占了里芬施塔尔的光。他在有着专职司机的豪华轿车里和我们见了面,把我们带到市中心格林威治村的一家旅馆里。"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他陪着里芬施塔尔走遍了纽约的角角落落,从他常去的地方,到市艺术展览馆,再到他能找到的最贵的饭馆。里芬施塔尔抗议道:"丽池大饭店真是你唯一知道的旅馆吗?"他还在河畔大道的大公寓里面把里芬施塔尔介绍给了父母,这说明他是多么细心而缜密。尽管里芬施塔尔敬佩奥本海默,而且对于他的关心感到荣幸,但她却感到不能在情感上接受奥本海默。里芬施塔尔曾试图让他谈谈过去,奥本海默都回避了。她觉得奥本海默的家令人窒息,而且奥本海默过于自我保护,于是她开始疏远奥本海默。里芬施塔尔要在瓦萨任教,这使得她不能待在纽约,而奥本海默接受的奖学金也迫使他待在哈佛大学。最终,里芬施塔尔回到了德国,并于1931年和奥本海默在哥廷根时的同学豪特曼斯结了婚。

新墨西哥州正召唤着奥本海默。他非常怀念"低挂在沙漠夜空中的月亮"和那十足的生理体验——"寒冷和闷热",这使得他在西部以外度过的两

个夏天感到精力充沛。他不可能在新墨西哥州做尖端的物理学研究——他接受了由位于帕萨迪纳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提供的职位，仅仅是因为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靠近他所喜欢的沙漠。与此同时，他也想从哈佛大学这座限制了他这么长时间的"独立监狱"中解脱出来。他得以从去年的危机中恢复过来，部分得益于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新的开始。科西嘉、普鲁斯特和哥廷根都给他提供了重新开始的机会，继续留在哈佛看上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倒退。因而，1927 年圣诞节后不久，奥本海默收拾行李来到了帕萨迪纳。

加利福尼亚很适合他。几个月后他写信给弗兰克说："我发现没时间去工作了，因为帕萨迪纳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数百个令人愉快的人不断地建议你去做令人愉快的事。我正在为明年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拿个教授职称还是出国之间举棋不定。"

尽管他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有教学任务，而且帕萨迪纳很令人分心，但奥本海默在 1928 年还是发表了六篇论文，涵盖了量子理论的诸多方面。这年晚春，他的医生诊断他持续不断的咳嗽可能是肺结核的症状，而在这段时间他的成果尤为突出。参加完 6 月在密歇根的安阿伯市举行的理论物理研讨会，奥本海默就赶往了拥有干燥山土气息的新墨西哥。这年早春时候，他曾写信给他快 16 岁的弟弟弗兰克，建议他们两个人这个夏天到沙漠里漫游两周。

他弟弟正处在多事的青春期——这是段艰难的历程，这一点奥本海默知道得很清楚。在为弟弟在这条路上指明方向的过程中，奥本海默开始产生了作为父辈的兴趣。"你很年轻，但比我成熟多了。"

奥本海默说得很对，年轻的弗兰克比他哥哥在这么大时成熟多了。他同样有着冷冰冰的蓝色眼睛和一头浓密的黑发，弗兰克天生就和奥本海默一样又瘦又高，他很快就六英尺高了，但只有一百三十五磅重。他在许多方面和他哥哥一样聪明，但似乎没有奥本海默那种强烈而紧张的活力。奥本海默会因为得到某样东西而激动，而弗兰克得到想要的东西时只会冷静对待，他总是令人感到轻松愉快。作为一个青少年，弗兰克对他哥哥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他的信件和假期一块去航海的经历。在去往新墨西哥的途中，只有他和哥哥两个人，没有父母在身旁。这次旅途使他长大成人。

兄弟俩来到洛斯皮诺斯，他们投宿在凯瑟琳·佩奇的牧场。尽管奥本海默咳嗽不断，但他仍坚持要骑着马到周围的山丘里到处看看。他们只带了点

花生油、罐装菊芋、维也纳香肠、樱桃酒和威士忌。他们俩骑马而行，弗兰克听着奥本海默兴致勃勃地讲物理学和文学。晚上，哥哥会拿出一本破烂的波德莱尔的作品，借着营火的光线朗读。1928 年夏天，奥本海默还在读 1922 年的小说《巨大的房间》。这本书是 E. E. 卡明斯对他在法国战时俘虏营中四个月监禁生活的描述。卡明斯认为，被剥夺了一切的人可以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自由。奥本海默很喜欢这一点。这个故事在 1954 年后对奥本海默有了新的意义。

弗兰克注意到他哥哥的激情变化不定。奥本海默似乎把这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类——值得为之花时间的人和不值得为之浪费时间的人。弗兰克说："对前一类人而言，很好……奥本海默对每个人和每件事的要求都很特别。他不是个乏味的人，他甚至可以把激情耗在一种品牌的香烟上，甚至使他们上升为某种特殊的东西。他的黄昏总是最棒的。"

那年 7 月的一天，佩奇带着奥本海默兄弟到洛斯皮诺斯的山上骑马游玩。沿着路骑了一万英尺后，他们来到山上的草地。这片草地覆盖着厚厚的苜蓿和蓝紫色山花。白松林构成了克里斯托山和佩科斯河的一幅唯美图景。在海拔九千五百英尺的草地上，坐落着一座由半个树干以及土坯和沙浆筑成的乡间小屋。硬黏土制成的壁炉尤为显眼，窄窄的木楼梯通向楼上两个小卧室。厨房里有洗涤槽和炉子，但没有自来水，而且唯一的洗澡间就是建在走廊末端的附属建筑物，四面通风。

"喜欢吗？"凯瑟琳问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点点头。她又解释说，这座木屋和一百五十四英亩的牧场及小溪都是可以租的。

"太棒了！"奥本海默惊叫道。

"不，太美妙了！"凯瑟琳俏皮地说道。她把奥本海默的话翻成了西班牙语。

那年晚冬，奥本海默和弗兰克劝说父亲签下了这个牧场的四年租约，他们称之为"佩罗卡连特"。在 1947 年奥本海默花一万美元把它买下来之前，他们一直租着这个牧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片牧场成为奥本海默的私人乐园。

在新墨西哥待了两周后，兄弟俩于 1928 年秋分开了，与他们的父母在科罗拉多温泉的布罗德莫豪华酒店会合。奥本海默和弗兰克都学了些基本的驾驶，不久他们就买了辆旧的六引擎克莱斯勒跑车。他们的计划就是开车到

帕萨迪纳。弗兰克轻描淡写地说:“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小事故,但最终还是到了。”在科罗拉多的科特斯郊外,弗兰克驾驶的车在稀疏的石砾上打了滑,头朝上、脚朝下地翻进了深沟里,挡风玻璃碎了,布顶篷也坏了。奥本海默的右臂和右手腕的两块骨头折断了。

当他们最终抵达帕萨迪纳时,奥本海默直接去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布里奇实验室。他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右臂还绑着个鲜红的悬带,就这样走进实验室宣布道:“我就是奥本海默。”

“哦?你是奥本海默吗?”一位叫查尔斯·克里斯汀·劳瑞森的物理学家问道。这位物理学家认为他“像个流浪者,而不像大学教授”。“那你肯定愿意帮个忙。为什么我从串联电压发生器里得出的数据总是错的呢?”

奥本海默返回帕萨迪纳只是为了收拾好行李准备去欧洲。在1928年的早春,已经有两所海外大学以及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十所美国大学都为他提供了工作。奥本海默决定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供职。他的计划是轮流在每个学校教一个学期。他选择伯克利是因为它的物理学课程缺乏理论成分。伯克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片沙漠”,因此他认为“这是个能开始做点事的好地方”。

然而,他并不急于打算“开始做点事”。因为与此同时,他申请了一份奖学金,并很快就得到了。这样他就能回到欧洲待一年。他感到在博士后学习阶段,他仍旧需要些知识上的补充,尤其在数学方面。他想在保罗·埃伦费斯特的指导下继续学习。埃伦费斯特是荷兰莱顿大学享有盛誉的物理学家。当奥本海默登上去莱顿的船时,他的计划是跟着埃伦费斯特学习一学期再去哥本哈根,在那儿他希望能够结识玻尔。

结果,埃伦费斯特为经常发作的抑郁症所困扰,身体不适,心神不宁。奥本海默回忆道:“后来我不再对他感兴趣了,我有着平静而忧郁的回忆。”回想起来,奥本海默认为在莱顿浪费掉了一学期,而且这都是自己造成的。埃伦费斯特认为简单和清晰非常重要,奥本海默还不具备这种品质。

事实上,埃伦费斯特发现与这位年轻人一起工作精神上会很疲劳。博恩写信给他在莱顿的这位同事说:“奥本海默现在和你在一起,我想知道你对他的看法。我跟他在一块可受够了罪,这一事实并不影响你做出判断。他无疑很有天赋,但内心却没一点儿原则。他看上去很谦虚,但内心却很傲慢。”埃伦费斯特的回信已经遗失,但博恩的下一封信却表明得很清楚:“你提供的关于奥本海默的信息对我很有价值。我明白他是个不错的人,但如果有人总使

你心烦不安,那你也会受不了的。”

奥本海默到达后仅六周就用荷兰语作了个报告,这震惊了他的同龄人。荷兰语是他当时自学的又一门语言。他的荷兰朋友们对他精神十足的演讲印象很深,因而开始叫他“奥本”——他姓的亲密简称——这个新绰号伴随了他一辈子。他学习新语言的天赋还得益于一位女人的帮助。据物理学家亚伯拉罕所说,奥本海默与一位叫苏珊的荷兰年轻女人关系暧昧。

这段暧昧期肯定很短,因为不久奥本海默就决定离开莱顿。尽管他已打算去哥本哈根,但埃伦费斯特说服他去瑞士,因为埃伦费斯特认为他在泡利的指导下学习会更好。埃伦费斯特给泡利写信道:“为了使他伟大的科学天赋得以发展,他需要被人轻轻地敲打屁股。他值得受到这种对待……因为他是个特别可爱的家伙。”埃伦费斯特过去总是把学生送到玻尔那儿学习。奥本海默回忆道:“但这次埃伦费斯特却很肯定玻尔的粗枝大叶和含糊不清不是我需要的良药,我需要的是一位计划周到、工于心计的专业物理学家,而泡利正是我的合适人选。我想他用了 herausprugeln(商讨解决)这个短语……他把我送到那儿显然是为了让我受到调教。”

奥本海默渐渐喜欢上了泡利,奥本海默曾开玩笑说:“他是位如此优秀的物理学家,以至于只要他一走进实验室,东西就会出故障或者爆炸。”泡利虽然只比奥本海默大四岁,但早熟的他在 1920 年就已成名。他 1921 年在慕尼黑大学得到博士学位,并在这一年发表了一篇两百页的文章,讲述了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

泡利是一个睿智而又好争吵的年轻人,跟奥本海默一样,在争论中哪怕是觉察到了最微小的错误,他也会跳起来执著地询问讲演者。他经常说其他物理学家“不仅仅是错了”,而且有一次他说一位学者“如此年轻,一无所知”。

泡利欣赏奥本海默洞察问题核心的能力,但奥本海默对细节不加注意也使他很恼怒。泡利说道:“他的想法很有意思,但计算却总是出错。”有一天泡利正在听奥本海默的讲座,奥本海默突然停了下来,在头脑里组织语言,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发着“嗯……嗯……”的声音。此后泡利就有了叫他“嗯嗯男人”的习惯。然而,泡利在为这个复杂的年轻美国人而着迷。不久,泡利写信给埃伦费斯特说:“他的优点在于他有许多好思想和很强的想象力,弱点在于很容易就对基础不牢的陈述感到满意。他因为缺乏恒心和彻底性,连他自己很感兴趣的话题都不作答……不幸的是,他还有个很坏的脾气:他与我争辩时头脑里存着无条件相信权威的思想,而且认为我说的一切都是绝对真

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他放弃这种想法。”

另一位名叫伊西多·I. 拉比的学生，与奥本海默一起度过了那年春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在莱比锡见面后，就结伴而行到了苏黎世。拉比回忆道：“我们处得很好，在他一生之中我们都是朋友。我喜欢他那些不为别人喜欢的东西。”拉比比奥本海默大六岁，和奥本海默一样在纽约度过童年。但他在纽约的日子和奥本海默在河畔大道的金色岁月不可相提并论。拉比一家住在贫民区的一座只有两个房间的公寓里。父亲是个手工工人，家里面很穷。与奥本海默不同的是，拉比从小到大身份都很明确。拉比一家子是正统的犹太人，上帝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拉比回忆说：“上帝出现在人们谈话中的每一句话，而不是每一段。”随着他渐渐长大，正规的宗教也渐渐远去。“这个教堂正是我的失败之所。”拉比俏皮地说道。但作为一个犹太人，拉比依旧感觉很好。即使在德国的反犹主义日益加剧的那些年，拉比都坚持介绍自己是奥地利犹太人，因为他知道人们最讨厌奥地利犹太人已经模式化了。数十年后，拉比认为他知道了原因：“奥本海默是犹太人，但他却希望自己不是，而且试图装作不是犹太人……即使你不是很了解犹太人的传统，你也要知道它是如此强大，放弃它是要担风险的。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很传统，甚至于要实践它，但如果你出身在这传统中，却违背了它，那你就麻烦了。因此，可怜的奥本海默，那个梵文和法国文学的专家……”（拉比的声音逐渐变小，陷入了静静的沉思。）

拉比后来猜测道：“奥本海默从未有过完整的个性。人多时，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而有聪明的犹太人在场时，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由于在每个方面都有很强的能力，因此奥本海默难以取舍，他总想拥有一切。他使我想起了一个少年时代的朋友。他现在是个律师，有人这样评论他，他总是想成为哥伦布骑士会的主席。上帝知道我不是最单纯的人，但与奥本海默相比，我非常非常单纯。”

拉比很喜欢奥本海默，但他也会向朋友声称：“奥本海默？那个来自纽约、被金钱宠坏了的犹太小坏蛋。”拉比自认为很了解这种人。“他是德国东部的犹太人，他们尊崇德国的文化胜过自己的文化。由于波兰犹太人的血统和他们崇拜的原始形式，他们很容易就可以知道原因。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把自己当犹太人。”许多年以后，拉比回忆道：“我认为他幻想着自己不是犹太人。记得有一次我跟他说我发现基督教是如此令人费解，简直是血腥和温柔的复合体。他说这正是吸引他的地方。”

尽管拉比和奥本海默有着许多不同点，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还是得到了发展。拉比后来说道："我从没和他在过同一个班，我从来不和那些越来越聪明的人混在一起。"不过，拉比自身的才智却毋庸置疑。奥本海默的一位叫温德尔·弗瑞的学生说："拉比是一位伟大的实验家，他不像理论家那样萎靡不振。"在物理学界这个小圈子内，人们逐渐认为拉比是一个有深度的思想家，而奥本海默则被认为是伟大的综合者。他俩合在一块，威力巨大不可抵挡。

他们的友谊不仅仅是在物理方面，拉比和奥本海默在哲学、宗教和艺术等方面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拉比说，我们感到彼此间有种特殊的亲密关系，这是一种很少见的友谊，这种友谊在少年时代形成，在长时间的分离中依旧保存了下来。拉比回忆说："你开始的地方就是停下的地方。"奥本海默特别尊崇拉比的这份坦诚。拉比回忆说："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因他的态度而有所拖延。我从不奉承他，总是真诚对待他。"他发现奥本海默总是"鼓舞人心、非常鼓舞人心"。这些年来，尤其是大多数人感到了来自奥本海默的胁迫的那段时间，当奥本海默犯傻时，可能拉比是唯一一个能直接告诉他的人。当拉比的生命走到尽头时，他承认："奥本海默对我很重要，我很想念他。"

在苏黎世，拉比知道他的朋友正在从事一项很难的工作，即计算恒星表面到内部辐射的不透明度——但奥本海默故意以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掩盖了他的辛苦。的确，在朋友之间他避免谈及物理，只有当话题转向美国时，他才兴致勃勃。年轻的瑞士物理学家费利克斯·布洛赫顺路拜访奥本海默在苏黎世的寓所时，碰巧喜欢上了奥本海默挂在沙发上的美丽的纳瓦霍小地毯。这引出了奥本海默关于美国好处的一段又长又兴奋的谈话。布洛赫对此评论道："奥本海默对美国的热爱毋庸置疑。他的喜爱之情显而易见。"奥本海默也会谈一谈文学，"特别是印度经典名作和只有内行才懂的西方作家"。泡利和拉比开玩笑说，奥本海默似乎把物理学当副业，把心理分析当职业。

奥本海默1929年6月离开苏黎世，返回美国时，已经因在理论物理上做出的贡献而赢得了国际声誉。1926年至1929年间，他发表了十六篇论文，对任何科学家来说，这都是个惊人的产量。他因为太年轻而没赶上1925年至1926年间的量子理论的第一次繁荣期，但在泡利的指导下，他赶上了第二次浪潮。他是第一个掌握了连续体波动函数性质的科学家。在物理学家罗伯特·塞培尔看来，奥本海默最具独创性的贡献是他的场放射理论。这个理论

促进了在强电流的牵引下从金属中放射电子的研究。在早些年的时候，他还在计算 X 光的吸收系数及电子弹性和非弹性放射方面取得了突破。

从实际情况来看，它对人类有何意义呢？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理论晦涩难懂，也没有对宏观世界做出解释。正如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所说："量子力学只是以普通的视角对自然作了荒唐的描绘，它是在实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我希望你能接受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充满了荒谬。"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量子物理学导致了一系列的发明创造，包括个人电脑、原子能、基因工程和激光技术，它们的发明标志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虽然年轻的奥本海默可能是因为它的抽象美而喜欢上了量子物理学，可是这一理论却引发了一场人与世界的革命。

6 | “奥比”

“我认为，在未来的三十年里，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不平静且令人烦恼的世界里，而且不能找到可行的方法来摆脱这种困境。”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31 年 8 月 10 日

对罗伯特来说，在苏黎世的日子既受益匪浅，又充满刺激。然而像往常一样，暑期临近时，由于向往佩罗卡连特的生活，他渴望保持高兴的心情和平静的心态。他的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专心致志地做学术研究，有时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然后会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去新墨西哥的克里斯托山骑马。

1929 年的春天，他写信给弟弟弗兰克，催促弟弟在 6 月把父母带到西部。之前他曾提议，如果 16 岁的弗兰克带着朱利叶斯和埃拉在圣达菲找到合适的住处，他就会邀请他的朋友来洛斯皮诺斯的大牧场，开发这块土地，放逐马儿，学习烹饪，使这块庄园尽可能地适合人类居住，一起欣赏这片土地。7 月中旬他将和弟弟会合。

弗兰克并不需要进一步的催促，他和道德文化学校的同学伊恩·马丁和罗杰·刘易斯会在 6 月到达洛斯皮诺斯。刘易斯经常到佩罗卡连特去旅游。弗兰克列了一张清单，把床、家具、炉子、壶、平底锅、床单和毯子等所有必需品都邮寄了过去。他回忆说：“那真是一次狂欢。”罗伯特则带着两加仑自酿的威士忌酒、大量的花生酱和一袋维也纳香肠和巧克力来了。

在接下来的三周里，他和孩子们一起爬山，一起骑马。当他在马背上度过了筋疲力尽的一天以后，他常给一位非常思念的朋友写信说：“我有两大爱好：物理学和骑马，可惜两者不能合二为一。”晚上，他借着灯笼的光阅读物理学著作，准备他的物理学讲座。一次旅游，他花了八天时间到科罗拉多骑马骑了一个来回，行程超过二百英里。当他们吃腻了花生酱时，他为大家献上

了一道马来西亚炒饭，这是在荷兰时乌伦贝克教他做的。那还是个禁酒的年代，但是他总能找到威士忌酒。弗兰克后来回忆说："在山头时，我们总会喝上两杯，还会做些没脑子的事。"

有一次去大峡谷骑马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被一群像蜜蜂一样叮咬人的苍蝇吸引住了。"我们在峡谷里尽情地骑马，不时地赶超对方，因为我们其中一方会减慢速度停下来呷一口酒，然后快速赶上把酒递给另一方。"

罗伯特送给弟弟许多礼物，比如他给了弟弟一块那年夏天很流行的表，可是两年后就不值钱了。他也花时间指导弟弟的恋爱、音乐、艺术和物理学，并传授给他自己的生活哲学："不好的生活哲学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因为在筹划时期你的想法会主导你紧要关头的处事方式，而此时往往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甚至可能犯罪。"那时，罗伯特还常常点评弟弟的散文。"例如，你文章中对鳟鱼和奥霍卡连特（在新墨西哥）夜晚的那段描述，具有强烈的说服力，结尾洋溢着丰富的情感，但是关于古代各种各样的日落的描写就有点华而不实和堆砌辞藻的痕迹。"

8月中旬，罗伯特心情复杂地打上背包开车前往伯克利，住进了教授俱乐部的一间家具很少的房子。弗兰克在新墨西哥待到9月初，那时他写信给弟弟说，他错过了佩罗卡连特最美好的时节。他既不忙着备课，也不忙着熟悉同事。他对弗兰克说："看起来，这里的本科院校不值得你来学习，我建议你明年再来，因为那时环境优美，人们友好，我会把我在教授俱乐部的房子给你留着。"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经聘用他给研究生讲授最前沿的物理学了，但是没有人想到他会教本科生的课，可是他自己根本不在意。他的第一堂课是关于量子力学的研究生水平的课。在上课时，他直接抛开主题，试图讲解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薛定谔方程，迪拉克的综合论、场论以及泡利对量子电动力学的最新研究。起初，大部分学生都不能理解和跟上他的课。当通知他讲课太快时，他极其不情愿地放慢速度，很快他就向系主任抱怨说："我讲课慢得自己都不知道该讲什么了。"

虽然，在从事教学的前一两年里，他的讲课更像是做礼拜，但是他还是经常讲课。他讲课时声音低沉，当试图强调某一点时声音低得甚至听不见，刚开始上课时，他还有点结巴。尽管上课时不用讲稿，但他在讲课时常常掺杂着引用了许多著名科学家和诗人的名言。"我是一个令人头痛的老师。"他回

忆说。

他爱玩文字游戏,发明了复杂的双关语。他从来不用蹩脚的词组,讲课时总是精力充沛。他能用一系列语法准确的完整句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很少有停顿,并时常伴有奇怪的抑扬顿挫的支吾声;在他那冷酷的嗒嗒声里偶尔还夹杂着他吸烟的声音。他经常在黑板前面来回踱步,有时会在黑板上写下一个方程式。一位低年级的研究生回忆说:"我们总期望哪天他用烟蒂当作粉笔来写字,用粉笔当作烟来抽,但是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有一天,当学生们排队离开教室时,他发现了一位坐在后排的朋友理查德·托尔曼教授。当他问托尔曼教授对他所教的课的感受时,托尔曼回答说:"这堂课非常精彩,但是我一点也听不懂。"

后来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格伦·西博格曾经抱怨说:"在你的问题还没有提出之前,他就开始回答你的问题了。"他常常以类似"够了,我们都已经知道你的问题了,让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吧"这样的话来打断客人。他不能忍受愚蠢的人,甚至平庸的人也令他不悦。他会不加考虑地把自己的高标准强加于别人。在伯克利的这些年里,有人认为:"他对学生的态度近乎嘲讽,使得学生对他非常害怕。"一位同事回忆说:"他在讲话时有点近于冷酷。"但是做老师的时间长了以后,他变得成熟了,对自己的学生温和多了。哈罗德·彻尼斯回忆说:"他对不如自己的人和蔼可亲、关怀备至,相反对与自己才智相当的人则是另一种态度。当然,这使他招人厌恶,树敌不少。"

对于那些坚持不懈的人,他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回报他们的努力工作。利奥·尼德尔斯基说:"人们能从与他的交往中获益。当你问他问题时,他会花数小时甚至直到半夜与你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他会邀请攻读博士的学生和他一起执笔写论文,在论文发表时确保所有人的名字都列入作者名单中。一位同事说:"对一位著名教授来说,找一些学生为他做这些苦力活是很容易的,但是奥本海默和学生们一道解决问题,并给予他们应得的报酬。"他鼓励学生们叫他"奥本",那是在莱顿时,别人为他取的荷兰绰号。后来,他自己也在书信中署名"奥本",他的学生逐渐把"奥本"演变成了英国化的名字"奥比"。

经过一段时间后,他创造了一套独特的开放式教学法,鼓励所有的学生互相交流。他不用上班时间和学生会面,也不单独与学生见面。相反,他会要求八到十个研究生和六个博士生在莱克特楼的119号房间与他会面。每个学生有一张课桌和一把椅子,他们坐着看奥本海默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

自己没有课桌和椅子,只有一张中间堆着厚厚一沓论文的方桌。在约定的时间开始之前,学生们稀稀拉拉地待在房间里等着他,有的随意地坐在方桌上,有的斜靠在墙上。当他到来后,开始一个一个地指出学生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并请每个学生对自己的论文做出评论。塞培尔回忆说:"他兴趣广泛,他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并与其他问题一起讨论。一个下午,我们可能讨论电子动力学、宇宙射线和核物理学。"通过集中讨论物理学求解的难题,奥本海默给学生们营造了一种站在未解之谜边缘上的感觉。

奥本海默顺理成章地成为理论物理学的领头人。全国人都知道,如果你想进入理论物理学这一领域,伯克利是最好的场所。"我原本不打算教书的,也不准备招收学生,我只为我热爱的理论做宣传。"他后来说道。1934 年,在五个被国家研究委员会授予奖学金的学生中,有三位被选在他的门下学习。然而,在他们跟随奥本海默学习期间,他们同时跟着另一位名叫欧内斯特·奥兰多·劳伦斯的实验物理学家学习。

劳伦斯的名气很大,而罗伯特·奥本海默则经历平平。劳伦斯出生在南达科他州,并且先后在南达科他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接受教育。他年轻有为,自信十足。有着挪威路德教会血统的他,在作风上表现出完完全全的美国气质。当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他就把铝壶、铝锅卖给他的农民邻居,拿赚的钱缴学费。作为一个性格外向的人,他会利用他的可以成为推销员的天生本性去发展他的学术事业。他的一些朋友觉得他不像罗伯特,认为他有一点攀附权贵,没有一点忧患和自省意识。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他是那个时代的首席实验物理学家。

当 1929 年秋奥本海默到达伯克利的时候,28 岁的劳伦斯正住在教授俱乐部里。这两个有点孩子气的物理学家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们白天一起聊天,晚上一起参加社交活动。在周末,他们偶尔会一起去骑马。罗伯特喜欢骑西式马鞍,但是劳伦斯为了使自己更惹眼,坚持要穿他最喜爱的骑马裤并用英式马鞍骑马。罗伯特称赞他的新朋友"充满活力,热爱生命"。罗伯特认识到,劳伦斯是一个"可以整天工作,为了赢得网球比赛而努力拼搏,而且可以工作到半夜"的人。但是罗伯特也明白,劳伦斯的性格是"活跃的",而他自己却"正好相反"。

即使在劳伦斯结婚以后,奥本海默依然是他们家晚宴上的常客。他不断给劳伦斯的妻子莫莉送兰花。当莫莉生下第二个儿子后,劳伦斯坚持给他取名为罗伯特。莫莉默许了。但是一些年以后,她逐渐发觉奥本海默很虚伪,

他过分的做作暴露出他人性的浅薄和丑陋。在结婚之初，莫莉没有对她丈夫的这位朋友做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情形改变以后，她要求丈夫以新的眼光重新认识奥本海默。

劳伦斯还是一位建造家，他具有筹集资金的技巧以实现抱负。在邂逅奥本海默前，他已经构思了一种建造机器的想法，这种机器能够穿透目前为止久攻不破的原子核。原子核的确存在，他曾经开玩笑地说，原子核就像“教堂里的一只苍蝇”。它不仅微小，而且被一种叫做库仑（电量基本单位）的皮肤所保护。物理学家们估计在100万伏能量的推动下，氢离子流能够穿透原子核。在1929年产生如此大的高能量是不可能的，但是劳伦斯建议建造一台机器使用相对小的2.5万伏的电荷，在交流电场中来回给质子加速。

1931年早期，劳伦斯已经建造出了他的第一台简易的加速器。这台机器带有一个4.5英寸的内室，在内室里能产生8万伏的电荷。一年后，他又建造出能产生百万伏的质子加速器。他现在梦想建造数百吨重、价值数万美元的更大加速器。他为他的发明创造了一个新词——“回旋加速器”，并且说服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把坐落在伯克利校园尽头的物理学的老式建筑给他作实验室。那是毗邻莱克特楼的老式木屋，劳伦斯称它为伯克利放射实验室。全世界的物理学家们很快意识到，劳伦斯在他的放射实验室里所做的研究，已经使人们能够更深层次地接触原子了。1939年，劳伦斯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用八吨磁铁来建造回旋加速器需要花费很多钱，但是劳伦斯擅长从多方获得赞助，像伯克利的校董石油企业家埃德温·波利、银行家威廉·克罗克，以及身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首席顾问的弗朗西斯·尼兰都曾经为其提供过资助。1932年，斯普劳尔资助劳伦斯成为旧金山波希米亚精英俱乐部的会员，该组织是加利福尼亚最有影响力的商人和政治家参与的兄弟会。该会不欢迎罗伯特·奥本海默，因为他是犹太人而且太专注非现实世界，但是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娃却轻而易举地进入了该精英社团。（后来，尼兰帮助他加入了更排外的太平洋联盟俱乐部。）劳伦斯源源不断地从这些声名显赫的人手中获得资金，同时他也对他们反对罗斯福新政的保守政策表示赞同。

相反，奥本海默对金钱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所起的作用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当一位研究生为某项课题研究写信给他以求得资金上的帮助时，奥本海默做出了奇怪的答复：研究“像婚姻和诗一样历经磨难，但恰恰是这些阻难促使了它们的发生”。

那时，全世界的物理学家们掀起了解决同一类问题的竞赛，而且竞争非常激烈。在这场竞赛中，奥本海默被证明是多产的业余选手。他和他的一些学生一起工作，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并及时发表了那些课题的研究手稿，比其他的竞争者提前了一两个月。伯克利的一位同事回忆道："那真是令人惊奇，奥本海默和他的团队在这场竞争中攻克了这些难题。"他们的研究结果可能是不完美的，甚至可能不是特别准确，其他人不得不进一步修正剔除他在研究上的缺陷，但是奥本海默始终如一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奥本海默极其擅长透视物理学的本质，他在信封背面计算并写下所有主要的要素……迪拉克习惯那种严密精致的工作方式，而这不是奥本海默的风格。他研究问题迅速且粗糙，像美国人制造机器一样。"

奥本海默没有耐心，他不会在某一个问题上纠缠不清。正是这样，其结果常常是他开启了大门，而别人借助他做出了重大发现。1930 年，奥本海默他写了一篇举世闻名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运用直接理论探讨了光谱线的无限性。氢光谱线的分离暗示着，氢原子的两种可能状态在能量级上存在细小的差异。迪拉克反驳说，在两种状态下氢都应该具有同样级别的能量。在论文中，奥本海默不同意上述观点，但是他没有做出最终判定。然而几年以后，他的一位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实验物理学家威利斯·拉姆，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所谓的"拉姆转移"把两种能量级的不同准确地归因于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被充电的粒子和电磁场相互作用。1955 年拉姆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的部分原因是他对"拉姆转移"的精确测量，这项发现是量子电动力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一步。

这几年，奥本海默写了许多重要的，甚至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论文，涉及面极广，包括宇宙射线、伽马射线、电动力学以及关于正负电子的一系列问题。在核物理学领域，他和梅尔巴·菲利浦共同计算出在氘核反应过程中质子的爆炸当量。菲利浦是一个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农家女孩，她出生于 1907 年，是奥本海默的第一个博士生。他们关于质子爆炸当量的测量成果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奥本海默—菲利浦程序"。"他是一个极具创意的人，"菲利浦回忆道，"他没有伟大的物理学成就，但是他和他的学生们关于物理学的奇思妙想却造福了人类。"

今天的物理学家一致同意，奥本海默的最伟大、最具创造性的成就是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对中子星所做出的研究，而天文学家直到 1967 年才观察到中子星这种天文现象。他对天文物理学的兴趣首先被理查德·托尔曼

点燃,理查德把他介绍给了在帕萨迪纳威尔逊天文台工作的天文学家们。1938 年,奥本海默和罗伯特·塞培尔撰写了题为《论恒星中子核的稳定性》的论文,论文中探讨了高度压缩的"白矮星"的某些特征。几个月后,他和他的另一位学生乔治·沃尔科夫合作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大规模中子核》的论文。他们勤勤恳恳,终于得出结论。他们推测,在达到中子星的质量过程中存在着上限(现在被称为"奥本海默—沃尔科夫极限"),超出这个上限中子星就变得不稳定了。

九个月后,也就是 1939 年 9 月 1 日,奥本海默和他的另一位学生哈特兰·斯奈德合作发表了题为《论持续的引力收缩》的论文。当然,历史上的这一天因为希特勒入侵波兰导致二战爆发变得人所共知。但是,以一般的眼光来看,那一天论文的发表也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杰里米·伯恩斯坦称那篇论文是"20 世纪物理学中最伟大的论文之一"。然而,论文当时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几十年后物理学家们才发觉,早在 1939 年奥本海默和斯奈德就已经开启了通向 21 世纪物理学的大门。

他们以提问作为论文的开头,即一个自身开始燃烧并将耗尽燃料的大星体将会发生什么?他们的计算表明,超出某种质量范围的星体(现在认为这质量大约是太阳的两到三倍),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会持续不断地被压缩,而不是蜕变成"白矮星"。凭借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他们分析道,星体能被"奇点"轻而易举地吞噬,甚至光波也不能逃离环绕于周围的重力所带来的拉力。因此从远处看,星体确实已经消失了,把自己与宇宙的其他部分隔离了起来。奥本海默和斯奈德在论文中这样写道:"只要重力持续施压的话,这种现象就会存在。"也就是说,它将会变成黑洞,虽然当时他们没有使用这一术语。因为这篇论文既奇妙又怪诞,长时间被认为是数学上的狂想,所以它的重要性被人们忽视了。

直到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当天文观测技术赶上理论的发展时,才有大量的黑洞被天文学家探测到。随着射电望远镜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的出现,黑洞理论成为当时天文物理学的核心理论。"回顾过去,奥本海默和斯奈德的工作以精确的数学方式表述了黑洞的蜕变过程,"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学教授索恩说道,"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个理论是很难理解的,因为用数学方法表示出来的事物,不同于任何表示宇宙物体怎样运行的图画。"

然而,基于他的性格,他没有花时间对这一理论进一步润色加工,这一任

务留给了数十年以后的后来者去完成。可是,人们仍然存有疑问:"他为什么如此挑剔?"当别人一提出新理论时,他总能看出它的不足和缺陷。爱德华·特勒立即想到,当前许多物理学家不顾理论本身存在的漏洞,大肆宣扬他们的新理论,然而奥本海默的严谨治学态度使他们开始彻底怀疑自己的理论。塞培尔回忆道:"奥本海默对所有的想法都抱有怀疑的态度。他擅于置疑的个性使他发生了转变,他抛弃了对传统理论的盲目迷信,主张有时要对传统理论进行大胆的怀疑。在黑洞理论上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后,他的怀疑精神把他导向对另一问题的研究——介子理论的研究。"

奥本海默的物理学界的朋友和同事们一致认同他是一个天才。几年以后,他们讨论了为什么他没能获得诺贝尔奖。"罗伯特的物理学知识博大精深,"尼德尔斯基说道,"可能只有泡利在物理学上的造诣胜过他。"与许多人一样,诺贝尔奖垂青于那些甘于奉献,周密制定计划,合理安排时间,擅于抓住机会,才能卓著的人。奥本海默甘于奉献,孜孜不倦地专注于物理学研究,从不放过感兴趣的每一个问题,同时他也才高八斗,但是他没有周密的研究计划——他的时间安排是随意的。诺贝尔奖最终只授予在某一领域里取得卓越成就的科学家,然而奥本海默的天才在于他具有整合整个领域研究成果的能力。埃德温·尤林是他的学生,1934 年至 1936 年在他的指导下做博士后研究。他回忆道:"奥本海默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人,他的物理学知识是综合性的。我不认为他的成就没有达到诺贝尔奖的要求。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可能只是因为评委会认为他的成果不够令人激动。"

罗伯特很少花时间去玩乐。1929 年夏,他曾对弗兰克坦言:"我对物理学的所需多于朋友。"他每周会去山上骑一次马,俯瞰整个旧金山湾。他在给弗兰克的信中说:"有时我和朋友们开着克莱斯勒随处逛。有一次,我们在路口开到了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把当时的一个朋友吓坏了。而那辆车在每小时七十五英里的速度下行使都不会有震动,因此可以说我是一个坏透了的司机。"有一次,他和纳塔利·雷蒙德一起外出,由于不慎驾驶,他发生了车祸。他毫发无损,成功逃离灾难。他以为和他一起的年轻女子雷蒙德在车祸中丧生了。事实上,她当时只是没有了知觉。当朱利叶斯查明这场车祸后,他送给雷蒙德一张塞尚的素描和一幅弗拉曼克的油画作品。

雷蒙德是在帕萨迪纳的舞会上邂逅奥本海默的,那时她还是十七八岁的美丽少女。一个和罗伯特经常通信的朋友曾经在信中提到,"雷蒙德是一个

十足的冒险家,在某种程度上像他。这很可能是他们性格上的共同点,只不过他比雷蒙德年长一点"。他称她为精灵,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经常见面。奥本海默把她形容为"美丽的小姐"。他陪她在音乐之城的音乐厅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欣赏了一场美妙的巴赫音乐会。之后,他在给弗兰克的信中说道:"与雷蒙德在一起的最后日子里,她总是给人以新鲜感、神秘感,令人神往。"在1934年暑假的大部分时间,雷蒙德都是与罗伯特以及在佩罗卡连特的其他人一起度过的。他们的关系直到她搬到纽约做自由职业的图书编辑时才结束。

雷蒙德不是奥本海默一生中唯一的女人。1928年春天,他在帕萨迪纳的舞会上认识了海伦·坎贝尔。虽然她已经和伯克利的一位物理学讲师塞缪尔·阿利森订婚了,但是她仍被奥本海默深深吸引。他邀请她到外面共进晚餐,并且一起散步。当1929年他重回伯克利时,他们重叙旧情,尽管那时她已经结婚了。当她细致地观察他时,她发现,爱上他的年轻少妇们无一不是被他的花言巧语和殷勤周到所征服。他对女人要求很高,她认为他本不应该对她太好。她发现他喜欢谈论那些生活不如意的女人,同时他还对女同性恋很敏感,但是他从来不是一个缺乏魅力的男人。

奥本海默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人人都希望自己招女人喜欢。虽然这种愿望很强烈,但是那并非自负的体现。如果一个人不去致力于吸引女人,就不可能去追求高品位、外在美和幸福感。因为这些不是人们努力实现的特定目标,它们是人类生活充实的外在描绘。因此,保持天天快乐就像建造一台不产生噪音的机器一样不可思议。"

当弗兰克写信抱怨他和一位年轻女人的烦恼事时,罗伯特回信道:"我应当说,你不应该让女人为你担心,除非她们能给你真正的快乐,否则不要和她们来往。和你交往的女人应当是不仅能够给你快乐,而且你要能给她带来快乐,并且真正让你身心放松的女人。通常来说,女人一方担负有主动尝试交往的责任,如果她们不接受这一责任的话,你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显然,他都不能很好地处理和异性的关系,更不要说他的17岁的弟弟了。

对他的大多数朋友来说,奥本海默充满了矛盾。当1929年哈罗德·彻尼斯认识他时,彻尼斯正在伯克利的古典希腊语系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彻尼斯刚和奥本海默的一个儿时朋友鲁思·迈耶结婚,她和奥本海默早在道德文化学校学习时就认识了。彻尼斯很快就和奥本海默成为了朋友。"他浑身散发出物理学的气息,美妙的声音和他那得体的举止会令男性和女性都喜欢

他。”但是彻尼斯同时承认:“和他接触越频繁,交往越密切,我就越不了解他。”作为一位敏感的观察者,他感觉到和奥本海默疏远了。彻尼斯认为,他聪慧过人,人们之所以觉得他很复杂,是因为他兴趣广泛,知识渊博。但是在情感方面,简单来说,奥本海默想做一个普通人,他非常需要朋友。然而,他尽管有着丰富的个人魅力,却不知道怎样交朋友。

7 | “淘气的孩子”

“请告诉我，政治与真、善、美有什么关系？”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30年春，朱利叶斯和埃拉去帕萨迪纳看望他们的儿子。前一年秋天股票市场的暴跌，已经使整个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然而朱利叶斯非常幸运。他早在1928年就从股票市场抽身，卖掉股票的同时也卖掉了在河畔大道的公寓和湾岸的度假别墅，与埃拉一起搬到公园大道的一座小型公寓里。因此，奥本海默家族的财富没有受到损失。罗伯特对自己的克莱斯勒汽车抱怨不已，朱利叶斯于是给儿子买了一辆新的。罗伯特把他的新车称作“迦玛列”，这是《圣经》里著名的希伯来学者的名字。少年时，他竭力掩饰自己的祖先是犹太人的身份，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自己逐渐成熟，他觉得那已没有什么好掩饰的了。

在这些日子里，弗兰克写信抱怨说，他熟悉的哥哥已经消失了；罗伯特回信对弟弟说，哥哥永远陪伴着你。罗伯特明显意识到，在他不在的两年里弟弟已经长大了。弗兰克说：“当你认出我时，你会惊奇地发现我有6英尺高，头发乌黑，眼睛幽蓝，嘴唇有点开裂，而且我还可以接罗伯特打来的电话了。”

他试图回答弟弟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做到不受情绪的影响并且理智地处理问题？”罗伯特的答复让人看出他对心理学的兴趣也很浓厚。“……我认为，对情绪要因势利导，不要被它影响从而使自己偏离正确方向。因此，当你开心时，做需要好心情才能做好的事；当你忧郁悲伤时，做需要压抑情绪才能做好的事情；而当你情绪低落时，去做些能令人心情放松的事。”

和其他教授不一样，奥本海默常常和学生们泡在一起。“我们做任何事都在一起。”埃德温·尤林说。星期天早上，他经常光顾埃德温的寓所，一起共进早餐，一起听收音机播放的纽约交响乐团的演奏。每周一的晚上，他和劳伦斯都会开物理学的讨论会，来自伯克利和斯坦福的研究生都有资格参加。他们把讨论会戏谑为“周一晚的杂志俱乐部”，因为他们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自然》杂志或《物理评论》中新近发表的文章上。

1934 年，他搬到了位于沙斯塔路 2665 号的一间小型公寓里，它坐落在伯克利山中一条陡峭的之字路上。他常常邀请学生们参加在他家里举行的晚宴，一起畅饮掺了墨西哥红辣椒的白酒，一起喝红葡萄酒。在这种场合，他会要求学生们品尝他精心准备的有点酒力的马提尼酒。不管冬天还是夏天，屋里的窗户总是开着的。这使得他的客人们不得不挤到角落里，靠近屋里的壁炉。卧室铺着从新墨西哥买来的印度地毯，墙上挂着父亲送给他的毕加索的版画。当物理学话题谈得乏味时，谈话的主题会转向艺术或文学，有时他会建议谈谈电影。从这所小小的房子可以看到旧金山和金门桥的美景，他称它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港口”。从房子上面的大路看，屋子被桉树、松树和阿拉伯胶树遮蔽着。他告诉弟弟说：“我常常躺在星空下，想象自己躺在佩罗卡连特的长凳上。”

这些年，奥本海默总是一身工作服打扮：灰色套装，丁尼布的衬衫，一双破旧但擦得很亮的黑色皮鞋。大学毕业后，他就脱下了学生服，换上了蓝色的工作服，穿上带有墨西哥银扣子的褪了色的牛仔裤，修长的手指染上了黄色的尼古丁。

不知不觉，一些学生开始模仿他的怪癖行为。他们常常模仿他“嗯嗯”的声音，因此被称为“嗯嗯男孩”。几年后，这些初出茅庐的物理学家都开始抽奥本海默常抽的切斯特菲尔兹牌香烟。人们都像他一样，当有一人掏出烟时，都会有人给他点上，顿时周围就烟雾缭绕了。“他们模仿奥本海默的手势、动作和声调。”罗伯特·塞培尔这样回忆道。伊西多·拉比说：“奥本海默像蜘蛛一样位于他周围人际关系网的核心。有一次，我在伯克利对他的一群学生说了一句‘我觉得你们很有天赋’，第二天，他就知道这句话了。”那是一种近乎狂热的迷信和崇拜。埃德温·尤林说：“我们不应该喜欢柴可夫斯基，因为奥本海默不喜欢他。”

他的学生都会清楚地记得，与其他的物理学家不同，他大量地涉猎专业领域以外的书籍。哈罗德·彻尼斯回忆说：“他大量阅读关于法国诗歌的书

籍,所有能找到的书包括诗歌和小说他都阅读。"彻尼斯亲眼看见他不仅读古希腊的诗歌,而且阅读类似欧内斯特·海明威一样的当代小说家的作品。他尤其喜欢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这部作品。

即使在经济危机时,他的生活状况无疑也是优越的。首先,1931 年 8 月他被擢升为副教授,年薪三千美元,此外他父亲继续向他提供额外的补助。虽然朱利叶斯没有获得充裕的资金来建立他一直想建立的独立基金会,但是他的钱足够建立信托基金。因此,奥本海默从来没有中断过他的研究。

像父亲一样,他天生慷慨,非常乐意和学生们一起分享美味佳肴。在伯克利时,当开完研讨会后,他总会邀请一群学生去杰克餐厅吃晚餐。杰克餐厅拥有全旧金山最美味的食品。他的一位老友说,在 1933 年全国上下禁酒时,他总是知道旧金山最好的餐馆和地下酒吧在哪里。在那时,人们只有通过渡船才能从伯克利到达旧金山,当他们在等渡船时,人们总会在渡口的酒吧里匆忙地来上一小口酒。他们一到坐落在萨克拉门托街 615 号的杰克餐厅,他就开始点酒,并让学生们点餐厅里最好吃的菜,通常都是他买单。他的学生弗兰克林·卡尔森和梅尔巴·菲利浦都在尼德尔斯基那里租了房子,他每两三周会去看望他们一次。几乎每晚十点他们都会准备饭菜和点心,每个人都坐在一起玩弹塑料片游戏,一起谈天说地,畅所欲言。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聊到半夜,有时甚至聊到凌晨两三点。

每年春天,也就是伯克利的第一学期结束后的 4 月份,他的学生都会远行三百七十五英里同他到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去,他在那里教春季班。学生全然不计损失地放弃了他们在伯克利租的公寓,不顾昂贵的费用搬到了帕萨迪纳每月高达二十五美元的花园式别墅。除此以外,暑假里一些学生甚至同他参加了在安娜堡举行的为期几周的密歇根大学物理学研讨会。

1931 年夏天,奥本海默遇到了自己在苏黎世读书时教过他的老师沃尔夫冈·泡利,他也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在研讨会上,他不断地打断奥本海默的演讲,直到另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克拉默斯冲他生气地吼道:"泡利,请闭嘴,让我们听完他的演讲。等他讲完了以后,你可以随意指出他的错误。"如此尖酸的戏谑反而凸显了奥本海默的卓越才能。

1931 年暑假,埃拉病倒了,被确诊为白血病。1931 年 10 月 6 日,朱利叶斯发电报给他说:"母病危,不久矣……"他迅速赶回家,整夜守在母亲的床头。母亲面色苍白,毫无生气。他给欧内斯特·劳伦斯写信说:"我不能和她

谈话。她很憔悴且面带忧伤,但是没有绝望,依然和蔼可亲。"十天后,他被告知,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她已经不省人事了,死神一步步接近她了。我们现在只祈求她不要遭受太多的痛苦……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喔,加利福尼亚!'"

在母亲过世后,奥本海默的老师赫伯特·史密斯来慰问他。经过几小时漫无边际的谈话,他抬起头说道:"我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埃拉死于 1931 年 10 月 17 日,享年 62 岁,当时他才 27 岁。一位好友试图安慰他说:"你知道的,你母亲非常爱你。"他以轻微的嘀咕来回答:"是的,我知道,可能她太爱我了。"

遭受失妻之痛的朱利叶斯继续在纽约生活,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开始频繁地探望远在加利福尼亚的儿子。母亲过世后,父子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他的同事们看到他为父亲整理房间的细心周到,无不为之感动。1932 年的冬天,父子二人住在帕萨迪纳的别墅里,那学期他正在那里任教。他每天都和父亲一起共进午餐,每周都会带父亲去一家上流精英参加的晚餐俱乐部。他预定了一张桌子。在晚会上,会有一位预先指定的人作演讲,接下来是大家激烈的讨论。朱利叶斯非常喜欢参加这种活动,他在给弗兰克的信中说:"他们非常有趣……我邂逅了他的许多朋友。但是我相信没有打扰他们的活动,他总是很忙,有时谈些我听不懂的东西。"

在他的朋友里,他把父亲介绍给了伯克利的梵文教授阿瑟·赖德。赖德是丹佛的共和党人,他强烈反对个人崇拜。他被奥本海默深深地吸引,而从奥本海默方面来说,他认为赖德是一个典型的天才式人物。他的父亲表示赞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是一个艰苦和朴素的完美结合体,通过艰苦朴素的品质可以看出他绅士般的灵魂。"罗伯特后来坚信赖德是个道德伦理的忠实捍卫者。他认为,赖德是一名学者却被人们看作禁欲主义者,赖德是对生活持有悲剧感的极少数人之一。赖德认为,人都可能犯不可弥补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他的所有东西都已经不重要了。

奥本海默发觉自己被赖德和他擅长的古老语言吸引住了。不久,赖德就开始在周四晚上对他进行梵文家教。他给弗兰克写信说:"我开始学习梵文了。我非常喜欢,非常珍惜这次不可多得的接受教育的机会。"介绍他和赖德认识的哈罗德·彻尼斯说,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他对任何事物都很感兴趣。他喜欢挑战那些困难的事情,除此以外,他还对神秘的、玄妙的事物非常爱好。

由于他的语言天赋,他很快就读懂了《薄伽梵歌》。"这本书很浅显,可是

相当精彩。”他写信给弗兰克说。他给朋友们讲古印度文章里的“圣主的歌”，他认为那是人类所有语言中最美妙的哲学诗歌。赖德书桌旁的书架上有一本粉红色封皮的书，他给了奥本海默一个复本。奥本海默把《薄伽梵歌》复本作为礼物送给了朋友们。

奥本海默那时非常喜欢学习梵文。1933 年他的父亲给他买了一辆新的克莱斯勒，他称它为“揭路荼”。它是印度神话里的鸟神，能载印度教主神飞上天。《薄伽梵歌》是梵文史诗《摩呵婆罗多》的核心，它是以神的化身奎师那和人类的英雄阿朱那王子之间的对话形式写成的。当神与人类进行殊死战斗时，阿朱那拒绝参加反对自己朋友和亲人的战争。奎师那却回答说，从本质上讲，作为一名战士就必须履行战斗和杀敌的使命。

从 1926 年遭受感情挫折以来，奥本海默一直试图寻求内心的平静。他一生善于自控，努力工作，现在他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去生活。1932 年春天，他给弟弟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说明了原因，他解释说：“这种自制对人是有好处的，是人类善良本性的组成部分。我相信，虽然自制只是一种方法之一，但是通过自制我们可以得到内心深处的安宁，得到来自前世的偶然的但又极为珍贵的一些自由，得到免受世界谴责的冷静与客观。我相信通过自制，在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我们能保护自己，学会放弃其他看似可有可无的单纯。”只有通过自制，才有可能“摆脱个人意志对事物的歪曲来认识世界，使我们更容易接受人世间的贫困和恐惧”。

像许多西方科学家对东方哲学惊奇不已一样，奥本海默在神秘主义中找到了一丝心灵的安慰。他在给 20 岁的弟弟的信中说：“因此我认为所有的事物都能激起自制，包括学习、责任、战争、个人努力，甚至是维持生计的需要，我们都应该满怀感激之情去接受它们。因为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安宁，才知道什么是和平。”

在二十多岁的后半段，他已经着手追求一种世俗化的超然，换句话说，他希望自己与物理学界的科学家一起研究物质世界，然而又使自己不同于他们，他不想彻底摆脱精神世界。他不需要宗教，他追求的是内心的平静。看来《薄伽梵歌》为感情丰富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最有效的哲学。

《薄伽梵歌》不像《奥义书》，它颂扬一种行动的、参与世界的生活方式，这和奥本海默在道德文化学校所接受的教育是一致的，但也存在许多明显的区别。《薄伽梵歌》里关于因果报应和俗世责任的理念，与道德文化社团所提倡的人道主义不相符。费利克斯·阿德勒博士贬低任何永恒的“历史规律”的

教导,“道德文化”运动强调个人意志的作用。这对于约翰·洛夫乔伊·埃利奥特在下曼哈顿外来贫民居住区里做的社会工作没有实质性意义。因此,《薄伽梵歌》主张的宿命论吸引了奥本海默,它至少部分地激发了他对童年时期所学知识的思考和反抗。拉比也持这种观点。

拉比推测,奥本海默年轻时学的道德文化传统很可能成为了他难以卸载的负担。要知道人类行为的所有后果是不可能的,好的想法有时也可能导致可怕的后果。他完全接受了道德伦理,然而他素有大志,天生聪颖,富有好奇心,像许多意识到生活坎坷的知识分子一样,有时他也会因为无法有所作为而感觉无奈。后来,他生动地描述了这种尴尬:“像其他人一样,我不得不先决定然后再付诸实践;或者我会考虑我的动机、独特性、美德和缺陷,并试图弄明白为什么要去改变那些事物。它们本身就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同时又互相抵消。”在道德文化学校时,费利克斯·阿德勒不断要求自己“作自我剖析和自我评价,以达到他为别人所定的高标准和严要求”。但是当奥本海默快30岁时,他对这种苛刻的自我反省的不满与日俱增。正如历史学家詹姆斯·希吉亚提到的,《薄伽梵歌》为他的心理困境提供了答案:专心工作,承担责任,自我约束,坦然面对结果。这使他能平静地接受他的行为所造成的任何结果,也能像阿朱那一样忠实履行自己的责任。因此责任和大志使他不在意别人的怀疑,尽管怀疑犹在,因为他知道人是容易犯错误的。

1934年6月,他回到密歇根大学给暑期班学生讲授物理学,并作了一场他对迪拉克方程最新评论的演讲。那次演讲给正在做博士后的年轻的罗伯特·塞培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立即决定放弃自己现在的研究奖学金,从普林斯顿去伯克利。几周后,塞培尔开车来到伯克利,奥本海默邀请他去看了一场罗伯特·蒙哥马利主演的惊险故事片《黑夜到来》。这是他们终身友谊的开始。

塞培尔的父亲是一个与政治有着紧密关系的费城律师,因此他是在明确的左翼政治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他父亲出生在俄国,父母都是犹太人。12岁时他母亲就去世了,没过多久父亲再婚,娶了弗朗西斯·里奥弗。她是一位壁画家、制陶工艺者,据美国联邦调查局资料显示,她加入了共产党。塞培尔的继母有一位在费城做医生的叔叔莫里斯·里奥弗,她叔叔很有人格魅力。里奥弗家是个大家族,以叔叔莫里斯·里奥弗和妻子珍妮为核心,罗伯特·塞培尔很快便成了其中的一员。年轻的他很快就爱上了莫里斯和珍妮最年

轻的女儿夏洛特·里奥弗。1933 年,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以后,他就迎娶了夏洛特。夏洛特秉承了父亲的政治观点,在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她一直是狂热的活动家,持左翼观点并积极开展政治活动。基于所有这些家庭的因素,塞培尔的政治观点倾向于左翼毫不奇怪。但是几年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说,"没有资料表明塞培尔是共产党员"。

在伯克利,他和奥本海默一起研究物理学。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他就发表了十二篇论文,其中有七篇是和他导师合写的。论文的主题涉及宇宙射线粒子、高能质子的分裂、高能量级上的原子核光电效应和恒星原子核内核等。奥本海默对劳伦斯说,塞培尔是"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为数不多的真正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他和奥本海默也是亲密的朋友。1935 年夏天,奥本海默邀请塞培尔夫妇去新墨西哥做客。但是塞培尔对那里的环境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佩罗卡连特的日子对他来说非常痛苦。那里海拔九千英尺,稀薄的空气使得游客们气喘吁吁。他后来写道:"在奥本海默那里的前几天,任何一项体力活动都会让人累得气喘吁吁。"奥本海默兄弟租住这个牧场已经有五年了,但屋里的家具依然很少:简单的木制桌椅,壁炉前一张沙发,地上铺一条纳瓦霍人的地毯。弗兰克从木屋上的泉水中接上了一根管子,他们才用上自来水。塞培尔很快就意识到,对奥本海默来说,大牧场只是骑马累了以后用来睡觉的地方。

直到 1934 年,奥本海默才表现出对政治和时事的关心。此前,与其说忽视,倒不如说漠不关心,他对政治一点也不积极。但是有时,他则表现出对政治的天真和幼稚。后来他揭开了对时事缺乏了解的原因:他宣称自己既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话,既不看报也不读杂志。他喜欢在事后几个月才对别人讲他听到的关于 1929 年 10 月 29 日的股票市场危机的新闻。他说直到 1936 年的大选,他才开始第一次投票。1954 年他证实道:"对我的许多朋友来说,我对时事的漠不关心看起来很奇怪,他们常常指责我自恃博学而不问时事。我对人和经验感兴趣,被我研究的科学深深吸引,但是我却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几年之后,罗伯特·塞培尔对此发表评论道,奥本海默的自我批评恰恰反映了他是"一个不世俗、不擅交际、没有审美能力的人,他不知道世界是怎么样的,因为他根本不喜欢"。

在伯克利,他常常被那些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和同事包围。从 1931 年起,他所住的沙斯塔路 2665 号的女房东是玛丽·艾伦·沃什博恩。

她是一位高个子、令人肃然起敬的女人。她穿着艳丽的蜡染布做的连衣裙，喜好交际。她的丈夫约翰·沃什博恩是一名会计师，在大学里教经济学。他们的房子成了伯克利的知识分子长期开展社交活动的中心。玛丽·沃什博恩本人和这些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都对左翼运动持同情态度。美国联邦调查局后来认定，她是阿拉米达县共产党中的积极分子。

一位名叫哈康·希瓦利埃的年轻法国文学教授，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一直参加他们夫妇举行的社交活动。塞培尔夫妇也曾经去过，一位名叫简·塔特洛克的年轻漂亮的医学系学生也常常去。很自然地，住在楼下的奥本海默也常常参与这些活动。“我们没有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政治的兴趣。”梅尔巴·菲利浦回忆说。奥本海默曾经对尼德尔斯基说：“我知道三个人对政治很感兴趣。请告诉我，政治与真、善、美有什么关系？”但是，1933年希特勒开始掌握德国政权以后，政治开始侵入奥本海默的生活。那年的4月底，德国的犹太裔教授被当即解除工作。一年后，也就是1934年春，奥本海默收到了一份传单请求提供资金支援德国物理学家移民，他立即同意拿出自己两年工资的30%用于支援他们。有趣的是，在接受这一支援的移民中，其中一位是他在哥廷根时教他的教授詹姆斯·弗兰克博士。希特勒刚上台时，他是被允许保留继续工作的为数不多的犹太裔物理学家之一，但是一年后由于拒绝解除其他犹太人的工作而被强制流放。到1935年，他才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物理学。同样，1933年马克斯·博恩被迫逃离哥廷根，最后在英国教书。

接下来，从德国传来的消息更加令人震惊。到1934年，任何人都不可能忽视在伯克利发生的政治暴乱。五年的经济萧条，使上百万的居民贫困潦倒。1934年5月9日，超过一万二千名码头工人在西海岸的沿线港口设立纠察队。到6月底，码头工人的罢工几乎扼杀了加利福尼亚、俄勒冈以及华盛顿州的经济。在7月的早些时候，当局试图开放旧金山的港口，警察向成千上万的码头工人施放催泪瓦斯，暴乱随之发生。经过持续四天的冲突以后，几名警察向人群开火，导致三名男子受伤，其中两名死亡。1934年7月5日，成了闻名的“红色星期四”。

十一天后，也就是7月16日，旧金山的工会发动了一场全面罢工，整个城市瘫痪了四天。联邦政府介入调停，直到7月30日西海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终于结束了。码头工人开始复工，虽然他们没有获得工会所要求的工资，但是很显然工会赚得了大量的政治资本。罢工博得了人们对码头工人境

况的广泛同情,大大加强了工会组织活动的能力。1934 年 8 月 28 日,政治气氛有利于左翼,标志是激进派作家厄普顿·辛克莱获得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提名。虽然由于少数人的蓄意诋毁和部分共和党人的不信任,辛克莱的竞选失败了,但是加州的政治已经和以前不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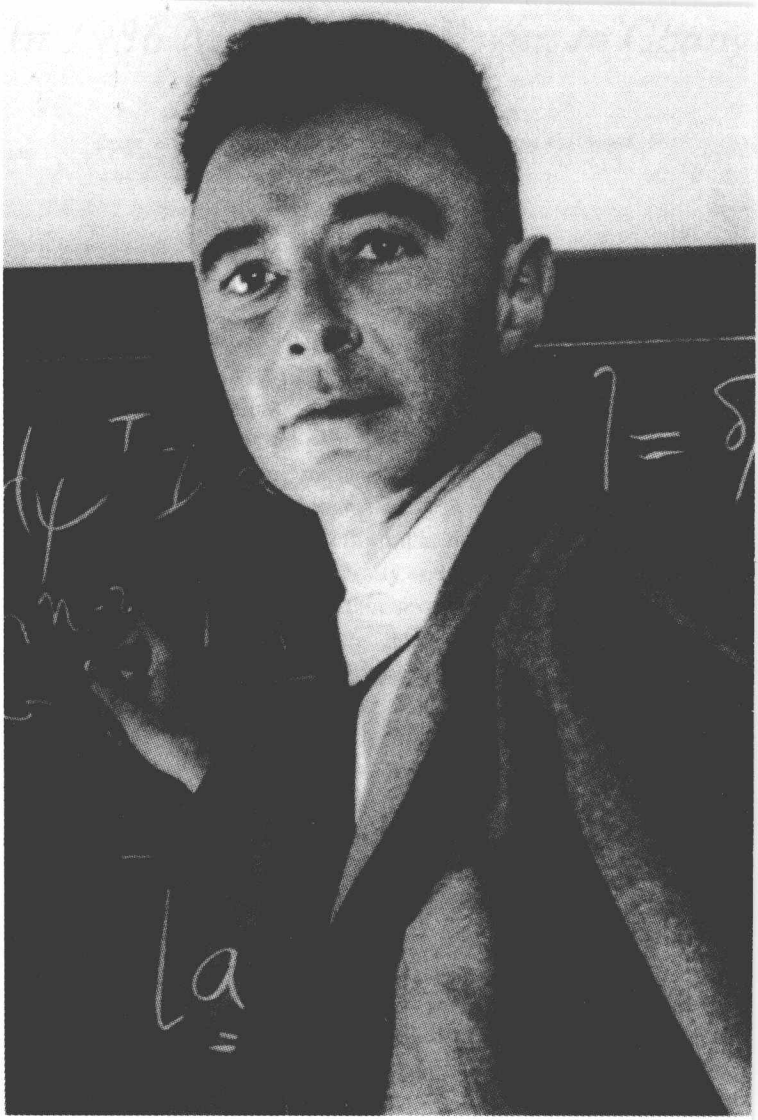
如此重大的事件不可能不引起奥本海默和他的学生的关注,事实上在伯克利就分成了罢工的反对派和支持派。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奥本海默邀请一些学生和他一起参加了在旧金山礼堂举行的码头工人集会。塞培尔回忆说:"我们当时坐在高高的看台上,自始至终我们都被他们的激情所感染,和他们一起高呼'罢工、罢工、罢工!'"后来,奥本海默去了一位朋友埃斯特尔·卡昂的住处,在那里他被朋友引见给了很有人格魅力的码头工人工会领袖哈里·布里奇斯。

1935 年秋,弗兰克·奥本海默完成了在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学习回到了美国。他获得了一项奖学金,这使得他能完成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工作。罗伯特的老朋友查尔斯·劳瑞森同意做弗兰克的论文导师,于是弗兰克立即投入到 β 射线光谱的研究,这一课题是他在卡文迪许时就开始研究的。弗兰克回忆说:"作为一位刚起步的研究生,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感觉很棒。"

罗伯特仍然把时间分配在伯克利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之间,每年春天待在帕萨迪纳与他的好友理查德·托尔曼和鲁思·托尔曼一起度过。托尔曼夫妇在大学附近建了一座粉白色的西班牙式房屋,后院有一个郁郁葱葱的花园和一间客房。只要罗伯特在镇上,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会在此住上一段时间。罗伯特和托尔曼夫妇是在 1929 年春天认识的,就在那年夏天托尔曼夫妇去罗伯特新墨西哥的大牧场拜访了他。后来,他本人也说,与托尔曼夫妇的友谊非常紧密。他承认托尔曼智慧超群且兴趣广泛,对物理学有独特而深刻的见解,同时他也称赞托尔曼很爱妻子。鲁思那时是一个诊所的心理咨询师,刚刚研究生毕业。对奥本海默来说,"夫妇俩在可怕的加州为他创造了一个温柔的家乡"。如果奥本海默不选择和他的朋友劳伦斯一样为加州的建设劳心费力的话,无论怎样,他都会过得很开心。他回忆说:"我已经决定在此扎根奉献了,那里的确是令我满意的地方。"

的确,在 20 世纪 30 年代,除了暑期离开加州去新墨西哥度假以及去安娜堡参加研讨会以外,他再也没有重返过欧洲。哈佛大学曾提出,如果他能去

东部工作立即把他的工资提高两倍,但是他不为所动。1934 年在普林斯顿刚成立的高等研究院两次邀请他离开伯克利,但是他坚决拒绝了,他说“在那种地方,我绝对毫无用处……”。他给弟弟写信说:“我拒绝这些诱惑,只专注于我现在的工作。在这里我可以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同时,美味的加利福尼亚葡萄酒能慰藉我在物理学上遇到的困难和自己人性的缺点。”他认为自己根本不成熟,只长大了一点点。他的理论著作相当丰富,部分原因是他一周只有五个小时的课,这就使他有足够的时间用于物理学和其他事情……在那里他还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女人。



第二部分

8 | “1936 年我的兴趣开始改变”

“简是罗伯特的真爱，他深爱着她。”

——罗伯特·塞培尔

当罗伯特在 1936 年春天遇见简·塔特洛克时，她才 22 岁。他们是在奥本海默的女房东玛丽·沃什博恩在沙斯塔路的房子里举行的宴会上认识的。这时的简将要完成她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第一年的学习。当时的斯坦福大学坐落在旧金山。奥本海默回忆道：“在那个秋天，我开始追求她，我们变得越来越亲密。”

简的身材不错，有着浓密乌黑的鬈发、幽蓝色的眼睛、浓黑的睫毛，以及天生的红润嘴唇。有人认为她看起来就像爱尔兰的公主。她有 5 英尺 7 英寸高，但体重从未超过 128 磅。她有且只有一个身体缺陷：睡意浓浓并且有点下垂的眼睑。这是小时候的一次意外造成的。然而，这个几乎察觉不到的缺陷反而给她增添了魅力。她的美丽打动了罗伯特，同样使他着迷的还有她害羞的外表。“简有着非常神秘的忧郁。”她的一个朋友伊迪丝·詹金斯后来写道。

罗伯特知道她是伯克利著名的乔叟研究者约翰·S. P. 塔特洛克教授的女儿，约翰是为数不多的物理系之外的教授委员会成员之一。罗伯特和他私下有过不止一次的会面。在一次午餐后，塔特洛克教授在教授俱乐部见到罗伯特，并被这个年轻的物理学教授提出的有关英语文学知识所折服。因此，当奥本海默遇到简时，他很快认识到，她继承了她父亲的文学鉴赏能力。简喜欢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的神秘诗，她也喜欢约翰·邓恩的诗——这种强烈的文学爱好传递给了罗伯特。许多年以后，当他读到邓恩的十四行诗

“打击我的心吧，三位一体的上帝……”而产生灵感用“三位一体”作为第一次核试验的代号。

简 1914 年 2 月 21 日出生在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市，她和她的哥哥在马萨诸塞以及后来的伯克利长大。她父亲把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贡献给了哈佛，当退休后，才开始在伯克利任教。

在简 1931 年到瓦萨学院上学之前，她的父母同意让她花上一年时间游历欧洲。在瑞士，她和母亲的一个朋友住在一起，这个人是卡尔·荣格的忠实追随者。这个人将简带到以弗洛伊德为核心的一群心理学家的复杂交际圈里。这个荣格学派——侧重于人的集体意识的观点——强烈地吸引了年轻的塔特洛克。等到简离开瑞士时，她已经对心理学非常感兴趣了。

简在瓦萨学习英国文学并且为学院的《文学评论》供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简后来也被称为最早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早期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反对者。一位教授送她一本马克斯·伊斯曼的《穿着制服的艺术家》，希望能将她从崇拜俄国共产主义的思想中解救出来。简向一位朋友说道：“如果我不相信俄国的一切都更好，那我宁愿不活了。”在 1935 年 6 月从瓦萨毕业之前，1933 年至 1934 年间简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医学预科课程。后来一位友人写信给塔特洛克说：“都是社会良知及早年与荣格的交往，促使你当一名医生。”她在伯克利时，总是找时间写些东西，并发表在《西部工人》上，这是共产党在太平洋海岸的机构。作为一名交党费的党员，简通常是一周参加两次共产党的会议。在她遇到罗伯特的前一年，塔特洛克写道：“我发现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共产党员。”她的怒火和激情很容易被她所看到的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所激发，她在《西部工人》上的文章证实了她的不满。因为她了解到下列事件：三个小孩因为在旧金山的大街上买《西部工人》而遭到起诉，以及另一件有关二十五名锯木工人被指控在加利福尼亚的尤里卡制造骚乱的案子。

当然，像许多美国的共产主义者一样，简也是一个很好的理论家。她给罗伯特的信中写道：“我发现要成为一名虔诚的共产党员，必须不分白天黑夜时时刻刻去实践它。”此外，她很渴望成为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学家，而在那时，共产党坚持认为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是势不两立的。思想的分立似乎并不影响塔特洛克，但似乎与她断断续续的对共产党的崇拜有关。

总之，简·塔特洛克是一个很复杂的女人，拥有敏锐的心理观察力并肯定对这个物理学家感兴趣。据她的朋友说，不管从哪个方面讲，她都是值得

罗伯特爱的，并且他们有很多相同之处。

那年秋天，简和奥本海默开始约会后，大家很快明白他们是极其认真的。“所有人都嫉妒她，”简的好朋友伊迪丝后来写道，“我也是奥本海默的仰慕者之一。”他的风度和出类拔萃早已成为传奇：那摇摆的步子，犹太人的脸庞，蓝色的眼睛以及乱糟糟爱因斯坦式的发型很是吸引人。要知道他出现在宴会上时，这些人都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而他总是关注别人不在乎的东西，并且时常还说着“是……是……是……”。当他陷入沉思时，他不停地来回踱步以致身边年轻的物理学信徒也学着他那摇摆不定的步子，还时常说着“是……是……是……”。

简·塔特洛克非常清楚奥本海默的古怪行为，也许她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她并没有强迫自己与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男人生活。她对一个朋友讲道：“你必须记住他 7 岁就开始从教训中认识社会，他没有童年，所以他和我们其他人不同。”像奥本海默一样，她明显是个喜欢自省的人。

在遇到塔特洛克之前，奥本海默的学生注意到他和很多女人有过来往。“最起码有半打，”塞培尔回忆说，“但和塔特洛克就不一样了。奥本海默只让她和他待在一起，而很少让她接触到他物理系的朋友圈子。”他的朋友们只是在沃什博恩家的聚会上偶尔看到他们两个。塞培尔说：“塔特洛克非常美丽，能适应各种社交场合。她的政治观点比我们都倾向左翼。虽然她是一个聪明的姑娘，但我能看出她有阴暗的一面。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狂躁抑郁症患者，但是她有时会有抑郁症的征兆。当简失落时，奥本也会感到失落。他和简之间有矛盾。”

这样的关系没有超过三年。他们的一个朋友后来说：“简是罗伯特的真爱，他深爱着她。也许是简的激进思想和社会良知和罗伯特在道德文化学校学到的社会责任相契合，奥本海默开始成为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

1954 年奥本海默面对质询时说：“从 1936 年末开始，我的兴趣开始改变……我对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政策淤积着持久的愤怒。那里有我的亲戚（姑妈和几个兄弟姐妹）。我随后把他们解救到美国。我看到了大萧条对我的学生的严重影响。他们经常找不着合适的工作。我开始明白政治和经济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我开始感觉有必要更积极地投入到社会工作中去。”

大萧条使很多美国人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政治观念。加州更是如此。1930 年加州四分之三的选民都是共和党人。而八年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

持者之比已经变成了二比一了。

尽管加州的左翼政治已经成为了主流，但是加州共产党还是一个小党，即使在加州大学的校园也是如此。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坐落的阿拉米达县，只有五六百名共产党员，其中还有奥克兰造船厂的一百名码头工人。共产党是全国政治中的一股力量。共产党员从1936年的六千人增长到了1938年的七万五千人。但是大多成员都是入党不满一年的人员。在整个30年代，大约有二十五万美国人曾在短期内加入过美国共产党。

对于很多倡导支持罗斯福新政的民主党人来说，和一些参加过美国共产党及其主办的一些文化和教育活动的人接触并不是见不得光的事。的确，在一些圈子里，人民阵线——一个由共产党资助的组织，成员主要是一些同情和帮助工人的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声望。大批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入党，但绝对愿意参加一个由共产党资助的作家研讨会，或志愿在人民教育中心教授工人知识。所以这并不奇怪，像奥本海默这样年轻的伯克利分校的学者，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体验着大萧条时期加利福尼亚的教育和政治生活。“我喜欢这种新型的友谊，”他后来证实道，“在那时我感觉到自己变成了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一部分。”

这就是塔特洛克为罗伯特打开的政治世界的大门，她的朋友变成了他的朋友。这些包括共产党员肯尼思·梅（伯克利的一名毕业生）、约翰·皮特曼（《人民世界》的记者）、奥布里·格罗斯曼（一名律师）、鲁迪·兰伯特和伊迪丝·阿恩斯坦。汉娜·彼得斯是塔特洛克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她是一名在德国出生的博士，她和塔特洛克是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认识的。汉娜不久就成为了奥本海默的医生，并和一个从纳粹德国逃出来的难民伯纳德·彼得斯结了婚。

伯纳德1910年出生在波森，在慕尼黑学习电路工程设计直到希特勒1933年掌权。尽管他后来否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确实作为一名观众参加了几次共产党集会。他还参加了一次反纳粹游行，为此还受了伤。不久，他被捕并关押在达豪集中营——一个早期纳粹集中营。经过三个月的审查，他被转移到慕尼黑监狱，然后，没有任何解释就被释放了（另一个版本是伯纳德成功地逃出监狱）。之后，伯纳德骑着自行车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穿过德国南部，并且越过阿尔卑斯山最终到达意大利。在那里，他碰到了出生在柏林的女友汉娜·莉莲，当时她正到帕多瓦学习医学。1934年4月，伯纳德和汉娜·莉莲移民到了美国，1934年11月20日他们在纽约登记结婚。当汉

娜1937年在纽约长岛医学院获得了医学学位后,他们搬到了旧金山湾地区。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学习期间,汉娜和托马斯·阿迪斯博士一起从事研究工作,托马斯·阿迪斯是简·塔特洛克的朋友和顾问。奥本海默通过简认识了彼得斯夫妇,那时伯纳德还是一名码头工人。

在1934年,伯纳德写了一篇三千字的文章,描述了自己在监狱所遭遇到的恐怖。他极其详细地描述了随意处决犯人的现象。他写道:"一名犯人受到严刑拷打没有几小时就死在我的手里。犯人背上的皮肤全部脱落,肌肉一块一块地掉下来。"毫无疑问,伯纳德一到西海岸就给他的朋友们详尽讲述了纳粹的暴行。不管奥本海默是读了伯纳德关于监狱里的文章还是仅仅听到他谈到这个事,他一定被这些故事深深地震动了。

当伯纳德表现出对物理感兴趣时,奥本海默鼓励他在伯克利学习一门课程。他证明自己是一名有天赋的学生,尽管他没有毕业证。罗伯特想办法让他成功旁听了伯克利的研究生课程。伯纳德不久就成为了奥本海默在量子力学课上指派的记录员,并且在奥本海默的指导下写论文。因此,奥本海默与简频繁地和汉娜、伯纳德出入社交活动,也就不奇怪了。虽然这对夫妇一直声称自己从未参加过共产党,但他们的政治倾向无疑是左翼的。

所有这些新朋友无疑将奥本海默推入到政治活动中。但是,单方面地认为塔特洛克以及她的交际圈为他的政治觉醒负责是不对的。在1935年的某个时候,奥本海默的父亲借给他一本名为《苏联共产主义,一个新文明?》的书,这是一本充满美好地描述苏联的书,由著名的英国社会主义者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布所著。奥本海默对书中所描述的苏联试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6年夏,据说奥本海默在去纽约的三天火车行程中带着全部三卷德语版《资本论》。就像他的朋友说的那样,等他到达纽约时,他已经一页一页地读完了全部三卷。事实上,他对马克思的兴趣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大概是1932年春,他的朋友哈罗德·彻尼斯记得奥本海默在纽约拜访他时,就说自己已经读完了《资本论》。彻尼斯只是笑,他并不认为奥本海默会成为一名政客,但他知道他的朋友兴趣广泛。"我猜想在某个地方某个人对他说,'你不知道这个吗?你没读过呀?'于是,他就找到这本令他极不愉快的书并看完了它。"

哈康·希瓦利埃是由于奥本海默的名声才知道他的。在1937年7月,希瓦利埃在他的日记里写了一些关于奥本海默买了列宁的全部著作并读完它

们的评论。希瓦利埃为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评论道,这将使奥本海默"比其他党员更有读书的能力"。尽管希瓦利埃认为自己是一名相对老练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从未完整读过《资本论》。

哈康·希瓦利埃1901年出生在新泽西的雷克伍德,他常常被误认为是一位侨民。他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出生在挪威。就像他的朋友们称呼他的那样,"霍克"在巴黎和奥斯陆度过了他的部分童年。结果,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挪威语。随后,他父母在1913年将他带到了美国。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完成了高中学业,然后在斯坦福和伯克利学习过。但他在1920年中断大学学业成为了一名海员,花了十一个月在旧金山和开普敦之间航行。在这次冒险之后,希瓦利埃返回伯克利并在1929年获得拉丁语的博士学位,专注于法国文学。

霍克,六英尺一英寸高,拥有蓝眼睛和卷曲棕色的头发,是一位穿着时髦的年轻人。在1922年,他和鲁思·博斯利结婚——但由于外遇与她在1930年离异。一年之后,他与芭芭拉结了婚。当时芭芭拉24岁,是他在伯克利的一个学生。这位金发碧眼的女孩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在旧金山北部二十英里的斯汀森海滩拥有一幢海边的极其漂亮的红木房子。"他是一位极其有魅力的老师,"他们的女儿苏珊·希瓦利埃后来说,"这促使母亲爱上了他。"

在1932年,希瓦利埃出版了第一本书——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传记。在同一年,他开始为左翼杂志《新共和》与《国家》写书评和散文。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已经成为伯克利校园里的一名大人物。他教法语,并经常和学生、艺术家、政治活动家,以及像埃德蒙·威尔逊、莉莲·海尔曼和林肯·斯蒂芬斯这样的作家,在他的位于奥克兰查博特路的漂亮红木屋里聚会。由于聚会活动会持续到深夜,希瓦利埃经常在上午课迟到,因此系里最后不得不停止他在上午教学。

希瓦利埃是一个充满抱负的知识分子,他在政治上也非常活跃。他参加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教师工会、行业间协会和消费者联盟等组织。他成为了卡罗琳·德克尔的朋友和支持者。卡罗琳是一个农业工人组织的领导人,这个种族联盟代表墨西哥裔的美国农场工人。

在1933年,希瓦利埃访问了法国。在那里,他成功地见到了如安德烈·纪德、安德烈·马尔罗和亨利·巴比塞等左翼文学作家。他回到加利福尼亚后,确信自己的命运"将见证一个追求利润和剥削人的社会,向基于使用而生产和人类合作的社会转变"。到1934年,他已经翻译出安德烈·马尔罗广受

欢迎的关于1927年中国崛起的小说《人类的命运》和他自己的作品《蔑视时间》——这部小说是希瓦利埃基于他的"人类新构想"由感而发的。

像大多数左翼人士一样,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对希瓦利埃是一个转折点。在1936年7月,西班牙军队中的部分右翼分子起义反对马德里经过民主选举的左翼政府。由佛朗哥将军领头的法西斯分子发起了叛乱,企图在几星期内彻底推翻共和政体,但是广泛的反抗是顽强的。一场残酷的内战爆发了。

当奥本海默遇到希瓦利埃时,他已经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还很可能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很受人尊敬,尽管他只是旧金山共产党官员的非正式顾问。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只是远远地见过奥本海默,在教授俱乐部和校园里的其他地方也碰过面。但是,他已经通过伯克利的小道消息听到,这位年轻有为的物理学家正在"焦虑地很想做些事而不是仅仅读到这些困扰世界的问题"。

希瓦利埃和奥本海默最终在一个教师工会的早会上被正式引见相识。希瓦利埃后来确认说,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发生在1937年秋。但如果就像后来他们说的那样在工会上见的面,这就将他们见面的时间向前推到两年前,即1935年秋,当地区教师工会——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个分支——扩大到允许大学教授加入的时候。"一群学院的人谈论过这件事,"奥本海默后来证实道,"见了面,并在教授俱乐部或其他什么地方吃了午饭,然后决定开始工作。"奥本海默被选举为记录秘书,希瓦利埃后来被选为当地的主席。在几个月里,地区教师工会拥有一百名成员,其中四十名是大学里的教授或助教。

奥本海默和希瓦利埃都不记得初次见面的场景了,只记得他们相见恨晚。希瓦利埃回忆道:"有一种错觉——好像我以前就认识他。"他被奥本海默自然简约的知识和魅力所折服。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据希瓦利埃说,他们同意建立一个由六到十个人组成的一到四个星期定期讨论政治的封闭小组。这些沙龙在1937年秋到1942年秋定期召开。在这些岁月里,希瓦利埃将奥本海默看作"自己最亲密、最可靠的朋友"。希瓦利埃很快学会叫这个新朋友的昵称"奥本",而奥本海默则经常拜访希瓦利埃的家并在那里吃晚饭。他们还会时不时地去看场电影或听场音乐会。希瓦利埃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喝酒对他来说是一个具有特定仪式的社会功能。"奥本海默能"调配世界上最好的马提尼酒"。他经常喝酒并能说一些颇具特点的祝酒词,比如"为我们的敌人的困惑干杯",对希瓦利埃来说,他很清楚谁是他们的敌人。

对简·塔特洛克来说,重要的是这项事业而非共产党或它的意识形态。奥本海默后来谈道:"她告诉我有关她共产党身份的事,这些都是小事。我认为她的兴趣真的是政治。她是一个有很深宗教情感的人。她爱这个国家、这里的人民和这里的生活。"到了1936年秋,最能吸引她的唯一事业是西班牙共和国的艰苦环境。

正是塔特洛克充满激情的本性促使奥本海默从理论走向了实践。有一天,他自己评论说,当他还处于弱势时,他不得不满足于处在政治斗争的外围;而简反驳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满足于任何事情。"她和奥本海默不久就开始为各种各样的西班牙救助团体组织资助的人。在1937年到1938年的冬天,简将奥本海默介绍给了西班牙难民营的主席托马斯·阿迪斯博士。阿迪斯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受人敬佩的教授,他曾经鼓励过在斯坦福医学院读书的塔特洛克。阿迪斯既是她的朋友又是她的导师。阿迪斯碰巧也是希瓦利埃和鲍林(奥本海默的同事)的朋友。总之,阿迪斯很快就成为奥本海默的"一位好朋友"。

托马斯·阿迪斯是一位极其文雅的苏格兰人。他1881年出生在爱丁堡,在一个要求极其严格的加尔文教派的家庭中长大。他在1905年获得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学位后,在柏林以一名卡内基学者的身份在柏林和海德堡做博士后研究。他是第一位阐述血浆能用来治疗血友病的研究者。1911年他成为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医科主任。在斯坦福时,他开始了自己作为一名临床医学科学家的辉煌生涯,并成为一名肾病治疗的开拓者。他写了有关肾炎的两本书以及一百三十多篇论文,成为美国一流的肾病专家。他在1944年被选举为著名的国家科学院院士。正当他在医学界小有声望时,他还在政治上表现得很活跃。在加利福尼亚,他成为了一个大家熟知的为黑人、犹太人和工会成员争取公民权利的支持者,同时他也是工会成员。在很多请愿书上签了名并借自己的名字为民间组织提高影响力。

1935年,阿迪斯参加了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国际生理学会会议,并带着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在公共医学方面的巨大进步的信息从苏联访问回来。此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推动国民健康保险,最后导致了他被美国医学学会开除。但他在斯坦福的同事认为,他对苏联体制的崇拜是一种信仰的行为,这只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的一个缺点而已。鲍林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那种少有的科学家和临床医生的结合体"。其他人都叫他天才。"他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人,看起来很明智和有理性,"他的同事霍勒斯·格雷博士回忆道,"他是

一位勇于探索的发现者,具有开放的学术思想,一个不具反叛性的不循规蹈矩的人。"

到了20世纪30年代晚期,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说,阿迪斯是共产党员重点吸纳的教授之一。奥本海默后来认为,阿迪斯即使不是党员但也是很接近党员性质的那种人。在这些年里,阿迪斯相继担任了美国援助西班牙委员会的副主席和主席职务,这就给他提供了接触奥本海默的最佳途径,并接受奥本海默提供的经济援助。在1940年,阿迪斯声称,他的委员会在救助包括欧洲犹太人在内的从法国集中营出来的成千上万的难民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许出于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同情,奥本海默发现自己已经被阿迪斯那种实用主义的承诺和知识分子的严格所深深折服。阿迪斯是一个像他自己一样的有广泛兴趣的知识分子,其知识面涉及诗歌、音乐、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只要谈及他的工作……这些分支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有一天,阿迪斯给奥本海默打电话,邀请奥本海默到他的斯坦福的实验室去。他们是秘密会面的。阿迪斯告诉他:"你通过这些救济组织给西班牙共和事业捐钱。如果你想它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就让这些钱通过共产党的渠道,这样它们才能真的得到很好的利用。"此后,奥本海默定期以个人名义分些钱给他,通常在阿迪斯的实验室或家里。"他对这很清楚,"奥本海默后来说,"这些钱直接用到真正的实处。"但是一段时间以后,阿迪斯建议如果将这些定期捐款直接给伊萨克·弗克福将更便捷。伊萨克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旧金山共产党员。奥本海默认为,以现金形式捐款用于军事装备好像不合法。他每年通过共产党捐献给西班牙救助工作的钱大概有一千美金——这在20世纪30年代可算是一笔巨额的捐款。但是随着1939年法西斯的胜利,阿迪斯和伊萨克以其他理由组织捐款,如为在加利福尼亚的移民农场工人。罗伯特最后一次捐款是在1942年4月。伊萨克以前是一名制衣工人,在17岁时,他的一只手就瘫痪了。在遇到了奥本海默时,他是共产党在海湾区的财政委员会的负责人。"他是一位受人尊敬、大家熟知的左翼人士。"史蒂夫·纳尔逊回忆道。纳尔逊是亚伯拉罕林肯旅的政治委员,后来在1940年成为旧金山地区的党主席。纳尔逊证实,伊萨克从奥本海默兄弟那里筹钱。

当1954年奥本海默被问及这些给共产党的捐款时,他解释道:"我怀疑我的这些钱被用于某些其他目的,可能这些目的是不好的。那时我不认为共产党人是危险的,他们宣扬的一些目标很吸引我。"

在1938年的早些时候,奥本海默订阅了《人民世界》。这是共产党在西

海岸新发行的报纸。他经常读上面的文章，后来他解释说，对上面陈述事件的方式很感兴趣。在 1938 年 1 月末，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人民世界》上。当时报道说，奥本海默、希瓦利埃和其他几位伯克利教授筹集到一千五百美元买了一辆救护车通过海运送给了西班牙共和国。

那年春天，罗伯特和一百九十七名西海岸的其他大学教师签了一份请愿书，请求罗斯福总统解除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武器禁运。在 1939 年 1 月，罗伯特被任命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加利福尼亚分会的执行委员。在 1940 年，他成为了“中国人民的朋友”的资助人，并成为了民主与知识自由美国委员会的全国执委会的成员，这个机构公开了德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困境。除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所有这些机构在 1942 年和 1944 年都被贴上“共产主义前线机构”的标签。奥本海默表现得很活跃。“对全体教师来说，这是个充满焦虑的时刻，”希瓦利埃回忆说，“我们其中的一些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左翼思想，这些人都非常担心被上级鄙视。”在例行的教师委员会会议上，保守派“总是获胜”。大多数伯克利教师拒绝与这个联盟有任何关联。简·塔特洛克的心理学教授爱德华·托尔曼和奥本海默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朋友理查德·托尔曼兄弟则是例外。在接下来的四年里，罗伯特尽力发展这个联盟的成员。据希瓦利埃的讲述，罗伯特很少缺席会议而且总是干一些枯燥的事情。希瓦利埃回忆说，有一次他和罗伯特为填写寄往几百个成员的信封熬夜到凌晨两点。

有些人感觉到，奥本海默的政治倾向总是被私人感情所驱使。“不管怎样，他对自己的天赋、继承的财产以及与别人产生的隔阂总是有一种罪恶感。”伊迪丝回忆说。伊迪丝是塔特洛克的一个朋友，并且是一名共产党员。30 年代早期，当奥本海默在政治上并不活跃时，就已经非常在意在德国发生的一切。他经常很生气地谈到他德国亲戚的困境。在 1937 年秋，罗伯特的姑妈和她的儿子阿尔弗雷德·斯特恩及他的家人，以纳粹德国难民的身份到达了纽约。罗伯特在法律上资助他们并承担他们的花费，不久他说服他们在伯克利定居。罗伯特对斯特恩一家的慷慨并不是一时兴起，他总是认为他们是一家人。几十年后，在他的姑妈去世后，她的儿子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写道：“只要她能想到和感觉到，她就总是想着要报答你。”

那年秋天，罗伯特认识了另一位欧洲难民齐格弗里德·贝恩菲尔德博士。为了逃脱纳粹的迫害，贝恩菲尔德首先到了伦敦。在 1937 年 9 月，他已经在旧金山定居。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心理学家。她父亲是柏林的一个大艺术馆的主办人，就是他将毕加索这样的艺术家介绍给大众的。当他们到达旧

金山时，贝恩菲尔德一家为了他们的日常花费卖掉了最后一幅绘画，这是他们曾经羡煞旁人的艺术收藏品中唯一剩下来的。贝恩菲尔德博士是一名雄辩的老师和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众多试着将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合二为一的弗洛伊德学派人物之一。贝恩菲尔德年轻时在奥地利政治圈内非常活跃，开始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又是社会主义者。他个子高而瘦削，戴着一顶很有特点的馅饼式帽子。这是一种低矮但是宽檐的毛毡帽，奥本海默对这样的帽子印象非常深刻，不久也喜欢上了这种帽子。

在到达旧金山几星期后，贝恩菲尔德筹划了一个支持基督教大联合的由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组织来定期讨论精神分析。除了奥本海默之外，贝恩菲尔德还邀请了爱德华·托尔曼、欧内斯特·希尔加德、唐纳德·麦克法兰（弗兰克·奥本海默的朋友）、埃里克·埃里克森（安娜·弗洛伊德培养的在德国出生的心理学家）、儿科医生恩斯特·沃尔夫、伯克利的哲学教授斯蒂芬·佩珀以及著名的人类学家罗伯特·洛维成为这个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固定会员。他们在私人住宅会面，一边喝酒抽烟，一边讨论诸如“阉割的恐惧”和“战争心理学”之类的心理分析问题。

当然，奥本海默有着与心理学家冲突的痛苦回忆。毫无疑问，这也是他对这个课题感兴趣的部分原因。他一定对埃里克森的有关年轻成年人“身份形成”问题的著作很感兴趣。埃里克森争辩道，伴有“长期恶性忧虑的”青春期有时表明这个人在摆脱自己不满意的性格方面存在困难——寻求完美，但又怕失去个性，一些年轻人感到愤怒而武断地攻击别人。奥本海默在1925年至1926年的行为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这个论断。他将自己完全埋在理论物理学中，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坚定的个性，但伤口依然存在。正如物理学家、科学史学家杰拉德·霍尔顿所评论的，“一些心理上的伤害依然存在，并且是伴随其个性的重要弱点，就像地壳断层会在下次地震中显露出来一样”。

奥本海默是团体中唯一的物理学家。他通常被大家当成是一个对精神分析非常感兴趣的人。在任何情况下，他对精神分析的好奇心与他对物理的兴趣是相当的。回忆起泡利在苏黎世对拉比的抱怨：奥本海默“似乎把物理当副业，而把心理分析当职业”。形而上学的东西依然占据优先地位，所以在1938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里，他总是挤出时间参加贝恩菲尔德的研讨会。这个团体在1942年发起成立了旧金山心理研究所和协会。

奥本海默对心理学的探索常常被他和简·塔特洛克的密切但多变的关

系所鼓励，但简·塔特洛克毕竟是一名受过培训的心理学家。尽管简不是这个研讨会组织的成员，但她知道这些人。塔特洛克的情绪化且内省的性格，使她在无意识中分担了罗伯特的困扰。不仅如此，很显然，奥本海默这位政治活动家选择了在像贝恩菲尔德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家的指导下来研究心理分析学。

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如劳伦斯，对他突然的政治激进行为感到很厌恶。他会同情奥本海默亲戚的遭遇，但是又会想到这是欧洲的事情，和美国没有关系。他分别和奥本海默及弗兰克谈过话，说“你们对物理太在行了，而政治上的事情会成为你们的负担，你们没法搞懂”。有一天，劳伦斯走进放射实验室时，看见奥本海默在黑板上写道：“今晚在布罗德的实验室举办关于西班牙内战的鸡尾酒会，实验室所有的人都被邀请了。”劳伦斯看了看这条信息，就把它擦掉了。

9 | “弗兰克，裁下来，寄出去”

“我们（希瓦利埃和奥本海默）都是又都不是共产党员，随你怎么看。”

——哈康·希瓦利埃

1937年9月20日，朱利叶斯·奥本海默死于心脏病，当时他77岁。罗伯特知道他父亲的健康已经每况愈下，但他的突然去世仍然是一个震人心怀的打击。自从埃拉1931年去世以来的差不多六年时间里，朱利叶斯与他的儿子们渐渐建立起了亲密的、温情脉脉的关系。父亲经常轮流到兄弟俩那里去串门，而且罗伯特的朋友变成他父亲的朋友也是常有的事。

经过近八年的消沉，朱利叶斯的财富稍微有些减少。尽管如此，在他死的时候当他把自己的不动产平均分给罗伯特和弗兰克时，仍然有实实在在的392602美元之多。这份遗产给兄弟俩每人每年平均10000美元的收入作为对他们生活花销的补充。但是，罗伯特一想到这笔财富就爱恨交加，于是他立即写下一张遗嘱把他所有的不动产留给加州大学，并指定款项的用途为研究生奖学金。

奥本海默兄弟俩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十分亲密的。罗伯特同很多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没有哪一个能像他们兄弟之间所缔结的感情那么深厚和持久。1930年到1940年间，通过他们的通信可以看出他们二人之间一种异常强烈的同胞之情，尤其是对于一对年龄相差八岁的兄弟来说。罗伯特的信读起来，与其说是哥哥写给弟弟的，不如说是一个父亲写给儿子的。罗伯特写给弗兰克的信中常常带有一种使人恼怒的高傲态度，很明显是希望弗兰克能以他为榜样。弗兰克耐心地忍受他那个固执己见的哥哥所做的一切，直到几年以后，他才承认：“罗伯特多少有些年少轻狂……我跟哥哥在一起的时间

本不该有那么长。”

他们很相像但又有不同。所有人对弗兰克·奥本海默都有好感，他是一个没有脾气的奥本海默，他被赋予了奥本海默大部分的聪明才智。“弗兰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两兄弟共同的好朋友、物理学家利昂娜·马歇尔·莉比这样说。她把弗兰克称作“德尔塔函数”，那是搞物理研究常用的一种数学方法，其中德尔塔的值被定义为零，而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德尔塔被定义为无限。当人们这样称呼弗兰克的时候，通常是比喻弗兰克拥有无限友善和无限欢乐的蓄积。几年之后，罗伯特自己谈论到弟弟时说：“和我相比，他的为人更好。”

曾经有段时间，罗伯特试图劝说弗兰克不要选择物理学作为他的专业。而当他刚刚13岁时，弗兰克就决心走哥哥的道路了。罗伯特写道：“我认为你不可能对相对论感兴趣，除非你先学一点几何学、力学和电动力学。但如果你想试一试学物理的话，最好从爱丁顿的书开始读……最后还有一句忠告：要确实弄懂为数不多的你最感兴趣的那些东西，要达到使你自己满意的程度，完完全全地、实实在在地弄懂。因为只有这样做，你才能真正领会其中的难度和乐趣，只有这样你才能充分地欣赏诸如相对论和机械生物学这样的东西。我仅是凭我的一点小小的经验谈一谈。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请尽管向我说明，不用有所顾忌。”

当他在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时候，弗兰克想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能力可以像他哥哥一样。和罗伯特一样，他是一个博学的人；与他哥哥不同的是，他热爱音乐，会一样拿手的乐器——笛子。他把笛子玩得相当好。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时候，他经常在一个四重奏小乐队里参与吹奏，但他绝对忠诚于物理学。在那里的第二年，弗兰克与罗伯特在新奥尔良相遇，他们是去参加一年一度的美国物理学会的会议。罗伯特后来在给欧内斯特·劳伦斯的信中写道：“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假期，我认为这段时光无疑培养了弗兰克的物理学天赋。”

但是后来，仅仅几个月之后，罗伯特就警告弗兰克在没有找到其他选择之前先不要把全身心都投在物理学上。罗伯特料想到弗兰克学术探求的积极性会被生物学的一些课程调动起来。罗伯特宣称：“我很确定无疑地告诉你，物理学里有着其他学科不能比拟的美妙之处——严谨、周密、深奥。”他敦促弗兰克继续深造生理学：“遗传学确实包括一些难懂的技术，还有一些复杂的解释性理论……无论如何，求主保佑，好好学习物理，一切都与它相关，这

样你才能理解它,运用它,反复地琢磨它。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以你的所得教授别人,但是不要把物理学研究当成一项职业。为此,你要更多地了解其他学科的知识,当然也包括更丰富的物理学知识。"

弗兰克没有把这位同胞兄弟的劝告放在心上。仅仅三年的时间他就拿到了物理学学士学位。之后,他又花了三年(1933—1935)的时间在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学习物理。他以当年教导他哥哥的物理学家为师,并且结识了他哥哥当年的朋友如保罗·迪拉克和马克斯·博恩。当时,罗伯特对弗兰克所作的决定更多地抱以妥协的态度。"你知道我有多高兴,"他在 1933 年给弗兰克的信中写道,"当我得知你要去剑桥学习时……"但是后来,他又开始变得挂念起他的弟弟来。"我经常会这样,"他在 1934 年初给弗兰克的信中写道,"当我十分想念你的时候,就好比最近这几天吧……我就安慰自己说选择剑桥对你来说是对的,你现在完全徜徉在物理学的海洋里,整日与你热爱的物理学相伴,还有那里精彩的美好生活。"

与罗伯特不同,弗兰克精于实验物理学。他总喜欢在实验室里搞东搞西,把手弄得很脏。他喜欢对实验仪器修修补补,有一次他还为他哥哥专门做了台留声机。就像罗伯特描述的那样,弗兰克有一套办法,"能把那些特殊的且相当复杂的情况简化成为他的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核心公式"。弗兰克在英国学习了两年,之后又在意大利学习了几个月。在意大利,他屈从地学习了令人厌恶的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在法国学习生活之后,弗兰克申请了几个大学来读完他的实验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在为是不是要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作激烈的思想斗争,而这时候罗伯特"帮他做了些工作"。此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突然以奖励他的卓越成就为名答应提供给他一份学费奖学金,这样一来,他便决定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了。

在实验室那段时间,他在罗伯特的一个名叫查尔斯·劳瑞森的老朋友手下工作,他们主要进行 β 射线光谱摄制仪的实验。罗伯特用了两年时间就修完了他的博士学位,而弗兰克不厌气其烦地花了四年才拿到他的那份博士头衔。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因为实验物理学较之理论物理学通常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但即便是这样,弗兰克依然选择了实验物理。这是根据他的性格、思维习惯和爱好所做出的选择,这也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物理学以外的东西。他热爱音乐,吹奏笛子的功底十分深厚,以至于许多朋友包括他的哥哥都说他的演奏是专业水平的。他继承了妈妈的艺术洞察力,他还喜爱绘画并且读了许多诗歌。与他哥哥典型的欧洲式勤逸作风迥异,朋友们都认

为弗兰克的穿着实在是邋遢，行为举止更像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波希米亚艺术家。

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第一个年头，弗兰克遇到了雅姬，她是一个24岁的法裔加拿大女孩，那时在伯克利主修经济学。他们于1936年春天相遇，当时罗伯特带着弗兰克去拜访一位叫维诺娜·尼德尔斯基的朋友，而雅姬碰巧在那人家里做看护小孩的工作。为了生计，她当时靠做女招待来养活自己。她率直而朴素，对矫揉造作嗤之以鼻。“雅姬以自己是工人阶级为荣，”塞培尔说，“她对那些知识分子们来说就像另一个世界的人。”她的志向是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她把自己的头发打理成杂志封面的男孩那样的款式，她也从不屑于什么唇膏或者化妆品一类。罗伯特是绝对不会给他弟弟选择这样一个女孩的。

然而在同一年的夏末，弗兰克向罗伯特透露说他想娶雅姬为妻，罗伯特试着劝他打消这个念头。雅姬跟罗伯特相处得不是很好。雅姬回忆过去时说：“罗伯特总是爱说，‘当然了，你比弗兰克大那么多岁’——其实我也就比弗兰克年长八个月而已——他还总说什么‘弗兰克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充分准备’。”

然而，这一次弗兰克没有听他哥哥的劝告，他与雅姬在1936年9月15日结婚了。“他这样做是一种叛逆，他想求得解放，”罗伯特写道，“从我的监护中求得解放和独立。”罗伯特还接着贬损雅姬，称她是“那个我弟弟娶的女招待”。另一方面，他继续对弗兰克和他的妻子“指指点点”。“在帕萨迪纳、伯克利和佩罗卡连特我们三个人经常是彼此对视，”弗兰克回忆道，“但在我和哥哥之间，我们仍旧分享彼此的想法，拥有共同的朋友和事业。”

雅姬一直是一个政治煽动者。“她能用激情的演说使你疯狂。”雅姬的亲戚回忆道。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本科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后，在洛杉矶她又为一个共产党报社工作了一年。弗兰克对她的政治观点感到十分欣慰。“在上高中的时候，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左翼的东西。”弗兰克回忆道。

同罗伯特一样，弗兰克也是道德文化学校的学生，在那里他们学会了就道德和伦理问题进行辩论。16岁那年，他和学校里的几个朋友一起参加了阿尔·史密斯在1928年的总统竞选活动。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的许多同龄人都投向了左翼民主党。在一次德国旅行期间，他很快认识到了法西斯主义者的危险性：“整个社会好像在蜕变腐化。”他父亲的亲戚告诉他“一些可怕

的东西”在希特勒的德国发生了，而他有志支持任何一个有决心“为此做点什么”的组织。

那年秋天，他一返回加利福尼亚，就深深地被当地农场工人和黑人那可悲可叹的生存状况所触动。经济大萧条给百万民众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1937 年初的一天，雅姬和弗兰克在当地的共产党报纸《人民世界》上看到一份会员申请表。“我把它裁了下来，然后寄了出去，”弗兰克回忆道，“我们太贸然行事了——真的是太贸然行事了。”但是过了好几个月党组织那边才有人回信过来。同其他许多教授一样，有人建议弗兰克用化名入党，于是他给自己起了个化名叫“弗兰克·福尔瑟姆”。“我入党的时候，”他事后声明说，“不知道因为什么，他们让我签上自己的名字，又让我另写了一个名字。我当时不知道原因，直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原因。我认为这很滑稽，我从没用过什么假名，而当时，我感到这事太滑稽可笑了，于是就用了加利福尼亚的一所监狱的名字（福尔瑟姆）。”1937 年他所在的共产党的“注册人数”已有 56385 人。

弗兰克和共产党的联系有着深厚的美国渊源，就像他后来解释的那样：“知识分子们被左翼吸引是因为 30 年代出现的惨状、不公正和恐惧，并在不同程度上被美国人民的抗争所证实……约翰·布朗、苏珊·安东尼、克拉伦斯·达罗、杰克·伦敦，还有像早期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这样的组织。”

最初，共产党指派弗兰克和雅姬去帕萨迪纳的“街区”工作，他们的大多数同志是当地的居民，并且有相当多的人是贫穷的失业黑人。他们的党小组会员人数在十人到三十人之间浮动。这个组织里的人们会谈论很多事情，商讨很多事情，可就是做出实际行动的不多，这一点挫伤了弗兰克的热情。“我们曾尝试使城市的游泳池取消种族隔离，”他说，“他们只允许黑人在星期三的下午和晚上进入，然后星期四一早他们又将游泳池排干。”尽管他们付出了努力，但那个游泳池最终还是处于隔离状态。

又过了一些时日，弗兰克同意试着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组织一个共产党小组。雅姬和弗兰克又吸纳了大约十人左右的新成员，其中包括共事的研究生弗兰克·K. 马利娜和西德尼·魏因鲍姆和钱学森。与帕萨迪纳的街区不同，这个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团体“实际上是一个秘密团体”。弗兰克是其中唯一一个仍然公开其正式身份的成员，而其他成员大多不这样，他们解释说：“那是因为人们害怕会因此丢了工作。”

弗兰克明白,他与共产党组织有牵连这件事触怒了一些人。“我记得有个我父亲的朋友,一个老头子,他曾经说过决不会把他的儿子送到我教书的大学去读书。”斯坦福的物理学家费利克斯·布洛赫曾经尝试着劝他退出共产党,但是弗兰克听不进去。但是他的大多数朋友都不是很在乎这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只是弗兰克生活的一个方面。那时,他正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致力于他的β射线光谱学的研究。如同他的哥哥一样,他当时站在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的前沿,但是他的政见——如果说共产党员的身份并不重要的话——对他来说既是一本打开的书,又是一项课外活动。

弗兰克和雅姬把他们的家作为共产党员每周二晚例行会议的开会地点。据一名“可靠的、秘密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消息人士说,弗兰克一直组织这样的会议直到1941年6月份左右。罗伯特参与过一次。事后就他本人辩解说,那是他唯一一次参与的“可证实的”共产党会议。会议的议题涉及帕萨迪纳市立游泳池的种族隔离问题。罗伯特后来证实,那次会议“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十分乏味的印象”。

同他的哥哥一样,弗兰克在东海湾教师工会、消费者联盟以及加利福尼亚移民农场工人的事业中都很活跃。一天晚上,他在帕萨迪纳当地的一个音乐厅举办了一场个人笛子独奏会,鲁思·托尔曼在一旁为他钢琴伴奏,并一同追忆在西班牙共和国的往事。罗伯特后来曾经以一种轻描淡写的口吻谈起他弟弟的社会主义分子社交圈:你说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可是他却还忙于许多其他的事情。“他是狂热的音乐爱好者,他的许多挚友是跟共产党一点不沾边的人……到了夏天他会去大牧场度假……他可真够可以的,”罗伯特总结道,“当时他可真是一个四处奔波、忙得一刻不得闲的共产党员啊。”

弗兰克加入共产党之后便立刻专程赶回伯克利,在那里他和哥哥一起住,并把这个消息讲给他哥哥听。“我对此失望极了。”罗伯特在1954年曾经这么说,却并未说明为什么对弗兰克走的这一步不满。共产党员的身份,不用说,一定有它的危险性,但1937年在伯克利那些自由主义者中间对此却没有什么不好的评价。“没什么大不了的,”罗伯特说,“要说确实有点傻,是因为加入共产党的人要被定国家重犯的罪名,还要为此背上不忠的骂名。”同时明显的不利是,加利福尼亚那些大学的行政部门对任何与共产党有关的人都有敌意,而弗兰克还意欲在学术生涯中有所建树。更何况,和罗伯特不同,弗兰克没有任何教学任期。如果罗伯特要对弗兰克的决定有什么失望之处,也许就是他年轻的弟弟不明智地做出了这个固执的决定,或是受他那个充满鼓

动性的老婆的影响。

尽管罗伯特自己的政治观念也有所觉醒，但他并没有迫切加入共产党的冲动，也没有觉得加入共产党是什么重要的原则性问题。而另一方面，弗兰克则明显地感觉到一种来自情感上的需要——去完成一个正式的承诺。这两兄弟也许能分享同一种政治本能，但弗兰克的渴望要远比这更强烈。他虽然仍然以他的哥哥罗伯特为榜样，但就他的婚姻、他选择的政治立场这两件事来说，他正试图标榜自己的个性，试着脱离哥哥的保护网。

与他坦率的弟弟相比，罗伯特就像是一个谜。他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他的政治认同感之所在，但是他与共产党的确切关系在当时仍然是朦胧且含糊的。罗伯特在后来形容他的朋友哈康·希瓦利埃是“会客室的化身”。“他与各种各样的政治前线组织有过交往，尤其对左翼作家感兴趣……他总是很自由、很轻松地谈及自己的政治观点。”这样的描述放在奥本海默自己身上应该也是很适合的。

毫无疑问，罗伯特的许多朋友、亲戚、同事都或多或少地与共产党有关联，而罗伯特就身处这些人的包围之中。作为一个拥护罗斯福新政的左翼人士，他向共产党支持的事业赞助数量可观的金钱，但是，他坚称自己从来不是共产党的正式成员。虽然他总是声称自己与共产党的交往是“非常近距离的和充满热情的”，但他说那是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然而事后，他还会继续参与缴纳会费的共产党员组织的时事讨论会。这些由共产党支持的会议，特意吸收像奥本海默这样的独立学者并且有意含糊共产党员正式身份与非正式身份界限的人。然而，没有明确的共产党员的正式身份，让奥本海默有了自己决定与共产党是何种关系的权利。在一段时间内，他大概把自己定性为一个尚未被批准为正式党员的共产主义伙伴。可以肯定的是，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尽量减少了与共产党的来往。非常明确的是，任何将罗伯特·奥本海默定性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企图都是白费工夫——一名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多年后最终意识到在这件事上他是失败的。

实际上，他与共产党的来往是一种自然的社会性的结果，是他的政治认同感和在生活中所处位置的必然产物。作为处于30年代后期的一位身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奥本海默生活在一个政治紧张的环境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他的许多已成为正式共产党员的朋友很容易产生一种印象：奥本海默跟他们是一伙的。罗伯特毕竟希望被周围人喜欢，而且他也确实相信共

产党所认同和捍卫的社会公正的目标。他的朋友能够想到他们想得到什么。毫不奇怪,共产党里的一些人确实已经把他当成是同志了。自然而然地,当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用窃听器监听这帮人谈论奥本海默时,他们会碰巧听到共产党员们谈起奥本海默时就好像他是党组织的一员;而其他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也会窃听和记录下共产党员抱怨奥本海默的超然态度和不可靠性。最重要的是,没有证据证明他曾服从于党组织的纪律。很明显,他对苏联政治制度的极权主义本质表示了疑虑。他公开表示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敬佩,而且拥护新政。虽然他身为众多共产党掌控的人民阵线的成员,但却也是一个坚定的公民自由支持者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著名成员。简而言之,他是一个典型的同情共产党的新政进步论者,在欧洲他拥护共产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在家乡他拥护共产主义对劳工权益的支持。以上种种线索并不能引导我们得出结论,他与共产党一起工作并为他们的目标而努力。

所有这些不确定性很让人找不着头绪,而且人民阵线在那些年里,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有意模糊临时入会和正式成员之间的界限。杰西卡·米特福德在她的关于参与旧金山党组织分支的讽刺传记中写道:"那些天里……党组织可以说是一种奇怪的公开化和秘密化的混合体。"听起来阴谋多多的三五人的"小集团"被替换成了"分支部门"或"社团"——"一种被认为更贴近美国政治传统的命名法"。大概有百十来号人都囊括在这种所谓的"小集团"中,在其中,党组织的一切工作在相当公开而且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着。那里来者不拒,而且里面往往还会混进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他们每周在租来的房间里开例会,而且不怎么留意他们的党费有没有按时交齐。

另一方面,米特福德报告说:"她和她丈夫是最先被派去南岸俱乐部的,它是少数且秘密的分支组织之一,其成员包括了政府公务员、医生、律师,还有其他一些担心公开身份而利益受到危害的人。"

几年以后,哈康·希瓦利埃坚持说奥本海默是其中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但是,当进一步问到他所说的罗伯特参与的那个组织时,希瓦利埃说的却是一个由众多朋友聚集起来的无危害的组织。这个组织更像一种"讨论小组",就像他在1965年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种"讨论小组",而不是米特福德所说的"正式团体"。希瓦利埃对马丁·舍温说:"那是一个仅限于少数人的组织,而且它也算不上正式组织,找不到任何关于它的记录……除了一个人,谁也不知道这个组织。我不知道他是谁,但他在旧金山是名列第一梯队的党

员之一。”这个只有“一个人”知道的“非正式的”组织，最初只有六七个成员——虽然在某一时期有多达十二人参与其中。“我们讨论那些当地发生的事情，然后是州、国家，最后是整个世界。”希瓦利埃回忆道。

这是希瓦利埃对整个事情所作的描述，这段记录保存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美国联邦调查局于1941年3月首次专门为奥本海默设立了一个档案。在前一年的12月份，他的名字很偶然地引起了调查局的注意。美国联邦调查局大约用一年多的时间对一些人的交谈进行窃听，这些人包括共产党加利福尼亚州的书记威廉·施奈德曼以及会计伊萨克·弗克福。窃听行动没有经过任何法院授权，也没有经过司法部长的授权，所以属于非法。但是在1940年12月，一名旧金山的探员无意中听到弗克福说下午三点在希瓦利埃家中举行名为“大男孩”的会议，一名探员被派去记录下与会车辆的车牌照。其中发现了一张被证实是奥本海默的克莱斯勒跑车的牌照。到1941年春，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把奥本海默当成一个“据其他消息来源证明有共产主义政治倾向的”教授。美国联邦调查局记载着他服务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执行委员会——据探员描述那是一个“共产党性质的组织”。于是，一个关于调查奥本海默的档案设立了，这个档案最终达到约七千多页。同月，奥本海默的名字被列入“国家紧急事件调查期间受监禁的对象”名单中。

另一份美国联邦调查局档案引用了代号“T-2”的政府探员的调查报告，声称奥本海默是一个共产党“分支”的成员。在“T-2”的报告中，有一份来源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从一段未经确认的报告中摘录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上记录了共产党各个分支的成员。有些成员的名字和地址被列出，如“码头工人分支”，“海员分支”和“教授分支”。其中九个成员的名字被列在“教授分支”，他们是：海伦·佩尔、托马斯·阿迪斯、罗伯特·奥本海默、哈康·希瓦利埃、亚历山大·考恩、奥布里·格罗斯曼等。奥本海默一定或多或少了解这些人（如佩尔、阿迪斯、希瓦利埃和考恩），而且他也应该至少同样清楚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共产党员，但是这些未注明日期的档案无法证实它的可信程度。

希瓦利埃同马丁进行过长时间而深入的交谈，据他所述，这个所谓的“仅限于少数人的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向共产党交纳党费——除了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单独交他的那份，”希瓦利埃思索道，“因为他交的比他应交的多得多。”或者，就像罗伯特经常强调的那样，他做出了很多贡献却从不交党费。“但是我们其余的人都把钱交给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大家都知道的成员，而且

是公开身份的成员，”希瓦利埃继续说道，“我不该说出来，但我还是告诉你们，他叫菲利浦·莫里森。”另外，据希瓦利埃所述，这个组织不接受任何党组织的指示，仅仅是作为学术组织就国际时事和政治交换一下观点。莫里森当然早就承认他于1938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1939年到1940年加入了共产党。当谈及希瓦利埃的往事时，莫里森语气平平地否认他与奥本海默是同一个小组的。作为一个学生，他指出，他从未被指派与学校教职员为伍。

在1982年，当舍温问到“你反对左派，那么是什么让你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时，希瓦利埃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交党费。”舍温再次追问道：“你接受过共产党的什么指示吗？”希瓦利埃说：“没有。实际上我们不算正式党员。”当时他辩解道，像他和奥本海默这样的人很可能认为他们自己是政治上忠诚但不受党组织章程限制的学者。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按时交纳党费，在由党发起的活动中发言，起草文件和制作小册子为党作宣传。而且，希瓦利埃还解释道：“我们俩都是也都不是。随你怎么看。”为了进一步阐明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希瓦利埃说：“这就好像一层阴影，它确实存在但不可名状，而它的确在起着一定的作用。有时，我们对所发生事情的一些观点都会被传到共产党中央去，而且他们会咨询我们某些事情……显然，同样的事情在美国的其他地区也有发生，即限于少数人的、由教授或其他不愿公开身份的人构成的组织。”

史蒂夫·纳尔逊确认，奥本海默与共产党的模糊关系就像希瓦利埃所描述的那样。他是一位旧金山共产党组织的领导者，与奥本海默在1940年到1943年之间曾是好朋友。纳尔逊在社交场合与奥本海默见面，但这同样也是他的工作——作为大学社区的联络员。“我在社交层面上曾与这些组织有过接触，”纳尔逊在1981年的会见时解释说，“其中包括一些党员和非党员人士，在那里他们自由探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这个组织当时正在探讨关于外国政策问题。”

纳尔逊补充了希瓦利埃对于奥本海默的党员身份模糊不清的描述。“我不知道我是正视还是反驳这个观点，”纳尔逊说，“所以我只能保留原来的说法——他是一个坚定的同情者。我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我们探讨了大量的关于左翼政策的问题……现在，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学校里的共产党员。”这个传说中的秘密党小组的所有成员都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们中的一员留下了一部未发表的回忆录。戈登·格里菲思（1915—2001）于1936年6月在伯克利加入共产党。他1939年夏天一返回牛津就默默地更新了他的成员身份。

但是,因为他的妻子玛丽对共产党不抱幻想,格里菲思只得申请不太引人注目的任务。最终,他被指派的工作是"联络加利福尼亚大学里的教员组织"。格里菲思于1940年秋天接受了这个任务,并且在1942年春天离开了牛津。他在他的回忆录里指出,在数百名伯克利的教员中,只有三人是"教员共产党组织的成员":阿瑟·布罗德、哈康·希瓦利埃——还有奥本海默。

格里菲思的回忆录里加入了少量关于希瓦利埃所描述的他所谓的"少数人的组织"。可以理解的是,格里菲思明确地认为,仅仅是奥本海默参与这些会议的事实就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员。他指出,这个组织定期开会,一个月两次,在希瓦利埃的家或是在奥本海默的家。格里菲思经常独自带着会议的文件去分发,他还向希瓦利埃和布罗德收党费,但是不会向奥本海默收。"我必须理解他,作为一位独立的富人,他通过其他渠道做出对组织的贡献。没有人持有党员卡。如果党费是界定党员身份的唯一标准的话,我不能判定奥本海默是党员,但我敢说,要是没有一些限制,所有这三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

格里菲思回忆道,整个组织事实上并没有太多"自由主义者或民主党做不了的事"。他们互相鼓励,为教师工会和西班牙内战难民联盟那样美好的事业贡献力量。"这里从来没有关于物理学理论喜人进展的讨论,没有什么机密的东西或者其他——除了一些向俄国人输送情报的迹象。总而言之,我们的活动中没有任何危险分子或者叛国行为……"会议主要是致力于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和对此的评述。在这样的讨论会里,奥本海默总是能根据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给出最详尽的和意义深远的阐述。许多人都把他对左翼事业的眷顾描述成一种政治幼稚的结果是荒谬可笑的,因为这样贬低了那些知识分子的人格地位,事实上他们本可以比大多数人更深地理解政治事件的发生进程。

伯克利的共产党负责人肯尼思·梅指派格里菲思加入这个组织。他后来向美国联邦调查局透露,哈康·希瓦利埃和其他伯克利的教授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他认为参与这个组织的人并不是共产党员。

奥本海默曾经的好友肯尼思·梅是伯克利数学系的研究生,1936年加入共产党。他于1937年访问苏联达五周之久,之后的1939年又去了两个星期。他回来时已经深深地着迷于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1940年伯克利当地的选举中,也就是在学校董事会在公立学校操场上为共产党候选人争取举行会议的权利之前,梅进行了一次演讲。当他的演讲在当地新闻界引起广泛关

注后，他的父亲，一个保守派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学家，公开宣布与他脱离父子关系。与此同时，校方也取消了他的研究生助教奖学金。接下来的一年，梅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伯克利城市议会占有一个席位，而当时他还是数学系的一名学生。当遇到奥本海默时，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梅是简·塔特洛克的好朋友，他们两个大概是在1939年的某次教师工会的大会上认识的。

几年之后，在他离开党组织之后，梅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他去过几次奥本海默的家，他们在那里讨论政治问题；还说曾在“非正式的集会上见到过他……那个集会以讨论社会学理论问题为主”。他认为奥本海默不会是党员或是某类受共产党掌控或限制的人，他是一个独立的学者。梅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解释道：“共产党组织似乎不信任这类人，但同时又急于对这一部分人的思想加以影响，使他们的思想更符合共产党的教条，并且从中获得声望和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支持。鉴于以上的原因，我会保持与监视对象如奥本海默或其他专业人士的联系，会跟他们讨论共产主义，还会为他们提供共产党的文献。”

梅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解释说，奥本海默是那种“如果他自己认定共产党有益，就会在任何时候都特别愿意赞同共产党的目标。然而，他不会宽恕那些他不赞同的客观事实”。梅说：“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员，人们都乐意与同自己持有共同见解的人交往。”

美国联邦调查局从来没有搞清楚罗伯特到底是不是一名共产党员的问题——他们只是缺少确凿的证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档案里的大多证据都是不重要的和矛盾的。尽管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少数情报人员声称奥本海默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大多数情报人员还是倾向于认为他只是个同情共产党的人而已。还有些人强烈否认他是共产党员。联邦调查局对人们的猜测都表示怀疑。只有奥本海默自己知道事实的真相，而他总是坚持说自己从来都不是共产党员。

10 | “越来越肯定”

“这是他人生中决定性的一周，他还这样告诉我……
从那个周末开始，他脱离了共产党。”
——维克托·韦斯科普夫

1939年8月24日，苏联发表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声明，声称在早些时候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一周以后，德国和苏联同时侵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本海默在给他的同事、物理学家威利·福勒的信中谈到了他对时局的评述：“我知道查尔斯·劳瑞森会告诉你，我对苏德协议感到失望。除了德国人很可能入侵波兰以外，我从没有对这个骗术的任何后果表示过肯定。”

到30年代后期，奥本海默已经成为一名高级教授，并且有着相当显赫的社会地位。他常就政治问题发表演讲，还签署了民众请愿书，他的名字时常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旧金山成了一个剧烈分化的城市，码头工人罢工运动使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极端分子阵营都得到了巩固。当保守派开始反攻时，奥本海默敏感地预见到了现实的或潜在的影响，以及参加政治活动对他所在大学名誉的影响。实际上，1941年春天他写信给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大学的朋友威利·福勒说：“我没准会没了工作……因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下周要开始调查激进主义分子。糟糕的是，委员会的成员没有一个称得上是绅士，更没有一个人喜欢我。”

“加利福尼亚大学显然是一个目标，”一位名叫马丁·D. 卡曼的研究生说，“而且奥本海默非常突出，因为他畅所欲言，表现得非常活跃。他时常能从一些日常琐事中发现一些值得警醒的东西，或许这会让他注意自己的言行

而变得冷静些。可是,当发生某些事情激起他心中的情绪时……他又会活跃起来。所以说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

在1940年,希瓦利埃仍然认为奥本海默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情,但其他朋友对此有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奥本海默开始醒悟并放弃了苏联。从1938年开始,美国报纸对斯大林发起的"清洗"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数千名所谓的叛国者所引起的国内政治恐怖浪潮进行了定期报道。"我读了那些关于'大清洗'的报道,虽然不是很详细,"罗伯特于1954年写道,"但是我找不到一条观点不是谴责苏联体系的。"他的好友希瓦利埃在1938年4月28日的《工人日报》上高兴地签署了一项声明,称赞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叛国者"的莫斯科审判,而奥本海默从来都不支持斯大林的"清洗"政策。

在1938年夏天,两个曾在苏联逗留过几个月的物理学家——乔治·普拉切克和维克托·韦斯科普夫——在奥本海默新墨西哥州的牧场拜访了他。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们就当时的局势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讨论。"俄国不再是你想象的那样了",他们告诉起初还抱有怀疑的奥本海默。他们还谈论了关于奥地利的一名工程师兼共产党员亚历克斯·韦斯伯格的案子。他突然被逮捕,仅仅是因为他与普拉切克和韦斯科普夫来往。"这绝对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韦斯科普夫说,"我们招呼我们的朋友,可他们却说不认识我们。"韦斯科普夫对他的朋友说:"这简直糟糕得超乎你的想象,那是一片沼泽。"奥本海默的寻根究底表明,他们的讲述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十六年后,也就是1954年,奥本海默向他的质询者解释道:"那些讲述是那么真实可靠、合情合理,给我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而他们介绍的俄国,就算仅仅从它有限的表面来看,也像是一个充斥着大清洗和恐怖的大地,有着滑稽可笑的管理体制和长期遭受煎熬的人民。"

好像没有什么原因,然而为什么关于斯大林虐政的新闻会使奥本海默放弃他的原则,或是结束对美国左翼的政治认同?可以明确的是,就像韦斯科普夫描述的那样,奥本海默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相信共产主义的。奥本海默相信韦斯科普夫的话。奥本海默后来说道:"韦斯科普夫的确对我有相当多的情愫,我发现那是非常令人感动一种感情。"罗伯特知道,韦斯科普夫身为一个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说出这种话决不是因为他反对左派。"我们都深信社会主义是一种促进社会进步的有价值的尝试。"

然而,韦斯科普夫认为,这只是奥本海默第一次动摇信念。"我知道这次谈话对奥本海默有着很深的影响,"他说,"这是他人生中决定性的一周,他还

这样告诉我……从那个周末开始，他脱离了共产党。”

在收到韦斯科普夫和普拉切克的消息后不久，奥本海默表达了他对伊迪丝·阿恩斯坦的关切。简·塔特洛克的老朋友说：“奥本海默说他来找我是因为他知道我的信念不会轻易动摇，而且需要找个人聊聊。”他解释说，从韦斯科普夫那里听说苏联的许多科学家被捕。他说他勉强相信报道，但是他不能反驳。“他很沮丧也很激动，”伊迪丝事后写道，“我想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但是随即我又因为他的轻信而对他感到轻蔑。”

那年秋天，一些朋友发现他不再大谈他的政治观点了，虽然私下他还会召集他的密友讨论政治问题。“奥本海默情绪很好，他还向你传达他的问候，”费利克斯·布洛赫于1938年11月在给拉比的信中说道，“说实话，我不认为你能让他筋疲力尽，但是至少他不会再过分大声地赞扬俄国了，这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

无论他与共产党员交往的情况怎样，奥本海默仍旧崇拜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所推行的新政，他的朋友们都说他是罗斯福的忠实支持者。欧内斯特·劳伦斯回想起在1940年总统大选之前奥本海默曾经极力游说他选择罗斯福之后，奥本海默仍然怀疑他的老朋友的决心。为此，那天晚上他还为罗斯福的第三次连任作了激情的辩护，最终劳伦斯同意为罗斯福投上一票。

奥本海默的政治见解主要是随着悲惨的战争消息而变化的。在1940年春末夏初的时候，法国的失败让奥本海默非常悲痛。那年夏天，汉斯·贝特在西雅图的美国物理学会的会议上遇见了他。贝特对奥本海默的政治忠诚度略有所知。那天晚上，贝特被奥本海默关于巴黎沦陷对纳粹于整个欧洲文明有怎样的威胁那场“美丽的、意味深长的演讲”所打动。贝特记得奥本海默当时这样说：“我们不得不借助西方的价值观抵抗法西斯，而且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我们跟共产党人不能再进行任何交易。”几年之后，贝特告诉物理史学家杰里米·伯恩斯坦说：“他很同情左翼分子，我认为大部分是出于人道主义。“希特勒—斯大林协定”使得大多数认同共产党的人感到困惑。这把他们置于完全远离与德国作战的境地直到纳粹在1941年入侵苏联。但是，奥本海默受到法国陷落的深深影响（入侵苏联的前一年），这件事取代了他脑海里的所有其他事情。”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希瓦利埃原本打算和奥本海默在一个海滩野

餐。当他们听到收音机里传出纳粹入侵了苏联的消息时，希瓦利埃就驱车从海滩赶了回来。当晚，所有的人都彻夜未睡，认真聆听关于战争的最新消息公告，人人都想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希瓦利埃提醒奥本海默说，希特勒已经犯下了一个大错。奥本海默则论证道，随着希特勒转向攻打苏联，"他一举毁灭了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界普遍存在的一个危险的杜撰，那就是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版本的极权主义思想体系"。现在，共产主义会像西方民主主义一般到处受到欢迎，而这是双方的人们早就希望发生的进步。

在日本 1941 年 12 月 7 日袭击珍珠港之后，整个世界陷入了全面战争。"我们在伯克利的小型组织，"希瓦利埃回忆道，"不可避免地反映着国家正在改变的氛围。"希瓦利埃说这个组织"仍然不定期集会"——虽然奥本海默本人由于自己的日程排得很满基本上没怎么参与。"当我们真正聚到一起时，"希瓦利埃写道，"我们所谈及的多是战争的进程和家乡前线所发生的事情。"

希瓦利埃总是坚持说奥本海默是他心中最亲密的朋友，并分享他的左翼政治观点，直到奥本海默 1943 年春离开伯克利时。希瓦利埃说："我们分享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没有任何动摇，他的立场从未减弱，他坚如磐石。"但是希瓦利埃也清楚，奥本海默并不是空谈家。"他不冒进，不限于狭隘的爱国主义，也不机械地固守一个概念。"

希瓦利埃对于奥本海默的描述从本质上展现了一个左翼的、不受共产党纪律约束的学者形象，但是历经数载，当开始用笔记述他和奥本海默的友谊时，希瓦利埃则试着表达其他一些东西。在 1948 年，他发表了一个小说的提纲。小说里的主角是一个有才华的物理学家，主要工作是参与制造原子弹，实际上也是共产党"秘密组织"的领导者。在 1950 年，在迫于找不到出版商的情况下，希瓦利埃暂时把部分手稿搁置在一边。但是在 1954 年，在奥本海默安全听证会之后，他重新开始了写作，并且在 1959 年出版了这部小说，还起了个呆板的名字——《将成为上帝的人》。

这个瘦瘦的长得酷似罗马人的家伙没有大卖，而希瓦利埃对一些评论也不满意。比如《时代》杂志的评论家认为："小说的潜在口吻暗示了一个异教的礼拜者在践踏一个倒塌的神像。"但是希瓦利埃是不会听任事情自然发展的。在 1964 年的夏天，他写信告诉奥本海默，他那部关于他们之间友谊的回忆录快接近尾声了。他解释道："我尝试通过这部小说讲述一个好故事，但是

美国的读者却被真实与虚构的混合所干扰，而且我也渐渐明白，为了留下尽量准确详实的记录，我必须直截了当地讲述这件事……一件重要的事——关于你和我于1938年至1942年间在同一个共产党组织的党员身份的事。实话实说，我应该以端正的态度对待这件事。”希瓦利埃后来还问奥本海默是否介意他把这段故事说出去。两周以后，奥本海默回了一封简短的信：

> 你写信问我会不会介意，实际上我是有一点介意。那些你所说的关于自己的描述让我吃惊，在某个方面，你所说的关于我的话确实都不是真的。我从来就不是共产党员，也从没参与过什么共产党组织。我自己当然知道这些，我想你也是知道的吧。我已经一次又一次地郑重地说过此事。在1950年为了回应当时克劳奇所说的话，我曾经公开发表过讲话。十年前，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我也这么说过。

希瓦利埃有理由认为，奥本海默的拒绝同时意味着警告：如果他宣称奥本海默加入了共产党，他将面临诽谤罪诉讼。于是，在次年出版的名为《奥本海默：友谊的故事》的书中没有任何无证据的断言，代之的是，全书里所有提到所谓的共产党“秘密组织”的地方都被仅仅描述成“研讨会”。

希瓦利埃告诉奥本海默，他被迫写这本书，是因为“历史尽管腼腆，但需要真相作为她的女仆”。但是就这件事而言，“真相”源自每个人的不同理解。所有伯克利的“研讨会”的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吗？显然，希瓦利埃相信他们是，而奥本海默坚信至少他自己不是。他会资助特殊的共产党事业——西班牙共和国、农场工人、民权和消费者保护；他会参加会议，发表自己的主张并且帮助党内知识分子撰写立场性文章。但是，他没有一张党员证，也没有交过党费，完全不受党章的约束。他的朋友或许有理由相信他是一名党员，但是他自己清楚他不是。

约翰·厄尔·海恩斯和哈维·克莱尔——两位美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曾经写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相当于置身于一种坚硬的金属外壳内，与外界一切影响隔绝……”这当然不是在说奥本海默。他当时读马克思，但他也读《薄伽梵歌》、欧内斯特·海明威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那个年代，他这样做完全可以被作为开除出党的依据。简而言之，奥本海默从来没有加入过特定的社团组织，也没有指望要成为其中一员。

在20世纪30年代，罗伯特似乎比后来他所承认的更亲近共产党，但是他

对共产党的亲近程度完全不是他的朋友哈康所认为的那样。最有力的政治事实是，他在1930年自愿献身于美国的社会与经济正义事业，从而实现他接近左翼阵营的理想。

11 | “史蒂夫，我要娶你的朋友做妻子了！”

“她的事业对奥本的事业起着推动作用……”

——罗伯特·塞培尔

到1939年末，奥本海默和简·塔特洛克暴风骤雨般的糟糕关系终于土崩瓦解了。奥本海默很爱简，他愿意抛开彼此的问题把简娶回家。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双方的关系已经是有实无名的夫妻了，但他经常揭简的伤疤。奥本海默经常送小礼物给朋友，简对此很恼火，不想迎合他的坏习惯。“够了，别再送花了好吗？罗伯特。”可是奥本海默并不放在心上，再去简的朋友家时仍带着与往常一样的花束。简愤愤地把这些可怜的花扔到地上，告诉朋友说：“让他滚，就说我不在这！”塞培尔回忆说：“简经常生气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无情地奚落奥本。她告诉奥本自己在和谁约会，她所做的这一切似乎在故意伤害奥本，或许她这样做是因为她知道奥本深深地爱着她吧。”

最后简提出了分手，并坚决拒绝了奥本海默的求婚，从那以后，简在医学院学习了三年。在20世纪30年代，没几个女孩会选择去当医生。简毅然决定做精神科医生着实让她的朋友们吃了一惊，大家觉得简太鲁莽，但他们不否认简一定有她自己的道理。从政治到精神病学，简总是随着自己的性子来，她渴望从行动上帮助别人——做精神科医生很适合简的个性。1941年6月，简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简来到了华盛顿特区圣伊丽莎白精神病医院实习，而后一直在旧金山的一家医院工作。

奥本海默自从和简分手以后，开始和许多年轻漂亮的女孩约会。其中跟他走得最近的是哈康·希瓦利埃的小姨子安·霍夫曼和《旧金山纪事报》的

专栏作家赫伯特的妹妹埃斯特尔。此外，塞培尔还列出了五六个女孩，并说奥本海默伤了其中几个女孩的心。然而，奥本海默和简仍然是亲密的朋友，或者说是不适合一起生活的恋人。每当简告诉奥本海默自己很失落，他就会立刻飞到简的身边帮她走出低谷。

1939 年 8 月，奥本海默去帕萨迪纳参加了由查尔斯·劳瑞森举办的宴会。就在一天下午，经人介绍他结识了一位离了婚的 29 岁女士基蒂·哈里森。塞培尔正好见证了这次相遇，他看出基蒂明显迷上了奥本海默。“我从那天起就爱上了他，但我不想被别人知道。”基蒂后来回忆说。奥本海默后来做的事让所有的朋友都很吃惊，他在旧金山的一次宴会上未经基蒂允许就擅自把她搂在了怀里，那晚基蒂胸前别着一朵淡紫色的花。所有人都对奥本海默的举动相当吃惊，更令人尴尬的是，举办晚会的是当时跟奥本海默打得火热的埃斯特尔·凯恩。希瓦利埃就对此很不满。当大家最后确认奥本海默并不是到处留花香而是真的与基蒂相爱了，他们不得不正视这段恋情。“面对事实吧，至少基蒂能让他收敛点。”一位女士这样说。

基蒂是一个小巧的褐色皮肤的女人。她和简一样吸引人，然而她与简的性格迥异。基蒂在晚会上佩戴胸花并非偶然，她在公寓里种了很多艳丽的花，正好迎合她的乐观天性。对基蒂来说，天空从来都不会有乌云，每天都是艳阳高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基蒂总会豁达地面对并最终战胜它。如果说简是一个爱尔兰公主的话，基蒂就是德国的王室，因为她具有正宗的王室气质。罗伯特·塞培尔说，基蒂继承了母亲的欧式高贵气质，她曾去舅舅那里度暑假——她的舅舅是比利时的国王。基蒂 1910 年 8 月 8 日出生于雷克林豪森，那是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一座小城。父母移民匹兹堡两年后，她来到了美国。父亲是冶金工程师，在一家钢铁公司工作。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基蒂小时候被娇生惯养，无忧无虑地在匹兹堡郊区享受自己的童年。基蒂家势显赫，她曾对朋友谈到她父亲是威斯特伐利亚一个小公国的王子，而母亲和维多利亚女王有亲缘关系。她的祖父是汉诺威王室成员，同时也是汉诺威议会的议员，祖母的祖先从 11 世纪十字军开始东征起便是萨伏依王朝——欧洲最古老的王朝之一——的诸侯。她祖母的家族在萨伏依王朝有许多公国，包括意大利、瑞士和法国，并且拥有日内瓦湖南部的一座重要的城堡。

基蒂的母亲非常漂亮，是那种让男人看一眼就难以忘怀的女人。她曾经被许配给堂兄威廉——后来成为希特勒第三帝国的陆军元帅，1946 年在纽伦

堡审判中被判绞刑。基蒂小时候随妈妈回欧洲探亲时，爸爸曾叮嘱她不要对人谈及自己的高贵血统，但年轻的基蒂免不了偶尔跟朋友提起她的黄金家族。她的朋友们记得，基蒂的德国亲戚的来信上都写着“尊贵的凯瑟琳殿下”。

由于基蒂一家是德国移民，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周围人的仇视。爸爸被当地政府严密监视，小基蒂也受到影响，小朋友们都疏远她。基蒂的母语不是英语而是德语，即使在她成年以后仍能说一口标准又漂亮的德语。进入青春期后，她非常反感妈妈的专横跋扈，母女俩相处得很不融洽。基蒂是个精力充沛且喜欢冒险的女孩，对于上流社会的社交礼仪不屑一顾。朋友们说“她在高中时就是从地狱走出来的野丫头”。

后来基蒂开始了她变化多端又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一开始，基蒂在匹兹堡大学已经注册，可是不到一年，她就离开美国到了欧洲，先后在德国和法国学习，经历了慕尼黑大学、索邦神学院和格勒诺布尔大学。她花时间最多的地方是巴黎的咖啡厅，在那里她被音乐迷得神魂颠倒，因而她学习并不刻苦。1932 年圣诞节刚过，基蒂一时冲动嫁给了这些年轻人中的一个名叫弗兰克·拉姆齐的音乐家。几个月后，基蒂看到了丈夫的日记——丈夫喜欢倒着写日记——发现丈夫是个癔君子而且有同性恋倾向。基蒂带着满心伤痛回到美国，进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生物学。1933 年 12 月 20 日，威斯康星州地方法院判决基蒂离婚，同时压下了证词中有关猥亵淫秽的内容。

十天以后，一位匹兹堡的朋友邀请基蒂参加新年晚会。在晚会上，塞尔玛·贝克和基蒂谈起她曾遇到一个共产党，并问基蒂是否感兴趣见见他。基蒂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情况是，我们一帮朋友中还没有哪个见过活生生的共产党人。”那晚，基蒂见到了乔·达莱，一个 26 岁的小伙子，其父亲是长岛的富商。乔比基蒂大三岁，基蒂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不到半年的光景，基蒂就嫁给了乔，并离开威斯康星来到了俄亥俄州的扬斯顿。

达莱个子很高，有点颓废，一头黑黑的略带卷曲的长发，他看起来似乎无所不能。他出生于 1907 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弹一手美妙的钢琴，还擅长他那套唯物辩证法。达莱的父母都是第一代德裔犹太人移民。在 1923 年进入达特茅斯大学之前，达莱在私立学校读书，那时他的政治观点就很激进，是个好战分子，达莱自己称其为“无产阶级信仰”。1927 年 8 月，意大利裔的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科和巴尔托洛梅奥·万泽蒂被马萨诸塞州处以极刑，这件事对达莱震动极大。为了抹去早年生活优裕的“不光彩”历史，达莱

从社会工作做起，当过矿工、码头装卸工，并于1929年加入共产党。他告诉家人说："你们一定要看看我的所为，我的信仰。我现在很快乐，做我喜欢的事情。"他在芝加哥待了几个月，在那里，进行了一次几千人参加的公开演讲，之后被臭名昭著的城市警察"红班"痛扁了一顿。

到了1932年，达莱已经是俄亥俄州扬斯顿的党组织负责人了，在喧闹的产联运动前线带领钢铁工人加入劳工组织，在与钢铁公司恶徒的激烈对抗中他充满了力量与勇气。有几次，当地警方把他投入了监狱以阻止他在工人集会上演讲。基蒂尽管是他的妻子，却只被允许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前，她在街上叫卖《工人日报》并向钢铁工人们派发传单。"我那时是穿网球鞋的，"她回忆说，"以便在工厂门口发共产党传单遇到警察时能跑得快一些。"

她每周要交十美分的党费。夫妻俩住在一处破旧的公寓里，月租为五美元。讽刺的是，他们靠每个月二十五美元的政府救济金度日。"房子里有一间厨房，"基蒂后来说，"但炉子漏了，根本不能烧东西，我们每天去一家肮脏的小饭店吃饭。"1935年夏天她担任党内的"文学专员"，鼓励会员们去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来读。

基蒂一直坚持到1936年，她告诉乔，她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条件了。乔的全部生命都扑在了党的事业上，而当基蒂不能放弃她的政治信仰时，她们开始争吵。据她们的一个朋友史蒂夫·纳尔逊说，乔对她勉强接受像他一样强烈地忠于党的问题有些固执。在两年半的赤贫生活后，她宣布她们必须分开。"贫困让我越来越消沉。"她回忆道。最终在1936年的6月她逃往伦敦，她的父亲在那里接了一个建造工业用熔炉的任务。她有一段时间没有接到达莱的消息——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她的母亲一直在扣留他的来信。她开始渴望和好，并且很高兴地获悉她的丈夫即将来到欧洲。

早在1937年，达莱就决定自愿加入一个共产党资助的战斗旅在西班牙内战中代表共和国与法西斯分子作战。1937年3月，他和老战友史蒂夫·纳尔逊搭上了"玛丽女王"号漂洋过海。当他们的船驶进法国瑟堡港时，基蒂已经在码头等他们了。她和乔在巴黎共度了一周——纳尔逊也跟着。"我是多余的，"纳尔逊回忆道，"基蒂给我的印象是，她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年轻女子，个子不高，金色头发，非常和善。"她从伦敦带来了许多钱，足够他们三人吃住体面。纳尔逊回想起他在午餐时听着基蒂讲自己是多么想陪伴乔共赴西班牙的战场，嚼着异域的奶酪，啜着法国的葡萄酒。问题是，共产党不让在西班牙的党员携妻同行。"乔会提高嗓门说，"纳尔逊回忆起那次午餐时说，

“这是官僚主义！她能做很多事情，她能开救护车。”基蒂执意要去，但他们所有想改变现实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一周后，达莱被迫与基蒂分开，和纳尔逊启程去西班牙。在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天，基蒂带着达莱和纳尔逊去买保暖的法兰绒衬衫、羊毛手套和羊毛袜。然后她回到了伦敦，等待机会和丈夫重聚。他们经常通信，基蒂养成了每周给他寄张照片的习惯。

达莱最终在4月下旬把自己“私运”到西班牙后，写信给基蒂说：“我爱你，我迫不及待地想到阿尔巴塞特去取你的信。”直到7月，他一直给她写信，他充满希望热情洋溢地描述他的经历：“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国家，这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战争，这是我做过的所有有意义的工作中最有意义的一项，来给法西斯们一次真正血淋淋的痛打。”

基蒂真诚地喜欢她丈夫的朋友，不厌其烦地写信给纳尔逊的妻子玛格丽特——一个她未曾谋面的女子——告诉她他们在巴黎度过的那一周。“我们在一起没几天，可是很开心，”她写道，“我认为他们对面前的艰难旅途没有做好准备，但是他们很有趣。”她讲述了他们参加了一次有三万人参加的宏大会议，抗议西班牙内战中西方坚决中立的立场。“我们听不懂那些演讲，所以最激动人心的是我们坐地铁到那里时，数百名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唱着国际歌，高喊着反法西斯的口号直到他们上车才让地铁继续运行。我们到达格勒纳勒时，每个人都加入进来，整个巴黎好像都在唱国际歌。也许我属于很情绪化的人（尽管我不大相信），但这使我感到我好像突然变得高大起来，眼中充满了泪水，想要大喊出来。”基蒂在信末的署名是“你的同志，基蒂·达莱”。

在西班牙，乔·达莱很快被任命为拥有一千五百人的一个营的政治委员。这个组织里大多数人是加拿大人，那时已吸收了林肯旅的很多美国志愿者。那年夏天，他和他的士兵们开始了战斗训练。

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法西斯从德国和意大利得到了不间断的飞机和炮弹的支援，而且达莱很快就发现，西班牙的左派政党正在被其残酷的、有时是致命的宗派政治一步步地削弱。到那年的秋天，达莱负责监督对逃兵的审判，根据一种说法，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被处决了，由此达莱本人在他的部队里十分不受欢迎。根据1937年10月9日的一条报道：“部分士兵公开表达他们对乔的不满，还有人谈到对他的免职问题……”

五天后，他第一次参加战斗，带领他的营对法西斯占领的城镇丰特斯发起了进攻。他是第一个冲出战壕的人，向敌方前进仅几码就被机枪击中腹股沟，他忍受着巨大的疼痛，试图爬回战壕，但是却被第二波的机枪扫射击中致

死,年仅30岁。基蒂那时仅27岁,回到美国时却已经是一名共产党战斗英雄的遗孀了。美国共产党向她保证乔的牺牲将被后人永远铭记。作为共产党内少数出自名牌大学的党员,乔却成了无产阶级的烈士。在获得基蒂的允许后,共产党将乔给他妻子的信结集成册,于1938年发表在《西班牙的来信》一书中。

基蒂在纳尔逊夫妇纽约的狭小公寓住了几个月,其间她见了乔的一些老朋友。后来基蒂自己告诉政府的调查人员,她曾见过知名共产党员的名单。但她说,她于1936年6月离开扬斯顿时就退了党,并且停交了党费。

随后,在1938年初,她拜访了费城的一个朋友并决定留下来在费城大学春季学期注册学习化学、数学及生物并且最终获得了学位。在那年的春夏之交,一个名叫理查德·哈里森的年轻人走进了她的生活。他是一个拥有一双深邃眼睛的高个子帅小伙,在伦敦的时候是一名药剂师,并且取得了美国的相关认证。合适的年龄和无党派的身份使理查德具有了基蒂最希望伴侣拥有的条件——稳定。基蒂和哈里森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是基蒂做出的又一个冲动的决定。"这场婚姻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注定是失败的,"基蒂回忆道,"这是一场不幸的婚姻。"她在离开哈里森很久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不久,哈里森去了帕萨迪纳,基蒂则留在了费城并取得了艺术学学士学位。两个月后,她同意跟随哈里森去加利福尼亚。

在29岁的时候,基蒂仿佛已经准备去把握自己的命运了,尽管她被这有名无实的婚姻所禁锢,但是她准备开始自己的事业。那年的夏天,她获得了在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研究生的机会。她志在获得博士学位,并且希望能成为一名植物学家。

在1939年的8月,基蒂和哈里森在帕萨迪纳参加了一个聚会,并且结识了奥本海默。在同年秋天,基蒂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始攻读硕士学位。奥本海默那高大的轮廓和他那双纯净的蓝眼睛时常浮现在基蒂的脑海里。在几个月后的另一次见面之后,她们开始约会了。尽管基蒂是个有夫之妇,但是她们的约会却从来不避嫌,经常能看到两个人出双入对。物理学家路易斯·亨佩尔曼博士回忆道:"基蒂是一个十分有魅力的年轻姑娘,她们两个总是在分别的时候给对方一个深情的吻。"

1940的春天,奥本海默作了一个鲁莽的决定,他邀请哈里森和基蒂到佩罗卡连特共度夏天。哈里森后来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他在最后一刻决定不去了,但还是鼓励基蒂答应奥本海默的邀请。奥本海默得知后,便又邀请了

塞培尔和夏洛特来牧场。当塞培尔夫妇开车经过伯克利的时候，奥本海默跟他们说："基蒂是一个人来，你们可以顺便带她来。"基蒂和塞培尔夫妇提前到达了地方，并且在牧场度过了两个月。

在基蒂到达后的第二天，她和罗伯特——她总是坚持叫罗伯特——就骑马去了洛斯皮诺斯。他们总是在那里共度良宵，第二天早上再骑马回去，有几个小时是被佩奇——一个奥本海默在1922年曾深深迷恋过的女人——跟随着的。佩奇还恶作剧般地给基蒂展示她的睡衣，并且解释说："这件睡衣是在洛斯皮诺斯的奥本海默的枕头下找到的。"

在那年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奥本海默打电话给哈里森，告诉他基蒂怀孕了。两个男人达成了共识，哈里森和基蒂离婚，奥本海默则接过了这个接力棒。哈里森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我和奥本海默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我们在性方面的观点都是十分开放的。"

尽管塞培尔是这个激情事件的见证人，但是当他被告知奥本海默要结婚的时候，依然感到十分震惊。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还在猜测这个要成为新娘的人是简还是基蒂。奥本海默夺走了别人的妻子，并且因此遭到了一些朋友的诟骂。

1940年秋天的某个晚上，奥本海默碰巧与纳尔逊同台在伯克利的筹款活动上代表西班牙内战的难民们发表演讲。纳尔逊刚来纽约的时候并不认识奥本海默。作为一位有号召力的演讲者，奥本海默说是西班牙法西斯的胜利直接促使了欧洲大战的爆发，认为纳尔逊他们在西班牙的行动只是一种阻滞行为。

后来，奥本海默主动接近纳尔逊，并且微笑着对他说："我将要和你的一位朋友结婚了。"纳尔逊怎么也猜不到是谁。罗伯特最终揭开了谜底："我的新婚妻子就是基蒂。"

"基蒂·达莱！"纳尔逊喊道。他和基蒂自从纽约分别后就失去了联系。"她已经回到了这里，并且坐在这个大礼堂里。"奥本海默说，并且把基蒂叫了过来。两位老友热情相拥，热泪盈眶。不久，纳尔逊就和奥本海默夫妇一起野餐了。那年秋天的一段时间，基蒂去了内华达州的雷诺，并在1940年11月1日得到了离婚的判决书。当天，罗伯特和基蒂在内华达的弗吉尼亚市结婚了。一个法院的看门人和给他们发结婚证的登记员见证了他们的婚礼。基蒂穿着婚礼盛装，在罗伯特的陪伴下回到了伯克利。

同年的11月底，玛格丽特·纳尔逊打电话告诉基蒂她有女儿了！她们

把女儿取名为乔西，这是为了纪念乔·达莱。基蒂立即邀请纳尔逊夫妇来访，并且让他们住在家里的客房。在接下来的两年，纳尔逊夫妇频繁造访奥本海默家。几年之后，他们的孩子可以一起玩耍了。从一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录音中可以知道，在1941年10月5日奥本海默和纳尔逊见了面，并且给纳尔逊开了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作为对罢工农民的捐助支持。但是他们的关系远远不只是政治上的。当乔西·纳尔逊两岁生日时，奥本海默带着礼物突然造访他们家，这使得纳尔逊的妻子玛格丽特非常吃惊和感动。“奥本所有的美好品质，”玛格丽特说，“都带着人性的光辉。”

尽管有孕在身，基蒂依然坚持着她的生物学习，并且告诉她的朋友说，她依然不会放弃成为一个植物学家的理想。“在回到校园以后，基蒂十分兴奋，”玛格丽特说，“她好像就是学校的一部分。”奥本海默夫妇尽管在科学上有着共同的兴趣，但在性格上却并不相像。“奥本十分温柔而有礼，”一位两个人的共同朋友回忆道，“基蒂则要强，充满进取心，但是性格的相反恰恰促成了美满的婚姻。”

奥本海默的大部分亲戚都被基蒂拒之门外。坦率地说，雅姬总是认为基蒂是一只“母狗”，并且十分憎恨基蒂，觉得她阻隔了奥本海默和老朋友们的交往。“她不愿意和任何人分享奥本的感情，”雅姬回忆道，“基蒂是个阴谋家，如果她想得到什么东西，她就一定要得到。她十分虚伪，她所有的政治信仰都是虚伪的，她所有的思想都是借鉴别人的。坦率地说，她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为数不多的最邪恶的人之一。”基蒂平时说话很刻薄，但不可否认的是，她对奥本海默有着很大的影响。塞培尔回忆说：“她的事业对奥本的事业起着推动作用。”

在他们仓促结婚之后，奥本海默和基蒂在大学的北面租了一个很大的房子。奥本海默卖掉了他的克莱斯勒轿车，又送给基蒂一辆崭新的凯迪拉克轿车，并将其取名为“瞄准器”。基蒂劝她的丈夫要注意自己的穿着，而且奥本海默也开始改变自己，但是他始终保留了他的那顶馅饼似的帽子。“一种压抑的情绪控制了我。”奥本海默对他的婚后生活是这么表述的。基蒂能做一手好菜，所以她们经常邀请一些亲密的朋友来家里做客。她们的酒橱总是满满的，纳尔逊回想起基蒂曾对他说她们家酒的花费比食物的还要多。

在1941年的一天晚上，罗伯特在哈佛和剑桥念书时候的朋友约翰·埃兹尔来拜访他。他们已经有十年没见面了，他发现罗伯特已经有了巨大变

化，那个曾经以谦逊著称的他变得爱发号施令了。埃兹尔回忆道："我感觉他比以前明显强壮了。"那时，罗伯特马上就要当父亲了。他们的孩子在1941年5月12日，也就是奥本海默正在进行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例行的春季讲学计划时出生了。奥本海默夫妇给他取名叫皮特，但是罗伯特却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普伦特"。基蒂告诉她的朋友们说，这个八磅重的孩子是早产的。基蒂的生产对她的身体伤害很大，而且正在这时，奥本海默也患上了单核细胞增多症。直到这年的7月份，他们才都慢慢地恢复过来，并且邀请希瓦利埃夫妇来看望他们。

在希瓦利埃夫妇拜访过几个星期后，有一天奥本海默对他们说，由于基蒂非常需要休息，询问他们是不是能在他和基蒂去佩罗卡连特一个月的时间内帮助照顾一下两岁的小皮特。由于奥本海默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希瓦利埃夫妇答应替他们照顾两个月，让他们可以休息到秋季开学。这次不寻常的安排却给母子关系带来了长远的影响。就是在一年之后，他们的朋友们发现去看小皮特的时候，总是奥本海默领着他。奥本海默为小皮特的优点感到骄傲和兴奋。"基蒂则看起来对这些毫无兴趣。"他们的一位老朋友回忆道。

当奥本海默来到佩罗卡连特的时候，一下子就恢复了生气。在第一周的时候，他和基蒂便开始兴致勃勃地把鹅卵石镶嵌在屋顶。他们在山中恣意骑马驰骋。有一天，基蒂为了显示她的勇气，在马儿慢跑的时候，在马鞍上站了起来。不幸的是，随后奥本海默在把马赶进棚的时候，却被马踩到了，还被送到圣达菲的医院照了X光。但是，无论怎么说，这次旅行都是让人怀念的。

在回来之后，奥本海默接回了小皮特，并且搬到了在苍鹰丘新买的房子里。这栋房子是奥本海默在夏天的时候去看过的。仅仅看了一次，奥本海默就深深喜欢上了它，并且一次性付清了2.25万美元的房款，又花了5300美元购买了这座房子旁边的两块地。这栋房子是一栋坐落在半山腰的白墙红瓦西班牙风格的别墅，三面都是绿色的峡谷，在那里，他们可以很清楚地观赏到金门大桥上的日落。房子的卧室铺有红木地板，顶有十二英尺高，并且三面都有窗户。在壁炉上雕刻着一只愤怒的雄狮。房子的每间卧室都有墙式的书架，每当打开法式的门，花园中的绿色便扑面而来。房子还有设备齐全的厨房和独立的客房。在芭芭拉·希瓦利埃的帮助下，基蒂对这栋房子做了一些内部装饰。每个人都认为这座房子典雅美丽，布局合理。奥本海默则在这里度过了十年的时光。

12 | “我们一直在把新政向左推”

“我已经为西班牙的事业做得够多了，其实世界上还有其他更加紧迫的危机。”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39年1月29日是个星期天，当路易斯·阿尔瓦雷茨这位年轻有为的物理学家正在理发的时候，看到《旧金山纪事报》上的一则消息说，两位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成功地证明了铀原子核能够分裂成两个或更多的部分。他们是通过用中子轰击铀原子核来达到这种裂变的，铀是自然界中最重的元素之一。出于对该发现的震惊，阿尔瓦雷茨理了一半头发便跑回放射实验室去宣布这一消息。当他把这则消息告诉奥本海默的时候，奥本海默的第一句话便是“这是不可能的”，而后走到黑板前，用数学公式推导了一遍，并且说这个反应不可能发生。他认为这是别人所犯的错误。

但是第二天，阿尔瓦雷茨便在实验室里做成了这个实验。“我邀请罗伯特来一起观看这个实验，他在实验成功后的十五分钟之后，不仅认可这个实验是正确的，而且明白了其中的原理，说这个实验可以使更多的原子发生变化，而且能够产生爆炸。他的思维是如此的灵活，这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十分吃惊。”

几天后，奥本海默写信给他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同事福勒时说：“铀的这种反应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首先是在论文上看到的，但其后关于这个的报道越来越多……还有许多地方很令人费解。那些短暂的高能射线会在哪里？铀的分离到底有多少种方式？……”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奥本海默不能抑制他的兴奋之情。他下决心要搞明白其中的奥妙。

巧合的是，就在那一周，21岁的研究生约瑟夫·温伯格找到了莱克特楼

的219房间并扣响了房门。自负而又固执的温伯格曾经被威斯康星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格雷戈里·布赖特指导过半年。他告诉温伯格,伯克利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人们疯狂到可以接受你"的地方之一,并且说奥本海默在《物理评论》上发表的论文是世界上他所不能理解的很少数的论文之一。

"房间里传出了巨大的嘈杂声,"温伯格回忆道,"所以我用很大的力气敲门,过了一会儿,一个人伴着一股浓烟和嘈杂声出来了。"

"你来干什么?"这个人问道。

"我找奥本海默教授。"年轻的温伯格回答道。

"哦,我就是!"奥本海默说道。

温伯格能够清楚地听到在门内激动的人们在大声地争论。

"你来这里干什么?"奥本海默问道。

温伯格解释说他是从威斯康星来的。

"你在那里是做什么的?"奥本海默问道。

"我为格雷戈里·布赖特教授工作。"温伯格回答说。

"你在说谎,"奥本海默咕哝道,"这是你的第一个谎言。"

"什么?"

"你现在在这里,"奥本海默解释道,"你并没有和布赖特一起工作。"

"那样说更准确一些。"温伯格承认道。

"很好,"奥本海默说,"祝贺你!进来加入这个疯狂的群体吧。"

奥本海默把温伯格介绍给了欧内斯特·劳伦斯和奥本海默的几个研究生。温伯格很惊讶于自己能见到这些物理学界的杰出人物。后来温伯格与菲利浦·莫里森和西德尼·M. 丹科夫出去共进午餐。有人拿出一张餐巾纸,开始根据链式反应的观点画出了一张炸弹的草图。温伯格说:"根据这些资料我们设计了一种炸弹。"莫里森做了一些初步的计算,并且得出结论说这不可行,因为链式反应在爆炸之前就失败了。但是不到一周,莫里森回忆起走进奥本海默的办公室看到里面的黑板上画着"一张有关炸弹的极糟糕潦草的草图"。

在来伯克利之前,温伯格就已经是玻尔的忠实信徒了。在玻尔的描述下,量子理论就像是一件有趣的事。当温伯格到达伯克利的时候,他向莫里森说,玻尔的书是他随身携带的很少的书之一。莫里森听后就笑了起来,因为在伯克利奥本海默的那个圈子里,玻尔的书就像是《圣经》一样。温伯格很高兴地发现,在这里"玻尔是上帝,而奥本海默则是他的先知"。

奥本海默从来不在他学生的论文遇到困难时说“自己再去想”。1939 年的一个晚上，温伯格和哈特兰·斯奈德被奥本海默邀请到他在沙斯塔路的家里。因为这两个年轻的研究生在合作写一篇论文，但他们总不能做出好的结论。“他给了我们每人一杯威士忌，”温伯格回忆说，“并且打开了音乐，这样可以使我有事可做。哈特兰·斯奈德则在他的书架前看书，而他只花了半个小时就用打字机给我们写出了一个漂亮的结论。”这篇论文发表在 1940 年的《物理评论》上。

奥本海默在讲座中不可避免地会在黑板上写出一连串的公式，但同其他理论家一样，奥本海默并不是仅看重公式。奥本海默的一个最得意的学生温伯格发现，数学公式就像是攀岩时候的把手，每个把手都能或多或少地指示出下一个把手的位置。温伯格和其他学生都说，听奥本海默讲课，是对思维的一个挑战，他的思维很跳跃，如果只是执著于黑板上的公式，就会茫然不知所措。

奥本海默从来不进行最后的考试，但是他每次都布置很多的作业，他的学生回忆说：“你可以随时向奥本海默提问，他总是很耐心地给你解答，直到你懂了为止。”

温伯格很快就成了奥本海默圈子中的一员。“他知道我崇拜他，”温伯格说，“我们都知道。”菲利浦·莫里森、罗西·洛马尼茨、大卫·博姆和马克斯·弗里德曼也在这些年里把奥本海默视为良师和楷模。按莫里森的话说，这些爱打破传统的年轻人，自诩为“自觉而大胆的知识分子”，并且深以为豪。他们都在研究理论物理学，而且都积极参与一些大胆而前沿的事业。其中的一些人，像菲利浦·莫里森和大卫·博姆都承认加入了共产党，其他人也已经处于边缘地带，其中温伯格很有可能已经加入很长时间了。

莫里森 1915 年生于匹兹堡，成长于离基蒂·奥本海默度过童年的家乡不远的地方。他在一所公立中学毕业后，于 1936 年获得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物理学学士学位。那年秋天，他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奥本海默学习理论物理学。他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大学时还绑着金属支架。作为一个从疾病中康复的孩子，他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病床上，学会了一分钟读五页书的技能。作为一名研究生，莫里森以其渊博的学识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通晓从军事学到物理学几乎所有的学科。1936 年，他加入了共产党，然而他既没有隐瞒他的左翼观点，也没有公开他的党员身份。

“我们当时跟共产主义都很亲近。”博姆回忆说。事实上，直到1940年至1941年的时候，博姆还没有对共产党有多少好感，但当法国战败后，在他看来只有共产主义者才有抵抗纳粹的决心。事实上，许多欧洲人显得更喜欢纳粹而不是俄国人。“而且我感到，”博姆说，“在美国也有这种趋势。我认为纳粹是对文明的巨大威胁……看起来只有俄国人在真正与之战斗。从那时起我就更同情他们的观点了。”

1942年秋天，报纸上充斥着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报道。那年秋天，战争的结果看起来已完全取决于俄国人民所做出的牺牲。温伯格后来说，他和他的朋友们每天都与俄国人民共同承受着苦难。“没有人能体会到我们的感受，”他回忆道，“甚至当我们看到关于苏联国内战争进程的虚假消息时，我们都不屑一顾。”

大卫·霍金斯于1936年来到伯克利学习哲学。他几乎立刻就结识了奥本海默的许多学生。在教师工会的一次会议上，他遇到了奥本海默。他们当时正在讨论助教所得的报酬过低的困境。霍金斯被奥本海默雄辩得体的举止所吸引，他回忆道：“他很有说服力，语言中透着优雅。他能听取别人的观点，并且能将之加入到自己的表述中。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如果有几个人在谈话，他能对这个谈话作一个总结，从而使这几个人发现他们彼此观点一致。这是一种难得的天分。”

几年后，有人问他是否认为奥本海默是共产党员时，霍金斯答道：“我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这并不重要，但可以确定他和左派关系紧密。”他接着说：“我们把左翼当作罗斯福总统新政的一部分，我们一直在把新政向左推，这是我们毕生的任务。”这是对奥本海默和他自己政治目标的一个准确描述。

马丁·卡曼是奥本海默的另一个助手。作为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化学家，他在芝加哥发表了他的有关核物理问题的博士论文。在短短几年内，他和另一位化学家山姆·鲁本用劳伦斯的回旋磁力加速器发现了放射性的同位素碳14。1937年初，他跟女友去了伯克利。在那里，欧内斯特·劳伦斯以一千美元的年薪聘请他到放射实验室工作。“那里很像麦加。”卡曼回忆在伯克利的生活时曾说。奥本海默不久就发现卡曼是一名优秀的音乐家，并且乐于谈论文学和音乐。“他带给我欢乐，”卡曼说，“因为我可以和他谈论物理以外的东西。”他们从1937年开始就经常待在一起，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

和奥本海默的其他朋友一样，卡曼喜欢这位魅力非凡的物理学家。“他很睿智，但有时候有些肤浅，”卡曼说，“他对一些事情涉猎不深。”卡曼有时认为奥本海默的一些古怪行为都是故意而为的。卡曼回忆了一次和奥本海默一起去埃斯特尔·凯恩家参加一个新年晚会。在驾车的路上，奥本海默说他忘了凯恩家的门牌号，他只记得那个数字是 7 的倍数。“我们只好在那条街上来回往返，”卡曼说，“最后终于找到了 3528 号他的家，果然是 7 的倍数。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他是在和我开个小玩笑……他有时会不经意地骗骗你。”

卡曼不是左翼人士，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参加了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鸡尾酒会，并参加各种反法西斯难民委员会和俄国战争救济会的募捐活动。奥本海默甚至还和他试图在放射实验室里建立工会。有一天晚上，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他以前的一个学生赫维·沃格的家里作了一场为工会筹集赞助的演讲，有超过十五个人参加并且认真听了他的演讲。他探究了美国参与战争的可能性。“在他演讲的时候，”沃格回忆道，“每个人都在听。”

1941 年秋天，奥本海默在苍鹰丘的家里举办了一场有关组建工会的会议。劳伦斯听到这个事情后很生气，不仅因为他强烈反对他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参加工会，也因为这件事证明了他的这位老朋友仍在左翼政治问题上浪费宝贵的时间。

劳伦斯很烦恼，那年秋天他试图让奥本海默参与原子弹的研究项目，但没有成功。“如果他能停止做这些无聊的事情，”他向卡曼抱怨道，“我们可以让他继续这个项目，否则军方不会接受他的。”

奥本海默在 1941 年秋天退出了那个工会，但他想要组织放射实验室的科学家们的志向没有泯灭。一年多以后，即 1943 年初，罗西·洛马尼茨、欧文·大卫·福克斯、大卫·博姆、伯纳德·彼得斯以及马克斯·弗里德曼——都是奥本海默的学生——参加了那个工会。

工会很快引起了正在监视放射实验室的军方情报人员的注意。1943 年秋天，美国陆军部警告了放射实验室里的几位“积极的共产主义分子”。约瑟夫·温伯格的名字也在其中。

其实到了 1943 年，奥本海默已很久没有参与工会的组织活动了。他这么做不是因为他改变了政治理想，而是意识到如果不听劳伦斯的建议就无法

继续研究项目的工作。而他认为,这个项目对打败纳粹德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941 年秋天在争论奥本海默组织工会活动的问题时,劳伦斯曾跟奥本海默说,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斥责自己同奥本海默探讨核裂变的一些结论,因为当时奥本海默被排除在核弹研究项目之外。

事实上,奥本海默在 1941 年初就开始同劳伦斯合作,当时劳伦斯已经开始用他的回旋磁力加速器研究的电磁技术分离铀—235,这是制造核武器不可缺少的物质。奥本海默和其他许多国内科学家已经知道,铀委员会早在 1939 年 10 月就被罗斯福总统授权进行核裂变研究。但到 1941 年 6 月,许多物理学家开始担心德国科学界可能在核裂变研究上的成就更大。于是到了秋天,出于担心用于实战的核研究进展缓慢,劳伦斯写信给康普顿并坚持要求让奥本海默参加 1941 年 10 月 21 日在纽约的通用电力实验室举行的秘密会议。"奥本海默有极重要的新观点。"劳伦斯写道。得知奥本海默与激进政治运动联系紧密时,劳伦斯给康普顿又写了张附条:"我对奥本海默抱有极大的信心。"

奥本海默参加了 10 月 21 日在斯克内克塔迪举行的会议。在最后呈交给华盛顿的结论报告上,他的关于有效核武器所需要的铀—235 的必需量是关键的部分之一。他总结道,一百公斤对于爆炸性的链式反应来说足够了。科南特、康普顿、劳伦斯以及其他一百多位科学家参加了会议,他们对奥本海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纳粹进军莫斯科的消息令人气馁,奥本海默也急于为美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做出贡献。他曾羡慕他那些研究雷达的同事。"但直到我开始接触原子能研究工作时,"他后来说道,"我才开始发现能直接发挥我作用的途径。"

一个月以后,奥本海默给劳伦斯写了张便条,向他保证自己的工会活动已经结束。"关于工会问题不会再有什么困难……我没有告诉有关的每一个人,但凡是我告诉过的人都同意我。你现在可以忘了这件事了。"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奥本海默就发现自己已成为中心人物,那正是他想要的。"所有发生的事情,"卡曼说,"只要你去告诉奥本海默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会去思考并给出一个解释。他是官方的解释者。"但从 1941 年开始,奥本海默有理由认为他被排除在圈子外了。"很突然地,"卡曼说道,"没有人再跟他说话,他被排除在外了。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但他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渐渐变得沮丧。劳伦斯对此很担心,因为他觉得,毕竟奥本海默能够

清楚地了解研究的进程。因此正确的安全措施不应该是把他排除在研究项目之外。我猜想最终的情况是,他们认为让他在研究项目内可以更好地监控他。”

1941 年 12 月 6 日星期六的晚上,奥本海默参加了为西班牙内战士兵募款的活动。他后来证实道,当第二天惊闻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他判定:“我已经为西班牙的事业做得够多了,其实世界上还有其他更加紧迫的危机。”

13 | “速爆协调者”

“现在我可以第一个看到奥本海默的巨大智慧力量了。他是我们小组当之无愧的领导者……这智慧的经历真让人难忘。”

——汉斯·贝特

奥本海默被邀请参加关于“铀问题”的会议，其间他表现出来的沉稳和智慧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此他迅速变成了小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谈他的政治情况，他的确算是这个科学小组完美的新成员。他对这个课题的了解很深，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也很强。他对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很感兴趣。在不到十五年的时间里，由于工作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奥本海默由一个笨拙的科学天才转变为成熟而富有魅力的学术领导者。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很快就信服了他，因为他总能很快地解决与制造原子弹有关的问题，总能发挥极大的作用。

早在1939年2月，奥本海默和国内许多物理学家就已经知道制造原子弹是可能的，但要使政府在这上面感兴趣是需要时间的。就在二战爆发（1939年9月1日）的前一个月，利奥·齐拉就曾说服爱因斯坦在自己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上签名。这封信警告总统说：“某种新型的威力极大的炸弹可能会出现。”他指出：“只要这样的一颗炸弹被装载上船，在港口爆炸就可能把我国的高科技园及其周边地区一同摧毁。”

罗斯福总统一接到这封信就建立了以物理学家莱曼·C. 布里格斯为首的“铀委员会”。然而，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却没什么事发生。但是在大西洋彼岸，两个作为难民流浪在英国的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弗里希和鲁道夫·派尔斯认为，说服英国战时政府研制原子弹已经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事情了。1941年春，一个名为“莫德委员会”的英国高级秘密组织推出了一份关于

"铀在炸弹上的应用"的报告。报告说,一种以钚或铀为原料的炸弹可能在两年之内研制出来,这种炸弹很小,用现有的飞机就可以运载。1941 年 6 月,罗斯福政府设立了科研和发展办公室(OSRD),主管军事领域的科技应用。这个办公室由一位名叫万尼瓦尔·布什的工程师领导,万尼瓦尔·布什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和当时在华盛顿特区的卡内基研究所的成员之一。早先,布什报告罗斯福总统说,研制原子弹的可能性还"非常小",但是读完莫德委员会的报告后,布什改变了看法。他在 1941 年 7 月 16 日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尽管成功研制原子弹还困难重重,但有一点很确定,原子弹爆炸能够产生相当于现在的炸弹成千上万倍的威力,它的作用将会是决定性的。"

突然间,事情开始有了进展。布什 7 月的那份便函使得罗斯福设立了一个直接受命于白宫的拥有更大权力的组织来取代布里格斯的铀委员会,代号为"S-1 委员会"。他的成员有:布什、哈佛大学的詹姆斯·科南特、陆军部部长亨利·史汀生、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还有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这些人知道他们在和德国人比赛,这是一场可能决定战争胜负的比赛。科南特担任 S-1 委员会的主席,与布什一起,他现在开始利用政府的巨大资源组织全国的科学家来研制这个炸弹项目。

1942 年 1 月,罗伯特得知他将被任命负责在伯克利的加速中子研究项目时特别高兴,因为这项工作对整个工程至关重要。劳伦斯曾告诉科南特说,对各个方面来说,奥本海默都将是他们的一笔宝贵资产。他能把整个工程的理论部分作深入研究,同时能把详尽的基本常识和项目结合起来,虽说有些地方看起来还有些欠缺……因此,在 5 月,奥本海默被正式任命为 S-1 工程加速中子研究项目的领头人,而且他还有个奇妙的头衔——"速爆协调者"。几乎同时,他开始组织一个高度机密的夏季研讨会,由负责设计原子弹基本结构的高级理论物理学家参加。汉斯·贝特是他邀请人员名单上的第一人。时年 36 岁的贝特出生于德国,1935 年逃离欧洲来到康奈尔大学,在 1937 年成为那里的物理学教授。贝特随后开始研究雷达的军事应用,他认为这项研究比任何有关核物理的研究都实用得多,但他最终还是被说服去参加研讨会了。爱德华·特勒也应邀出席,这位匈牙利出生的物理学家任教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同样受到邀请的还有奥本海默在瑞士的物理学方面的朋友:斯坦福大学的费利克斯·布洛赫和印第安纳大学的埃米尔·科诺平斯基。他还邀请了罗伯特·塞培尔和几个他以前的学生。奥本海默称这群杰出的物理学家小组为他的"杰人帮"。

在奥本被任命为“速爆协调者”后不久,他就邀请塞培尔做他的助手,而早在1942年5月,塞培尔和夏洛特就在苍鹰丘奥本海默家车库上面的房间里安顿下来了。1938年塞培尔搬到了伊利诺伊大学,从那时起他们几乎每周日都要给对方写信。接下来的几个月,塞培尔就一直紧跟在奥本海默的身边,为他做记录,并提供各种帮助。

1942年的那个夏季研讨会在莱克特楼四楼的西北角召开了——就在奥本海默二楼办公室的上面。会议室的两个房间是法式门,可以直接通向阳台。为了安全考虑,整个阳台都被粗电线网给固定住了,只有奥本海默才有专门的钥匙。

几周过后,奥本海默的“杰人帮”开始钦佩这个作为会议的发起者和大会报告人的天赋。爱德华·特勒后来这样写道:“奥本海默展现出一种优雅的、确信无疑而又友好的格调。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获得这种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的。那些认识他的人都感到意外。”贝特也很赞同地说:“他总能迅速抓住问题的所在,只听到一个简单的句子他就能判断出整个的问题。”

他们开始仔细研究和讨论了以前发生的一次人为爆炸:1917年发生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市的一艘满载着炸药的轮船爆炸。在这场悲剧中,相当于五千吨TNT炸药爆炸的威力,将哈利法克斯市中心方圆2.5平方英里都摧毁了,造成了四千人死亡。他们很快估算出任何一次核裂变爆炸都会产生两到三倍于这次爆炸的威力。

奥本海默向他的同事们提出,要注意核裂变装置基本设计的改变,设计必须小巧到可以保证能实现军事上的运输。他们很快就认识到,把一个铀原子核放入直径为八英寸的金属球体中很可能会发生链式反应,因此设计规格需要极其精准的计算。

奥本海默很快认识到,尽管在设计一个加速中子反应装置上已经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但研讨会上计算出的裂变所需物质的实际数量是不明确的。他们只是缺少确切的数据,但是他们已经掌握的数据表明,制造武器所需的裂变物质数量可能是四个月前送给总统的评估量的两倍。这种数据上的不相符暗示了,裂变物质仅靠实验室中少量的提炼是不够的,必须在大型工厂里生产。因此,这种炸弹的成本一定很高。

整个夏天,奥本海默都在起草小组的总结报告。在1942年8月下旬,科南特阅读他的报告时做了题为“炸弹的现状”的笔记。按照奥本海默和同伴的意思,原子装置的爆炸会产生原来计算量一百五十倍的能量,但这同时也

需要六倍于原来估算量的裂变物质。原子弹制造在总体上是可行的,但它需要组织大规模的科技和工业资源。

在夏季研讨会结束前的一天晚上,奥本海默邀请特勒夫妇到他在苍鹰丘的家里吃饭。特勒生动地回忆起奥本海默曾信心十足地说:"只要一颗原子弹就可以把希特勒赶出欧洲。"

到1942年9月,奥本海默作为领导秘密武器实验室最可能的候选人的消息在政府机构已流传开来,而这个实验室的目的就是制造原子弹。布什和科南特也认为奥本海默是最佳人选,因为整个夏天他做的所有事情都增加了他们的自信。但仍有个问题悬而未决:军方对奥本海默依然不信任。

奥本海默意识到这是因为他有许多共产党朋友。"我正在斩断所有与共产党的联系,"他在电话里跟康普顿说,"如果不这样,政府用我时就很为难,我不想有任何事情阻止我为国奉献。"然而在1942年8月,康普顿得知奥本海默被陆军部拒绝了。他的安全文件中有许多可疑之处和与共产党的联系。早在1942年初,奥本海默自己就填过一份安全问卷调查,列举出许多他参加过的组织,其中包括一些被联邦调查局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前线组织。

尽管有这些不便,科南特和布什还是推动陆军部通过对奥本海默以及其他一些有左翼政治背景的科学家的"许可"。9月,他们一同去了波西米亚森林,那里景色宜人,有许多野生的大红杉树,就在这里,奥本海默参加了高密级别的S-1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10月初,布什跟陆军部部长史汀生的执行秘书哈维·邦迪说,即使奥本海默被认定为"左翼分子",他对整项研究的"巨大贡献"也使他应该获得"豁免"而继续工作。

那时,布什和科南特已经着手把军事因素引入研究了。布什把他的资料拿给萨默维尔。萨默维尔是负责军队后勤的高级军官,他对这项研究很熟悉,他告诉布什已经挑选了一个人去负责S-1项目。在1942年9月17日,萨默维尔就在国会听证厅外的走廊里遇到了一个46岁的职业军人——莱斯利·R. 格罗夫斯上校。格罗夫斯是修建新近竣工的五角大楼的陆军工程兵部队中的关键人物。

他希望有一次海外战斗任务,可萨默维尔说:"不可能,你现在必须待在华盛顿。"

"可是我不想待在这里,"格罗夫斯平静地说。

萨默维尔回答他说:"如果你做好了这份工作,它将使你赢得战争。"

"噢,你是说那件事。"格罗夫斯知道S-1,但印象不深。他已经在陆军工

程建设上花了比 S－1 多得多的钱，而后者的预算是一百万美元。萨默维尔命令他接受这个安排，同时他的军衔也将晋升为将军。

格罗夫斯习惯于别人接受他的命令，而奥本海默也有这个“天赋”。然而，这两个人却是对手。格罗夫斯这位身高近 6 英尺、体重 250 多磅的大汉，在生活中开辟出了一条路。他说话生硬，直言不讳，因为他没有时间去揣摩那些微妙的外交辞令。“的确是这样，”奥本海默就曾经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讨厌的人，但也很直率。他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分子，毫不掩饰他对新政的蔑视。”

1942 年 9 月 18 日，格罗夫斯正式接管这个工程，官方的名称是“曼哈顿工程区”，而多数情况下则称其为“曼哈顿工程”。就在那一天，他安排购买了一千二百吨富铀矿石。第二天，他下令征用田纳西州奥克里奇的一块地皮用于铀的提炼。那个月的后几天，他开始对国内所有与铀同位素分离实验有关的实验室进行轮流考察。

奥本海默知道，是格罗夫斯看守着通向曼哈顿工程的入口，于是他展现了他所有的魅力和才华。这是个让人无法抗拒的表演，然而格罗夫斯却被奥本海默“超大的雄心”给镇住了，这一点使得他觉得应该让奥本海默成为他可靠而且也许是温顺的合作者。他也对奥本海默关于实验室的地点应该建在偏僻的乡村地区而不是大城市的建议产生了很大兴趣，因为这正好符合他对于安全的考虑。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就喜欢这个人。“他是一个天才，真正的天才。”格罗夫斯后来告诉记者说。

奥本海默是格罗夫斯在考察中发现的第一位科学家，他认识到要制造原子弹需要找到许多跨学科问题的现实解决方法。奥本海默指出，在普林斯顿有很多小组在从事加速中子裂变反应试验，在芝加哥和伯克利也有，有时他们之间做的工作都是重复的。他们需要被整合在一起，相互协作。这种问题同样也出在格罗夫斯的工程师们身上，因此当奥本海默提出建立一个集中实验室的想法时他们都表示同意。奥本海默提出这一想法的目的，就像他随后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紧紧地把这些化学的、冶金学的以及军械的问题牢牢地抓在一起了，而以前我们却没有这么做”。

会议结束一周后，格罗夫斯要奥本海默飞到芝加哥，在那里他们会乘坐“20 世纪特快”号豪华专列去纽约。他们在火车上继续讨论，那时格罗夫斯脑海里已经决定要奥本海默做那个提议要成立的中心实验室的候选负责人。

“奥本海默要成为负责人的迹象并不明显，”汉斯·贝特这样记录道，“毕

竟他还没有过领导一大批人的经验。"格罗夫斯向人们提及这个主意,却没有人对这一提议表示出兴趣。"没人支持我,大伙都反对,"他后来写道,"那时候整个科学界的领导人都反对。"原因有一点,奥本海默是个理论物理学家,而当前制造原子弹需要的是实验学家和工程师的技能。欧内斯特·劳伦斯特别佩服奥本海默,但是和其他人一样,对于提名奥本海默他还是感到惊奇。奥本海默的另一个好朋友和崇拜者拉比,也觉得他是一个不可能的人选,他是一个很不切实际的家伙。关键在于,他对有关设备一无所知。他散步时常常穿着破旧的鞋,戴顶搞笑的帽子。于是,一位伯克利的科学家这样评价道:"他连经营一个汉堡摊子都不会。"

当格罗夫斯向军事政策委员会提名奥本海默的时候,又一次遭遇到极大的反对。"讨论了这么久,我要每一个成员提名一个更好的人选。但是几周以来的事实表明,我们不会再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人了。"到了 10 月底,奥本海默终于上任了。

在他上任之后,奥本海默开始向科学界的几个关键人物阐述他的新任务。1942 年 10 月 19 日,他跟贝特说:"我写信给你并解释我最近的所作所为。我这段时间到东部是为了给我们以后的工作铺路。这已经定下来了,而我还没有告诉你所有的设想。我们要建一个用于军事的实验室,位置很可能挺偏远,但是我希望它在未来的几个月就可以投入使用。"

到 1942 年秋天,奥本海默在伯克利正和他的学生们研制一种和原子有关的武器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他常谈起他的工作,甚至跟一般的熟人。约翰·麦克特南是劳工关系委员会的一个检察官,也是简的一个朋友,在一次晚宴上跑到奥本海默那里,听到了他说的一些话。"他说得很快,试着解释他在爆炸装置方面的工作。我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下一次我们再见面时,他告诉我他已经不能再随意说那些事了。"心理学系的研究生贝蒂·戈德斯坦 1942 年秋来到学校,并跟奥本海默的很多研究生成为了朋友。大卫·博姆在奥本海默的指导下写博士论文,而自从贝蒂到来后,他们就开始约会了。博姆这个几十年后成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人,开始喜欢上贝蒂,并把她介绍给他的朋友们:洛马尼茨、温伯格和马克斯。他们总是在周末聚在一起,有时就在被弗里丹称为"各种激进学习小组"的地方。

"他们都在一起研究奇妙的工程,而又从不谈起,"弗里丹回忆道,"因为那和战争有关。"到 1942 年底当奥本海默要招募一些他的学生时,一切都很

清楚了，大家都知道要制造一个很大的武器。“我们中的很多人就想，”洛马尼茨说道，“上帝啊！制造这样一种武器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它会把地球炸没的！”一些人把这些想法告诉了奥本海默，他就这样回答：“要是纳粹先制造出来怎么办？”

史蒂夫·纳尔逊——他的职务是伯克利校园内的共产党联络员——也听说了关于制造新武器的流言。当地的一家报纸引用一位议员的话说，这项武器的研究地点在伯克利，流言就这样传开了。洛马尼茨听纳尔逊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我听一些议员谈到某种大型武器在这里研制的事，我要告诉大家，人民的战争不是靠武器来取胜的。”

在记忆中，纳尔逊是这样描述他和奥本海默的学生之间的关系：“我和大学生们在一起工作很负责，指导他们上课和讨论。奥本海默的许多研究生在物理学这一领域都是很积极的。我们的联系大多都是关于他们的问题，他们处在更加纯粹的学术和文化的环境里，他们很友好而且从不自命不凡。”

在1943年初春，联邦调查局在纳尔逊家里安装了一个窃听器。1943年3月30日清晨的几个小时，局内人员窃听到了一个他们认定叫做“乔”的人谈论他们在放射实验室的工作。“乔”一点半到了纳尔逊的家，而且很明显他很焦急，他俩窃窃私语，纳尔逊一开始说他在寻找一个完全信任的同志。乔坚持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开始解释道，部分工程要被搬到一个几百公里外偏僻的地方，高度机密的试验性爆炸要在那里进行。

他们的话题开始转向教授，纳尔逊说道：“他现在很担心，我们让他不舒服。”

乔很同意地说：“教授（录音很明显表明他们说的是奥本海默）要我离开这个工程，因为他有两个担心。首先，我的存在会引起过多的关注；另外，他怕我还传出去一些让他害怕的事。他已经改变了。”

纳尔逊说：“我知道。”

“你无法相信这些改变。”乔说道。

纳尔逊说他总试着让奥本海默“政治上保持先进，但他并不可靠。他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说到这儿，纳尔逊和乔都笑了。

纳尔逊接下来谈论奥本海默：“他希望能在正确的道路上，但我认为他同

朋友们之间的联系又有些疏远了。在这个世界上他现在只拥有一件东西，那就是这个计划，但它使得他跟朋友们隔离起来。”

……

在确认奥本海默不会把这个计划的信息透露给他时，纳尔逊开始把目光放在乔身上，希望引诱他说出一些可能对苏联有利的信息来。

美国联邦调查局用非法手段收集到的二十七页的录音稿记录了乔谨慎而焦虑地谈论计划的细节，即那些可能对美国的这个战时同盟国有用的信息。纳尔逊小声地问这武器多久能被制造出来，乔的猜测是至少一年才能生产出足够一次试验用的材料。“而奥本海默一度认为可能要用一年半的时间，”乔主动地说道，“那么就等材料问题解决了，我不知他是否能做成，但他每天都在做。”在录音稿的这一处，一位不知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是军方情报官员的人写道：“他这样的说话语气表明，奥本海默已经很谨慎地对纳尔逊封锁信息了。”

这份录音稿表明乔在给纳尔逊传递情报，但同时也说明奥本海默已经有了安全保密意识，并且纳尔逊总结说他们已经不再合作了，因为奥本海默已经变得特别谨慎。

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一份这样的录音稿（其中“乔”的身份仍未确认）送到洛杉矶 G－2 陆军情报部的帕什那里。这个人是西海岸第九军情报部的主管，他在看到这个时震惊了。他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追捕共产党。他出生在旧金山，年轻时曾跟父亲——一位俄国东正教主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去了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上台后，帕什加入了反革命军并参加了 1918 年至 1920 年的内战，后来他跟一个俄国贵族结婚后回到美国。在二三十年代，帕什在一所中学做足球教练，而夏天时他又成为匿名的情报军官。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在西海岸协助拘禁日裔美国人，而后被任命为曼哈顿工程的反间谍机构的主管军官。他的追随者说他善于伪装而且有远见，其他人则认为他是一个“俄国疯子”。帕什不仅把苏联看成美国的战时同盟，更把它看成是致命的敌人。

帕什很快认识到乔和纳尔逊的对话稿是间谍行为的证据，他从而确认了对奥本海默的怀疑。第二天他就飞往华盛顿，把录音稿的事告知了格罗夫斯将军。因为窃听是非法的，当局不能把指控强加给纳尔逊和那个神秘的“乔”，但他们可以利用这个信息，追踪纳尔逊在放射实验室内的整个活动和

联系。帕什中校很快就被任命去调查伯克利实验室是否是这次间谍活动的目标。

帕什后来证实,他和同事们已经知道乔把有关工程的技术情报和时间表都给了纳尔逊。一开始,调查就集中在洛马尼茨身上,因为帕什获知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们开始跟踪洛马尼茨,1943 年 6 月的一天,有人监视到他和一些朋友站在伯克利学校的南门外,他们正在把手臂相互搭在同伴的肩上摆姿势照相。这个摄影师总是到校园里为同学们服务。照完相后,洛马尼茨和同学们离开了,这时一个政府人员过来把底片买走了。洛马尼茨朋友们的身份很快就被确认了:约瑟夫·温伯格、大卫·博姆、马克斯·弗里德曼,他们都是奥本海默的学生。从那时起,这些学生就被认定是颠覆分子了。

帕什证实道,他的调查者们"认定这个地方就是那四个人经常聚会的地方",用不到什么"调查技巧和程序"。帕什解释道:"还有个人未被确认,但我们有照片,研究的结果使我们信心十足地确认这个人就是约瑟夫·温伯格。"他还宣布掌握了足够认定温伯格和博姆是共产党的证据。

帕什确信他遇到了一批很狡猾而又善骗的苏维埃人士,他感到应采取一切措施来解决这些嫌疑犯。1943 年 7 月,美国联邦调查局旧金山分局报告说,帕什想要逮捕那四个人,把他们带到海上,用"俄国人的方式"审讯他们。美国联邦调查局指示说,用这种方式搜集到的信息不能用于法庭上,但很明显,帕什不打算审问后对他们进行什么迫害。

尽管这样,帕什还是加紧了对纳尔逊的监听,在窃听他家之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在他的办公室里安装了微型耳麦,而且他们窃听到的对话表明他正在从许多同情苏联卫国战争的年轻物理学家那里搜集有关实验室的情报。

1943 年春天,就在博姆加紧写他的关于质子和氘核碰撞的论文时,他突然被告知这个课题已经被定为机密了。因为他缺乏必要的安全许可,他自己在散射计算上的笔记都被收走了,他本人也被告知不能再进行这项研究。他去求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就写信说他的学生已经具备写这样论文的要求了。在此基础上,博姆在 1943 年 6 月拿到了他在伯克利的博士学位。尽管奥本海默个人请求把博姆调往洛斯阿拉莫斯,但国家安全局官员却直接拒绝给他通行证。尽管博姆被禁止参与曼哈顿工程,但他还是可以作为一名物理学家继续他的工作。洛马尼茨和其他几个人就不这么幸运了。就在欧内斯特·劳伦斯任命他作为实验室和奥克里奇工厂之间的联络人时,洛马尼茨收到了一

份入伍通知。奥本海默和劳伦斯都为他求情,但还是不行。洛马尼茨在美国本土的军营里度过了剩下的战争岁月。

至于约瑟夫·温伯格,则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当没有其他证据表明他和谍报活动有联系时,他也被应招入伍,去了阿拉斯加的陆军基地。

在动身去洛斯阿拉莫斯之前,奥本海默打电话给纳尔逊邀请他的朋友在当地的一家餐馆见面。他们一起在伯克利主街的餐馆吃了午饭。"他看起来很兴奋而没有焦急。"纳尔逊后来写道。喝了一大杯咖啡后,奥本海默告诉他:"我得跟你说再见了……我希望战争结束后再见到你。"他解释说他不能说出他的去处,但这和战争有关。纳尔逊只问他基蒂是否也一起去,然后这两个老朋友就聊起了战争近况。在要分开时,奥本海默抱怨西班牙共和国的忠诚战士就没打算要坚持到底,这太糟糕了,要不然我们早就把佛朗哥和希特勒一同埋葬了。纳尔逊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们俩最后一次见面。无论怎么说,奥本海默跟共产党的联系都是无关紧要的"。

14 | “希瓦利埃事件”

“我跟希瓦利埃说了，他也跟奥本海默说了，
但奥本海默说自己根本不想掺和进来。”
——乔治·埃尔滕顿

一个人的生活会因一件小事而改变。对罗伯特·奥本海默来说，1942 至 1943 年的冬天在他苍鹰丘的家的厨房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其实只是跟朋友的一次谈话。他们所谈的事以及奥本海默对这件事的处理决定了他的后半生。这件事人尽皆知，并使得他像一个经典希腊或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物。这就是“希瓦利埃事件”，那段时间它还抢了电影《罗生门》的风头——这是一部 1951 年黑泽明拍摄的电影，描述了一个每一位参与者都对它持有不同看法的故事。

得知自己很快要离开伯克利后，奥本海默夫妇邀请希瓦利埃夫妇吃饭，他们把哈康和芭芭拉看作最亲密的朋友，所以想和他们单独告别。当希瓦利埃夫妇到达时，奥本海默到厨房去准备一托盘马提尼酒。哈康也跟随奥本海默来到厨房，说起了他跟他们俩共同的熟人乔治·埃尔滕顿的一次谈话。乔治·埃尔滕顿是一名物理学家，出生在英国，从剑桥毕业后在壳牌石油公司任职。

他们每个人具体说的话会随着历史的流逝而消逝，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在当时，没有人认为那是一次重要的谈话，尽管话题是一个令人气愤的提议。希瓦利埃说，埃尔滕顿恳求他问他的朋友奥本海默把科学工作的信息传给一个人，而这个人是埃尔滕顿在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认识的一名外交官。

据所有人的叙述——包括希瓦利埃、埃尔滕顿和奥本海默的叙述——奥

本海默生气地告诉哈康这是在图谋“叛国”，他对埃尔滕顿的计划没有任何兴趣。他没有为埃尔滕顿的提议动心。埃尔滕顿的这个想法在伯克利的左翼圈子里很普遍。他们认为，当美国的苏联盟友在为生存酣战时，在华盛顿的一群反动分子却在蓄意破坏苏联有权获得的协助。

希瓦利埃一直坚持说，他只是提醒奥本海默对埃尔滕顿的提议保持警惕，而不是做中间人。或许，奥本海默接受了朋友跟他说的话作为解释，但这些解释却说明了哈康对苏联境遇的过度关心。他是否应该早点把这件事告诉当局呢？如果他这样做，他的生活就会很不同了。但是同时，在没有告诉他最好的朋友之前他是不应该这样做的。最糟糕的是，他还认为这个朋友是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

马提尼酒喝完了，交谈也结束了，这两人又回到了夫人们那里。

在希瓦利埃的回忆录《友谊的故事》中，他回忆道，他和奥本海默仅仅简要谈论了一下埃尔滕顿的建议，“谈话被打断了，我们交流了一两句就结束了”，因此希瓦利埃“不再想这件事了”。

1954 年，奥本海默在自己的安全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希瓦利埃跟着他进了厨房，说了类似“我最近见了埃尔滕顿”的话，他接着还说埃尔滕顿有“把技术信息传给苏联科学家的方法”。奥本海默接着说：“我想我说了‘那可是通敌’，可我不确定。我肯定是说了话，‘这样做是件可怕的事’。希瓦利埃说了或是表示了完全赞成。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这是一次简单的对话。”

罗伯特死后，基蒂说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她在伦敦拜访弗娜·霍布森（他是奥本海默以前的秘书，也是基蒂的朋友）时说：“希瓦利埃一到家，我就知道有事。”于是，她就有意不留他们单独在一起。最后，希瓦利埃发现他无法把罗伯特叫到一边，就只好在基蒂在场时提起了埃尔滕顿。基蒂说她后来突然发了话：“那可是通敌啊！”根据这一陈述，我们得知奥本海默一心不愿基蒂掺和进去，于是就说这话是他说的，一直坚持他和希瓦利埃单独在厨房谈起埃尔滕顿。另一方面，希瓦利埃也坚持说基蒂没有进过厨房，芭芭拉在关于这件事的回忆中也没有提到基蒂。

几十年过去了，芭芭拉已变成一个幽怨的前妻。她在日记中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哈康跟奥本海默说话时我当然不在，可我知道他要说的事，我也知道哈康百分之一百想知道奥本海默的研究并把它报告给埃尔滕顿。我觉得哈康也相信奥本海默会跟俄国人合作的，我了解是因为在这之前我跟他就这

事吵了一架。"

在芭芭拉写这个时已经是四十年后的事了,她对她的前夫很有看法。她觉得他傻,是"一个目光短浅、思想僵化、坚持习惯的人"。埃尔滕顿到后不久,哈康就告诉她:"俄国人想知道。"她一想起这事就告诫他不要把这事告诉奥本海默,"他一定不会干这么荒谬的事"。她1983年在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位无辜的现代法国文学教师成为俄国人了解奥本海默研究工作的联络人。"

奥本海默对埃尔滕顿的了解,仅仅是他俩都参加了工会组织的会议。埃尔滕顿一次在奥本海默家参加了这个会议,总共算起来,他就见过埃尔滕顿四五次。埃尔滕顿是一个瘦瘦的、带着北欧特征的人,他的妻子多莉是英国人。希瓦利埃第一次见到多莉是在1938年,那时她刚走进在旧金山的美国作家联盟的办公室就主动提出要做文秘工作。

因此,当埃尔滕顿有天打电话说要跟他谈谈时,希瓦利埃就开车去了他在伯克利的家,埃尔滕顿就谈了一下战争以及不明了的战争结局。

彼得·伊万诺夫首先接近了埃尔滕顿。他是旧金山总领事的一个秘书(事实上,彼得是一个情报人员)。伊万诺夫问埃尔滕顿是否知道关于"要搬到山上"的事,他指的是伯克利的实验室。

1946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审问了埃尔滕顿关于希瓦利埃的事,他回忆了他跟伊万诺夫的对话:"我告诉他,我不了解这方面的事,他问我是否认识劳伦斯教授、奥本海默博士和另外一个人——我记不起名字了(埃尔滕顿后来想起了第三个科学家叫路易斯·阿尔瓦雷茨)。埃尔滕顿回答说他只认识奥本海默,但还没有熟到可以谈这事。伊万诺夫向他施压,问是否认识可以接近奥本海默的人。"在这方面我唯一想起的跟我熟识的只有希瓦利埃了。他还问我是否愿意跟希瓦利埃谈一下这事。"

据埃尔滕顿说,希瓦利埃很不情愿地同意了接近奥本海默。埃尔滕顿向希瓦利埃保证,要是奥本海默有有用的信息,伊万诺夫肯定能拿到并安全地传回去。从埃尔滕顿的话中可以看得出,这两个人很清楚他们在考虑什么。埃尔滕顿说:"报酬由伊万诺夫提供,但没有提到给多少,因为我本身不愿意为做此事接受酬劳。"

几天后,希瓦利埃告诉他说:"自己已经见到了奥本海默,但是没有获取信息的机会,奥本海默博士不同意。"1946年埃尔滕顿这样对美国联邦调查局

说。后来伊万诺夫来到埃尔滕顿的家里，他也说奥本海默不愿合作。

关于埃尔滕顿对这件事所作陈述的准确性，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另一组调查那里得到了证实。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询问埃尔滕顿的同时，另一组人也在问希瓦利埃同样的问题。当这两个人交代完后，两组人员把他们的回答通过电话作了对比，想知道两者的回忆是否矛盾，最后发现仅仅有细微的差别。希瓦利埃说他幸好没有向奥本海默提及埃尔滕顿这个名字（尽管他在回忆录中说自己提到了），而且他也没向审问者提及劳伦斯和阿尔瓦雷茨。“我想说以我现有的回忆，除了奥本海默之外我没向任何人打听过放射实验室的事。我也许提及过应该从别的什么人身上获取信息，但我肯定在这点上我没有提到过别的什么建议。”他说，奥本海默已经“毫无商量地拒绝了我的接近”。

换句话说，这两个人都坦白了他们曾谈论过向苏联方面透露科学情报的事，也都承认奥本海默拒绝了这个建议。后来，历史学家怀疑埃尔滕顿是苏联在二战期间招募的间谍。1947 年，当他被询问的内容细节从美国联邦调查局解密后，他逃往了英国，以后就拒绝谈起这件事。埃尔滕顿是苏联间谍吗？当然，没有人对他提议向苏联透露战争研究的事有异议，但是 1942 年和 1943 年对他的研究又表明他更像是一个被误导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正式的苏联间谍人员。

从 1938 年到 1947 年的九年时间里，埃尔滕顿每天都跟他的邻居沃格一起拼车去壳牌公司上班。沃格是一名物理化学家，曾经上过奥本海默的课，也在距离伯克利八英里的爱莫利维尔市工作。1943 年还有其他四个人也和他们拼车——休·哈维，一个走政治中间路线的英国人；李·卡尔顿，一个左翼分子；还有哈罗德·卢克和丹尼尔·卢滕。他们把这个拼车形象地称为“熏青鱼驾车俱乐部”，因为卢滕总是在平时的交谈中提起“熏青鱼”。沃格形象地回忆起他们的谈话：“我记得很清楚，大家都知道放射实验室里的事，到那里去的人有很多机密的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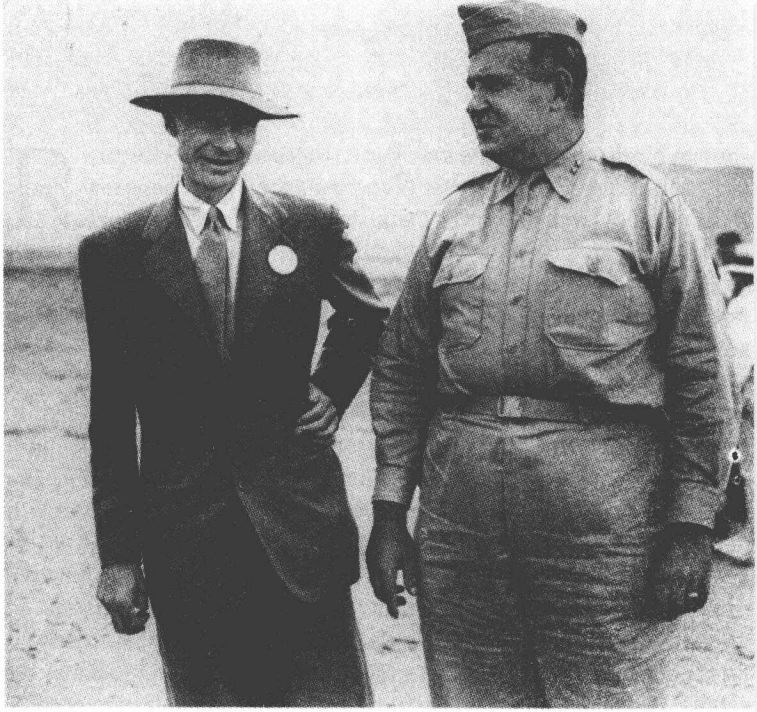
有一天，当他们拼车去工作时，埃尔滕顿听到有关战争的新闻后说：“我希望俄国人赢，而不是纳粹，我愿意做一切去帮助他们。”沃格宣称当时埃尔滕顿还说：“我将尽力跟希瓦利埃和奥本海默谈一下，告诉他们我愿意把任何有用的信息传给俄国人。”

然而，几周后，他又告诉沃格和其他人：“我跟希瓦利埃说了，他也跟奥本

海默说了,但奥本海默说自己根本不想掺和进来。”

这个故事有沃格40年代末给联邦调查局说的话作支持,1983年时他又把这个故事告诉了马丁·舍温。二战后,沃格因为跟埃尔滕顿的关系几乎丢了工作。美国联邦调查局说如果他愿意揭发就给他除名,沃格拒绝了。但美国联邦调查局说服他签署了一份有关埃尔滕顿的声明,声明中写道:“乔治·埃尔滕顿和多莉·埃尔滕顿已经被证实是嫌疑分子,他们在苏联居住过并公开对共产党政权表示同情。乔治在二战期间公开协助俄国人。”

多年以后,当埃尔滕顿的名字出现在1954年对奥本海默的安全听证会上时,沃格认为政府完全错怪了埃尔滕顿。“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间谍,他根本不可能公开地谈论那些事了,他应该装作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才对。”



第三部分

15 | “他变得非常爱国”

“当我和他在一起时，觉得自己也高大了许多……我崇拜奥本海默，并且变成了一个奥本海默式的人。”

——罗伯特·威尔逊

罗伯特·奥本海默正在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作为武器实验室的领头人，他将要把曼哈顿工程的众多人的努力成果结合在一起，并且使它们能很快地用于制造核武器。他需要把自己所不知道的潜能发掘出来，以处理一些从未想到过的问题，彻底改变与过去生活方式不同的工作习惯，并且调整那些与自己的经历不相符合或背道而驰的态度与模式。奥本海默需要改造他性格中重要的一部分。所有这些事情，他都打算在短期内完成。在39岁的年龄，为了要获得成功，他必须做出这些改变。所有的工作都是建立在快速的进度基础之上，可是几乎没有哪一件事能够迎合这个根本不可能的进度表，包括奥本海默自身的改造。这是对他承诺和毅力的考验，虽然他的承诺和毅力很快就要实现了。

罗伯特经常思考如何把自己对物理学的激情和他对新墨西哥州大沙漠的向往结合起来，现在他有了一个机会。1942年11月16日，他领着格罗夫斯将军来到了洛斯阿拉莫斯。

奥本海默告诉他：“如果爬上峡谷，你会从一个台地的上面出来。那里有一所寄宿制男校，可能会成为一个有用的地方。”他们下午才到了学校。这所占地八百英亩的学校由一间“大房子”（它的主建筑物）、福勒庄园（一个在1928年由八百棵北美黄松的圆木建造的大庄园）、乡舍和一些其他的小建筑组成。学校海拔七千二百英尺，正好位于树带分界线。西面，白雪覆盖的杰姆兹山拔地而起约有一万一千英尺。你从福勒庄园宽敞的门廊能看到四十

英里远的地方;向东从里奥格兰德河峡谷可以看到奥本海默所钟爱的一万三千英尺高的克里斯托山。格罗夫斯看到这一景致后,突然激动地说:"就是这里了。"

奥本海默如愿以偿地看到了克里斯托山脉的壮丽景色,格罗夫斯也找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那里只有一条蜿蜒的沙砾小路,只有一条电话线通到那儿。在后来的三个月里,建筑工人们建起了木瓦或锡制屋顶的廉价木屋。类似的房子建起来就被当作简易的化学和物理实验室用了。所有的房屋都被漆成了军绿色。

看起来,奥本海默并未察觉到这一切对洛斯阿拉莫斯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尽管多年以后他承认,"我要对毁掉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负责"。由于集中精力招募工程所需的科学家,他也就无暇顾及建设一个小城镇的任务了。奥本海默的助手之一约翰·曼利是一名实验物理学家,他对这个站点有着深深的忧虑。当1942年12月2日曼利刚刚从芝加哥到来时,意大利流亡物理学家恩里克·费米就已经在那里领导了一个实施世界上首个可控核链式反应的团队。作为美国的大都市,芝加哥拥有声名显赫的大学、世界级的图书馆和一大群经验丰富的机械师、玻璃吹制师、工程师和其他技师,而洛斯阿拉莫斯什么也没有。曼利写道:"我们正尝试着在新墨西哥州的野外建造一个新的实验室。"曼利认为,如果奥本海默是一名实验物理学家,他就会明白"搞实验物理学百分之九十是管道工程",因此他永远都不会同意在这种条件下建造实验室。

后勤组织工作复杂得让人恐怖。奥本海默和第一组科学家计划在1943年的3月中旬到达洛斯阿拉莫斯。罗伯特向汉斯·贝特担保说,到那时候,一个由城市工程师管理的可生活的社会将在那里建成。

洛斯阿拉莫斯的建设、科学家的招募以及世界上第一个核武器实验室所必需的一切装备的聚集,都需要一位一丝不苟的耐心的管理者。在1943年早期,奥本海默还不能胜任,他从未主持过比他的研究生研讨会更大的活动。在1938年,他曾负责过十五名研究生,现在他则指挥着几百名乃至很快就要达到几千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工作。他的同事也都不相信他能胜任这项工作。"他是一个行为古怪的人——在1940年以前我知道他是因为他的古怪行为,"一位那时正在欧内斯特·劳伦斯手下学习的年轻实验物理学家罗伯特·威尔逊回忆说,"他可不是那种你们心中所想的领导者。"

曼利回忆说,他惊讶于奥本海默的广博知识,但同时也反感于他对世俗

琐事的漠不关心。曼利对实验室的组织特别担心。曼利说:“因为我不知道制作一个组织系统图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就问了奥本海默——谁来负责这个,谁来负责那个。”奥本海默对曼利的询问一直避而不答,直到1943年3月的一天,曼利来到了奥本海默的办公室。奥本海默抬眼看到曼利站在那里,他清楚曼利想要什么。他抓起了一张纸,扔到桌子上说,这就是你要的该死的组织系统图。奥本海默设想把实验室分成四个区:实验物理、理论物理、化学冶金,还有就是军火类分区。每一分区里的小组领导向分区领导负责,而分区领导向奥本海默负责。这只是个开始。

在1943年初,奥本海默派年仅28岁的罗伯特·威尔逊去哈佛安排把哈佛的回旋加速器安全运到洛斯阿拉莫斯。在3月4日,威尔逊来到洛斯阿拉莫斯检查了安装回旋加速器的房子。他发现那里几乎一片狼藉;看起来那里好像没有日程安排,没有计划,没有责任人。威尔逊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曼利,他俩认为他们应该和奥本海默见上一面。在伯克利和奥本海默的会面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奥本海默大发雷霆把他俩臭骂一顿。曼利和威尔逊开始怀疑奥本海默是否胜任这一挑战。

因为祖上是教友派信徒,所以威尔逊是一名和平主义者。当欧洲战争爆发时,他说:“当我发现实际上我在为一项如此恐怖的工程工作时,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相当大的改变。”威尔逊第一次发觉自己被奥本海默的傲慢行为惹恼了。他后来说道:“我不怎么喜欢他,他有些自作聪明而且厌烦傻瓜,也许我就是他还没有发现的傻瓜之一。”

在搬到洛斯阿拉莫斯之前,奥本海默看起来可能已经不能胜任了,可是他快速地展示了自己的应变能力。在洛斯阿拉莫斯待了几个月后,威尔逊吃惊地发现他的老板变成了一个具有超凡魅力和能力的领导者。曾经行为古怪的理论物理学家、长头发的左翼知识分子现在变成了一个一流的组织严密的领导。“他有型而且立场分明,”威尔逊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无论我们觉察到他哪方面的不足,在几个月内他就会改掉这些不足,而且明显比我们更加懂得管理程序。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疑惑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疑惑都会很快被解决掉。”到了1943年的夏天,威尔逊说:“当我和他在一起时,觉得自己也高大了许多……我崇拜奥本海默,并且变成了一个奥本海默式的人。”

尽管如此,早期的计划阶段以后,奥本海默经常表现出幼稚得不可思议。

在他给曼利的组织系统图中，他把自己同时列入到实验室总监和理论物理分区的领导行列。但很快他的同事就明白了，最后他自己也明白了，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干两件事，所以他指定了汉斯·贝特担任理论物理分区的分区领导。他告诉格罗夫斯，他需要的是一群科学家。

奥本海默起初大大低估了工作量的大小。最初的建筑预算约三十万美元——可不到一年就花了七百五十万美元。

当洛斯阿拉莫斯于1943年3月开放时，一百名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供给物资聚集在这个新社区里。不到六个月这里就有了一千人，一年后有三千五百人生活在台地上。到了1945年夏，奥本海默的这片荒地已经发展成了拥有至少四千居民、其中包括两千工作人员的小城镇。他们居住在三百栋单元住宅、五十二个宿舍和二百个汽车房屋中，仅“技术区”就有封闭的三十七幢建筑物，包括净化钚的植被区、铸造厂、图书馆、礼堂和数十个实验室、仓库和办公室。

令奥本海默几乎所有的同事感到不满意的是，他原封不动地接受了格罗夫斯将军的建议——在这个新实验室里所有的科学家都应该成为现役军人。1943年1月中旬，奥本海默参观了陆军在旧金山的军事基地，顺便谈论了安排他成为陆军上尉的有关事宜。实际上，他只是参加了体检而且还没有达标。军医在报告中指出，奥本海默的体重一百二十八磅，比体重的下限少了十一磅，比标准体重更是差了二十七磅。他们指出，从1927年开始他就患上了慢性咳嗽病，做胸透时还查出他患有气管炎。他还坦言自己有腰肌劳损的病史：大约每十天左右，他的左腿就会感到剧痛。考虑到上述情况，这位军医认定他永远都不适合服军役。但由于格罗夫斯将军已经指示过这位军医，奥本海默必须服役，所以他被迫打了个字条说明上述身体缺陷的存在，而且强烈建议奥本海默不能超期服役。

体检之后，奥本海默得到了一套专门为他量身订做的军官制服。他的情绪很复杂，也许穿上制服更能体现他的重要性以及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自豪感吧，而且穿上军装，在1942年来说也是一件爱国之举。奥本海默的目光变得十分深邃。罗伯特·威尔逊回忆道：“他还告诉我这场战争与以往不同，这是一场为自由而战的战争，一场人民的战争……语言上的细微差别，就是一种政治语言，比起以前的一股激进味，现在只是多了一丝爱国主义的味道。”

就在奥本海默开始巡视并通知物理学家们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后不久，他就发现同事们不愿在军队的管控下进行工作。到了1943年2月，老朋友拉比

和其他几名物理学家来劝他必须让实验室去军事化。拉比是奥本海默为数不多的能够当面指出他错误的朋友之一。

奥本海默最失望的一件事情是，自己没能够把拉比挽留在洛斯阿拉莫斯。他是如此渴望拉比的到来，以致想和他共同管理实验室，但这对拉比来说完全没有用。拉比从根本上就质疑原子弹的建造理念。“从 1931 年当我在上海看到日本空袭郊区的情景时，我就强烈反对这个了。你投下一枚原子弹，但原子弹并不管你是否具有正义。没有逃脱的可能性，谦虚的人不能，诚实的人也不能……在和德国交战的时候，在放射实验室中我们的确帮助发展了炸弹装置……但那是面临真正的敌人，那是真正严重的事情。但原子弹却使我们迈向了一个那时我不喜欢、现在也不喜欢的更远的一步。我认为那是很恐怖的。”按照拉比的想法，战争应该通过一项火药味更少一些的技术——雷达——来取得成功。“我想过这个问题，”拉比重申道，“并且拒绝了他，我说‘关于这场战争我很担忧，如果没有高效的雷达我们会输掉战争的’。”

对于不能接受奥本海默的挽留，拉比还给出了一个不是很现实却很意味深远的原因：他告诉奥本海默，他不想让物理学三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成为一种毁灭性的武器。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声明，拉比知道这会在奥本海默的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尽管拉比已经想到了原子弹的道德逻辑，但处于战争中心的奥本海默第一次对于这种形而上学的问题失去了耐心，他现在已经无视他朋友的异议。“我想如果我相信你这项工程是‘近三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他回信给拉比说，“我就会站在另一个立场。对于我来说，它首先是战争武器必然的发展。我认为纳粹不会让我们选择不进行这样的发展。”对于奥本海默来说，现在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纳粹之前造出武器。

虽然拉比拒绝进入洛斯阿拉莫斯，但奥本海默仍然欢迎他能参加第一次的讨论会，这样他就成为这项工程的少数访问顾问之一。像汉斯·贝特所说，拉比成了奥本海默的“父亲一样的建议者”。可是，拉比却说自己从未为洛斯阿拉莫斯工作过。

然而，拉比却劝说贝特和其他科学家搬往洛斯阿拉莫斯。他还建议任命贝特为理论物理分区的分区领导，这个区就是他所说的“整个工程的神经中枢”。

当拉比警告奥本海默说在普林斯顿工作的科学家们的士气正在下降后，奥本海默决定把普林斯顿所有二十名科学家都接进洛斯阿拉莫斯。结果发现这完全是一个妙手偶得的决定，因为普林斯顿组当中不仅包括罗伯特·威

尔逊,还有一名年仅24岁的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奥本海默很快就发现了理查德·费曼的天才,而且知道他想待在洛斯阿拉莫斯。但是,理查德·费曼的妻子阿利纳患有肺结核,费曼清楚地表示他不能抛下她独自一人去洛斯阿拉莫斯。费曼原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但在1943年冬,他接到了一个从芝加哥打来的长途电话。奥本海默打电话说,他已经为阿利纳在阿尔伯克基安排了一个肺结核疗养院,还保证说费曼肯定能去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话,周末还能去看望阿利纳。费曼很感动,立即就同意去洛斯阿拉莫斯工作了。

1943年3月16日,奥本海默和基蒂登上了驶往圣达菲的列车,圣达菲是一个有着两万人口却没有什么活力的城镇。他们登记住进了镇里最好的拉芳达酒店,在那里,奥本海默用了几天的时间为实验室的圣达菲联络站招募了一些人。有一天,一位45岁的史密斯大学的毕业生多萝西·斯卡里特·麦克宾站在拉芳达的大厅里,等着去面试一份以前从没有听说过的工作。麦克宾说:"我看到一个男人脚上踩着什么东西,穿着邋遢的军用防水短上衣,戴着猪肉饼一样的帽子。"奥本海默把自己称作布拉德利先生,他询问了她的背景。麦克宾十二年前守了寡,然后搬去了新墨西哥治疗肺结核。之后,和奥本海默一样,爱上了那里惊艳的美景。到了1943年,麦克宾几乎熟识了圣达菲的每一个人。当奥本海默知道她比他更加了解圣达菲以及那里的环境后,他聘请她在镇中心的东殿街109号经营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办公室。

麦克宾一下子就被奥本海默的平易近人和优雅的举止所吸引了。她回忆道:"我知道他所谈论的一切都是活生生的,而我也做出决定,和他成为同事一定会很棒。"

麦克宾并不知道奥本海默在做些什么,但不久以后她还是成为了"通往洛斯阿拉莫斯的守卫者"。在那个没人在意的办公室里,她向数百名前往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科学家以及他们的家人送去了祝贺。几天的时间她就接了数百个电话并且验证了数十个通行证。她知道这个新社会的每个人和每件事,但直到一年之后她才知道他们正在造原子弹。麦克宾和奥本海默成为了毕生的朋友。

39岁的奥本海默看起来却只有二十多岁。他还留着几乎要竖起来的、长长的、波浪式的黑发。"他有着我所见过的最蓝的眼睛,"麦克宾说,"非常干净的蓝色。"能让你想起长在克里斯托山缓坡上的龙胆根的蓝色。那双眼睛

能让你着魔，又大又圆的眼睛周围点缀的是重重的眼睫毛和浓黑的眉毛。“他总是看着和他说话的人，他总是把能够给的一切都给予和他说话的人。”他说话很温柔，尽管他能对任何事都滔滔不绝，但是他还是有些可爱的男孩气。“当他被什么所感动了，”麦克宾随后回忆道，“他会说‘叽’，当他说‘叽’时你会觉得他很可爱。”

到了这个月的月底，罗伯特、基蒂和皮特搬上了山并住进了那里的新家——一座单层的原木石头房子。这最初是1929年为梅·康奈尔修建的。她是农场学校的校长同时也是那位专门照顾孩子们的艺术家的妹妹。“主人的二号别墅”坐落于“浴缸排”的最后。它的名字起得相当贴切，因为台地上只有这所和其他五所农场学院时期的原木房子装了浴缸。奥本海默的家在这个新社会中心的一条宁静而未经铺饰的街道旁，掩映于斑驳的灌木之中，就像一个小花园一样。说起来只有两间小卧室和一间书房的这座房子未免有些太过朴素了。由于学校老师们餐餐都从学校的食堂里打饭，屋子里也就没有厨房。不过在基蒂的努力下，这一不足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客厅还不错，高高的天花板，石砌的壁炉，还有能够鸟瞰整个花园的大玻璃窗。1945年之前，他们就一直住在这里。

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致多多少少弥补了镇上基础设施的薄弱。物理学家罗伯特·布罗德的妻子伯妮斯·布罗德曾写道：“我们能够透过围起来的铁丝网眺望镇子外的景色，欣赏着季节轮替：入秋后的金黄色映衬着深沉的常青树；隆冬天暴风雪过后堆积的白；春天萌生的绿；夏天呼啸而过的沙漠上的干燥的风。尽管有人说洛斯阿拉莫斯就不应该存在，但在这个台地上建起一个小镇确实很不容易。”

在这里，每个人都改掉了以前的旧习惯。在伯克利时，奥本海默为了晚上能玩得很晚，第二天上午十一点之前是从来不安排授课计划的；可到了洛斯阿拉莫斯他却常常要早晨七点半就起身前往技术区，也就是“T”区。这里四周都拉起了9.5英尺高的隔离网，顶上还有两排卷曲的铁刺网，大门口还有宪兵把守检查每个人所佩戴的徽章。物理学家和科学工作者们佩戴的是能够通行整个“T”区的白色臂章。

像其他人一样，奥本海默每周工作六天。在工作期间，他也常常着便装，比如从新墨西哥家里的柜子拿出的牛仔裤或其他米色裤子配上没有领带的工作衫。同事们对此也纷纷效仿。伯妮斯·布罗德曾写道：“我印象中好像

没人会穿锃亮的皮鞋。”奥本海默步行到“T”区时,同事们总会尾随其后,偷听他小声地嘟囔早晨的安排。“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来啦!”一个洛斯阿拉莫斯的居民看到后说。另外,根据一位23岁负责转接电话的陆军妇女队的工作人员回忆,“奥本海默常常戴着一顶搞笑的小帽子,叼着烟斗,眼神里给人一种特别的感觉,这使得他根本不用张扬或大呼小叫”。

主管的这种有意识的不拘小节打消了由于他在场而给大家造成的压抑,也使得他备受爱戴。一名陆军特别工程分队的年轻队员埃德·托蒂在二战后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有好几次,奥本海默博士有事打电话过来时,我回答‘我是托蒂’,电话那头就会说‘我是奥蒂’。”他的不拘小节与格罗夫斯将军的“处处要人瞩目,要人尊敬”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每个人都工作很长时间。实验室日夜开放,并且奥本海默鼓励人们制定自己的计划表。他拒绝规定时间,只有1944年10月,在一名格罗夫斯将军的效率专家抱怨工作时间内的懒散现象后,他们才第一次使用了警铃。“工作变得太过紧张了,”贝特回忆道,“我有种感觉连做梦都梦到了我正在往山上推着一辆可怕的大车。”科学家们习惯于使用有限资源却没有时间限制的环境,而现在却不得不适应使用无限资源在严格时间限制下进行工作。

贝特的工作地点是在奥本海默的总部T楼(T代表“理论的”),一幢土褐色的双层绿色建筑物,那里迅速成为了整个台地的精神中心。坐在他旁边一起工作的是费曼,如果贝特是严谨型的,那么他就是社交型的。贝特回忆道:“我只知道费曼是来自普林斯顿的。我还不认识他,但奥本海默认识。他一开始就很活跃,但直到他来了两个月后他才开始和我开玩笑。”37岁的贝特喜欢他周围的人同他辩论,而25岁的费曼正是这种人。当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楼里的每个人都会听到费曼大叫道:“不是,不是,你简直疯了!”或者“那就是废话!”然后,贝特就会平静地解释为什么认为自己是对的。费曼冷静几分钟然后重新喊道:“不可能,你绝对疯了!”他们的同事们很快就给他们俩起了外号,费曼——“蚊子”,贝特——“战舰”。

“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奥本海默和以前我认识的大不一样了,”贝特说,“举个例子,战前的奥本海默做事犹豫不决,缺乏自信;而在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则是一个很好的决策者。”贝特后来在人们的催问下解释这种转变。他所熟悉的伯克利的那位单纯的科学家,曾经只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投入到探索自然的深层秘密上。奥本海默并未曾对诸如工业企业之类的事情有所偏

爱，然而在洛斯阿拉莫斯他却指挥着整个工业企业。“那是另外一种问题，另外一种态度，”贝特说道，“可是他为了适应这个角色完全改变了自己。”

他很少下命令，而是习惯间接地表述他要干什么，就像物理学家尤金·威格纳所回忆的，“他非常简单自然，就用一双眼睛、两只手和抽了一半的烟斗”。贝特记得奥本海默“从没有命令过应该做什么，他总是我们中间做的最好的，就像好的主人和客人的关系一样”。威尔逊也有类似的体会：“他在的时候，我变得更加聪敏，话也更多了，有热情、有先见，而且更善于表达自己。虽然平常我读东西很慢，但是他递给我的东西我只要扫上一眼就能把东西还给他，并能细致地讨论其中的微小差异。”他同时承认，回头想想这些感觉未免有些“自欺”。“一旦他不在了，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就会变得难记、难理解。不过没关系，这种感觉已经有了。我已经知道要做的时候该怎么做了。”

在解决理论物理问题时，他总有办法预测到下一个将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他的同事们同样惊叹于他对于工程学任何方面的即时理解能力。李·杜布里奇回忆说：“我看到过好多次，他读完一篇那种十五页到二十页打印纸长的论文后，就会说‘我们把这个过一遍，然后讨论一下’。然后，奥本海默就会在五分钟内浏览所有内容，并且准确地摘出要点……”即使在有异议的情况下，奥本海默也总是能有种预知争论的直觉。奥本海默招来担任他私人助理的是来自伯克利的哲学系学生大卫·霍金斯，他有很多观察他老板行动的机会。“奥本海默能够耐心地等待争论的开始，然后总结，他能做到使人没有异议。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把戏，他居然能得到所有人的尊敬，有些人甚至是科学领域的权威……”

这使得奥本海默能对自己的个人魅力张合有度。那些在伯克利就认识他的人知道，他就是那种有能力把人们拉到他的轨道上的人。曼利回忆道：“我认为，他如果觉得别人对他有用，就不会被动地使用别人，这正是他会自然而然地使用别人的原因。”

奥本海默能够听取并时常接受别人的意见。汉斯·贝特曾建议说，每周一次的开放性学术讨论会会让每个人受益，他立刻就同意了。然而格罗夫斯将军初闻此项建议时就试图阻挠，奥本海默则坚定地认为，自由地进行思想交流对于有着白色臂章的科学家们至关重要。

第一次讨论会于1943年4月15日召开，地点就在现已荒凉的学院图书馆。站在小黑板前的奥本海默，经过一番平淡的寒暄后便举荐了他的旧徒塞培尔。他对现场近四十位科学家说，下面将由塞培尔简短地说明手头上的工

作。于是,羞涩的塞培尔走到讲台中央,习惯性地结结巴巴地念着笔记。塞培尔后来写道:"当时的安全情况很糟,我们都能听到木匠噼噼啪啪跑下楼梯的声音。还能看到一个在楼上工作的电工,透过房顶上的纤维板可以看见一条腿,估计就是他的。"

仅过了几分钟,奥本海默让曼利走上前在塞培尔的耳边轻声提醒道,他应该把炸弹一词换为另外一个更为温和的词语,比如"新装置"。

在总结奥本海默研究小组在伯克利夏季会议的研究成果时,塞培尔说:"这项工程是为了造出一种实用的军事武器,它将采用炸弹的外形,利用一种能够产生核裂变的材料,引发其中子的加连锁反应,进而释放能量。"同时,他也提到,一颗原子弹可能产生两千吨 TNT 当量的爆炸威力。然而,制造每个这种新装置都需要高度浓缩的"铀"。这种浓缩的铀核约有一个香瓜的大小,三十磅左右。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利用铀—238 获得中子的方法,产生质量更大的钚元素制造出另一种武器——钚弹。钚弹进行核链式反应的临界质量则小得多,因此一个钚核只有十一磅,体积也不会超过一个橘子。尽管如此,无论采用哪种核,都要包裹在普通铀制造的坚硬外壳里,这种壳的大小与篮球无异。所以,无论哪种武器的重量都在一吨左右,都可以进行空中投射。

在座的大部分科学家都明白,这种构想在新物理学中具有理论可能性,然而,分工的局限性令许多人都不明细节。因此,几乎很少人知道基础问题是如何解决的,甚至连大概都不清楚。制造一种实用的军事武器固然难度很大,但并非不可逾越。生产原子弹的某些物理学原理尽管还不是很确定,但工程和兵械的技术才是难以估量的。生产足够的铀—235 或钚会给工业带来极大的压力。可是即便有了足够的生产炸弹的原料,也没人敢确定就一定能造出合格的原子弹。尽管如此,连贝特这种曾经持怀疑态度的人都明白:钚元素一旦产生,核弹就能产生。总而言之,对于塞培尔的听众来说,真正的消息是他们的努力极大地促进了战争的胜利。塞培尔按照奥本海默的意思说道:"这是使命的召唤,历史的抉择。"问题在于,他们会比德国人先攻破难关吗?他们确实能为打赢战争出力吗?

接下来的两周内,塞培尔做了三十四次长时间的演讲,促进了创造性的交流,而这也正是奥本海默所需要的。在众多问题上,塞培尔简要地归纳了他自称"激发"的实际力学原理——实际上就是如何把铀与钚的临界质量联系起来,引起链式反应。他用了最明显的方法,即所谓的枪式激发原理。也就是说,先是一小部分的铀产生反应,然后把它们注入另一部分的铀—235

中,从而激发所有铀进行反应,以达到铀的临界点最终产生爆炸。但他同时还建议说,"这些碎片"可以按照草图上画的安装到一个环上。如果爆炸物质分布在钚周围并被点燃,那么这些碎片就会向内形成一个球体。

这个想法引起了塞思·内德尔迈耶的兴趣。他请求奥本海默允许他进行这方面的试验。不久,他就和一小组科学家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峡谷里进行内爆试验。

有一天,费米把奥本海默拉到一边说,他有另一个消灭大量德军的办法。他说可以用放射性物质污染德军的食物。奥本海默似乎对这一想法很感兴趣。他让费米不要和别人再提起这件事,随后就向格罗夫斯将军进行了汇报,并和特勒讨论了此事。特勒告诉他,从链式反应中分离出锶—90 是可行的。但是到了 1943 年 5 月,奥本海默决定推迟这项行动。他写信给费米说:"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这个想法能消灭五十万德军,而他们还有大量不穿军装的军人。这个想法搁浅了,仅仅是因为这样的办法不能消灭大量的敌人。"

战争能使一些温文尔雅的人做出不可思议的举动。1942 年 10 月底,奥本海默的老朋友维克托·韦斯科普夫给他寄去了一封标有"秘密"字样的信。维克托在信中说,他从泡利那里得知泡利的德国同学,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维尔纳·海森堡刚被任命为柏林一个核研究机构的主任。他要去瑞士作演讲。韦斯科普夫已经和贝特商量过了,他们建议应该立即采取行动。韦斯科普夫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上说:"我认为当前最有效的办法是在瑞士绑架海森堡。因为如果你或贝特出现在瑞士,德国人也会这么做的。"

奥本海默立即给他回信,谢谢他这封"有意思"的信。他说他已经知道了关于海森堡到瑞士演讲的事,并且已经和华盛顿的相关当局讨论过此事。

过了很久,格罗夫斯认真地考虑过绑架或刺杀海森堡的计划。他在 1944 年派特工莫·伯格到瑞士去。这位前棒球明星在 1944 年 12 月一直跟踪海森堡,但最终格罗夫斯决定放弃刺杀计划。

16 | “太多的秘密”

“这项政策把你置于如此的境地：你试图努力去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
可是后面却有几只手死死地将你拽住。”

——爱德华·康顿博士致奥本海默的信

这位总指挥的第一次管理危机发生在一年的早春时节。在格罗夫斯将军的批准下，奥本海默任命他在哥廷根读书时的同学爱德华·乌勒·康顿为副总指挥。康顿的工作是分担奥本海默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在洛斯阿拉莫斯研究组中担任军方的联络人。康顿比奥本海默长两岁，他既是一位出色的物理学家，又是一位杰出的实验室管理者。1926 年在伯克利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就在哥廷根以及慕尼黑获得了一些委派和任命。在 1937 年，他离开了普林斯顿大学成为了西屋电气公司工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总之，至少从工作经验方面来说，康顿比奥本海默更加适合领导洛斯阿拉莫斯的实验室。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康顿在政治方面不像奥本海默那么活跃，而且他从未想过加入共产党。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的新政倡导者，忠实的民主党人士，所以在大选中他投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票。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公民自由意识的理想主义者，康顿相信如果没有自由的学术观点交流就不会产生优秀的科学成果。他积极倡导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物理学家们定期与全国的实验机构接触交流。这不可避免地激起了格罗夫斯将军一伙人的愤怒。

1943 年 4 月下旬，格罗夫斯得知奥本海默去了芝加哥大学后非常愤怒。在那里，奥本海默与曼哈顿工程冶金实验室主管物理学家阿瑟·康普顿讨论了钚的生产计划。将军把这项公然违反了保密政策的举动归咎于康顿。当然，格罗夫斯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地位已经日渐下降。当他愤怒地闯入奥本海

默的办公室并与两个人当面对质时，康顿坚持己见，但意外的是奥本海默并没有支持他。一周后，康顿决定游说奥本海默反对立法议案并递交了辞呈。他原打算在计划组里再留一阵子，可六周后他便离开了。

在康顿致奥本海默的辞呈中他写道："最让我感到失望的是这异乎寻常的保密政策。"康顿解释说："当我得知格罗夫斯将军责备我们时，我是如此震惊以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强烈地感到这项政策把你置于如此的境地：你试图努力去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可是后面却有几只手死死地将你拽住。如果我们为了保密政策而不与康普顿那样的人见面的话，那么我只能说这项计划无望在科学领域中有所建树。"

最后，康顿说他会回到西屋电气继续研究雷达技术来为战争做出贡献。由于奥本海默表示不愿意反对格罗夫斯，康顿在忧伤和困惑中离开了。他并没有意识到奥本海默是为了继续获得机密工作的许可。军队的安全保密官僚机构仍在试图阻挠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奥本海默明白，如果他想保住自己的工作的话，就不能在保密工作方面向格罗夫斯施压——绝对不能。

奥本海默曾经精心地维持与格罗夫斯的关系。前一年的秋天，两个人都设法支配对方，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能主导彼此的关系。格罗夫斯相信，这位有号召力的物理学家是计划成功的关键，同时也想当然地认为，他能够利用奥本海默的过去来控制这个曾经背负着左翼政治倾向包袱的人。罗伯特的估计同样简单直接，他知道只要格罗夫斯继续把他当作当下最优秀的总指挥，那么他就能保持工作。他知道自己与共产党人的那些友情让格罗夫斯能牢牢地控制着他，但是通过展示他那独一无二的领导才能，他相信能得到格罗夫斯将军的信任，并在其认为合适的情况下管理这个实验室。

回顾那段往事，在发展核武器的竞赛中，这对完美组合领导这个团队一起努力战胜了德国人。如果我们把罗伯特的管理方式说成是利用其号召力来让大家产生共识，那么格罗夫斯则是通过恐吓与威胁来行使其权威。奥本海默的秘书普里希拉·达菲尔德一直记得那位将军是如何踱着步子经过她的办公桌，甚至不打招呼就说一些类似于"你的脸很脏"之类的粗鲁言辞。这些粗鲁之举使得格罗夫斯遭致大多数人的抱怨，因此批判的重心已经悄悄地从奥本海默身上转移了。但格罗夫斯会避免在奥本海默的周围做出这种粗鲁的举动，奥本海默常常借此来标榜自己在他们关系中的地位。

罗伯特做出一些必要的让步来缓和同格罗夫斯的关系。他变得像将军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灵活高效的管理者。在伯克利，他那具有代表性的

大办公桌总是堆满了几英尺高的文件。曾经在伯克利担任内科医生的路易斯·亨佩尔曼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后便与奥本海默成为了好朋友。他发现在这里罗伯特的办公桌收拾得干净整洁,看不见桌子上有任何杂纸。在外表上他也有了变化,奥本海默剪掉了他又长又卷的头发。"他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有头发,"路易斯·亨佩尔曼说,"我差点认不出他来了。"

事实上,即便是康顿退出了洛斯阿拉莫斯计划,格罗夫斯的分隔政策也还是失败了。虽然奥本海默曾避免在这件事上公开对抗格罗夫斯,但这个政策已然变成了一个空架子。随着工作的进展,让所有戴有"白色臂章"的科学家相互自由地讨论问题、交流思想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连爱德华·特勒都明白分隔政策是高效工作的一大障碍。早在 1943 年 3 月,他就向奥本海默说,他曾经写过一封官方信件同格罗夫斯讨论自己先前的忧虑——太多的秘密。但随后他透露说:"我没能做什么使您感到麻烦的事,而是提供给您一种建议。这封信件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对您的工作有所帮助。"不久之后,格罗夫斯便明白自己的处境了。尽管他已经竭尽全力,但仍不能得到那些最受尊重以及资历较深的科学家们的合作。有一次,欧内斯特·劳伦斯访问了洛斯阿拉莫斯并为一个科学家小组作了一场学术讲座。格罗夫斯把这位物理学家拉到一边小心翼翼地嘱咐他一些不允许向小组成员们讲的内容。让格罗夫斯吃惊的是,仅仅片刻之后,他就听到劳伦斯起身站在黑板前说:"我知道将军不想让我讲这些,但是……"虽说在制度上没有任何的改变,但在实际行动中,科学家们的分隔已经日趋不复存在。格罗夫斯终于认识到,在洛斯阿拉莫斯科学研究准则与规律已经取代了军方确立的安全保密原则。

在 1943 年 5 月,奥本海默在他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以后每周二举行全员学术研讨会,同时他还建议会议由特勒来组织。当格罗夫斯说他被这种规模大、范围广的讨论会所打扰时,奥本海默非常坚定地回答说自己将"尽忠"于学术研讨会。最后,奥本海默做出的让步仅是同意对到场物理学家的人数有所限制。

1943 年夏末,奥本海默对曼哈顿工程的安全保密官员阐述了自己对于安全保密事宜的观点:"关于这该死的整个事件,我个人的观点认为,那些我们正在研究的基本信息很可能已经被所有留心的政府知道了,但我们所做事情的信息由于其复杂性可能根本就不会有用。"像他所说的这种危险,并不是有关原子弹的技术信息会泄露到其他国家,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努力程度"和"已卷入的国际投资"的规模。如果其他国家明白了美国为努力研制原

子弹而投入了大量资源,他们很可能会尝试建设和我们一样的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甚至已经不再想这项技术"对苏联造成了什么影响",而是"它可能会对德国产生非常巨大的效应,而且我同其他所有人一样坚信这一点"。

在奥本海默因格罗夫斯保密工作人员的请求而分心的时候,他的一些青年学生还在抱怨军队对曼哈顿工程的庸冗管理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1943年8月21日,汉斯·贝特和爱德华·特勒致信奥本海默表达他们对工程进度的失望和不满:"最近,无论是公众报纸还是秘密机构的报告都给出种种预示,德国人可能拥有了一种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他们将在今年11月到明年1月之间完成这种新式武器。"他们警告说:"这种新式武器很可能是'管状合金物'——英国对原子弹的代称。"他们写道:"如果这些事情得到证实,就没有必要来描述这可能导致什么结果。"奥本海默了解他们的忧虑,同时他也担心他们会落后于德国人,所以他鞭策同事们一起更加努力地工作。

凭借着科学主管的头衔,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研制计划中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威。尽管表面上他与一位军方指挥官一起掌权,但他却直接对格罗夫斯将军汇报工作。

安全保密工作一直是一个让人感到头痛的问题,有一阵子,军队安全部门甚至把武装军警安排在奥本海默的房子外面。宪兵们会检查进入房子的每一个人的通行证,包括基蒂的。基蒂时常会在离开时忘记把通行证带上,却又总是能在宪兵们不许她进来时编造出合适的理由。即使这样,她对于宪兵的出现并不是完全不开心的,她时不时地就把宪兵当作照顾皮特的保姆。当负责此事的警官知道这件事后,就立即撤走了宪兵。

由于对格罗夫斯有了一定的了解,奥本海默已经同意任命一个三人委员会来负责内部安全保密工作。他指定他的助手大卫·霍金斯和约翰·曼利以及一名化学家乔·肯尼迪来负责实验室(T区)的内部安全保密工作。这个实验室建在郊外并用铁丝网将其与外界隔离,而且不允许宪兵和士兵们进入。内部安全委员会大多处理一些无聊琐事,诸如检查并确保研究员们在离开办公室时锁上了他们的文件柜这样的事情。如果有人被抓到把一份秘密文件留在他的桌子上过夜,那么这个研究员就要在第二天晚上执勤并巡逻整个实验室,还要努力抓到其他人。有一天,塞培尔看见霍金斯和埃米洛·塞格雷在争执。"埃米洛,昨晚你一定把一份秘密文件放在了外面,"霍金斯说,"而且你一晚上都不在。"塞格雷反驳道:"那份文件完全是错误的,只会给敌

人产生误导。”

奥本海默一直尽力保护他的人不受安全机构的威胁，他和塞培尔已经无数次讨论过关于如何才能保护所有人免于被开除的问题。“如果他们一意孤行的话，”塞培尔谈到安全隔离的问题时说，“这里将留不下任何人。”的确，1943 年的 10 月，军队安全调查员建议将塞培尔夫妇两人调离洛斯阿拉莫斯。联邦调查局用那种惯用的夸张手法指控塞培尔夫妇，“完全被共产主义信仰所侵蚀，而且他们所有的同事都被认定为激进分子”。

从文件记录来看，我们并不清楚军方是如何驳回这一决定的，但很可能是奥本海默以个人名义为塞培尔夫妇的忠诚作了担保。有一天，这位当地安全办公室的负责人皮尔·德·席尔瓦上尉来当面质问塞培尔的政治背景问题，奥本海默认为这根本就不重要而不加干预。“奥本海默自愿提供的信息表明，他早就知道塞培尔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并且坦白地交代过此事。事实上，塞培尔已经这样告诉过他了。”奥本海默解释说，在塞培尔加入洛斯阿拉莫斯之前，自己已经告诉塞培尔必须放弃他的政治活动。奥本海默说：“塞培尔向我保证他会的，因此我信任了他。”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德·席尔瓦认为，奥本海默所说的一切只是证明了他的幼稚和轻信他人，甚至是更加糟糕的缺点。

军人们与科学家及其家属们的关系一直不是非常稳定，格罗夫斯将军给这个定下了标准。和自己人在私底下聊天时，格罗夫斯习惯把洛斯阿拉莫斯的人们看作“孩子们”。他曾指示他的一名指挥官说：“努力满足各种人的需要，不要让生活条件、家庭问题或其他什么使他们从工作中分神。”许多人都表示格罗夫斯很令人生厌，但格罗夫斯表现得根本不在乎这些人是怎么看他的。

奥本海默和格罗夫斯相处得还算不错，但他发现军方大部分反间谍机构官员都很愚笨，而且喜欢冒犯别人。有一天，当奥本海默与所有小组领导进行周五的例行午会时，德·席尔瓦上尉破门而入，大声说道：“我很不高兴！”他说，一名科学家到他的办公室聊天，未经允许就坐到了桌角上。“我对此很不满！”上尉怒气冲冲地说道。但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讶不已的是，奥本海默竟回敬道：“上尉先生，在这个实验室里，无论是谁都可以坐在任何一个人的桌子上！”

一些保密限制让大家深恶痛绝。当爱德华·特勒说他手下人总是抱怨自己的信件被打开过时，奥本海默无奈地回答说：“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我

竟然被禁止和自己的亲弟弟说话。”他不停地抱怨,为自己正在被监视着的想法焦躁不安。罗伯特·威尔逊回忆道:“他的通话被监听。”在那时,威尔逊甚至认为这一想法多少有些偏执。但不久之后,他意识到奥本海默确实已经处于完全被监听的状态之下了。

为数众多的军方反间谍机构官员早在奥本海默到达洛斯阿拉莫斯之前就已经被暗中授予了任务。在这样一个机构中,安德鲁·沃克被任命为奥本海默的私人司机和保镖,沃克后来曾坦言,反间谍机构官员曾监视奥本海默的信件,并监听他的家庭电话和他的办公室。

此时,奥本海默自己开始具有了高度的安全意识,这位曾经很不拘小节的大学教授,现在居然会小心谨慎地将一份份分类备忘录别在自己后裤兜的内侧,以防止其丢失。他甚至尝试着安抚那些军方保密官员,让他们占用自己的宝贵时间,并且遵守他们提出的几乎所有要求。但是,这份工作的压力太大了,被长久监视的不安全感,以及对计划失败的恐惧感——加上生活中其他令人头疼的事情——开始让奥本海默时不时地打算放弃。在1943年的奥本海默与罗伯特·巴彻的一次会面中,奥本海默坦言他打算放弃。他觉得对自己过去的那些调查像是一种无情而竭力的纠缠,除此之外,他还告诉巴彻,他的工作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在听完奥本海默列举出其种种的不胜任之后,巴彻简短地回答道:“在这里,没有人比你更加胜任此职。”

所以,奥本海默坚持了下来。但是在1943年的6月,奥本海默却做出一件他本知道会引起反间谍机构官员高度警觉的事情。尽管他已经和基蒂结了婚,但在1939年到1943年间他仍然每年与简·塔特洛克约会两次。他后来解释道:“我们曾深爱着对方,而且在后来的相见中,我们仍然对彼此有着深厚的感情。”罗伯特和基蒂在1940年结婚之后,简有一次去拜访她的老朋友伊迪丝·阿恩斯坦——她以前居住在旧金山的一处公寓里,现在已经结婚了。当简站在窗台边抱着伊迪丝的小女儿玛格丽特·卢德米拉时,伊迪丝问简是否后悔当初拒绝嫁给奥本海默。她回答说:“是的!假如当时头脑更清楚一点的话,我现在已经嫁给奥本海默了。”

1943年春,奥本海默离开伯克利时,简已经成为简·塔特洛克医生了。那时正值一个女人步入一个令人欣慰的医学事业大门的时候。她成为了锡安山医院的一名儿童精神病科医生,多数病人都是有精神问题的孩子。她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气质和能力的工作。

那年春天,简告诉奥本海默,在他和基蒂去洛斯阿拉莫斯之前希望能与他见上一面。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奥本海默拒绝了。当时也还不存在什么安全保密方面的问题,因为他曾与史蒂夫·纳尔逊相约告别。或许是因为基蒂的反对,但不管怎么样,他没有同简说句再见就去了洛斯阿拉莫斯,因此他总是对此事有种负罪感。他们相互通信,但是简和她的朋友们说,她从奥本海默的信中读到了迷茫。在回信中,简苦苦地哀求他能够回来,而奥本海默也知道现在简的生活并不开心。

所以在1943年6月,当奥本海默有机会回到伯克利时,他约了简共进晚餐。军方情报机构暗中监视了他们约会的全过程,奥本海默从伯克利坐火车回到旧金山,简·塔特洛克在接他的地方吻了他。他们相拥走进简的汽车,那是一辆1935年的绿色普利茅斯轿车。她开车带他去了霍奇米尔科咖啡厅,那是一个低档的混合酒吧,那里有咖啡厅和舞厅。晚餐他们喝了几杯酒,然后在晚上十点五十分左右,简把车开回了她的顶楼公寓——旧金山市蒙特马利街1405号。晚上十一点半,公寓的灯熄灭了,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当他们一起离开公寓时,奥本海默才露面。这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指出:奥本海默与简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亲密并充满爱意。十一年后当他被质询者询问"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她必须要见你?"时,奥本海默回答:"因为她仍然爱着我。"

奥本海默与这位共产党员约会的报告传到了华盛顿,不久她就被说成是可能向苏联情报机构传递原子弹秘密的线人。1943年8月27日,根据一份监听塔特洛克电话的备忘录,联邦调查局怀疑奥本海默很可能把她当作中间人或者使用她的电话进行重要的通话,进而帮助共产国际组织。

1943年6月29日,就在奥本海默与塔特洛克相处一夜的两周后,西海岸的反间谍机构负责人鲍里斯·帕什上校写了一份备忘录递交给了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办公室),他建议取消对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并且将他开除。帕什在报告中声称,他有资料显示奥本海默可能仍旧与共产党有联系。他列举出奥本海默与塔特洛克的约会,以及奥本海默打给大卫·霍金斯——一个与贝尔内特·多伊尔和史蒂夫·纳尔逊仍有联系的共产党员——的电话。

尽管缺少必要的证据,帕什仍坚持把奥本海默与塔特洛克的关系作为武器来攻击奥本海默。6月下旬,他顺着这些线索整理了自己的思路,并向格罗夫斯将军的新助手、一位来自克利夫兰州的31岁的精明律师约翰·兰斯代尔中校提交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帕什告诉兰斯代尔,如果不立即开除奥本海默的话,奥本海默就很有可能被传讯到华盛顿并且面临着入狱的危险,因

为他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和其他相关活动。应该让他知道军方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他与共产党的一切联系,政府也绝对不会漏掉他的任何一位共产党朋友。和格罗夫斯将军一样,帕什认为,奥本海默所表现出来的野心和傲慢会使他一直处于被调查的状态。帕什还写道,官方认为对于一个目前事业成功的人,要利用他自己的前途、名誉以及忠诚来控制其个人意向。因此我认为,他要努力与政府的任何一项使他受到指控的计划合作,并服从政府的决定。

可就在那时,奥本海默与兰斯代尔见了面,与帕什不同的是,兰斯代尔欣赏并且信任奥本海默。但他同时也明白,只要奥本海默是研究计划的核心,那么政治方面的联系就会一直是一件麻烦事。在收到帕什的建议信后不久,兰斯代尔就言简意赅地用了两页纸给格罗夫斯将军写出一份总结所得证据的备忘录。

兰斯代尔仍然没有建议开除奥本海默,相反地,在 1943 年 7 月他还劝说格罗夫斯:"您应该大体地告诉奥本海默,我们知道共产党正在试图搞到一些关于'曼哈顿工程'的信息,告诉他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卷入这项活动的叛国者……而另一些却还在继续隐藏着。"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只要奥本海默还担任政府工作,他就一直被这些调查困扰着。在洛斯阿拉莫斯,他的助理兼保镖实际上是"反间谍机构的特工"。他的司机兼保镖安德鲁·沃克直接对帕什上校负责。他们监视奥本海默的信件,监听他的电话和办公室。即使在战后,他们仍然对奥本海默进行这样的监视和监听。国会的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不断地提及奥本海默过去的交往,不断地怀疑他是共产党的一员。

17 | “奥本海默在陈述事实……”

“如果我做错了事，我宁愿去死。”

——奥本海默致帕什上校

格罗夫斯将军同意了兰斯代尔中校的请求，同意留下奥本海默继续参与这项工作，但是兰斯代尔将把奥本海默拉入到他的安全网中。1943 年 7 月 20 日，格罗夫斯通知曼哈顿工程的安全部门发表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已经获得通过的评论。下面就是被提到的一部分内容：“不管你们以前是怎么得到有关奥本海默的信息，毫无疑问，他对这项工程将是至关重要的。”帕什并不是唯一对此决定表示惊讶的安全官员。当肯尼思·尼古拉斯通知奥本海默他的安全许可已经通过了，尼古拉斯还警告他说：“在以后尽量避免接触你那些有问题的朋友，你还要记住，只要一离开洛斯阿拉莫斯我们就会盯住你。”尼古拉斯表现出对奥本海默的极度不信任，不仅是因为奥本海默过去和共产党有过接触的历史，而且他认为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接见有问题的朋友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见的越多尼古拉斯就越不信任奥本海默。

即使奥本海默已经通过了安全许可，但他仍然有许多易于受到攻击的地方，比如罗西·洛马尼茨。1943 年 7 月 27 日，这位 21 岁的年轻物理学家被叫到了劳伦斯的办公室，被告知他将被提拔到放射实验室组长的位置上。但是三天后，由于帕什的调查报告，洛马尼茨收到了一封特快邮件，要求他第二天就去参加一个身体检查。他立即给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奥本海默打电话并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奥本海默在当天下午就立即写信给五角大楼说，这“是个严重的错误，洛马尼茨应该待在伯克利”。尽管有此干涉，洛马尼茨仍然被送到了部队。

几天之后，兰斯代尔去奥本海默的办公室并和他聊了很长时间，他警告奥本海默不要再帮洛马尼茨了。因为他的轻率、不谨慎是不可原谅和不容忽视的。兰斯代尔公开申明，即使是加入了放射实验室，洛马尼茨仍然会继续他的政治活动。奥本海默说："听到这些我快疯了。"他解释道，洛马尼茨答应过他从国外回来就可以为了这个工程而放弃政治活动。

后来，兰斯代尔和奥本海默进行了一次关于共产党的讨论。兰斯代尔说，作为一个军队的情报官员，他关注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政治信仰，而是防止机密信息流传到那些坏人手中。令兰斯代尔感到惊讶的是，奥本海默极其不同意他的观点，他说我只是不想那些共产党成员参与到这项工作。据兰斯代尔回忆，奥本海默解释道："人们总会对忠诚抱有疑问。"在共产党的纪律中有这样一条："要非常严肃，并且不能违背对党的忠诚。"他很清楚地对兰斯代尔说，他只是针对那些现共产党成员说的，以前的就是另外一种说法了。因为他知道这里有前共产党员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兰斯代尔的印象就是，奥本海默表现得很忠诚，而且他相信奥本海默对美国也是十分忠诚的。

但是，奥本海默事后对于这次谈话很担心。事实上，尽管有许多人的求情，洛马尼茨还是离开了实验室。忽略那些所谓的"不谨慎的"原因，奥本海默猜测，可能是因为以前埃尔滕顿曾让希瓦利埃去接近他，并且向苏联方面泄露了一些秘密信息。六个月前，他和希瓦利埃在厨房进行了一次谈话，内容主要是关于埃尔滕顿的。他们认为那个想法纯粹是无稽之谈，而现在看来却显得很重要了。奥本海默在和兰斯代尔见面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决定告诉当局埃尔滕顿的活动。

格罗夫斯将军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奥本海默第一次提起埃尔滕顿是在8月上旬或中旬。而随后奥本海默还有进一步的动作，1943年8月25日，罗伯特就有关工程的事宜去了伯克利。在这次访问中，他去了放射实验室安全官员莱尔·约翰逊的办公室，经过一个简短的关于洛马尼茨的讨论之后，他告诉约翰逊，在镇上有一个在壳牌公司工作的人活动非常积极，他说他的名字叫埃尔滕顿，并建议他应该被监视起来。他还认为埃尔滕顿可能在搜集有关放射实验室的信息。奥本海默没有更进一步说什么就走了。约翰逊中尉立刻打电话给他的上司帕什上校。帕什上校指示他让奥本海默第二天过来谈一谈，他们连夜在约翰逊的电话下安放了窃听器，并且在邻近的房间内接上了一个录音设备。

第二天，奥本海默出现在了这个所谓的重要访问的现场，当踏进约翰逊

办公室的时候他很震惊。虽然曾经听说过帕什上校，但自己还从未见过，这时他被介绍给了帕什。这三个人坐了下来，很明显是帕什自己在主持这场谈话。

当帕什开始询问他前一天和约翰逊中尉的谈话时，奥本海默打断了他的说话，并且开始讨论他早想好的有关罗西·洛马尼茨的事。他解释说，并不知道他是否可以和罗西谈话，但是他想说他确实有些轻率。

帕什打断了他的话，说他有重要的事要说。他问还有其他对放射实验室感兴趣的组织吗？

"哦，我认为有，"奥本海默回答道，"但我没有第一手资料。"紧接着他又说道："的确有个人！但我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他好像与苏联的领事有关系，他还间接地通过中间人去打听我们的信息，然后再去传递给别人。这样就没有任何泄漏、丑闻或是其他危险。"奥本海默说："他们似乎用这种办法求别人，再让这些人过来和我谈论此事。"

奥本海默说这种接触的方法不止一次。他其实并没有为这次面谈做好充分的准备，而只是期待和约翰逊中尉能更多地谈谈有关洛马尼茨的事。当突然面对帕什并且被问到一连串的问题时，他很不安，而帕什和他都很雄辩。

对于六个月前在伯克利的厨房里与希瓦利埃的谈话，他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希瓦利埃可能曾经暗示过说埃尔滕顿试图接近过三位科学家（因为埃尔滕顿后来告诉了美国联邦调查局）：除了他自己，还有劳伦斯和阿尔瓦雷茨。但是，可能在其他几次谈话中，他脑子里有过这样一个概念，即苏联应该发展新的武器技术，为什么不呢？他的许多朋友、学生和同事每天都在担心法西斯会在欧洲取得胜利。这种担心是十分有必要的，只有苏联可以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许多在这个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都不是军人，只是因为奥本海默说他们的特殊项目会给战争提供很大的物质帮助。这些人会经常讨论他们的政府是否在尽一切力量做对于战胜法西斯有益的事情。确实，奥本海默听说有很多他的同行和学生向当时受困的苏联提供帮助。毕竟曾经有段时间苏联被认为是美国英勇的盟友。

所以，现在奥本海默试图向帕什解释，说那个接近他的人想帮助苏联完全是本着一种友谊而不是合作的态度。他们对于帮助我们的同盟是本着支持的态度，所以他们对不能给苏联提供信息感到不解。正如奥本海默说的那样，那不仅仅是在走后门。现在，奥本海默公开他与格罗夫斯和约翰逊中尉的谈话：确实应该对乔治·埃尔滕顿进行监视。奥本海默说："他很可能接到

了尽一切可能搜集信息的命令。”因为埃尔滕顿曾经对他有一面之交的朋友同时也是为这个工程工作的人透露过这一点。

当帕什问奥本海默试图接近这个工程的人的名字的时候，奥本海默很礼貌地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人本身是无辜的。奥本海默说：“我只告诉你一件事，我已经知道了两三起事件，并且他们中有两个人和我一起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而且和我的联系还很密切。”这些接触和埃尔滕顿并没有关系，而是来自另一个人。奥本海默拒绝提供他的名字，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错误。他解释说，他很确定这个人本身是无辜的。他推测这个人曾经在一次会议上碰到过埃尔滕顿，并且埃尔滕顿对他说：“你可以帮助我吗？”

奥本海默并没有告诉他这个人来自伯克利校园，只是固执地拒绝发表意见，他坚持说：“我想我已经告诉你他来自哪儿了，其他的事情就纯属巧合了。”奥本海默指认出埃尔滕顿，是因为他认为他是对国家有危险的人物，但他认为哈康在这件事上是无辜的。奥本海默对帕什说：“我认为埃尔滕顿想套取信息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我认为他本身并不赞成这个做法。”

自从六个月以前与希瓦利埃谈过话后，奥本海默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很多。洛斯阿拉莫斯改变了他，他是原子弹实验室的领导，是这项工程成功与否的关键人物。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仍然自信是一位很优秀的物理学教授。他每天都在论证，使得他有许多引人注目的观点。他了解帕什的工作，但是奥本海默仍然很自信他可以决定谁是对安全的一种挑衅（比如埃尔滕顿），谁不是（比如希瓦利埃）。他甚至向帕什解释他的信条：“共产主义运动与这个秘密计划是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说这两件事情是不可能兼容的。”后来他对帕什说：“我觉得有许多杰出的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看到了某些东西，可能他们就是属于那里的，这对于国家来说也许是件好事，我希望他们不属于我们这项计划。”

从帕什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言语都是令人气愤的。埃尔滕顿和另一个匿名的人，都试着获取曼哈顿工程的信息，这可是间谍活动。然而，帕什却很有耐心地听取了奥本海默发表他自己关于安全问题的观点，后来他又把谈话的重点拉回到了埃尔滕顿和这个不知名的中介人上来。帕什解释道，对于自己来说，回到奥本海默那里并获取更多人的名字是十分必要的。奥本海默再一次解释道，他只是试着去“理智地做事”并且“为他们拉线”，为像埃尔滕顿一样的人和那些对这种接触持反对意见的人。

奥本海默很清楚地告诉帕什，作为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一名主管，他很确定一切都是百分之百地有秩序。后来他又补充道："如果我做错了什么，我宁愿去死。"

这件事情很不同寻常，后来的结果表明此事很严重：奥本海默对间谍活动有所警觉。虽然他指认了埃尔滕顿的罪名，但他认为那个不知名的中介人是无辜的，而且与这个无辜的人有过接触的科学家同样也是无辜的。他向帕什保证，他很相信自己的判断力，所以就没必要向他提供名字了。

回忆起这个，就连奥本海默自己都不知道这次的谈话已经成为奥本海默安全资料的一部分，并被记录保存了下来。因为到后来他可能会说他的报告是不准确的，只是瞎编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起源连他自己都解释不了，他不能证明是否对帕什撒过谎，或者告诉了他真相而后来又撒了谎。就好像他无形中吃了一颗定时炸弹，到它爆炸时可能已经是十年后。

在那次与帕什见面之后，兰斯代尔和格罗夫斯意识到他们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1943 年 9 月 12 日，兰斯代尔和罗伯特又进行了一次长谈。在读了对奥本海默审问的手稿后，兰斯代尔决定去触碰这种所谓间谍罪的最底线，即偷偷地录下了这次谈话。

兰斯代尔很明显就是以奉承的语气开始了这个谈话："我想说我并不是恭维你，但你确实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他又承认说，在他们前一次谈话以前他确实不赞同他，但现在说的完全是他真诚的想法。兰斯代尔又说道："自从 2 月份以来，我们就知道有几个人在向苏联方面提供有关这项工程的信息了。"他声称，苏联已经了解了这项工程的规模，知道设备位于洛斯阿拉莫斯、芝加哥和奥克里奇，并且对这项工程的时间表有了大概的了解。

奥本海默确实被这个消息惊呆了，他对兰斯代尔说："我确实还不知道这个，在以前我知道有人试图这么做，尽管我想记起那个时间，但我的确忘了。"

在这时候，兰斯代尔提到奥本海默告诉了帕什关于埃尔滕顿的事，奥本海默又一次说道，他认为不说出接触他的人的名字是正确的。

"我不想提更多人的名字了，因为之前我所说的人也并不一定都是有罪的，他们并不想以任何方式卷入这件事当中，我感觉这件事情既古怪又前后不一致。"由于某种责任感，他感觉隐藏那个中间人的名字是正确的。

兰斯代尔换了个角度，他向奥本海默索要那些曾经在伯克利实验室工作的并被奥本海默认为当时是或者曾经是共产党员的人的名字。奥本海默给

出了这些人的名字。他说在上次去伯克利的访问过程中,他知道了罗西·洛马尼茨和约瑟夫·温伯格都是共产党员,他认为一个叫简的秘书也是其中的一个成员。他还说,在洛斯阿拉莫斯他知道夏洛特·塞培尔也曾是,而他认为他的好朋友罗伯特·塞培尔有可能是,但并不确定。

"那么大卫·霍金斯呢?"兰斯代尔问道。

"我不认为他是,也不会说他是。"

"那么你自己是否曾经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不是。"

兰斯代尔则暗示道:"你曾经很有可能属于西海岸的每一个前线组织。"

奥本海默很随意地回答:"只是有可能。"

"你是否认为自己一度是个追随者?"

"我认为应该是的,并且我与这些事情的联系都是非常简单和紧密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认为我自己拥有了好多,在那里我的确很相信共产党的真理和目标。"

"我能问一下是哪个时期吗?"

"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即在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条约之前。"

"你是说在苏德协定签定之后你就与共产党断绝了联系?"

"我从没断绝,我也从没断绝过任何事情,我只是慢慢地从一个又一个组织中消失。"

当兰斯代尔再一次向他要名单时,奥本海默说:"我会把它当成一种小把戏。你想知道某人,我就会想办法不让你知道。"

兰斯代尔以一声叹息结束了这次谈话,并补充了一句:"好的,先生。"

格罗夫斯认为他自己善于识人,并且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坚定不移的忠于自己的人,那就是奥本海默。他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军方对于埃尔滕顿事件的调查,如果没有那份名单是无法取得进展的,所以最终在1943年12月格罗夫斯命令奥本海默给出应埃尔滕顿的要求充当中间人的名字。奥本海默已经下定决心,如果他们要求他这样做,他将很坦然地去应对,但他很不情愿去指认他的朋友希瓦利埃,因为他相信他的朋友是无辜的,并且与那个问题毫无瓜葛。兰斯代尔将所得的新信息与罗伯特在8月26日告诉帕什的话综合起来,于12月13日给美国联邦调查局写了封信。内容如下:"奥本海默教授已经说明了参与DSM计划(早期原子弹计划的代名词)的三名成

员曾暗示过他说,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曾被一位不知名的教授接近,并让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当被要求说出这位教授的名字时,兰斯代尔说奥本海默已经知道了希瓦利埃就是那个中间人。兰斯代尔在信中没有提到其他人的名字,可能是因为奥本海默仍然拒绝提供那三个接近希瓦利埃的人的名字,或者更有可能只是因为格罗夫斯仅仅问了他中间人的名字。令人厌烦的是,两个月后即1944年2月25日,联邦调查局又强迫格罗夫斯让奥本海默给出其他科学家的名字。因为联邦调查局是从来不会自己在历史记录中找答案的,很明显格罗夫斯不想甚至是厌烦去回答这样的问题。

这个故事还流行着另一个版本。在1944年3月5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威廉·哈维写了一篇题为《辛拉德》的备忘录。哈维写道:"在1944年3月,格罗夫斯将军和奥本海默进行了一次谈话,奥本海默最终说出了曾经和希瓦利埃接触过的人,那个人就是他的兄弟弗兰克·奥本海默。"在这个版本中,人们都以为希瓦利埃在1943年秋天接触过的是弗兰克·奥本海默而不是罗伯特。弗兰克曾经去通知罗伯特,而罗伯特立即给希瓦利埃打电话,并大骂了他一顿。

如果弗兰克被牵扯进来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将变得不一样了。但是这样一来就不只是误会了,而是很明显的错误。希瓦利埃为什么会去接近弗兰克?他俩并不熟悉更不是好朋友。不论是谁在1941年的秋天去问1942年才要开始的工程的信息,都会让人觉得荒谬。除此之外,希瓦利埃和埃尔滕顿两个人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谈话都证实了,那个在厨房的谈话是在奥本海默和希瓦利埃在1942年至1943年的冬天进行的。另外,哈维3月5日的备忘录是仅存的文件,并且其中也只是含糊地提到了弗兰克·奥本海默。通过查阅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证实了这件事情之中并不包含弗兰克·奥本海默。然而,因为哈维的报告是奥本海默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档案的一部分,所以其中的小部分还是有点价值的。

18 | “动机不明的自杀”

“我已经厌倦一切了……”

——简·塔特洛克

1944 年 1 月

在 1943 年的秋天，帕什花了两个月时间艰难地去寻找那个和奥本海默谈话有关的向苏联领事馆传递消息的人，最后无果而终。他和他的探员们反复地询问伯克利的学生和教员。帕什在他的调查中显得很固执，并且对奥本海默存有敌意，因为他让格罗夫斯觉得他是在浪费军队的资源，也在浪费时间，而最后却毫无成效。这就是格罗夫斯最终在 1943 年 12 月命令奥本海默说出联系人是希瓦利埃的原因。与此同时，格罗夫斯认为，帕什凭借自己的才能足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发展。11 月，他被任命为一个秘密行动的军方负责人，代号叫“阿尔索斯”的行动。这个行动主要是通过调查德国科学家来判定纳粹政权的原子弹计划的地位。帕什被调到了伦敦，在那儿，他可以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去准备一个主要由科学家和军人组成的更为高级的机密任务。这支队伍将跟随盟军到欧洲去。尽管帕什已经走了，但他在旧金山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朋友仍然继续在他的公寓里监听简·塔特洛克的电话。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他们还是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年轻的心理学家是奥本海默向苏联方面传递信息的中介人，但是由于位于华盛顿的联邦总部没有人去通知他们停止调查，所以他们还在继续。

在 1944 年的早些时候，也就是在假期之后，塔特洛克的心情并不怎么好。当她 1 月 3 日去看望在伯克利的父亲的时候，她的父亲发现她很沮丧。那天离开的时候，她答应第二天晚上会给他打电话，然而在星期二晚上她没打电话过来。约翰·塔特洛克试着打她的电话，但简·塔特洛克没有回复。

在星期三的早上,他又试了一次,仍没有反应,紧接着他就去了她的住所。他大约是在下午一点到的,按了门铃但没反应。这时,这位67岁的教授就只能爬窗户进去了。

在公寓里,他发现简的尸体"横躺在枕头上,并且头浸在放满水的浴缸里"。不知道为什么,塔特洛克教授并没有报警。不仅如此,他还把他女儿的尸体从浴缸里抱出来,放到了卧室里的沙发上。在厨房的桌子上,他发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遗书,在信封的背面用铅笔潦草地写了好多东西。信的内容如下:"我已经厌倦了一切,这是写给那些爱我和帮助过我的人,以及所有的爱和勇气。我想活下去,也想给予,但我在某些方面却瘫痪了,我试着去明白,但却不能。我想我这一生都很平稳,至少我可以把这个所谓的瘫痪的负担从这个让人痛苦的世界上拿掉了。"从这往下的字迹就模糊不清了。

令人震惊的是,塔特洛克开始四处翻找东西,最终他发现了简的一堆私人信件和一些私人照片。他在信中所看到的内容促使他把这些东西都烧了。当他在烧掉这些信件和照片的时候,他女儿的尸体就躺在他身边的沙发上。又过了几个小时,他首先打了殡仪馆的电话,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报了警。当他们在下午五点半和验尸官一起到来的时候,信纸仍然在盆里冒着烟。塔特洛克告诉警察,这些信件和照片是他女儿的,从他发现他女儿的尸体到现在已经过了四个半小时了。

验尸官的报告说明,死亡时间大概是在十二个小时之前,简是在1944年1月4日也就是星期二的晚上死去的。她的胃里有"许多堵塞物和一些半固体食物"。在她的屋里发现了用于精神疾病的药,还有两片安眠药。还有一个写有"可待因1/2粒"的信封,但信封里只有一些粉末。警方还发现一个贴有"盐酸消旋麻黄碱3/8粒"标签的锡盒,锡盒里有十一粒胶囊。病理学部门对她的胃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一些"巴比妥酸盐的提取物,这个提取物中有些酸性物质和少量的氯化物"。真正的死因是"由于肺部堵塞而死的",也就是说简是在浴缸里被淹死的。

1944年2月进行了一场很正式的审理,陪审团最终判定简·塔特洛克的死亡属于"动机不明的自杀"。报纸上说,从她的心理分析师西格弗里德·贝恩菲尔德那里发现了一张732.5美元的单据。贝恩菲尔德证实说:"她去找心理医生其实是自找麻烦。"事实上,她正在进行心理学方面的训练,简自费接受心理分析。如果是那段时间经常产生的压抑情绪使他自杀的话,那的确是一桩悲剧。根据不同的报告显示,她的朋友们都认为她已经到了她生命的

最高点，成就是伟大的。锡安山医院的同事们认为她是个很成功的人，并且对于她的自杀感到非常震惊。

简小时候的伙伴普里希拉·罗伯逊一听到她的死讯，就写了封信想了解情况。罗伯逊不敢相信是自身的心理崩溃而导致了她的自杀，因为她相信她从来不缺少爱，她唯一不能满足的就是无休止地创造新事物。罗伯逊推测，可能是由于中期课程给她带来了失望，从而导致悲伤过度而难以自拔。

罗伯逊和她的其他朋友都忽略了塔特洛克难于应付有关她性取向的流言蜚语。雅姬·奥本海默后来说，简曾说过她的心理分析曾揭示她有潜在的同性恋倾向。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观点，同性恋其实是一种很难控制的病症。

在简死后的某个时候，她的一个名叫伊迪丝·阿恩斯坦·詹金斯的朋友和《人民世界》的编辑梅森·罗伯逊边走边聊到了简。罗伯逊很了解简，他说简曾对他吐露说自己是个同性恋者，还说自己试着去克服对同性的兴趣，并“和任何男性过夜”。这使得詹金斯回想起了一件事：在一个周末的早晨，当她走进沙斯塔路的房子，看到了玛丽·艾伦·沃什博恩和简·塔特洛克两人坐在玛丽·艾伦的双人床上边看报纸边抽烟，这明显暗示了她俩的同性恋关系。詹金斯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简看起来十分需要沃什博恩。”她还引用了沃什博恩的那句话：“当我第一眼看到简的时候，我就被她的胸部和那美丽的脚踝深深地吸引了。”

当沃什博恩听到塔特洛克的死讯时十分伤心，这其中是有特殊原因的。她对她的一个朋友说，简在死之前一天的晚上曾让她去她家，简说自己非常沮丧。但是，那天晚上她并没有去，这就使得沃什博恩的心中充满了懊悔和罪恶感。

夺取自己的生命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总是会变成一个无法预料的谜。对于奥本海默来说，简·塔特洛克的死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对于这个年轻的女人已经投入了很多，还曾经提过要娶她，甚至在与基蒂结婚后还有这种想法。他还坚持使她当作一个在需要的时候忠诚的朋友——偶尔也是一个情人。他曾花了好多时间陪她散步，并且试着使她从悲伤当中解脱出来，但是现在她却死了，他彻底地失败了。

在自杀事件被发现的第二天，沃什博恩给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塞培尔发了电报。当罗伯特·塞培尔告诉奥本海默这个令人悲伤的消息时，奥本海默已经知道此事了，他说那时他处于极度的悲伤之中。接着，奥本海默离开了房

间,在洛斯阿拉莫斯四周的松林走了人生当中最长的一段路。当奥本海默听说简这么多年来的心理状态的时候,他感到难过、矛盾,还有一些后悔、生气、挫折和伤心,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懊悔和罪恶感。如果简变成了一个不完整的灵魂,那么他作为出现在她生命中的人怎么说也应该做点什么。

由于爱或激情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已经变成了支撑简内心的一个重要成员,但是后来他却神秘地消失了。虽然后来他也曾试着去维持这种关系,但从1943年6月以后,他明白如果想不损坏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而继续与简的关系已经不可能了,对此他很苦恼。他对深爱的妻子和孩子有一种义务,对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同事又有一种责任感。从这方面看,他做得十分明智,但是在简的眼里,是他的野心战胜了他俩的爱情。在这一点上,简可以被认为是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第一个受害者。

塔特洛克自杀的消息成为了旧金山当地报纸的头条新闻,那天早上,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旧金山的办公室给埃德加·胡佛发了封有关报纸上新闻的电报。电报的内容如下:"美国联邦调查局将不采取某些直接的行动去给予公众一些不合时宜的说法,随着时间的消逝,联邦调查局将采取隐秘的调查。"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有许多历史学家和记者还去对塔特洛克的自杀进行了调查。验尸官在她的消化系统里发现了少许的水化氯醛。如果和酒精混合的话,那么水化氯醛就会变成一种叫做"混有麻醉药的酒"中最活跃的成分,这种药物容易使人头晕和跌倒。换句话说,简可能是由于这种药物作用而滑倒在浴缸里淹死的。

和简的哥哥休·塔特洛克一样,许多调查者仍然对简的奇异死亡存有疑问。1975年在美国参议院的教堂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有关中情局的谋杀被公之于众之后,他们仍然对简的自杀存有疑问。其中一个有力的证人就是那个不负责任的鲍里斯·帕什,他不仅搭线窃听简的电话,而且还提出以俄国的方式来审问温伯格、洛马尼茨、博姆和弗里德曼,并且主张把他们的尸体抛到大海里去。

帕什从1949年到1952年在中情局主要部门的第七局工作,那是政策协调机构的一个特殊部门,也是中情局最初的秘密机构。中情局的前任官员霍华德·亨特在1975年12月26日告诉《纽约时报》,在1950年他被上司告知,鲍里斯·帕什主管的特殊行动小组被指控对两个疑似双重间谍的特工和一些低级官员的刺杀负责。

帕什否认这件事,但是参议院的调查表明,帕什的人员确实要为刺杀和绑架负责,这都是写在文件里的。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他在中情局技术服务部门工作的时候,帕什就曾卷入试图将一些有毒的雪茄输送给菲德尔·卡斯特罗。

很明显,这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老军人转为了一位反间谍机构官员,鲍里斯·帕什掌握着冷战时期所有必需的间谍谋杀案的凭证。但是,尽管他有着"丰富多彩的"简历,却没有人能证明他与塔特洛克的死有什么联系。事实上,到1944年1月,帕什已经去了伦敦,简的未署名的遗书暗示了她是自杀的。她已经是一个"瘫痪的灵魂"了,这也是奥本海默一直所确信的。

19 | “你愿意收养她吗?”

“在洛斯阿拉莫斯,我发现了雅典精神、柏拉图精神以及理想共和精神。”

——詹姆斯·塔克

洛斯阿拉莫斯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里几乎没有人超过50岁,人们的平均年龄在25岁左右。伯妮斯·布罗德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这里没有病残者,没有姻亲,没有无业者,没有游手好闲的富人,也没有穷人。”每个人的驾照上面有编号但没有名字,地址写的是统一的邮政信箱1663号。在带刺铁丝网的包围中,在美国军队支持和保护下,洛斯阿拉莫斯变成了科学家们的社区。鲁思·马沙克回忆了初到时的感觉:“就像有一扇大门在我们身后关闭,这个世界上的朋友和家庭对我来说都不再真实。”

1943年到1944年的那个冬天,雪来得早去得迟。一个在此长住的居民写道:“只有普韦布洛最年长的人才能记得大雪在地上存留了多长时间。”当大雪最终融化时,湿漉漉的大地上开满了淡紫色的百合和其他的野花。春夏时节傍晚的时候,都会有猛烈的雷暴来冷却大地。成群的蓝色知更鸟、灯心草雀和红眼雀栖息在洛斯阿拉莫斯绿色的三叶杨上。“我们学会了在桑格里山上观雪景,在水谷中寻鹿。”菲利浦·莫里森用能够反映很多居民对大地的情感眷恋的抒情诗体写道。

洛斯阿拉莫斯是一个军营,但它有许多特色鲜明的山景。来这儿之前,罗伯特·威尔逊刚刚读完了托马斯·曼的《魔山》。他现在有时会感觉自己正在被送到那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洛斯阿拉莫斯的居民便形成了一种社区的概念,

而且许多已婚妇女都信任奥本海默。在初期,在民主参与的基础上,奥本海默任命了一个城镇委员会。后来,委员会成为了一个选举产生的机构,虽然没有正式权力,但会定期举行会议协助奥本海默满足社区的需求。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方法,奥本海默让人们感觉到他理解并感激人们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尽管缺少隐私,生活条件很艰苦,水、牛奶和电也不能得到补给,他却能用独有的带有诙谐的热忱来感染人们。"在这里,人们的情绪都很抓狂,"奥本海默有一天对伯妮斯·布罗德说,"你应当和他们和睦相处。"(布罗德一家人住在西里尔、艾丽丝·史密斯和特勒夫妇所住公寓的上一层。)当地剧院还上演了《毒药和老妇》。当奥本海默脸涂白粉,像一具僵尸一样和约瑟夫·凯塞林的喜剧里的其他受害者一起被抬到舞台上面时,人们着实吃了一惊,不过却很愉快。

在家里,奥本海默是个厨师。他对像米饭这样具有异域风味的热盘相当偏爱。但他的一套常备晚餐是牛排、鲜芦笋、土豆配上姜汁或马提尼酒。1943 年 4 月 22 日,他在台地上举办了第一个大型聚会来庆祝他的 39 岁生日。尽管缺少食物,但他仍然提供给客人们极品马提尼酒和精选美食。"酒会让你极度爽快,"路易斯·亨佩尔曼回忆道,"即使是最冷静的人比如拉比也感觉不到任何痛苦了,每个人都翩翩起舞。"奥本海默僵硬地伸出双臂用他特有的舞姿跳起了狐步舞。

作为主管的妻子,基蒂却拒绝扮演其社会角色。"基蒂固执地穿上牛仔裤和布鲁克斯兄弟牌的衬衫。"一位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回忆道。刚开始,她是在研究辐射对健康伤害的亨佩尔曼博士的手下做实验室的兼职技术员。"她极其专横。"他回忆说。她只是偶尔会邀请伯克利的朋友们共进晚餐,但很少举办户外聚会。奥本海默鼓励每个人努力工作和尽情玩乐。"星期六我们尽情狂欢,"伯妮斯·布罗德写道,"星期天我们旅游,但其他的时间我们工作。"

星期六晚上,集会处总是挤满了跳舞的人。男人们身穿牛仔裤、牛仔靴和各种颜色的衬衫,女人们则穿带褶皱的长衬裙。单身汉们自然会举办最嘈杂的聚会,冰镇罐装白酒和柚子汁的混合物会把这些聚会搞得火热。

有些物理学家偶尔会表演钢琴或小提琴独奏。奥本海默会为这些周六晚上的活动盛装打扮,穿上粗花呢制套装,他无疑是引人注目的焦点。"如果你参加一个大型舞会,"多萝西·麦克宾回忆道,"如果你仔细观察,人们大多是围着奥本海默转。他在聚会上表现出众,女人们都喜欢他。"

在星期天,许多人在附近的山上登山或野餐,或租借马匹在洛斯阿拉莫斯牧场学校的旧地上徘徊徜徉。奥本海默骑着自己的"齐科"——一匹14岁的漂亮栗子色的马——从镇子东边沿往常路线走到西边的山间小路上。奥本海默能让齐科这个"快步子"在最坎坷的路上疾奔。他沿路挥动着馅饼状的帽子,问候每一个遇见的人。基蒂也是一位优秀的欧式女骑手。起初,她骑的是一匹阿尔伯克基的标准赛马,后来她换骑了一匹良种马。通常情况下,一个武装警卫总是陪伴在他们四周。

奥本海默驭马和登山的耐力令他的同伴都很吃惊。"他看起来弱不禁风,"亨佩尔曼博士回忆道,"当然,他看起来总是很瘦弱。实际上他的强壮却令人惊奇。"1944年的夏天,他和亨佩尔曼一起骑马穿过克里斯托山去他的佩罗卡连特牧场。"这差点累死我,"亨佩尔曼说,"他舒展地骑着'快步子',而我的马却要跑特别快才能赶得上。我想我们第一天行进了三十到三十五英里,我都要死了。"虽然很少生病,奥本海默却因一天抽四五包烟而饱受咳嗽的折磨。"我想他总是拿着一根烟,"他的一位秘书说,"当他在连续吸烟的间隙时,他便控制不住由持续不断的咳嗽所引起的身体痉挛,在边讲话边咳嗽时他甚至会面红耳赤。在庆祝调制成功马提尼酒时,他会一直用单一的姿势吸烟。当大多数男人用食指弹掉烟灰时,他却有特殊的癖好——用小拇指在烟前端弹烟灰。"

在这片台地上的生活虽说不上奢侈,但也很舒适了。士兵们把砍好的柴堆积起来以备厨房和壁炉之用,他们还收集垃圾,用煤填炉子。军队每天把附近的印第安女人从普韦布洛送来做女管家。她们穿着鹿皮靴和戴着各种颜色的围巾,戴着绿宝石和银质珠宝,很快便成为镇子里面一道道熟悉的靓丽风景。

洛斯阿拉莫斯的男女比例总是极其不平衡,所以军队自然不能成功地将单身男女分开。当军队下令关闭其中一间女士宿舍并遣散里面的女人时,实验室最年轻的领导罗伯特·威尔逊正是城镇委员会的主席。一群哭哭啼啼的女人在一群坚决的男人支持下,出现在委员会前控诉这个决定。威尔逊后来回忆起当时发生的事情时说:"女人们一直从事着有偿满足男士需求的生意。军方开始时尚能对此表示理解,但当疾病开始蔓延的时候,军方就介入了。"在这起事件中,城镇委员会判决从事那种交易的女人是极少数,并采取了健康措施让这个宿舍继续开放。

当大多数洛斯阿拉莫斯的夫妻逐渐适应了这片台地荒凉的天气、孤独的生活和单调的节奏时，基蒂却愈加感到自己掉进了圈套。她拼命地想得到她丈夫在洛斯阿拉莫斯应得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有抱负成为植物学家的聪明女人，她感到自己被巧妙地阻止了。为亨佩尔曼做了一年的血细胞计数后她辞职了。她同时感到自己与社会隔绝了。如果情绪好，她会招人喜欢，对朋友和陌生人都很亲切，但每个人都感到她情绪反差太大。她经常看起来很紧张，不高兴。在聚会上，她能够闲聊，正如她一位朋友说："她喜欢讲大话。"

奥本海默的秘书普里希拉·达菲尔德有很好的条件来观察基蒂。"她敏感睿智，是个重要人物。"达菲尔德回忆道。但她认为基蒂很难相处。基蒂的一位邻居帕特·谢尔——另一位物理学家的妻子——感到被基蒂的强烈个性所压抑。"她看起来很高兴，散发出温暖的气息，"谢尔回忆道，"我后来觉察到这不是对人们的真正温情，部分原因是害怕失去人们的关注与友情。"

基蒂开始像罗伯特一样给人们大量地送礼物。有一天，谢尔抱怨她屋里的煤炉，基蒂就送给她一个老电炉。"她想给我礼物，并坚决地把东西塞给我。"谢尔说。其他的女人发现她的行为近乎于侮辱，而且很多男人也这样想，尽管基蒂看起来喜欢这样一群男人。"她也被其中一些所谓的好男人骂作婊子。"达菲尔德回忆道。但达菲尔德也非常清楚她的老板很器重基蒂，向她咨询各种事情。"他听从她的判断，但对别人的建议他会选择性地问一问。"她说。基蒂从不打扰她的丈夫，一位密友回忆道："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1945 年初，普里希拉·达菲尔德有了孩子，因此奥本海默需要一位新秘书。格罗夫斯先后给他提供了几位经验丰富的秘书，他都拒绝了。直到有一天，他告诉格罗夫斯他想要安妮·T. 威尔逊。这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可爱女孩。安妮是他在华盛顿格罗夫斯的办公室里碰到的。"他（奥本海默）在我的办公桌前停下脚步——将军的正门口外面——我们进行交谈，"安妮这样说奥本海默，"我几乎吓呆了，因为这就是传说中的人物。传言说几乎所有女人都会被他的魅力所倾倒。"

安妮很爽快地同意搬去洛斯阿拉莫斯。但是，在她走之前，格罗夫斯的反间谍机构主任约翰·兰斯代尔带着酬劳去找她：如果她每月用一封信报告她在奥本海默办公室的见闻，他将付她两百美元。安妮吃了一惊，但平静地

拒绝了他。“我告诉他,”她后来说,“兰斯代尔,我要你假装从未向我提过这件事。”

刚到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安妮·威尔逊了解到奥本海默得水痘卧床不起,发烧到四十度。“我们单薄的苦修者般的主管,”另一位物理学家的妻子写道,“看起来像15世纪的圣徒,红扑扑的脸上有未修剪完美的胡子,还有一双因发烧而深陷的眼睛。”不久他便康复了,并邀请安妮去他家喝酒。她的主管给她提供了各式各样的马提尼酒。她不适应这里的海拔,加上混合酒精的强度令她头晕。后来安妮只记得自己被护送进了她在护士区的房间里。

安妮被她的极富魅力的领导所吸引,非常尊重他,但20岁的她并没有迷恋上这个在1945年年龄是她两倍的已婚男人。安妮依旧美丽动人,富有女性气息。她到达几周后,就开始收到了瓶装的单支玫瑰。这些玫瑰是每隔三天从圣达菲送来的,可是这些神秘的玫瑰没有带卡片。“我很为难,所以用显得幼稚的方式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谁会送我如此美丽的玫瑰呢?但是我从未去刨根问底。最后,一个人告诉我,‘只有一个人会这么做,他就是罗伯特。’我说,这太荒唐了。”

像在任何小镇上会发生的一样,流言很快就传播开来,说奥本海默和安妮有一腿。她说,没有这回事,“我得告诉你,我太年轻,不会看上他。我认为40岁的男人便成为古董了”。不可避免地,基蒂也听说了谣言。有一天,她和安妮正面交锋了,并要求她坦白讲是不是给罗伯特设下了圈套,安妮如五雷轰顶。“她不会没看出来我的惊讶。”安妮回忆道。

第二年安妮结婚了,基蒂于是也放心了。这两个女人发展出了长久的友谊。如果安妮对罗伯特有吸引力,那么匿名单支玫瑰只是一个微妙的表示,是出自他的个性,他不是那种性占有欲很强的人。正如安妮自己观察的一样,女人们被他吸引。“他确实是大众情人,”安妮说,“我耳闻目睹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但同时,当事者(奥本海默)却依然容易害羞,基于某些天真的考虑。“他有非常丰富的感情投入,”安妮说,“我想这便是他为什么吸引女人的原因。我是说,我感觉他几乎能读懂她们的思想——很多女人都这样对我说。洛斯阿拉莫斯的孕妇们说,‘人们最想了解的是罗伯特’,他拥有对人们几近于神圣的情感。”如果他被别的女人吸引了,他依然会顾及他的家庭。“他们太亲近了,”亨佩尔曼评价基蒂和罗伯特,“无论多晚,只要可能他都会回家。我想,她以他为傲,但是我认为她更想成为中心人物。”

安全网覆盖了罗伯特，当然也覆盖了他的妻子。很快，基蒂就发现兰斯代尔经常温和地盘问她。作为一位资深的能够深入人心的访谈者，兰斯代尔很快就发现基蒂能够提供给他关于她丈夫的深入看法。“她的背景不好，”他后来证实说，“因为那个原因，我尽可能地找机会和奥本海默夫人谈话。”当她给他提供马提尼酒时，他从侧面观察到她不是给客人上茶的人。“奥本海默夫人给我的印象是很遵守惯例的强悍女人。我能看出来她是那种从前当过共产党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必须是一个很坚强的人。”经过这种旁敲侧击的谈话，兰斯代尔意识到基蒂最终是忠于她丈夫的。他还意识到，虽然她的举止礼貌端庄，但她就是恨他和他所代表的方面。

这种散漫的调查变成了跳舞。“就像我隐含提到的那样，”兰斯代尔后来说，“她正试图把我套住，就像我想把她套住一样……”

“我确信她曾是共产党员，但不肯定她的意识形态有多大变化。她不在乎我对她在嫁给奥本海默之前的事情了解多少，或者我是怎么看的。慢慢地，我感觉到她过去的事和她另一个丈夫对她的意义是不能和奥本海默相提并论的。我开始确信在她眼里，自己丈夫的未来比共产主义更重要。她试图让我相信他就是她的生命。她欺骗了我。”后来，兰斯代尔向格罗夫斯报告他的结论：“奥本海默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她坚定的意志产生一种强大的影响力，让奥本海默避免成为我们所认为的危险分子。”

在带刺的铁丝网里，基蒂有时感觉像是生活在显微镜下。仅有一辆定量配送车从外面给军需商店运送食物和货物。剧院每星期放映两部电影，每场仅收十五美分。在这里看病是免费的，所以许多年轻人生孩子——第一年的记录是出生了八个孩子，随后每月有十个孩子出生——这个只有七间房的小医院门口写着“乡村免费接送”。当格罗夫斯将军抱怨所有新生婴儿时，奥本海默苦笑地说，科学主管的任务不包括控制人口。奥本海默说得对。那时，基蒂又一次怀孕了。1944 年 12 月 7 日，她在洛斯阿拉莫斯军营医院生下了凯瑟琳，他们给她起的昵称叫“泰克”。奥本海默对着婴儿床打着手势，因为人们结群成队来看这个主管的新生女儿。

四个月后，基蒂说她得回家看望父母。这时基蒂因为产后抑郁，或是奥本海默家里过多的马提尼酒，或是不满她们的婚姻状况，而正处在感情崩溃的边缘。“基蒂已经开始崩溃了，她喝了很多酒。”谢尔回忆说。基蒂和罗伯特在她们 3 岁儿子身上起了点争执。像所有幼儿一样，皮特长得很漂亮。依

谢尔看，基蒂对皮特极其没有耐心。作为受过培训的心理学家，谢尔认为基蒂对孩子没有感觉，基蒂总是变化无常。基蒂的妯娌雅姬·奥本海默也注意到，基蒂要去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甚至去西海岸购物，却把孩子们留给用人来照顾。当她回来后，她会带大量的礼物给皮特。“她肯定感到罪恶和不高兴，”雅姬说，“这个可怜的女人！”

1945年4月，基蒂带皮特去了匹兹堡，但她却把四个月大的女儿留给最近流产的朋友谢尔——洛斯阿拉莫斯的儿科医生亨利·巴尼特建议最好让谢尔照顾一个孩子，因此泰克——后来他们称她托尼——就被放到谢尔家。基蒂和小皮特去了三个月，到1945年7月才回来。罗伯特工作时间很长，所以他每两周才去看一次他的女儿。

这两年不可思议的紧张生活给他造成了一些伤害。身高五英尺十英寸的他看起来已经是皮包骨头了，虽然他的热情未减，但他确实看起来一天比一天消瘦了，而对他心理上的伤害是残酷的。罗伯特竭尽一生在缓解精神压力，泰克的出生和基蒂的离开都让他变得易受伤害。“这非常奇怪，”谢尔回忆道，“他会过来坐坐聊聊，但他不会要求看孩子。或许只有上帝知道她在哪儿，他从不要求去见她。”

“终于有一天，我对他说，‘你不想看看你的女儿吗？她长得很漂亮。’”他说：“好，好的。”

两个月过后，罗伯特在一次探访中对谢尔说：“看起来，你越来越喜欢泰克了。”谢尔如实说：“是的，我喜爱孩子们。当你在看孩子的时候，不管她是不是你的，她都会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当奥本海默问她，“你愿意收养她吗？”谢尔感到很惊讶。“当然不会啊，”她回答，“她有很好的父母啊。”当她问他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时，罗伯特回答：“因为我不能给她关爱。”

谢尔开导他，这种感觉在一位父亲离开孩子一段时间再接触她时很正常。

“不，我不是那种类型的人。”奥本海默说。当谢尔问他是否和基蒂讨论过这件事时，罗伯特说：“没有，没有，没有。我第一个想到的人是你，因为我想让孩子有一个温馨充满爱意的家庭很重要，而这些你可以做到。”

谢尔在那次谈话中很尴尬，惴惴不安。这些荒诞怪异都是因人的原始感情而产生的。“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人，因为他能够向我坦白这些

……现在这里有一个感情很敏感的人——同时感到他这种感情很是罪恶——想以某种方式或其他办法给孩子一些他所不能给予的东西。”

当基蒂最终在1945年7月回到洛斯阿拉莫斯时,她给谢尔带了许多礼物。基蒂发现洛斯阿拉莫斯处在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男人们工作时间很长,他们的妻子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因此基蒂每天通常会邀请一小群女人来喝鸡尾酒。雅姬在1945年参观洛斯阿拉莫斯时回忆起这样一件事。“大家都知道我们相处得不太好,”雅姬说,“她似乎决定和我见面。有一次,她邀请我去喝鸡尾酒。那是下午四点钟,当我到达时,那里只有基蒂和四五个女人正在喝香槟。我们只是坐在那里进行琐碎的谈话,喝酒。这很枯燥,后来我再也没有去过。”

那时,谢尔并不认为基蒂酗酒。“她有时喝酒,”谢尔回忆道,“从下午四点开始她就一直喝酒,但她并不是喝得很快。”基蒂的饮酒在她以后的人生里将成为一种麻烦,但据另一位密友亨佩尔曼说:“她肯定不比洛斯阿拉莫斯的其他人喝得多。”酒精在这片台地上自由地流淌,随时间一起流过,有些人在这个孤独的小镇上感到压抑。“起初,这里有很多快乐,”亨佩尔曼回忆道,“但当事情都枯燥乏味了,每个人都感到疲惫紧张,容易发脾气,情况就很糟糕了。”每个人都像生活在他人的钱包里。

除了下午定期在圣达菲散步,另一项被允许离开洛斯阿拉莫斯的事情就是在伊迪丝·华纳女士的土砖房里共进晚餐——这个地方能听到二十英里以外的里奥格兰德河哗哗的流水声。奥本海默第一次遇见华纳女士是在他、弗兰克和雅姬从弗里约斯峡谷集体旅游回来的时候。当时有一匹马跑掉了,奥本海默追了出去,他最终来到了华纳女士的茶社。华纳女士是费城的一名公务员的女儿。她30岁时遭受了一次精神创伤,后于1922年第一次来到这里。她是和一个名叫阿蒂拉诺·蒙托亚的当地土著老人一起来的,这个人非常熟悉普韦布洛。她经营了一家茶社为游客服务,生活单调到了极点。

奥本海默搬到台地上不久的一天晚上,他带着格罗夫斯将军一起去奥特韦桥的茶社喝茶。当时因为牧场学校的关闭及战时煤气强制性定量供应而影响了游客的交通,伊迪丝语气和缓地承认,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支平衡。当他们品着茶时,格罗夫斯给她一个向山上提供所有食品的机会。这是一个利润丰厚的买卖。伊迪丝说她会考虑这个想法。当他们离去时,罗伯特送格罗夫斯到他们的车上,然后他回来敲伊迪丝的房门。他站在门口,手里

拿着帽子,月光照在他的脸上。他告诉伊迪丝说:"不要做这个买卖。"然后他立即转身,走回到他的车里。

几天后,奥本海默再次出现在华纳女士的门前,建议她每周举办三次十人以内的聚会晚餐,向山上的科学家们提供消遣娱乐活动。奥本海默解释道,她将会对战争的胜利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格罗夫斯将军同意了他的建议,伊迪丝自己则把这个看作上帝的恩赐。

"在4月里,"华纳在年终写道,"一群神秘人物每个星期会从洛斯阿拉莫斯下来吃晚餐,还有很多人随后而来。"做了一天饭后,华纳女士穿着一身简单的衬衣式连衣裙和印第安软拖鞋。每个人都坐在位于餐厅正中央的手工木质长桌旁。这个餐厅的墙壁粉刷成了白色,低矮的横梁由手工砍制而成。51岁的华纳女士做分量很足的家常菜给这些"饥饿的科学家们"吃。他们在烛光旁用印第安人的黑陶盘子和碗吃炖羊肉。这些盘和碗都是由当地陶工玛丽亚·马丁内斯手工制作的。饭后,她的客人们依偎在篝火旁取暖,他们要再喝很长时间的酒才会回台地上去。华纳女士向客人每人收取两美元作为此晚烛光晚宴的费用。她只知道这些人是为某个非常秘密的项目工作。圣达菲人称之为"水下基地"——这是个很好的猜测。

1944年初的一天,奥本海默带着丹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尼尔斯·玻尔来到茶社,向华纳女士介绍说这是尼古拉斯·贝克先生——奥本海默自作主张给玻尔起的化名。每个人都称呼这位温文尔雅、谦虚的丹麦人"尼克叔叔"。华纳女士对玻尔和奥本海默都有近乎神奇的评论:"玻尔静水流深,有很深邃的思想——罗伯特和他一样。"

玻尔当然不是华纳唯一能记住的来吃晚饭的人,但只有奥本海默的照片被她收藏在费城的梳妆台里。菲利浦·莫里森在1945年末替奥本海默写了一封感谢信:"华纳女士,你在我们生活中并非昙花一现。在你那里的夜晚,我们傍着河流,我们有典雅的餐桌。在精心点燃的篝火前,你给我们一些鼓励让我们感到自由自在。我们将不会忘记……我很高兴在我们峡谷下面有这样一座房子,在这里,玻尔的精神深入人心。"

20 | “玻尔是上帝，而奥本海默是他的先知”

“美国人不需要我帮助他们制造原子弹。”

——尼尔斯·玻尔

原子弹“竞赛”或多或少已经成为一种现实。1919 年，一些科学家（几乎全部是欧洲逃难者）很害怕他们在德国的前同事会率先把核裂变应用到军事领域。他们向美国政府警告了这种危险。政府支持他们，并开展了小型核试验项目。科学委员会做研究并写了报告。但是直到德国发现核裂变两年后，即 1941 年春天，两位在英国工作的德籍物理学家奥托·弗里希和鲁道夫·派尔斯才指出，一枚有效的原子弹可以在战争中被很快制造出来。从那时起，跟美英加联合原子弹项目有联系的人都投身到这场致命的竞赛中。直至 1943 年 12 月，大家都很关注核武装世界的战后影响。就在这时，尼尔斯·玻尔抵达了洛斯阿拉莫斯。

奥本海默非常高兴能得到玻尔的帮助。这位 57 岁的丹麦物理学家于 1943 年 9 月 29 日晚从哥本哈根的码头偷渡出国。他一安全抵达瑞典海岸就被带到斯德哥尔摩，在那里，德国有关部门正密谋对他实施谋杀。10 月 5 日，英国的营救队员送他上了一架没有标记的英国“蚊子”轰炸机。他在这次危险旅程中幸存下来，并到达了苏格兰。他说他还愉快地睡了一觉。他的好友兼同事詹姆斯·查德威克在机场跑道上欢迎他，带他去伦敦并向他提供英美原子弹计划的信息。玻尔自 1939 年就明白核裂变的发现将使原子弹的制造变为现实，但他深信铀—235 的分离所需要的工业投入是巨大且不现实的。现在，他知道美国人把大量工业人才运用到这一目的上。奥本海默后来写道：“这对玻尔来说完全是个幻想。”

到伦敦一个星期后，玻尔与后来荣获诺贝尔奖的杰出物理学家、他21岁的儿子奥格一起工作。在此后的七个星期里，父子俩全面研判了“试管合金”项目——英国原子弹计划的代号。玻尔同意成为英国的顾问，英国同意送他去美国。12月初，父子俩登上驶往纽约的轮船。

格罗夫斯将军对玻尔的到来很不满，但是考虑到他在物理学界的声誉，他还是很不情愿地批准他去参观新墨西哥沙漠里的神秘“Y”地。

有情报报告说，玻尔是一个很难控制的危险人物，格罗夫斯因此才很不高兴。1943年10月9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位丹麦物理学家已经抵达伦敦，并会承担“有关原子弹爆炸的研究计划”。格罗夫斯极其愤怒，但他还不得不去容忍他。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没有胜算的任务，因为玻尔是管不住的。在丹麦，他会随意走到宫殿门口敲国王的门。在华盛顿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比如他拜访英国大使哈里法克斯和最高法院法官、罗斯福的密友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他带去的信息很明确：制造原子弹已成定局，但是评估它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他最害怕的是，原子弹的研发会激起西方和苏联致命的核武器竞赛。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他坚持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苏联人知道原子弹的存在，并强调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

这个观点理所当然地让格罗夫斯毛骨悚然。他迫不及待地想把玻尔送往洛斯阿拉莫斯，以便把这个多嘴的科学家隔离起来。为确保玻尔不会出现问题，格罗夫斯与他们父子俩一同从芝加哥乘火车出发。格罗夫斯的科学顾问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理查德·托尔曼也与他们同行。格罗夫斯和托尔曼轮流监视他，不让他因需要观光而走出包厢。一个小时后，筋疲力尽的托尔曼对格罗夫斯说：“将军，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不干了。你是军人，应该由你来监视他。”

于是，当格罗夫斯听到玻尔小声嘀咕抱怨时，就会时常打断他，并向他解释坐在包厢里的重要性。两年多以前，即1941年的9月，玻尔与他以前的学生、主管德国原子弹项目的德国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见过面。格罗夫斯向玻尔询问德国原子弹项目的进展情况——但他当然不想玻尔拿这个与别人谈论。“我和他直接谈了十二个小时，告诉他哪些不能说。”

他们在1943年12月30日到达洛斯阿拉莫斯，便立刻参加了奥本海默为称赞其巨大的声誉而举办的小型招待会。格罗夫斯后来抱怨说：“到后不足五分钟，玻尔就把他承诺不说的话说出来了。”玻尔问奥本海默的第一个问题是：“它足够大吗？”换句话说，这个武器足够强大到令未来战争不可预测吗？

奥本海默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到创建和运行新实验室的细节管理上，但在随后一段时间里，玻尔很想知道奥本海默关于原子弹对战后影响的想法。玻尔后来说："这才是我来到美国的原因，因为美国人不需要我帮助他们制造原子弹。"

那晚，玻尔告诉奥本海默说，海森堡正富有激情地研究核反应堆。它可以在一系列反应后制造出巨大的爆炸。奥本海默在第二天即 1943 年的最后一天开会讨论玻尔的想法。

玻尔描述了他的得意门生获得纳粹政府的特许在德占哥本哈根开会的情况。海森堡虽不是纳粹成员，但他却是选择留在纳粹德国的所谓爱国人士，他无疑是德国最有声望的物理学家。如果德国有一个原子弹项目，那么海森堡无疑会是项目领导人的候选人。他一到达哥本哈根便去找了玻尔。两位老友的话漫长且令人费解。海森堡后来说，他已经隐讳地提到了铀的问题，并试图警告他的老朋友，一旦核裂变武器在理论上变为可能，它就"需要可怕的技术支持"。他希望这不要在战争中变为现实。他出于纳粹的监视和对自己生命的考虑而不得不隐晦地表示，他和德国的其他物理学家想要说服纳粹政府不要将这样的武器运用在战场上。

但由于这是海森堡的话，玻尔并没有轻信。他听丹麦同行说，这位德国最重要的物理学家表示过一个核裂变武器确实会变为现实，如果继续发展，将会在战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玻尔对此很警觉，同时也很生气。玻尔结束了他们的谈话。后来，玻尔说他自己不是非常确定海森堡的话有何意图。

玻尔和海森堡之间的谈话存在极大的冲突。奥本海默后来模棱两可地写道，玻尔有这样的印象：他们（海森堡和他的同事卡尔·弗里德里希·魏茨泽克）来的目的不是谈论他们的认识，而是想知道玻尔是否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我想这是一盘和局。

然而，有一件事情很明显，玻尔摆脱了德国人利用原子弹结束战争的巨大恐惧。在新墨西哥州，他把这种恐惧传递给奥本海默和科学家队伍。玻尔不仅告诉他们海森堡已经肯定了德国拥有原子弹计划，还展示了一幅图。这幅图是一个由海森堡辅助绘制的原子弹。所有人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核反应堆而不是一个炸弹。"我的天，"贝特看到这幅图片时说，"德国人打算向伦敦扔一个核反应堆。"谈论了这个问题之后，玻尔也相信了这个"炸弹"将会失败。第二天，奥本海默在给格罗夫斯的信中写道，一个可爆炸的核反应堆事实上"是一个没用的武器"。

奥本海默曾经说:"像历史展示的那样,即使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不一定明白玻尔真正在说什么。"跟玻尔一样,奥本海默也不是一个直接的、简单的人。在洛斯阿拉莫斯,这两个人看起来有时跟对方开玩笑。"玻尔在洛斯阿拉莫斯表现得很出色,"奥本海默后来写道,"他对技术专业很感兴趣,但是我认为他对我们所有人的作用不仅限于此。"奥本海默解释说,玻尔"最神秘的作用"是推动政治因素——使科学像国际关系一样公开化,并使美国在战后核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这是奥本海默想听到的信息,因为他担负复杂的管理任务已经有两年时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已经更像一位科学的管理者,而不是理论物理学家。这个转变因不能使他发挥聪明才智而令其窒息难受。所以,当玻尔在台地上用深邃的哲学术语讲述这个项目对人类的影响时,奥本海默感到重获青春了。他使格罗夫斯相信,玻尔的话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奥本海默后来写道,直到那时,这项工作"经常看起来是如此令人毛骨悚然"。当有许多工作误入歧途时,玻尔能很快让这个工程变得生机勃勃,充满希望。他用轻蔑的语气说,希特勒轻视了科学家的作用,导致了他的失败。"我们都相信,将各类科学结合在一起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维克托·韦斯科普夫回忆玻尔曾这样对他说:"原子弹是个很可怕的东西,但它可以作为'希望支柱'。"初春时节,玻尔试图把他的想法记录下来,起草并修订成一份备忘录和奥本海默一起分享。1944 年 4 月 2 日,他写了一份包含几个基本观点的建议草案。不管事情会怎样发展,玻尔始终坚持道:"我们处在科学与技术的高峰已无可争议,同时它将会决定性地影响人类的未来。"在最近的一个阶段,"一种不平衡权力的武器将被创造出来,并将完全改变未来战争的条件"。这是个好消息,也是个坏消息。坏消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除非在可行的时间内能切实达成控制使用这种新型武器的协议,否则任何一方的优势,即使是暂时的优势,都会成为对人类安全造成深远影响的沉重负担。"

在玻尔看来,原子弹的制造已经成为现实。在将要到来的原子时代,人类除非放弃发展这个秘密计划,否则人类将不再安全。玻尔构想的"开放世界"并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这个新世界存在于各国科学界的交流之中。基于一种务实的想法,玻尔相信在哥本哈根、卡文迪许和其他地方的实验室对新世界来说是个实用的模式。只有在拥有科学价值的"开放世界"里,国际社会控制原子能的设想才能实现。在玻尔看来,交流性的科学研究能带来进

步、理性,甚至和平。战后,只有在国际监督者能够获知有关军事和工业新发现的完整信息的情况下,身处"开放世界"的每个国家才能庆幸任何潜在的敌国都没有发展核武器。

最后,玻尔总结说,如此宏大的具有国际控制功能的新管理体制,只有在大战结束后通过迅速邀请苏联参与到战后核能计划中才能建立起来。玻尔认为,如果斯大林知晓曼哈顿工程并确信这不会威胁苏联,那么战后核军备竞赛就能避免。战时盟国提早对战后国际控制核能签署协定,才能避免战后建立一个核武器装备的世界。奥本海默同意他的观点。就在前一年的8月,当奥本海默告诉帕什上校,他对建言总统通知苏联人这个制造原子弹的计划"感觉是友好的"时候,他就震惊了所有的安全官员。

玻尔对奥本海默的影响显而易见。"(他)在回来的路上认识了玻尔,他们的个人关系非常亲近,"韦斯科普夫说,"玻尔是唯一能和奥本海默讨论这些政治和伦理道德的人。或许就在那时(1944年初)他开始严肃考虑这个问题了。那年冬季的一个下午,奥本海默把霍金斯召进他的办公室,打开秘密文件柜的一扇门,让他读一封玻尔写给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信。奥本海默显然存了很多这样珍贵的文件。霍金斯认为:"这暗示罗斯福已经完全明白了。这里面包含许多快乐和乐观态度……这很有趣。我们在洛斯阿拉莫斯剩下的时间里都以为总统已经理解此事了。"

奥本海默是如此尊敬玻尔,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经常承担起向其他人解释玻尔想法的责任。那些没有理解玻尔"开放世界"的意思的人经常受到玻尔有意图的警告。1944年初春,玻尔收到一封积压已久的来自他以前的学生、苏联物理学家皮特·卡皮察的信。卡皮察从莫斯科写信盛情邀请玻尔来这里定居,他说:"这里已经为您和您的家人准备好了包括进行科学研究的一切。"玻尔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事实上,他希望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他接受卡皮察的邀请。

在玻尔看来,秘密很危险。玻尔了解卡皮察和其他苏联物理学家,他认为他们完全能够掌握核裂变的军事影响。事实上,从卡皮察的信中他看出苏联已经知道英美原子弹计划的一些事情。他想,如果苏联认为新武器的研发没有他们参与,这就会成为危险的嫌疑。其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物理学家也同意他的观点。罗伯特·威尔逊后来回忆说,人们曾向奥本海默"指出",为什么洛斯阿拉莫斯只有英国物理学家而没有苏联科学家。威尔逊说:"在我

看来,为一些非常不快的感觉做些补偿是完全必要的。”战争结束前夕,奥本海默同意这个观点,但在战争中他却是慎重的。因为他知道自己长期处在监视之下,所以他首先避免参与到这种谈话中去。他不会回答,或者直接说这不是科学家能决定的事。“我不知道,”威尔逊后来说,“我感觉他可能认为我在试探他。”

玻尔的态度并不被将军和政客们认可,这并不使人惊讶。诸如格罗夫斯将军的人从来没有把苏联人当成真正的盟友。温斯顿·丘吉尔对苏联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并且他看到从英国情报系统得到的卡皮察和玻尔的通信时非常愤怒。“他(玻尔)怎么会介入这件事?”丘吉尔向他的科学顾问彻韦尔勋爵说道:“我看玻尔应该被拘禁起来,或者无论如何应让他知道他距离道德犯罪已经很近了。”

尽管玻尔和罗斯福及丘吉尔分别在1944年春天和夏天进行了单独会谈,但玻尔却没能让各方领导人认为英美对原子弹制造的垄断是目光短浅的。格罗夫斯后来告诉奥本海默,他认为“玻尔有时在和别人相处时会变成利刺”。有意思的是,当玻尔对政治领导人的影响逐渐减弱时,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物理学家中的地位却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玻尔再一次成为上帝,而奥本海默是他的先知。

1943年12月,玻尔已经来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因他从海森堡那里了解到德国制造原子弹的潜力。玻尔在看到一份显示德国没有切实可行的原子弹计划的情报后,于第二年春天离开了洛斯阿拉莫斯。“……从泄漏出的有关德国科学家活动中得到的信息,”他记录道,“可以非常确定轴心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如果玻尔确信这一点,那么奥本海默就会更加意识到德国物理学家很可能在制造原子弹的竞赛中落后了。正如大卫·霍金斯所言,奥本海默在1943年末从格罗夫斯将军那里得知,有消息称德国已经放弃了他们的早期核计划。格罗夫斯暗示很难评估这个报告,因为德国情报部门有可能在散布假消息。奥本海默则仅是耸耸肩。霍金斯回忆说,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洛斯阿拉莫斯的人们“已经不管德国的进程,一心要制造出原子弹了”。

21 | “原子弹的发明对文明的影响”

“在那时，我感觉奥本海默是一个天使般的人，
忠诚、正直并且从不做错事……我信任他。”
——罗伯特·威尔逊

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奥本海默的存在。他自己开着军用吉普车或是他的那辆黑色别克车，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就到一个实验室下属的办公室视察。通常他都坐在房间的后面，连续不断地抽着烟，静静地听着别人的讨论。韦斯科普夫对奥本海默几乎在工程取得每一个新的突破时都在现场这一事实表示惊讶。“当一个新的试验效果要测试，或是大家想出一个新的主意时，他总是在实验室或研讨会的房间。并不是他贡献了很多好的主意或建议，虽然有时他会做一些，但他的主要影响来自他的持续不断而又热切的参与。他使我们感到他一直在直接地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汉斯·贝特回想起一天奥本海默顺便参加了一个关于冶金的会议，会议对于使用何种类型的提炼容器来熔化钚仍没有结论。在听完讨论后，奥本海默作了总结。他并没有直接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但当他离开房间时，正确答案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再清楚不过了。

相比之下，格罗夫斯将军的视察就常常是打扰了，有时还是惹人发笑的捣乱。有一天，奥本海默带着格罗夫斯将军参观一个实验室。实验室里有三个能使热水流到水管的橡胶管子，而格罗夫斯就站在了其中一个的上面。麦卡利斯特·赫尔向历史学家查尔斯·索普回想了当时的情景：“橡胶水管啪的一声被挤破了，一股仅低于沸点的水喷射出来。如果你能够看到当时格罗夫斯将军的模样就会明白它击中了谁。”奥本海默认真地看着浑身是水的格罗夫斯将军，幽默地说道：“哦，仅仅是试一下以展示水的不可压缩性。”

奥本海默对工程的干涉和指导，对于工程的成功是绝对必要的。他知道，快速地建造一件可用武器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可裂变材料供应不足，因而他一直都在寻找可以加速这些材料生产的方法。在1943年初，格罗夫斯和他的S-1执行委员会已经决定要通过气体扩散和电磁技术来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分离出可裂变的浓缩铀。当时，还有另一种建立在液体热扩散基础上的可能技术，但因不可行而被放弃。但是在1944年的春天，奥本海默在读了以前的一些关于液体热扩散的报告后，认识到此前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这种技术可以以一种相对廉价的方式为电磁过程提供不完全的浓缩铀。因此在1944年4月，他写信给格罗夫斯将军，建议采用液体热扩散作为一个应急的措施，用它所生产的轻度浓缩铀供给电磁扩散工厂，就会加快可裂变材料的生产。这是他的希望，他写道："Y-12生产工厂的生产量可以提高30%至40%。材料供应量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样就可以比预期的达到K-25产量的时间提前好几个月。"

在研究了奥本海默的建议一个月以后，格罗夫斯将军同意探索这个方法。于是，一个工厂立刻就投入了生产。到1945年的春天，它刚好生产出了足够多的不完全浓缩铀，从而保证了1945年7月底有足够量的可裂变材料来造一颗原子弹。

奥本海默一直对铀的枪式设计方案有很大的信心，就是用一颗可裂变材料的"子弹"射向另一个目标裂变物质，从而产生"临界"和核爆炸。但在1944年的春天，他突然面临一个可能使设计钚原子弹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的危机。奥本海默批准塞思·内德尔迈耶进行爆炸试验，目标是造一个内聚爆设计的炸弹，即一个松散的充满可裂变材料的球体可以被即时压缩而爆炸。奥本海默一直希望证明枪式结构对于钚弹是切实可行的。但1944的7月，在开始供应的小量钚上进行了试验，结果清楚地表明高效能的钚原子弹在"枪管内"不能被触发。事实上，任何这样的尝试都必将导致钚"枪"里发生灾难性的前引爆。

一种解决办法就是通过进一步分离钚原料来获得更稳定的元素。"我们可以把不稳定的钚同位素同稳定的分离，"约翰·曼利解释道，"但这同时意味着我们要把铀用位素进行同样的分离。所有那些大的工厂都没有时间那样做。而且这个办法会使生产钚的链式反应的所有发现都变得毫无用处，所有在汉福德工厂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都将白白浪费，除非有人能把钚原料装配成一个可以爆炸的武器。"

在1944年7月17日,奥本海默召集了一次会议来解决这个危机,与会者有格罗夫斯、科南特、费米等人。科南特力劝众人,目标仅仅是在铀和钚混合的基础上建造一个低功效的内聚爆炸弹,它将会只有相当于几百吨TNT的威力。只有在低功效的炸弹成功后,实验室才有信心去建造威力更大的武器。

奥本海默反对这个主张,理由是它将导致不可接受的推迟。尽管内聚爆的建议第一次被塞培尔提出时,奥本海默曾持怀疑态度。但现在奥本海默列举出所有能具说服力的理由去争论,要他们把所有的努力都放在内聚爆钚弹的研究上。这是一个大胆而英明的冒险。自从1943年春天塞思·内德尔迈耶自告奋勇对这个项目进行试验以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在1943年的夏天,奥本海默把约翰·冯·诺伊曼请到了洛斯阿拉莫斯。约翰·冯·诺伊曼计算出,内聚爆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奥本海默下定决心冒这个险。

第二天,奥本海默总结了他的结论并呈交给格罗夫斯将军。在当时,高于一切的优先权都分配给了内聚爆方法的研究。

奥本海默的助手大卫·霍金斯稍后解释说:"内聚爆是唯一真正的希望,但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也不是最好的。"内德尔迈耶和他的研究人员在内聚爆的设计上取得了很小的进展。内德尔迈耶是一个害羞孤僻的人,喜欢独自有条不紊地工作。他随后承认道:"在1944年的春天,奥本海默对我变得非常不耐烦。"当奥本海默在夏末宣布对实验室进行重组的时候,内聚爆设计的危机也到了紧要关头。

1944年初,奥本海默成功地把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炸药专家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调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基斯佳科夫斯基意志坚强但又固执己见,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与他的表面上的上级帕森斯上尉有非常多的争执。基斯佳科夫斯基和内德尔迈耶的关系也不融洽,在他看来,内德尔迈耶工作时太没精打采了。在1944年6月初,基斯佳科夫斯基向奥本海默写了一份便函,威胁要辞职。奥本海默的反应是立刻把内德尔迈耶召来,告诉他基斯佳科夫斯基将要取代他的位置。内德尔迈耶从奥本海默的办公室走出来时,感到既愤怒又伤心。尽管内德尔迈耶将要忍受长久的痛苦,但奥本海默还是说服了他留在洛斯阿拉莫斯做一名高级技术顾问。

在钚弹设计的危机期间,拉比会定期访问参观洛斯阿拉莫斯。他稍后回想起那是一个消沉的阶段,众多参与这个工程的顶级科学家们谈到了寻找使钚弹爆炸的方法的紧迫性。拉比回忆道,谈话总是很快就转向了敌人,"那些

德国科学家都是谁？我们都知道他们。他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最终达成结论，认为那些德国科学家或许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研究工作，或是已经超过了我们。我们都感到形势很严峻。我们不知道敌人有了什么。我们不想浪费每一周、每一天——当然，一个月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正如菲利浦·莫里森对他们在1944年中的态度所作的总结："我们输掉战争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败了。"

尽管已经重组了研究室，但到1944年末，基斯佳科夫斯基的研究小组仍然没有能生产出精确的葡萄大小的球形钚炸药（也叫晶状体）。这种炸药要求能对称地挤入高尔夫球大小的空间里。没有晶状体，一个内聚爆的炸弹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帕森斯上尉是如此的悲观，以至于他去找奥本海默，建议他们放弃晶状体的研究，而是试着创造一个不用晶状体的内聚爆形式。在1945年1月，当着奥本海默和格罗夫斯将军的面，帕森斯和基斯佳科夫斯基就激烈地争论起这件事。基斯佳科夫斯基坚持认为，没有晶状体就不可能有内聚爆的成功。他保证他和研究人员很快就会制造出它们。在这个内聚爆炸弹成功的至关重要的选择上，奥本海默支持了基斯佳科夫斯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基斯佳科夫斯基和他的团队成功地使内聚爆的设计得以完美实现。1945年5月，奥本海默已经感到了相当的自信，钚弹会成功的。

原子弹的建造其实更多的是工程学而不是物理学理论，但是奥本海默非常内行地带领着他的科学家们克服技术和工程学上的难关，就像在伯克利激励他的学生们要有新的见识那样。汉斯·贝特后来说："没有奥本海默，洛斯阿拉莫斯应该也可以成功，但一定会有更大的压力、较少的热情和较慢的速度。事实上，那是在实验室的所有成员都难以忘怀的经历。也有其他的战时实验室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我从没看到像这样精神上如此团结一致的团体，激动地回想起在实验室的日子，感觉到那是他们一生中最伟大的一段时光。这就是真正的洛斯阿拉莫斯，这应主要归功于奥本海默，他是领导者。"

1944年的2月，在德国出生的鲁道夫·派尔斯带领一组英国科学家来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是在1922年第一次见到这位聪颖而谦逊的理论物理学家的，当时两个人都师从于沃尔夫冈·泡利。派尔斯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从德国移居到了英国。在1940年他和奥托·弗里希一起完成了对后来发展有巨大影响的论文《论超级炸弹的建造》，正是这篇论文使英美两国政府认识到建造一个核武器是可行的。在派尔斯和他的科学家组于1944年

春天进驻洛斯阿拉莫斯后，奥本海默决定把由爱德华·特勒主持的工作交给他们。爱德华·特勒这个思维敏捷活泼的匈牙利物理学家，被指派为内聚爆炸弹做一系列复杂的计算工作，但是特勒并不喜欢干这个。他着迷于超级热核反应炸弹的理论挑战，而对核裂变炸弹没有任何兴趣。奥本海默在1943年6月决定战时不优先发展超级原子弹后，特勒就变得越来越不合作了。他总是不停地谈论氢弹。他还对在贝特的手下工作感到不满。“我不高兴他做我的上司。”特勒回想说。可以确定的是，特勒的怨恨由贝特的批评而激化了。每天早晨，特勒都会有一个制造氢弹的新主意，但一天后，贝特就会证明那是荒谬的、愚蠢的。在一次和特勒极为恼人的偶遇后，奥本海默幽默地对查尔斯·克里奇菲尔德说：“愿上帝保佑我们免受来自外部敌人的进攻和内部‘敌人’的困扰。”

奥本海默对特勒的行为越来越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那年春天，特勒在一次部门领导会议上擅自离开，并拒绝为贝特做一些工作必需的计算。贝特感到非常气愤，进而向奥本海默抱怨说：“爱德华实质上是在罢工”。当奥本海默当面向特勒提出这件事时，特勒最终要求解除他在核裂变炸弹工作上的所有责任，奥本海默同意了。

特勒感觉受到了忽视，就向外宣布他正考虑离开洛斯阿拉莫斯。所有人都不会因特勒的离开而感到惊讶，每个人都认为特勒是一个高傲而又喜怒无常的人。塞培尔称他“对任何机构都是一个不幸”。但奥本海默并没有解雇他，而是给了他所想要的，自由地研究超级热核反应炸弹的可行性。奥本海默甚至同意每周给他宝贵的一小时，只是讨论在特勒头脑里的任何想法。

即使这种非同寻常的姿态都没有使特勒满足，他认为他的朋友奥本海默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家”。奥本海默的同事想知道为什么他还要为特勒而烦恼，派尔斯认为特勒“有点疯狂，他会在一段时间支持一种想法，但接着又证明它是毫无意义的”。

奥本海默也不会这样地忍耐傻瓜，但他意识到特勒并不愚蠢。奥本海默之所以容忍他，是因为在最后他也许可以对工程做出某种贡献。在那年夏末时，奥本海默为丘吉尔的特别代表彻韦尔勋爵举行了欢迎宴会。奥本海默在宴会结束后才想到，由于他的疏忽大意而在邀请名单里漏掉了鲁道夫·派尔斯。第二天，奥本海默向派尔斯道歉时幽默地说：“如果漏的是特勒，那恐怕就更糟了。”

在面临大量行政工作的同时，奥本海默仍然挤出时间偶尔写些私人信件。在1944年的春天，他给德国难民迈耶一家写了封信。这个家庭在逃离欧洲时，奥本海默曾帮助过她们。他们是完全的陌生人，但是在1940年，他给了这个家庭一笔钱来支付她们去美国的费用。这个家庭有五位成员，母亲和她的四个女儿。四年后，迈耶一家把钱还给了奥本海默，并骄傲地告诉他，她们已经成为了美国公民。他回信说，他理解她们所感受到的骄傲。他还感谢她们还钱，"我希望这不会给你们造成困难"。他随后又把钱退给了她们，也许她们将来还会需要的。对奥本海默来说，把迈耶一家从纳粹的魔爪下拯救出来意义重大。首先，这是他在把政治上毫无争议的反法西斯立场延伸到行动上的第一个事例，而且那也使他感觉不错。第二，虽然这是一个小的慷慨大方的行为，但却是一个深刻的令人愉快的记忆，提醒他为什么要加速建造一个可怕的武器。

他要加快速度。不安分是他性格的一部分，至少弗里曼·戴森是这样想的。戴森是一位在战后了解和尊重奥本海默的年轻物理学家，但他同时也把不安分看作奥本海默不幸的瑕疵。"不安分驱使他获得至高的成就，使他完成洛斯阿拉莫斯的任务，但也使他没有停下来休息或者深思。"

"只有一个人停了下来，"戴森写道，"停下来的是一位来自利物浦的波兰物理学家约瑟夫·劳伯特。"在战争爆发时，他在英国一筹莫展。后来他被詹姆斯·查德威克吸收为英国原子弹工程的成员，并在1944年初来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在1944年3月的一个晚上，劳伯特经历了"不快的震惊"。格罗夫斯将军来查德威克家吃晚饭。在晚饭期间，他不经意地开玩笑说："当然你应该认识到这个工程的主要目标是使俄国人屈服。"劳伯特震惊了。他对斯大林不抱有任何的幻想，毕竟这位苏联的独裁者入侵过他深爱的祖国波兰，但是在东线战场上每天都有成千的俄国士兵牺牲。劳伯特感到了某种意义上的背叛。"直到那时，我还认为我们的工作是阻止纳粹的胜利，"他后来写道，"而现在我被告知，我们准备的这个武器是为了用来对付那些为了消灭纳粹而做出巨大牺牲的人们。"到了1944年底，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六个月后，欧洲的战争将在不久结束是很清楚的了。劳伯特看到已经没有理由为一个打败德国不再需要的武器继续工作。在告别聚会上向奥本海默告别后，他在1944年12月8日离开了洛斯阿拉莫斯。

在1944年秋天，苏联直接从洛斯阿拉莫斯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情报。被

军队反间谍情报部门忽视的间谍包括:英国籍的德国科学家克劳斯·富克斯和特德·霍尔。霍尔是一个有着卓越智慧的、获得哈佛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的19岁青年。霍尔在1944年1月下旬来到了洛斯阿拉莫斯,而富克斯是在8月份作为鲁道夫·派尔斯率领的英国科学家组的一个成员来到了洛斯阿拉莫斯。

富克斯,1911年出生,由一个信奉教友派的德国家庭抚养长大。富克斯勤奋好学而且富有理想。当1931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时,他加入了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社民党。同一年,他的母亲自杀了。1932年,因纳粹政治力量的不断增长而感到不安,他脱离了社民党,加入了更积极反对希特勒的共产党。在1933年7月,他逃离了德国,在英国成为了政治难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的家族成员被纳粹成员大批地杀害了。富克斯有充足的理由恨纳粹。

1937年,富克斯在布里斯托尔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拿到了一笔博士后奖学金,并和奥本海默从前的指导教授马克斯·博恩一起工作。马克斯·博恩当时在爱丁堡教学。虽然英国内政部知道富克斯过去是共产党,但在1944年春天,富克斯还是与派尔斯和其他英国科学家在高度机密的"试管合金"工程一起工作。在1942年6月,富克斯获得了英国国籍。到那时,他已经向苏联传送有关英国原子弹项目的情报。

当富克斯来到洛斯阿拉莫斯时,奥本海默和其他人都没有怀疑过他是一名苏联间谍。1950年富克斯被捕后,奥本海默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他原以为富克斯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政治狂热者"。

到1944年7月,霍尔从事于内聚爆炸弹需要的校准试验工作。当需要创造一个内聚爆测试时,奥本海默听说霍尔是台地上最好的年轻技术人员之一。霍尔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在那年秋天,他正在经历思想上的斗争。他表面上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苏联的崇拜者,但实际上还不是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他对他的工作和在生活中的地位也没有不满或不高兴,更没有人吸收他成为共产党员。但那一年,他总是听到三十岁左右的"老"科学家们谈论他们对战后军备竞赛的担忧。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尼尔斯·玻尔坐在同一张宴会桌旁。他听到玻尔对一个"开放世界"的关注。由玻尔的结论推断出战后美国的核垄断可能会导致另一场战争。在1944年10月,霍尔决定行动起来,"在我看来,美国对核的垄断是危险的,应该有人来阻止,并不是只有我持这样的观点。"

霍尔在请了一个十四天的假后,乘上前往纽约的火车,径直走进了苏联

的贸易局，并给了苏联官员一份关于洛斯阿拉莫斯的手写报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霍尔向苏联传递了更多的情报，包括关于内聚爆炸弹设计的关键信息。

奥本海默对霍尔的间谍活动一无所知。

在1944年，一些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对于继续发展这"玩意儿"开始说出了他们不断增长的道德上的疑虑。实验室的物理试验部门主管罗伯特·威尔逊"和奥本海默就原子弹将怎样使用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当威尔逊去见奥本海默时，地面上还覆盖着白雪。他建议举行一次正式的会议来更充分地讨论这个问题。"他劝我放弃那样做，"威尔逊后来回忆说，"奥本海默说我将会和G-2安全部的人员产生磨擦。"

尽管威尔逊尊重甚至敬爱奥本海默，但他没有考虑这次争论对他自己的影响。因此威尔逊告诉奥本海默，他并没有能说服他放弃对这个问题至少进行一次公开的讨论，而这次讨论的作用显然是非常重要的。随后，威尔逊在实验室的各个地方粘贴了公告，宣布举行一次公开的会议，讨论"原子弹对文明的影响"。

令威尔逊惊讶的是，奥本海默在预定的那个晚上出席了会议，并倾听了讨论。威尔逊后来回想起当时大约有二十个人参加，其中包括像韦斯科普夫这样地位较高的物理学家。"我还能记起，"威尔逊说，"在我们的楼房里很冷，我们对于为什么在事实上已经赢得战争的条件下仍然继续制造原子弹进行了非常激烈的讨论。"

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在道德和政治上对原子弹的讨论。一位从事内聚爆技术工作的年轻物理学家路易斯·罗森回忆说，白天在老剧院的会谈挤满了人，奥本海默是发言人。据罗森所说，讨论的题目是"国家对活生生的人类使用原子弹是否是一件正确的事"。奥本海争论道，作为科学家，他们和其他任何公民相比在决定原子弹的命运上没有更大的发言权。罗森说："他是一个非常雄辩且有说服力的家伙。"化学家约瑟夫·O.赫希菲尔德回想起了一个相似的讨论会曾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小木教堂里举行。那是1945年初在暴风雪中的一个寒冷的周日晚上。在这样的场合，奥本海默用他惯有的雄辩语言争论着，虽然他们都注定生活在持久的忧虑之中，但原子弹也许能结束所有的战争——在玻尔的话里重复的这样一个希望，对很多与会科学家都是有说服力的。

这些敏感的讨论没有官方的记录,但关于它的记忆一直都流传着。罗伯特·威尔逊的陈述最为形象生动,那些知道威尔逊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维克托·韦斯科普夫后来回忆起他和威利·希金博特姆、罗伯特·威尔逊、汉斯·贝特、大卫·霍金斯、菲利浦· 莫里森、威廉·伍德沃德以及其他人一起进行关于原子弹的政治讨论。韦斯科普夫回想起一次在1945年3月由四十位科学家参加的会议,讨论了"原子弹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奥本海默有一次试图阻止人们参加,"他认为我们的讨论不应该涉及原子弹的使用问题"。

威尔逊认为,如果奥本海默不参加会议,大家将会责备他。"你知道,你是主管,有一点像个将军,有时候你必须冲在你的士兵前面,有时候你要在他们的后面。无论如何他来了,并作了有说服力的争论而使我信服了。"威尔逊希望得到确信,现在似乎已经很清楚了,原子弹将不会被用在德国,他和很多其他人一样,只有疑虑却没有答案。"我原想我们在和纳粹作战,"威尔逊说,"尤其并不是与日本人作战。"没有人认为日本有原子弹计划。

奥本海默走上讲台,开始用他的温柔的声音发言。每个人都悄然无声地听着。据威尔逊回忆,奥本海默控制了讨论,他的主要观点实质上吸收了尼尔斯·玻尔的"开放"观点。他认为,这场战争在全世界不知道这种原始的新式武器存在的情况下是不会结束的。最坏的结果就是原子弹仍然是个军事秘密。如果这发生了,那么下一场战争将几乎一定会是使用原子弹进行的战争。他解释说,他们必须加速工作,也就是为了这一点,才应该对原子弹进行试验。他指出,新的联合国在1945年4月举行它的第一次会议,而知道了人类已经发明了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于与会代表对战后世界的考虑将会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那是一次非常好的辩论。"威尔逊说。在那以前,玻尔和奥本海默就讨论过原子弹将怎样改变世界的问题。科学家们知道原子弹将迫使对国家主权进行全部的重新定义。他们相信富兰克林·罗斯福,相信他正带领美国正确地处理这个难题。正如威尔逊所说:"在任何地区都将没有主权,主权将存在于美国。如我们所知的,这将是战争的结束,而这也是制造原子弹的承诺。那是我为什么一直继续这项工程的原因。"

没有人感到奇怪,奥本海默占了上风,他清楚地表达了在世界没有人知道洛斯阿拉莫斯可怕的秘密的情况下,战争将不会结束。这对每个人都是个决定性的时刻。玻尔的逻辑对于奥本海默手下的科学家们是尤其具有说服

力的，但同样也是因为站在他们前面的这个有魅力的男人。正像威尔逊回忆起那个时刻所说的，“在那时，我感觉奥本海默是一个天使般的人，忠诚、正直并且从不做错事……我信任他”。

22 | “现在我们都是婊子养的了”

“罗斯福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许杜鲁门也将是位好的政治家。”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45年4月12日，星期四上午，刚好是实验室建立两年后，突然传来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一切工作都暂停了。奥本海默通知每个人在行政大楼附近的旗杆下集合，并正式宣布了这一消息。接着，他计划在星期天举行悼念仪式。“星期天的早晨才发现台地在厚厚的积雪之中，”菲利浦·莫里森后来写道，“一夜的雪覆盖了城镇所有的粗陋，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放眼望去都是温柔的白色，明亮的太阳照耀着，每一堵墙后面都投下了深蓝色的阴影。没有悼念的服装，但它好像认识到了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一种安慰的表示。每个人都来到了剧院，在那儿，奥本海默非常平静地作了两三分钟的发言，他说出了他的和我们的心声。”

奥本海默起草了三段简短的颂词。“数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不同寻常的邪恶和恐惧之中。”在这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多年以来一直是我们的英明领导者。奥本海默以他特有的风格转向了《薄伽梵歌》：“人，真正的意义在于信念。”他的信念是激励全世界的人们相信，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将会产生“一个更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为了这个原因，奥本海默总结说：“我们应该致力于我们的理想，他的伟大工作并不会因他的去世而结束。”

奥本海默仍然怀有希望，认为罗斯福和他领导的其他官员已经从玻尔那里理解到，正在建造的这种可怕的新式武器需要完全的开放。他后来告诉大卫·霍金斯说：“罗斯福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许杜鲁门也将是位好的政

治家。”

当哈里·杜鲁门成为白宫主人时，欧洲的战争已接近胜利，但是太平洋的战争却正达到最血腥的高潮。在1945年3月9日和10日的夜晚，334架B-29轰炸机向东京投下了数吨凝固汽油弹和高爆炸药。爆炸引起的风暴性大火致使大约一万人死亡，这个城市15.8平方公里的面积被大火焚毁。燃烧弹的空袭一直持续到1945年7月，在日本的所有城市中有五个大城市被夷为平地，成百上千的日本平民被杀死，这就是全部的战争。攻击的目的是毁灭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它的军事目标。

这种轰炸并不是秘密，普通美国人可以在他们的报纸里读到关于空袭的内容。沉思的人们明白，这种轰炸城市的行动引起了深刻的道德问题。

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的利奥·齐拉很慌乱。这位物理学家很清楚，时间已经不多了，原子弹很快就会造好，而且他预期它们将被用于轰炸日本的城市。作为第一个力促罗斯福总统开始原子武器计划的他，现在开始不断地试图阻止原子弹的使用。首先，他向罗斯福总统起草了一份备忘录，由另一封爱因斯坦的信介绍给总统。在这份备忘录里，他提醒总统，如果我们使用原子弹将会引发和苏联的军备竞赛。虽然罗斯福总统在见齐拉之前就去世了，但齐拉设法获得了在5月25日和新总统杜鲁门见面的预约。与此同时，他还决定写信给奥本海默，告诫他：“如果制造原子弹的竞赛变得不可避免，这个国家的前景将不可能会是好的。”

在缺乏一个明确的避免军备竞赛的政策的情况下，齐拉写道：“我怀疑用原子弹打击日本来展示我们的力量是否明智。”而且他感到他们的争论“并不能足够强烈地驱散我的疑虑”。奥本海默并没有回信。

5月25日，当齐拉和他的两个同事——芝加哥大学的沃尔特·巴特基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哈罗德·尤里——到达白宫时，只被告知杜鲁门已经安排了他们和不久将被任命为国务卿的詹姆斯·伯恩斯会面。他们顺从地去了伯恩斯在南卡罗来纳斯巴达堡的家。这次会谈的结果没有任何收获。

伯恩斯表明，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可以促使苏联在战后撤出在东欧的军队。齐拉听了这个投放原子弹会使苏联更容易对付的假设后哑然失色。伯恩斯对他说：“你来自匈牙利，你不会想要苏联长久地留在匈牙利吧。”这激怒了齐拉。他后来写道：“我所关注的是，我们和苏联展开军备竞赛，那也许会导致这两个国家的毁灭。我并不愿意在这一时刻去担心匈牙利将会发生什

么。”齐拉伤心地离开了。

回到华盛顿后,齐拉再次努力阻止原子弹的使用。在5月30日,听说奥本海默将会来首都和陆军部部长史汀生会面,齐拉给格罗夫斯将军办公室打电话,约定在那天早晨和奥本海默会见。奥本海默认为齐拉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但还是决定听听他的意见。

“原子弹就是狗屎。”奥本海默在听完齐拉的争论后说。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齐拉问。

奥本海默回答说:“好吧!这是一个没有任何重大军事意义的武器。它只会发出突然的一声巨响,一个声音非常大的响声,但是它不是在战争中有用的武器。”与此同时,奥本海默告诉齐拉,如果原子弹被使用,他认为事先通知苏联是很重要的。齐拉争论说,仅仅告诉斯大林这个新武器的存在并不能阻止战后的军备竞赛。

奥本海默坚持说:“难道你不认为如果我们告诉俄国人我们所要做的,然后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他们就可以理解我们吗?”

“他们只会理解地过了头。”齐拉回答说。

齐拉再一次沮丧地离开了,他已经清楚,他阻止使用原子弹的第三次努力失败了。

第二天,也就是5月31日,奥本海默参加了史汀生所称的“临时委员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会议,即一群政府决策高官聚到一起讨论未来核政策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史汀生、万尼瓦尔·布什、詹姆斯·伯恩斯、卡尔·康普顿、詹姆斯·科南特、乔治·马歇尔和格罗夫斯等;包括奥本海默在内的四位科学家作为科学顾问也参加了会议。

史汀生主持了会议的议程安排,议程包括决定是否对日本使用原子弹。那差不多是一个在讨论调查前就已产生的结论。奥本海默和其他的科学家在听史汀生谈到,他和委员会里的其他成员并不把原子弹仅仅看作一个新式武器,而更是一次对人类和宇宙关系的革命性改变的话后,他们都感到放心了。原子弹也许会成为“吃掉我们的弗兰肯斯坦”,或者它能保卫地球的和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它的意义“都将远远超过对当前战争的需要”。

当史汀生询问关于这项工程的非军事用途的可能性时,奥本海默主持了会谈。他指出,直到那时,他们紧迫关注的是尽快结束战争;但是也应该清楚,关于原子物理学的基本知识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广泛地流传。他认为,美国为在和平发展时期使用核能提供自由交换的信息将是明智的。回想起

前天他和齐拉的会谈，奥本海默说："如果我们在真的使用原子弹前提出交换信息，我们在道义上就会得到大大的加强。"

接着这个话题，史汀生开始讨论一种"自我克制政策"的前景。他提出应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监督"完全的科学自由"的可能性。也许原子弹可以在战后由一个"国际控制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督而得到控制。当在房间里的科学家们点头表示同意时，一直沉默的马歇尔将军突然警告说，不要过于相信任何监督机构的作用，苏联很显然是需要美国"极为关切的"。

马歇尔的地位很高，没有人对他的意见表示怀疑，但奥本海默提出了玻尔的观点。现在，他平静而有力地想使受人尊敬的马歇尔将军接受他的观点。他承认，没有人知道俄国人在核武器领域做了什么，不过，他还是"表达了通过科学家之间的共同关注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美好希望"。他指出："俄国对科学一直是很友好的。"他建议，也许应该以试探性的方式开展和他们的讨论，向他们解释我们已经发展了核武器，但不给他们任何有关我们生产成果的详细信息。

"我们可以说，在这项工程上我们投入了巨大的国家性努力，"奥本海默说，"并表达和他们在这个领域合作的愿望。"奥本海默以"他强烈地认识到我们不应该预先判断俄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结束了他的发言。

有些令人吃惊的是，奥本海默的陈述引起了马歇尔将军对俄国人详尽的辩护。他说，通过长期的角力，两国的关系已经确定，但是"大多数的断言都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马歇尔说："我们没有必要害怕俄国，如果他们知道了这项工程，他们会向日本人透露信息的。"马歇尔并不想向俄国人保守原子弹的秘密，而是提出了"邀请两位著名的俄国科学家来见证试验是否值得的问题"。

奥本海默听到这个国家的最高军事指挥官的话一定很高兴，但他又一定会很快因听了杜鲁门的私人代表詹姆斯·伯恩斯的话而沮丧了。詹姆斯·伯恩斯强烈反对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怕斯大林将会要求参加到工程中来。

伯恩斯已经开始想到把原子弹作为美国的外交武器了。即将被任命为国务卿的伯恩斯反对奥本海默和马歇尔的理由，进一步支持了劳伦斯的观点，即他们必须"尽可能快地推进原子弹的建造，保证我们在这个领域的领先地位；与此同时，尽力和俄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据备忘录记载，伯恩斯的观点被与会者广泛同意。

午饭后，有人提出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问题，然而没有做任何记录。

但当正式会议重新开始时，讨论仍以即将到来的轰炸所产生的效果为中心。史汀生总是对任何决定的政治含义很警觉，于是改变了会议议程，使讨论继续。有人评论说，一颗原子弹将不会比那年春天向日本城市投掷大量炸弹的袭击有更多的效果。奥本海默看起来是同意的，但又补充道："原子弹爆炸的视觉效果将是十分惊人的，它会伴随升至一万到两万英尺高的强烈闪光。爆炸的中子效应对生命将会是非常危险的，它的辐射半径至少有三分之二英里。"

与会者广泛讨论了"各种类型的目标以及产生的效果"。史汀生作了似乎是广泛同意的总结："我们将不会给日本人任何警告，我们不会以平民区为目标，但我们应试图对尽可能多的居民造成深刻的心理影响。"史汀生表示同意詹姆斯·科南特的建议："最值得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军事工厂，它雇用了大量的工人，并被工人的房屋紧密地围绕着。"于是，这位哈佛大学的校长用这样精致的委婉语，选择了将平民作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目标。

奥本海默在这次重要的会谈中扮演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角色。他强有力地推进玻尔的主张，认为应该尽快向俄国人提供关于即将出现的新武器的资讯。直到伯恩斯有力地反对他的看法之前，他甚至劝服了马歇尔将军。另一方面，他在格罗夫斯将军表明要解雇像齐拉这样持不同政见者的意图时，明显地感到保持沉默是谨慎的。奥本海默没有提供其他的办法，更别说是批评科南特对"军事目标"的委婉定义，即"一个重大的军事工厂，它雇用了大量的工人，并被工人们的房屋紧密地围绕着"。虽然他清楚地阐释了玻尔的一些关于开放的看法，但在最后他没有赢得任何东西，却默认了每件事。美国将不会详细告知苏联关于曼哈顿工程的内容，而原子弹也将会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在日本的一座城市使用。

在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们正为尽可能快地测试钚内聚爆炸弹而紧张地工作着，他们已经没有时间考虑他们的"玩意儿"怎样或是否应该被用于日本。他们感到可以信赖奥本海默。

有一天，奥本海默叫罗伯特·威尔逊来到他的办公室，并解释他是临时委员会的顾问，任务是向史汀生建议原子弹应该怎样使用。他询问威尔逊的看法。"他给了我一些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当我再次来到奥本海默的办公室时，对他说我感到我们不应该使用原子弹，而且应该以某种方式告诫日本人。"威尔逊指出，在几个星期以后，他们将会进行原子弹的试验，为什么不邀

请日本派一个观察员代表团来见证试验。

奥本海默回答说:“假使它不爆炸呢?”

“我冷冷地转向他,”威尔逊回想道,“那我们就把他们全部杀死!”几秒钟后,威尔逊——一个和平主义者——就后悔说出了如此残忍的话。

威尔逊因奥本海默向自己咨询此事而感到高兴,但又对他没有采纳自己的看法感到失望。“奥本海默原本没有任何理由和我事先谈论这件事,”威尔逊说,“但很显然,他想要一些来自别人的意见,而他喜欢我,我也非常喜爱他。”

6月中旬,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者有劳伦斯、阿瑟·康普顿、恩里克·费米。会议的目的是讨论他们给临时委员会的最终建议。这四位科学家对“弗兰克报告”进行了自由的讨论。康普顿为他们做记录。对于要求不致命的但剧烈的原子弹威力的展示的特殊考虑,奥本海默的心情是矛盾的。“我提出了我的忧虑,并进行了辩论,反对使用原子弹……但我并不赞同他们。”他后来说道。

1945年6月16日,奥本海默签署了简短的备忘录。他总结了科学家座谈小组对于“立即使用原子武器”的建议,并呈交给了史汀生。这是一份态度踌躇的公文。座谈小组建议:第一,在使用原子弹之前,应优先通告英国、苏联、法国和中国“原子武器的存在”,并欢迎对于我们可以进行怎样的合作以促进提高国际关系的建议。第二,座谈小组报告他们的科学家同事在这些武器的首次使用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一些正在建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建议应该把不使用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那些支持一种纯粹技术上展示的科学家希望全面禁止使用原子弹,并担心如果我们现在使用了原子弹,我们将来在谈判中的位置将会引起别人的反感。”虽然奥本海默确定地感到,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大多数同事都支持这样一种展示,但他现在更倾向于认为,那些“强调通过立即的军事使用挽救美国士兵生命的机会”更重要。

为什么?足够奇怪的是,奥本海默的理由和玻尔以及那些支持使用原子弹的人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变得相信原子弹在战争中的军事应用可以消除一切战争。奥本海默解释道,他的一些同事实际上相信,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可以“改善国际前景,因此他们更关注于阻止战争而不是消除这种特殊的武器。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因此我们建议不是简单的技术上的展示而是实际使用更可能结束战争。我们认为,除了直接的军事

使用外,没有另一种可以接受的办法”。

座谈小组已提供了这样一个清楚的、确定的对军事使用原子弹的赞同,但并没有提供任何怎样定义“军事使用”的结论。正如康普顿后来对格罗夫斯所说的,“在座谈小组成员之间对于如何或是怎样的条件下使用原子弹并没有取得足够的一致意见来做出共同的陈述”。

奥本海默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正如他后来回忆的,“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日本的军事形势。我们不知道以其他的方式是否能使他们接受投降,或者占领日本是否真的是不可避免。在我们的头脑深处认为,占领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我们就是那样被告知的”。在其他事情上,他不知道华盛顿的军事情报部门截获并解密了来自日本的电报,它表明日本政府明白战争已经失败并寻求可以接受的投降条件。

例如在5月28日,约翰·J.麦克洛伊曾劝说史汀生在建议美国对日本的要求中放弃“无条件投降”的条款。据他们对所截获的日本电报(代号为“魔法”)的解读,麦克洛伊和许多其他高级官员都认识到,东京政府的核心成员正试图在接受大部分华盛顿协议的条件下寻求一种方式结束这场战争。艾伦·杜勒斯是当时在瑞士的一名情报人员,他向麦克洛伊汇报:“日本人想要保持他们的天皇和宪法,他们害怕认定军事投降就意味着所有秩序和准则的崩溃。”

6月18日,麦克洛伊向杜鲁门总统汇报说,当提到“我们是否需要俄国帮助打败日本的问题”时,他认为日本的军事地位是非常糟糕的。他继续向杜鲁门总统报告说,在最终决定进攻日本本土或是使用原子弹之前,应采取政治上的措施来确保日本的全面投降。他说,日本应该被告知,他们“将会被允许保留他们的天皇和自己选择政府组织的形式”。此外,“日本应该被告知我们拥有了一种可怕的毁灭性武器,如果他们不投降,我们将对他们使用”。

据麦克洛伊所说,杜鲁门总统看起来已经接受了这些建议,并最终认为日本已经非常接近于接受投降协定。在杜鲁门总统的私人日记里,他1945年7月18日提到,近来破译的日本电报被引述给了日本驻莫斯科的大使,作为“一封日本天皇请求和平的电报”。电报的内容称:“无条件投降是和平的唯一障碍。”杜鲁门已经得到斯大林的承诺,苏联将会在8月15日对日宣战。这是一个他和很多军事策划者都认为是决定性的行动。“他(斯大林)将在8月15日进行对日作战,”杜鲁门在7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当那发生时,就将结束对日本的战争了。”

杜鲁门和他周围的人都知道,开始占领日本本土最早要到1945年11月1日才能按计划进行。几乎所有的总统顾问都相信,战争将会在这个日期前结束。战争将会确定地以令人震惊的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后结束,也或许会以格鲁、麦克洛伊、莱希和很多其他人所预想的通过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后而结束,即澄清投降的条款并确认日本可以保留他们的天皇。但是杜鲁门和他最亲近的顾问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已经决定,原子弹的出现给了他们另一种选择。正像伯恩斯稍后解释的,"出现在我头脑里的是,我们在俄国人卷入之前就结束战争是很重要的"。

最终在8月3日,伯恩斯的特别助理沃尔特·布朗在日记中写道:"总统、莱希、伯恩斯同意日本寻求和平。(莱希从太平洋获得了另一份报告。)总统担心日本将会向俄国而不是向瑞典这样的国家请求和平。"

奥本海默被隔绝在洛斯阿拉莫斯。他不知道"魔法"情报的截获,不知道华盛顿高层官员内部对于投降条款的激烈争论,也不知道总统和国务卿希望原子弹会使他们在没有澄清无条件投降条款和没有苏联介入的情况下结束战争。

如果他在广岛爆炸前知道那些情况的话,没有人能确定奥本海默的反应会怎样。总统清楚日本人在寻求和平,在8月份军事应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城市是一种可选择的办法而不是结束战争所必需的。但是我们知道,奥本海默在战后开始认识到他被误导了。这种经历作为一个不断的提醒,使他自此以后本能地对政府官员所讲的一切都持怀疑态度。

在奥本海默写完6月16日总结座谈小组科学家观点的备忘录的两个星期后,爱德华·特勒交给了他一份请愿书的复本。这份请愿书在曼哈顿工程的工作人员中广为散布。它由利奥·齐拉起草,目的是劝服杜鲁门总统在没有发表一个关于日本投降条款的公开声明的条件下不对日本使用原子弹。"除非加给日本的投降条款能够详细地公之于众,否则美国不应在这场战争中求助于使用原子弹。日本知道这些条款而又拒绝投降时……"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齐拉的请愿书征集到了一百五十五位曼哈顿工程科学家的签名。一份反对请愿书仅仅征集到了两个人的签名。

奥本海默以一种轻视的口气向格罗夫斯将军通告了齐拉的请愿书:"信内附入的便条是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我知道您正很感兴趣地注视着这件事。"格罗夫斯的助手尼古拉斯中校,也在同一天给格罗夫斯打了电话。在他们谈

论齐拉的请愿书的过程中,“尼古拉斯问为什么不摆脱掉齐拉,将军说在当时还不能那样做”。格罗夫斯明白,如果解雇或是逮捕齐拉,将会引发其他科学家的造反。奥本海默也同样因齐拉的请愿书而愤怒,这就使格罗夫斯将军有信心直到原子弹准备好后稳妥地解决这个问题。

1945 年的夏天,台地像往常一样炎热干燥。奥本海默督促技术区的工作人员工作更长的时间。每个人似乎都感到烦躁,甚至连住在山谷而被隔离的华纳女士都注意到了变化。“在山上进行着紧张的行动……高地上的爆炸次数增加了然后又停止。”她注意到在南面通向阿拉莫戈多的公路上有了更多的车辆。

最初,格罗夫斯将军曾反对进行一次内聚爆炸弹试验的主张,理由是钚如此稀少,甚至一盎司都不应该被浪费。奥本海默使他相信一次全面的试验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我们对原子弹的认识还不全面。

在一年多以前的 1944 年的春天,奥本海默选择了在阿拉莫戈多东北六十英里的一块沙漠作为场地。西班牙人把这个地方称为“死亡之旅”。

在那儿,军队围出了一块十八英里宽、二十四英里长的地区。军方通过给予牧场主更好的牧地而迁移了一些牧场主和工人,并开始建造一个试验基地,加固用来观察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掩体。奥本海默给试验起的代号为“三位一体”。数年后,他也不是十分确定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名字。

每个人都因长时间的工作而感到筋疲力尽。格罗夫斯要求的是速度而非完美。格罗夫斯想要在波茨坦会议结束前把一颗经过试验的可用的原子弹交到杜鲁门的手里。那年春天的早些时候,奥本海默同意了把目标日期定在 7 月 4 日。但不久就证明这是不现实的。6 月底,在受到格罗夫斯的更大的压力后,奥本海默告诉他的工作人员,他们将以 7 月 16 日作为试验的目标日期。

奥本海默指派肯·班布里奇监督“三位一体”基地的准备工作,但他还派了他的弟弟弗兰克作为班布里奇的主要行政管理助手。使肯高兴的是,弗兰克在 5 月底就到了洛斯阿拉莫斯。

弗兰克在 1945 年 5 月底就开始在试验基地扎下营地,条件可以说是很艰苦的。人们晚上睡在帐篷里,白天在高达摄氏 37.8 度的天气下长时间艰苦地工作。当目标日期越来越近时,弗兰克只感到小心谨慎地为灾难准备着。

“我们花了几天时间寻找通过沙漠的撤离路线,”他回忆道,“并且制作了微型地图,这样每个人才能疏散撤离。”

1945 年 7 月 11 日晚上,奥本海默走回家向基蒂道别。他告诉她如果试验成功,他将会给她捎一个口信:“你可以换床单了。”基蒂为了给奥本海默带来好运,把在花园里采摘的长着四片叶子的三叶草送给他。

在计划试验的前两天,奥本海默登记入住了阿尔伯克基附近的希尔顿旅馆。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万尼瓦尔·布什、詹姆斯·科南特和其他从华盛顿乘飞机赶来的 S-1 官员。“奥本海默非常紧张。”化学家约瑟夫·赫希菲尔德回忆道。尽管在最后时刻对内聚爆炸物的点火试验的失败表明原子弹很可能是一个废品,但人们好像已经不太忧虑了。每个人都向基斯佳科夫斯基提出问题。“奥本海默的情绪变得如此激动,”基斯佳科夫斯基回忆说,“我以我一个月的薪水和他的十美元打赌,我们的内聚爆炸物将会发生作用。”

第二天晚上,罗伯特仅仅睡了四个小时。格罗夫斯将军的主任参谋托马斯·法雷尔将军在隔壁房间的床铺上睡觉,他听到罗伯特在半夜里痛苦地咳嗽起来。第二天,7 月 15 日,星期日,罗伯特醒来时感到筋疲力尽,并仍因昨天的试验失败而消沉地失望着。但是,当他在基地军营大食堂吃过早餐后,他接到了贝特的电话,通知他模仿内聚爆的试验仅仅是因为线路系统的电路保险丝被烧断而失败的。贝特对他说,没有任何理由显示实际装置上的设计有问题。这使奥本海默感到了宽慰。奥本海默现在把注意力转向了天气。那天早晨,基地的上空还是晴朗的,但他的气象学家杰克·哈伯德告诉他,在基地周围将要起风。在格罗夫斯将军从加利福尼亚很快将乘飞机飞往这里观察试验之前,奥本海默和他通了电话,提醒他说:“天气是变化无常的。”

当雷雨云在黄昏到来时,奥本海默开车到了基地发射塔,最后看了一眼他的“玩意儿”。他独自爬上了发射塔,检查了他的作品。这是一个由引爆装置装饰的丑陋金属球。每件事看起来都很正常,在环视了周围的景象后,他下来回到他的车里,开车驶向麦克唐纳牧场。在那儿,最后组装了原子弹的工作人员正在收拾他们的传动装置。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一些科学家组织了一场赌注,用一美元就可作赌注来预测爆炸的规模。特勒总是赌得最高,他把钱赌在四万五千吨 TNT 上;奥本海默赌得较低,只有一个不大的三千吨;拉比则把他的钱赌在两万吨。费米则对原子弹是否将会点燃大气下了赌注,这使得一些军队警卫感到恐慌。

那晚想要睡觉的科学家们都被非同寻常的噪音吵醒了。正如弗兰克·

奥本海默回忆的,“这个地区的所有青蛙都聚到了营地附近的一个小水塘里。它们整晚都呱呱地叫个不停”。奥本海默住在基地营地的军人食堂大厅,不是大口地喝黑咖啡,就是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焦虑不安地吸着烟,直到它们都只剩下烟蒂。有一段时间,他拿出一本波德莱尔的书,静静地坐在那儿读诗。到这时,暴风雨正倾盆而下降落到薄薄的屋顶上,闪电划破了外面的黑暗。费米担心大风会使他们被有放射性的雨水浸湿,他说他更希望延期。“那将是一场灾难。”他警告奥本海默。

在另一方面,奥本海默的主要气象学家杰克·哈伯德认为,暴风雨将会在日出前结束。哈伯德建议推迟引爆原子弹的时间,从四点改到五点。焦虑不安的格罗夫斯将军在军人食堂大厅来回地走着,担心一些谨慎的科学家可能劝说奥本海默推迟试验。格罗夫斯把奥本海默带到了离南面掩体一万码远的控制中心。这里离基地不到六英里。

在凌晨两点三十分,整个基地都在每小时三十英里的大风和猛烈的暴风雨中。杰克·哈伯德和他的气象预报小组仍然预测暴风雨将会在黎明时停止。在离南面掩体的一万码处,奥本海默和格罗夫斯来回踱着步子,每隔几分钟就瞥一眼天空,看看他们能否看到天气的改变。在凌晨三点左右,他们回到了掩体里面讨论。他们都不能忍受推迟试验,“如果我们推迟,”奥本海默说,“我就不能组织我的人再来试验基地了。”格罗夫斯对于应该继续试验持更坚定的态度。最终,他们宣布了他们的决定,他们计划在五点三十分发射,并希望到那时一切都好起来。一个小时以后,天空开始放晴,风也逐渐减弱。在五点十分,芝加哥的物理学家山姆·阿利森通过控制中心的扩音器发出了低沉的声音:“现在距离发射还有二十分钟。”

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弗兰克和他的哥哥奥本海默紧挨在一起。虽然他正躺在地上,但“第一次闪出的光从地面升起透进了人的眼睛。当一个人向上看,他首先会看见火球,随即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盘旋上升的云雾。它是紫色的,非常明亮”。弗兰克回忆道:“也许它将飘向这个地区吞没我们。”他没有想到闪光中的热量如此剧烈。在过了一段时间后,爆炸的轰隆声还在远处的群山中回荡着。弗兰克回忆道:“我认为最恐怖的事情是非常明亮的紫色云团。黑色的伴随着放射性的尘埃,就悬挂在那儿,你不会感觉到它是否将会上升或是向你飘来。”

奥本海默就在控制掩体的外面脸朝下地躺着,他和南面的倒计时处有一

万码远。当倒计时还有两分钟时，他嘀咕道："上帝！这些事情对我太严酷了。"一位将军在最后倒计时密切注视着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在倒计时最后几秒时，变得越来越紧张，他屏住了呼吸"。在最后的几秒，他直接盯着前面。随着广播员喊出"发射！"，巨大的光亮紧随着深沉的爆炸声，他脸上显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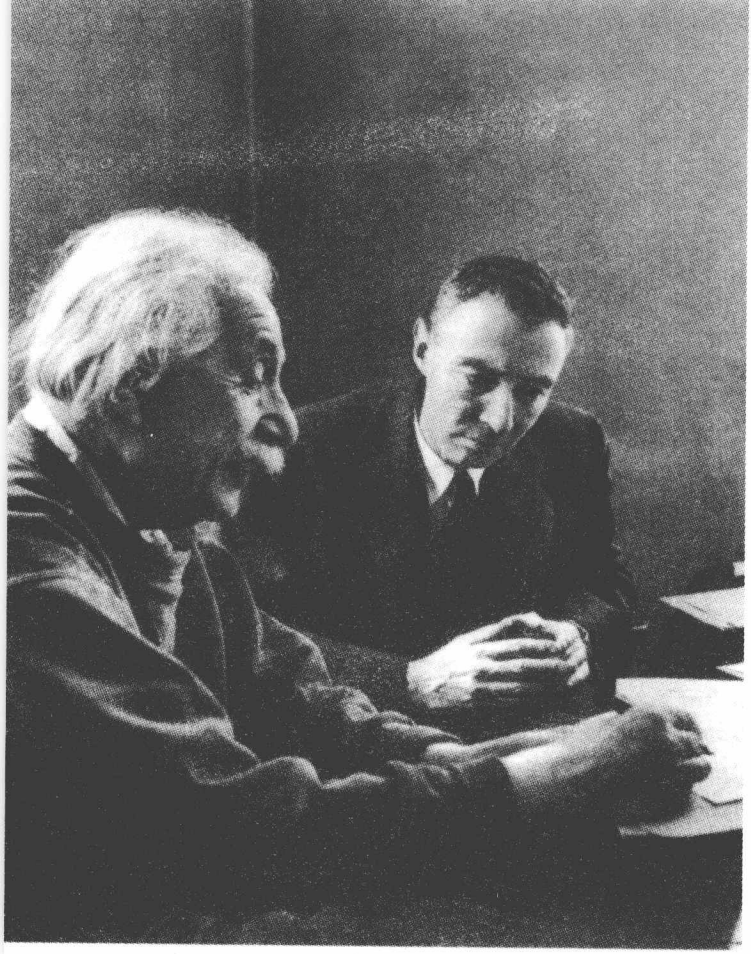
当然，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对未来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时刻，奥本海默的头脑里闪现了什么。他的弟弟回忆说："我想我们只是说，它成功了！"

随后，拉比在远处看见了奥本海默。他的步态，一个能主宰自己命运的男人的随和举止，使拉比感受深刻。"我不会忘记他的步态，不会忘记他走出汽车的方式……他的步态像正午的太阳，这是一种高视阔步的姿态，他做到了。"

那天早上晚些时候，被格罗夫斯选来记录这件大事的《纽约时报》记者威廉·劳伦斯采访奥本海默对此事的评论。奥本海默以一种平和的口气描述了他的激动。他告诉劳伦斯，爆炸的效果并不全是使人激动，它还是令人恐怖的。在停顿了一下后，他补充道："很多现在还没长大的孩子将会感激它。"

奥本海默随后又说，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蘑菇云升腾到天空，他想起了《薄伽梵歌》的诗文。在1965年的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纪录片中，他回忆道："我们知道世界将不再是同一的。一些人笑了，一些人哭了，大多数的人沉默着。我想起印度经文《薄伽梵歌》的诗句，毗瑟努试图劝服王子尽自己的职责，为了使王子铭记，他露出了他的手臂说，'现在我成为死亡，世界的破坏者。'我认为我们都应以这样或是那样的方式想到那些。"一位奥本海默的朋友亚伯拉罕·派斯曾经表示，这个引述听起来像是奥本海默的"教士般的夸张"。

当奥本海默离开了控制中心，他转身和肯·班布里奇握手。肯·班布里奇看着他的眼睛嘀咕着说："现在我们都是婊子养的了。"回到基地营地后，他和格罗夫斯以及他的弟弟分享了一瓶白兰地。接着，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记载，他给洛斯阿拉莫斯的秘书打了电话，让秘书给基蒂捎口信："告诉她，她可以换床单了。"



四部分

23 | “那些可怜的平民”

“离绝望只有一箭之遥”

——罗伯特·奥本海默

返回洛斯阿拉莫斯以后，每个人看上去都很高兴。理查德·费曼坐在一辆吉普车的引擎罩上敲打着他的小鼓，跟往常一样精力充沛。他后来写道：“我记得只有一个人并不十分高兴，只是坐在那里擦这儿擦那儿，这个人是罗伯特·威尔逊。”

“你为什么闷闷不乐啊？”费曼问。

“我们做的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威尔逊回答。

每一个来到洛斯阿拉莫斯的人都有了更好的理由来努力地工作以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就连枯燥的工作本身也变得很让人满意，但威尔逊始终高兴不起来。在阿拉莫戈多取得的伟大成就令每个人都盲目地兴奋着，甚至那些像费曼一样具有敏锐思维的人也是得意忘形。但是，稍后他说起了那个时刻，“你知道那时你停止了思考，完全停止了。”对于费曼来说，威尔逊是“那个时刻依然唯一在思考的人”。

然而费曼错了，奥本海默也在思考着。在原子弹测试后的日子里，他的情绪开始变化。在洛斯阿拉莫斯，每个人都想办法缓解实验室工作的疲劳，他们知道，试验之后这个“玩意儿”已经变成了武器，而且是由军方控制的武器。奥本海默的秘书安妮·威尔逊回忆了一系列和军方空军官员会面的情况：“他们在寻找目标。”奥本海默知道清单上那些将被攻击的日本城市。“罗伯特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变得非常安静和沉默，”安妮后来回忆说，“一是因为他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二是因为他明白结果意味着什么。”

原子弹试验结束后的第一天，奥本海默的悲伤情绪吓到了安妮·威尔逊。安妮回忆说："他开始感到很失落，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但是他过去常常从自己的房子走过技术区，我也从护士区或其他地方沿着那条路走，我们经常遇见。那天早晨，他一边吸他的烟斗一边说，'那些可怜的平民，那些可怜的平民'——他指的是日本人，言语中透露着放弃的意思。"

但是，就在那个星期，奥本海默正在努力地工作以确保原子弹可以有效地在那些可怜的平民上空爆炸。1945 年 7 月 23 日的夜晚，奥本海默和托马斯·法雷尔将军会面。那是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天气十分凉爽。奥本海默在办公室里紧张地踱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试图让军方明白他关于投送原子弹的方案。约翰·F. 莫伊纳汉中校曾是一名媒体人。他在 1946 年出版了一份生动描写那晚经过的小册子：（奥本海默说）不要在多云或阴天投弹；不能通过雷达，只能用肉眼观察投弹，但不排除用雷达检查，如果在夜晚投弹就必须有月光，那将是最好的；当然不能在雨雾天气下投弹……还有就是不要让原子弹的引爆位置太高。

奥本海默组织研制的原子弹终于要派上用场了，但他宽慰自己说，使用原子弹将不会引发和苏联的军备竞赛。原子弹试验后不久，奥本海默就听说临时委员会已经一致同意接受他的建议——应该通知苏联原子弹已经研制成功并将在日本使用。他设想这种坦率的讨论正在波茨坦进行着，因为杜鲁门和斯大林正在那里会面。然而，不久他惊骇地了解到了在那次最后的"三巨头"会议上所发生的一切。原本应是公开而坦诚的关于原子弹性质的讨论，却被杜鲁门弄得遮遮掩掩、神神秘秘。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7 月 24 日，我向斯大林提到了我们有一种具有不同寻常威力的武器。那位苏联主席对此没有特别的兴趣，他的反应只是说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希望我们能够很好地对日本使用。"杜鲁门的做法和奥本海默的期望相距甚远。

1945 年 8 月 6 日，确切时间是上午八点十四分，一架以飞行员保罗·蒂贝特母亲的名字艾诺拉·盖伊命名的 B－29 轰炸机在广岛上空投下了一颗没有经过测试的枪式原子弹。

同一天的下午两点钟，格罗夫斯将军给身处洛斯阿拉莫斯的奥本海默打电话。格罗夫斯情绪激动地对奥本海默说："我为你和你所有的同事感到骄傲。"

"进展顺利吗？"奥本海默问。

“很明显进展得很棒……”

“每个人都感觉很好,”奥本海默说,“我表示最衷心的祝贺。我们为此努力了很久。”

“是啊,我们为此付出了许多,而且我认为我选择洛斯阿拉莫斯作指挥所是我做得最明智的事情之一。”

“嗯,我有许多疑问,将军。”奥本海默有些缺乏自信地说。

“我要告诉你我可从没有过任何疑问!”

在那天稍后的时间里,洛斯阿拉莫斯公共广播系统宣布:“大家请注意,请注意,我们的军队已经成功地在日本投下一颗原子弹。”听到消息时奥本海默正站在大厅里,就在他兄弟的办公室的外面。他回忆说,他的第一反应是“谢天谢地,这东西不是一个废物”,但几秒钟过后,“遍地尸首的恐怖场景就开始在他的脑中浮现”。

那个夜晚,一群人聚集在礼堂,热切的观众们在等待奥本海默的出现。每个人都期望着他从礼堂的厢房走上台,因为那是他的习惯,但是他选择了从后面出场这一更加戏剧化的出场方式。到了台上,他把紧握的双手高高举过头顶,像一名拳击手。奥本海默对欢欣鼓舞的人群说:“现在来定性原子弹爆炸产生的效果还太早,但是我确信日本人不喜欢它。”人群欢呼起来。接着,奥本海默告诉大家应该为所有人的成功而骄傲,人群吼叫起来,大家发自心底地赞同。据一位年轻物理学家的记录,“他唯一后悔的是,我们没有能够及时地研制出原子弹用来对付德国。这句话使人群的欢呼声冲破了屋顶”。

奥本海默好像是被号召来出演一个舞台角色,一个并不适合他的角色。科学家不该是耀武扬威的将军,他只是单纯为科学所取得的成功而狂喜。除此以外,观众们期望他的出现是红光满面而且得意洋洋,但是那个时刻很短暂。

菲利浦·莫里森在蒂尼安岛上听到了消息,他在那里帮助准备炸弹并且把炸弹运上了飞机。他回忆说:“那天晚上我们有个聚会,这是战争的胜利,我们有权利庆祝。但是,当我坐在帆布床的边缘,想象着另一边是什么样子,真不敢想象那天晚上在广岛发生着什么。”

艾丽丝·金博尔·史密斯后来坚持说:“没有人因为广岛而庆祝。”但是她又承认,“少数人”试图在男人们的宿舍举行一个聚会,然而聚会却变成了一个“难忘的惨败”。奥本海默参加了一个聚会,但是当他将要离开时却看见一名明显发狂的物理学家在矮树丛中呕吐。这个情景使他隐隐意识到清算

开始了。

罗伯特·威尔逊对来自广岛的消息很惊骇。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使用原子弹。1月,奥本海默曾劝他继续工作。他知道奥本海默已经参加了临时委员会的讨论,理性地讲,他明白奥本海默不能给他坚定的承诺——这是由将军们、史汀生乃至总统来决定的,但是他仍然感觉他的信念被亵渎了。他在1958年写道:"他们背叛了我,没有讨论,没有商议,原子弹就这样在日本上空爆炸!"

威尔逊的妻子简,听到消息时恰巧在旧金山参观。她迅速返回洛斯阿拉莫斯,用微笑和祝贺问候她的丈夫,但是她发现丈夫"很失落"。简回忆说:"三天以后,另一颗原子弹毁灭了长崎,人们都在奔走欢呼,他从不参加,他非常失望。"威尔逊回忆说:"我记得当时自己的感觉像生了大病,恶心到了要呕吐的程度。"

威尔逊并不是唯一这样的人,洛斯阿拉莫斯的冶金学家西里尔·史密斯的妻子艾丽丝·金博尔·史密斯写道:"厌恶在增长,伴随着厌恶——甚至那些相信战争的顺利结束证明了原子弹的作用的人们都开始认为——原子弹成了杀人无数的恶魔。"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大多数人至少可以感觉到一时的高兴,但是在长崎的消息传来后,塞培尔感觉到一种明显的忧郁情绪在实验室中传播开来。奥本海默说,原子弹是如此可怕的一种武器,以至于战争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了。一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情报人员在8月19日报告说,奥本海默是一具"焦虑的骷髅"。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斯大林已经在雅尔塔会议对罗斯福许下诺言,而且在波茨坦对杜鲁门也作了保证。这对日本帝国的主战者们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事件。他们曾争论过诱使苏联帮助日本获得比无条件投降更加宽大的条件。两天后,即长崎被原子弹毁灭之后的第二天,日本政府递交了投降书,并附带一个条件,就是日本天皇的地位得到保证。第二天,同盟国同意了这个变动,以及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期限和帝国统治权力将隶属于盟国军事最高指挥官等条件。8月14日,东京广播宣布政府接受投降,战争结束了。几个月之内,记者和历史学家就开始争辩,如果没有原子弹,战争是否可能在相似的条件下或者同一时间内结束。

长崎的原子弹轰炸几天后,欧内斯特·劳伦斯抵达了洛斯阿拉莫斯。他发现奥本海默十分疲惫,闷闷不乐而且已经被产生的疑虑耗尽精力。

疑虑无法消除,奥本海默利用那个周末的大部分时间代表科学家组给史

汀生起草了一份最终报告。他的总结是悲观的,"……我们坚信没有军事对策能够充分有效地阻止原子武器的攻击"。这些装置已经很有毁灭性,它们将来的毁灭性会更大而且更加致命。美国胜利后仅仅三天,奥本海默就告诉史汀生和总统,没有任何国家能防御这些新式武器的攻击。

那个星期他亲自带着信件去华盛顿,在那里他见到了万尼瓦尔·布什和史汀生的助手乔治·哈里森。"一个糟糕的时代,"他在8月底向劳伦斯报告时说,"距离一切都明晰的时候还早。"他尝试着向科学家解释在原子弹上倾注努力是无用的。他暗示原子弹应该被禁止。"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毒气。"但是他发现没有人赞同他的想法。"我对谈话印象深刻,在波茨坦的事情已经糟糕透顶了,在吸引俄国人合作或者控制方面,很少或根本没有进展。"

奥本海默回到新墨西哥时比离开时更加消沉了。

几天后,罗伯特和基蒂独自去了佩罗卡连特,他们的小屋离洛斯皮诺斯不远,他们花了一周时间努力去整理过去两年紧张生活所带来的混乱。这是三年中他们第一次度过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罗伯特抓紧时间处理他的个人信件,给老朋友回信,他们中的许多人仅仅是最近才从报纸上知道战争期间他在做什么。他写信给他以前的老师赫伯特·史密斯说:"您该相信如果没有疑虑的重压就不会有承诺,今天它们对我们来说太沉重了,而将来更多的承诺也仅仅离绝望只有一箭之遥。"类似地,他写信给他哈佛的室友本海姆说:"我们现在在一个大牧场里,热切且不太乐观地追寻理智……面对的是一些令人头疼的事情。"

8月7日,哈康·希瓦利埃给奥本海默写了一张祝贺便笺:"亲爱的奥本海默,你很有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人了……"奥本海默在8月27日回了一封三页的手写信。希瓦利埃后来描述这封信说:"我们之间一直存在不寻常的亲密感情。"对于原子弹,奥本海默写道:"那东西不得不做,当全世界的人前所未有地渴望和平时,它终归必须被拿到一个公开的场所。"但是,他轻松不起来,"就像我们所想的,情况不容乐观,在重塑世界的过程中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奥本海默已经决定辞去科学主管的工作。8月底,哈佛、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都愿意他前去工作,但是他想回到加利福尼亚。"我有一种克服不了的属于那里的意识。"他在写给他的朋友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的信中说。奥本海默在写给劳伦斯的信中说:"我曾经对我们在伯克利的讨论

有一种十分悲伤的复杂感觉。”他提醒他的老朋友说：“我总是比你更容易受欺压，那是属于我的不可改变的一部分，因此我不为它害羞。”他还没有决定去做什么。

甚至随着“奥本海默”变为全球家喻户晓的名字，他仍把自己定义为“受欺压者”。当他们回到洛斯阿拉莫斯时，基蒂告诉她的朋友琼·巴彻说：“你不能想象这对我来说是多么可怕，他完全变了。”巴彻对基蒂的情绪状况感到震惊。“她只是害怕会再发生什么让罗伯特产生过激的反应。”

广岛和长崎的蘑菇云已经深深影响了奥本海默。“基蒂不经常表露她的感情，但是她不知道自己能否继续忍受得了。”巴彻说。罗伯特向他人倾诉他的悲伤。罗伯特给他的道德文化学校的同学简写的信，“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失望和悲痛”。

在台地上，很多人有相似的情绪反应——特别是在10月塞培尔和菲利浦·莫里森带着第一批科学观察家从广岛和长崎回来之后。到那时，人们有时会聚在他们的房子里来试着了解发生的事情。“但是，菲利浦是唯一让我真正明白它的人，”琼·巴彻回忆说，“他有天才般的口才和叙述能力。我回到家里不能安眠，整夜地发抖，它是如此令人震惊。”

莫里森在“艾诺拉·盖伊”投下那绝命一掷的三十一天后就登上了广岛。“街上差不多方圆一英里的每个人都被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热量迅速而严重地烧伤了，”莫里森说，“热量烧得突然且奇特。日本人告诉我们，穿着条纹服装的人的皮肤被烧成了条纹状……有很多人认为他们自己很幸运，他们从房子的废墟中爬了出来，只是受了轻微的伤，但是不管怎样他们还是死掉了。他们在数日或者数周之后死于原子弹爆炸时发出的大量射线。”

莫里森在洛斯阿拉莫斯给出了一份关于他所见情况的正式简报，但是他也为一家当地广播站概括了他的报告：“我们最终在广岛上空低空盘旋并且不愿相信地注视着，曾经的一座城市被夷为平地，遍是烧焦的红色……但是在一个长夜里并不是数百架飞机光临这座城市。一架轰炸机和一颗炸弹只是在打出一颗步枪子弹的时间内穿过了城市，就把一座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燃烧的火葬场。”

伊迪丝·华纳女士第一次是从基蒂那里听到了广岛的消息，那天基蒂去取新鲜的蔬菜。“许多东西现在弄明白了。”华纳后来记录道。不止一位物理学家强迫自己去奥特韦桥的房子对温柔的华纳女士解释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莫里森把他自己的愿望写给她，“所有聪明善良的人们都能理解我们所

面临的危机”。既然已经参与研制原子弹，莫里森和其他很多物理学家现在相信，唯一明智的行动是对原子弹进行国际监管。华纳女士在 1945 年的圣诞节写道：“科学家们知道，他们现在不应回到实验室里，而把原子弹留在军队或政客手中。”

奥本海默知道，在基本意义上，曼哈顿工程确实已经达到了拉比所担心会达到的目的——它已经制造出了一种极具毁灭性的武器，从而达到了“三个世纪以来物理学的高峰”。他认为，那个工程已经耗尽了物理学的光辉；而且不久之后，他就开始贬低它在科学成就上的意义。“我们得到了这棵大树和树上大量成熟的果实，”奥本海默在 1945 年的晚些时候告诉一名参议员，“并且用力摇晃它，雷达和原子弹出来了。整个战时的精神似乎只是对知识不顾一切地无情掠夺。”他说，战争具有“一个明显的物理学上的效果”，“它实际上阻止了它”。

1945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奥本海默去和亨利·史汀生告别。这一天不仅是史汀生的 78 岁生日，也是他陆军部部长任期的最后一天。奥本海默知道，他计划那天下午在白宫举行一个宴会。奥本海默认为，“关于原子弹的公开接洽已经被延误很久了……”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他将直率地告诉杜鲁门总统，“我们应该马上和苏联接洽，去分享原子弹的一些信息”。

罗伯特真诚地喜欢并信任这位老人，他很难过地看到，他将要在如此充满批判的十字路口离开。大家激烈地辩论战后该如何管理原子弹。在这种情况下，奥本海默又一次为他提供了一些关于原子弹的信息，而后史汀生告诉奥本海默陪他一起去五角大楼理发店去理他那稀疏的灰色头发。即将离开时，史汀生从理发椅上站起身来，紧紧握抓奥本海默的手说：“现在它在你的手中了。”

24 | “我觉得我的手满是鲜血”

“如果原子弹成为充满敌对的世界的新式武器，或者成为国家备战的武器，
那么人类诅咒洛斯阿拉莫斯和广岛的日子也就到了。”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45 年 10 月 16 日

罗伯特· 奥本海默现在成了名人，他的名字被亿万美国人所熟知。他轮廓分明的外形，开始出现在报纸杂志的封面，传遍整个美国。他的成功成了整个科学界成功的代名词。《密尔沃基日报》发表社论称，他是“值得钦佩的研究员”。《圣路易斯邮报》说他是美国的“科学先驱，为了探险，否定一切需要否定的事物”。《科学月刊》发表文章说，我们必须尊重他们“光荣的成就”，“现代版的普罗米修斯再次奇袭奥林匹斯山，为人类带回了宙斯的雷电之火”。《生活》杂志说，这位物理学家现在就好像穿上了“超人的紧身衣”。

奥本海默在无数恭维中安逸地生活着。之前，他似乎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去适应他在台地上的新角色；而存在，他正在向一个政治科学家转型——并成为一个符号，甚至腔调、烟斗、草帽都迅速得到了国际认同。

奥本海默的私生活开始迅速被大众关注。“我发明了一件东西，一件最可怕的武器，”他这样告诉美国哲学学会的一位听众，“世界的本质正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从世界的各个角度来看，我们发明了一件邪恶的东西，而且我们还在继续这么做……我们再次提出科学是否对人类有益的问题……”“原子弹之父”解释说，它被定义为可怕的、有侵略性的武器，而且还很便宜。这些结合起来，它有一天可能会毁掉整个文明。“就目前所知道的，核武器可能会很便宜，原子弹使用的例子出现在广岛，”他说，“广岛投放的原子弹是用来彻底击败敌人……它是给侵略者的武器，原子弹与生俱来具有震惊和恐怖的元素，就像原子天生就具有可裂变性一样。”

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对他的讲演能力很吃惊，他经常在即兴演讲中表现出雄辩和镇定。有一次，哈罗德·彻尼斯出席了一个在伯克利举行的学生集会，当时奥本海默正在演讲。几千人挤进体育馆听这位著名科学家的演讲。“从他开始说话到结束，整个场馆里没有一个人窃窃私语，他好像有某种魔力。”

整个秋天，奥本海默穿梭于洛斯阿拉莫斯和华盛顿，想用他的名望影响政府高层官员。他说的话几乎代表了所有洛斯阿拉莫斯的民间科学家。1945年8月30日，他们当中的大约五百多人涌进礼堂，准备建立一个新组织——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联盟。那些天里，汉斯·贝特、爱德华·特勒、弗兰克·奥本海默、罗伯特·克里斯蒂和其他人起草了一份关于军备竞赛危机的措辞强硬的宣言：在未来战争中不可能防住原子弹的进攻，这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当奥本海默知道后，他给陆军部递交了这份“文件”。每个人都希望这个宣言能够很快被媒体报道出去。

9月9日，奥本海默把这份报告送给史汀生的助理乔治·哈里森。在附信中他提到，“文件”已经分发给了三百多位科学家，只有三个人拒绝在上面签字。奥本海默写道，“文件”确实反映了他的个人观点，他还希望陆军部能够批准“文件”发表。不久，哈里森打电话给奥本海默说，史汀生想要更多的复本供政府内部交流，但是他补充说，陆军部不会希望它发表的，至少现在还不会。

然而到了月底，政府对“文件”进行了加密，更让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联盟的科学家们震惊的是，一位深受信任的特使临阵倒戈，决定抵制“文件”。在他的一些同事看来，奥本海默在华盛顿待的时间越长，他就变得越妥协。

奥本海默坚信自己有这样做的理由：杜鲁门政府可能会建议在核能问题上立法，并且向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解释，关于热点问题的公众讨论是非常必要的，出于礼貌的考虑，他们应该等待，直到杜鲁门总统把他关于核能问题的批示转给国会。

当杜鲁门总统在1945年10月3日把批示转给国会时，许多科学家起初都感到很心安。一名为艾奇逊工作的年轻律师赫伯特·马克斯起草批示，要求国会建立原子能委员会用强制力规范整个领域。甚至华盛顿的会员也不知情，奥本海默帮助马克斯起草了文件。这份文件反映了奥本海默关于核能

潜在危险和利益的急切心情。关于核能的使用，杜鲁门宣称："一种新的力量太具革命性，以至于不能在旧的意识框架中考虑。"时机才是关键。"民众的希望基于当前的国际格局，"杜鲁门强调说，"如果可能，他将要放弃使用和发展原子弹……"奥本海默认为，他在废除核武器方面赢得了总统的认同。

但是，即使奥本海默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也不能左右接下来几天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参议员埃德温·C. 约翰逊和肯塔基州的众议员安德鲁·J. 梅制定法律。"梅—约翰逊提案"和总统讲话的意图严重相左。大多数科学家把它当作军方的胜利。最重要的是，该提案建议要重罚那些违反国家安全原则的人。奥本海默宣布支持"梅—约翰逊提案"，这让他的同事们很费解。

弗兰克·奥本海默极力反对他的哥哥。作为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们联盟中的积极分子，弗兰克认为是公开教化民众的时候了，告诉他们国际控制的重要性。据弗兰克回忆，当时他说没有时间了，他在华盛顿看见所有事情都在发展，他觉得他必须从中改变些什么。或许奥本海默在做一个计划好的冒险，他打算用他的威望和关系去劝说杜鲁门政府在国际控制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他并不关心在民用和军用核能领域做过些什么。或许他不想把自己卷入政治的压力当中，使政府把自己定义为局外人，一个"麻烦制造者"。在核时代的第一个法案中，他要站在舞台的中央。

为了反对"梅—约翰逊提案"，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联盟的成员开始有了第二个想法。维克托·韦斯科普夫告诉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同事，"应该更仔细地研究奥本海默的建议"。在这个月里，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联盟与国会断绝了来往，并开始动员反对立法。

让许多华盛顿官员大为惊讶的是，科学家的不知疲倦的游说打败了"梅—约翰逊提案"，这样一来，一个由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提出的新议案应运而生，建议控制核能政策，建立一个专为民用的原子能委员会。但是，在 1946 年 8 月 1 日杜鲁门签署原子能法案时，许多科学家发现法案的内容已经修改了很多，多得让他们都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取得了这场提案之争的胜利。例如，法案包括控制核物理学家工作的领域，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从未经历过如此严苛的安全等级。

在国会讨论期间，奥本海默正式辞去了洛斯阿拉莫斯主管的职务。1945 年 10 月 16 日，台地上的所有人参加了一个重要的颁奖典礼，来向他们 41 岁

的领导者道别。在奥本海默作告别演讲之前,多萝西·麦克宾简短地向他致谢。奥本海默没有准备演讲稿,麦克宾回忆说:"他的眼睛发亮,这是他思考的方式,事后我才知道,罗伯特是在准备他的领奖词。"几分钟后,讲台上的奥本海默从格罗夫斯将军手中接过并举起荣誉证书,就在新墨西哥州的太阳底下,他用低沉且平静的声音表达了他的希望,他希望这些年来在实验室里团结工作的每一个人,在未来能够骄傲地回想起今日的成就。但是,他又用严肃的语气警告说:"必须清醒而深刻地认识今日的成就。如果原子弹成为充满敌对的世界的新式武器,或者成为国家备战的武器,那么人类诅咒洛斯阿拉莫斯和广岛的日子也就到了。"

他的话使台地上的许多人感到心安,他仍然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一位洛斯阿拉莫斯的居民写道:"那一天,他就代表我们,讲给我们听,为我们而讲。"

10月18日,奥本海默回到华盛顿在斯塔特勒宾馆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六位议员,奥本海默清楚明确地概括了原子弹对国家的危险。同时出席会议的还有亨利·华莱士。他曾在罗斯福的第三个任期(1941—1945)担任副总统职务,现在是杜鲁门政府的商务部长。奥本海默抓住时机走到华莱士跟前,表示要跟他私下聊几句。华莱士邀请他第二天早上一起散步。

奥本海默和前副总统一起穿过华盛顿的闹市区向商务部走去,并表示出对原子弹深切的焦虑,迅速阐述了政府政策中存在的危险。华莱士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未见过像奥本海默那样焦急紧张的神态,他仿佛觉得整个人类即将毁灭。"奥本海默尖刻地批评说,国务卿伯恩斯"觉得我们在国际外交中就像是用手枪一样肆意使用原子弹"。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俄国人是一个骄傲的民族,拥有优秀的物理学家和大量的资源。他们可以为了造原子弹而降低生活水平,为了在短期内尽快拥有大量的原子弹不惜一切代价。他认为,错误地处理波茨坦的局势会导致亿万无辜的人大量死亡。"

奥本海默向华莱士表示,早在去年春天,也就是"三位一体"核试验之前,他的许多科学家就对可能与苏联之间的战争表示高度关注。罗斯福政府曾经制定了在原子弹方面和苏联交流的计划,但是未能实现。他怀疑这是由于英国的反对。但是他仍然认为,史汀生对整件事的观点很有政治家的风格,他还很赞赏地提到了陆军部部长给杜鲁门的9月11日的备忘录,宣称可以移交给苏联工业技术和科学资料。基于这一点,华莱士打断他说,史汀生从未在内阁会议上提到这个观点。很显然,奥本海默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忧虑,他说他的那些在新墨西哥的科学家都十分伤心,他们的全部考虑是和原子弹有

牵连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这时，奥本海默问华莱士他是不是应该去见一下总统。华莱士鼓励他试着通过新的陆军部部长罗伯特·P. 帕特森预约。就这样，两个人分开了。华莱士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原子弹科学家的负罪感是我见到过最感震惊的事情。"

六天后，1945 年 10 月 25 日，上午十点半，奥本海默被人引进总统办公室。杜鲁门总统对接见这位因极其健谈和魅力超凡而著名的物理学家自然而然地感到好奇。在帕特森做过介绍后，屋里没有了其他人，三个人坐下。这时，杜鲁门首先以要求奥本海默帮助国会通过"梅—约翰逊提案"打开话题，要求把原子能的永久控制权交给军队。杜鲁门说，第一件事是要明确国内问题，然后才是国际问题。奥本海默在尴尬的沉默许久后，迟疑地说，或许应该先考虑一下国际问题，当然，他的意思是当前最紧急的是要通过对核技术在国际范围内的全面控制来阻止核武器的扩散。谈话正在进行，杜鲁门突然问奥本海默，你猜苏联什么时候会发展他们自己的核武器。当奥本海默回答说不知道时，杜鲁门自信地说："永远不会。"

对于奥本海默来说，这种愚蠢正体现了杜鲁门的局限性。威利·希金博特姆回忆道："能让他理解是件不可能的事情。"杜鲁门是一个用计算和演示来弥补他的不安全感的人。奥本海默看似疯狂的假说晦涩而不受欢迎。最后，他觉察到总统对他的急切不能理解，奥本海默不安地扭动着他的手，说出了那句让他后悔的话，也是他在压力下个性的体现，他平静地说："总统先生，我觉得我的手满是鲜血。"

这句话激怒了杜鲁门。随后他告诉大卫·利林塔尔："我告诉他血在我的手上，让我去操心吧。"但是几年后，杜鲁门美化了这个故事。他回忆当时说的是："不用担心，总会洗掉的。"另一个版本是，杜鲁门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手帕递给奥本海默说："那好，你想在这儿擦擦手吗？"

这段交谈接下来是一段可怕的沉默，然后，杜鲁门站起身来表示会谈到此结束，两人握手，杜鲁门作报告似的说："不用担心，我们正在解决这件事，你会帮助我们的。"

随后，有人听见总统嘀咕道："你手上有血，见鬼！你手上的血还没我手上的一半多呢。你只不过是在无故抱怨罢了。"他又告诉迪安·艾奇逊："我再也不想看见这个婊子养的家伙。"甚至在 1946 年 5 月，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次会谈，他说："奥本海默就像一个哭泣的婴儿，他在五六个月之前来我的办公室，花大部分时间在那里扭手，还告诉我说他发明了原子弹，所以觉得手上

沾满鲜血。”

在这个重要的场合，冷静、雄辩、一向魅力十足而且自恋的奥本海默放弃了。他习惯于在轻松自在的时候自发地工作，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在压力下说出的话深感后悔。这对他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有机会向一个拥有权势的人表达要求帮助他把核恶魔放回瓶子里，但他完全错失了这个机会。

这不是奥本海默第一次也不是他最后一次冒犯权威人士。在他的生命里，他一次又一次地展现他自己最伟大的思考能力，他能够耐心、亲切、温柔地对待他的学生，除非他们公然地问他愚蠢的问题；但他通常是不耐烦地、坦白无礼地指出那些权威的问题。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杜鲁门对核武器所牵扯到的问题的不理解和忽视，促使奥本海默说出了那些他本应该认识到可能会激怒总统的话。

杜鲁门对科学家的态度从来没有改变。总统给许多科学家的印象是理解能力比较差且目光短浅。拉比说：“他是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科学家们对这个观点都很认同。甚至老练的华尔街律师、曾担任过杜鲁门政府陆军部部长助理的约翰·J. 麦克洛伊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总统“是个简单的人，能够果断迅速地做出决定，或许是太迅速了，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总统，“一点都不杰出，不像林肯，而只是一个普通的、依靠本能的、实在的人”。与麦克洛伊、拉比和奥本海默不同，人们全都认为杜鲁门的直觉既没有分寸又不健全，而且很悲哀，尤其是在核外交领域，根本不能迎接挑战以及当下我们所面对的国家和世界。

回到台地，没有一个人认为奥本海默是个“哭泣的婴儿”。1945 年 11 月 2 日，一个湿冷的晚上，这位前主管回到了台地。洛斯阿拉莫斯的剧院再一次挤满了人，他们都是来听奥本海默的“我们所处的困境”的演讲的。一开始，他就坦白地说：“我确实不了解实际的政治。”但是，那并不重要，因为有一些摆在面前的问题需要直接对科学家讲，过去发生的事情迫使我们“要重新考虑科学与常识间的关系”。

他说了一个小时，大多是即兴的，他的听众被他迷住了，多年以后人们仍然会说：“我记得奥本海默的演讲……”他们会记得那个晚上，因为他把对原子弹的复杂感情解释得恰到好处，使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的听觉上的需要。他说：“如果你是个科学家，你会为发现世界运转的原理而高兴……这证

明人类可能会拥有巨大的能力来控制世界，并能根据事实和价值来处理世界。这是件好事，但原子弹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作为一名科学家，奥本海默告诉他们，面对这个严重的危机，他们不能逃避责任。他说，许多人尝试要摆脱这些，他们认为这个只不过是另一种武器。科学家们更清楚，对我们来说应该把它看成一个非常严峻的危机，认识到我们开始制造的核武器是个大麻烦，他们将被卷入一场大的变革，而不是小小的改变。

“对我来说，战争已经改变了。长崎投下的原子弹能够毁掉十平方英里。如果有人想制造它，它就会变得很便宜。”数量上的改变，会导致战争本质的改变，现在战争的优势完全属于侵略者，而不是防守的一方。但是，如果战争变得无法忍受，那么国际关系将会在精神法律和理念感觉上发生最根本的变化。

这个危机要求国与国之间的态度和行为进行历史性的转变。他正在寻求现代科学的经验指导。他认为，他采取的是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法。首先，集中精力组建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用实力武装自己，而不是听命于总统的观点，致力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第二，应该建立具体的措施来确保科学家们的交流，我们将使科学家之间的兄弟关系更加紧密。最后，我要说的是，不再制造原子弹。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好的提议，但这只是个开始。我知道“我们这的许多朋友会亲眼看见美丽的景象。我要特别说的是玻尔……”。

尽管玻尔和其他的多数科学家赞同这一点，但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只是这个国家里的极少数。随后在他的演讲里，奥本海默承认，他被大量的政府文件所困扰，这些文件要求为原子武器的使用单方面承担责任。在那个星期早些时候的海军建军节上，杜鲁门总统在纽约中央公园作了一个好战的演讲，以展示美国的军威。杜鲁门说，为了世界的和平，原子弹将被美国当作“神圣的信赖”，而且我们不会做出任何与邪恶妥协的决定。奥本海默说，他不喜欢杜鲁门那种必胜的口气，“如果你在谈论问题时说‘我知道什么是对的，并且我们喜欢用原子弹劝说你同意我们’，那么你就会处在弱势的地位，并且你也不会成功……你是在用武力的方式阻止灾难”。他说他不会评论总统的动机和目的，但是“我们有一亿四千万人口，而全世界有二十亿人”。或许自信的美国人坚信他们的信仰会在全世界流行，但是，对其他民族的全面否定不可能达成任何协定。

那天晚上，礼堂里人群涌动。奥本海默的讲话说出了他们的渴望，点燃了他们的疑虑、担心和希望。在几十年以后，他的讲话产生了共鸣。他所描

绘的世界正是原子时代的世界雏形。他就如同一名出色的政治家,用谦逊的话语阐述了当下问题的核心。世界正发生着变化,美国将独自在危险的边缘前行。

25 | “人们可以摧毁纽约了”

“我发现我生命的全部——物理学和物理教学——现在看来已经无关紧要了。”

——罗伯特·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在华盛顿开始有了发言权，然而这却引来了埃德加·胡佛的注意。那年秋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散播有关奥本海默与共产党之间存在联系的流言。1945 年 11 月 15 日，胡佛向白宫和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文件，这份共三页的文件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奥本海默的调查总结。胡佛报告说，一些旧金山的共产党官员提到过奥本海默是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胡佛还写道：“在加利福尼亚，有一些共产党员在奥本海默参加原子弹计划之前就已经认识他了，而在原子弹爆炸后，他们对与奥本海默重新建立旧有的联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胡佛提供的信息很成问题。美国联邦调查局确实曾经窃听到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共产党员提到过奥本海默是一名共产党员，但这一点也不稀奇。事实上，早在战争之前，就有一些共产党人假设罗伯特（奥本海默）已经入党，另外还有一些人早就认识奥本海默，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就希望把奥本海默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说成是他们中的一员。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四天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有一次窃听到两位共产党员的对话，其中一位叫大卫·阿德尔森，是一名共产党组织者，另一位叫保罗·平斯基，是一名共产党活动家。大卫说：“奥本海默开始得到信任了，这真是不错。”保罗说：“是呀，我们应该宣称他是共产党员吗？”大卫笑了笑说：“当初，就是奥本海默那个家伙把我辞退的，还记得那次会议吗？”“是的，当然记得。”大卫接着说：“只要他们一把奥本海默身边的探子调走，我就会找到他，在他那要点钱。现在没人敢碰这个家

伙了,但是他也该出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了。"

非常明显,大卫和保罗认为奥本海默很同情他们的政治主张,但这就能说明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吗?而且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已经注意到保罗的一个问句:"我们应该宣称他是共产党员吗?""有迹象表明,奥本海默的正式党员身份依然有一些疑问。"

白宫和国务院并没有对胡佛的调查做出什么反应,但胡佛并没有死心。直到1945年底,美国联邦调查局依然对奥本海默在伯克利郊区的家进行窃听。在1946年1月1日举行的新年舞会上,美国联邦调查局窃听到了来看望弟弟的奥本海默与平斯基和阿德尔森的交谈。平斯基和阿德尔森试图说服奥本海默在他们召集的联盟会议上作一篇有关原子弹的演讲,尽管弗兰克(奥本海默的弟弟)同意了这个请求,但奥本海默却礼貌地拒绝了。平斯基和阿德尔森并没有对此感到很奇怪。因为另一名共产党员巴尼与平斯基和阿德尔森谈论奥本海默时也提到,共产党曾尝试过与奥本海默建立联系,但他却没有同意,而他们的一位老朋友史蒂夫·纳尔逊——一位奥克兰的共产党员——也曾多次试图利用他和奥本海默的友谊劝说奥本海默入党,但也被他拒绝了。

史蒂夫再也没有见过奥本海默,而其他党员也认为奥本海默只是曾经和共产党有过一些接触。甚至哈康·希瓦利埃都知道,奥本海默根本没有遵守过党的纪律。一直以来,奥本海默都是我行我素,按自己的意愿办事,这就使得除了奥本海默本人以外的所有人都难以准确地探寻出奥本海默和共产党之间的真正关系。同样,人们也无法得知,这样的关系对于奥本海默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美国联邦调查局永远都无法证明奥本海默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在接下来的八年中,胡佛和美国联邦调查局依然每年都炮制出一千多页的内部报告、监视报告或者窃听记录,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败坏这位我行我素的思想家的名誉。1946年5月8日,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是在奥本海默在苍鹰丘的家中安装了搭线窃听器。

胡佛不管别人的顾虑,亲自指挥了这些调查。早在1946年3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曾利用一位天主教神父去说服奥本海默过去的秘书安妮·威尔逊做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这位来自巴尔的摩的神父叫约翰·奥布赖恩。他说安妮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女孩,他想他能够说服她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寻找有关奥本海默泄漏原子弹机密的信息。胡佛同意了这一计划,只要神父能够按规矩办事——对发生的一切保守秘密。

奥布赖恩神父希望得到一些能够贬损奥本海默的信息，他想利用这些信息在和安妮的交谈中鼓动她参与到计划中来。但是，奥布赖恩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头头却告诉他，在了解到安妮的真实想法之前这并不是个安全的策略。1946 年 3 月 26 日晚上，奥布赖恩与安妮·威尔逊见了面。第二天早上，奥布赖恩打电话给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说，出于对自己的信仰与国家的忠诚，安妮·威尔逊表示她不会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安妮·威尔逊对奥本海默非常忠诚，她对神父说，她完全相信奥本海默教授的正直为人。尽管安妮·威尔逊面前的这位神父是她过去的老师，同时还是她家族的亲密朋友，但是安妮·威尔逊仍然拒绝向他透露任何信息。她表达了她对于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奥本海默教授的行为的愤怒。安妮说奥本海默教授曾经和她提到过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监视他，安妮认为这根本就是无耻的行为。

奥本海默对于被监视非常生气。有一次在伯克利，奥本海默正在与他过去的学生约瑟夫·温伯格谈话的时候，突然指着墙上的一个铜质圆盘问道："那该死的东西是什么？"温伯格试图向奥本海默说明那是学校以前安装的内部通信联络系统，而那个圆盘是用来遮住那个洞的。但是，还没等他解释完，奥本海默就生气地说道："那里根本就藏着一个窃听器，过去是，现在也是！"然后，他踩着重重的步子走出房间，狠狠地摔上了他身后的门。

1945 年圣诞节的那个星期非常寒冷。有一天下午，奥本海默拜访了拉比在纽约市河畔大道的住所。这两位老朋友坐在卧室里向窗外看去，落日余晖下的哈得孙河愈发绚烂夺目，一块块浮冰顺流而下。他们各自坐在黑暗中，一边抽烟，一边探讨核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危险。拉比告诉奥本海默，他有一个想法，就是建立一种国际机制控制核技术。奥本海默很高兴成为他唯一的听众。其实，自从在洛斯阿拉莫斯与玻尔谈话之后，奥本海默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很有可能的是，奥本海默与拉比之间的这次谈话真正促使他把这种想法改进成一种可行的计划。拉比回忆说："我想到了这个计划，它必须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原子弹必须在国际控制之下，因为原子弹被国家控制很容易造成国家之间的核竞争；另外，我们也相信这个时代不断发展的工业正需要核技术带来的巨大能源。"因此，拉比和奥本海默设想成立一个真正有权力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控制核武器，并且还可以和平利用核能。那些被发现秘密制造核武器的国家，将面临核设施被关闭的惩罚。

四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946年1月，奥本海默听到一个令他振奋的消息。几个月前开始的美苏等几个国家举行的协商终于有了结果，会议决定建立一个联合国原子能机构。作为回应，杜鲁门总统指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制订一个关于国际社会控制核武器的方案。迪安·艾奇逊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其他的委员还包括一些美国外交决策界的重要人物，如前陆军部部长助理约翰·麦克洛伊以及万尼瓦尔·布什、詹姆斯·科南特、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当艾奇逊向他的私人助理赫伯特·马克斯抱怨他对于原子物理一无所知时，马克斯建议艾奇逊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马克斯是个年轻有为且善于交际的律师，他曾经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主席利林塔尔工作过。尽管支持新政的利林塔尔也不是一位科学家，但是他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曾经和数百位工程师和科学家一起工作过。他很快就同意出任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并指定了另外四名成员：新泽西贝尔电话公司董事长切斯特·巴纳德、孟山都化学公司副董事长查尔斯·托马斯博士、通用电气公司副董事长哈里·温纳，还有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对事件的进展非常高兴。这是他一直以来等待的机会，希望能够解决有关原子弹控制的一些主要问题。那年冬天，艾奇逊的委员会和他的顾问小组开始断断续续地开会，打算起草一份初步方案。作为其中唯一的一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自然而然地主导了这一讨论过程，他明确、清楚地向他的同事们表达了他的观点。他需要得到所有人的一致同意，他对此很有信心。从一开始，奥本海默就使利林塔尔非常愿意听从他的意见。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华盛顿肖尔汉姆旅馆的房间里。“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利林塔尔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看着地面，一边走着一边和我谈话，在说完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后总会发出‘呼’的一声非常可笑的声音——真是奇怪的习惯动作。声音很大……我发觉自己很喜欢这个人，被他思想的火花所打动，但更被他滔滔不绝的讲话所震撼。”在艾奇逊的日记里还描绘了奥本海默的一些事情，最后，他写出了自己的真切感受：“他（奥本海默）的生命很有价值，他让全世界知道了我们中间有他这样的人物。”

格罗夫斯曾经知道奥本海默在工作中给人的魅力，但是这次他想奥本海默做得有点过火了。“每个人都听从他的意见。利林塔尔已经糟糕到需要请教奥本海默自己早上应该戴什么样的领带。”麦克洛伊是对奥本海默最着迷的一位。麦克洛伊早在战时就已经认识他了，他至今依然觉得奥本海默知识渊博，拥有“音乐般细腻”的思维，是一个有“巨大魅力”的知识分子。

“我认为所有的成员都赞成,这个委员会里最激动、最有创造性的想法都是奥本海默想出来的。”艾奇逊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工作时,他往往还表现出他那最具建设性的思想和最随和的一面。奥本海默有的时候特别喜欢争论,非常尖锐,然而有时他也非常迂腐、固执,但在我们工作时他从不这样。”

按照他们原来的想法,奥本海默是到艾奇逊在乔治城的家中做客的;但是在晚宴过后,奥本海默手里握着一支粉笔,站在一块小黑板前,向麦克洛伊和主人(艾奇逊)讲起了关于原子的一些复杂的事情。为了让大家更为直观地理解,奥本海默画了些小竖条来代表电子、中子和原子,它们以一种无规律的方式互相追逐。“我们不知所措的问题好像令他非常困惑,”艾奇逊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最后他绝望地将手中的粉笔放下,说‘没希望了,我真的会认为你们两个觉得电子和中子是两个小人’。”

1946 年 3 月初,顾问团起草了一份约三万四千字的草案,这份草案由奥本海默撰写,马克斯和利林塔尔也参与其中。3 月中旬,他们开了一次为期四天的全天会议,地点选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酒店,这座位于乔治城的拜占庭风格的建筑非常庄严。在会议临近结束时,艾奇逊、奥本海默和其他人轮流宣读了这份文件的各个部分。当他们结束时,艾奇逊环顾了一下四周,摘下了他的眼镜,对大家说:“这将是一份伟大且意义深远的文件。”

奥本海默已经说服了工作小组的同事们赞同这份引人注目的、覆盖面广的计划。他宣称,即使做到其中的一半措施都不是充分的,因为除非全世界每个人都百分之百地执行这项计划,否则这份严禁核武器的国际条约就不会成功。首先,单单就这项计划所需要的国际核查人员的数量就很难实现,因为根据这项计划,仅仅用于监视奥克里奇的核查人员就需要三百多个。而现在,如此多的国家都在试图和平开发核能,那得需要多少核查人员呢?就连奥本海默自己都承认,事实上,核查人员要想检测出用于民事目的核资源是否被用于制造核武器是相当困难的。如果一个国家有能力和平开发核能,那么它将不可避免会拥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能力。

为了走出这种两难的境地,奥本海默再次采取了一种当代科学的国际主义解决方法。他设计了一个国际机构,这个机构可以垄断全世界所有的原子能,然后再根据需要分配给全世界各个国家。这个机构必须既要控制原子能技术,还要严格地使其用于民事目的。奥本海默相信,在未来“没有一个国际政府,就不会有永久的和平;而没有和平,就必将有战争”。然而,世界政府

的成立是不可能马上实现的，所以奥本海默辩称，各国应首先在原子能领域让渡部分主权。根据他的这项计划，设计成立的原子能开发总署将拥有全世界所有的铀矿、核反应堆以及核实验室。任何国家都不可以制造原子弹，但全世界所有的核科学家仍然可以把开发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在4月初的一次演讲中，他向大家解释了这一概念："我们这里所提出的让渡主权是充分的，但绝不是过分的。我们希望一个原子能开发机构可以真正建立起来，测试它在开发、研究和控制核能方面的功能，使它可以保护全世界免受核武器的侵扰，同时我们还可以和平利用核能。"

这种完全的透明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拥有足够的工业、技术、材料等资源来秘密制造核武器。奥本海默知道，这样的话，一个国家还没制造出核武器，秘密就已经泄露了。国家可以建立一种透明的体制，以使文明社会可以在流氓政权着手准备制造核武器时给与充分的警告。

不久之后，奥本海默的报告，也就是著名的"艾奇逊—利林塔尔报告"被白宫采纳。奥本海默非常高兴。当然，总统也知道控制核能的紧迫性。

但是，奥本海默有点过于乐观了。国务卿伯恩斯找了个借口说他被报告深深地打动了，事实上他是被报告的建议如此彻底全面震惊了。一天之后，他说服杜鲁门总统指定伯恩斯的长期商业伙伴——华尔街金融家巴纳德·巴鲁克向联合国"解释"行政当局的计划。艾奇逊被吓到了。利林塔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当我晚上看到新闻时，我快晕倒了。"当奥本海默得知这项指派时，他告诉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威利·希金博特姆——新成立的原子能科学家联盟的主席——"我们迷失了"。

巴鲁克在私底下已经对"艾奇逊—利林塔尔报告"表达了极大的保留态度，他向两位保守的银行家费迪南德·埃伯施塔特和约翰·汉考克（雷曼兄弟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以及一位自己的私人好友、矿业工程师弗瑞德·瑟尔斯寻求建议。巴鲁克和国务卿伯恩斯都是纽蒙特矿业公司的董事和投资人，而纽蒙特矿业公司在铀矿上有很大的份额。瑟尔斯是纽蒙特矿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显然对奥本海默关于建立原子能开发机构以控制他们的私人矿产产生了警觉。他们都没有认真严肃地思考过国际新兴的核工业，而且单就原子弹来说，巴鲁克他们认为那是美国"胜利的武器"。

奥本海默的声望非常之高，以至于巴鲁克也准备吸收一些"艾奇逊—利林塔尔报告"中的内容，它还尝试过招募奥本海默做他的科学顾问。1946年4月初，他们讨论了在一起工作的可能性。在奥本海默看来，这次会面纯粹就

是场折磨。在压力之下,奥本海默不得不承认他的计划确实不能协调现在的苏联政权。然而,他也坚持美国当前应该采取受人尊敬的方法,寻求是否可以展开合作的诚意。巴鲁克和他的顾问们辩称,"艾奇逊—利林塔尔报告"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必要的修改:联合国应该授权美国保留一些核武器储备来进行遏制;计划中的原子能开发机构不可以控制铀矿;最后,该机构不能在核能使用上拥有否决权。这一看法使奥本海默得出了一个结论:巴鲁克的工作就是想得到美国人民所期待的苏联的反对。

奥本海默非常肯定这个老家伙(巴鲁克)就是个白痴。他告诉拉比他讨厌巴鲁克。不久之后,奥本海默告诉巴鲁克,他不会去做他的科学顾问。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奥本海默、艾奇逊和利林塔尔尽最大努力保留住"艾奇逊—利林塔尔报告",他们游说官员和媒体。作为回应,巴鲁克抱怨艾奇逊对他进行的暗中破坏令他非常尴尬。艾奇逊仍然希望能够影响到巴鲁克,他同意把大家召集起来讨论,时间是1946年5月17日,地点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布莱尔宫。

但是,当艾奇逊还在对付原子能魔怪时,另外有些人正在对付奥本海默——如果说那不是想摧毁他的话。也是在那个星期,埃德加·胡佛催促他的手下加紧对奥本海默的监视。虽然胡佛没有一点证据,但他仍然认为奥本海默很可能打算叛变成为苏联的人。由于他们得出的结论说奥本海默非常同情苏联,所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这位长官(胡佛)得出结论:他做原子能产业的顾问远不如做一名临时线人的价值大。他命他的手下严密监控奥本海默的一举一动和所有联系。

峰会开始前的一个星期,奥本海默打电话给基蒂,告诉她会议是"痛击那个老家伙的一次尝试……形势不容乐观"。他还说:"我不想要他们的任何东西。如果我能够唤醒他们的良知的话,那将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否则,就一文不值了。"基蒂敦促他必须了解巴鲁克到底想要什么。奥本海默表示同意。然后,他听见接话员的钥匙插进拔出的声音,他问基蒂:"你还在吗?是不是有人在听我们说话?"基蒂回答说:"亲爱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奥本海默说:"他们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于是,他一语双关地说:"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定是刚刚挂断了电话。"

基蒂猜对了。两天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奥本海默伯克利的家中安装了搭线窃听器。胡佛给国务卿伯恩斯送交了一份谈话复本,说"你和总统一定会感兴趣"。胡佛还让他的手下尾随奥本海默,无论他到什么地方。

虽然,无人知晓巴鲁克是否知道奥本海默对自己蔑视的言语,但是在布莱尔宫的会议不是很顺利。巴鲁克非常明确地表示,他和他的团队完全不同意有关国际控制铀矿所有权的主意。接着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轮的焦点就集中于"惩罚"。巴鲁克问计划中为什么没有写明对违反规定者的惩罚。如果一个国家被发现制造核武器该怎么办?他认为一定库存的核武器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用于惩罚被发现制造核武器的国家。赫伯特·马克斯说这项规定同"艾奇逊—利林塔尔报告"的精神极不相符。另外,赫伯特·马克斯还指出,背叛的国家至少需要一年才能准备核武器,因此国际社会将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出反应。

巴鲁克仍然坚持没有惩罚的法律是毫无用处的。他不顾众多科学家的意见,认为苏联绝不可能在二十年内制造出自己的核武器。据此,他得出结论,美国在任何时刻都没有理由放弃自己对核武器的垄断。最终,他交给联合国的是从根本上修订了的"艾奇逊—利林塔尔报告":苏联应放弃在安理会有关新成立的原子能机构中的否决权;任何违反规定制造核武器的国家都将受到核武器的攻击;最后,在得到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秘密许可之前,苏联必须接受一项有关它的铀原料的调查。

艾奇逊和麦克洛伊强烈反对过早强调惩罚的规定。事实上,巴鲁克非常明显是在保持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而这种规定肯定会在几年之后毁掉整个计划。特别是在美国仍然继续制造和试验核武器的情况下,苏联决不会同意这项规定的。巴鲁克设计的这项协议根本不是为了合作控制核武器,而是专门为实现美国的核垄断地位。麦克洛伊非常气愤地说,他坚持认为根本没有绝对安全的条件,提出这项粗糙且机械的惩罚条款的建议是"自以为是的"。

如果说共和党人麦克洛伊仅仅是气愤的话,那么奥本海默简直就是绝望了。他在事情结束后给利林塔尔的一封信中说他"心情仍然非常沉重",并再次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敏锐。奥本海默预测了整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事实上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美国的部署会花费很长的时间,不会立即推进这一事件的解决,它会送一份报告给安理会,而苏联会动用否决权,拒绝合作。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苏联的行为解释为他们的战争企图。现在有些人越来越希望把国家推向战争的深渊,先是从心理上,然后是事实上,而且这些人的数量还在增长。我们现在所做的恰恰符合他们的计划。军队指挥着国家的研究;抨击别人为赤色分子;对付所有劳工组织,首先是把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看成共产主义组织和叛国者……"利林塔尔在之后的日记中记录了奥本海默

的“心碎口气”，奥本海默说话时以他特有的疯癫方式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奥本海默告诉利林塔尔，他在旧金山和一位曾担任过苏联外交部长技术顾问的苏联科学家谈论过。这位科学家也强调，巴鲁克的计划是在保护美国的核垄断。奥本海默说：“美国的计划就是准许美国无限期地保留核武器和核工厂——三十年或者五十年，只要美国愿意。如果美国想要苏联的铀，或者只要苏联想利用这些核原料，它就可能被检查并被原子能发展机构控制。”

1946 年 6 月 14 日，巴鲁克向联合国陈述了自己的报告，非常戏剧性的是，他用双语宣读了报告，因为他认为他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是快速解决问题，还是灭亡。正如奥本海默和其他人所预料的那样，苏联迅速否决了这一意见。莫斯科的外交官还提出了一个禁止核武器的生产和使用的简单协议。对于苏联的这一提议，奥本海默在电话中对基蒂说“还不错”。没有人对苏联动用否决权否决巴鲁克的计划感到惊讶。然而，奥本海默告诉他的妻子，他观察到巴鲁克大声地表示他有多么失望。奥本海默知道那真他妈是个愚蠢的表演。

然而，正如奥本海默预测的那样，杜鲁门政府立即否决了苏联的回应。谈判在之后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好几个月，但最后仍无果而终。这个阻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无节制核军备竞赛的绝好机会就这样化为泡影了。即使后来有了进展，但是到那时，成千上万的核弹头已经被制造出来了。奥本海默和他的许多同事都警告过巴鲁克不要错失这个良机，艾奇逊之后生气地说：“都是他（巴鲁克）坏的事。他真是非常出色地毁了这件事。”拉比也很直接地说：“所发生的一切太疯狂了。”

几年之后，奥本海默 1946 年国际核控制方案的批评者们认为他在政治上非常幼稚。他们辩称，斯大林永远不会接受调查。奥本海默自己理解这一点。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能而且我想也没有人能说清楚玻尔早期提出的行动路线是否会改变历史的进程，在对斯大林的了解这一点上，我从没有给人一点希望，我确实对他的行为习惯一无所知。但是，玻尔清楚他当时的行动创造了一个巨变。他从没说过‘另一次试验安排’，但是他脑海中有一个模式。我想如果我们理智地、清楚地、小心谨慎地同斯大林进行交流与合作，我们很可能早已经丢弃了我们无所不能的幻觉和我们关于秘密效应的错觉，并能使我们的社会朝着更加健康、更加适合人类生活的未来前行。”

那年夏末，利林塔尔在华盛顿的宾馆房间拜访了奥本海默，两个人一直

谈到深夜。“他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利林塔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充满魅力,才华横溢。当我离开时,他看上去是那么悲伤:‘我准备随便去个什么地方,随便做点什么事,但是我的想法已经枯竭了,我发现我生命的全部——物理学和物理教学——现在看来已经无关紧要了。’这句话深深地震动了我的心。”

奥本海默非常愤怒,而且这种愤怒还相当深。他觉得自己对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结果负有个人责任。报纸每天的头条都使他更加确信世界将再次踏上战争之路。他在1946年6月1日出版的《原子科学家的子弹》一书中写道:“每个美国人都知道,如果再爆发一场战争,核武器肯定会被用上。”他辩称,那意味着我们现在真正的任务就是减少战争本身。“我对此非常了解,因为在最近的一场战争中,我们认为最人道的两个国家——英国和美国——用核武器攻击一个基本上被打败的敌人。”

早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一场演讲中,奥本海默就观察到了这些,而在1946年发表它则是个不同寻常的承认。1945年8月的那件事发生后不到一年,那个指导轰炸机手如何将核弹准确投到日本中部城市的人现在得出结论,他当时支持了用原子弹攻击一个“基本上已经被打败的敌人”。这一事实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奥本海默担心的不仅仅是一场大战,他还担心核恐怖主义。当在一场参议院闭门听证会上被问及“三四个人能否把一枚核弹头运到纽约,然后炸毁整个城市?”时,奥本海默回应说:“当然很可能发生,人们可以摧毁纽约了。”紧接着,当一位被震惊的参议员问及“你能用什么仪器检测出藏在城市某个角落的核武器?”时,奥本海默回答:“一把螺丝刀(只要把所有的箱子撬开就可以了)。”对核恐怖主义没有什么有效的防范手段,其实奥本海默心里认为永远都不会有。

之后,他在与一位来自驻外事务处的听众和一群军官谈话时说,国际核弹控制是“唯一使国家享受到战争之前那几年一样安全的途径。假如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我们有一个带着一些新发明的邪恶政府,或者不负责任的政府,如果我们还想毫无恐惧地生活在这些武器的环境中,这(国际核弹控制)也是唯一的途径”。

1946年7月1日上午九点三十四秒,世界上第四颗原子弹在位于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珊瑚岛上爆炸。一支废弃的海军舰队的所有船只都沉没了,或

者暴露在毁灭性的核辐射当中。一大群来自世界各国的议员、记者和外交官,包括苏联的,目睹了这次示威性的试验。奥本海默是被邀请观看这场演示的众多科学家中的一员,但他肯定是不会去的。

两个月前,他越来越感到挫折,因此那时他就决定不参加比基尼岛的试验。1946 年 5 月 3 日,他给杜鲁门总统写信,表面上看是在解释他为什么不去,然而他真实的意图是在挑战杜鲁门的整个立场。在信的开头他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说他没能够和其他科学家的意见统一而且分歧很大。然后,他从试验的毁灭性上把整个试验批评得毫无价值。如果试验的目的像说的那样是用来确定核武器在海战中的效果,那么答案就再简单不过了。"如果原子弹在船边爆炸,就算是一艘主力战舰,也会沉没。"人们需要做的仅仅是确定一下炸弹到底需要多近,而这完全可以用数学计算得出,可是这项计划却要花费将近一百万美元。奥本海默解释说:"只要花费不到百分之十的钱就可以得到更加有用的信息资料。"

另外,如果我们通过试验想得到核辐射对海军设备、粮食、生物的影响的相关科学数据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用更加便宜和更加准确的方法得到。奥本海默写道,试验的支持者辩称"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核战争的准备"。如果这才是试验的真正目的的话,那么每个人都肯定理解"核武器无比巨大的效果就在于可以被用于对城市的轰炸"。对比一下的话,用核武器炸掉海军舰队这种战术上的试验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最后,奥本海默质疑了"当我们促进国际社会削减核武器计划刚刚开始的时候,进行这种纯粹军事的核武器试验的正当性"。(比基尼岛上的试验和巴鲁克在联合国的陈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奥本海默总结说,他本可以完成总统的使命,出席比基尼岛上的试验,但是,总统或许会认为:"当我完成一份对整个计划批评的报告时,我的参加将是最不受欢迎的。"他写道,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其他方面为总统服务可能会更好。

如果奥本海默认为他的这封信可以说服杜鲁门总统放弃或延期比基尼岛上的试验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杜鲁门根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奥本海默的反对上,他只记得和奥本海默的第一次见面。事实上,奥本海默的信使总统多少有点难堪。总统把信给了艾奇逊,顺带还写了几句话,他把奥本海默说成是一个"爱哭的"科学家,"他之前不就宣称自己双手都是鲜血嘛"。实际上杜鲁门误解了,奥本海默的信是在宣布他个人的独立,通过这封信,奥本海默再次同美国总统分道扬镳了。

26 | “奥本出过疹子，现在有免疫力了”

“他（奥本海默）把自己看成了上帝。”

——菲利浦·莫里森

奥本海默开始在加州理工学院教物理，但他的心思却并不在教学上。奥本海默后来回忆说：“我确实在教课，但究竟教了些什么现在想来却很模糊。战争带来的巨大变化使我无心教学，由于总是考虑别的事，我经常魂不守舍，心烦意乱。”事实上，奥本海默和基蒂从未在帕萨迪纳安家。基蒂仍然住在伯克利苍鹰丘上的房子里，奥本海默则是每周在老朋友理查德和鲁思·托尔曼家借住一两夜。然而，华盛顿的电话从未停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安排越来越难于应付。到了1946年春末，奥本海默宣布他将在秋天重新回到在伯克利的教学岗位上，这时的他还在不断往来于华盛顿、纽约和洛斯阿拉莫斯之间 。

尽管受到巴鲁克计划失败的沉重打击，奥本海默和利林塔尔仍继续合作。那年秋天，杜鲁门总统任命利林塔尔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应国会要求，总统组建了顾问委员会来协助原子能委员会的成员们。杜鲁门不喜欢奥本海默，但是他无法把“原子弹之父”排除在这个委员会之外。最后，在很多人的推荐和劝告下，杜鲁门指派他和哈特利（洛斯阿拉莫斯的顾问）、拉比、格伦·西博格、恩里克·费米、詹姆斯·科南特、西里尔·史密斯、胡德·沃辛顿（杜邦公司的高管）、李·杜布里奇（加州理工学院的新院长）等人一起组建顾问委员会。杜鲁门让委员们自己选出主席。1947年1月初，顾问委员会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奥本海默因暴风雪而耽搁，当他最后到会时得知自己被大家一致选为主席。

那时候，奥本海默已经看清了苏联和美国的立场。任何一方都没有做出避免核竞赛的必要努力。极度的失望和所承担的新责任使奥本海默的观点开始改变。1月，汉斯·贝特到伯克利拜访奥本海默，在一番长谈中，奥本海默承认他已经"放弃了苏联能接受计划的所有希望"。苏联毫不让步，他们建议禁止使用原子弹，是要"立刻剥夺我们阻止俄国人进入西欧的唯一武器"。贝特赞同这个看法。

到了春末，奥本海默以他的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影响力使美国的谈判立场强硬起来。1947年3月，奥本海默飞到华盛顿，艾奇逊让他预览了即将出炉的"杜鲁门主义"。奥本海默后来回忆说："他想让我清楚，我们和苏联正步入一种敌对的关系，无论我们在谈判中遇到什么都要牢记这一点。"奥本海默立刻在谈判中履行了这一点，并会见了伯纳德·巴鲁克在联合国原子能谈判的继任者弗雷德里克·奥斯博恩。出乎奥斯博恩的意料，奥本海默告诉他苏联将退出联合国谈判，不会接受任何可行计划。

奥本海默对苏联的态度走上了冷战的一般轨道，在他自己看来，在战争期间他已经从左翼的国际主义者转向了。在斯大林1946年2月9日的演说中，奥本海默也被责难，和大多数西方观察家一样，奥本海默把它描述为苏联害怕"被包围和他们有必要保持警惕和重整军备"的表现。另外，奥本海默在得知苏联战时的间谍行为后非常失望。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一个代号为"T-1"的知情者（该知情者也是伯克利大学的官员）透露，奥本海默回到华盛顿收到一份1946年的剪报后非常沮丧。

奥本海默收到的那份剪报是关于一桩加拿大间谍丑闻的。叛变苏联的译电码员伊戈尔·古赛克揭发说，在蒙特利尔工作的英国物理学家艾伦·纳恩·梅为苏联提供情报，从而导致后者被逮捕。奥本海默被这些科学家同事的背叛震动了。

巴鲁克计划的失败让情况变得更糟，奥本海默明白，目前美苏之间的鸿沟短期内不可能弥合，核能置于国际监管的梦想看来只有在地缘政治形势彻底改变后才能实现了。1947年9月，奥本海默对一名外事处军官说："非常明显，即使对于美国来说，实行核能国际监管也意味着要放弃很多，其中包括美国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奥本海默很清楚，各国外交官们对他所倡导的国际监管的深远意义心知肚明，但这样做他们就要牺牲一些利益，包括国家主权这样的根本利益。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对俄国人的要求触及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因此俄国人不可能接受。"

奥本海默知道苏联不可能最终做出这个“伟大的决定”，但他没有完全放弃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实现核能国际监管的希望。与此同时，他不得不违心地帮助美国进行核武装。他悲哀地说，原子能委员会的基本职能将是“提供核武器，又好又多的核武器”。到 1947 年，奥本海默开始制造大量核武器来建立防御系统。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奥本海默都已经成为美国体制内的一员了，他的职位包括了原子能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物理学会主席、哈佛大学督导会成员。

在哈佛大学工作时，奥本海默结识了几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例如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法官小查尔斯·怀赞斯基，以及约瑟夫·艾尔索普。1947 年 6 月初，哈佛大学授予奥本海默荣誉学位。在毕业典礼上，奥本海默的老朋友乔治·马歇尔将军，公布了杜鲁门政府为恢复欧洲经济向欧洲援助亿万美元的计划，即后来著名的“马歇尔计划”。

奥本海默和麦克利什的关系很亲密。这位诗人用十四行诗赞美他，双方交往频繁。麦克利什和罗伯特价值观相似，都崇尚自由，他们都感到了共产主义极左思潮和右翼暴力思想的威胁。一些左翼的朋友很困惑于奥本海默的转变，但那些一直把他看作受欢迎的民主派的人们，没有理由认为他的政治观点已经改变。然而，形势已经变了：随着战争的胜利，法西斯被打败（除了佛朗哥的西班牙），大萧条已经结束，共产党对于政治上积极的知识分子不再有吸引力了。和老朋友罗伯特·威尔逊、汉斯·贝特和拉比一样，奥本海默是自由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很多思想是一致的。

值得深思的是，奥本海默的思想转变并没走极端，他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并不认为苏联对美国构成了真正威胁。在这一点上，奥本海默兄弟发生了激烈争论。罗伯特坚信，一旦有机会苏联一定会采取行动，因此他帮助杜鲁门对苏采取强硬政策。每当弗兰克对此表示不同看法时，“罗伯特会说他有足够证据但不便透露，这使他相信苏联不可能与美国合作”。

二战后，当奥本海默和哈康·希瓦利埃重逢时，哈康也注意到了奥本海默观点的变化。1946 年 5 月，奥本海默和基蒂拜访希瓦利埃在斯蒂森海滩的新家。奥本海默向希瓦利埃挑明了他的政治观点的转变，在希瓦利埃看来，奥本海默已经相当“右”了。希瓦利埃回忆了一些奥本海默对美国共产党和苏联的贬低。“相信我，我是认真的，”奥本海默说，“我不能告诉你原因，但我有足够理由改变我对苏联的看法。他们并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要再坚持你的

信仰和对苏联政策的盲从了。”

此外，希瓦利埃不断听到的有关他老朋友的一些事情确定了他的判断。有一天晚上，希瓦利埃在纽约的大街上碰到了菲利浦·莫里森，二人谈起了战争爆发后的一件件往事。希瓦利埃仍把莫里森看作同志，同时他也清楚，莫里森在战前是奥本海默的密友，并且作为核心科学家跟随他去了洛斯阿拉莫斯。

“奥本海默怎么样了？”希瓦利埃问。

“我几乎见不到他，”莫里森回答道，“我们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他已经转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莫里森接着谈到有一天奥本海默不停地提及“乔治”，莫里森最终打断了他并问谁是乔治。莫里森对希瓦利埃说：“你明白，对于我来说，乔治·马歇尔仅仅是马歇尔将军或者是国务卿，但不是乔治，这就是不同……奥本海默变了，他把自己看成了上帝。”

自从1943年春天和奥本海默分别后，希瓦利埃便陷入了一连串的失望之中。1944年，希瓦利埃试图在战争信息办公室找一份工作，但最终成了泡影，因为他保存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写着“不可信”的断言。一个在战争信息办公室工作的朋友说：“很明显有人故意把他写进去的。”希瓦利埃在纽约找了一份自由撰稿和临时翻译的工作，1945年春天，他回到了伯克利。战争结束不久，希瓦利埃被陆军部聘用，为纽伦堡审判做翻译，他于1945年10月飞到欧洲直到1946年5月才返回加利福尼亚，然而，伯克利拒绝再聘用他。这个突然打击毁了希瓦利埃的学术生涯，他决定与出版人阿尔弗雷德·诺普夫合作并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

1946年6月26日，即希瓦利埃与奥本海默重逢六周之后，希瓦利埃和往常一样在家里写小说，两个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敲响了他家的门，然后把希瓦利埃带到他们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办事处。几乎与此同时，乔治·埃尔滕顿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带到了奥克兰的办事处。希瓦利埃和埃尔滕顿被同步审问了六个小时，美国联邦调查局想知道他们与奥本海默在1943年初冬那次谈话的内容。

尽管二人相互间不知道对方也被审问，但他们口径一致。埃尔滕顿承认，在1942年末苏联牵制纳粹的疯狂进攻时，苏联领事馆一个叫彼得·伊万诺夫的人曾经找到他，并问他是否认识欧内斯特·劳伦斯教授和奥本海默，还有另一个人但埃尔滕顿记不太清了，可能是叫阿尔瓦雷茨。埃尔滕顿告诉

他们他只认识奥本海默，还不是很熟，但他有个朋友和奥本海默很好。俄国人接着问他的朋友可否说服奥本海默与苏联科学家分享一些信息，埃尔滕顿说他会联系希瓦利埃，并告诉希瓦利埃情报传递渠道很安全。最后，埃尔滕顿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证实，几天后希瓦利埃没有告诉他任何东西，原因是奥本海默不赞成希瓦利埃这样做。埃尔滕顿同时否认接触过其他任何人。希瓦利埃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证实了埃尔滕顿的说法。随后，他在回忆录里表达了他的疑问：美国联邦调查局怎么知道他与埃尔滕顿和奥本海默的谈话，同样他也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联邦调查局坚持他曾接触过三位科学家。

过了不久，大概是在1946年7月或8月，埃尔滕顿和希瓦利埃碰巧参加伯克利的同一个午宴，这是双方自1943年分别后的第一次相见。希瓦利埃告诉埃尔滕顿自己6月份的遭遇，在对比了当时的备忘录后，二人意识到双方是在同一天被调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究竟是怎么打探到他们与奥本海默的谈话的呢？

几周之后，奥本海默邀请希瓦利埃到苍鹰丘的家参加鸡尾酒会。为了好好叙叙旧，二人比其他客人早到了一步，希瓦利埃给奥本海默看了他的回忆录，当提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时，奥本海默的神情暗淡了下来。

“我们出去吧。”奥本海默提议说。希瓦利埃明白他的老朋友在暗示房间可能被窃听了。他们沿着灌木丛生的小路走进后花园，一路上希瓦利埃详细讲述了他被调查的细节。“奥本海默显然十分生气，”希瓦利埃在1965年的文章中写道，“他不停地追问我，不停地追问。”当希瓦利埃告诉奥本海默他不得不说出他与埃尔滕顿的谈话内容时，奥本海默肯定了他的做法，“你知道，即使是我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也必须说出来”。

“是这样的，”希瓦利埃这么回答，尽管他在反思自己是否必须那么做，“可是那些所谓的接近三位科学家获取秘密情报的怀疑又该怎样解释呢？”对这个敏感问题奥本海默没有回答。

在花园里，奥本海默努力回想1943年曾对帕什说过什么，希瓦利埃记得当时他看起来十分焦虑。

最后基蒂喊他们：“亲爱的，客人们都到了，你们快回来吧。”奥本海默生硬地应了一声，说他马上回去。他继续踱着步，让希瓦利埃再重复一遍整个事情。几分钟后，基蒂又出来叫，说这次真的该回去了。奥本海默草草地应了声，基蒂仍在不断提醒。“让我很气愤的是奥本海默竟口出脏话，让基蒂自己去管好该死的事情。”希瓦利埃写道。

希瓦利埃还从没见过奥本海默如此失态。即使那样，他看上去还是不愿结束与希瓦利埃的交谈。“显然有什么事情严重困扰着他，但他什么也不说。”希瓦利埃这样回忆道。

1946 年 9 月 5 日，奥本海默和希瓦利埃这次不愉快的谈话结束后不久，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拜访了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办公室。不出奥本海默所料，他们试图了解他和希瓦利埃 1943 年的谈话内容。他和往常一样温和地解释道，希瓦利埃告诉过他埃尔滕顿的方案，但被他断然拒绝。他记得告诉希瓦利埃“那样做是叛国行为或者接近叛国”。他否认希瓦利埃曾试图探听关于原子弹计划的信息。在进一步的追问下，“奥本海默说因为时间久远，他记不清他和希瓦利埃所说的具体内容了，而所有试图回忆他们谈话的努力都只能是猜想，但他确切记得曾对希瓦利埃说过‘叛国’或‘叛国的’之类的话”。

当联邦调查局探员逼问他关于另外三个与曼哈顿工程密切相关的科学家时，他说这部分都是他“编造”出来以保护希瓦利埃身份的。“奥本海默声称，在过去向曼哈顿工程局的报告中，他曾试图保护希瓦利埃的身份，为此他‘编造了这个纯属虚构的故事’，事后他称之为‘纯粹是无稽之谈’。其大意是埃尔滕顿为了获取相关信息曾接触过三位不知名的同事。”

奥本海默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为什么承认他在 1943 年所说的是谎话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这个故事是真实的。1943 年，他在面对帕什时惊慌失措，就用三位虚构的科学家来粉饰其陈述，以夸大其重要性，从而将注意力从他身上转走。另一个解释就是，在他和希瓦利埃的花园谈话中，他意识到他的朋友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接触三位科学家。毕竟，埃尔滕顿已经对希瓦利埃作为潜在目标提起过奥本海默、劳伦斯，或许还有阿尔瓦雷茨，希瓦利埃很有可能在厨房的谈话中对奥本海默提及此事。还有一种可能，他在 1943 年就说出了真相，但现在感觉到不得不改变其陈述，以保护希瓦利埃和那三位匿名的科学家。他的敌人在 1954 年的安全调查听证会上坚持这才是实情，但这也是可能性最小的一种解释了。他在早前就检举过希瓦利埃，而劳伦斯和阿尔瓦雷茨根本不需要他的保护。现在唯一需要保护的人就是罗伯特·奥本海默了，而在 1946 年向联邦调查局承认曾在 1943 年对军情处撒谎可不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除非那是确凿无疑的实情。但是，所有这样那样的解释，都将在八年后罗伯特的安全听证会上被再次提及并接受调查，

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将是要害所在。

1946年末，杜鲁门任命的原子能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刘易斯·斯特劳斯飞抵旧金山，到机场迎接他的有欧内斯特·劳伦斯和奥本海默。在谈论原子能委员会事务之前，斯特劳斯将奥本海默叫到一旁，说有些其他的事要商量。在此之前，斯特劳斯只在二战末期与奥本海默有过一面之交。踱步于混凝土铺的停机坪上，斯特劳斯说，他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一名理事，当时正担任理事会聘选委员会主席，负责为研究院物色一名新主管。奥本海默名列五位候选人名单之首。他说，现在理事会已授权他向奥本海默授予这一职位。奥本海默表示，他对此很感兴趣，但还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大约一个月之后，即1947年1月下旬，奥本海默飞抵华盛顿，在一次漫长的早餐上聆听了斯特劳斯向他竭力推荐的这份工作。在当天晚些时候的电话中，奥本海默告诉基蒂。他尚未下定决心但感觉这个提议"相当不错"。

该研究院作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母校和学术庇护所而格外著名。当斯特劳斯敦促爱因斯坦形容他理想中担任主管工作的人选时，他回答道："啊，乐意效劳。你应该找一个沉稳的人，他不会打扰人们的思考。"就奥本海默而言，他并不总是认为这是个严谨的治学之地。在1934年首次造访该院后，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普林斯顿真是个疯人院：那些唯我的精英们在各自孤独的世界里无助地闪着光芒。"但现在他的看法改变了。"想做好一份像样的工作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他告诉基蒂说，"我无疑是可以做到的"。他向她许诺，即使他们搬到普林斯顿，他们仍可以保留伯克利苍鹰丘的住宅，以作为度夏之用。除此之外，他已经厌倦了往返于华盛顿的漫长通勤。"我已经不可能再像去年冬天那样在飞机上度日了。"仅那一年，他就在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之间横跨大陆飞行了十五次。

然而，他仍在耐心地考虑，直到最后，根据一则传闻，奥本海默夫妇在他们的车载电台里收听到一则新闻报道，宣称罗伯特·奥本海默已被任命为高等研究院的主管。"哦，"罗伯特对基蒂说，"我想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掉了。"

《纽约先驱论坛报》在一篇社论中高度评价这一任命"极为恰当"，"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朋友们都叫他'奥本'"。该报的主笔们滔滔不绝地表达颂扬之情，形容他为"杰出人才"，一位"科学家中的科学家"，一个"有点风趣的"、"务实的"人。刘易斯·斯特劳斯因奥本海默考虑时间过长而心生恼怒。斯特劳斯中学毕业后就做了一名旅行鞋推销员，最终成长为一位白手起家的

百万富翁。1917 年,年仅 21 岁的斯特劳斯谋得了一份工作,做赫伯特·胡佛的助手。胡佛是一位工程师,又是个大有前途的政客,人们称他为"进步的"西奥多·罗斯福共和党人……一战后,胡佛为斯特劳斯在纽约的库恩洛布投资银行谋得一个十分抢手的职位。凭着吃苦耐劳和见风使舵,斯特劳斯不久就娶到了股东库恩·洛布的女儿艾丽丝·哈诺尔。到 1929 年,他自己已经成为一名正式股东,每年赚取上百万美元。他几乎未受损失就躲过了 1929 年的经济危机。20 世纪 30 年代,他成为罗斯福新政的强烈反对者,但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九个月,他却突然说服罗斯福政府让他到海军部军械局任职,不久又担任海军部部长特别助理并戴着海军少将的荣誉头衔退役。到 1945 年,斯特劳斯已经利用他和华尔街与华盛顿的关系为自己奠定了在战后重建中的强势地位。纵观此后的二十年,斯特劳斯将给奥本海默带来大麻烦。

奥本海默对斯特劳斯的第一印象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窃听记录。"关于斯特劳斯,我知道一点,他不太有教养但不至于坏事,"利林塔尔这样对奥本海默描述他,"斯特劳斯头脑灵活又非常保守,显然还不赖。"两人都低估了斯特劳斯,事实上,他近乎病态的固执而且顽强,再结合他极端的敏感,使他成为政治斗争中一个极端危险的人物。斯特劳斯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同事说:"如果你反对他的意见,他先把你当作傻子,可是你若继续和他作对,他将把你看作背叛者。"

基蒂很高兴丈夫决定搬到东部。美国联邦调查局窃听到她对一个推销员说,他们不会离开太久,也就十五年或者二十年。奥本海默告诉她新家在普林斯顿,是一个老庄园,"十间卧室,五间浴室,还有一个可爱的大花园"。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同事们都非常失望,物理系主任把他的离开称作"物理系所遭受的最大打击"。

奥本海默离开了很多老朋友——还有他的情人。他很珍重与鲁思·托尔曼博士的感情,在战争年代,奥本海默和鲁思的丈夫理查德并肩工作,当时理查德担任华盛顿的科学顾问。战后,正是理查德力劝奥本重新回加州理工学院教学。奥本海默一直把托尔曼夫妇看作最亲密的朋友,自从 1928 年春天在帕萨迪纳结识他们,他一直对二人很敬重。多年以后,奥本海默回忆起理查德时说:"他深受敬仰,知识广博,睿智,兴趣广泛,他对物理贯穿始终的深邃理解,他的绅士风度,还有他那极聪明可爱的妻子,一切的一切使我们成为亲密的朋友。"1954 年,奥本海默郑重声明理查德一直是他亲密的朋友,他

将一直珍爱这份感情，还有他对鲁思深深的爱。

大概是在战争期间，或者是回到洛斯阿拉莫斯后不久，奥本海默开始和鲁思约会。鲁思是临床心理学家，比奥本海默大近十一岁，但她很高雅，有非凡的吸引力。鲁思出生于印第安纳，1917 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1924 年鲁思嫁给理查德，同时继续深造物理。理查德当时是杰出的化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年长鲁思十二岁。尽管二人一直没有孩子，但朋友们一致认为二人是天生一对。鲁思感染了理查德，使他增加了对心理学的兴趣，特别是科学的社会意涵。

奥本海默陷入了对鲁思的热恋。作为女人，鲁思拥有令人恐怖的超级智商。据说，她很温柔、热心，同时对人性观察敏锐。她看起来很能理解奥本海默性格深处不为外人所知的东西。

1947 年夏天，奥本海默在准备搬到普林斯顿时给鲁思写了一封信，向她倾诉自己对未来的迷惘与彷徨甚至惊恐。鲁思回信说："此刻我有千言万语，感谢你的来信。每当想到夏天结束后，我们将不能每月见面，我和你一样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她告诉奥本海默将会去底特律参加一个会议，她要求奥本海默到时一定要去见她。"如果不能实现的话，别忘了常来看看我。我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

现存的奥本海默写给鲁思的信非常少，因为大部分都被鲁思在临死前销毁了，但鲁思写给奥本海默的情书融入了深深的相思与温情。鲁思在一封没有标注日期的信中说："回首过去甜蜜的一个星期真的很感谢你，亲爱的，我将把这一星期珍藏到永远。宝贝，你能感受到我的爱吗？"还有一次，她写了一个一起度周末的计划，在信中，鲁思保证亲自去机场迎接奥本海默，一起去海边的爱情小巢。"最近我的眼前时常浮现那蔚蓝的天空，曲折的海岸，还有追逐嬉戏的沙鸥，罗伯特，我多么渴望见到你，马上！"海滩之行后不久，奥本海默写道："亲爱的鲁思，这封信是纪念我们在一起的日子，这对我而言无比的重要。我发现你是如此富有勇气和智慧，而知道这些是一回事。亲自了解这些又是另一回事。能见到你真是太棒了。我永远的爱人，鲁思。"

基蒂知道奥本海默与托尔曼一家长期存在的特殊友谊，她知道奥本海默每月去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上课时住在理查德家。奥本海默经常带托尔曼一家，有时是巴彻一家去他们最喜欢的墨西哥饭店——这时奥本海默往往会接到基蒂在伯克利打来的电话。巴彻回忆说："如果基蒂知道有人跟奥本海默这样纠缠不清，她一定会非常生气，但如果她的占有欲真的这么强烈，那

为什么没有迹象表明她发现了奥本海默的婚外情呢?"

1948 年 8 月中旬,一个周六晚上,理查德·托尔曼在家里举办晚会,其间突发心脏病。基蒂的前夫斯图尔特·哈里森博士及时发现并把他送到了医院。三周以后,理查德逝世。鲁思伤心欲绝,风雨相伴了二十四年的丈夫就这样离去了。然而在这样的悲剧中,理查德的一些朋友却几次来诽谤奥本海默。劳伦斯曾对斯特劳斯说:"奥本海默很早就开始和鲁思交往,他不断勾引鲁思,最终二人搞得乌烟瘴气,人尽皆知,理查德就是被他们气出了心脏病!"

理查德死后,鲁思与奥本海默仍经常见面,这样过了四年。在某次见面后,鲁思写了封短信给奥本海默说:"我将永远铭记码头上那两张美妙的座椅,它们躺在天海间,笑迎俯冲而过的飞机。我想你该想到那些我不敢提起的事——理查德去世四周年纪念日,1948 年 8 月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还有早些时候那些让我无法释怀的甜蜜记忆。那晚能待在你身边真的很幸福。"在另一封没有标注日期的信里,鲁思写道:"亲爱的罗伯特,过去的那妙不可言的两天令我如此心潮澎湃,何时才能再有这样的机会呢?"鲁思不断提议他们下次约会的日期。"你可以说需要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开会,这样我们就能见面了,不是吗?"很显然,奥本海默和鲁思彼此相爱,但他们不想毁掉彼此的婚姻。回顾那些年,鲁思和基蒂还有奥本海默的孩子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看上去,她只是奥本海默家的一个老朋友,当然,还是奥本海默的红粉知己。

在接受普林斯顿的工作前,奥本海默向斯特劳斯提出有人散布对他不利的信息。斯特劳斯打消了奥本海默的疑云,但由于新通过的《麦克马洪法》,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重新调查所有原子能委员会成员,并责成所有委员们阅读奥本海默的档案。这样,正如埃德加·胡佛的一名副手所说:"我们不用再缩手缩脚,可以放手深入调查奥本海默了。"特工们开始跟踪监视奥本海默以及他的二十多个同事,包括罗伯特·斯普劳尔和欧内斯特·劳伦斯。每个人都担保奥本海默是忠诚的,斯普劳尔说奥本海默对他过去曾是左翼深感羞愧,劳伦斯说奥本海默"曾经很草率,但现在却很沉稳"。

尽管很多人作证奥本海默值得信任,斯特劳斯和其他原子能委员会成员还是从美国联邦调查局那里得知,他们坚信奥本海默存在历史问题。1947 年 2 月,胡佛交给白宫一份关于奥本海默档案的十二页提纲,重点放在奥本海默与共产党的合作上。1947 年 3 月 8 日,星期六,原子能委员会接到了这份报

告,斯特劳斯把原子能委员会的律师约瑟夫·沃尔普叫到办公室,斯特劳斯明显对这份报告很震惊。二人仔细研究了一会儿,斯特劳斯对沃尔普说:"约瑟夫,你怎么想?"

沃尔普回答说:"如果这些材料都被塞到原子能委员会首席顾问的档案中,那将会很糟糕,因为他的背景很麻烦。你的责任是现在决定他是否是个危险分子。这份档案中除了希瓦利埃事件外,其他的并不能对他做出定论。"

接下来的星期一,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们对这个事件作了集体讨论。所有人都认为暂停奥本海默的行动自由将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詹姆斯·科南特和万尼瓦尔·布什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说法多年前就被推翻了,他们仍然希望美国联邦调查局保留奥本海默的行动自由。3月25日,利林塔尔要求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他向胡佛表达了原子能委员会安全官员的意见,认为已知的证据不能取消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胡佛为奥本海默拒绝交待他和希瓦利埃的谈话内容而恼火,然而他依然很不情愿地承认,尽管奥本海默曾接近过共产党,但这些不足以取消他的安全许可。虽然胡佛认为原子能委员会方面有义务让美国联邦调查局继续深入审查奥本海默,但最终他暗示他们到此为止。由于奥本海默的特殊身份,胡佛会放任联邦调查局的独立调查。而弗兰克·奥本海默则是另一种情况,联邦调查局不会给他一个新的安全许可。

后来斯特劳斯告诉奥本海默,他已经仔细查阅过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他的档案,上面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他完全可以担任高等研究院的主管。原子能委员会的审查延续了好长时间,1947年8月11日,一个高度保密的对奥本海默的无记名信任投票开始了。结果是一边倒地通过给罗伯特·奥本海默最高安全等级的许可。即使是极端保守的斯特劳斯也投了赞成票。

27 | “智慧旅馆”

“从某种大致意义上说，每个物理学家都是罪恶的，但他们不能放弃知识。这并不是任何粗俗、幽默或是大话所能诠释的。”

——罗伯特·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在1947年7月中旬抵达普林斯顿。那是一个异常炎热潮湿的夏天。奥本海默将担任研究院的主管一职，爱因斯坦曾在这个职位上待了将近十五年。这是一个令人景仰的位子，同时也为奥本海默接触那些与核政策有关的委员会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而这些委员会是越来越多了。研究院付给他的年薪高达两万美元，还给他提供一套主管可免费使用的别墅——奥尔登庄园。一名厨师负责处理日常家务，还有一位园艺师照料别墅的大花园，他们平时都住在这套房子里。研究院还给他大段时间让他自由旅行。奥本海默将在10月上任，在此之前，他和妻子基蒂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6岁的皮特和3岁的托尼——将有几个月的空闲时间可以用来开始适应他们的新生活。那一年罗伯特刚刚43岁。

基蒂很快就喜欢上了这套带有殖民时代风格的别墅。这套三层别墅布局随意，周围还有二百六十五英亩的葱翠的草木地，谷仓和畜栏靠在房子后面。罗伯特和基蒂买来两匹马，分别取名为特佩尔和塞特。

奥尔登庄园的部分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96年——奥尔登家族是最早来到普林斯顿的家族之一———那时，他们开始在这里耕种。别墅西侧的几间房屋建于1720年。此后，一代代奥尔登家族的成员不断将别墅扩建，到19世纪晚期已经增加到十八间屋子。奥尔登家族在20世纪30年代将它卖给研究院之前一直居住在这里。

这套别墅里里外外都被漆成亮白色，这使它显得宽敞而明亮。在他们到

达不久，罗伯特在房子后面靠近厨房的地方建了一间很大的温室。这是他给基蒂的生日礼物。基蒂在温室里种满各种各样的兰花。

罗伯特将父亲的一幅获奖的梵高画作《田野的日出》挂在起居室白色壁炉的上面。他们把德兰的作品挂在厨房，在音乐房里挂上维亚尔的作品。屋子里的家具摆放让人感觉惬意，从来不显凌乱，也没有陈旧的感觉。基蒂把房间里的每件东西都整理得井井有条。奥本海默的书房简单朴素，白色的墙上没有任何装饰，这使得他的那些老朋友想起了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家。

从庄园的后阳台，奥本海默可以向南眺望从宽广的田野到研究院的操场之间的所有景色。在不到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坐落着富尔德大楼。这是一栋四层的红砖建筑，两翼镶有教堂风格的尖顶。它于 1939 年建成，里面有为学者准备的办公室、带有木嵌板的图书馆和一个正式的会议室，室内有成排的加有厚垫子的棕色皮沙发。1947 年，爱因斯坦使用的是角落的那间办公室——二楼的 225 房间；尼尔斯·玻尔和保罗·迪拉克在三楼相邻的房间里工作。奥本海默的办公室位于一楼的 113 房间，这使他能够看到屋外的树林和草地。他雇用了两名秘书，曾经与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一起工作的埃莉诺·利里女士和年轻有为的凯瑟琳·罗素女士。在他的办公室外面有一个巨大的保险箱，里面放着他作为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各种资料。全副武装的警卫二十四小时守护在保险箱旁。

人们在富尔德大楼会看见一个精力充沛的人。电话响起时，他的秘书会敲门然后说道："奥本海默博士，马歇尔将军的电话。"他的同事发现那样的电话会使他更加精神饱满。他细细品味着历史赋予他的角色，并尽其所能地将其演好。尽管大多数研究院的长期学者都穿着运动夹克散步——爱因斯坦喜欢穿一件破旧的毛线衫——但奥本海默则经常穿一套昂贵的英国羊毛套装。这身套装是在朗罗克裁缝店手工制作的，这是一家专为普林斯顿上流社会人士做衣服的店。（但是，他也会以一身夹克出现在晚会中，"那夹克看起来像是被沙鼠咬过一样"。）许多学者在普林斯顿都骑自行车，奥本海默却开着一辆豪华的凯迪拉克轿车。一旦他的头发变得又长又密后，他就立即将头发剪掉，看起来就像个和尚。43 岁的他，看起来很瘦而且很脆弱，然而他实际上很强壮，而且精力充沛。"他很瘦，紧张而且经常颤抖，"弗里曼·戴森回忆道，"他不停地走动，停下坐着的时间不会超过五秒钟，给人的感觉是他得了重病，却又安然无恙，他一直抽着烟。"

普林斯顿无法与伯克利和旧金山自由、开放的气氛相比，更不用说在洛

斯阿拉莫斯的生活方式了。1947 年的普林斯顿,只是一个有着两万五千居民的郊区城镇,仅有的一盏交通灯在拿骚和威瑟斯庞大街的拐角处。除了小型有轨电车将上百的日常乘客送到位于普林斯顿十字路口的火车站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交通工具。银行职员、律师和股票经纪人要从那里乘五十分钟的火车去曼哈顿。

罗伯特的愿望是把研究院变成吸引跨学科学者的集散地。研究院于 1930 年由刘易斯·班伯格和他的妹妹朱利叶·凯莉·富尔德创建,那时的启动资金是五百万美元。1929 年,在股票市场崩盘前,班伯格和他的妹妹将家里的产业——班伯格零售店——出售,获得了一千一百万美元的现金。为了实现建造高等学府的愿望,班伯格雇用了了行政主管和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为研究院的首任主管。

1933 年,弗莱克斯纳因聘请爱因斯坦而使研究院出名,并且付给他年薪一万五千美元。其他的学者也享受很高的工资待遇。弗莱克斯纳希望得到最好的人,他要确保研究院的学者不会因生活窘迫而被迫去"写一些无用的课本或是在形式上应付工作"。这里"没有义务,只有机会"。在整个 30 年代,弗莱克斯纳聘用了许多有才干的学者,大多数是数学家,如约翰·冯·诺伊曼、库尔特·戈德尔、赫尔曼·韦尔、迪恩·蒙哥马利、鲍里斯·波多尔斯基、奥斯瓦尔德·维布伦、詹姆斯·亚历山大和内森·罗森。弗拉克斯纳喜欢发掘无用知识中的有用性。但是到了 40 年代,学院面临着名誉扫地的危险,因为它太过溺爱那些头脑聪明且有无限潜力的学者。一位科学家描述道:"那是科学只开花却不结果的地方。"

奥本海默决定改变这一切。在自己的理论物理学方面,他想给研究院带来曾经在 30 年代为伯克利所做的一切——将研究院变成一流的理论物理学研究中心。

早在 1947 年 4 月,亚伯拉罕·派斯是一位获研究院短期奖学金的年轻有为的物理学家。他接到从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人说:"我是罗伯特·奥本海默。"这让派斯吃了一惊。"我刚出任研究院的主管一职,我真切地希望明年你能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研究理论物理学了。"派斯非常高兴,他立即放弃了去丹麦与玻尔一起做研究的想法而接受了奥本海默的邀请。他在研究院待了十六年,并且成为奥本海默的长期好友之一。

派斯很快就有观察奥本海默的机会了。在 1947 年 6 月的三天时间里,二

十三位全美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齐聚兰姆海德旅馆——长岛东端幽静的度假地。奥本海默主持了这次关于“量子力学的基础”的会议。战争接近尾声时,他们得以把精力放在基础理论上。奥本海默手下的一个博士生威利斯·拉姆第一个作了演讲——其后还有许多同样出色的论述——他的理论勾勒出了日后闻名于世的“拉姆转移”,这是量子电动力学理论的关键一步。(威利斯·拉姆因为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获得了195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和他相同,拉比的演讲开创了核磁共振领域。

虽然物理学会的秘书长卡尔·达罗是这次会议的官方主持,但是奥本海默实际上主导了会议。达罗在日记中写道,奥本海默的强势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对每个人都作了近乎苛刻的评论,他从来不会因为用词而迟疑。奥本海默对观众讲话中的“牧师风格”也给派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好像是在给观众传授神的奥妙一样”。

在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奥本海默发起了一场关于介子的讨论,这个论题在战前他曾和罗伯特·塞培尔讨论过。派斯后来讲述了奥本海默控制全局的表演,他适时地插话,提出引导性的问题,总结想法,刺激别人想出对策。“我当时坐在马沙克的旁边,仍记得在讨论中他的脸突然变得通红。他站起来说道,‘也许存在两种不同的介子,一种是被大量制造的然后分裂成另一种引力较弱的。’”在派斯看来,奥本海默部分采用了马沙克的两种介子的假设。正是在这个理论上,英国物理学家塞西尔·F. 鲍威尔获得了1950年的诺贝尔奖。在长岛的这次会议也促使费曼和施温格研究出了“重整化理论”——一种新的计算电子与它自身或另一电磁场内部反应的简洁方法。

并不是每个人都赞赏奥本海默的表现。大卫·博姆在回忆时认为他讲得太多了。“他对我在物理上的贡献讲得太少了,我想要对基础理论提出一些疑问,但他认为我们应该在目前的那些有用的理论上多花些时间,充分利用这些理论做出些成果。”他这样回忆道。以前,博姆很尊敬奥本海默,但是他后来发现自己的看法改变了,与他的一个朋友变得一样了。他的朋友叫米尔顿·普莱森特,他和奥本海默工作过一段时间,他认为奥本海默没有什么独创性,但是他善于理解别人的主意,甚至可以理解他们那些没有表达出来的意思。

奥本海默租了一架私人飞机飞往波士顿,按计划他将在哈佛大学获得荣誉称号。维克托·韦斯科普夫和其他几个准备回坎布里奇的物理学家接受了他的邀请和他一起乘飞机离开。在飞行途中,他们遇到风暴,飞行员决定

降落在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海军基地。按规定,民用飞机是不能使用这个机场的。当他们到达码头时,一名海军上尉对他们的飞行员大喊大叫。奥本海默对飞行员说,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吧。他走下飞机说道:"我是奥本海默。"那位海军军官吃了一惊,吸了一口气说:"你是那个奥本海默吗?"奥本海默紧接着说:"正是那个。"他以自己著名物理学家的身份战胜了这个海军军官。军官带着奥本海默和他的朋友们去喝了茶,吃了些糕点,然后把他们送上了去波士顿的海军大巴。

美国最著名的物理学家并没有投入很多精力在物理上,尽管奥本海默说服研究院的托管会给他主管和"物理学教授"的双重职位。1964 年秋天,奥本海默抽时间与汉斯·贝特合写了一篇关于电子散射的论文发表在《物理评论》上。那年他被提名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委员会明显在踟蹰是不是该把这个奖颁给他,因为他的名字与广岛和长崎紧密相连。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发表了三篇较短的物理学论文和一篇生物物理学论文。但是 1950 年后,他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他不是一个能'坐住'的人,"1951 年来研究院的一个访问者默利·格尔曼说道,"德语里'坐住'就是坚持的意思——'从不厌烦地坐在椅子上'。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写过一篇长论文,也从来不做那些大量的计算和任何类似的工作,他没有耐心做这些。他的成果都是些短的文章,但却相当优秀。他能激励别人做工作,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在洛斯阿拉莫斯,他管理着几千人,有几百万的资金;现在他控制着的这个研究院手下只有几百人和八十二万五千美元的预算。洛斯阿拉莫斯全靠联邦政府的资金,但是研究院的托管会不允许他的主管申请联邦政府的基金。研究院是一个独立的领地,与它的邻居普林斯顿大学没有任何关系。到 1948 年时,大概有一百八十名学者加入进他们新创的两个"系"——数学系和历史系。研究院没有实验室,没有回旋加速器,这里没有比黑板更复杂的器械。这里没有课程,没有学生,这里有的仅仅是学者。大多是数学家,一些是物理学家,还有少数是经济学家和人文学家。

事实上,奥本海默的第一个职位使他显得似乎是在尽力把研究院转变成理论物理的中心。他从伯克利带来了五名访问学者。在成功劝说派斯留下后,他又聘请了另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弗里曼·戴森,成为研究院的长期成员。他还劝说尼尔斯·玻尔、保罗·迪拉克、沃尔夫冈·泡利、汤川秀树、乔治·乌伦贝克、乔治·普拉切克和其他的一些年轻学者来研究院过暑

假和公休假。在1949年,他将一位十分聪明的仅仅27岁的年轻人杨振宁请到了研究院。杨振宁在1957年与另一位中国出生的李政道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李政道也被奥本海默请到了研究院。派斯在1948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这像是一个虚幻的地方:玻尔到我办公室来和我谈话,我从窗口可以看见爱因斯坦和他的学生们向他家走去,隔着两个办公室坐着迪拉克,楼下是奥本海默……"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像这里一样会集着这么多聪明的科学头脑,当然除了洛斯阿拉莫斯。

在1946年6月,那时奥本海默还没到研究院,约翰·冯·诺伊曼已经开始在富尔德大楼的地下锅炉房里研究他的高速电脑了。这是研究院有史以来最实用的同时也是最费钱的东西。刚开始,研究院托管会给了诺伊曼十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后来他又获得了美国无线电公司、美国陆军、海军研究所和原子能委员会的赞助,这是研究院少有的一次破例接收外部资金的事件。1947年时,距富尔德大楼几百码的地方有一座砖砌的小屋,就是用来存放诺伊曼预想中的电脑的地方。

制造这样一个机器的计划,在那些认为思考才是自己的工作的学者中引发了争议。"我们没有什么是需要大量计算的。"数学家迪恩·蒙哥马利抱怨道。奥本海默对诺伊曼的研究抱有两种看法。和那些人一样,他认为不应该把研究院变成一个国防部资助的实验室。但是这次不同,诺伊曼的机器将会对研究工作起到革命性的推动作用,因此他支持这个项目。诺伊曼同意不为他的设备申请专利,尽管这个东西很快就变成了商业电脑的模板。

奥本海默和诺伊曼在1952年6月正式推出了研究院的电脑。在那时,这是世界上运行最快的电脑,而且它推进了20世纪末的电脑革命。但是,当它被其他的更快更好的机器超越时,聚集在奥本海默屋子里的研究院长期成员们投票决定完全停止这个项目;他们还达成一致,再也不让类似的东西出现在研究院。

1948年,奥本海默请来了古典学者哈罗德·彻尼斯,他是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朋友,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全国顶尖学者。同年,他又游说托管会建立一个一万二千美元的"主管基金",他可以自由支配这笔资金,用这些钱请一些短期学者到研究院来。他请来了他儿时的朋友弗朗西斯·弗格森。弗格森利用这些资金写出了他的作品《戏剧印象》。在鲁思·托尔曼的建议下,他设立了一个心理学顾问委员会。鲁思和他的内弟爱德华·托尔曼,以及乔治·米勒、保罗·梅尔、欧内斯特·希尔加德和杰罗姆·布鲁纳每

年来学院一到两次。

奥本海默喜欢谈一些心理学的话题，布鲁纳发现，他“在感兴趣的事上很聪明但却漫不经心，而且他很顽固，不论在哪儿都时刻准备着探讨任何话题，他十分讨人喜欢，我们几乎对任何话题都讨论，但心理学和物理哲学是我们的最爱。”

不久，许多人文学家也加入到研究院，包括考古学家霍默·汤普森、诗人T. S. 艾略特、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社会哲学家伊塞亚·柏林，后来的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也加入进来。

奥本海默坚信可以把研究院建成集文理科学于一体的研究院。在奥本海默的讲话中，他一再强调人文知识会帮助科学更好地理解它的性质和结果。虽然仅有一小部分数学家支持他，但他们的支持却十分有力。诺伊曼对古罗马史的兴趣不亚于他自己专业的兴趣，还有些其他的人和奥本海默一样对诗歌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希望把研究院建成那些能理解整个人类状况的科学家、人文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天堂。这是一次让人难以抗拒的机会，把两个世界——科学和人文——合而为一的机会，奥本海默在这两个方面都像年轻人一样投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普林斯顿是洛斯阿拉莫斯的对立面，也可能是奥本海默对之前生活的矫正。

奥本海默与研究院最著名的人物之间关系不太稳定，奥本海默在后来写道：“我们是关系密切的同事，还有点朋友的感觉。”但他认为，爱因斯坦是物理学界活着的圣人，而不是一个科学工作者。研究院的部分人怀疑，《时代》杂志上“爱因斯坦是里程碑而不是灯塔”的评论出自奥本海默。爱因斯坦对奥本海默怀着同样复杂的感情。当奥本海默在1945年第一次被提名为研究院终身教授候选人时，爱因斯坦和数学家赫尔曼·韦尔联名向研究院写了一份备忘录推荐理论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代替奥本海默。那时，爱因斯坦对泡利很熟悉，但对奥本海默仅是知道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韦尔曾在1934年试图将奥本海默吸引到研究院来，但奥本海默坚决地拒绝了，他说：“我在那里一点用都没有。”毫无疑问，单就物理学家的资格来说，奥本海默比不上泡利。然而，爱因斯坦和韦尔也不得不承认，虽然奥本海默没有像泡利那样在物理学上开创出不相容原理和对电子旋转的分析这样的成果来，但奥本海默创建了全美理论物理学领域最大的研究院。在奥本海默的学生一致赞扬他时，爱因斯坦和韦尔告诫说：“奥本海默有时太居高临下了，他的学生

差不多也是这样。”由于这个不太公平的建议，研究院将职位给了泡利，但泡利拒绝了。

爱因斯坦最后不得不对这个新主管表现出一些尊敬。爱因斯坦把他描述成一个“不同寻常、精通教育的各个方面的人”，而这仅仅是爱因斯坦对他本人的尊敬，而不是对他在物理学上的造诣。爱因斯坦仍不把他当朋友看，“可能部分原因是我们在科学上的不同观点吧”。奥本海默曾把爱因斯坦叫作“十足的疯子”，因为他一直顽固地拒绝承认量子理论。奥本海默带来的年轻学者都对玻尔的量子理论坚信不移，对爱因斯坦提出的反对理论不屑一顾。他们搞不清为什么这么伟大的人要如此不知疲倦地搞出一个“统一场论”来代替量子理论。这是一份孤独的工作，但爱因斯坦仍一往无前，他说：“上帝反对让他一直掷骰子的建议。”这是他对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的简略描述，这个原理也是量子理论的基础。爱因斯坦很满意自己对量子理论的这个反驳，并不在意普林斯顿的同事们“把我看作一个异端邪说者和反动分子，认为我活得不现实”。

奥本海默深深敬仰爱因斯坦“与众不同的独创力”。他曾建立了相对论，“这是几何与重力非凡的统一”。奥本海默认为，爱因斯坦把原始的传统带到了工作中，而正是这种传统在以后的日子里误导了他。奥本海默很遗憾地看到，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日子里一直试图去证明量子理论的缺陷和不和谐。他比任何人都擅长举那些富有灵性的反驳例子，但事实证明不一致性是不存在的，而且那些解决的办法通常可以在他以前的工作中找到。量子理论让爱因斯坦不满的是它的不确定性。然而，正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激发了玻尔的灵感，奥本海默觉得这太有讽刺意味了。“他用豁达而激烈的理论对抗着玻尔，而他憎恨的理论却承袭了他的观点，这在科学史上并不是第一次。”

这些争论并没有影响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的合作。1948 年的一天傍晚，奥本海默在他的庄园款待了爱因斯坦和大卫·利林塔尔。利林塔尔坐在爱因斯坦的身旁，他看到奥本海默在听爱因斯坦把微电子描述成小生命和物理界美人时脸上的庄重和专心致志。有时奥本海默还忍不住轻声地笑起来，眼角漾出皱纹。奥本海默还喜欢当礼物派送者。他知道爱因斯坦喜欢古典音乐，而且也知道他的收音机收不到纽约广播的卡内基大厅的音乐会节目。奥本海默安排人在爱因斯坦的住宅上安装了天线，他做这些事都没有让爱因斯坦知道。在爱因斯坦生日那天，奥本海默出现在爱因斯坦的家门口，抱着一台崭新的收音机，并让爱因斯坦试着收听音乐会。爱因斯坦十分高兴。

在物理学方面二人意见各不相同,但在人文主义方面二人团结一致。当科学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被迫为冷战服务时,国家安全网的武器实验室大规模地收买科学家,当时的许多大学更依赖军事合同,但奥本海默选择了另一条路。面对着科学军事化的威胁,奥本海默离开了洛斯阿拉莫斯。爱因斯坦佩服奥本海默用自己的影响力来阻止军备竞赛,同时爱因斯坦发现,奥本海默十分谨慎地运用他的影响力。奥本海默拒绝在新成立的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的公开宴会上讲话的事,让爱因斯坦很疑惑。奥本海默解释说,他没准备好作这样一个公开演讲,没有信心使演讲成为公众期待的那样。

这位老人很显然不明白,为什么奥本海默显得好像很在乎保持他与华盛顿统治集团的联系。爱因斯坦也没有参与到这些事中。他从没想过政府会对他进行忠诚调查,他打内心不喜欢和政客、将军以及那些权力机构的人接触。就像奥本海默看到的那样,爱因斯坦从没有很自然地与政府工作人员交谈过。然而,奥本海默好像很喜欢把他的名声和前途与权力联系在一起,但谄媚使爱因斯坦反感。1950 年 3 月的一天是爱因斯坦的 70 岁生日。那天晚上,奥本海默送爱因斯坦回家,爱因斯坦对奥本海默说:"一旦一个人受命去做一些看似合理的事,在那之后,生活就变得不同了。"奥本海默比任何人都明白他的意思。

像在洛斯阿拉莫斯一样,奥本海默仍然拥有不同寻常的说服力。派斯曾回忆到他遇到一个刚从奥本海默的办公室出来的高级学者,那位学者对他说:"我身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我是来同奥本海默争论的,当时我在那个话题上的观点很坚定,但当我从那扇门出来时,我发现自己已经是他的观点的支持者了。"

奥本海默也试着把同样的手段用在研究院的财产托管理事会上,但结果并不乐观。在 40 年代晚期,理事会经常在以后发展是开放还是保守上争执不休。这是因为他们的副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他是唯一一个拥有大量财产的成员,其他人都倾向于听他的意见。他几乎是病态地倾向于守旧,主张开放的成员都被清除出去了。一位成员私底下抱怨说,理事会不需要一个"胡佛派共和党人的思想"。虽然奥本海默只是在来研究院之前简单地见了一面斯特劳斯,但他十分清楚斯特劳斯的政治立场,并且很明了地表示他不赞同斯特劳斯升职为理事会主席。

奥本海默与斯特劳斯的私人关系开始时很好,但也是在开始的那几年交往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斯特劳斯到研究院时基本上都要到奥本海默的庄园做客。在一次午餐后,斯特劳斯送给奥本海默和基蒂一箱红酒,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为了攫取权力他们二人已经反目。

奥本海默很快就感觉到斯特劳斯有当总管的野心。1948 年的时候,他曾和奥本海默说过他很想买下研究院的一处房子,那是一位前研究院领导留下的。这个信号太明显了。他立刻让研究院将这处还在考虑中的房子买下来,租给了一位学者。他就这样迅速地打破了斯特劳斯的计划。斯特劳斯很显然收到了奥本海默的这个信号。这件事就如同研究院未公开的官方记录上写的那样:"这次事件打破了斯特劳斯通过采取小范围变化而控制研究院的希望。"同时,这也导致了整个研究院弥漫着紧张和相互猜疑的气氛。

当听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原子能委员会所属的各个学会资助的科学家要具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忠诚调查时,奥本海默十分生气。他立刻给原子能委员会写了封信,他写道,研究院将不再认同这些学会,因为这些忠诚调查的要求破坏了研究院的传统。一个月后,奥本海默才将他的行为告知托管会。通过会议记录我们可以得知,一些托管会成员担心,这位主管的行为可能使研究院卷入政治矛盾,特别是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托管会告诫奥本海默,下次再采取这种行为时要事先通知理事会。

奥本海默提出的研究院改造计划,经常遭到研究院学者的反对,特别是那些数学家。因为他们曾以为奥本海默会增加他们的经费,提供他们更多的职位。这些争论有时会变得很奇怪,像那种日常琐碎的争吵一样。奥本海默的秘书弗娜·霍布森说:"研究院是充满乐趣的天堂,但在任何一个理想的群体里,当你想改变一些不和谐的地方时都会引起更大的矛盾来。"争论大多是关于职位的问题。有一次,奥本海默正在主持一个会议,奥斯瓦尔德·维布伦闯了进来要求旁听。奥本海默坚持让他离开,但这位数学家坚决不走。奥本海默最后暂停会议,然后搬到另一个房间里重新开始。"这些事情就像两个小孩子吵架一样。"

奥本海默在研究院展现了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同样的耐心和精力,但戴森说,奥本海默同那些数学家的关系非常糟糕。研究院的数学系是一流的,而且奥本海默尽量不干涉他们的事务。事实上,在奥本海默任职的第一年里他为研究院引进了各方面的人才,尤其是数学系人员一下子增加了 60%,但这没带来任何回报,那些数学家一直不断地反对他在其他领域的任命。感到屈

辱和愤怒的奥本海默,曾把38岁的数学家迪恩·蒙哥马利称作他见过的“最骄傲自大,最愚蠢的混蛋”。

这种情绪,不断发展最后导致了不理智的大爆发。“他一直试图羞辱我们数学家,”曾在研究院工作过几十年的法国数学家安德烈·魏尔(1906—1998)说,“奥本海默完全是一个失意者的心态。他把挑拨别人的争吵当作乐趣,我曾见他这样做过。他喜欢让研究院的人互相敌对。他心底感到沮丧,因为他想成为尼尔斯·玻尔或爱因斯坦。”魏尔是奥本海默在研究院遇到的典型自尊心膨胀的那类人。这些人不像洛斯阿拉莫斯的那些年轻人,他的人格魅力在这样的人身上没有任何作用。魏尔喜欢攻击别人。他尖酸刻薄,在威胁别人中获得乐趣,当他不能使奥本海默感到害怕时就会感到愤怒。

当奥本海默被那些夺权密谋削弱后,他偶尔也会把他的怒气发泄到那些试图威胁他的人身上。当他得知弗里曼·戴森口风不紧,把还未宣布的一位物理学家的任职消息透露出去后,他把戴森请到办公室里。戴森回忆道:“他让我感到害怕。我看到他愤怒到了极点,当时太糟了,感觉自己就像一条可怜的小虫子,他让我记住:我把他给我的信任出卖了,他也会这样对我。他必须以他自己的方式行事,研究院是他的王国。”

在普林斯顿,奥本海默身上的那些在洛斯阿拉莫斯很少表现出来的粗暴品质有时会激烈地爆发出来,这使他那些最亲密的朋友都感到吃惊。值得肯定的是,大多数时间里奥本海默是智慧和谦逊的。人们被他那迷人的性格所吸引,但有时他控制不住他的愤怒。这种情况派斯能想起很多次。当奥本海默将不必要的怒火倾泻在年轻学者们身上后,那些学者就到他的办公室里抽泣诉苦。

他聪明过人,不知疲倦,感情坚强。他的好朋友也对他捉摸不透。派斯几乎是和他天天在一起的,他认为奥本海默从来不把自己的内心示人。极少数情况下,他的心扉会向你敞开,流露出那些平时隐而不示的情感。有一天晚上,派斯去研究院的加登剧场看简·雷诺阿在1937年拍的一部经典反战电影《幻灭》。电影讲的是一战期间士兵之间的友情、隔阂和背叛。当电影结束、灯光亮起时,派斯转身发现奥本海默和基蒂坐在后排,他还可以看到奥本海默脸上的泪痕。

另一次是在1949年,派斯邀请奥本海默和基蒂参加他在自家公寓里举办的小型聚会。那天晚上,派斯突发奇想,他把吉他拿出来让大家坐在地板上轮流唱歌。奥本海默虽然照办了,但派斯看到他脸上明显流露出傲慢与不

屑。他大概觉得自己不该出现在这种愚蠢的场合。这个活动进行了一段时间后,派斯看到奥本海默的傲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多愁善感、渴望友情的面孔。

研究院的生活节奏是平静而雅致的。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富尔德大楼的公共休息室里都会准备好热热的下午茶。奥本海默曾经说:"那里是我们相互讨论的地方。"他一星期举行两到三次研讨会,主题经常是物理学方面的,但也有其他领域的。他说:"最好的传递信息的方式就是把它放在人的思想里。"经济学家斯图尔特博士说:"那些年轻的物理学家是最活跃也是最敏捷的……几天前,我问刚从研讨会出来的他们,'感觉怎么样?'其中一个人说,'太棒了,我们上星期对物理学所了解的内容都是错的。'"

然而,有时客作演讲者在遭遇到这种被称为"奥氏对待"时会感觉到信心全无。戴森在写给他在伦敦的父母的信中描述了这种感觉:"我曾非常仔细地观察过奥本海默在研讨会上的行为。假如演讲者讲的是他知道的内容,为了听众的利益他会迫不及待地要求跳到下一位演讲者,如果是他没涉及过的或当即就让他感到赞同的,在这个理论完全展开前他会插进来,有时还发表一些批评的言论。他不停地转来转去,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不能控制自己保持耐心。"有些人受不了他的那些下意识的动作:他经常不停地咬自己的手指,上下牙相互撞击。

戴森记得,有一次当他就费曼的新近成果量子电动力学发表演讲时,奥本海默"像一座大山一样向他压了过来"。不过他事后为此向戴森表示了歉意。当时,奥本海默认为费曼的理论绝大部分是依靠直觉做出的,仅仅一小部分是靠计算得出的,并认为这个理论完全是错误的。他也拒绝听戴森的解释。在来自康奈尔的汉斯·贝特作演讲支持费曼的理论后,他才决定重新考虑他的观点。当戴森再次作演讲时,奥本海默面无表情地沉默着。事后,戴森在他的信箱里发现了奥本海默留给他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奥本海默,无罪申诉"。

戴森对奥本海默怀着复杂的感情。贝特告诉他,他应该拜奥本海默为师,因为奥本海默很有深度。但戴森对他感到失望。奥本海默好像没时间进行物理学研究和演算,而这些是一名理论物理学家应该做的。他可能是学识渊博,但他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些什么。戴森搞不懂奥本海默这个人,他身上既有哲学家的超凡脱俗,又怀着巨大的野心。他觉得奥本海默身上最吸引人

的，是那种使魔鬼屈服的强势和拯救百姓的善心所结合的品质。

戴森觉得奥本海默很狂妄，有时他不能理解奥本海默的那些言论。这也使他明白一个道理："说些让人不明白的话可能会显得很高深。"尽管如此，戴森还是被奥本海默吸引着。

在1948年的早些时候，《时代》杂志对奥本海默在《技术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作了简短的评论：奥本海默教授在上周诚恳地承认了科学的罪恶。

这个故事引用了战时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领导者的话："从某种大致意义上说，每个物理学家都是罪恶的，但他们不能放弃知识。这并不是任何粗俗、幽默或是大话所能诠释的。"

奥本海默明白这些话（尤其是出自他的口）必会引起争论，甚至他的好朋友拉比都认为他说这些话是个错误。"这是一堆废话，我们从来不那样说，"拉比说，"他感到罪恶，可他并没搞清楚他是谁。"这件事也使拉比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奥本海默太仁慈了。拉比对他生气，是因为他太了解他了，他说他的缺点就是喜欢把事情搞得神神秘秘的。奥本海默以前在哈佛大学的老师珀西·布里奇曼教授告诉记者说："科学家不用对自然界的事实负责……假如有人要负责那个人也该是上帝，是他创造了这一切。"

奥本海默当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奥本海默在剑桥大学的导师帕特里克·布莱克特出版了《原子能的军事与政治影响》一书。他是第一个激烈批评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的决定的人。布莱克特认为，在1945年8月，日本已经投降了，美国投下原子弹的动机是为了挫败苏联对日本的战后占领的计划。布莱克特这样写道："我们能想到的美国急匆匆地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仅有的两颗原子弹的理由是，他想让日本只向他的武力屈服。对日本实施核攻击，不仅仅是二战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而且是对苏联实施冷战的开始。"

布莱克特和许多美国人都明白这两颗原子弹的用意，这使那些了解或猜测到这个真相的人的心里产生一种激烈的矛盾情绪。这些矛盾感也存在于那些科学家的心里。他们看到自己的成果被用作这种用途而感到深深的自责。布莱克特当然对作为自己学生的奥本海默的内心矛盾进行了描述。他甚至提到了奥本海默在1946年6月1日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奥本海默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是在对一个已经被击败的国家进行攻击。

布莱克特的书第二年在美国出版时引起了轰动。拉比在《大西洋月刊》

中以这本书没在日本引起轰动的现象攻击他。他坚持说,那两个城市就是合法的靶子。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奥本海默从来没有对布莱克特的理论表示过反对,而且在第二年,当布莱克特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奥本海默还送去了他热情的祝贺。在几年之后,布莱克特出版了第二本批评美国决定使用原子弹的书——《核武器与东西方关系》。奥本海默认为,书里的一些观点不是很有力,但他仍然同意书里的主要观点。

那年春天,一本新杂志《今日物理》创刊,奥本海默的帽子和金属烟斗的黑白照片被作为封面。这张照片太著名了,不需要任何文字说明。在爱因斯坦之后,奥本海默无疑是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那时,科学家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他们的意见被政府采纳,在社会上的影响也不可估量。戴森说,奥本海默一方面想要和华盛顿的那些将军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他还想成为人类的拯救者。

28 | “他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说他在那一刻精神错乱了，当事情太多的时候他就有这种倾向，
他有时会做些很荒谬的事……”

——大卫·博姆

1948年秋天，罗伯特回到了十九年前曾访问过的欧洲。那时，他是个前途无量的青年物理学家，而当他归来时，理所当然地成为那个时代最知名的物理学家、最著名的美国理论物理学的创始人、“原子弹之父”。根据日程安排，他访问了巴黎、哥本哈根、伦敦和布鲁塞尔，并在那里发表演讲或者参加物理学的有关会议。那时，年轻的他已经到了可以到哥廷根、苏黎世和莱顿作深层次研究的程度了。他急切地期待这次旅行。但到9月底，他写信告诉弟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对本次旅行的收获感到失望。他在信中写道：“欧洲像它的过去一样，只是一段时间的简单记忆……关于物理学的会议还是值得称道的，然而，在哥本哈根，在英格兰，在巴黎，甚至在这里（布鲁塞尔）都充斥着一句话：‘你瞧，我们多少有点离题了。’”这使得罗伯特惆怅地得出结论：只有在美国，我所掌握的知识才会被用来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

罗伯特随后在他的信中言归正传：敦促弗兰克去寻求一位好律师的安慰、支持和意见。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那年夏天曾举行过听证会。罗伯特正为他弟弟或者说在为自己担心。他在信中对弗兰克说：“自从我们离开美国而无法得知托马斯委员会的最新发展，情况就变糟了。”

奥本海默担心委员会会对他弟弟采取行动，因为他与共产党的关系众所周知。罗伯特知道，早在1947年3月《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登载的一篇报道就指控他曾是个共产党员，而弗兰克那时愚蠢地否认了这篇报道的真实性。虽然不是很明显，但罗伯特发现弗兰克这些年对此事想了很多。正是在这封

信中,他殷切建议弟弟找个好律师,他需要的是一个与华盛顿和国会都有门路的人,更重要的是跟媒体有很多关系。“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赫伯特·马克斯?他可能符合所有这些条件。”罗伯特希望弟弟能够免于托马斯委员会的各种迫害。但很显然,弗兰克要为此做好准备。

那时,36岁的弗兰克·奥本海默正处于事业的巅峰。他曾在罗切斯特大学工作。现在他在明尼苏达大学做量子物理学的创新实验研究。到1949年,他名声鹊起,并且成为从高层次研究量子物理学的一流实验物理学家之一。

罗伯特担心弗兰克的处境,同时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声誉可以抵消自己左翼的过去。1948年11月,罗伯特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同时该杂志附加了使他更具声名的生活及事业概况。《时代》杂志的编辑告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民众说,奥本海默——一个原子弹时代的奠基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时代英雄”。当《时代》杂志的记者采访他时,他并未掩饰自己过去的激进。他坦然承认1936年以前他是“一个世界上离政治最远的人物之一”,但接下来他也承认,一个年轻而又失业的物理学家的眼光会很短浅,而他自己的德国亲戚要逃离纳粹政权的消息使他明白了一些事。“我清醒地认识到,政治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成了一位真正的左翼人士,加入了教师工会并认识了许多共产党的朋友。那是大部分人在大学或高中后期都会做的。托马斯委员会不喜欢这些,而我却不为这些感到惭愧,甚至为参加晚了感到惭愧。那时我所信奉的现在看来是无稽之谈,但它却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不可或缺的经历。如果不是这迟来却不可替代的教育,我可能就不会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了。”

他的故事在《时代》杂志刊出后不久,他最好的朋友,曾为律师的赫伯特·马克斯写信祝贺他说:他的感想是一篇极好的文章,它的内容很可能作为他左翼历史的引证。马克斯评论说,这个“开庭前的预备”很出色。罗伯特回信说:“我欣赏你专门指出的那一点,从这上面我看到了希望,这是我期待已久但以前没有见到的东西。”赫伯特的妻子安妮·威尔逊(奥本海默过去的秘书)担心《时代》杂志的报道会引来批评。奥本海默自己却不能确定能从中得到什么。

奥本海默期待自己免受国会调查员的打扰,但在1949年春,托马斯委员会展开了一场以伯克利放射实验室的原子能间谍案为主的调查。这不仅涉

及到弗兰克,就连罗伯特都成了潜在目标。奥本海默过去的四个学生——大卫·博姆、罗西·洛马尼茨、马克斯· 弗里德曼和约瑟夫·温伯格——都收到了接受调查的传票。

1949 年 6 月 7 日,奥本海默出现在托马斯委员会决策会议紧闭的大门内。六位国会议员对他进行质询,其中包括众议员理查德·M. 尼克松。奥本海默以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出现在该委员会的面前,而那些老练的国会议员质问的不是关于核武器政策,而是想知道关于间谍的事。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奥本海默表现得十分配合。

委员会的律师首先声明,委员会并不是想刁难他,但首要问题是:"你知道共产主义的思想存在于实验室某些科学家的头脑中,难道不是吗?"奥本海默否认他知道这些。此后,他被要求说一说关于他以前学生的政治活动和看法。他说自己不知道温伯格在战前是个共产党员。

委员会的律师接着又问到奥本海默的另一个学生伯纳德·彼得斯博士。他的答复显示出了他一贯的幼稚。他自我安慰地认为,因为这是决策委员会的听证会,因而他的评论不会被公开。委员会问他是否曾告诉曼哈顿工程安全官员彼得斯是个"危险的极左翼分子"。奥本海默承认,他曾告诉过皮尔·德·席尔瓦上尉这些。委员会要求他详细讲一下。奥本海默解释道,彼得斯曾是个德国共产党,而且与纳粹进行过巷战,而后被送进集中营,且用计谋奇迹般地逃脱。他又自愿说出,当彼得斯来加利福尼亚后,曾气势汹汹地宣称:"美国共产党没有足够的牺牲精神来通过武力和暴力革命推翻美国政府。"当他被问及如何知道彼得斯是德国共产党时,奥本海默回答说:"这些都是他自己告诉我的。"

奥本海默给彼得斯带来了麻烦。那年的 5 月,他正在参加一次美国物理学会会议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塞缪尔·古德斯米特问到了彼得斯的问题。因为古德斯米特是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他偶尔能接触到安全文件。因为彼得斯最近问他为什么他觉得好像有人在调查自己,古德斯米特就看了他的安全文件,并读到了奥本海默在 1943 年对德·席尔瓦所说的彼得斯很"危险"的言论。当古德斯米特问奥本海默他是否依旧对彼得斯持同样的态度时,奥本海默的答复令他吃惊:"你看看他那样子,你能说他可以信任吗?"

委员会还问了奥本海默其他朋友的情况。当问到他的老朋友哈康·希瓦利埃是否是共产党员时,他回答说"他是个典型的赤色分子",但他却不知道他是否是党员。关于"希瓦利埃事件",奥本海默复述了他 1946 年曾对美

国联邦调查局讲过的事:困惑的希瓦利埃告诉他,埃尔滕顿提议同苏联政府交换情报的事,奥本海默大声且严肃地告诉他不要感到困惑且不要与此事扯上任何关系。他说,当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前希瓦利埃对原子弹一无所知。委员会并没有专门问他与其他三位科学家的接触——就像他在1943年对帕什说的那样——他否认任何人与他进行过涉及原子弹信息的接触。

当被问到关于弟弟过去的共产党员身份时,罗伯特回答说:"主席先生,我会回答您的任何问题,但是我要求您不要涉及我弟弟,如果这些对您很重要,您可以直接去问他自己。我请求不要问那样的问题。"

出于对奥本海默极高的敬意,托马斯委员会的律师收回了问题。在结束前,国会议员尼克松说,奥本海默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而且十分高兴赋予奥本海默在他们的程序中应有的地位。乔·沃尔普对奥本海默的冷静表现十分吃惊:"罗伯特好像下决心要让国会议员们坐不住。"会后,六名托马斯委员会委员全都走下来与这位著名科学家握手。因此,罗伯特继续认为他的坏名声仍是个保护盾也就不奇怪了。

奥本海默从听证会上毫发无损地回来了,但他以前的学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奥本海默被询问后的第二天,彼得斯草草应付了委员会的二十分钟调查。他否认自己在德国或在美国曾是共产党员,他同时也否认了自己的妻子汉娜·彼得斯博士是共产党员和自己认识史蒂夫·纳尔逊的事。

彼得斯离开时,一直在揣度奥本海默前一天跟委员会说了什么。因此,在回罗切斯特的路上,他在普林斯顿停下来去拜访了自己的导师。奥本海默俏皮地说:"上帝指引了他们的问题,所以我没有说任何不合实际的话。"但一周后,奥本海默的闭门听证会的内容被透漏给了《罗切斯特联合时报》。报道的标题很惊爆:"奥本海默博士称彼得斯'极其赤色'"。彼得斯在罗切斯特大学的同事了解到,彼得斯曾用"诡计"逃出达豪集中营,而且还批评过美国共产党因不够敬业而无法发动一场武装革命。

彼得斯马上知道自己可能会丢掉工作。他迅速否认奥本海默的指控,他告诉《罗切斯特联合时报》:"我从未告诉奥本海默博士或任何人我曾是共产党员,因为我不是,但我的确赞叹那种与纳粹作战的斗争精神,而且敬重那些牺牲的英雄们。"他还承认,虽然他的政治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不是正统的,但他强烈反对激进歧视主义,他对社会主义也很向往,但他不是共产党。

奥本海默不久就收到了弟弟弗兰克以及汉斯·贝特和维克托·韦斯科

普夫的信，他们都对奥本海默那样攻击一个朋友感到吃惊和痛心。韦斯科普夫和贝特都写道，他们无法理解奥本海默怎么能那样说彼得斯的这些事。正如韦斯科普夫所说的，他们敦促奥本海默"纠正那些记录并尽自己所能使彼得斯不被解职"。贝特写道："我记得你跟我谈到彼得斯夫妇时是极其友善的，而他们也认为你是他们的朋友。你怎么可以将他从达豪集中营的逃离描述为有意识的'直接行动'，而不是一种逃离精神折磨的自我保护？"

奥本海默在哥廷根大学时的朋友并在洛斯阿拉莫斯担任过副主管的爱德华·康顿，也对该描述感到十分震惊和恼怒。现在身为国家标准局局长的他，也是国会山上右翼分子不断攻击的对象。他在1949年6月23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确信罗伯特已经失去理智，如果奥本海默真是这样的话，考虑到他的职务及'艾奇逊—利林塔尔报告'中关于原子能国际管制的发起者身份，这会造成极其复杂的后果。如果他的精神垮掉，那一定是个悲剧，我只希望他不要牵连太多人。彼得斯说，奥本海默关于自己的证言，都是奥本海默明明知道真相却编造的彻头彻尾的谎言。"

伤心的康顿给奥本海默写了一封尖刻的信："我辗转反思，你怎么能对一个你认识了那么久而且你也明明知道是一位好物理学家和好公民的人如此指责。别人都觉得你愚蠢，认为你是想通过告密来换回自己的前途。我期望这不是真的，你十分明白，如果这些人一旦决定追查你的卷宗，并且将它公之于众，那么你将会名誉扫地。"

几天后，弗兰克带彼得斯去见正在伯克利访问的哥哥。彼得斯在后来写给韦斯科普夫的信中描述道："我与罗伯特的谈话令人沮丧，开始他就拒绝告诉我报纸上的报道是真是假。"当彼得斯坚持要知道真相时，奥本海默确认了报纸关于他听证会的描述。"他说这是个极大的错误。"彼得斯写道。奥本海默试图揭示他开始并没有作好回答这些问题的准备。直到现在，从他的言词上才可以看出，他已经认识到他说的话这样具有破坏性。当彼得斯问他在普林斯顿为什么欺骗他时，奥本海默的脸红了，并说他无话可说。彼得斯坚持认为奥本海默误解了他。彼得斯承认，他曾在德国参加过共产党的露天集会，但他发誓自己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奥本海默同意写一封信给罗切斯特报社的编辑，以纠正他在托马斯委员会的证词。在这封1949年7月6日发表的信中，奥本海默解释说，彼得斯博士不是共产党员而且也没有鼓吹要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奥本海默说他相信他的声明，而后他继续为自由言论辩护："政治见解，无论多偏激，多么毫无

顾忌的表现,都不应当给一位科学家的高尚生涯造成不利影响……”

彼得斯认为这封信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尽管如此,这封信还是挽救了他在罗切斯特大学的工作。但他很快认识到,因为无法摆脱政府的调查,他在美国的研究生涯就要结束了。在 1949 年晚些时候,他向国务院表示了要去印度的意向,但政府拒绝给他签证。第二年,国务院终于缓和了些,允许彼得斯前往孟买的塔塔基础研究院任教。但在 1955 年,因为美国国务院拒绝再次认证他的护照,他最后取得了德国国籍。1959 年,他同汉娜前往哥本哈根的尼尔斯·玻尔学院并在那里度过了他之后的研究生涯。

相对博姆和洛马尼茨而言,彼得斯算是幸运的了。一年之后,他们都因蔑视国会罪而被审判。博姆在 1950 年被逮捕,并在缴纳了一千五百美元之后才被释放,但普林斯顿暂停了他的教学工作并不准他进入校园。六个月后,普林斯顿不再与他续约了。洛马尼茨在接受托马斯委员会的质询后便失业了。到最后,他仅能找到的工作是每小时 1.35 美元的修铁轨的活,直到 1959 年他才又找到了教学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好像并没有对奥本海默愤恨不已,他也没有因为联邦调查局和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对他所做的一切而抱怨。然而,他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失望。洛马尼茨过去曾将奥本海默想成“几乎是上帝”的人,他深信奥本海默不是有意的。但这些年之后,他说他对“人性的弱点感到伤心”。

博姆明白,奥本海默的压力很大。在托马斯委员会的质询中对彼得斯的不利证词被公布后,他与奥本海默进行了一次坦诚的交谈。他问奥本海默为什么那样说他的那些朋友。博姆回忆说:“他说他在那一刻精神错乱了,当事情太多的时候他就有这种倾向,他有时会做些很荒谬的事,我没记住具体的话,只记得大体是这个意思,他说当事情很多时他就容易犯错,他也不能理解当时自己为什么那样做。”当然,这种情况在 1943 年他与帕什见面和 1945 年他与杜鲁门见面时就曾发生过,后来在 1954 年的安全听证会上也发生了。就像帕什对韦斯科普夫表述的那样,“奥本海默很显然对听证会感到畏惧,但这很难解释……看着一个我十分崇敬的人处于道德上的绝望状态是一种痛苦的经历。”

1949 年 6 月初,在他被托马斯委员会质询仅仅六天后,奥本海默回到国会接受一个有关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公开听证。这是关于向国外实验室出口放射同位素的案件。在略有争议的四比一的决议中,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

们已经同意出口，但唯一不同意的委员刘易斯·斯特劳斯则深信这种出口十分危险，因为他认为放射同位素会被转化用于原子能的军事用途。不久前，为反对这个决定，斯特劳斯曾公开在联合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反对该意见。

所以，当奥本海默踏进国会办公大楼的党团会议室时，他感受到了斯特劳斯的忧虑。但他与斯特劳斯的看法不同，并且认为斯特劳斯的看法是愚蠢的。他作证说："你不可能将这些同位素用于原子能；如果可以的话，你就能将铲子用于原子能，实际上，你能行；你也可以将一瓶啤酒用于原子能，实际上，你也可以。"听到这些时，听众们都笑着窃窃私语。一名年轻记者菲利浦·斯特恩碰巧在那天参加了听证会。斯特恩并不知道具体讽刺的是谁，但"很明显奥本海默正在捉弄某个人"。

乔·沃尔普很清楚地知道他在拿谁开涮。他坐在奥本海默旁的证人桌上，回头瞟了斯特劳斯一眼，看到这位委员气得通红的脸时他并不感到意外。奥本海默接着说："我自身认为，从广义上说，同位素的重要性不及电子设备，却比维生素或两者间的某件东西重要。"回应他的是更多的笑声。

后来，奥本海默漫不经心地问沃尔普："乔，我表现得如何？"律师并不轻松地回答："很好，的确很棒。"如果他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政策分歧的话，他可能就不会羞辱斯特劳斯，但对奥本海默来说，优越感使他很轻易地就取胜了——太轻易了，许多朋友都这么认为。这是他课堂技能的一部分。一个朋友说，他能使一个人感到自己是在上学的孩子，也可以让人们感到自己像蟑螂。但斯特劳斯不是个学生，他是有权势、脸皮薄且又对羞辱怀恨在心的人。他那天十分生气地离开了听证会议室。"我记得很清楚，"另一位委员戈登·迪安说，"在他脸上有着不常出现的愤恨表情。"

从1948年的早些时候起，奥本海默与斯特劳斯的关系就"直线下滑"，那时，奥本海默已明确表明抵制斯特劳斯对自己高等研究院主管事务的干预。他们在听证会之前就曾经历过几次与原子能管制相关的分歧，但这是奥本海默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有权势并在他专业生涯中有重大影响的危险敌人。

就在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的6月14日，弗兰克作为证人在托马斯委员会上出现。两年前，他对一个报社记者否认了他曾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本不想再在党员身份一事上撒谎，但在一天深夜，一名《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记者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明天报纸上将有篇关于他的文章。在记者通过电话读

完文章后，当时就叫弗兰克评论一下。弗兰克说："这故事中夹杂了各种各样错误的指控，只有战前的党员身份是真实的。他们向我要声明，我只是简单地说整个故事都是假的——这样做对我来说太愚蠢了，我本应当保持沉默什么都不说。"当文章发表后，明尼苏达大学的官员向弗兰克施压，并让他写出一份相同的否认声明。为了保住工作，弗兰克让一位律师起草了声明，宣誓他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但现在，同雅姬反复交谈后，弗兰克觉得要讲真话。那天早晨，他宣誓要讲真话，证明他同雅姬从 1937 年早期到 1940 年末或 1941 年初的三年中是共产党员，在那段时间，他化名"弗兰克·福尔瑟姆"。根据律师的建议，他拒绝为他人的政治主张提供证词，他说："我不能说关于朋友的事。"

后来，弗兰克又告诉记者们，他们在 1937 年入党是为了"在这个最富裕又最具生产力的国度寻找解决失业和供需问题的答案"，但他们因幻想破灭而于 1940 年退出了共产党。他说他对在洛斯阿拉莫斯或在伯克利的放射实验室的原子能间谍案并不知晓。"我不知道共产党的活动，没有人来找我要信息，而且我也没有给任何人。我工作十分努力并且深信自己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仅仅一小时以后，弗兰克就从一名记者那里得知，明尼苏达大学已经接受了他提交的物理学副教授的辞呈。他两年前曾撒过谎，从学校的角度讲，这个理由就足以让他退出学术生涯了。他离任期仅剩三个月了，但在与校长的最后一次会面上，校长告诉他工作已经结束了。弗兰克泪流满面地离开了校长办公室。

弗兰克伤心欲绝。当他回到伯克利时，他受到了致命打击。他幼稚地认为欧内斯特·劳伦斯会给他提供一个避难所，但当欧内斯特拒绝时，他十分震惊。

一年前，弗兰克和雅姬在科罗拉多山上的帕哥沙温泉附近买了八百英亩牧场。他们本打算将其作为夏日度假村。让很多朋友吃惊的是，他们在 1949 年秋天来到了这一清苦的内陆流放地，他写信给伯纳德·彼得斯说："没人愿意给我们工作，所以我们毅然决定在这里过冬。这里的确很美，我想也许只有你才会让我们的居住有意义。"牧场位于海拔八千英尺的地方，因而冬天十分寒冷。"雅姬坐在小木屋里，"菲利浦·莫里森回忆道，"用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将在雪里生产的奶牛。他们得跑出去救刚出生的牛犊，免得它们冻死。"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罗伯特的弟弟可怜而又出色地维持了一个精打细算的牧场主的生活。他们离最近的城镇有二十英里远。联邦调查局特工时常

出现并向他们的邻居问些问题，就如同提醒他们别忘了他们的身份一样。偶尔，他们也会光顾弗兰克的牧场，问弗兰克一些关于共产党内其他人的问题。有一次，一名特工特意告诉他："你不想在大学工作吗？如果你想，你就必须跟我们合作。"弗兰克经常把他们赶走，弗兰克在1950年写道："经过这些年，我终于明白了这个事实，那就是，联邦调查局并不是真的在调查我，他们正在试图破坏我生活的气氛。他们试图通过让我的朋友、邻居和同事的怀疑和反对来惩罚我这个左翼人士。"

罗伯特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光顾牧场。当时弗兰克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但罗伯特对弟弟的生活方式感到恼火。弗兰克说："我真感觉自己是个牧场主，其实我就是。尽管他当时并不能做什么，但他不相信我能成为一个牧场主并急切地想让我回到学术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弗兰克收到了来自巴西、墨西哥、印度和英国物理学教授的试探性邀请，但国务院坚决拒绝给他办理签证。而在美国他又找不到任何工作，他早已上了黑名单。在几年之内，弗兰克被迫以四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梵高的《第一步》。

奥本海默在他弟弟的事上感受到了挫折，他与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哈佛大学的督导主任格伦维尔·克拉克以及其他法律界的学者探讨了组织一个讨论会，来批评杜鲁门政府的忠诚和安全项目，用这种方式来支持弗兰克和奥本海默的学生。他告诉克拉克，他认为总统的忠诚命令、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许可程序和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把很多个人案件引入了毫无根据的苦难"。不久之后，奥本海默聘请他的老朋友伯克利大学法学院的院长马克斯·雷丁博士到研究院从事一年的研究，并撰写了一篇关于加利福尼亚忠诚誓言的辩论论文。

通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奥本海默确定他的电话被监听了。1948年的一天，奥本海默的一位洛斯阿拉莫斯的同事、物理学家拉尔夫·拉普来到奥本海默的普林斯顿办公室，讨论他关于军备控制提案的工作，拉普很惊讶，奥本海默突然起身把他带到外面，边走边低声说"隔墙有耳"，他意识到自己处于审查之中。"他意识到有人跟踪自己。"路易斯·亨佩尔曼博士是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现在是奥尔登庄园的常客。他回忆说："他给我们一种感觉，他认为实际上有人在跟踪他。"

在洛斯阿拉莫斯，他的电话被监听，而且他在伯克利的家从1946年到1947年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窃听。当他搬到普林斯顿，联邦调查局的新泽西

州纽瓦克区域办事处奉命监视他的行动,但是决定不允许采用电子监视。他们用尽各种方法使奥本海默信任的人成为内线。到 1949 年,联邦调查局里至少已经招募了一名机密情报员。她是一名通过社会关系和大学工作认识奥本海默的女人。1949 年的春天,纽瓦克办事处通知埃德加·胡佛,“没有额外的情报显示他是不忠诚的”。多年以后,奥本海默挖苦地说:“政府花费的监视我的费用,比他们曾经在洛斯阿拉莫斯付给我的还要多。”

29 | “我确信那是她朝他发脾气的原因”

“他的家庭关系看上去是如此可怕，而且你不可能从罗伯特那里知道这些。”

——普里西拉·达菲尔德

当弗兰克和雅姬在他们的科罗拉多大牧场拼搏时，罗伯特仍在普林斯顿主管的位置上。行政工作并没有耗尽他所有的精力。他花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研究院上，三分之一在物理或其他研究上，另三分之一在旅行、作演讲和参加在华盛顿的高级会议上。有一天，他的老朋友哈罗德·彻尼斯警告他说：“你现在是时候该放弃政治回到物理学上了。”当时罗伯特沉默地站着，看上去在考虑这个建议。彻尼斯拍拍他说：“你喜欢有一个屁股后面跟着老虎的人吗？”罗伯特最后回答说：“是的。”

在罗伯特看来，离开普林斯顿和他的妻子，在路上旅行有时是一种安慰，对于《生活》、《时代》和其他流行杂志的读者来说，罗伯特的家庭生活看上去像田园诗一般。照片描述了这样一幅情景：一位吸着烟斗的父亲正在给他的两个孩子读一本书，娇妻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家里的德国牧羊犬巴迪趴在他的脚下。“他是十分热心并且充满感情的，”一位作家为《生活》杂志写的一篇关于奥本海默的封面故事说，“他的妻子和孩子生活得很好，而且也很喜欢他，而奥本海默对每个人都很有礼貌。”据《生活》杂志说，奥本海默每天晚上六点半走回家和孩子们玩，每个星期日他们把皮特和托尼带到外面去寻找四片叶子的三叶草。“奥本海默妻子的想法也很直接，她要让她的孩子远离杂乱的房子，让他们品尝所有他们在田野里找到的可以吃的东西。”

但是，那些十分了解奥本海默一家的人知道，奥尔登庄园的生活是很艰难的。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前任秘书普里西拉·达菲尔德也是他在普林斯

顿的一位邻居,她说:"他的家庭关系看上去是如此可怕,而且你不可能从罗伯特那里知道这些。"

奥本海默的家庭生活是痛苦且复杂的,罗伯特在他的生活中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基蒂。"她是罗伯特最伟大的知己和建议者,"弗娜·霍布森说,"他告诉她所有的一切,他极大地依赖于她。"他把研究的工作带回家,她通常卷入他的决定中。"他很爱她,她也很爱他。"霍布森坚称。但是,霍布森和其他在普林斯顿的亲密朋友知道,基蒂有着一种无情的强烈折磨靠近她的任何人的倾向。"她是一个多么奇怪的人啊,充满了愤怒、悲伤、智力和才华。"她就像一直忙碌的蜜蜂,她把所有的时间都绷得紧紧的。

霍布森与少数了解他们生活的其他人接触罗伯特和基蒂的方式是一样的,她和她的丈夫怀尔德·霍布森 1952 年在一次新年前夜的晚宴上见到了奥本海默一家人,晚宴是他们的朋友约翰·奥哈拉举办的。那之后不久,霍布森就去为罗伯特工作了,而且一做就是十三年。"他是一个极其苛刻的人,基蒂对他的秘书也很苛刻,所以像是为两位苛刻的老板工作,他们直接把你带进他们的生活,而且希望你有一半的时间在他们的家里。"

基蒂是一个习惯的创造者。她主持每个星期一下午在奥尔登庄园的好友聚会,她们会坐在一起闲聊,一些人会整个下午都在喝东西。基蒂称它为"俱乐部"。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家的妻子把这些女人称为基蒂的"损坏了翅膀的鸟儿……基蒂的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她们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酒鬼"。基蒂在洛斯阿拉莫斯已经开始喝大量的马提尼酒了,但是现在她喝酒会导致可怕的场景。霍布森那时只是适量饮酒,她回忆说:"她有时喝到要倒下而且没有了什么意识,有时她会晕过去,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很多次她自己硬撑了起来。"

基蒂来自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帕特·谢尔曾经照顾了托尼三年。她是基蒂的一位老酒友。谢尔一家在 1946 年搬到了普林斯顿,不久之后,奥本海默一家也搬到了奥尔登庄园。基蒂每周都去帕特家两三次,基蒂相当孤独。"她会在每天上午的十一点到来,"谢尔回忆说,"而且直到下午四点喝掉大量的苏格兰酒后才会离开。"但是有一天,帕特宣布她负担不起酒钱了。"啊,我是多么的愚蠢啊,"基蒂说,"我带自己的酒来,你只要替我保管就行了。"

基蒂与朋友的友谊都是强烈而短暂的。她会盯上某个人,进而和她走得很近。谢尔看见她反复这样做。她会完全地告诉她的新朋友关于她自己的所有事情——包括她的性生活。"我的意思是,她不得不一直讨论这类事

情。"谢尔回忆说。她可以是一位好朋友,但是她一直强烈地要成为一位好朋友,而且不可避免的是,在某些事上,她会在公开场合侮辱她的朋友。霍布森说:"基蒂有着伤害他人的一种特殊倾向。"

基蒂不断地出事,她的酗酒制造了一系列的事故。在普林斯顿,她经常出交通事故。几乎每天晚上,她在床上吸烟时都会睡着,于是她的床上布满了烟洞。有一天晚上,她醒来后惊讶地发现房间着火了,她用灭火器把火扑灭。灭火器是她或者她的丈夫事先明智地放在房间里的。奇怪的是,罗伯特极少进行干涉,他反而以一种淡泊的顺从来反抗妻子的自毁行为。"他明白妻子的品质,"弗兰克说,"但是不愿去承认它们,也许是他不能承认失败。"

一个偶然的机会,亚伯拉罕·派斯和奥本海默正在他的办公室里交谈。当时,他们看见基蒂在散步,很明显是喝醉了。她从奥尔登庄园走过草坪,来到他办公室的门口。罗伯特转身告诉派斯说不要走开。派斯后来写道:"当时我为他感到伤心。"他为罗伯特惋惜,派斯不能理解为什么他的朋友可以忍受这样一个女人。"她饮酒成瘾,"派斯写道,"她的残忍使我觉得基蒂是我见过的最卑劣的女人。"

霍布森看到过基蒂的失败,而且她明白为何罗伯特深爱着她。他因为她的真实而接受她,而且知道她永远都不会真正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罗伯特有一次向霍布森吐露,先前在普林斯顿的时候他已经为基蒂咨询过一位心理医生。他说医生建议他给她找一个治疗的地方,至少要治一段时间。但是,他不能这么做,他自己当起了她的护士和心理医生。他告诉霍布森,他已经作了这个决定:"睁开双眼,接受现实。"

弗里曼·戴森有着类似的观点:"罗伯特就是喜欢基蒂,并且他不会尝试强迫她寻求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要说的是,奥本自己肯定十分依赖她,她是他站立的基石。我为他考虑过把基蒂送到诊所,并且试着重新安排她的生活,但我想那有悖于他的性格,也有悖于她的性格。"奥本海默的另一位普林斯顿的记者朋友罗伯特·斯特伦斯基赞同道:"他对她忠诚,他真想尽可能地保护她,他怨恨对她的任何批评。"

罗伯特肯定已经知道基蒂酗酒是一种深刻痛苦的表现,一种将会一直存在的痛苦。他曾去尝试不阻止她酗酒,而且他也不会放弃自己晚间的鸡尾酒会。他的马提尼酒很烈,但他自己很喜欢。不像基蒂,他喝酒很慢。派斯认为喝鸡尾酒是粗野的风俗,然而他认为罗伯特喝得很优雅。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注意到在他身旁酗酒的妻子。"他享受最美味、最冷的马提尼,"谢尔说,

“奥本海默让每个人都非常自觉地喝酒。”罗伯特自己把杜松子酒、马提尼酒和一滴苦艾酒混合起来，然后把混合物倒入高脚杯里。一位教授俱乐部的成员把奥尔登庄园又称为“波旁庄园”。

罗伯特消极对待基蒂酗酒让某些人觉得很奇怪。无论她对他或者自己做了什么，他都将陪伴她一生。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另一位老朋友路易斯·亨佩尔曼博士敬佩罗伯特对妻子的奉献。路易斯和埃莉诺每年都要到奥本家两到三次，他们感觉很了解奥本海默一家。罗伯特从来不向他们打听关于基蒂的建议，但是他平静地告诉路易斯关于基蒂的情况。“他是她的一位信徒，”亨佩尔曼回忆说，“他总是富于同情心，而且从来不对她生气，他是一位优秀的丈夫。”

基蒂不愉快的源头无疑是她自己的心灵，但是扮演“主管妻子”的角色也是压力源之一。在以前的接待中，她被要求作为女主人一直站立着，并且问候一长排人。她通常让帕特站在她的旁边。当问她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她说：“我需要你在我的旁边，是因为当我倒下时你可以扶住我。”谢尔知道她的朋友是太紧张了，而且对自己没有自信。基蒂能够吓唬那些不是很了解她的人，而且有时她看上去很有生气，但是这些全是一种表演。谢尔相信，当需要表演时，基蒂能真正地展示出她的智慧。

作为一个精神自由、反复无常的女人，基蒂发现自己不能适应普林斯顿的拘谨，她不能适应这个小城镇以及这里的生活。亚伯拉罕·派斯的一位同事曾经说到普林斯顿：“如果你是单身，你会变得疯狂；或者，你结婚了，你的妻子将变得疯狂。普林斯顿把基蒂逼疯了。”

基蒂就像一只困在普林斯顿的母老虎。如果被邀请到奥本海默家吃饭，普林斯顿的人都有经验，知道不要期望吃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宴会的好坏直接和基蒂的情绪有关。罗伯特会拿着一大壶极烈的马提尼酒招待客人。“你会坐在厨房里，”雅姬回忆说，“仅仅是闲聊，喝喝酒，没有东西可以吃。然后，大约十分钟以后，基蒂会扔一些鸡蛋和辣椒到锅里，而且那是你能吃到的所有东西。”不论是罗伯特还是基蒂，看上去从来都没有饿过。一个夏天的晚上，派斯被邀请去吃晚饭，在例行喝过了马提尼酒后，基蒂端上来一碗奶油浓汤。那汤十分鲜美，罗伯特和基蒂沉溺于一种相当奢侈的感觉中，他俩交流它的好味道。派斯自己想，“好吧，现在让我们开饭吧”，但是没有更多的菜端上来，经过一个体面的休息后，饿坏了的派斯礼貌地告辞，并马上到普林斯顿买了两个汉堡。

在基蒂不愉快的生活中，婚姻对她来说就是一切。她完全依赖着罗伯特。她努力地去做好一位家庭主妇的角色，绕着他的高兴和呼叫奔跑，确保每样东西对他都完美。一天晚上在一个聚会上，奥本海默正站在一个角上和客人谈论，基蒂突然大叫道："我爱你。"奥本海默极其尴尬地点了点头。"很明显，"帕特回忆说，"他很不愉快，但他在那个时候没有向她大叫。"

谢尔早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日子里就认识了奥本一家人，而且在普林斯顿的头一年她可能是基蒂最亲密的朋友。基蒂似乎已经向谢尔吐露了她的婚姻。"她敬爱他，"谢尔说，"这毫无疑问。"但是在谢尔严谨的观点中，罗伯特不是同样的感觉。"我确信如果不是她已经有了身孕，他是不会要她的。我不认为他回报了那份爱，而且我不认为他可以回报任何爱情。"而霍布森一直坚持认为罗伯特爱着基蒂。"我认为他极大地依赖着她，"霍布森说，"他不是总听她的，但是在政治和智力上他尊重她。"霍布森从罗伯特的眼睛中观察婚姻。谢尔和霍布森都承认问题可能是抵触的性格。基蒂的性格是极端的，罗伯特是自由的。基蒂是那种需要表达她的情绪和愤怒的人；但是罗伯特却没有任何反应，反而将她的所有情绪吸得无影无踪。霍布森说："我确信那是她朝他发脾气的原因。"

基蒂告诉谢尔，虽然她和很多男人上过床，但是她从来没有对罗伯特不忠。当然，罗伯特不是这样。虽然她可能没有在意他和鲁思·托尔曼的事情，但基蒂嫉妒罗伯特对鲁思的热情。

基蒂也向谢尔吐露过罗伯特从来不想娱乐。从基蒂那里得知，他是"极端地吹毛求疵"。基蒂确信，他是令人发狂的孤独和超然，他平静地过着他的情感生活。他们是极其相反的，但那也是他们一直相互吸引的根源。尽管他们的婚姻不是一对健康的搭档关系，但结婚十年以后，有了两个孩子，奥本海默一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联盟。

到普林斯顿后不久，谢尔被邀请到奥尔登庄园参加一个野餐。野餐过后，一位女仆把3岁的托尼带过来。谢尔一直没有见过那个孩子，尽管她在洛斯阿拉莫斯和她们住过三个月，而且奥本海默还曾问过她是否想收养这个孩子。"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谢尔说，"她有着基蒂的高颧骨和深邃的眼睛，黑色的头发，但是她还有像奥本的方面。"谢尔看着托尼跑向奥本海默，并且爬上他的腿。"她把头靠在他的胸部，他用手抚摸她。奥本看着我，向我点点头。"谢尔明白他的意思，"这是一条我们之间的信息，我是对的，他很爱她"。

但是,他们并没有多少精力去履行做父母的义务。“我认为作为他们的一个孩子,”他们的一位邻居罗伯特·斯特伦斯基说,“是世界上最困难的经历。”谢尔说:“表面上他和孩子们很亲密,我从没有见过他和孩子们发脾气。”但是年头久了,她对奥本海默的观点全改变了。谢尔发现6岁的皮特很害羞,为了帮助他适应社会,她建议基蒂带他去看儿童心理医生。但是和罗伯特谈了这个以后,基蒂说他不放心把儿子交给一位治疗专家,罗伯特自己曾经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这激怒了谢尔,她认为奥本海默的态度不是一名父亲所应该具有的。她最后总结出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我见他越多就越烦他,我觉得他是一位可怕的父亲。”

这太苛刻了。其实,罗伯特和基蒂都试图和他们的儿子保持好关系。皮特六七岁的时候,基蒂帮助他组装了一个电动玩具——一个装满了各式灯泡和蜂鸣器、导火线和开关的方板。皮特把这个玩具命名为他的“秘密装置”,甚至两年以后,他还喜欢玩这个玩具。1949年的一个夜晚,大卫·利林塔尔在访问奥本家时发现基蒂和皮特坐在地板上,耐心地去固定“秘密装置”。几乎一个小时以后,当她起身去厨房准备晚饭时,罗伯特慈父般地走过去坐在基蒂此前的位置上。他的嘴里叼着一支香烟,他拉起了电线,皮特跑到厨房大声对基蒂说:“妈妈,可以让爸爸摆弄装置吗?”大家都笑了起来,一位从事过研制原子弹的大人物怎么可能不会摆弄儿子的玩具。

罗伯特除了感受类似的家庭温馨之外,也苦恼于做一位合格的父亲。弗里曼·戴森曾经问过他,两个孩子有如此一位“问题父亲”,他们会不会太受罪了。他像往常一样轻率地回答道:“啊,对他们来说完全合适。他们没有想象力。”戴森后来评论他的朋友说,这是一位能够“对那些接近他的人迅速在温暖和冷酷之间转换的人”,但这对孩子就太难了。“对于一位像我一样的旁观者,奥本的家庭如同地球上的地狱一般。最坏的是两个孩子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这些。”

除了“秘密装置”和其他的好玩意儿,基蒂和皮特几乎没有共同语言,而且他们经常争吵。罗伯特觉得问题在基蒂。霍布森说:“罗伯特认为他们陷入爱河并且热恋时皮特就来了,她不喜欢他。”当他11岁的时候,皮特得了少年期肥胖症,基蒂就不停地唠叨他的体重。家里从来就不放太多吃的,基蒂对皮特的饮食控制得很严格。妈妈和儿子经常吵架。霍布森说:“她过去常常把皮特的生活搞得很糟。”谢尔赞同地说:“她对他非常没有耐心,她完全不了解孩子。”罗伯特很被动地站在母子之间,如果有压力他就会站在基蒂一

边。“罗伯特很可爱,”亨佩尔曼回忆说,“但他从不管教孩子,所有的事都是基蒂在做。”

从各方面来看,皮特是一个正常但难以管教的孩子。幼儿时期,像大多数男孩子一样,他曾经大声吵闹,非常活跃,基本上很难管教。基蒂把他的行为看作不正常。她告诉过塞培尔,她和皮特的关系直到他 7 岁前还都很好。但在 7 岁时情况突然改变了,她不知道为什么。皮特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家,像他的弗兰克叔叔一样,他能够用双手拼出了不起的东西来,把东西拆开然后重新装起来。但是,他在学校里却是一塌糊涂,基蒂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皮特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孩子,”哈罗德说,“他在学校有一段困难的时期,但这与他的能力毫无关系。”为了对抗妈妈的唠叨,皮特变得沉默了。塞培尔回忆说:“皮特在五六岁的时候,看上去很需要慈爱。”作为一个孩子,他太过严肃。塞培尔说:“你到奥本家的厨房,皮特就像是一个影子,他总是努力把自己隐藏起来。这就是皮特。”

基蒂对待女儿则完全不同。霍布森回忆说:“她对托尼的喜爱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她只想让她好好的,快快乐乐的。”作为一个特殊的女孩子,托尼很安静,很坚定。“从她六七岁的时候起,家里就是靠她的可爱来调节气氛。托尼是一位永远都不用别人担心的女孩子。”

1951 年下半年,托尼 7 岁的时候被诊断患了轻微的小儿麻痹症,医生建议带着她去一个温暖而湿润的地方。于是,在那年的圣诞节,他们租了一艘七十二英尺长的双桅船——“科曼奇”号。他们花两周的时间绕着美国境内的圣克罗伊岛航行。这艘船的主人是爱德华·戴尔,他是一个热心并喜欢交友的人,因此迅速赢得了罗伯特的好感。爱德华把船航行到一块宝石般的岛屿——圣约翰岛。它有着原始的白色海滩和蓝色海水。他们隐居在象鼻湾,在海滩上游玩、探险。罗伯特写了一封信给鲁思,描述了迷人的圣约翰岛。鲁思回信说:“那温暖的海水,闪闪发光的鱼儿,轻轻的海风一定很受欢迎并值得收藏。”圣约翰岛给奥本海默一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托尼的病好了,她将在多年以后重回这个可爱的岛屿并长期住下来。

尽管有时基蒂把家庭生活搞得很糟,但罗伯特的冷漠和超脱帮他渡过难关。他选择坚守他的婚姻,并且公正地对待基蒂。如果基蒂想的话,她可以很好地控制自己,她很矛盾要不要去酗酒。有一天,戴森家中突然发生了一场危机,基蒂穿着她的蓝色牛仔裤冲过来,手上还带着在后花园劳动时的泥

土。“无论是对于我们还是罗伯特来说,她都是一座力量之塔,”弗里曼说,“她在很多方面都是强者,你从来不会感觉她是那种需要帮助的人。她会时不时地喝醉,但是我从不认为她不能控制酒精。”

基蒂既然有敌人,也就会有朋友。埃莉诺·亨佩尔曼曾多次访问奥本海默家,她写道:“在你的房子里,我们总会有乐趣和爱心。”当奥本海默的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威廉·帕森斯和玛莎·帕森斯做客奥尔登庄园时,基蒂会带他们去野餐,有刷了鸡蛋、鱼子酱和奶酪的烤黑麦面包,还有香槟。威廉·帕森斯是一位有魄力的职业军人,那时他是一名海军上将,他很珍惜和奥本海默的谈话。他在1950年9月写道:“亲爱的奥本,与你和基蒂一起度过的周末是我们最难忘的季节,我们的私事甚至世界大事似乎更可能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得到解决。”

30 | “他从不先透露他的想法”

“我们对原子弹的垄断就像一个在太阳底下融化的冰激凌……”

——罗伯特·奥本海默

《时代》杂志，1948 年 11 月 8 日

1949 年 8 月 29 日，苏联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隔绝试验场秘密进行了原子弹的爆炸试验。九天之后，一架美国的 B－29 侦察机通过一种特殊设计的专门用于探测原子弹爆炸的过滤纸在北太平洋上空检测到核辐射，由此发现了苏联的原子弹爆炸试验。9 月 9 日，这个消息传到了杜鲁门政府的高级官员那里。任何人都不想相信它，就连杜鲁门本人也对此表示怀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同意成立一个专家小组对获取的证据进行分析。国防部决定任命万尼瓦尔·布什为专家组主席。当万尼瓦尔·布什接到这个通知时，建议让奥本海默当主席会更合理一些，但一位美国空军上将告诉万尼瓦尔·布什，他们宁愿选择他当主席。

万尼瓦尔·布什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但是他坚持一定要让奥本海默加入这个专家组。当万尼瓦尔·布什把这个消息告诉奥本海默时，奥本海默刚刚从佩罗卡连特回来。专家组成员在 9 月 19 日的早晨举行了一个长达五小时的会议。当万尼瓦尔·布什主持这个会议时，奥本海默提出了很多问题。到午饭时间时，专家组所有成员都认为证据是再明显不过了，这确实是一次原子弹试验。此外，大家还认为，它很像是对曼哈顿工程的钚原子弹的复制。

第二天，利林塔尔向杜鲁门总统汇报了专家组关于苏联核试验的结论，并请求总统立即发表一个声明。利林塔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尽了一切的努力，但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杜鲁门总统犹豫了，他不能确定苏联是否真拥有原子弹。他告诉利林塔尔，他将推迟几天处理这件事，并好好地考

虑一下。当奥本海默听说总统的这种做法时，感到了难以置信和不安。他告诉利林塔尔，他们错过了一个争取主动的好机会。

三天后，仍然持怀疑态度的杜鲁门最终勉强对外宣布，苏联进行了一次核爆炸试验，但是他拒绝说那是原子弹。对此感到震惊的爱德华·特勒打电话给奥本海默，并且问他“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奥本海默简洁地回答说：“穿上你的衬衫。”

“试验只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奥本海默在那年秋天曾镇静地对一位《生活》周刊的记者说。他从不认为美国对原子能技术的垄断会持续很长时间。早在一年前，奥本海默就曾跟《时代》杂志说：“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就像一个在太阳底下融化的冰激凌，很快就会消失。”现在他希望通过苏联原子弹的存在可以劝说杜鲁门改变计划，像他们1946年所做的努力那样，把重点放在由国际社会控制所有的核技术上。但是，他仍然担心政府会做出过激的反应。他已经听到一些关于提早在一些地区进行战争的论调。大卫·利林塔尔发现奥本海默变得狂乱，带着令人可怕的能量。奥本海默告诉利林塔尔：“这一次我们一定不能失败。它有可能会终结保密政策带来的恶果。”

奥本海默认为，杜鲁门政府被这一政策迷失了理智，而且还达不到预期目的。奥本海默和利林塔尔用整年的努力劝说杜鲁门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在核问题上更开放一些。他们推断，既然苏联已经有了原子弹，过分地保密就已经不合理了。在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的会议上，奥本海默表达了他的看法：苏联对核武器的掌握会推动美国采取一个“更为合理的国家安全政策”。

尽管奥本海默告诫不要采取任何激烈的措施，但是国会山的立法者们还是开始讨论对抗苏联的措施。几天后，杜鲁门签署通过了加大核武器生产量的协议。在1948年6月，美国大约有五十枚核弹头，但是到1950年6月，核弹头的数量将要猛增到三百枚，而这仅仅是整个计划的一个开始。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刘易斯·斯特劳斯发表了一份备忘录，讲到美国对苏联的军事实力的优势将不可避免地消失。借用一句物理学方面的语言，刘易斯·斯特劳斯建议美国要想重新获得对苏联的绝对优势，就要利用“量子跃迁”这项技术。美国需要快速地实施一个计划来发展超级热核武器。

杜鲁门总统甚至直到1949年10月才知道这种超级武器的可行性，但是他的兴趣马上就被激起来了。奥本海默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我不相信这种可怕的东西会起作用”。他写了一封信给科南特，他嘲讽地说，“现在这种

超级武器只能用牛车拉着去轰炸目标”，可以预期它将太大而飞机运不了，所以说这个计划是不可行的。这种武器的破坏性将是原子弹的几千倍，他被这种武器的道德意涵所深深困扰，因此他希望超级武器在技术上将被证明是不可行的。比原子弹还可怕的这种超级武器，一定会进一步加剧国家间的核竞赛。这种超级武器的聚变反应赶得上太阳中心内部的聚变状况，也就意味着这种反应所产生的爆炸威力将是不可估量的。一种可以使爆炸威力更大的方法就是注入更多的重氢。如果在战争中使用这种超级武器，也就是所谓的氢弹，一架飞机就可以在数分钟内让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生命。这种损害对将要轰炸的军事目标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它是对人类不加选择的大屠杀。这种武器出现的可能性让奥本海默感到很恐惧，但它也激发了众多空军将军们和他们在国会的支持者们，以及支持爱德华·特勒提出生产这种超级武器的科学家们的想象力。

早在1945年9月，奥本海默就写了一份关于氢弹的秘密报告，这份报告代表科学家顾问小组的阿瑟·康普顿、欧内斯特·劳伦斯、恩里克·费米以及他自己。这份报告建议说：“现在不应在研究氢弹上耗费任何的努力。”可以确信的是，发展这种武器的可行性“不应该被忘掉”，但它不是必要的。奥本海默并没有正式提到道德上的关注，但康普顿代表奥本海默、劳伦斯、费米写信给亨利·华莱士并解释道：“我们认为这个氢弹计划不应该实施，主要是因为我们宁肯战争失败也不想为了胜利而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如果最终决定使用氢弹，那将会导致可怕的后果。”（他特别强调了最后一句话。）

又经过了四年的时光，世界又有了更多的改变。美国和苏联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核武器的出现又引发了美国对核武器的控制政策，美国的核武器军工厂把原子弹数量扩大到了一百枚以上，还有更多更大的原子弹在制造之中。对于这件事的疑问是很明显的：如果这个新的、巨大的武器被制造出来，它将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

1949年10月9日，奥本海默到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去参加一个哈佛大学委员会的调研会议，那年春天他刚刚被选入这个委员会。他住在科南特位于昆西街的家里。他和哈佛校长还进行了一场“激烈而又长久的讨论，而这和哈佛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两位老朋友知道，接下来，他们将要在这个月的顾问委员会会议上对于氢弹问题的建议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他们很可能在这次会议上表达自己的忧虑。同时，科南特告诉奥本海默，氢弹将会制造在“我的尸体上”。科南特对于一个文明国家竟然会考虑使用这么可怕的

杀人武器感到非常气愤，他认为这种武器无疑就是一种大屠杀的武器。

10月21日，在对当前核技术的研究现状进行简要考察之后，奥本海默给“吉姆叔叔”写了一封长信。他承认，在他们的上一次谈话中，“他倾向于认为氢弹或许也是有意义的”；但从技术上来说，他仍然认为“氢弹仍像他们七年前所说的那样：这种武器的设计、经费、运输和军事价值都是未知的”。在这七年中，唯一的改变就是国家对发展氢弹的观点。他指出：“两位有经验的专家一直在提倡进行氢弹的研究，他们是欧内斯特·劳伦斯和爱德华·特勒。氢弹工程耗费了特勒很多心血，而且劳伦斯也确信，我们必须从苏联的原子弹爆炸中认识到，苏联不久将制造出氢弹，我们最好在氢弹的竞赛中打败他们。”

奥本海默和其他顾问委员会成员认为，与氢弹有关的技术目前还不成熟。他和科南特对这个超级武器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影响感到忧虑。他在给科南特的信中提到，“让我担忧的是国会议员和军方都把这个武器当成对付苏联核武器的最好手段。现在反对这项武器的开发无疑是愚蠢的，我们都知道他们已经在开发这个武器了……但是我们知道用这种方法来确保国家安全无疑是个危险的举动”。

1949年10月28日，星期五，下午两点，奥本海默参加了顾问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自1947年1月）。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拉比、费米、科南特、巴克利（贝尔实验室的负责人）、杜布里奇等人将要聆听乔治·凯南和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的讲话，并讨论这个超级武器的优点。原子能委员会委员刘易斯·斯特劳斯、戈登·迪安和利林塔尔也出席了会议。与会者都清楚杜鲁门政府会对苏联在原子弹方面的进展做出强硬回应。利林塔尔在前一天的日记里写道，劳伦斯和其他一些氢弹的鼓吹者们是一群胡说八道的“嗜杀”的人。他认为这些人简直不可理喻。在会上，奥本海默出示了化学家格伦·西博格此前写来的信。就在1954年，奥本海默的批评者还认为他不同意西博格的观点，但是根据作为顾问之一的西里尔·史密斯的回忆，当时奥本海默在会前向各位与会者展示了这封信。西博格在这封信中说，他无法想象这个国家要开发氢弹。他写道：“虽然我对我们国家要花大力气研究氢弹的消息感到悲痛，但是我还不能说我们不能研究这个武器……我希望在我拿出足够勇气来反对这个项目前能听到其他好的建议。”

奥本海默总是在其他人都发言后才表达自己的观点。“奥本海默从来不

先透露他的看法，”李·杜布里奇回忆说，“我们围在桌子旁，每个人都说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大家都持消极的态度。”利林塔尔听到科南特咕哝道：“原子弹看起来几乎是半透明的、灰色的，我们已经制造了一个毁灭自己的‘怪物’，要是再制造另外一个，我们简直是疯了。”拉比后来回忆说，在周末的讨论中，“奥本海默一直跟随着科南特的论调”。据迪安所说，“我们详尽讨论了它所涉及的道德问题”。利林塔尔在他周六晚上的日记中写道：“科南特在道德上断然反对发展氢弹。”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当巴克利暗示说发展氢弹和发展原子弹在道德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区别的时候，“科南特反对这种看法，认为它们之间对道德的违背有等级的不同”。但斯特劳斯指出，最后的决定将由华盛顿做出，而不会根据大众投票。科南特回答说：“但它是否被接受取决于国家对道德问题的态度。”科南特甚至反问道：“它能被解密吗？事实上，这项计划已经在考虑实施了……”

在周日的早晨，八位出席会议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取得了一致意见。他们在科学、技术、道德上反对发展超级武器的计划。拉比和费米阐述了反对发展这种武器的理由，“从任何角度来考虑，这种武器对人类都是邪恶的”。他们还提到，想让美国邀请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共同达成一个不要发展氢弹的协议。一开始，奥本海默并没有很认真地考虑拉比和费米的建议，但最终，奥本海默和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反对加速超级炸弹的发展计划，认为这种武器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不会提供任何保障和任何利益。

奥本海默从实用的角度争辩说：“氢弹要比原子弹的建造更便宜还是更昂贵？”委员会报告清楚地表明，核武器政策必须考虑道德因素。“这种武器的使用会给无数的人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奥本海默写道，“它并不会被专用于毁灭军事或半军事用途的设施，它的使用将会比用原子弹屠杀人类产生更为严重和可怕的后果。”

奥本海默担心这种武器威力太强大了，或者换句话说，任何常规的军事目标在这种高热原子核反应的装置下都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假设在广岛上空爆炸的原子弹所产生的爆炸相当于一万五千吨 TNT 的威力，那么这种炸弹的爆炸就相当于一亿吨 TNT 的威力，它可以很容易地摧毁一百五十到一千平方公里甚至更大面积内的所有物体。正如顾问委员会报告所做出的结论：“超级武器将成为种族灭绝的工具。”就算它从来不被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最终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的武器库中存有这种武器，将会在世界上产生深远的影响。”明智的人们都会看出美国有

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意图。“因此我们相信,这种武器在心理上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将会损害我们的利益。”

就像科南特、拉比以及其他人一样,奥本海默也希望这种武器“永远都不要生产出来”。如果美国拒绝生产这种武器,那么将会使和苏联重新开启军控谈判成为可能。“我们认为超级炸弹应该永不被制造,”奥本海默这样写道,“如果不去证明这种武器的可行性,人类的生活就会好得多……”

正如麦克乔治·邦迪后来所说的,顾问委员会报告的作者们实质上是在为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军控条约的谈判而努力着。但是,如果这个建议不被国家接受怎么办?如果苏联首先拥有氢弹怎么办?在那种情况下,苏联一定会进行武器试验,因为在不进行试验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发展氢弹的,而这种试验是一定会被探测到的。“如果苏联成功地发展了这种武器,那我们也可以发展,而到那时这并不会成为对他们的威慑。假如苏联用超级武器来攻击我们,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储量巨大的原子弹来进行报复,而它们要比一颗氢弹有效得多。”

奥本海默和顾问委员会的报告说,由于氢弹的攻击目标太大了,所以它不是一个可行的武器。从经济和军事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加速生产小型战术核武器。这些核武器加上部署在西欧的常规军事力量就足以有效地遏制苏联。这是第一次严肃地提出核武器的有效性的问题。这样的战略概念是处于以战术武器取代大规模的盲目军备竞赛。

奥本海默对顾问委员会最后的讨论结果感到很高兴,但他的私人秘书凯瑟琳·罗素并不这么认为。在打印出顾问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后,罗素对奥本海默说:“这将会给你带来许多麻烦。”不过,奥本海默在得知1949年11月9日原子能委员会最终以三比二的结果签署了顾问委员会报告后还是感到很满足。小组成员利林塔尔、派克、史密斯都反对发展超级武器,而另外两位成员斯特劳斯和戈登·迪安则投了赞成票。

奥本海默天真地认为,在反对超级武器的这场战斗中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不久以后,特勒、斯特劳斯和其他发展氢弹的支持者们就发起了反击。布赖恩·麦克马洪参议员告诉特勒说,顾问委员会的报告“只令他感到恶心”。麦克马洪相信和苏联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告诉利林塔尔一个让人震惊的想法,他认为美国应该“在苏联对我们采取相同的行动之前,尽快地让苏联在地球上消失”。西德尼·索尔斯告诫说:“我们要么赶紧制造出这种超

级武器，要么就等着俄国人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把氢弹扔到我们的国土上吧。”许多其他的政府高官也都有着同样的反应。这样，在超级武器问题上的争论最终形成了冷战的结局，并且把决策者和政治家们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分别是军备竞赛者和军备控制者。

由于强有力的游说活动，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让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林塔尔、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对这个问题再次进行研究，并且要求给出一个最终的建议。利林塔尔和约翰逊观点都很明确，利林塔尔坚定地反对发展超级武器，而约翰逊赞成发展，只有艾奇逊是犹豫不决的。但是，凭着敏锐的政治本能，艾奇逊很清楚什么才是白宫想要的。在听了奥本海默关于超级武器的简短表述后，这位国务卿用简单的言辞把奥本海默针对顾问委员会报告所作的稍有差别的陈述进行了加工。之后，他对一位同事说：“我听得非常仔细，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奥本海默想要讲什么，你怎么可能通过‘榜样’的作用来让你狂妄的敌人解除武装呢？”

艾奇逊明显的怀疑态度让奥本海默清醒地认识到，他在政府部门可以获得的支持太少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一个最忠实的支持者——乔治·凯南。在那年秋天，他就已经打算辞去他在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领导工作。虽然艾奇逊曾经非常重视凯南的建议，但是现在他们在政策的实质问题上有着极大的分歧。这位美国遏制战略的缔造者不愿意看到政治走向军事化。

凯南第一次见到奥本海默，是在1946年军事学院的一个讲座上。“当时奥本海默穿着一件很长的棕色衬衣，看起来和他的裤子很不搭配，”凯南说，“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刚毕业的物理专业的学生，而不是一个有声望的学者。他缓慢地走到讲台边开始演讲，他没有演讲稿，但他的演讲是如此的思维严谨、条理清晰，以至于在讲了四十到四十五分钟之后，竟然没有任何人敢于提问。”

就是在1949年到1950年的这段期间，奥本海默和凯南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在关于超级武器的争论中，凯南于1949年11月16日再次来到普林斯顿。他和奥本海默长时间地讨论了当前核问题的现状。奥本海默认为这次拜访很令人鼓舞。他认为凯南的看法没有脱离实际，很现实，而且和他的想法很相近。在那次拜访中，凯南提到，为了应付苏联的原子弹问题，总统应该暂停超级武器的开发。第二天，奥本海默在给凯南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你的建议十分合理……”但他警告凯南说：“我们必须准备面对并且反驳那些

认为你的建议很危险的人。”

得到了这样的警告，凯南静下心来，开始动笔起草一份可能的总统报告，宣布在这个阶段内放弃氢弹的开发。他用雄辩的语言表达了顾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凯南用三点简洁的原因阐述了不要继续开发具有无限毁灭力量的氢弹。第一，很明显，这种武器不可能让人信服它只有单纯的军事上的用途。第二，没有绝对安全的东西，并且现在美国的核武库已经有足够的储备，足以抵挡任何形式的进攻。第三，对于我们来说，如果已经踏上一条这样的路，那么我们也不能阻止别人走上这条路。相应地，制造超级武器就会鼓励别的国家也这样做。

这篇演讲没有发表过，但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内，凯南把这些想法变成了一篇长达八十页的正式报告，要求重新审核整个核问题。他曾经把原件给奥本海默看，奥本海默认为这些都值得拜读。凯南日后自己也说道：“在所有我写的政府文件中，这份文件就算不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重要中的一篇。”凯南知道这个问题很富于争议性，1950 年 1 月 20 日，他把这篇文章当作私人信件交给了艾奇逊（1949—1953 年任美国国务卿）。

在《备忘录：原子能的国际控制》中，凯南挑战了杜鲁门时期关于核弹和苏联的根本看法。凯南从奥本海默的视角出发，认为原子弹其实很危险，因为人们错误地把它当作了解决苏联威胁的便宜的灵丹妙药。在给奥本海默的回信中，他写道：“军人已经把开发超级武器作为苏联开发原子弹的回应。我担心，核武器由于它的危险性和它的不确定的决定性后果，将会阻止那些清晰明了的政策，从而导致我们对这种武器的滥用和对国家力量的挥霍。”

凯南还采纳了奥本海默最近的其他看法：不应依赖于核武器的大规模杀伤性效应，华盛顿政府应该提高其常规武器力量，尤其应加强在西欧地区的力量。他说，苏联应该明白，西方愿意在西欧部署足够的军队和常规武器来抵挡任何形式的可能入侵。这样一个依靠常规武器抵挡进攻的政策，将可以使美国采取一种“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他认为，美国应该“尽快朝着消除核武器装备前进，而不是坚持对苏联制度进行颠覆”。

凯南认为斯大林的统治是值得谴责的专制，但他认为苏联并不会鲁莽行事。凯南日后说道：“我确信，他们已经身陷战争泥潭，斯大林不想再有任何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此外，凯南相信苏联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比美国弱的，从长期来看，美国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和明智地运用美国的遏制力量来损耗苏联制度。

凯南八十页的“个人公文”有可能是与奥本海默合著的，它和罗伯特的很多观点都不谋而合。事实上，他和凯南把这份文件所受的待遇看作变化的“晴雨表”，也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强烈政治风暴。虽然只在国务院内部流传，但凯南的备忘录却被所有读过它的人平静而坚定地反对。艾奇逊把凯南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乔治，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你的看法，你就应当辞去外交部的工作，像一个僧人那样，拿着锡杯站在街角说，‘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了’。”

艾奇逊甚至都嫌麻烦而没有向总统杜鲁门展示凯南的公文。到那时，奥本海默已经充分认识到了“风”在朝哪个方向刮了。爱德华·特勒赢了。但即使是这样，奥本海默仍然希望设计热核反应装置在技术上的障碍将会被证明是难以克服的。“让特勒和惠勒去干吧，”据传闻他曾经这样说过，“让他们自己摔得鼻青脸肿。”1950 年 1 月 29 日，奥本海默在纽约举行的美国物理学会的会议上遇见了特勒，他对特勒承认了杜鲁门将会反对他们对超级武器的建议。特勒问奥本海默，如果这样他还会回到洛斯阿拉莫斯从事超级武器的工作吗？奥本海默打断他说：“当然不会。”

一天后，在华盛顿的顾问委员会会议上，他决定顺便参加一个关于原子能的特别会议。他被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邀请来讨论“超级武器”。奥本海默说：“我想我不来这里将会被认为是怯懦的，而这也会让你趁我不来而提出反对意见和不合时宜的问题。”

他的态度是一种礼貌的放弃。当被问到如果俄国人有氢弹而美国人没有会发生什么时，他回答：“如果俄国人有这样的武器而我们没有，我们的境况很不好；而如果俄国人和我们都有这种武器，我们仍然是很糟糕的。”他解释了他的全部观点，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就正在使苏联加速和坚决地发展氢弹”。当他离开时，他知道他没有改变任何人的看法。

第二天，1950 年 1 月 31 日，利林塔尔、艾奇逊和国防部长从国务院大楼前往白宫参加总统关于超级武器的会议。

他们刚到椭圆形办公室，利林塔尔几乎还没有开始他的发言，杜鲁门就打断他，问道：“俄国人能做到吗？”当每个人都点头时，杜鲁门说：“那样的话，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前进。”利林塔尔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杜鲁门“在我们进门之前就已经很清楚他将做什么了”。几个月前，利林塔尔曾提醒过杜鲁门，国会内部有些蛊惑人心的政客试图迫使杜鲁门发展那种超级武器。“我并不会轻易地发展那种武器。”他曾说道。走出白宫时，利林塔尔看了看他的

表,这位声称不会轻易发展氢弹的总统仅仅给了他七分钟。就像利林塔尔自己在备忘录中记录的那样,“他会对一切反对的意见说‘不!’”。

那天晚上,毫无疑问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后,杜鲁门通过广播讲话宣布了一个计划以便决定“热核反应武器在技术上的可行性”。

仅用了十年时间,美国的核武器储备就从三百多枚核弹头快速发展到将近一万八千件核武器,而在接下来的五十年,美国则制造了超过七万件核武器,花费在核武器上的经费将会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五万五千亿美元。回顾过去,即使是现在也非常清楚,制造氢弹的决定是冷战期间螺旋式上升军备竞赛的转折点。奥本海默和凯南对此完全反对,拉比则是愤恨的,“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杜鲁门”。

在利林塔尔和杜鲁门的简短会面后,利林塔尔告诉奥本海默,政府决定禁止所有科学家公开讨论这个决定。奥本海默感到非常失望,并考虑辞去顾问委员会的工作。艾奇逊怕奥本海默和凯南会向美国公众呼吁,他还特别郑重地警告哈佛大学的校长不要进行破坏活动。

科南特告诉了奥本海默艾奇逊的警告,公开的讨论将会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对立。因此,奥本海默再一次地发挥了忠诚支持者的作用。正像他后来证实的,在当时辞职和对于已经解决的问题进行讨论都是不负责任的。科南特在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他和奥本海默“不辞职是因为我们不想做任何表明我们不是好战士的事情”。回想起来,他后悔当时作了这个决定——认为那时他们两个应该立即辞职。

如果奥本海默当时真的辞职了,他的生活将会怎样的不同和美好啊!但是他没有,而是像科南特一样,再一次陷入了冒险之中。然而,他不能掩饰他对那些推行这个决定的人的藐视。杜鲁门发表声明的那个晚上,奥本海默感到有必要去参加在肖勒姆饭店举行的生日聚会,庆祝斯特劳斯 54 岁的生日。一位记者发现,奥本海默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他走过去对奥本海默说:“您看起来并不高兴啊。”奥本海默嘀咕着回答:“这是底比斯的传染病。”当斯特劳斯试图向他的儿子和儿媳介绍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时,奥本海默只是无礼地在斯特劳斯的肩头上向他们伸出了一只手,然后没有说一句话就走开了。这种行为当然让斯特劳斯很愤怒。

发展氢弹的决定是秘密做出的,并没有进行公开的讨论,而且奥本海默也相信并没有对将会产生的后果做出切实的评估,保密政策成了愚昧政策的

仆人。因此,奥本海默决定站出来反对保密政策。1950 年 2 月 12 日,奥本海默出现在埃莉诺·罗斯福星期天早晨的脱口秀节目上,并公开挑战已经做出的发展氢弹的计划。斯特劳斯看到后非常生气。"这些是复杂的技术上的事情,"奥本海默告诉观众,"但是他们触及了我们道德上的根本问题,对民众来说,在保密政策的影响下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危险的。"在斯特劳斯看来,这样的评论是对总统的公开挑衅,但是他也相信,白宫已经有人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了。

随后的那个夏天,在核物理学家的公告节目中奥本海默重申:"这些决定是在对事实进行了保密的基础上做出的。"他认为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聪明,因为"相关的事实对敌人来说没有任何用处,然而它们却是让大众理解政策问题所必需的"。但在政府部门没有人认同他的看法,事实上是朝着更加保密的方向发展。

有将近五年的时间,奥本海默希望用他作为一名知名科学家的名望和地位来影响政府的国家安全观念。他的老朋友都离开了,菲利浦·莫里森和塞培尔,甚至连他的弟弟都告诉他这是一场徒劳的冒险。他在 1946 年失败了,利林塔尔控制原子弹的计划因杜鲁门对伯纳德·巴鲁克的任用而被破坏了;现在他再一次失败了,他没有说服总统和政府部门的其他官员不去做那些科南特所描述的"完全糟糕的事情"。政府现在支持制造比广岛原子弹更致命一千倍的武器。奥本海默不会"破坏计划",但他仍然是一个内部人,尽管他更加坦率而且更加受到质疑。

31 | “对奥本海默的影射”

“真让人恶心——但这就像一阵来自直布罗陀海峡的风吹向了美国。”

——大卫·利林塔尔致罗伯特·奥本海默的信

1950 年 5 月 10 日

奥本海默带着他后来称之为“我们和氢弹之间巨大但却失败的较量”的结果，极度失望地回到了普林斯顿。那年春天，乔治·凯南写信跟他说：“你可能不知道你的科学思想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关于原子弹的讨论已在两个不凡的智者之间形成了联盟，这两个智者都本能并明智地反对以核大战威胁为基础的防御政策。

凯南回忆说：“当我回想那些天时，在我脑子里，赫然显现的是他对‘开放’要求的坚持不懈。”奥本海默认为，对原子弹信息的保密增加了误解的机率。凯南回想起奥本海默的观点时说：“你不得不坦率地和苏联讨论核武器的未来和它们的使用问题。”凯南同意奥本海默的看法，他们都认为核武器是持久邪恶的、大屠杀式的武器。“很清楚，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到那时没人想得到这种武器……发展这些武器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结果，因而它的发展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是可笑的。”

从个人层面讲，凯南将会一直感谢奥本海默带他进入研究院，使他能作为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历史学家开始新的事业。“我由于你的信任和鼓励，有机会成为一个学者，从中年开始偿还我欠知识的债。”然而，凯南在研究院的任命颇具争议。一些人质疑说，这位外交官没有出版过任何东西，因此远称不上学者。多位数学家在奥斯瓦尔德·维布伦的领导下反对凯南，他们认为他不是个学者，而只是奥本海默的一个政客朋友。弗里曼·戴森回忆说：“他们恨凯南，而且借这个机会攻击奥本海默。”但是，奥本海默很欣赏凯南的才

华，他通过理事会任命凯南，并承诺从主管津贴里给他一万五千美元的薪水。

奥本海默不只反对氢弹，他还反对建立冷战军备。到1949年，他对在可预见未来的核武器裁减问题的进展很沮丧。然而，奥本海默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政府和公众正在增长的对于核武器的期望泼盆冷水。那年夏天，媒体引用他的话说："核力量对于战机和战舰而言一无是处。"在顾问委员会里，奥本海默和其他科学家批评空军的"莱克星顿工程"。这是一项发展装备核炸弹飞机的计划。他的这番陈述得罪了受益于核技术发展的国防建设或能源工业中的人士。

奥本海默在顾问委员会会议上的陈述基本上是无懈可击的。他很少流露感情，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海曼·里科弗简述海军在促进发展核潜艇中的义务的会议。里科弗抱怨说，原子能委员会对核反应堆的发展工作不够努力，他向奥本海默挑衅，问奥本海默是不是在等到掌握所有细节之后才去制造原子弹。奥本海默冷眼瞪着他回答"是的"。虽然这位海军上将以专横无礼出名，但是奥本海默一直控制自己直到他离开。然后，奥本海默走到里科弗的桌子前，抓起摆在他桌子上的一个木质小潜水艇的模型，平静地捏碎了它，然后沉默着离开了。

奥本海默正在政治方面给自己树敌。刘易斯·斯特劳斯仍然是奥本海默最大的政治敌人。他不会忘记前一年的夏天，奥本海默在国会听证会上是如何嘲笑他的建议的。"对我来说，那几天真是糟透了。"斯特劳斯在1949年给他朋友的信中这样提到。

斯特劳斯很自信，他断定奥本海默会在研究热核反应炸弹的过程中故意消极怠工。他认为奥本海默是"一位不愿打仗，不渴望胜利的将军"。早在1951年，斯特劳斯就找过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戈登·迪安，认真地宣读了关于控告奥本海默消极怠工的备忘录，虽然那时他已经不是原子能委员会的成员。斯特劳斯说，一些基本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他强烈要求解雇奥本海默，还强调了继续任用他的政治风险。斯特劳斯用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谈话，他把备忘录扔进了迪安的壁炉里，或有或无地隐喻了国家的安全要求将奥本海默的影响化为灰烬。

回到1949年的秋天，正当关于超级炸弹的内部讨论逐渐升温之际，斯特劳斯所获得的高度机密情报使他更加深了对奥本海默的怀疑。10月中旬，美国联邦调查局告诉他，被解密的苏联电报表明，苏联间谍已经打入了洛斯阿

拉莫斯内部。密电好像暗示是英国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他在1944年作为英国科学家代表团的一员到达洛斯阿拉莫斯。几周后,斯特劳斯和其他科学家更加清楚了,富克斯接触了大量有关原子弹和超级武器的信息。

当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英国情报机关调查富克斯时,斯特劳斯开始自行调查奥本海默。他打电话给格罗夫斯将军,要求提供奥本海默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并询问希瓦利埃事件。格罗夫斯给斯特劳斯回了两封长信作为回答,试着解释1943年发生了什么,解释为什么他接受奥本海默关于希瓦利埃事件的解释。在第一封信中,他强调在他的信念中,奥本海默是忠诚于美国的;在第二封信中,他试着说明希瓦利埃事件的复杂性。

格罗夫斯同时澄清,他不认为奥本海默在这件事中的行为是有罪的。"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在给斯特劳斯的信中说,"假使我们利落地清除了所有过去结交过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朋友,或是在某一时期同情过俄国的人,那么我们早已损失了大批最具才华的科学家。"

斯特劳斯不满于格罗夫斯对奥本海默的辩护,他于是继续搜集能证明奥本海默有罪的信息。直到12月初,他从格罗夫斯的前助手肯尼思·尼古拉斯上校那里得到了消息——此人对奥本海默心怀不满。之后的几年里,尼古拉斯成了斯特劳斯的助手和证人。两人都对奥本海默充满敌意。现在尼古拉斯很乐意给斯特劳斯提供一份1945年9月阿瑟·康普顿写给亨利·华莱士的信件复本,据信中所讲,康普顿代表奥本海默、劳伦斯和费米表示,他们"宁愿战败"也不想通过使用像超级炸弹这样一种灭绝人性的武器来获取胜利。这种想法使斯特劳斯非常气愤,他从康普顿的信中发掘了更深层次有关奥本海默危险影响的证据。虽然是康普顿写的这封信,并记录了劳伦斯和费米支持他的看法,但在斯特劳斯眼里,这和寻找奥本海默的"罪行"没有任何冲突。

1950年2月1日下午,即杜鲁门签署发展氢弹的第二天,斯特劳斯接到了埃德加·胡佛的电话。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通知他,富克斯已于不久前供认了他的间谍行为。尽管奥本海默在富克斯调往洛斯阿拉莫斯的过程中根本没有插手,然而斯特劳斯还是指控奥本海默,认为富克斯的间谍行为是在他的注视下发生的。第二天,斯特劳斯给杜鲁门写了封信,信上指出,富克斯一案"只会更加说明您'在超级武器计划中'所做出的决定的正确性"。在斯特劳斯看来,富克斯一案还是他为保密政策和是否与对手保持在核技术

上的共享，以及是否与英国或其他国家共同研究同位素等问题上的态度的辩护。而对于斯特劳斯和胡佛来说，富克斯一案的发现还会要求重新详查奥本海默的左翼背景。

奥本海默在得知富克斯已供认的那天，碰巧正与安妮·威尔逊·马克斯在中央车站有名的牡蛎吧吃午饭。“您听说关于富克斯的事了吗？”奥本海默问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前秘书。他们一致认为，富克斯在洛斯阿拉莫斯总是给人一种安静、孤独，甚至可怜的形象。“罗伯特都被这消息吓晕了。”威尔逊回忆道。另一方面，奥本海默怀疑富克斯关于超级武器所知道的东西可能差不多仅限于那辆没怎么用过的“牛车”模型。同一周，奥本海默告诉研究院的同事亚伯拉罕·派斯，说他希望富克斯已告诉俄国人所有他知道的关于超级武器的计划，因为那玩意儿“会使他们倒退不少年”。

就在富克斯认罪的消息公开的前几天，奥本海默在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行政会议上作证。其中有人第一次特别问到了有关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交往。奥本海默冷静地解释说，他当时只是单纯地以为共产党人能解决大萧条时期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国内，他的学生发现找工作很难；在国外，希特勒又是个威胁。虽然自己从来没有成为共产党员，但奥本海默自愿在战争时期和一些共产党人维持着友谊。然而，他逐渐看清了在他所交往的某些共产党人缺少正直与诚信。据他自己说，至战争结束，他已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人士”。

之后，联合委员会中的一名年轻成员威廉·伯登给奥本海默很礼貌地写了一封信，感谢他所做出的表态：“我……认为您在联合委员会面前表现得非常好，我认为这会非常有益。”

伯登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他聪明活跃，把苏联视作威胁。1946年，他写了一本杞人忧天式的有关未来可能发生“核攻击版珍珠港事件”的书——《时日无多：战略革命》。伯登预言，美国的对手将拥有数量庞大的安装了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并称几年后就会成为现实。在耶鲁，伯登和其他几个保守的同学买下了报纸的广告栏，专门撰文力劝杜鲁门总统向苏联发出最后核通牒：“让斯大林决定要核战争还是核和平。”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在看到这篇煽动性的广告后，雇下了28岁的伯登作为他在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助手。

伯登第一次见到奥本海默是在1949年4月的一次顾问委员会的会议上。在那儿，他冷静地聆听了奥本海默公开贬低“莱克星顿计划”，在该计划中空

军提议建造一架核动力轰炸机。奥本海默还对原子能委员会推行民用核设施的计划提出批评:“这是个危险的工程项目。”伯登离开时并未对他表示信服,只觉得奥本海默是个“天生的领导者和操纵者”。

然而在富克斯案之后,伯登开始想知道奥本海默是否比一个纯粹的“操纵者”更加危险。他在这些线索上的怀疑自然受到了刘易斯·斯特劳斯的怂恿。到1949年,斯特劳斯和伯登已达成共识,甚至在离开原子能委员会后,斯特劳斯仍继续在负责调查原子能委员会失职行为的参议院委员会中培养眼线,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对奥本海默的影响有着共同的关注。

1950年2月6日,伯登出席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联合委员会的听证会。表面上,胡佛是向委员会简述富克斯一案,但他最后详细地讲述了奥本海默的事。参议员麦克马洪和国会议员亨利·杰克逊在当天的委员会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现在,杰克逊和麦克马洪第一次从胡佛那里得知1943年哈康·希瓦利埃与奥本海默的接触,而前者曾建议或许应该将一些科学信息与他们的战时盟友苏联分享。胡佛报告说,奥本海默当时就拒绝了这一建议,但在疑心重重的伯登脑海中,这一事件听起来仍然可以拿来指控。他开始怀疑,奥本海默对氢弹的反对可能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忠诚。

一个月后,爱德华·特勒告诉伯登,奥本海默想在战后关闭洛斯阿拉莫斯。他宣称奥本海默已经说过“让我们把一切都还给印第安人吧”。伯登还第一次被告知,奥本海默的妻子基蒂·奥本海默曾嫁给一名在西班牙战死的共产党人。

当伯登、麦克马洪和杰克逊得知奥本海默最近已经开始利用他的影响去推动开发战术核武器这个计划时,他们都很慌张。对于空军及其在国会的支持者来说,奥本海默的主动行为被看作是一种刻意削弱战略空军主导地位的动作。杰克逊和他的同事考虑了战略空军发动核打击的能力。“到目前为止,”杰克逊在一次演说中指出,“我们的核优势已经将克里姆林宫牢牢控制住了……在核军备竞争中,落后将意味着我们这个国家的自杀。俄国人最新的一次爆炸表明,斯大林在核能方面已倾其所有,现在到我们也倾注所有的时候了。”

当以国会议员杰克逊为代表的一些政客认为奥本海默在这一可怜的判断上表现出了无知与错误时,伯登开始怀疑奥本海默有更糟的事情。1950年

5月10日,伯登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读到一则报道,两名前共产党员保罗·克劳奇和西尔维亚·克劳奇已作证,奥本海默曾在他伯克利的家中召开过共产党的会议。在面对加利福尼亚参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质询的证词中,克劳奇夫妇表示,肯尼思·梅于1941年7月曾开车带他们到过奥本海默家。那时,希特勒已入侵苏联,而作为阿拉米达地区共产党的主席,保罗·克劳奇被认为应该阐述一下共产党在战争中的新立场。二十至二十五名成员出席了那次会议。西尔维亚说,这次在奥本海默家中举行的所谓会议被描述为是一次"最高党小组的特别会议,这个小组非常重要以至于要对普通党员保密"。她说,她和她的丈夫在房间里没有被介绍给任何人。她只是在一部1949年的影片中才认出当时作为主人的奥本海默。克劳奇夫妇进一步表示,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向他们出示照片之后,他们能够确认大卫·博姆、乔治·埃尔滕顿和约瑟夫·温伯格都出现在那次会议上。克劳奇称温伯格为"X科学家",温伯格被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认定在战争中向共产党间谍提供原子弹机密。加利福尼亚的报纸把这些断言戏称是"炸弹"。保罗·克劳奇被认为是"西海岸的惠特克·钱伯斯"——他曾是《时代》杂志的编辑,同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曾在1950年1月21日作伪证而导致阿尔杰·希思被判有罪。

奥本海默立即发表了一篇自己写的声明,否认这种指控:"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也从未在家中或其他地方举行过任何具有那种目的的小组会议。"奥本海默说他不认识叫"克劳奇"的人,并且他还说:"我已公开承认我曾认识过很多左翼派系和组织的人。自我开始原子弹工程之时,政府也已知道了其中的详细情况。"他的反驳被媒体广泛刊登,看上去这一事件已平息了。他的朋友们也放心了。在读了加利福尼亚报纸上刊登的关于这件"肮脏的事情"的报道后,大卫·利林塔尔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说,克劳奇夫妇的证词"真让人恶心——但这就像一阵来自直布罗陀海峡的风吹向了美国"。

然而,利林塔尔却低估了这份缺乏同情心的证词的作用。威廉·伯登在备忘录中写道,他发现克劳奇夫妇的证词"非常有可信度"。保罗和西尔维亚在他们1950年5月于加利福尼亚作证前几周就已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详细地调查过。到那时,他们已作为有偿告发者,费用登记在司法部的薪水账上,并且要经常性地在对所谓的共产党员在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案件上作证。

最初,保罗·克劳奇看上去是个十分可靠的指证奥本海默的证人,他还能描述出奥本海默家中的布局。他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这个他一开始没认

出来的男人即奥本海默当时问了他一些问题，并在正式会议结束后与他进行了十分钟的私人交谈。据克劳奇讲，当克劳奇与肯尼思·梅开完会开车回家时，梅告诉他“你刚和这个国家的一位顶尖科学家谈了话”。克劳奇的故事详实，听起来好像很真实——并很具杀伤力。

但奥本海默也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当时不可能举行一个克劳奇所描述的党代会。在1950年4月29日和5月2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问询中，他解释他和基蒂当时是在他们位于新墨西哥州的佩罗卡连特牧场——那儿距伯克利1187英里。那年夏天，他与基蒂去了新墨西哥，把他们刚出生的儿子皮特留给希瓦利埃一家照顾。奥本海默不久之后用文件证明，他曾在1941年7月24日被一匹马踢伤，并于次日在圣达菲的一家医院照了X光。汉斯·贝特那时去看望了他，并且很清楚地记得那件事。两天后，即7月26日，罗伯特写了一封信，日戳上写着“考尔斯”。最后，一份奥本海默的行车记录——和基蒂在一起——证明，在7月28日去往佩科斯的路上与一辆新墨西哥的卡车发生碰撞。所有这些很清楚地显示，最早在7月12日直至8月11日或13日期间，奥本海默一直都待在新墨西哥州。克劳奇要么就是产生了幻觉搞错了，要么就是因为他自己早些时候曾声明于7月末的一次党代会上见过罗伯特后而不得不撒谎。

这次之后，克劳奇因为自身的谎言和过激的言行而被证明是个极靠不住的证人，他的证词败坏了这件由司法部主导的针对共产党领导成员的案件的名声，导致最高法院于1956年强行撤了案。

但威廉·伯登仍旧认为克劳奇是可信的。如果克劳奇讲的是实话，那么神秘人物奥本海默就成了共产党的同情者。1956年6月，伯登派他的一个助手肯尼思·曼斯菲尔德与奥本海默谈话。曼斯菲尔德发现，奥本海默对美国迅速增长的核武库表现得“非常矛盾”。奥本海默已表示，他相信战略核武器——城市毁灭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吓阻苏联对美国的进攻，但像杜鲁门政府所指出的将核储备翻倍却不能增加震慑的作用。

奥本海默解释说，战术核弹头就不一样了。1946年，他曾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贬低这类武器，但在1949年苏联原子弹爆炸后，奥本海默和他的顾问委员会的同事就极力主张杜鲁门政府制造更多的“战场”武器作为超级武器之外的另一个选项。“只有当人们认识到原子弹是有实际作用的，就像是任何军事行动中必备的一部分的时候，”他在1951年2月的原子科学家公告

中写道,"它才能在战争的对抗中真正显示作用。"

"我得到这么一个印象,"曼斯菲尔德告诉伯登,"奥本海默觉得(与苏联的)战争是不可思议的,是一件根本不值得做的事。"

曼斯菲尔德在1951年7月的备忘录里准确地掌握了奥本海默观点的精神和逻辑,但伯登看上去拒绝接受这种可能性,即奥本海默的政策性建议是有逻辑的阐释。他相信存在其他人或许看不见的影响在起作用,并且他发现还有人和他持同样的观点。夏季的晚些时候,伯登和斯特劳斯聚在一起讨论他们双方对于奥本海默的怀疑。斯特劳斯"在这次谈话中扮演了很好的角色,给人的印象是,他对奥本海默存在着担心和关切",他们的会谈记录中如是记载。他们详细地讨论了克劳奇关于奥本海默曾召开过一次共产党秘密会议的论断。

尽管所有证据都对对方有利,但这两个人还是相信克劳奇的故事。在他们的脑海中满是奥本海默的背信弃义,即使拥有窃听的情报,他们还是不情愿地将这个故事定性为不确定。他们认为,奥本海默在科学界的朋友们会一直保护他,况且奥本海默看上去已经知道自己被盯上了。"我(向斯特劳斯)指出了",伯登在自己的备忘录中说,其他人员(应该是美国联邦调查局)都有着相同的"对可能出现的任何明确结果的挫败感"。

在两个人的头脑中的密谋框架里,伯登和斯特劳斯领会到的是,奥本海默对战术核武器的支持就是一种阻碍发展超级炸弹的策略。

就在同一年,特勒带着一长串针对奥本海默的指控来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最核心的指控就是奥本海默"延误了或试图延误和阻止发展超级炸弹"。在洛斯阿拉莫斯的问询中,特勒尽其所能含沙射影地攻击奥本海默,他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很多人都相信奥本海默'受到莫斯科的直接命令'因而反对发展氢弹"。为掩饰自己,他之后又说自己认为奥本海默并非"不忠诚"。他将奥本海默的行为归结为人格缺陷。"奥本海默是个复杂的人,很出众。在他年轻的时候受到过某种心理或生理上的打击,并且这些打击有可能永久性地影响了他。他在科学上很有野心,并且意识到他成为不了自己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伟大的物理学家。"特勒在总结中说,只要能看到奥本海默不能再给政府做事,他"愿意做任何事"。

特勒并不是唯一的拼命想去除奥本海默影响的氢弹拥护者。在1951年9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理学教授大卫·特雷塞尔·格里格斯被任命为美国空军首席科学家。作为1946年兰德公司的顾问,格里格斯已经听说

了有关奥本海默博士安全问题的谣言，而他的直接上司空军部部长托马斯·芬勒特告诉格里格斯，他“对于奥本海默的忠诚有很严重的怀疑”。芬勒特和格里格斯都没有任何新的证据，但两人都确信他们的怀疑将被“一系列与奥本海默博士有关的行动”所证实。

对奥本海默来说，他怀疑空军的领导层是否心智健全，他被领导层极度危险的方案吓坏了。在1951年的时候，他看到了空军的战略大战计划，该计划提出要将苏联城市抹去极大地震撼了他。那是个罪恶的种族灭绝的战争计划。“那是我见过的最该死的东西。”他后来对弗里曼·戴森说。

1951年在给芬勒特工作数周后，格里格斯带领一个空军代表团去帕萨迪纳与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小组进行了一场讨论会。这个由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李·杜布里奇牵头的小组起草了一份高度机密的报告，该报告指出了当苏联对西欧发动地面入侵时核武器将会担当什么角色。有传言说，格里格斯和其他空军军官指责这份报告贬低了战略空军的地位。据传闻，报告的起草者承诺，要优先发展战术核弹头而不是氢弹，这样才能“将战役带回到战场上”。

报告的第五章甚至认为，在一个真正的战场上氢弹将不可能用于战术目的，并建议如果华盛顿公开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将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一章还劝告国家只给战略空军核裂变材料的三分之一，其余的都交给陆军搞战术武器。格里格斯看到这些劝告时极为愤怒，但看到第五章的首席作者是罗伯特·奥本海默时，他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奥本海默对战术核武器情有独钟，他将其作为终结种族灭绝战争的解药，这种青睐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通过那句“将战役带回到战场上”，他也使得核武器的真正使用越来越成为可能。在1946年，他警告说，原子武器“不是政治武器，但……它们本身就是一场全面战争概念的最高表示”。然而到了1951年，他在报告中写道：“很明显它们（战术核武器）只能作为一场军事战役的附属工具，战役中还应当包括其他要素，并且其首要目的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它们一开始并不是用来战斗或威慑的主要武器，而是在缺少支援时的一种攻击手段。”奥本海默在绝望中为了阻止空军在理性斗争战略的幌子下策划的世界末日之战而提出了这样的想法，但是他忽略了这种想法会以核弹为导火线触发更大规模的核战争。

1952年的初春，格里格斯告诉拉比说，奥本海默和顾问委员会正在阻碍

氢弹的发展。拉比生气地为他的朋友辩护，并建议格里格斯应该读读顾问委员会会议的备忘录。他建议只有那样，才能理解奥本海默主持的这些会议是多么公正。他还提议在普林斯顿的两个对手之间举行一场会议。格里格斯同意了。

1952 年 5 月 23 日下午三点三十分，格里格斯走进了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的办公室。他坐下来准备讨论双方应怎样进行相互间的沟通。奥本海默迅速地抽出了一份顾问委员会于 1949 年 10 月所写报告的复本，这份报告讲的是当时对有关发展氢弹所产生的争议进行讨论的内容。这如同一种示威。奥本海默原可以用他巨大的魅力去打消他的官僚对手的疑虑，但是他没有能控制住自己。他在格里格斯身上只看到了另一个愚蠢的权力追逐者，一个平庸的科学家与一些将军和一个充满野心的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为伍。他不想在这种人面前为自己屈膝辩护，他们的对话也很快就剑拔弩张。当格里格斯问奥本海默是否散播谣言说芬勒特鼓吹只要美国拥有少量氢弹就可以统治全世界的时候，奥本海默失去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的耐性。他回头瞪着格里格斯说，他不只听说过而且还相信它。当格里格斯强调他当时就在芬勒特的房间里，他没有听到芬勒特这样说过的时候，奥本海默回答说，他是从一个无可怀疑的人那里听来的，而且这个人当时就在现场。

既然诽谤已摆上台面，奥本海默就问格里格斯是否认为他“袒护俄国人或仅仅是糊涂”。格里格斯回答说，他只希望知道问题的答案。奥本海默接着说，您对我的忠诚产生怀疑了吗？格里格斯回答说，他确实听说过奥本海默的忠诚遭到了怀疑，而且他已经和芬勒特以及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伯格讨论过奥本海默的安全风险。听了这些话，奥本海默称格里格斯是个“妄想狂”。

格里格斯气愤地离开了，并比过去更认定奥本海默是危险的。之后，他给芬勒特写了一份“亲启勿转”的报告记录了这次遭遇战。对奥本海默来说，他天真地认为格里格斯无足轻重，而且不能给他带来伤害。为澄清他的错误，奥本海默一周后在一次正式午宴上向芬勒特讲述了普林斯顿的一幕。这位空军部部长觉得，他们两个人是时候面对面地坐下来谈谈他们的分歧了。奥本海默是从国会山作完证之后来与芬勒特见面的，他在整个午餐时间都只是冷冰冰地坐着，芬勒特——一个老谋深算的华尔街律师——不断地尝试着套取奥本海默的话。奥本海默毫不掩饰自己的蔑视之情，他表现出“无视信仰的粗鲁”。他已经开始厌恶空军里的这些人，他们要求制造越来越多的炸

弹,而目的只是为了杀更多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他看来,这些人是如此危险,并且道德缺失,以至于他很高兴与他们成为政敌。几周后,芬勒特和他的人向原子能联合委员会提出一个公开的问题:"(奥本海默)是否是颠覆破坏分子。"

芬勒特对奥本海默的指控是一些参与核辩论的人受到驱使而走向极端的反应。奥本海默自己对这股歪风也不能免疫。1951 年 6 月,他向"当前危险委员会"提供了一份不记录在案的、有关当前危险的报告。该委员会是一个私人组织,致力于对政府进行游说来建立传统(非核的)防卫力量。他还对建立一个真正的西欧防卫力量提出了意见,每个人都想"让欧洲自由,而不是(用原子弹)摧毁它"。"对待俄国人,"他总结道,"我们正在应付一些野蛮的、落后的人,他们还对自己的统治者不忠诚。我们的首要政策应该是,最终'从武器中除去原子材料'。"

到了 1952 年,奥本海默已经受够了华盛顿(美国政府)。杜鲁门总统经常忽视他的提议,以至于奥本海默想设法离开制定政策这摊子事。5 月的早些时候,他在华盛顿的宇宙俱乐部与詹姆斯·科南特和李·杜布里奇吃午餐。三个好友都深有感触地谈起他们目前在华盛顿的处境。之后,科南特在日记中写道:"一些'小子'拿出他们的斧子在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会对付我们三个,声称我们在氢弹方面拖了后腿。这根本就是对奥本海默的影射!"6 月,由于十几年来困扰于"一件可能真的正在变坏的坏事",并且注意到正有一场运动要将他们从顾问委员会中赶走,三个人向顾问委员会递交了辞呈。奥本海默写信给他的弟弟说,现在他正想要投身物理学,"物理学是复杂而又神奇的,让我只甘于做一个看客太难了;只有过了这些天才会轻松,但也许不会太久了"。

但远离华盛顿并没有那么容易,甚至当他从顾问委员会辞职之后,原子能委员会的戈登·迪安还劝他继续作为一个签约顾问保持联系。这也就自动将他的最高机密许可延续一年。这还不是全部。在 4 月份,他又接受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请求,在国务院的裁军顾问小组担任职务。和他一起的还有万尼瓦尔·布什、达特茅斯学院院长约翰·斯隆·迪基、中情局副局长艾伦·杜勒斯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约瑟夫·约翰逊。与往常一样,小组依然选举奥本海默为主席。

艾奇逊还征召麦克乔治·邦迪——一位 33 岁的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

来担任座谈小组的记录秘书。邦迪是亨利·史汀生的至交哈维·邦迪的儿子,而且他还很渴望与奥本海默见面。邦迪聪明、诙谐,有着很强的表达力。作为哈佛大学的一个晚辈,他还参与写作了史汀生 1948 年的回忆录:《和平与战争时期的服役》。作为史汀生著名的《哈珀》月刊 1947 年 2 月的一篇为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辩护的文章——《使用原子弹的决定》——的撰稿人,邦迪已经和一些与核武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十分熟悉。在他们的第一次会议上,奥本海默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的波士顿上层人物。之后,邦迪非同寻常地写了一篇谦恭文章给他的新朋友,说"我不知道怎样去感谢上周你对我的指导所付出的耐心"。很快地,两个人在给对方的手书中就署以"亲爱的罗伯特"和"亲爱的麦克"。

邦迪很快认识到,争议正在偷偷靠近他的新朋友。在他们早期的一次会谈中,奥本海默和他的座谈小组同意他们的首要问题是"生存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俄国面临着一个"蝎子的僵局——是否在主动攻击中使用毒刺……"。奥本海默知道,特勒和他的同事们很希望在深秋测试氢弹的初期设计版本,所以,当万尼瓦尔·布什建议也许能促使华盛顿和莫斯科在计划开始之前达成一项禁止测试一切热核反应装置的全面禁令时,奥本海默颇感兴趣。既然一切违反禁令的行为都能立刻被探测到,他们也就不能进行试验了,而不进行试验的话,氢弹也就无法发展成为可用的军事武器。一项在热核反应领域的军备竞赛就能在开始前被制止。

奥本海默和他的同事们知道了热核反应装置的第一次测试——代号"麦克"——被安排在即将到来的秋天,并且任何试图阻止这个计划的尝试都将遭到空军的强烈反对。尽管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们还是没有准备将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众。一条神秘的面纱遮掩着所有涉及原子能的问题,并且没有经过忠诚调查,他们也不能公开谈论他们的观点,但他们再一次尝试让华盛顿方面相信现行的核武器方针是一条死胡同。但在 1952 年 10 月 9 日,杜鲁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断然否决了奥本海默座谈小组关于推迟氢弹测试计划的建议。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生气地说:"一切像这样的想法都应该立即被抛于脑后,而任何存在的与之有关的文件都该被销毁。"洛维特是一个参与外交政策制定的强势人物,他害怕如果推迟计划的消息泄漏出去,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将有朝一日调查国务院及其座谈小组的顾问。

三周后,美国在太平洋爆炸了一枚当量 10.4 兆吨的氢弹,厄鲁格拉岛也随之消失了。沮丧的科南特告诉一名《新闻周刊》的记者:"我不再和任何原

子弹有关系了,我也没有任何成就感。”

一周后,奥本海默心情忧郁地和九位国防动员办公室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坐在一起讨论是否应该辞职抗议。很多科学家感到,“麦克”试验表明政府根本就没有聆听他们专家建议的想法。奥本海默的老朋友李·杜布里奇分发了起草的辞职信。但到最后,对下届政府可能改变政策的微弱希望让他们又将信抛到一旁。他们知道,胜率取决于他们。在会谈中,麻省理工学院的院长詹姆斯·基利安弯腰对李·杜布里奇小声说:“空军的一些人正盯着奥本海默,而我们已经知道并已经做好准备应对这一切。”李·杜布里奇很震惊。他幼稚地认为,所有人仍把奥本海默当作英雄。

此时,奥本海默正和邦迪为国务院裁军小组草拟最后的报告。这份文件将直接导致国务卿艾奇逊离职,就像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一样。当然,此时这份文件还非常机密,只在艾森豪威尔政府部分高官中传阅,如果在1953年将这份文件公布的话,这势必引起重大的分歧。邦迪是负责编写文件的,而其中很多观点则来自奥本海默:核武器将毁掉整个人类。在几年以后,苏联将有一千枚核武器,再过几年就会达到五千枚,这足以构成“毁掉一个文明,杀伤大量平民的力量”。

邦迪和奥本海默不得不承认,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恐怖”将会演变成“奇特的稳定”,这样双方都将禁止使用这些相当于自杀的武器。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一个危险的世界也不会安宁,为了保持和平,政治家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好每一次危机而不是某一次”。

在面对如此危机时,奥本海默的专家组成员力促“坦诚”的思想。那种过分保密的政策使得美国人得意妄为而忽略了核危机。为了纠正这些误解,新一届政府“应该告诉民众核威胁……”。令人惊讶的是,该小组成员还建议“核武器制造的速度和威力”应该向大众公开,“让公众明白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能靠‘超过俄国人’来抵御苏联的威胁”。

“坦诚”的思想完全是由尼尔斯·玻尔想出来的,他总是坚信安全和“开放”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一点上,奥本海默仍是玻尔的支持者,他不再对长期处于僵局的联合国裁军大会抱任何希望。但是,他希望新一届政府能理解“坦诚”既能让美国人民对依靠核武器所产生的危险有所警醒,也能向苏联人表明美国不打算在先发制人的第一波攻击中使用核武器。还有,裁军小组呼吁与苏联进行直接的长期对话。克里姆林宫应该大致知道美国核武库的规模和性质,华盛顿应积极支持通过双边会谈裁减军备。

如果奥本海默的专家小组的建议在1953年被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的话，冷战会是一个不一样的、军事冲突更少的局面。这个引人深思的猜想，后来在邦迪1982年刊载在《纽约书评》上的散文《失去的阻止氢弹的机会》中得到进一步阐述。在苏联解体的几年里，俄罗斯档案文件激起历史学家重新思考关于冷战初期的基本假设。就像历史学家梅尔文·莱弗勒所写的一样，"敌人档案"表明，苏联人"并没有事先培养东欧共产党的计划，也没有支援中国共产党或是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的计划"。斯大林对德国并没有"总体规划"，并希望避免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将他的军队从1945年5月的1135.6万人削减到1947年6月的287.4万人。这暗示即使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图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乔治·凯南后来写道，他"从未相信过他们（苏联）会通过武力征服西欧以实现他们的利益，即使不部署核威慑力量，他们也不一定会在西欧发起全面进攻"。

到1953年，冷战已经冻结了华盛顿的政策选择余地，华盛顿方面至少是和莫斯科一样举步维艰，奥本海默为自己的坚持付出的努力不管怎么说都将核恶魔封在了瓶子之中。他为此得罪了当时国内的强大政治势力，而现在既然轮到共和党人当总统了，政治力量也就会决定将奥本海默放进瓶子，并投入大海。

32 | “丛林中的野兽”

“我们就像一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每一只都有能力杀死对方，
但是要以生命作赌注。”
——罗伯特·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长久以来就抱着这样一种预感，大的不幸会在某一天降临在他身上。20世纪40年代末的某一天，他看到了亨利·詹姆斯的一本短篇小说《丛林中的野兽》，它讲述了令人困惑和痛苦的自我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预兆。奥本海默被书里的内容彻底惊呆了。他立刻打电话给赫伯特·马克斯。赫伯特·马克斯的遗孀安妮·威尔逊·马克斯回忆道：“他非常期望赫伯特读这本小说。”詹姆斯书里的主人公约翰·马尔谢偶遇到他多年以前认识的一个女人，她回想起他曾向她坦白他被一种不好的预感困扰着：“你说你从小就有这种预感，它存在于你的灵魂最深处，就像心里藏着什么珍贵而神秘的东西一样。它可能是巨大的、可怕的，并迟早会找上你。它一直困扰着你，而你担心它会将你打倒。”

自从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奥本海默就一直有种奇怪的预感，不知哪天他自己的“丛林中的野兽”就会向他扑来。过了这么些年，他明白自己一直是个猎物。假如真的有“野兽”存在，那就是刘易斯·斯特劳斯了。

1953年2月17日，奥本海默在纽约作了一次公开报告，讲的是关于裁军方面的问题。他和邦迪近来向艾森豪威尔政府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强烈要求实行一个明确而“坦诚”的核武器政策。他选择了议员和与对外政策有关的人员作为听众。选择的具体理由是，议会是一个精英聚集的地方，他的话会在华盛顿的军界和政策制定者中产生共鸣。听众都是才华横溢的对外政策

的制定者:年轻的银行家大卫·洛克菲勒、《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尤金·迈耶、《纽约时报》的军事记者汉森·鲍尔温,以及库恩洛布投资银行的银行家本杰明·伯滕威泽。当然,还有刘易斯·斯特劳斯。

奥本海默在演讲时很注意措辞,因为几乎和核武器有关的一切都是机密。"我必须仅仅揭示它的性质而不能泄露其他东西。"他指出,战后美国一直被迫应对"苏联巨大的敌意和它不断增长的力量"。核武器在冷战中扮演的角色是简单的,正如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所总结的,"让我们不断前进,保证我们领先于敌人"。

在核武器竞赛方面,奥本海默认为,苏联已经进行了三次核爆炸,并拥有大量的可裂变物质,"我愿意提供这方面的证据但是我提供不了"。但是,他说他可以大致估计出苏联在军备竞赛中的位置,"我认为苏联大概落后我们四年"。他评论说,这听起来让人很安心,但鉴于广岛原子弹的威力,不论从何种程度来说,它都是致命的。他还间接地提到了导弹技术,他说这种技术的发展不久将带来"更现代化、更灵活也更难预测"的运载工具。"所有这些都已准备就绪,"他说道,"我认为我们应该详细了解所有的情况。首先让我们明确我们的位置。"

事实是推测的基础,但这些事实是保密的。"我不能讲这些。"他反复强调他被秘密困扰着。"我只能这样说,我没有对任何负责的组织谈过这件事,科学家、政治家、公民、官员都没有过。我对任何可能触及到真相的人都没说过,他们不会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感到忧虑。想想十年以后,我们可能会对苏联落后我们四年感到些许安慰,但至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拥有两万枚核弹不会比苏联的两千枚更有战略威胁。"

虽然没有公布数字,但奥本海默宣称美国的核储备在不断增加。"我们一开始就声明要自由地使用这些武器,并且计划使用它们。我们这样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假如使用了,我们就会大规模地持续使用它来攻击敌人。"这是一个简略的战略计划总结:对苏联的城市进行毁灭性的、种族灭绝式的空中打击。

他继续讲道,原子弹是"保护欧洲不变成像朝鲜那样的战场的唯一军事手段,但欧洲人并不知道这些武器是什么样的,有多少,以及会被怎样使用,他们到那时该怎么办?"

核领域的保密制度造成了大量谣言的传播和猜测。当事实只流传在少数人中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做出充分的应对。对于前总统哈里·杜鲁门最近

抨击了苏联已具备打击美洲的能力的说法，奥本海默尖刻地指出，作为一个了解真相的前总统在各项事实面前发表这样的质疑是令人遗憾的。他同时也嘲笑美国防空指挥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因为这位官员在八个月前说美国的政策只是保护反击能力，而不是整个国家，因为这个任务会妨碍我们的报复能力。

奥本海默总结说："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坦诚'。"华盛顿的官员必须对美国公民直言相告，告诉他们敌人已经了解核军备竞赛的一切。

这是一个大胆而有见地的言论。奥本海默反复地说他被限制说出基本的事实，然而，就像被赋予特殊知识的婆罗门僧侣，他坚持披露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任何一个国家想赢得核战争的胜利都是虚妄的。他说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两个超级大国中的每一个都有将另一个国家的文明和全部生命毁灭而又无法保证自身不受到伤害的状态"。

而后，奥本海默又平静地加了一句任何人听了都吃惊的话："我们就像一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每一只都有能力杀死对方，但是要以生命作为赌注。"

很难想象出比这更具争议的言论了。毕竟，新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直言不讳地鼓吹基于大规模报复的防御主义。但此时，原子时代之父却宣称这一防御政策的基本设想是无知且荒唐的。当奥本海默所说的在华盛顿官僚机构中传开之后，很多人都感到了震惊，而刘易斯·斯特劳斯则更是十分恼怒。

从另一方面讲，大多数律师和投资银行家对奥本海默在国会上的发言印象很深，甚至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后来读了发言之后也被他坦诚的意见所打动。曾是一位将军的艾森豪威尔明白，奥本海默所说的两个超级大国如同"一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的表述具有深刻的含义。他曾看过裁军小组的报告，并觉得它十分明智且有见地。对核武器抱有很大怀疑的艾森豪威尔，告诉白宫的一位重要助理杰克逊说："核武器青睐突然而又主动进攻的一方，而这是美国永远也不会做的。我必须指出的是，只有在核武器真实出现的时候，美国才会不惧怕任何国家。"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后期，他感到不得不斥责一批鹰派的顾问们："你不能进行这种战争，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推土机来清理街道上的尸体。"

在一段时期内，奥本海默的观点好像影响了新总统。但是，在艾森豪威尔竞选活动中贡献突出的斯特劳斯，已经于1953年1月被任命为总统的原子能顾问，7月份他又被晋升为他垂涎已久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

当然，与奥本海默所坚持的公众应该知道美国核武器储备的实质，或者

美国的核战略应当公开讨论的理念不同，斯特劳斯认为公开只会使苏联更容易开展间谍活动。因而，斯特劳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让总统怀疑奥本海默。新总统曾对某人说起过，他记得斯特劳斯是在那年春天告诉他“奥本海默是不值得信赖的”。

1953 年 5 月 25 日，斯特劳斯来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与胡佛的一名助理拉德进行谈话。他告诉拉德，奥本海默预定在几天后短暂拜访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他“十分担心奥本海默的活动”。他刚刚了解到，正是奥本海默雇用了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大卫·霍金斯于 1943 年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除此之外，斯特劳斯还告诉拉德，他怀疑奥本海默在 1942 年的希瓦利埃事件中与苏联有过接触。除此之外，他还指控奥本海默故意延误氢弹的研究。他对拉德说，如果他向总统汇报奥本海默的这些背景，联邦调查局会配合吗？拉德表示会完全配合。

斯特劳斯诋毁奥本海默的行动就是从 1953 年 5 月 25 日开始的。那天，他被总统提名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艾森豪威尔回忆说，斯特劳斯“回来对我说起了关于奥本海默的事情。他说如果奥本海默继续参与这些项目的话，他就无法工作”。

在斯特劳斯会见总统的一星期之前，奥本海默给白宫打电话说：“他有紧急的事情，必须尽快见到总统。”两天之后，他就来到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在简短的会晤之后，总统邀请他 5 月 27 日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一次报告。奥本海默那天是和李·杜布里奇一起去的，他作了五个小时的报告，并回答了问题。他提倡“坦诚”的好处。同时，他也许想起了 1946 年利林塔尔小组的报告，于是他建议总统成立一个五大国的裁军小组。据杰克逊的回忆，“奥本海默征服了所有人——除了总统。”总统对他的演讲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在他离开时并没有与他握手。也许总统是在考虑两天前斯特劳斯对他所说的话，即如果奥本海默还担任顾问，他就无法工作。据杰克逊回忆，总统对奥本海默把他的“近乎催眠的权力施加给小团体”感到不安。之后，总统对杰克逊说，他不完全相信这个物理学家。于是，斯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第一拳奏效了。

在奥本海默的白宫之旅后，斯特劳斯开始了对他的公开攻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亨利·卢斯旗下的《时代》、《生活》和《财富》杂志全方位地攻击奥本海默和其他科学家在国防政策上的影响。在 1953 年 5 月的一篇名为

《氢弹下的隐秘斗争:奥本海默与美国军事战略的斗争》的未署名文章中,文章作者指责了奥本海默对空军的一场演习施加影响,说他让这项军事演习成了检验核报复战略的道德意义的试金石。利林塔尔在读了这篇文章后,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对奥本海默的又一次无耻的受人指使的攻击"。而利林塔尔不知道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财富》杂志的编辑之一查尔斯·墨菲。他曾是一名空军预备役军官,同时也是斯特劳斯的合作者之一。

奥本海默关于"坦诚"的演讲稿被白宫审查后,于1953年6月19日刊登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就此大做文章。他们声称,奥本海默说如果没有"坦诚"精神,美国人民就"不可能了解真正的防御措施,而只有总统有权力漠视这些由谎言堆积起来的核时代的战略形势",而这纯粹是一派胡言!

斯特劳斯郁闷地跑去见总统。他认为奥本海默的文章"危险而致命",他很奇怪白宫怎么会通过对这篇文章的审查。艾森豪威尔读过奥本海默的这篇文章,并赞同其中的一些观点。在当年7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总统表示,他赞同奥本海默的观点,并且将会在核武器上采取更加"坦诚"的态度。斯特劳斯向艾森豪威尔抱怨说,有些记者把这份声明解释成对奥本海默"坦诚"精神的支持,以及透漏我们的武器库存和生产率乃至敌方武器库存的信号。

"这是毫无意义的废话,"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你不该去读那些家伙写的东西。"他告诉斯特劳斯,他会坦诚地提醒公众核战争的危险,并给大家提供其他的有希望的选择。斯特劳斯并不同意,但是他聪明地保持了沉默。让他倍感挫折的是,艾森豪威尔好像被奥本海默的一些观点吸引住了。斯特劳斯决定要让总统省悟过来,并认识到这些观点毫无价值。

大环境似乎也有利于斯特劳斯。8月份全国的报纸在头版头条都大力宣传了"苏联氢弹试验"的消息。仅在美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的九个月后,苏联就明显已经跟上了步伐——至少美国人是这么认为的。事实上,苏联的试验不是表面上的科技成就。它既不是一颗氢弹,也不是一件可以用飞机运载的武器,但是它给人的印象是苏联准备在核武库方面超过美国。这就为斯特劳斯攻击奥本海默提供了更多的政治筹码。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前几个月里,他削减了常规武器的防御经费。他虽然还没有考虑核战略问题,但是他建造了核武器库。艾森豪威尔把这称为他的"新视野"防御姿态。政府接受了空军的战略方针,而且准备全部依靠空军

的力量进行防御。“大规模报复”战略不仅在表面上看是廉价而致命的手段，而且还是目光短浅的和屠杀性的，如果开始实施就等于是自杀。迪安·艾奇逊称其是一个“建立在话语和事实之上的欺骗”。阿德莱·斯蒂文森尖刻地质问道：“我们是要把自己置于冷酷无情的无所作为，还是选择热核爆炸的大屠杀？”那个“新视野”其实就是个旧政策，而且也是与奥本海默对新政府的希望背道而驰的。

刘易斯早就预料到了，政府会保留核保密制度，并且要大量生产核武器。奥本海默曾经认为，斯特劳斯仅仅是惹人烦而已，不足以成气候。现在是一个共和党的政府控制着华盛顿，斯特劳斯手握大权，他的右脚正在加速把他的政治生涯印在地板上。

奥本海默和他的很多朋友都相信斯特劳斯在对付他。7月，斯特劳斯就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不久，奥本海默的密友兼律师赫伯特·马克斯就接到一个原子能委员会雇员打来的电话：“你最好告诉你的朋友奥本海默，准备面对困境和一些风暴吧。”

“我知道他处于困境之中，”拉比回忆说，“他这样已经好多年了，他正生活在这个阴影下，我知道他身处困扰之中。”所以有一天拉比告诉他：“罗伯特，你写一篇文章给《星期六晚报》，告诉他们你的故事，你所起的关键作用，这样你不仅会得到很好的报酬，还会消除麻烦。”拉比认为，如果罗伯特写出这样的故事，并且出现在一份重要的报纸上，公众就会理解他。作为一个与公众有关的话题，一篇坦诚的忏悔式文章会使奥本海默更好地免受进一步的政治攻击。但是，正如拉比回忆的那样，“我不能让他那样做”。

奥本海默还有其他的计划，那年夏天的早些时候，罗伯特、基蒂和两个孩子在纽约乘乌拉圭客机飞往巴西。作为巴西政府的客人，奥本海默计划发表几次演讲，然后在8月返回普林斯顿。当他在巴西的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大使馆一直都在监视着他的活动。

当奥本海默正在巴西享受他的业余旅行时，斯特劳斯花费了整个夏天都在兴奋地准备彻底结束奥本海默的影响力。6月22日，他拜访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与胡佛进行了又一次私人会谈。斯特劳斯很清楚，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这位高官在华盛顿很有影响力，斯特劳斯希望能确信他们保持着“亲密和热忱的友谊”。“舰队司令”斯特劳斯几乎是立刻就把谈话转向了奥本海默。胡佛在备忘录中写道：“斯特劳斯说他意识到参议员麦卡锡正打算调查

奥本海默博士。他还认为,对奥本海默的行为进行调查是很值得期待的,但他希望那不要过早。"

胡佛向斯特劳斯解释说,他已经警告过麦卡锡,在对奥本海默这样的著名人物展开公开调查前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工作。麦卡锡表示他已经明白,他会撤回奥本海默的案子,至少现在他会这样做。胡佛和斯特劳斯都一致认为:"这件案子并不仅仅是那种应该尽早解决,好让众多媒体有头条消息的案子。"

这是两个想法接近的人进行的一次很好的会面。斯特劳斯相信,他和有权有势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形成了坚固的联盟,这对解决奥本海默的案子太重要了。他不得不暂时放弃去拜访麦卡锡参议员,因为他需要精心计划来操作这个案子。

离开胡佛之后,斯特劳斯回到他的办公室,写信给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敦促他阻止麦卡锡试图对奥本海默的调查。那将是一个"错误",他写道:"第一,一些证据可能会站不住脚;第二,麦卡锡委员会在当前还不是负责调查奥本海默的地方。"斯特劳斯将会自行展开调查。

1953 年 7 月 3 日,斯特劳斯正式就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一职,负责管理工作。《新共和》杂志报道说:"好像他就是这次战役的舰队司令。"当他发现退休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戈登·迪安已经同意了奥本海默关于他的顾问合同再续约一年的请求时(这就可以使奥本海默继续去游说),斯特劳斯操纵了这场战役。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请求胡佛将美国联邦调查局最近一次对奥本海默调查的总结报告的复本寄给他。到这时,美国联邦调查局里关于奥本海默的文件已经有几千页了。单单是 1953 年 6 月的摘要就有六十九页。于是,斯特劳斯等不急要开始研究奥本海默的案子了。

在艾森豪威尔的过渡时期,斯特劳斯始终保持着和威廉·伯登的联系,他是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年轻的理事,并且和斯特劳斯一样也很怀疑奥本海默。伯登是民主党,当共和党控制国会后,他就没了工作。然而,出于对奥本海默的怀疑,他已经完成了长达六十五页的奥本海默对华盛顿施加影响的追踪报告。他写道,在美国没有哪个人会比这位科学家熟知如此多的关于国家军事和外交政策的"详细的精确资料"。

伯登不能理解,在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安全文件中竟然有如此之多他认为是具有贬损性质的信息。当然,斯特劳斯有着相同的怀疑,他鼓励

伯登继续追查下去。1952 年 12 月，在伯登写出他的调查报告一个月后，斯特劳斯交给他一封四页的信，向他概述了氢弹计划为什么被推迟三年的看法。他认为，不仅是因为奥本海默的顾问委员会阻碍了超级武器的发展，而且现在已经很清楚的是，苏联从原子能的间谍活动中获益。

1953 年 4 月下旬，伯登拜访了斯特劳斯，在斯特劳斯的办公室里，他们讨论了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他们接下来的行为说明，在这次见面中，他们共同制定了一个计划——实际上是一个阴谋，目的是要结束奥本海默的影响力。伯登负责进行这项卑鄙的工作，而斯特劳斯负责提供伯登所需要的信息。

在他们讨论后的两周内，伯登就获得了许可从原子能委员会的保险库中拿出奥本海默的安全文件。即使在他 1953 年 5 月 31 日离开政府工作后，他还继续持有这些文件直到 8 月 18 日。7 月 16 日，在纽约州北部单独度假的斯特劳斯给伯登打了电话。这些关于奥本海默的档案在归还几个小时后，就又被放在了斯特劳斯的办公桌上。他保存这些文件达三个月之久，直到 11 月 4 日，他才把这些文件送回原子能委员会的保险库中。在斯特劳斯归还这些文件几小时后，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官员、斯特劳斯的好友布赖恩·拉普兰特又将这些文件拿了出去，直到 12 月 1 日才归还。

伯登对奥本海默文件的一送一还，斯特劳斯和布赖恩·拉普兰特肯定参与其中，这不可能是个巧合。很明显，是受了斯特劳斯的鼓动和指使，伯登炮制了对奥本海默的指控。当伯登完成工作并将档案送回后，斯特劳斯可能是为了核实这些证据又研究了这些档案。当他看完后，又让拉普兰特对这些报告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于是，从 5 月到 11 月的七个月中，刘易斯·斯特劳斯在伯登的大力帮助下，完成了他和埃德加·胡佛认为的对于成功指控奥本海默所必需的大量基础性工作。他们没有邀请麦卡锡参与其中，因为知道他对准备这样细致的工作不在行。1953 年 7 月 1 日，据原子能委员会的律师哈罗德·格林说，“斯特劳斯向胡佛承诺他将清除奥本海默。”一个月后，斯特劳斯写信告诉胡佛，他仍然很担心奥本海默在原子能项目上的影响力，他仍会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且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终止奥本海默与原子能委员会的整个联系。在这方面，这个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当斯特劳斯和伯登准备他们反对奥本海默的案子的时候，奥本海默在初

秋时节写了四篇关于科技的长论文。1953 年初,英国广播公司邀请他发表广播讲话。奥本海默和基蒂打算 11 月在伦敦待三个星期,然后在 12 月初去巴黎。这种邀请是很大的荣誉,先前被邀请的演讲者有伯特兰·罗素和阿诺德·汤因比。

奥本海默在阐释演讲的主题时说:"主要是阐明关系重大的、有利的和激励人们去了解的核物理中的新事物。"大多数的听众可能会被奥本海默研究的模糊性所吸引。一个评论家这样写道:"他那雄辩的言辞就像一张网网住了他的听众,使他们不经意间就被迷住了。"奥本海默的演讲除了神秘之外什么都没有。他随后补充道:"由于我自己的原因,我是不可能感到困惑的。"

冷战并不是他的话题,但他还是简单地谈论了共产主义的本质:"苏联这样一个如此强大的现代专制国家自称信仰共产主义,真是冷酷和严肃的嘲讽。'共产主义'在其他时期只会唤起人们对乡村和乡村旅馆的回忆,工匠们只关注他们的手艺,人们满足于默默无闻的生活。但是,这种所有的社会都是一个社会、所有的真理都是一个真理、所有的经验都和其他的一样、共有知识都是合理的、所有的潜在都会成为现实的系统信念必然会导致恶性后果。这不是人类的命运,也不是上帝的道路,因为这使得上帝不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的形象,而是垂死世界无助的绑着铁链的囚犯。"

当 20 世纪 30 年代奥本海默默守着共产主义者的誓言时,绝对不会想到他在 1953 年说的这些话。在伦敦录制完演讲后,奥本海默穿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了巴黎。基蒂在蒙马特尔的公寓给哈康·希瓦利埃打过电话之后,才知道他正在罗马参加一个会议,可能过几天才能回来。于是,奥本海默和基蒂坐火车去了哥本哈根,并在玻尔家住了三天。当他们回到巴黎时,希瓦利埃已经回来了,坚持要在他们走的最后一个晚上在家里请他们吃饭。这个邀请可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应斯特劳斯的邀请,驻巴黎领事馆的美国安全部门官员跟踪了奥本海默的整个行踪,他们在他住的旅馆中得到了一张他所有电话的记录。驻巴黎的美国大使馆报告说:"希瓦利埃可能是苏联间谍,他的名字在法国警察和情报机构的黑名单上。"

到 1953 年 12 月 7 日,希瓦利埃和奥本海默已经三年多没见了。他们上次见面是 1950 年的秋天在奥尔登庄园,那时希瓦利埃正在旅游,并试图从和芭芭拉的离婚痛苦中恢复过来。但是,两个老朋友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其中甚至包括应哈康的请求,罗伯特写了有关他在众议院非美调查委员会上

谈论埃尔滕顿的摘要。虽然信没有寄到希瓦利埃在伯克利的地址,但是他仍然很感激。

1950 年,希瓦利埃搬到了巴黎,由于美国政府拒绝发给他美国护照,他便拿着法国护照旅行。在巴黎,他渐渐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他为联合国当翻译,同时写写小说。他和 32 岁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卡罗尔·兰斯伯格结了婚,奥本海默送给他一个维京群岛产的桃木色拉瓶作为结婚礼物。

现在两个人都很期待一次聚会。奥本海默和基蒂来到希瓦利埃在塞尼峰路 19 号的公寓。这座公寓位于圣心大教堂的脚下,他们搭一部老旧的电梯上到四楼。希瓦利埃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在放满书箱的客厅里喝酒。希瓦利埃做了一桌美餐,包括盛在桃木色拉瓶里的奢侈的色拉。餐后甜点之后,希瓦利埃又开了一瓶香槟,在畅饮之后,奥本海默和基蒂在香槟的软木塞上签了名。

当奥本海默在午夜离开后,突然心血来潮又返了回来。他回来对希瓦利埃说:"我对后面的几个月并不期待。"可能他在暗示有什么麻烦,但他没细说。当他离开时,希瓦利埃觉得他穿得太少了,就送他一条意大利产的丝绸围巾。没人会觉得他们二人的友情会接受审判。

奥本海默在欧洲的时候,伯登就开始写奥本海默的起诉材料了。这些材料是基于奥本海默的安全文件,而它们是伯登在斯特劳斯的安排下从原子能委员会的保险库里拿出来的。伯登怀着巨大的热情从事这项活动,同时他对斯特劳斯忠心耿耿。在 1953 年 5 月失去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职位后,他获得了在匹兹堡核潜艇项目的工作。他十分感谢斯特劳斯还能惦记着他。伯登每晚对奥本海默的机密资料进行研究,同时在 1953 年 11 月给埃德加·胡佛写了一封信。尽管在美国联邦调查局记录中的同样信息很长、很复杂,但伯登仅仅用了三页半纸就表述出了他的观点。他的结论令人吃惊:从大量的奥本海默和共产党联系的材料以及他对核武器的建议中,伯登认为奥本海默很可能是苏联的人。

现在还不知道斯特劳斯是什么时候完全知道信的内容的,至少在胡佛通知他之前他从未提过。但是,在斯特劳斯 9 月份的一份文件记录中,他暗示他看过这封信。他说:"我记得 1945 年 11 月 27 日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苏联间谍的文件中写着:'1940 年的监视表明,有一个小群体的秘密会议曾举行过,包括史蒂夫· 纳尔逊、哈康·希瓦利埃,以及共产党在加利福尼亚的领导

者威廉·施奈德曼和罗伯特·奥本海默。'这明显是联邦调查局监视的。"

到1953年秋,华盛顿到处都在进行政治迫害。许多官员因为一点小事就被迫害了,包括总统都不敢和约瑟夫·麦卡锡议员作对。1953年11月24日,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通过电视和广播作了个演讲。他在演讲中指责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缓和政策。第二天,杰克逊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采访时说,他认为"麦卡锡在向总统宣战"。

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1953年12月2日,国防部长威尔逊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总统,问他是否看到了胡佛关于奥本海默的报告,总统说他还没有看过。威尔逊说,这"是目前为止最糟糕的事情"。他说昨晚斯特劳斯打电话跟自己说,"麦卡锡已经知道了此事并可能就此向我们发起攻击"。艾森豪威尔说他并不担心麦卡锡,但是应该把奥本海默的案子交给司法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他告诉威尔逊:"除非他们有确凿的证据,否则绝不会陷害奥本海默。"威尔逊误导性地跟总统说:"奥本海默的弟弟和妻子都是共产党员,事实上,从他以前的社会关系来看,他也难摆脱和共产党的联系。"

总统和威尔逊通过电话后——在看那份报告之前——在日记中写道,新的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有一些新的证据,这将会是一个严重的案子"。司法部长将要决定是否授权这次控告,但总统同时也说,"我很怀疑是否真的有什么证据"。无论如何,他决定要切断奥本海默和政府的一切关系。

第二天早晨,总统会见了国家安全助理罗伯特·卡特勒。卡特勒建议总统立即采取措施反对奥本海默。十点钟,总统把斯特劳斯叫到办公室,问他是否看过联邦调查局关于奥本海默的最新报告。斯特劳斯当然看过,就是伯登的那封信促成了这份报告。在匆忙的讨论后,总统发布命令,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断绝奥本海默接触一切敏感或密级文件。

同一天的晚些时候,总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读过了所谓的新的指控,但发现除了一封来自伯登的信外,这里面没有任何新意……这封信里没有什么新的证据……这些信息在过去的几年不断地被拿来审查,而且关于这个案子的结论早已定了下来。结论表明,没有证据证明奥本海默对国家不忠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安全风险"。

艾森豪威尔知道,奥本海默很可能会成为这场卑鄙指控的受害者,但他已经下达了调查的命令,自己不会就这样停止调查。如果总统停止调查,白宫就有可能受到麦卡锡的攻击。所以,他给司法部长发了一份正式通知,要

求他“切断”奥本海默接触机密材料的途径。

在华盛顿没有不透风的墙。第二天,1953 年 12 月 4 日,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老朋友和同事威廉·帕森斯将军知道了这个消息。帕森斯知道奥本海默所有的左翼背景,他知道这些都是无事生非。他曾在那年秋天写信给“亲爱的奥本”说,“近几个月的反智识主义已经过了它的高峰期”,而现在他知道事实不是这样。那天下午,他在鸡尾酒会上见到妻子玛莎,她看出丈夫“极其烦恼”。帕森斯跟妻子说了这个消息,他还说:“我必须阻止这个事情。总统必须知道事实的真相。”

当天晚上,帕森斯将军胸部疼痛得很厉害。第二天早晨,玛莎看到丈夫脸色苍白,就马上送他到贝塞斯达海军医院。但是,帕森斯当晚就死于心脏病,而玛莎一直认为是那条消息害死了丈夫。

也是在 12 月 4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到百慕大去度假,一共去了五天。斯特劳斯也跟随总统去了。五天后,当他们回来时,斯特劳斯开始为政府控告奥本海默的案子作下一步准备。

正如所料,美国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完成对伯登信件的分析。首先,胡佛并没有认真对待这封信。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认为:“伯登的指控是歪曲捏造出来的,这是为了让它们显得比事实更有说服力。”所以,官方现在以一种急迫的心情,命令斯特劳斯延迟本来应在 12 月 21 日举行的他对奥本海默的指控。

12 月 18 日,斯特劳斯来到椭圆形办公室,讨论他如何计划解决奥本海默的案子。出席的有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威廉·罗杰斯、白宫事务助理杰克逊和罗伯特·卡特勒,还有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艾森豪威尔总统没有出席,他去会晤国会领袖去了。他们接受了斯特劳斯的想法,决定由一个委员会对奥本海默再进行一次忠诚调查。这在正式形式上并不算是一项指控。他们给了这位科学家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安静地离去,或者在斯特劳斯任命的调查组来之前中止自己的安全许可。

当 12 月 21 日下午三点奥本海默到达时,斯特劳斯和肯尼思·尼古拉斯已经在等他了。肯尼思·尼古拉斯曾经做过格罗夫斯将军的战时助理,现在是原子能委员会的总负责人。

斯特劳斯告诉奥本海默:“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与您延续安全许可有关的非常困难的问题。”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签署了一项行政法令,要求对那些

文件中含有负面信息的所有人进行重新评估。当斯特劳斯提到奥本海默的文件中含有大量的负面信息时，奥本海默意识到，斯特劳斯知道他的忠诚调查就要开始了。斯特劳斯提醒奥本海默，一位前政府官员（伯登）写了一封质疑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信，总统因此命令立即展开调查。对于这一点，奥本海默并不是很惊讶。但现在斯特劳斯告诉他，审查的“第一步”是立即中止他的安全许可。斯特劳斯解释说，那封原子能委员会的信已经列出对他指控的性质。斯特劳斯强调说，那封信已经起草好了，只是还没有署名。

奥本海默可以读那封信。当他浏览信的内容时，他评论说：“这里面有许多东西是可以被否认的，有些是错误的，但确实有许多是真的。”这就像是一个大杂烩，有真相，有谎言，还有半真半假的。

根据尼古拉斯的会议记录，奥本海默本人首先提出在安全审查之前辞职的可能性。然而，指控文件还没有被签署，因此那还不是一份官方指控。奥本海默仔细地考虑了这个决定，刚开始他看起来是想接受这种可能性，但他很快评论道，如果一个委员会开始对他进行一项调查，那么现在辞职“在公众看来就可能不太好”。

当罗伯特问斯特劳斯他还有多长时间做出决定时，斯特劳斯说会从晚上八点整开始在家等他的答复，但是不会等到第二天。当奥本海默问他是否可以有一份指控的复本时，斯特劳斯拒绝了。他说，奥本海默只有在决定如何做之后才能拥有这封信。而且，当奥本海默问国会是否知道时，斯特劳斯说他不知道，但是他怀疑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对国会保密的。

斯特劳斯最终非常确定地告诉奥本海默，他希望奥本海默在某个地方待着。然而，奥本海默对这些消息的反应看上去很平静，他很礼貌地询问了一些恰当的问题，试着寻找一些他的权利。三十五分钟之后，奥本海默站起身来说他要去咨询一下赫伯特·马克斯。斯特劳斯告诉奥本海默，他可以把自己的配有司机的凯迪拉克车借给他，心里已经发狂的奥本海默居然愚蠢地接受了。

奥本海默并没有去马克斯的办公室，而是叫司机带他去乔·沃尔普的办公室。乔·沃尔普曾经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律师，他和马克斯曾在温伯格的审判中一起为奥本海默提供法律咨询。不久之后，马克斯也加入了进来。三个人花了一个小时来研究罗伯特的权利。一个隐藏的摄像头记录了他们的讨论。斯特劳斯早就预料到奥本海默会去咨询沃尔普，他对破坏律师特有的法律神圣性丝毫不关心，斯特劳斯已经在沃尔普的办公室提前做好了安排。

斯特劳斯通过那个隐秘的微型摄像头监视着他们的讨论，看看奥本海默是终止他的顾问合同还是准备在正式听证会上与指控作战。奥本海默很显然是犹豫不决，而且非常气愤。那天傍晚，安妮·威尔逊·马克斯顺便拜访，并带着她的丈夫和罗伯特开车回到乔治城的家。在路上，奥本海默说："我不敢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那晚，罗伯特坐火车回到普林斯顿，去和基蒂商量。

斯特劳斯原来希望奥本海默那晚就可以做出决定，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他还没有得到奥本海默的答复。他命令尼古拉斯当天中午打电话给奥本海默。奥本海默说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尼古拉斯回答"你没有更多的时间"，他给他的最后期限是三个小时。奥本海默似乎同意了，但一小时之后，他就打电话告诉尼古拉斯，他想自己亲自去华盛顿给出答复。他说他会坐下午的火车去，可以在明早九点见到斯特劳斯。

把皮特和托尼留给秘书弗娜·霍布森照看后，奥本海默和基蒂在特伦顿上了火车，然后在傍晚到达了华盛顿。他们直接去了马克斯在乔治城的家，他们一整晚都和马克斯和沃尔普在一起，继续讨论奥本海默是否应诉。

安妮记得，奥本海默依然处于一种绝望的状态。经过几个小时的分析，律师们最终给"亲爱的刘易斯"写了封五页纸的信。奥本海默强烈暗示斯特劳斯曾鼓励他辞职。"您暗示我自己请求终止我的合同不再担任委员会顾问，这样就可以免于被指控。"奥本海默说他已经最认真地考虑了这项选择。他写信给斯特劳斯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行动将意味着我接受我并不适合为政府工作的观点，而我已经为它服务了差不多十二年之久，我不能这样做。我曾经努力为我的国家服务，认真地为普林斯顿的研究院负责。我曾经不止一次以科学和国家的名义说过话。如果我接受这一行动，我做的一切就都不值得了。"

直到那天夜晚，罗伯特很明显是又累又沮丧。喝了几杯之后，他站起来说他要上楼到客房去睡觉。几分钟之后，赫伯特和基蒂听到一声"巨大的撞击声"。安妮第一个跑上楼。奥本海默不见了。她敲了敲浴室的门，大声喊奥本海默的名字，却没有回应，于是她试着把门推开。她说："我推不开浴室的门，奥本海默也没有回应我。"

他晕倒在浴室的地板上，失去知觉的身体砸向了门。他们三个人一起一点点地把门推开，把罗伯特的身体推到了另一边。然后，他们把他抬到沙发上，使他苏醒过来。安妮回忆说："他只是在喃喃自语。"罗伯特说他吃了一

片安眠药，那是基蒂给他的处方药。安妮打电话叫了医生，医生说“不要让他睡觉”。在医生赶来之前的一个小时里，他们扶着奥本海默走来走去，给他灌咖啡。奥本海默的那个“丛林中的野兽”来袭击他了，而他的厄运才刚刚开始。



第五部分

33 | “情况很糟，对吗？”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约瑟夫·K被捕了。
一定是有人诽谤了他，因为他什么坏事都没做。”
——弗朗兹·卡夫卡，《审判》

奥本海默刚告诉斯特劳斯他不会辞职，原子能委员会的总负责人肯尼思·尼古拉斯就进行了一场临时审问。原子能委员会的年轻律师起草对奥本海默的起诉书的那天，尼古拉斯就告诉哈罗德·格林说，那个物理学家是个“狗娘养的狡猾佬，但这次我们要抓住他”。格林后来回忆的那句话，正是在整个听证会过程中原子能委员会态度的精确写照。

圣诞前夜，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来到奥尔登庄园，并接管了奥本海默其余的机密论文，也正是在那一天，奥本海默接到了原子能委员会的正式起诉书，其标注日期为1953年12月23日。尼古拉斯告知奥本海默，原子能委员会现在对以下问题质疑：“您继续在原子能委员会任职是否会危害共同防卫和安全，是否与国家安全利益明显一致。兹以此信告知您为协助解决此问题所能做的……”指控中包括奥本海默所有的陈年“劣迹”：他与知名或不知名的社会主义者的来往、对加利福尼亚共产党的捐助、希瓦利埃事件，以及“您在劝说其他杰出科学家不要致力于氢弹项目的工作中起了作用，您在反对氢弹的工作中是最有经验、最有权威、最起作用的，这显然会减缓它的发展”。除了最后一条指控——延迟氢弹的发展，信中其他内容都曾经被格罗夫斯和原子能委员会认定为不可信的内容。

圣诞节前的一两天，当罗伯特和基蒂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奥本海默的秘书正坐在桌边。他俩关上了门，这很奇怪，因为罗伯特平时总爱开着门。“他

们在里面待了好久,"弗娜·霍布森回忆道,"一定是出事了。"最后他们出来时喝着饮料,并给了霍布森一杯。霍布森回家后告诉她丈夫怀尔德:"奥本海默家一定有麻烦了,我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但我想给他们一件礼物。"刚好怀尔德才买了一张巴西女高音的唱片,弗娜第二天就拿到办公室给了罗伯特,说:"这不算是圣诞礼物,我没专门为你出去买,是旧的,这只是我在此时此刻想给你们的礼物。"罗伯特接过礼物,低头坐着沉思了会儿,然后抬起头说:"太珍贵了。"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把霍布森叫进办公室,关上了门,说要告诉她所有的事。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他坐在那里,告诉了她自己被起诉的事,还告诉了她自己的童年、家庭及成年后的整个故事,这些事霍布森从未听说过。事后回顾时霍布森认为,他也许是在排练给尼古拉斯起诉书的回信中的内容。他认为:"那些所谓的'负面'条款……在脱离了我的生活和工作背景的条件下是无法被公正理解的。"

在之后的数周里,罗伯特拼命地准备辩护词。原子能委员会给了他三十天的期限来回复起诉。他首先要组建一支律师队伍,于是在1954年1月初,他向赫伯特·马克斯和乔·沃尔普咨询。马克斯坚决主张他的朋友应该找一位有政治背景的知名律师,而沃尔普则力劝奥本海默找一位庭审经验丰富的律师。最终,奥本海默和马克斯去找了劳埃德·加里森,他是保罗、韦斯、里夫金德、沃顿和加里森合开的纽约法律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之一。新年后不久,马克斯和奥本海默去加里森在纽约的家拜访了他,并给他看了尼古拉斯的起诉书。看完后罗伯特就说:"情况很糟,对吗?"加里森只是简短地回答说:"是的。"

加里森很同情奥本海默。他说,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原子能委员会延长给他的三十天回复起诉的期限。1月18日,加里森去了华盛顿,并争取到了必要的延期。他还试着作为主要辩护律师来找一位有庭审经验的辩护律师,但最终却没有成功。同时,他开始着手帮奥本海默撰写针对起诉书的回复。随着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加里森成为了奥本海默的首席辩护律师。包括加里森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意识到,因为缺乏庭审经验,他并不是最理想的人选。

奥本海默听证会即将举行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华盛顿。1954年1月2日,基蒂试着打电话给迪安·艾奇逊,想问他"事情怎么样了",但是没有成功。

而这些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监听到了。万尼瓦尔·布什在斯特劳斯的办公室正视这位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并告诉他,他反对奥本海默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城"了。布什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这是个"巨大的不公",如果他继续进行此案,"斯特劳斯自己最终必然会受到攻击"。斯特劳斯愤怒地回答说,他"一点都不在乎",不会因这样的建议而"就范"。

斯特劳斯后来描述自己遭受了围攻,而实际上他清楚自己是占优势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每天都向他提供奥本海默的行动和与律师间谈话的摘要,这样他就能参与到奥本海默所有的法律策略当中。他知道,奥本海默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有一些奥本海默的律师看不到的信息,因为他能够确保他们不会被赋予必要的安全许可,而且听证委员会的成员将由他来选择。1月16日,加里森为自己和赫伯特·马克斯申请安全许可,而斯特劳斯则以拒绝马克斯——原子能委员会的前律师——的安全许可作为回复。加里森是否能及时进行忠诚调查事关他对此案的准备,这是个公开的问题,但他坚守立场:要么给整个辩护团队安全许可,要么就一个都不要。他不会想到,这是个很快就会令他后悔且无法撤回的决定。

然而在3月下旬,加里森得知,听证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将用一周时间来研究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奥本海默调查的原材料,更糟的是,原子能委员会的"检控"律师将在委员会成员查阅美国联邦调查局档案的过程中,就美国联邦调查局档案中的负面条款予以指导并解答问题。加里森有一种"沮丧感":一周的时间埋头于卷宗会使委员会成员对他的委托人产生偏见,但当他提出和对方享有同样权利并出席长达一周的简报会时,却被断然拒绝了。同时,加里森尝试为自己争取一个紧急安全许可,以期至少能读到一部分相同的材料,但斯特劳斯告诉司法部:"我们绝不同意任何紧急安全许可。"在斯特劳斯看来,奥本海默和他的律师都不具备法庭赋予原告的那些权利,因为这是场原子能委员会的人事安全委员会听证会,而不是民事审判,斯特劳斯正是要充当规则仲裁人的角色。

斯特劳斯所做的事对奥本海默的辩护甚为不利,他并不为那些事的违宪本质感到不安。他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窃听电话的行为是违法的,但他并不在意,他曾对一名探员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的技术覆盖对原子能委员会非常有利,这样原子能委员会就能提前得知他的下一步动作。"哈罗德·格林对这种伎俩很反感,并告诉斯特劳斯,"这件案子与其说是起诉不如说是调查,他不愿再与此事有任何关系",他要求撤出此案。

有一天,罗伯特在华盛顿拜访巴彻家时,他告诉他们觉得自己正被监视。"他进了房间,"简·巴彻回忆道,"第一件事就是把画都拿起来并检查录音装置在哪里。"有一天晚上,他把一幅挂在墙上的画拿下来,说道:"在那儿!"巴彻说监视把奥本海默"吓坏了"。

当一名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鉴于这会泄露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而建议停止对奥本海默家的监视时,胡佛拒绝了。

斯特劳斯把他停止奥本海默对原子能委员会的影响升级为一场为了美国未来的运动。他告诉原子能委员会的总法律顾问威廉·米歇尔:"此案若失败了,原子能项目……将落入'左翼分子'之手,若真是这样,那将意味着另一个珍珠港事件……若奥本海默被清除了,那么以后就可以没有任何顾虑地清除'任何人'了。"斯特劳斯辩解说,国家安危遭受威胁之时,通常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可以暂时丢在一边。斯特劳斯认为,除非让奥本海默的名声染上污点,否则仅仅提供奥本海默作为前签约顾问与原子能委员会联系的证据是不够的,因为他会用他的声望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武器政策进行言论批判。为排除这种可能,斯特劳斯精心策划了一场"明星级阵容"的听证会,来与奥本海默的声望相抗衡,以确保听证委员不受其影响。

1月底,斯特劳斯选了罗杰·罗布来主管奥本海默案。此人46岁,家住华盛顿,具有七年美国副司法部长的检诉经验,擅长激烈盘问,是个名副其实的进攻性庭审律师。斯特劳斯一直以来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有着"亲密接触",并与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极其合作",所以,斯特劳斯能在短短八天内就给他安排了安全许可也就不足为奇了。

罗布在二三月间为听证会作准备时,斯特劳斯给他送来了自己整理的材料,那是从奥本海默的档案里弄出来的,罗布在对付可能的辩方证人的证词时能用得上。"布拉德伯里博士作证时……拉比博士作证时……格罗夫斯将军作证时……"斯特劳斯给罗布提供了在各种情况下需要用到的各种文件,他认为,这些一定能削弱证人为奥本海默辩护的证词。

选好了起诉人,斯特劳斯开始把精力转向选择法官上。他需要三个人来组成原子能委员会的忠诚调查委员会,他在那些必须是在奥本海默过去的左翼联系一旦被揭露就会对他的正直产生怀疑的人中寻找他的候选人。2月底,他最终选定戈登·格雷来主持委员会。格雷曾在杜鲁门政府中担任陆军部部长,时任北卡罗来纳大学校长。作为格雷的老朋友,斯特劳斯知道他是个曾在1952年大选中给艾森豪威尔投票的保守的民主党人。

接着,斯特劳斯选了另一位保守的民主党人——斯佩里公司的总裁托马斯·摩根。至于第三名成员,斯特劳斯选了保守的共和党人沃德·埃文斯博士。埃文斯的两项主要资历是他的科学背景——他是罗约拉大学和西北大学化学系的名誉教授,以及他有投票否决前原子能委员会听证委员会忠诚调查的清白记录。格雷、摩根和埃文斯都对奥本海默的过去一无所知,而他们看了他的安全档案后一定会大吃一惊。在斯特劳斯看来,他们是完美的"空容器"。

1月的一天,《纽约时报》驻华盛顿的总编辑詹姆斯·赖斯顿,正巧也登上了奥本海默搭乘的去往华盛顿的班机,他们相邻而坐并聊了起来。赖斯顿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奥本海默看起来"在我面前莫名其妙地紧张,而且明显带有压力"。赖斯顿开始给华盛顿各处打电话问"奥本海默最近怎么了?"很快,他数次给奥本海默打电话的尝试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窃听到了。

对于自己的安全许可被中止即将成为街头巷议的事实,奥本海默"很是恼火"。当他最终接到赖斯顿的电话时,赖斯顿告诉他一条听说的传言:他的安全许可已被中止,而且原子能委员会正在调查他。赖斯顿还说他将刊登此事,而奥本海默表示无可奉告,并让他去与自己的律师谈谈。赖斯顿在1月底见了加里森,两人达成了共识:既然事情早晚要公开,加里森同意给赖斯顿一份原子能委员会的起诉书和奥本海默准备的回复的复本,作为交换,赖斯顿同意直到消息快要传开时才刊登此事。

奥本海默的辩护准备成了一次漫长的煎熬。在大多数的日子里,他和加里森一起待在他富尔德大楼的办公室里,马克斯和其他律师则忙着起草他的陈词并讨论案件细节。每晚五点,他离开办公室,穿过田野回到奥尔登庄园,律师们通常会跟他到家里,他们还要工作至更晚。"那些日子真是很紧张。"他的秘书回忆说,而罗伯特却看似很平静。"他就好像没事一样,"弗娜·霍布森说,"他具有那种从结核病中康复的人才有的惊人毅力。尽管他瘦得皮包骨头,但他很坚强。"

奥本海默"极其努力地"准备原子能委员会起诉书的回复。霍布森回忆道,那是一份"一改再改、改了又改的草稿,也是一次尽可能清楚而真实的痛苦尝试。我已记不清他投入了多少时间"。

在他的朋友们看来,奥本海默则颇为心烦意乱,还有点令人无法理解的

消极。有一天，弗娜·霍布森在听律师们讨论法律策略时失去了耐心，并开始催促罗伯特。“我觉得罗伯特没有尽力斗争，”她回忆说，“我认为劳埃德·加里森太过绅士了，我很生气，我觉得我们应该出去作战。”

当律师们讨论时，霍布森经常是在场的，因此她熟知内情，在她看来，律师们对他们的委托人没起到帮助作用。“我看这整件事明显就是胡闹。”她说。霍布森“实在不敢”在律师团面前说她的想法，“但我一直在他面前抱怨”。最终，奥本海默把她带到一边，站在奥尔登庄园的后台阶上对她说：“弗娜，我知道怎样做，也知道什么对我是最有利的，而且我正在尽最大努力朝这个方向靠拢。”

霍布森并不是唯一感到加里森不够激进的人，基蒂也对律师团的整体工作方向也甚为不满。她是个斗士。二十年前她还年轻时，就曾站在俄亥俄州扬斯顿的工厂门口派发共产党的宣传材料。现在，也许是此生第一次，这次经历将考验她所有的精力、坚韧和智力。毕竟，她过去的经历是对她丈夫指控的一部分，她也很有可能要去作证。这对她和他都将是一次痛苦的经历。

在某个周六中午，完成了整个上午对起诉书回复的工作后，奥本海默在霍布森的陪伴下走出了办公室。“我正要开车送他回家。”霍布森回忆道。不过他们刚走到停车场时，爱因斯坦突然出现了，奥本海默上前和他聊了起来。两个人谈话时霍布森就坐在车里等着。过了一会儿，奥本海默转身对她说：“爱因斯坦认为他们对我的攻击太猖獗了，我应该辞职。”或许是想到了自己在纳粹德国的经历，爱因斯坦认为，奥本海默“没有义务使自己成为这场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他已为国家作了很大的贡献，如果这就是她（美国）所给的回报，那他就该转身离她而去”。霍布森清晰地记得奥本海默的反应：“爱因斯坦不理解。”在纳粹势力蔓延之际，爱因斯坦逃离了家乡，并且拒绝再次踏足德国，但奥本海默不能背叛美国。“他对美国的爱，”霍布森后来坚持这么认为，“正如他对科学的爱一般深。”

爱因斯坦走向他富尔德大楼的办公室，朝着奥本海默的方向点点头，对他的助手说：“真是个傻瓜。”

爱因斯坦的直觉是对的——时间会证明奥本海默是错的。“奥本海默不像我，我像个吉普赛人，”爱因斯坦向密友约翰娜·凡托瓦说，“我天生有张大象皮，谁都伤害不了我。”他认为奥本海默显然是个很容易受到伤害和恐吓的人。

1954年3月5日,奥本海默用自传形式完成的起诉书的回复被寄送到了原子能委员会,打印出来共四十二页。

4月3日,罗伯特给老情人鲁思·托尔曼打电话,告诉了她将要发生的事,这是数月来他们的首次谈话。“听到你的声音真是好极了,”托尔曼在一封给他的信中写道,“我以为你太烦躁和迷惑以致没法写信……我一直思念着你,亲爱的,当然,我也很为你担心……哦,罗伯特,罗伯特,为什么我们总是那么深切地想要帮助对方,却又总是无能为力。”

几天后,奥本海默夫妇坐火车把皮特和托尼送到了老朋友亨佩尔曼家。在听证会期间,孩子们会待在纽约的罗切斯特。就在罗伯特和基蒂去华盛顿前,罗伯特收到了老朋友维克托·韦斯科普夫的一封信。他已闻悉罗伯特的困境并写信表示支持和鼓励:“我想让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你在奋战,而我们也都在此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不知为什么,命运选择了你来承受这一切重担……在你身上体现了我们的生存之道和处世哲学,而在这个国家无人能比你更有资格代表这些品德。当你情绪低落时请想想我们……我恳求你一如既往地做原本的自己,这一切都会圆满地结束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解。

34 | “恐怕这就是件蠢事”

“整个过程从一开始就被扭曲了。”

——艾伦·埃克

奥本海默的辩护团队

刘易斯·斯特劳斯非常急切地期盼望着安全委员会的诉讼。一方面，他确实很害怕猎物会逃往国外。斯特劳斯希望奥本海默的护照被没收，于是预先通知司法部门，“他在原子能委员会即将起诉时叛逃将是非常不幸的事”。另一方面，他也担心麦卡锡参议员会来干扰他的计划。4月6日，麦卡锡在反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评论员爱德华·默罗对他的攻击时公开指责说，美国的氢弹计划是被蓄意破坏的，很明显，这是个真正的威胁。

于是，当听证会周一——1954年4月12日——在T-3号楼开始时，斯特劳斯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是幢破烂的二层临时建筑，建于战时，位于靠近第十六街的华盛顿纪念碑和国会的林荫处。原子能委员会的调查局局长在此办公。这幢建筑的2022房间被用作了审讯室。在阴暗的长方形房间的一端是三名安全委员会成员——主席戈登·格雷和他的两名同事沃德·埃文斯和托马斯·摩根——坐在一张大红木桌后，桌上堆满了黑色的活页夹，里面装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保密文件。加里森的一名助手艾伦·埃克回忆道，当罗伯特的律师们看到安全委员会的每位成员面前都放着那些装订好的书时都非常惊讶。“这是那天令人震惊的地方，”埃克回忆说，“也是案件中令人震惊的地方，因为对法律制度的传统概念是非常清楚的，法官面前无非是放置一些控辩双方的公开资料……他们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我们没有复本，我们没有机会质疑文件里的内容……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从一开始就被扭曲了。”

双方律师在两张摆成“T”字形的桌子的两边相对而坐。一边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律师罗杰·罗布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事务副主管小卡尔·阿瑟·罗兰德。与他们相视而坐的是奥本海默的辩护团队:劳埃德·加里森,赫伯特· 马克斯、塞缪尔·西尔夫曼和艾伦·埃克。在“T”字的底部,放了把单人木椅,供被告或者其他证人面对法官而坐。奥本海默不作证时,他就坐在证人后面靠墙的皮沙发上。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奥本海默将在证人椅上坐上二十七个小时,而更多的时间则是痛苦地坐在沙发上受着煎熬,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整个房间弥漫着他胡桃雪茄烟的气味。

就在那天早上,奥本海默和他的律师迟到了将近一个小时。几天前,基蒂又出了点事情。她摔下了楼梯,腿上打了石膏。她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到沙发前,坐了下来,与她丈夫共同等待诉讼的开始。罗伯特看起来很沉郁,而且好像几乎要向命运屈服了。“我们制造了一个相当尴尬的局面 。”安全委员会对奥本海默及其律师们的迟到“煞是恼火”。加里森对他们的迟到道了歉。他说他们迟到是为了躲开媒体,暗指媒体已开始介入此事。

格雷一上午都在大声朗读原子能委员会的“起诉书”和奥本海默的回复。在接下来的三周半的时间里,格雷一直坚称诉讼是一次“调查”,而不是审判,但每个听了原子能委员会起诉书的人都会认为,罗伯特·奥本海默是在受审。他被诉的罪名包括:加入多个共产党的前线组织;与诸如托马斯· 阿迪斯博士、肯尼思·梅、史蒂夫· 纳尔逊和伊萨克·弗克福等“公认的”共产党有联系;对在原子弹项目中雇用诸如约瑟夫·温伯格、大卫 ·博姆、罗西·洛马尼茨(全是奥本海默以前的学生)以及大卫· 霍金斯等公认的共产党负有责任;每月向旧金山共产党捐助一百五十美元;另外,也许是最糟的,没有及时报告他与哈康·希瓦利埃在 1943 年初关于乔治· 埃尔滕顿的提议的谈话,埃尔滕顿提议向旧金山的苏联领事馆透露关于放射实验室的信息。

奥本海默在回复中承认他与塔特洛克、阿迪斯以及其他左翼分子的友谊,但他否认这些关系有任何罪恶的成分。“我喜欢结交新朋友的感觉。”他谈到那些关系时说。他诚实地坦白了在 30 年代他曾是个共产党的同路人,也承认他通过共产党对很多不同的事业进行过经济资助。至于希瓦利埃事件,奥本海默承认希瓦利埃曾向他讲过埃尔滕顿的建议:“我说了些挺重的话,大意是说,我要是那样做将是大错特错。讨论就此结束。我们的长期友谊让我相信希瓦利埃不可能再刺探情报,我也能确定他对我涉及的工作一无所知。”至于没能及时报告此次对话,奥本海默承认他应该立即就报告的,但

他指出曾向一位安全官员主动汇报了埃尔滕顿的情报——他还说“如果没有我的报告”这件事将永不为人所知。

总的来说,奥本海默的回答看起来是可信的。如果从他一生来看,起诉中所涉及的行为对一个20世纪30年代献身于种族平等、消费者保护、工会权益和言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者来说是再寻常不过的。而在原子能委员会的起诉中有一项指控声称:“有报告指出,1942年至1945年间,包括汉娜·彼得斯博士(共产党加州阿拉米达地区的组织者)、伯纳多德·戴尔(共产党加州阿拉米达地区的书记),以及史蒂夫·纳尔逊、大卫·阿德尔森、保罗·平斯基、杰克·曼利和卡特琳娜·桑多都曾有声明表示,你在那时是共产党员;你在当时不应在共产党内太活跃;你的名字应从共产党的邮寄名单中删去并不再被提及;你在此期间曾和共产党员们谈论过原子弹的问题;1945年的数年前,你曾告诉史蒂夫·纳尔逊,军队正在研究原子弹。”

这些具体指控的来源是什么?这些人没有和当局谈过话,纳尔逊和其他人被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话时总是拒绝提及名字。显然,这些指控是基于那些堆在安全委员会法官面前桌上的黑活页夹里的那些资料,那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窃听记录。这些未受评估的记录材料在正式法庭上是不会被采纳与接受的,而在格雷委员会的“调查”中却被泰然使用。安全委员会的三位成员都看过美国联邦调查局对这些十年前对话的摘要——而奥本海默的律师却不被允许参阅,所以他们也就不能质疑其中的内容了。

加里森和马克斯应该意识到,这项共产党内秘密党员身份的指控使进行辩护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奥本海默否认了指控。“你的信,”他写道,“陈述了1942年至1945年间据说是共产党官员的人的声明,大意是说我是名共产党的秘密党员。我所知道的是,我从没加入过共产党,无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在正式法庭中,这样的证据是不可接受的,并会作为一个双重传闻——第三方叙述他们从别处听说关于被告的事——而被驳回,但在这场“调查”中,奥本海默的法官们则认为这些是有效的。

他们甚至暗中操纵活页夹中的一些信息,使之对奥本海默更为不利。一项关键指控的来源是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迪克森·希尔和西尔维娅·希尔,他们渗入过共产党在加州蒙特克莱尔的分支。1945年11月,这对夫妇走进旧金山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办公室,报告他们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参加过一次共产党的会议。西尔维娅·希尔说,她听到过一位共产党官员杰克·曼利提到奥本海默是“我们的一员”。然而,希尔的情报无法支持原子能

委员会对奥本海默是共产党员的指控，因为她当时不确定“我们的一员”指的是共产党员还是同情共产党的人。但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摘要中，这一层意思却没有了。

读完起诉书和奥本海默的回复后，格雷主席问奥本海默是否愿意“在作证前发誓”。奥本海默表示愿意，格雷让他发誓在法庭上说真话。调查开始了。奥本海默下午的其余时间都是坐在证人席上，由他的辩护律师温和地向他提问。

第二天早上，1954 年 4 月 13 日，星期二，《纽约时报》曝光了此事，在头版刊登了詹姆斯·赖斯顿撰写的独家报道。题目是：

奥本海默博士被原子能委员会中止安全许可；
科学家对录音辩护；
听证会开始；
核专家因被指控是共产党员而无法接触机密资料

报纸发表了尼古拉斯将军的信和奥本海默回复的全文。赖斯顿的报道立刻被国内外各家报纸转载刊登，数百万读者首次得知了奥本海默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细节。

格雷主席对赖斯顿的报道很恼怒，他对加里森说：“你说你们昨天迟到是为了躲避媒体。”加里森解释说，赖斯顿在 1 月中旬就已经知道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被中止的事。但格雷对此置之不理，就他何时将原子能委员会起诉书的复本给记者的事对加里森进行严厉盘问。奥本海默插嘴说：“这些文件是我的辩护律师在周五晚上给赖斯顿先生的，我认为……”而这更增加了格雷的愤怒：“也就是说，你们昨天早上在这里说为了躲避媒体时就知道《纽约时报》已经掌握了这些文件？”

“我们当然知道。”奥本海默回答说。

格雷显然被奥本海默和他的律师激怒了，他怪罪他们把文件泄露出去，而他永远不会知道其实他应该将怒气指向刘易斯·斯特劳斯。这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一开始就知道赖斯顿给奥本海默打电话的事，而且正是他——不是加里森——同意《纽约时报》发表此文的。因为担心麦卡锡参议员会首先

发布消息,斯特劳斯觉得是时候让故事面世了——尤其是如果能将泄露的罪名推到奥本海默的律师头上。艾森豪威尔的媒体秘书詹姆斯·哈格蒂同意这么做。于是在4月9日,斯特劳斯找来《纽约时报》的出版人阿瑟·苏兹伯格,告诉他可以不用像他们事先说好的那样再保密了,可以公布此事了。

斯特劳斯也害怕这种情况:现在整件案子"处在媒体的审判之下",一场冗长的听证会将对奥本海默有利。他估计,听证会拖得越长,奥本海默的盟友们就有越长的时间在科学界作"宣传"。必须要速战速决,于是在那个星期的晚些时候,他给罗布带了口信,敦促他加快听证会的进程。

4月14日,星期三,听证会的第三天,奥本海默一早就在证人席上开始回答加里森提出的关于他弟弟弗兰克的问题。原子能委员会的起诉书中包含这样的语句:"在这件事情上,哈康·希瓦利埃是直接来找你的,或是通过你弟弟弗兰克·弗里德曼·奥本海默间接接近你的。"所以,当加里森问他弗兰克是否与希瓦利埃对他的接近有关时,他回答说:"我对此很清楚,我记性很好,我确信自己不会记错,他与此毫无关系。我可以说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因为希瓦利埃是我的朋友。我不是说我弟弟不认识他,不过这样也太拐弯抹角了,也很不正常。"这话非常有道理,但斯特劳斯、罗布和尼古拉斯认为这是说谎,而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坚称,奥本海默对听证委员会说了谎。

加里森对奥本海默的直接审查所得出的结论与审判刚开始时是一样的:奥本海默和他的律师都相信事情会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当罗布开始他的盘问时,他们的好梦开始破灭,他明显精心策划了战略。经过埋头于美国联邦调查局卷宗的那两个月,他已作好充分准备。"我曾被告知盘问奥本海默不会有任何进展,"罗布后来说,"他反应又快又狡猾。于是我说,'也许是吧,但那是他以前没被我盘问过。无论如何,我坐下来并且开始非常认真地准备我的盘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使我很有信心。我的理论是,如果我能在一开始就动摇奥本海默,那他之后就会容易多说话。'"

4月14日,星期三,这天也许是奥本海默一生中最耻辱的一天。罗布无情而犀利的盘问是奥本海默从未经历过的,也毫无准备。罗布一开始就企图引导奥本海默承认,他与共产党的紧密联系是"与一项秘密战争计划相矛盾的"。于是,罗布问了他前共产党员的事。罗布问,像这样一个人进行一项秘

密战争计划是否合适?

“你是说现在还是过去?”奥本海默反问道。

“先问你现在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回到过去。”罗布答道。

“我觉得这要看人的性格以及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是否是个诚实的人。”

“那你在 1941,1942 和 1943 年间的看法呢?”

“你指的是什么?”

“你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1941,1942 和 1943 年间你如何使自己确信一名前共产党员不再是危险的?”

“我说过,我不知道谁是前共产党员。就我妻子的情况来说,很明显她不再是危险的。就我弟弟来说,我对他的正直坦率有信心,我也相信他对我的忠诚。”

“就以你弟弟为例,你是通过什么来证明他对你的忠心的?”

“兄弟之间无需证明,至少我不会。”

罗布有双重意图:第一,找出奥本海默与那些他和他的律师们不被允许接触的文字材料的矛盾之处;第二,把奥本海默承认的事置于这样一个背景下,即罗伯特不负责任地指挥洛斯阿拉莫斯,或者至少是他曾在知情的情况下有意雇用共产党的。罗布的目的总是想使证人蒙羞,这经常是通过仅仅让他重复他已承认的事实来实现的。

在准备听证会的过程中,罗布看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档案中关于奥本海默于 1943 年与鲍里斯·帕什上校面谈时的很多参考资料。档案显示,此次会见有录音记录。“那些录音在哪?”罗布问道。美国联邦调查局立马找出了十年前的旧磁带,罗布随即便听了奥本海默对希瓦利埃事件的第一次描述。这次的叙述与他在 1946 年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内容截然不同,很明显,奥本海默在其中的一次说了谎。于是,罗布准备在他的互相矛盾上做文章。奥本海默当然不知道他与帕什的谈话被录了音,因此当罗布转向希瓦利埃事件时,他知道的细节比奥本海默能回忆起的多多了。

罗布一开始就提醒奥本海默关于他 1943 年 8 月 25 日在伯克利与约翰逊中尉的谈话。

“对,我想我无非是说埃尔滕顿挺让人担心的。”奥本海默说。

“是的。”罗布答道。

奥本海默接着说:“之后我被问到为什么这么说,于是我编了个天方夜谭

式的故事。”

这样的坦白让人吃惊，不过罗布仍保持平静，然后把重点放在了奥本海默于次日即8月26日与鲍里斯·帕什上校谈话的内容上。

“你告诉帕什真相了吗?”罗布问道。

“没有。”

“你对他撒了什么谎?”

“我对他说，埃尔滕顿曾试图通过接近计划成员中的三个人。”

过了一会儿，罗布问道：“你有没有告诉帕什 X(希瓦利埃)曾接近计划中的三个人?”

“我说不清我是说了有三个 X 还是说了 X 接近了三个人。”

“你不是说 X 接近了三个人吗?”

“可能吧。”

“你为什么那么做，博士?”

“因为我是个白痴。”

“白痴?”奥本海默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在罗布看来，奥本海默正处于一种痛苦、忧郁的状态中。这位聪明的检察官猜得没错，的确是这样。听证会结束后，罗布向一个记者戏剧性地描述这一刻，说奥本海默说这话的时候，“蜷着身子，双手紧握，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我很难受。那天晚上我回家后告诉我太太，‘我刚刚看到了一个毁灭自己的人’”。

这种描述简直是胡说，只是罗布为了提升自己的庭审形象而进行的宣传(我对此感到恶心)。罗布和斯特劳斯很聪明地操纵了奥本海默听证会后的舆论导向：记者和历史学家至此为止已经接受了罗布对这一刻的阐释。但与罗布所述相悖的是，奥本海默的那句“我是个白痴”，只是用来消除希瓦利埃事件中有分歧的地方，这样一来，罗布就可以说奥本海默在“X 科学家”是否曾接近了三个人的事情上并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罗伯特清楚，所有人都知道他不是个笨蛋。他用了自我嘲讽的口语式词语来消除盘问者的敌意，然而，没过几分钟他就明白了，他没能消除任何人的敌意——他正面对一个旨在摧毁他的对手。

罗布只是刚刚开始，而奥本海默已承认了他在说谎。现在，罗布则要拿出证据与他对质，并且用令人痛苦的细节来夸大他的谎言。罗布抽出一份帕什上校与奥本海默在1943年8月26日碰面的记录，说：“博士，我将给你读几段那次面谈记录中的摘录。”随后，他读了十一年前记录的一部分。奥本海默

在其中声称,领事馆里有人已准备好“不会有泄漏和丑闻危险”地去传送情报。

当罗布问他是否记得对帕什说了此事时,奥本海默说他当然不记得了。“你否认你说过这话吗?”罗布问。当然,意识到罗布手中有记录,奥本海默回答说:“不。”

罗布演戏似的大声说道:“博士,关于你的信息,我想说我们有你讲话的录音。”

“当然。”奥本回答道。他又接着说,他确定在谈埃尔滕顿的主意时没有提到苏联领事馆的人,但他把这一细节透漏给帕什上校时说了曾有“数人”——而不是一个人——接近过科学家们。

罗布问:“于是你具体而又详细地告诉他与数人有联系?”

“是的。”

“而你现在证明那是个谎言?”

“是的。”

罗布继续读1943年的记录,“当然,”奥本海默对帕什说,“实际上这是叛国,因为这是不应该发生的。”

“你说过吗?”罗布问。

“当然。我的意思是我不记得那次谈话了,但我接受这些话。”

“你根本不觉得那是叛国,对吗?”

“那当然是叛国。”

罗布再次引用记录材料,读道:“但交流不应是那种方式,那几乎是政府实行政策的方式。交流的方式不应是安排和埃尔滕顿面谈。他和一个使馆的人有很好的关系,那人非常可靠,有丰富的微胶摄像机等其他方面的经验。”

“你有没有告诉帕什上校,”罗布问道,“有人曾向你提及微胶摄像?”

“当然有。”

“那是真的吗?”

“不是。”

“然后帕什对你说,‘好吧,让我们回到原来的地方你提到的这两个人,他们现在和你一起都在洛斯阿拉莫斯。他们是直接和埃尔滕顿联系的吗?’你回答说‘不’。帕什接着又说‘通过第三方?’,你说‘是的’。”

“也就是说,”罗布总结道,“你告诉帕什是X(希瓦利埃)来做联系工作

的,对吗?"

"好像是吧。"

"难道不是吗?"

"是的。这件事除了埃尔滕顿这个名字,其他都纯粹是编造的。"

由于他的当事人此刻表现出真切的局促不安,加里森最终还是打断了让人饱受折磨的盘问,并问格雷:"主席先生,我能就这一点提出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格雷答道。

加里森谦逊地提出是否可以以这样一种恰当的方式来促进审判,即当辩护律师宣读证词时,我们每个人也可以有一份抄本,当然,这在法庭上是很传统的做法。

经过讨论后,格雷和罗布同意,可能在今天晚些时候负责机密的官员会对档案的公开化做出决定——当然罗布已经有选择地读过证词了。

加里森的这一干涉有些太晚了,对解救他正饱受煎熬的当事人几乎没有什么帮助。

罗布很快又饶有兴致地回到了引用帕什和奥本海默的证词。"奥本海默博士,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在详细地讲述一个虚构的故事?"

"的确如此。"奥本海默答道。

罗布继续问道:"假如你讲述的是一个荒唐的故事,那为什么你能够如此深入知道这么真切的细节呢?"

"我害怕整件事就是一个错误,我担心我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领事,为什么会有微缩胶片,为什么这项工程会有三个人,而且两个人在洛斯阿拉莫斯。所有这些对我来说好像都不是真实的。"

"假如你告诉帕什上校的故事是真的话,事情看起来好像对希瓦利埃先生很不利,我想你会同意我的观点,对吗?"

奥本海默回答道:"是对每个涉入这件事的人,先生。"

"包括你?"罗布问道。

"对。"

"难道今天的陈述不是真的吗?奥本海默博士?根据你现在的证词,你已经不止一次向帕什上校撒谎了,而整件事就是荒唐的,是连篇的谎话!"

奥本海默感到自己已经被逼入绝境,显得惊慌失措,失神地回答道:"是的。"

罗布如此尖刻无情的问题将罗伯特逼到了绝境,他没有去回忆那次与帕

什的谈话以充分回应罗布。于是,他接受了折磨他的那个人精心挑选出来的谈话记录。加里森曾是一位有经验的辩护律师,早前他很坚定地认为,他的当事人在浏览一遍和帕什对话的记录前不会对那次对话做出更进一步的回答。他早该反对罗布对奥本海默设下的圈套,但是加里森却对谈话未提出任何异议,而奥本海默则坦然地走进了圈套。

其实,奥本海默也不需要这么早就屈服退让,对于他告诉帕什的令人费解的故事是有一个解释的,它远远不及罗布为了耍花招使他接受的解释那样具有诽谤性。回想 1946 年埃尔滕顿曾告知美国联邦调查局,苏联领事馆的彼得·伊万诺夫最初建议他联系和伯克利的放射实验室有关联的三位科学家:奥本海默、欧内斯特·劳伦斯和路易斯· 阿尔瓦雷茨。埃尔滕顿仅仅是认识奥本海默,并且还不足以向他寻求与俄国人共享信息。但似乎很有可能的是,假设埃尔滕顿在希瓦利埃面前提到了这三个人,而后希瓦利埃恰好又在奥本海默面前特别提到了他们,或者至少表明埃尔滕顿无意中提到了其他两个人。

因此在给帕什叙述他所指的关于埃尔滕顿的事情的时候,奥本海默提到了这三位科学家。关于奥本海默讲述的这个荒诞故事的所有解释中,这个解释是最有意义的,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证据显示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很明显,原子能委员会的官方历史学家理查德·休利特和杰克·霍尔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奥本海默的故事尽管起到误导作用,但是真真切切地达到了效果。然而不幸的是,之后就变得曲曲折折令人费解了。"

为什么呢?

最令人信服的答案来自结案前奥本海默本人的解释。他的解释不仅符合大家所关注的公认的事实,同时也符合他的性格,尤其如他五年前在大卫·博姆面前忏悔的那样:他倾向于在事情进展很快的时候说出不理智的话。针对格雷主席质疑他在 1943 年是否将事实告诉了帕什和兰斯代尔,以及希瓦利埃事件的真实性问题,奥本海默做出了回应:

> 我告诉帕什的故事不是真的,涉及这个工程中的没有其他人,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 我当时是在洛斯阿拉莫斯,但绝不包括其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人,也不包括在伯克利的人……我可以作证,希瓦利埃并没有提到苏联领事。这都是我真切的回忆。我能够知道埃尔滕顿与领事的联系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我相信我能做的只有依情况讲出故事的

细节，而在这其中由我所引出的越来越详细的细节则是不真实的故事。而今，当你要我找出比我这个傻瓜更有说服力的论据来解释为什么我要做这些时，我就会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被两种利害关系所驱动，一种就是我的感觉，我必须弄清楚事实是否向兰斯代尔说的那样。这件事有没有涉及到放射实验室。如果有，那么埃尔滕顿是最有可能是卷入其中的人。我的叙述使整个事件变得严重了还是轻松了，我不知道。但我不会说出这个简单的事实，即希瓦利埃和我说过这件事。没有其他人涉入其中，与希瓦利埃的谈话也是简短的。从他的口气中我知道，他并不想参与到这件事情中去。

奥本海默继续详述道：

我本该立即并且完完全全、准准确确地告诉他这个故事的，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矛盾，而且我习惯给那些聪明的人一些提示而不讲述整个故事。当他们要求我详尽地叙述时，我起错了头……那种认为希瓦利埃会和很多参与计划的人聊天的想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这个任务中，他不像也不可能是中间人……这里面没有阴谋。但我确实向格罗夫斯将军证明了希瓦利埃，我告诉他这儿确实没有三个人，事情发生在我的家里，并且是针对我的。因此，当我编造了这样一个糟糕的故事时，不想揭穿谁是中间人的意图就显而易见了。

接下来，罗布转向的话题必定是用来羞辱罗伯特的，也就是关于他与简·塔特洛克的爱情故事。

“如我所了解到的，在1939年至1944年间，你与塔特洛克小姐的相识是非常偶然的，是吗？”罗布问道。

奥本海默回答道：“我们的见面是很少的，我不知道说我们的相识是偶然的是否恰当。从见面起，我们彼此就融入了对方的世界，这种感觉一直持续着。”

“那在1939年至1944年间你们一共见了多少次面呢？”

“总共五年时间，十次总该够了吧？”

“那你为什么必须要见她呢？”

“在我们离开之前，她表示很想见我，那个时候我不能去。我不能说出我

要去哪里、去做什么。我觉得她必须见我是因为她正在接受精神治疗，看起来极其不开心。”

“那你能找出她为什么必须见你的理由吗？”

“因为她还爱着我。”

“你们在哪里见面的？”

“在她家里。”

“在哪里？”

“在电报山。”

“在那之后你什么时候再见到她的？”

“她带我去了机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那是在 1943 年吗？”

“是的。”

“她那时还是共产党员吗？”

“我们甚至都还没有谈论过这个话题。”

“你在你的回答中曾经说过你知道她是共产党员。”

“是的，我是在 1937 年的秋天知道的。”

“有什么理由能够让人相信她在 1943 年的时候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

“没有。”

“什么？”

“除了我大致陈述的关于我的想法以及想到的她与共产党的关系，其他就没有了，我也不知道她在 1943 年做了些什么。”

“你没有理由证明她不是共产党员，对吗？”

“是的。”

“你与她一起过夜了，是吗？”

“是的。”

“你觉得这安全吗？”

“事实上的确如此。不用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行为。”

“你有没有想过她如果像你在这里所描述的或者如你早晨所谈及的那样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话，会使你处于一个相当艰难的境地呢？”

“但她并不是啊！”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了解她。”

对于他和塔特洛克之间长达三年的暧昧关系的证实，可以说是对他和基蒂的婚姻的一种侮辱。在经历了这样的煎熬之后，罗布仍继续让奥本海默列举出他情人的朋友的名字，并且指出他们当中谁是共产党员，谁仅仅是同路人。至于对听证会的目的来说，这样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但却又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问题。当时正是1954年，是麦卡锡时代的顶峰时期，在国会委员会上逼迫人们说出前共产党员、同情共产党的人以及左翼人士的名字恰恰是麦卡锡主义者的政治游戏。在蔑视告密者或者叛徒的文化传统中，这是一件带有羞辱性的行为，而关键是可以摧毁证人的人格。

奥本海默给了罗布名单：托马斯·阿迪斯，他认为他与共产党比较密切，但他不知道他原来是不是党员；希瓦利埃是一个同情共产党的人；肯尼思·梅、约翰·皮特曼、奥布里·格罗斯曼以及伊迪丝都是共产党员。在认识到罗布这种羞辱性的手段后，奥本海默讽刺地问罗布："这个名单够长了吧？"事实上，这份名单是他早就已经得知了的，而罗布对奥本海默的无情的连续打击也付出了他的代价。奥本海默开始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认为在战斗中对于已经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事情，士兵所需要做的，除了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以外就没有时间去思考其他问题了。就像在搏斗中一样，搏斗就是搏斗！我从不考虑自己。"

许多年以后，加里森回忆了在奥本海默饱受折磨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心情："一开始，他有些绝望……我觉得我们在那样的气氛中都会觉得无法喘息，而奥本海默更应该如此了……"

罗布每天都会向斯特劳斯报告听证会上发生的事情。显然，斯特劳斯对于事态的发展很满意。他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信时说："周三的时候，奥本海默的防线被攻破了，并且在立誓后承认他撒谎了……"在欣喜地期待胜利的同时，他兴奋地告知艾森豪威尔："在委员会成员的头脑中已经产生了对奥本海默很坏的印象。"艾森豪威尔从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他的隐居处——发出电报做出了回应，感谢他的"中期报告"。同时，他又告诉斯特劳斯他已经把这个报告烧了，他显然不想为他和斯特劳斯违法操纵忠诚调查留下任何证据。

4月15日，星期四的早晨，审讯进入到第四天，格罗夫斯将军作为证人，宣读了誓词。在加里森的发问下，格罗夫斯赞扬了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

的战时表现，当问到他是否会有意地做出不忠诚的行为时，他说："假如他会这样，我会感到很惊讶……"当被问到希瓦利埃事件时，他强调说："我曾经见过许多版本，我认为我之前并没有糊涂，但我确信今天，我是已经被弄糊涂了……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真的有某种形式上的接触，奥本海默博士肯定会知道的……"

格罗夫斯继续解释道，当他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认为罗伯特的沉默寡言可以用典型的美国高中生的态度来解释，就是出卖自己的朋友是不道德的。对于他告诉我的东西我一直都不是很确信，我只知道他正在做他认为重要的事情。他向我透露有人企图渗入到这个工程中来，还特别提到了伯克利周围的安全环境。我认为他说的就是埃尔滕顿这个人。我总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奥本海默长期地想保护他的朋友，可能是他的弟弟，而他的弟弟可能牵涉其中……

看来，格罗夫斯似乎对两件事情很确定：一是希瓦利埃代表埃尔滕顿曾与罗伯特接触过；第二就是1943年的时候，罗伯特曾说了一些企图使格罗夫斯明白的东西，也就是弗兰克曾迅速地向奥本海默汇报了一些希瓦利埃不太合适的询问。更详细的事件都遗失在历史中了，毕竟格罗夫斯自己也说："我从来都不清楚他（罗伯特）究竟对我说了些什么。"而且，在更早一些的信中他还说："很难说清楚弗兰克和罗伯特究竟参与了多少。"所有的谈话记录和联邦调查局的文件都似乎说明，弗兰克在希瓦利埃事件上既没有和埃尔滕顿接触，也没有和希瓦利埃接触。埃尔滕顿和希瓦利埃在1946年接受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问询、芭芭拉·希瓦利埃尚未出版的回忆录、基蒂对弗娜·霍布森的回忆、弗兰克在1954年1月初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陈述、罗伯特1946年的陈述以及他的总结陈词都显示出，与罗伯特·奥本海默接触的人是哈康·希瓦利埃。

然而，格罗夫斯相信了奥本海默的"故事"，并且承诺对美国联邦调查局隐瞒此事，他发现自己已经妥协了。历史学家格雷格·赫尔肯假设了一个很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斯特劳斯和埃德加·胡佛都在知道格罗夫斯暗示他自己掩饰某些事情之后，要给这位将军施加压力，从而得到奥本海默在安全听证中的反面证供。胡佛的得力助手之一艾伦·贝尔蒙，在写给他的上司的信中曾经暗中建议道："很明显，格罗夫斯似乎在联邦调查局的间谍案上有所保留。他现在甚至在面对当局和供认事实的时候，仍然带着一种羞怯的心理。"

虽然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让他有些窘迫，但他始终无愧于对奥本海默的承

诺,即他不会向当局泄露弗兰克的名字。而且,他为了这个承诺一直在辩解:"格罗夫斯将军在联邦探员的问询中感觉到自己违背了与奥本海默之间的承诺,因为当局对整个事情都已经知晓了。他说他想要留下这段记录,因为奥本海默的朋友总有一天会看到这份文件,并且认为'我最终还是没有保守承诺'。"如果格罗夫斯想过奥本海默是在保护一个间谍的话,他一定早就去联邦调查局了。很明显,他对奥本海默的忠诚充满信心。

当然,斯特劳斯并不这么看,他无视任何能够证明奥本海默无罪的证据。相反,斯特劳斯却找到格罗夫斯,并且要求他在2月来华盛顿进行一次谈话。格罗夫斯知道,到那时他会要求自己为反对奥本海默作证,并且如果他不同意的话,他就会被指控知情不报。

令人吃惊的是,罗布并没有对格罗夫斯关于弗兰克的怀疑穷追到底,这无疑是因为这样做就会将罗伯特描绘成一个给他的弟弟带来失败的人。罗布既没有向格雷透露,也没有向奥本海默的律师透露,关于格罗夫斯承诺不会把弗兰克的名字泄露给美国联邦调查局这件事。这也将公众注意力从罗伯特身上转移。故事的这一部分也将会被列入机密,存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面达二十五年之久。在罗布的交互盘问下,格罗夫斯终于弄明白了,虽然他仍然认为他在1943年给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是正确的,但如今事情可能并不是这么回事了。罗布直截了当地问他:"你现在还会认为他是清白的吗?"格罗夫斯闲扯似的说道:"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要对原子能法案的规定做出我的解释。"在逐字逐句读完之后,他说,法案中详细说明了原子能委员会必须确定,公开保密资料"将不会给公共防御和安全带来危害……","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证明一个人是危险的,而是去想他也许是危险的……"。在此基础上,并考虑了奥本海默过去的社会关系,他继续说道:"如果我是委员会成员的话,那么在今天,在这样解释的基础上,我将不会给他安全许可。"这正是罗布想从格罗夫斯那里得到的或者说是必须要得到的。那为什么格罗夫斯会转而反对奥本海默这个他迄今为止一直矢志不渝地为之辩护的人呢?斯特劳斯知道答案。他以巧妙婉转的方式向这位将军说明了原因,因为他自己确信,如果格罗夫斯不合作的话,他的下场将会很惨。

第二天,即4月16日,星期五,罗布继续他对奥本海默的交互盘问。他严加盘问奥本海默关于他和塞培尔一家、大卫·博姆以及约瑟夫·温伯格的关

系。晚些时候,他又抽空问了这位物理学家关于他在氢弹发展过程中的反对立场。在整整近五天的紧张盘问中,奥本海默经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但是,在他作为证人的最后一天,他还是鼓起了他极敏锐的机智,更加老到地回避着罗布的问题,谨慎小心地防止自己陷入圈套,并且尽力彻底澄清这件事为自己洗脱罪名。

罗布问道:"1950 年 1 月,在总统做出决定之后,你有没有在道德层面上对氢弹的制造发表你的反对意见?"

奥本海默答道:"如果你想要问我或者让我想起与你脑海中出现的对话,那么我想我很可能说过这是多么恐怖的武器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因为我自己对此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

"为什么你说你很可能说过呢?"罗布问道。

"因为我已经认为它是一种很可怕的武器。就算从技术的观点看,这是一项很美好的工作,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种很恐怖的武器。"

"那你是说过了?"

"是的,我会假设我说过。"

"你的意思是,在道德层面上你对这种恐怖的武器抱有厌恶感?"

"太严重了。"

"什么?"

"那太严重了。"

"你是说什么太严重了?是武器还是我的表述?"

"你的表述,我对此表示极大的关注和焦虑。"

"那你是对那种武器怀有道德层面上的厌恶,这样的表述准确吗?"

"把'道德'两个字去掉吧。"

"那你是对此表示厌恶了?"

"怎么能有人不对此表示厌恶呢?我所认识的人都对此表示厌恶。"

当天晚些时候,罗布拿出了一封奥本海默给詹姆斯·科南特的亲笔信,日期是 1949 年 10 月 21 日。这是来自于奥本海默档案里的文件,是去年 12 月美国联邦调查局查抄的。信是写给"亲爱的吉姆叔叔"的,信中向他抱怨道,"两个经验丰富的倡导者已经在工作了,也就是欧内斯特·劳伦斯和爱德华·特勒这两个人",他们正以氢弹的名义到处游说。在这种很容易就被激怒的交流中,罗布问奥本海默:"博士,你难道不认为你信中有些贬低劳伦斯博士和特勒博士吗?"

“劳伦斯博士来到了华盛顿，他没有与委员会进行交流，而是去了国会的联合委员会，并与他们进行了交谈，而且与军事组织的成员也进行了交流。我觉得这种行为倒也配得上那个词。”

“那么你是承认了你在信中贬低这些人了？”

“不，我对他们倡导者的角色表示尊敬。我认为我的那些话有些不太公正。”

“你用‘倡导者’这一称呼，是不是带有嫉妒的色彩？”

“我不知道。”

“当你提到他们两个用这个词的时候，难道没有嫉妒的意味？”

“没有。”

“那你认为他们作为倡导者的工作是值得尊敬的，我说的对吗？”

“我认为他们确实做了一件很值得尊敬的倡导工作。”

到星期五的时候，很明显，罗布和奥本海默都互相厌恶瞧不起对方。“我的直觉告诉我，他空有头脑，但却是一个冷血动物，他有着一双我所见到过的最冷酷无情的眼睛。”罗布说道。奥本海默只觉得对罗布的存在有强烈的厌恶感。有一天在简单休息期间，当奥本海默咳嗽发作的时候，他们俩恰好站在相隔不远的地方。当罗布表示出了他的关心时，奥本海默很愤怒地拒绝了，并且说了一些使得罗布立即转身走开的话。

每天审讯结束后，罗布都会与斯特劳斯进行密谈，并且评估一下当天的事情。他们早已知晓结果会怎样。斯特劳斯告诉联邦调查局，他“确信根据目前的证词，委员会可能采取的行动只有建议取消对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

奥本海默的律师团也有同样的感觉。为了躲避媒体大军的详细追问，奥本海默一家每晚都在伦道夫·保罗在乔治城的家中度过，伦道夫·保罗是加里森的律师搭档。经过一个星期，媒体没有发现他们的住地，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却紧密地监视着那栋房子，并且放出消息说，奥本海默睡得很晚，经常在屋子里踱步。

加里森和马克斯每晚都会花几个小时在保罗家中计划下一步的策略。“我们所需要的能量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很疲倦了。可以想象，罗伯特和基蒂现在都处在一个非常疲惫的境地，但罗伯特会更疲惫一些。”

当奥本海默将这些日子的事情讲给保罗听时，保罗越来越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的不幸听起来更像是在经历一次审判而不是行政听证会。因此在4

月18日复活节那天的晚上,保罗邀请了加里森和马克斯到他的家里与乔·沃尔普一起商量。在饭菜都准备好了之后,奥本海默向这位前任的原子能委员会的总顾问请教道:“乔,我想让他们给你描述一下听证会上所发生的事情。”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马克斯和加里森总结了罗布具有敌对性的策略以及奥本海默每天所受折磨的气氛时,沃尔普越听越感到愤怒。最后,他问奥本海默:“罗伯特,让他们放弃这件事吧,离开这里,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因为我觉得你们不会赢的。”

此前,奥本海默听过爱因斯坦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这一次,这个建议是来自一个经验丰富的、曾经给原子能委员会的听证会写过章程的律师,并且他认为现在无论是这些章程的精神实质或是文字正受到一些无耻的亵渎。即便如此,奥本海默仍然决定只有等待结果而没有其他的选择。这是一种淡泊的并且相当被动的回应,这和当年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被关在夏令营的小冰屋时默默忍受的情形一样,这么多年都没有变。

35 | “国家之盾上的污点”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们错了而且是如此严重的错误。这不仅仅是在对待罗伯特上而且是在怎样对待为社会服务的出类拔萃者的理念上错了……”

——大卫·利林塔尔

奥本海默疲惫懊恼地回到家。他知道事情进展得非常糟糕，但是他除了等待格雷委员会的判决外无能为力。他认为至少要几个星期后才会做出决定。在他头顶上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器听到他告诉他的一个朋友说：“我觉得自己渡不过这个难关，我不相信这个案件在如此对其不利的情况下会轻易得到解决。”几天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说，奥本海默“近况消沉与其妻关系糟糕”。

在等待决定的日子里，他们每天都花几个小时在他们的黑白电视机前看麦卡锡参议员的听证会。这些夸张的节目开始于1954年4月21日，并且一直持续到5月份。这期间，奥本海默正在经受着被审判的痛苦，而且每天都有估计二十万的观众观看此辩论。像其他的美国人一样，奥本海默也被该节目深深地震撼了。但对他来说，这只会让他想起之前痛苦的经历：站在审判席上忍受被审判的折磨。

戈登·格雷认为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在听证程序结束后的第二天，格雷就开始整理文件记录准备作结案陈辞。“我坚信这场听证会的过程已经尽可能地公正公开。在此期间，奥本海默博士和他的律师们是不被允许看联邦调查局和其他一些机密材料的……”格雷承认说：“罗布先生的盘问方式以及他不间断地引用秘密文件的内容也让我稍许感到不快。”但是，最后他为自己辩解说：“如果从整体上看这个案件的话，这对奥本海默先生的利益是没什么危

害的。”

从格雷和他的委员会成员的正式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结果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奥本海默肯定会因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的利益或职责之上”而被判有罪,或者正如格雷在一星期前跟摩根和埃文斯说的那样,奥本海默博士“经常将其个人对局势的判断放在政府和有关部门人士的判断之上”。格雷引用有关希瓦利埃的案件、奥本海默对伯纳德·彼得斯的辩护、有关氢弹的辩论以及在有关原子能应用问题上的立场,来说明对奥本海默判决的公正。摩根和埃文斯赞同他的决定,而且埃文斯还特别强调说:“奥本海默确实因非常糟糕的判断而有罪。”

十天的休会期后,格雷非常吃惊地了解到,埃文斯博士已经起草了一份不支持对奥本海默判决的草案。格雷曾以为埃文斯从一开始就支持对奥本海默的判决。埃文斯曾私下告诉格雷说,以其经验来说,“几乎毫无例外地,这些有着危险背景和利益的人都是犹太人”。坦率地说,格雷认为埃文斯的这种反犹主义态度使他的判断带有偏见。在近一个月的审判过程中,格雷记录道:“我对两个同事的印象是两人都持同一观点。”但是,在埃文斯从芝加哥回来后,“埃文斯彻底地改变了其原有观点”。埃文斯说,他重新回顾了该案件的记录,认为起诉书里没有任何新的东西。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有人找过他。

斯特劳斯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大发雷霆。他和罗布曾窃听奥本海默律师的谈话,他们不让加里森获得安全许可,他们用大量保密文件埋伏式地盘问证人,并从美国联邦调查局道听途说的文件中搜集证据来使格雷对奥本海默产生偏见——他们努力证明奥本海默有罪;但现在结果却相反,奥本海默将被免除指控。

斯特劳斯担心埃文斯可能影响委员会中另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于是他打电话给罗布,他们俩一致认为应该采取行动。在斯特劳斯的授意下,罗布打电话给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胡佛的干预。罗布告诉亨里希探员,他认为“局长应立刻和委员会商讨这件事……罗布说他感觉到如果这件事沿着错误的方向前进,那将会是一个悲剧,他感到这件事十分紧迫”。同时,斯特劳斯打电话给胡佛的私人助理贝尔蒙,请他督促胡佛干预此事的发展。他说:“事态的发展很微妙,稍微的倾斜都可能导致严重的错误。”

亨里希后来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归结为斯特劳斯和罗布想找到证据证明奥本海默是一个危险分子,他们怀疑委员会能否找到有关的证据……我

认为局长是不应该干预此事的。”

胡佛知道,任何干预行为都会被极其丑化地曝光给公众。他告诉他的助理说:“我认为对于我来说参与此事是非常错误的。”他将不参与此事。

几年后,罗布在面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询问时声称,他从没试图让胡佛干预此事。他告诉电影制片人和历史学者皮特·古德柴尔德:“我非常坚决地否认我曾经怂恿委员会和胡佛见面,以促使联邦调查局长影响委员会……我也否认我曾经告诉亨里希我认为这是‘十分紧急的情况’。因为如果委员会和胡佛讨论过此事,决定就可能会倾向于奥本海默。”但是,文件记录是清楚的——他在说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格雷认为埃文斯的总结是如此的糟糕,以至于他要求罗布重写。罗布解释道:“我不赞同埃文斯的看法,他看起来仅仅像委员会中的植物,你能理解我的意思,他看起来像个傻瓜。”

5月23日,格雷委员会继续审理案件。该委员会以二比一的表决结果认为,奥本海默是对国家忠诚的公民,然而却是一个危险分子。据此,格雷主席和委员会宣布将不再保留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格雷和摩根写道:“基于以下考虑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1. 我们发现,奥本海默不断地与共产党交往的行为说明他对国家安全体制极端不尊重;2. 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对国家的利益产生危害;3. 我们认为,他在氢弹工程上的扰乱行为让人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在将来涉及国家安全的项目中会持同样的态度;4.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表示,奥本海默不能够在该委员会的几次作证中做到坦白和诚实。”

他们的理由让人难以接受。他们没办法指控奥本海默违反了什么法律或安全规定,却以他的交往行为给了他这个证据不足的判定。在他们眼中,奥本海默的主张一文不值。格雷和摩根写出了他们的观点:“对朋友的忠诚是最崇高的品质,然而,把对朋友的忠诚放在国家和安全体制之上的行为却与安全利益不相一致。奥本海默是由于过度的友谊行为导致其有罪,而非其他的越轨行为。”

埃文斯则有明显不同的意见。埃文斯陈述了他的不同意见:“1947年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中止的大部分不利信息是在委员会的手中制定的。”

很显然,他们了解他的左翼倾向和社会交往:他们使他出局。他们抓住了机会是由于奥本海默的特殊才智并且继续做着好工作。现在整

个事情结束了，我们还要调查他的信息。他以极其谨慎和仔细的态度做这件事。委员会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以说明奥本海默是对国家不忠诚的公民。奥本海默痛恨俄国。他有共产党朋友，现在也仍有一些，但是证据显示那比1947年少多了。他不像那时一样的天真，他有更强的辨别能力。委员会中没有任何人怀疑他对祖国的忠诚——甚至指控方证人也承认，他较1947年具有安全许可时危险性减少了；但现在取消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却是基于1947年的理由，这种事情不应发生在民主国家中。我们要知道，他现在与当时相比不再是安全威胁了……

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能给奥本海默安全许可是我们国家之盾上的污点。他的证人大多数是我国科学界的脊梁，他们羡慕他，敬爱他。

不论这个不同的意见是埃文斯亲手写的或是罗布写的，这都是一个非凡的记录。在被引用的简短的两段中，他驳斥了格雷和摩根关于给出奥本海默判决理由的第1、2、4点，但没有成功驳斥第3点，这点促成了“灾难”，也就是奥本海默日后所说的煎熬。“我们认为，他在氢弹工程上的扰乱行为……”格雷和摩根写道。

为什么说他在氢弹工程方面的行为是扰乱呢？奥本海默反对仓促发展氢弹，但同时也有其他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持相同立场，并且他们都非常清楚地解释了他们的观点。格雷和摩根所说的是，他们反对奥本海默的观点，并且他们认为奥本海默的观点不代表国家咨询机构的观点。奥本海默想规避或者甚至反对军备竞赛。他想鼓励一次公开民主的辩论，讨论美国是否应该采用这种大屠杀式的国防战略。显然，格雷和摩根认为，这些争论在1954年是不可接受的，而且他们断言，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强烈反对国家军事政策的行为是违法的。

斯特劳斯轻松了，委员会以非常微弱的优势判决奥本海默有罪——但是现在他担心埃文斯的不同意见可能说服原子能委员会的成员推翻该判决。这一判决毕竟只是建议，原子能委员会成员可以坚持或修改观点。奥本海默的律师估计，原子能委员会的主管肯尼思·尼古拉斯只会简单地通过格雷委员会的报告，但是尼古拉斯——这个认为奥本海默是“狡猾的杂种”的人，给委员会成员寄了一封信。尼古拉斯的信是在斯特劳斯、查尔斯·墨菲（《财富》杂志编辑）和罗布的指导下写成的。这封信完全颠覆了委员会的报告。

尼古拉斯的信给出一个全新的不应再给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论断。他

的思索已超过格雷委员会的讨论权限。尼古拉斯这三个月一直都在他的办公室里阅读斯特劳斯给他的关于奥本海默的卷宗。他认为,首先奥本海默不仅仅是一个赤色分子。“他和共产主义顽固分子的关系,使他们认为奥本海默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根据奥本海默对共产党的现金援助,尼古拉斯得出结论说:“这些记录说明,奥本海默除了没有党员证之外,在各个方面都是共产党员。”

尽管格雷委员会的判决强调了奥本海默反对匆忙发展氢弹工程计划,但尼古拉斯则打消了关于这方面指控的想法,并且非常精明地说,原子能委员会的目的并非是来质疑奥本海默作为科学家表达自己“诚实意见”的权利。取而代之的是,尼古拉斯把问题的重点转移到希瓦利埃事件上。但是他自己认为,这件模糊不清的事情与格雷委员会所表述的有很大的不同。委员会已经接受奥本海默关于他第一次说起希瓦利埃和埃尔滕顿事件时于1943年向帕什上校撒谎的认证。尼古拉斯否认这个结论,并且以一种令人吃惊或者甚至是非法的策略来重新解释这个事件。实际上,尼古拉斯重新审理了奥本海默,否认了格雷委员会的大部分观点,并且给原子能委员会的成员以全新的理由去剥夺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

在审阅了十六页关于1943年8月26日奥本海默和帕什上校的审判记录后,尼古拉斯认为:“难以断定奥本海默向帕什所说的这些记录是假的而现在奥本海默所讲的是真的。为什么奥本海默向帕什讲述如此复杂的错误故事。”尼古拉斯在反驳了奥本海默的合理解释后,把焦点从希瓦利埃和他自身转移开。尼古拉斯得出结论说,奥本海默不仅在1943年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撒谎,而且在1954年的听证会上也是如此。

尼古拉斯没有揭露任何其他的事情,实际上他隐瞒了真相。他仅断言说,奥本海默撒谎是为了保护他的弟弟,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认为有证据支持这种观点。奇怪的是,格雷委员会没有就这件事向弗兰克·奥本海默征询证词,以及两个重要的证人哈康·希瓦利埃和乔治·埃尔滕顿 。(希瓦利埃当时在巴黎,而埃尔滕顿已经返回伦敦很久了,但是两人都可以进行在国外的访问调查。)尼古拉斯的信仅包含一种假设,一种个人的理解,并且从没有向格雷委员会提起。他在这个时候提到这个见解的原因何在?答案很明显:证明奥本海默在1954年对委员会撒谎,而非仅仅在十一年前对一个上校,这样更让人厌恶。

因此不难想象,为什么尼古拉斯的偏激理解得到了斯特劳斯的同意。斯

特劳斯担心,大多数人的模糊判决与埃文斯的不同意见混合,可能导致原子能委员会的成员推翻原有判决。

奥本海默的律师对于尼古拉斯的信毫无所知。如果他有机会在原子能委员会的成员面前陈述其一般辩论的话,他也许会知道有这封信,但他们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其中一名成员同情加里森的请求,亨利·史密斯警告说:"如果我们不给奥本海默的律师机会来辩论尼古拉斯的信,如果这封信被曝光,我们将面临严重的批评。"但是,又一次在斯特劳斯的影响下,加里森的请求被拒绝了。

奥本海默的律师只希望原子能委员会的成员撤销格雷的判决意见,毕竟在委员会中有三个民主党人(亨利·史密斯、托马斯·默里和尤金·朱克特)而仅有两个共和党人(刘易斯· 斯特劳斯和约瑟夫·坎贝尔)。最重要的是,斯特劳斯自己也担心委员会会以三比二的投票来支持奥本海默。但是,作为主席,他知道怎样去影响那些委员,他知道如何在华盛顿运作权力,并且不失时机地送给他的同事实在的利益来达到其目的。他以私人企业的优厚待遇来诱劝史密斯,在这一点上,史密斯怀疑斯特劳斯是在收买他。原子能委员会的律师哈罗德·格林曾经受指使写信指控奥本海默。他认为斯特劳斯在利用一切手段对付奥本海默。格林知道朱克特倾向于证明奥本海默是清白的。事实上,在5月19日斯特劳斯已经了解到"朱克特欢迎这个机会来决定最终的判决",但是朱克特在某些方面动摇了。6月30日,因为某种原因,他辞去了原子能委员会中的职务。就在前一天,大多数人在对奥本海默的判决上签了字。这在华盛顿开了私设法律的先河。格林认为不幸的事情将要到来。他知道,斯特劳斯随后会把他的许多法律生意转让给朱克特;格林并不知道的是,朱克特也和斯特劳斯签了合同,并将作为他的"个人顾问和咨询人"。

6月底,除了该委员会的唯一一位科学家史密斯教授,斯特劳斯对其他的投票都有了把握。史密斯非常明确地表示,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应该被保留。作为1945年曼哈顿工程公开版的"史密斯报告"的作者,史密斯是了解奥本海默的,并且知道安全事务的重要性。从个人层面上讲,他并不关心奥本海默。他们是普林斯顿十几年的邻居,奥本海默给他留下了傲慢、自以为是的印象。史密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该证据不能使人信服。

几周后,史密斯告诉斯特劳斯说,他决定写一个不同意判决的报告。6月27日,史密斯已经完成报告的草案,但却发现他们已经以决定性意见要求他

重写他的草案报告。

6月28日早上七点，史密斯和他的助手开始写一个不同意见的报告，他仅仅有十二个小时的时间——在原子能委员会所要求的最终意见形成的截止时间前完成报告。“你知道这非常有趣，我竟然为了奥本海默而惹了这个麻烦，”在当晚深夜时他告诉他的助手法利，“我甚至都不喜欢这个家伙。”第二天上午十点，法利带着史密斯的不同意见报告来到原子能委员会的办公室，并且站在一旁以确保他们完整地复制该报告。当天下午，史密斯的不同意见和大部分人的观点都见报了。委员会最终以四比一证明他是对国家忠诚的，又以四比一的表决说他是一个危险分子。大部分人的观点是指向关于氢弹问题的——这就是格雷委员会判决的主旨。由斯特劳斯起草的判决文件的大部分观点集中在奥本海默性格的根本缺陷上，特别是希瓦利埃事件和他以前交往的学生成了问题的关键。“记录显示，奥本海默不断地将自己置身于政府规定之外，他谎称其在重大事件上如何尊重国家的利益，但在他的交往层面他不止一次地显示出他甚至不尊重一般的安全规定。”

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被取消的前一天，大卫·利林塔尔在阅读了原子能委员会的判决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们错了而且是如此严重的错误。这不仅仅是在对待罗伯特上而且是在怎样对待为社会服务的出类拔萃者的理念上错了……”爱因斯坦以俏皮话的方式不无厌恶地说，原子能委员会应该被叫作“原子判决阴谋”。

在6月的早些时候，斯特劳斯以一个备份文件在火车上被盗为借口（不久发现在纽约半岛车站的失物招领处）说服他的同事公布了听证会记录。这违反了格雷委员会曾向他们的证人所做出的将对证词保密的许诺，但是斯特劳斯感觉他不会赢得公众的赞许，所以他也就不在乎这些了。

这份七十五万字、九百九十三页的《关于J.罗伯特·奥本海默事件》，不久便成为冷战早期影响深远的报告。为了让这些重大的消息使奥本海默蒙羞，斯特劳斯安排原子能委员会的成员突出报告中最具攻击性的证词。沃尔特·温切尔——一位恶意中伤的右翼评论家——满意地写道：“……奥本海默的证词（大部分人都看过）包括他情人的名字（后来的简·塔特洛克），迷人的‘小红人’，他承认在结婚后和她有某种亲密关系的交往……这时他正忙于原子弹的事情，并且知道她的丈夫是共产主义活动的积极分子……”

然而从长远来看,斯特劳斯的做法是在引火烧身:这个复本暴露了听证会盘问者的性格,并且揭示了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的司法腐败现象。在四年间,这个复本断送了斯特劳斯的职业名声和政府信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围绕着奥本海默的判决和审判增强了他在国内外的声望。在那些地方,他原来仅仅作为"原子弹之父"而知名,现在他甚至比殉道士伽利略更具有吸引力。出于对于该判决的气愤与震惊,二百八十二名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联名写信给斯特劳斯为奥本海默辩护,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千一百名科学家和学者联名签署另一份申请书抗议该判决。

奥本海默的朋友乔·艾尔索普对此判决非常不满。他在给格雷的信中这样写道:"通过一次愚蠢的和不道德的行为,你已经将国家所欠你的一笔勾销了。"不久,乔和弟弟斯图尔特在《哈珀》月刊的专栏上写了一万五千字的文章抨击斯特劳斯"令人震惊的不公正行为",借用埃米尔·左拉关于德雷弗斯事件的文章,乔将《我控诉》改为《我们的控诉》。他以激昂的文字谴责原子能委员会的行为不是使奥本海默蒙羞而是使"美国自由的高贵声誉"蒙羞。他们有很明显的相似性:奥本海默和德雷弗斯都有富裕的犹太背景,而且两人都被迫站在法庭之上以对国家不忠的名义接受审判。

在麦卡锡主义盛行之时,奥本海默成了它的牺牲品。艾森豪威尔对这个结果很满意,但是他不知道斯特劳斯获得这结果所采取的手段。6月中旬,关于这次听证会的性质和内涵已经非常清楚了,艾森豪威尔写信给斯特劳斯,建议让奥本海默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我认为在这个时代没有比这更能有益于人类……"。斯特劳斯却置之不理。

刘易斯·斯特劳斯在和他想法一致的朋友们的帮助下成功地使奥本海默"免去职务",这对整个美国社会的意义相当深远。一位科学家被开除了,所有的科学家现在明白了,挑战国家政策的人会有严重的后果。

这些年来,科学界一直处于痛苦难忘的日子。爱德华·特勒被他从前的朋友遗弃了。在这件事过去三年之后,拉比仍然不能控制他对于这些判决奥本海默的人的愤怒。他怒气冲冲地冲到朱克特在纽约的高档法国餐馆,骂了一连串的脏话。他的声音充满了愤怒,他谴责朱克特作为原子能委员会的成员在这一案件判断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导致的结果。苦恼的朱克特做出反击,并在后来向斯特劳斯抱怨拉比的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里，科学家被认为是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是法律所授予制定公共政策的专家。他们不仅仅是科学家，而且是公共事务的哲学家。由于奥本海默事件的发生，科学家们知道了，在将来为国家服务的过程中，他们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在狭义的科学领域。正如后来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总结的：奥本海默所遭受的苦难表明了，战后“以救世主自居的科学家”时代已经终结。在这个体制下工作的科学家不能违背政府的政策，这就像奥本海默1953年为《外交事务》所写的文章一样，但他们仍然期望在政府的咨询委员会提供服务。这场审判代表政府和科学家关系的分水岭，这种狭隘的关于科学家应该怎样服务国家的短视胜利了。

奥本海默试图利用他的地位和声望来质疑科学界日益依赖于军事的倾向，而这不断受到来自艾森豪威尔政府日后称之为“军事产业群”的警告。他在1954年失败了。正如科学史学家帕特里克·麦格拉思评论的，“诸如满嘴都充斥着黩武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爱德华·特勒、刘易斯·斯特劳斯和欧内斯特·劳伦斯的科学家和政府官员一起，把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几乎完全推向了彻底服务于美国军事利益的位置”。

奥本海默的失败也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失败。在罗森伯格原子间谍案中自由主义者没有受到审判——阿尔杰·希斯因作伪证被起诉，但根本性的指控是间谍罪。奥本海默的案件就不同了。除了斯特劳斯个人的怀疑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奥本海默曾经涉嫌泄露任何秘密，格雷委员会确实也已经免除了对他的此类任何指控。但是，奥本海默像许多其他罗斯福新政时期的人一样曾经是左翼的一员，他活跃在人民阵线，与许多共产党员及其政党本身有联系。奥本海默曾用他的巨大影响力并通过他的私人朋友如乔治·马歇尔、艾奇逊和麦克乔治·邦迪积极参与自由主义对外政策的建立，并促成对苏联政策的了解。自由主义者热烈欢迎奥本海默，并认为他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他的蒙羞使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奉行者了解到，现在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了。现在即使没有间谍案，甚至即使没有对个人忠诚的质疑，挑战美国对核武器依赖的行为也是危险的。奥本海默听证会在冷战早期对限制公众言论起了很大的作用。

36 | “我仍能感觉到手中血液的温暖”

“他的反对者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这件事摧毁了他。”

——I.I.拉比

奥本海默已被信件所淹没，既有仰慕他的支持者的信，也有不明是非的谩骂者的信，还有亲朋好友表示愤慨的信。康奈尔大学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威尔逊的妻子写信给基蒂说：“我对您和罗伯特被无端攻击感到震惊，我们都对事态的发展充满了厌恶和反感。如此卑劣之事或许古已存在，但我却不能想起。”奥本海默试图把整件事情看淡，他告诉堂弟巴贝特·奥本海默说：“你不觉得关于我的事情的谈论已经多得令人厌烦了吗？我已经这样觉得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也有这样的评论：“他们花在窃听我电话上的费用比他们在洛斯阿拉莫斯付给我的还要多。”在与弟弟的一次电话聊天中，罗伯特说他早就知道了事情的结果。

罗伯特的一些亲密朋友认为，他在过去的六个月中明显衰老了许多。哈罗德·彻尼斯说：“有些时候，他看起来确实很憔悴，但有些时候，他看起来精力充沛，与以前没什么两样。”罗伯特儿时的朋友弗兰西斯·弗格森为他的外表所震惊。他的卷曲短发已经变成银白色，他才刚满50岁，然而如今，他第一次看起来要老于他的实际年龄。罗伯特坦白地对弗格森说，他是个“十足的笨蛋”，而且是罪有应得。这并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是他的确犯了错误，“就像承认他不知道的事情一样”。弗格森认为，他的老朋友意识到“他所犯的一些令人心痛的错误源自于他的虚荣心”。“他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弗格森回忆说，“他退却了，回到了原来的简单生活。”

他像14岁时那样，以淡泊主义的生活态度拒绝去反对该判决，他对一名

记者说:“我把它想成一件重大事故,非常像一次火车事故或者一栋建筑物轰然倒塌。这与我的生活没有任何联系或关联,我只是碰巧在那。”但是在审判六个月后,作家约翰·梅森·布朗把他所遭受的痛苦比作“十字架之罚”,奥本海默只是面带一丝微笑地说:“你知道,这并非很难受。我仍能感到手中血液的温暖。”确实,他越试图看轻这痛苦——看作“与生活没有联系”的一次“重大事故”——他越感到精神的压抑。

罗伯特并没有陷入深深的压抑中,或遭受任何明显的心理打击,但是他的一些朋友注意到他的变化。汉斯·贝特说:“他以前的许多精神头儿和活力都消失了。”拉比后来在安全听证会上说:“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件事几乎在精神上将他击垮。确实如此,他的反对者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这件事摧毁了他。”罗伯特·塞培尔总是认为在这件事之后,奥本海默变成了“一个悲观的人,他的精神已经崩溃”。但是几年后,大卫·利林塔尔在纽约一位名流玛丽埃塔·特里举行的晚会上遇到了奥本海默,他在日记中写道,基蒂看起来“活力四射”,罗伯特看起来“真的很高兴,和我以前见到的根本不一样”。他的密友如哈罗德·彻尼斯则“认为基蒂和罗伯特都已经从听证会的痛苦经历中恢复过来”。确实,如果罗伯特真的改变了,彻尼斯认为是朝更好的方向。彻尼斯认为,在这次痛苦的经历后,奥本海默变得“更理解他人了”。

奥本海默遭受了打击,然而却变得更加镇静。他能以一种把所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当作荒谬的事情来看待,但是不同之处在于,他不像以前那样习惯于反击别人了。也许这本是他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生存策略,但他为此却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

在一段时间里,奥本海默甚至不能确定研究院的理事是否让他继续工作。他知道斯特劳斯希望看到他不再担任主管。7月份,斯特劳斯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他确信研究院的十三位理事中有八位都希望奥本海默被解除职务,但是他决定把投票的事情推迟到秋天。因为如果不这样,斯特劳斯就像是在假公济私了。而最后证明这是一个误算,因为这个耽搁给了研究院的成员时间去写一份公开信来支持奥本海默。研究院中每个系的每一位成员都在公开信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斯特劳斯被迫退了下来,在不久后的秋天,理事们投票让奥本海默继续担任主管一职。斯特劳斯感到非常生气与挫败,于是,他继续在研究院理事会上与奥本海默表现出不和的态度。斯特劳斯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对奥本海默的妄想。

如果奥本海默把他最后几个月的过度疲劳都表现出来的话，那么他的家人也会和他一样。虽然基蒂在安全小组面前进行了一流的表演，但她的朋友们依然可以看出来她十分哀伤。有一天凌晨两点，她打了个电话给她的老朋友帕特·谢尔。“我们是很贪睡的人，”谢尔回忆道，“她很明显是喝多了，她说话含糊不清，而且她说的东西有点乱七八糟，毫无联系。”

9岁的托尼似乎想十分从容地应付这件事，但是据哈罗德·彻尼斯所说，13岁的皮特“在罗伯特备受折磨期间在学校有一段十分困难的时期”。有一天他从学校回来，把一个同学说的话告诉了基蒂：“你爸爸是一个共产党员。”皮特本来就是个十分敏感的孩子，现在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那年夏天的一个早上，皮特在看了一些电视上播的“军队—麦卡锡”的听证会内容后，上楼在黑板上写道：

> 在我所知道的对他们的众多不公平中，美国政府对某些特殊群体尤其不公平。由于这个事实，我想只有那些在美国政府中的特殊群体才应该下地狱。
>
> ——来自真正的特殊群体中的一员

罗伯特认为，一个长长的假期可能对每个人都有好处，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和基蒂决定返回维京群岛。在他们着手准备的时候，罗伯特告诉基蒂不要往圣克罗伊岛打电话，因为他认为他的通讯依然处于被监听当中，他担心当局可能会进行干涉。但是，基蒂忽视了这个建议，她草率地打电话订了一艘长七十二英尺的双桅船——“科曼奇”号，它属于她的一个叫爱德华·戴尔的朋友。

6月上旬，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已经再不监听了，但是一个月后，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们做出对奥本海默的最终判决后，斯特劳斯再次迫使罗伯特生活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听之下。他们于7月上旬重新设置了非法电话监听，同时，当局部署了六名密探，让奥本海默从每天上午七点开始到半夜都处于严密的监听之下。斯特劳斯和胡佛都怕他可能会逃跑。斯特劳斯一直有个幻觉：一艘苏联的潜水艇在温暖的加勒比海上浮出水面，在厚厚的装甲后面诱惑奥本海默逃跑。

奥本海默在《新闻周刊》上读到一篇令他发笑的报道：“主要的安全官员已经被警告，共产党正努力使奥本海默去欧洲访问，然后骗他做卧底。”这是

由布鲁诺·蓬泰科尔沃提出的，他是一名意大利物理学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窃听装置偶然听到了赫伯特·马克斯建议奥本海默在此种情况下最好写封信给埃德加·胡佛，告诉他自己的度假计划。“这封信，”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他们的交谈摘要中说，“被断定将在这愚蠢谣言的基础上促使奥本海默离开这个国家，可能绑架他，可能用俄罗斯潜水艇接他，或者安排去欧洲度假，等等。”奥本海默非常真诚地给胡佛写了一封信，告知他自己计划花三到四个星期去维京群岛度个航海假期。

罗伯特和他的家人在1954年7月19日登上了一架去圣克罗伊岛的飞机，然后通过那里再去圣约翰岛。那是一个普通的加勒比海岛屿，面积相当于曼哈顿岛（二十一平方英里），人口不足八百——其中的百分之十都是“欧洲人”。在1954年，偶尔会有几艘帆船在海湾停靠。这个岛屿上的一个村庄和唯一的商业港口克鲁兹湾住有几百个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圣约翰岛的奴隶的后代。莫伊酒吧是这个村庄中唯一的酒吧，才建成不到两年。麦德旅馆是村里最大的建筑物，是一栋一层的西印度式华丽村舍。孔雀和驴在没有铺柏油的路上徘徊。

步行到港口，奥本海默一家发现了一辆出租吉普车，它带着他们一家穿过了沿着岛屿北部海岸的充满泥土的道路。他们经过了卡内尔种植园，这是岛上唯一的高消费地区。然后，他们驱车驶往象鼻湾的旅馆，一个简单的住宿加早餐的旅馆，它由一个名叫艾华·布兰的常住居民经营。那里没有电话，没有电，而且顶多能容下一打客人。为了寻找一个孤独的避难所，他们来到了这个正确的地方。“他们有几分吃惊，”经营者的女儿克莱尔回忆道，“这里非常偏僻，所以人们几乎不可能到这里。他们对那些和他们讲话的人非常小心……基蒂非常具有自我保护意识。当任何人想要接近奥本海默时，她就像只母老虎一样，因为他想要交谈。”当基蒂情绪很恶劣时，她经常乱扔东西——然后第二天，罗伯特就会去见布兰一家，非常爽气地为那些损失买单。在接下来的五个星期，奥本海默一家把克鲁兹湾当作自己住的港口一样，在那里驾驶“科曼奇”号在圣约翰和邻近的英属维京群岛周围航行。

一直到1954年8月25日，联邦调查局对于共产党的秘密计划还是十分担心，这个被称为“营救奥本海默”的计划，想要在“铁幕”背后把奥本海默一家匆匆带走。“根据这个计划，”一份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写道，“奥本海默首先将去英格兰，然后从英格兰再去往法国，继而在法国消失在苏联人手中。”

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当奥本海默身处圣约翰岛时，要使他仍然保持在

他们的监视之下是不可能的。所以，当他于 1954 年 8 月 29 日终于返回纽约时，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们与他谈话，并且要求他与他们一起去一个在航空集散站的隐秘房间。奥本海默同意了，但他坚持让他的妻子也在场。当他们进入这个房间后，探员们很坦率地问他，苏联的密探是否在维京群岛已经接近过他并且让他背叛祖国。“那些俄国人，”他说，“确实非常愚蠢，但我并不认为他们愚蠢到抱着这个企图来接近我。”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事情，奥本海默将会无偿地迅速告知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这简短的审问过后，奥本海默一家离开了机场。探员们一直跟着他们的车直到普林斯顿。于是第二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又在他们家的电话上安装了窃听装置。

国外方面对于此次审讯抱持着质疑的态度，欧洲的知识分子们把它看作美国被荒唐无稽的恐惧所控制的进一步证据。“在如此气氛下，这种独立的实验性思想怎么能够生存下来?”理查德·克罗斯曼在英国的主流自由主义周刊《新政治家与国家》上发问。在巴黎，当希瓦利埃收到听证会文件的复本时——是由奥本海默亲自寄送给他的——在读了这份文件的一部分后对着安德烈·马尔罗大声喊了出来。这两个男人都被奥本海默面对审问者时奇怪的消极态度给震惊了。马尔罗尤其被奥本海默直白地回答关于他的朋友们和同事们的政治观点的问题所困扰，这次审讯已经使他变为了一个被控告的人。“麻烦就在于，”马尔罗告诉希瓦利埃，“他从一开始就接受了他与原告们的关系……他应该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我就是原子弹!’他应该坚持他的立场，他就是原子弹的创造者——他是一个科学家而不是一个被控告的人。”

最初，奥本海默似乎注定要成为一个政治贱民，至少在主流的圈子里是这样的。过了将近十年，他已经不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了，以前那个无处不在的具有影响力的公众形象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可能还是存在着，只是不见了而已。就像罗伯特·库格兰此后在《生活》杂志上写的那样：“在 1954 年的安全审查之后，这个公众形象就不复存在了……他曾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是最值得赞美的、引用的、拍照的、请教的、具有美名的、可谓神话般的、使人着迷不已的、崭新的典型英雄之一；他是科学与知识的英雄，新原子时代的创造者和活生生的象征。但是突然，所有的荣耀都消失了，他也随之消失不见了……”在媒体中，特勒取代了奥本海默，成为一个典型的政治科学家的形象。“在 50 年代，对特勒的赞誉也随之而来，”杰里米·贡德尔写

道,“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罗伯特·奥本海默频遭诽谤。”

在奥本海默被逐出政府圈的同时,他迅速成为了被共和党错误对待的自由主义人士的象征。许多美国人开始把奥本海默看作一个科学殉道者,麦卡锡主义过剩时代的牺牲品。在1954年末,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他在建校两百周年时来学校作一次演讲,这次演讲将会播放给全国观众看。他的演讲是凄凉且悲观的。

几天后,数百万美国人观看了爱德华·R.默罗在他的全国性电视节目《直击现场》上对奥本海默的访问。奥本海默通过这个场合讲述了守护秘密会使人日渐衰弱的效果。“随着秘密而来的麻烦,”他说,“就是它剥夺了政府自身吸收整个社会的智慧和资源。”

在他于《直击现场》露面仅仅几个星期后,奥本海默的名字又出现在了报纸上,这回是一次自由学术辩论会。在1953年,华盛顿大学曾经给奥本海默一个短期访问教授之职,但是由于安全听证会,奥本海默推迟了此项任命。但在1954年下半年,物理系又重新发出邀请,但这次邀请被校长亨利·施米茨取消了。《西雅图时报》获知施米茨校长的决定后刊发了该消息,这则新闻激起了一场关于学术自由的全国辩论。一些物理学家声称要联合抵制华盛顿大学。

奥本海默试图脱身事外。当他被记者问及此次访问的取消是否是一次对学术自由的侵犯时,他说:“那不是我的问题。”但当记者继续追问众多科学家的联合抵制是否会给大学带来一些尴尬时,他尖锐地回答道:“我认为似乎是这所大学自己给自己惹的麻烦。”

这件事强化了奥本海默的新形象——他不再是那个政府内部人士了,而是一个被流放的科学家。他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现在正倾向于更多地参与公共学术领域的演讲。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了某项事业筹措资金或者在请愿书上签名了。他的朋友们觉得他有些消极,甚至有些畏惧权力机构。

他正在绕开所有公共政策的面对面的争论,尤其是那些与核武器有关的。他不同意自作主张的那些博学者——比如把自己变成一个核战略家的年轻的亨利·基辛格。“有许多废话,”他私下里告诉利林塔尔,“他认为这些是用理论研究和实地调查就能解决的麻烦!”但他没有公然声讨基辛格或者任何其他的核战略家。

同一年的春天,奥本海默拒绝了伯特兰·罗素发来的邀请。这次是请他去参加帕格沃什会议的开幕式——这是一个由工业家塞勒斯·伊顿、罗素、利奥·齐拉和约瑟夫·罗特布拉特组织的国际科学家们的集会。奥本海默写信给罗素说:"在看到议程后我感到有些麻烦……首先,我认为'危险起于不断发展的核武器'这个议题的措辞是个最具危险的谎言……"罗素感到很迷惑,他回信道:"我认为你不会否认核武器的持续发展与危险有关。"

事实上,奥本海默非常想改变世界,但是他知道他无法对华盛顿的政府施加影响,而且他对在30年代曾令他感动的激进主义不再有热情。正如他被逐出教会且不允许他自由地加入白天的伟大辩论,这使他更倾向于审视他自身。弗兰克·奥本海默认为,他的哥哥对无法回到政府部门感到很沮丧。"他想回到那里,我觉得,"弗兰克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知道有些东西你一旦尝到了味道就很难放弃它了,而这就是其中一种。"

然而有时,他会公然讲一些关于广岛的事情,但同时会有种模糊的悔恨感。在1956年的6月,他告诉乔治学校的毕业生——他的儿子皮特是其中的一员——广岛原子弹爆炸可能是"一个悲惨的错误"。他说,美国的领导者们在日本的城市使用原子弹,"确实是失去了一种克制的理性"。许多年之后,他给了马克斯·博恩一个情绪上的暗示。这位以前在哥廷根大学时的导师已经清楚地表示,他非常反对奥本海默去从事有关原子弹工作的决定。"拥有如此聪明和能干的学生让我感到很满意,"博恩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但我希望他们能够展现出更多的智慧和更少的幼稚。"奥本海默写信给博恩说:"过了这么多年,我想我不赞成你的想法。在我看来,这是很自然的。"

奥本海默不愿意公开卷入到50年代中期针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核政策的激烈辩论中,但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谈论有关文化和科技的话题。在忠诚调查仅仅过去一年的时候,他以《开放的思想》为标题出版了一部短文集,书中包括了他从1946年开始所作的有关核武器、科学和战后文化之间关系的八次演讲。这本书由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出版,并且受到广泛好评,此书把他包装成了一个现代科学界的预言家,一个有思想的、高深莫测的哲人。在这些短文中,他为一种"开放思想"辩护,认为它是一个开放社会所必需的组成部分。他为"秘密的最小化"举了一个例子,他评论说:"我们似乎知道而且似乎在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这个基本常识,即在高压政策下不可能实现这个国家在外交政策领域里的目的。"奥本海默谴责那些认为一个强大的、拥有核武装的

美国能够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人。奥本海默说:“盲从正义的危害无法估量。这样的问题不单单出现在政治领域,它还出现在科学、个人生活、文学和艺术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用一种被称为‘风格’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个风格让我们行动迅速但不莽撞,这个风格让我们的外交政策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也考虑到其他民族的需要和感受,这个风格让我们谋定而后动。这个风格就是使权力让位于理性。”

1957 年的春天,哈佛大学哲学和心理学系主任麦克乔治·邦迪邀请奥本海默来作演讲。他想把这个邀请扩充成为一个辩论会。一群由阿奇博尔德·B. 罗斯福领导的哈佛毕业生威胁说,如果同意奥本海默讲话就停止捐款。“我们认为一个说谎的人,”罗斯福说,“不应该在一个座右铭叫‘真理’的地方演讲。”邦迪主任听到了这个抗议后强调要出席 4 月 8 日的讲座。

奥本海默给他的一系列六个公共讲座冠以“秩序的希望”之名。在开场演说上,一千二百人挤满了哈佛最大的讲演厅——桑德斯剧院,另外八百人在附近的会堂通过广播来听演讲。为了防止抗议,全副武装的警察镇守在门口。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挂在讲台后的墙上,给这个场景一种古怪的电影般的气氛。巧合的是,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在四天前去世了,他的遗体就躺在国会山供人瞻仰。正当奥本海默站起要说话时,他又犹豫了,随后走到黑板前写了一句“愿他安息”。观众中有一些人在小声议论,这是对已死参议员大胆无礼的无声指责。奥本海默回到讲台,面无表情地开始了他的演讲。埃德蒙·威尔逊参加过其中一个讲座。他后来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的感想:当哈佛大学校长内森·普西开始介绍奥本海默时,他独自坐在讲台上,“紧张且难堪地抖动手脚;但当他开始演讲时,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整个会场没有一点声音。他说得很平静但声音很有穿透力。在谈到威廉·詹姆斯以及他和亨利的联系时,他并不是在照着稿子念。开场白很令人激动——他并没有故弄玄虚,但他提出极其深刻且存在于每个人思想深处的问题,就像埃琳娜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自己的重大责任。我们所有人都被感动了,并受到了激励”。

后来,威尔逊开始思考,奥本海默是否是“一个被时代所迫害的伟人,一个并不比其他人知道更多的人,而他的谦虚使我汗颜”。像许多听过奥本海默讲座的人一样,威尔逊一回想起这段经历就有一种脆弱且困扰的对未来不确定的感觉。

奥本海默继续娴熟地主持着研究院的工作，他为他的创造感到骄傲。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伯克利是世界上理论物理学最有名的研究中心之一，这个研究院对很多年轻或年老的有才华的学者来说都是一个天堂。

但是，奥本海默自己却没有弄清楚自己复杂的个人命运。当27岁的杰里米·伯恩斯坦1957年加入研究院时，他被通知说奥本海默马上要见他。当伯恩斯坦走进博士的房间时，奥本海默轻松愉快地问他："在物理学当中，有什么是新的和不变的？"在伯恩斯坦还没能想好答案之前，电话响了。奥本海默示意让他先等会儿，自己先接了电话。伯恩斯坦从未见过像奥本海默这样随意的人。他挂了电话，转向伯恩斯坦并随和地说："是基蒂，她又喝多了。"接着，他邀请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去他家看看他的"照片"。

伯恩斯坦在研究院待了两年，他觉得奥本海默"无限迷人"：这个人可以先毫不客气地让人紧张不安，但随后又让人不知不觉地消除这种紧张感。有一天，他去了奥本海默的办公室，参加定期与主管"交心"的活动。伯恩斯坦凑巧谈到他正在读普鲁斯特的书。"他和蔼地看着我，"伯恩斯坦后来写道，"并告诉我，他在我这年龄时曾徒步旅行到科西嘉岛，在晚上用手电筒读完普鲁斯特。他并不是在自吹，他真的知道很多东西。"

奥本海默在1959年参加了一个在联邦德国的莱茵费尔登举行的由"文化自由大会"资助的会议。他和其他二十位世界知名的学者聚集在离巴塞尔很近的坐落在莱茵河畔的豪华饭店，讨论西方工业化世界的命运。在如此可靠隐匿的环境下，奥本海默不再对核武器问题保持沉默，他不带任何掩饰地表明，在美国社会人们是如何看待和评价它们的。他说："我们的文明都把道德看作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却只能隐晦地讨论屠杀人类的问题。"

奥本海默深受国会反共产主义信息的影响，就像当年他曾一度被共产党人包围着一样，奥本海默现在身边也有一群知识分子，他们毫不犹豫地消除"轻率地同情共产主义"的幻想。他很高兴和开会的人们待在一起。他们中有像史蒂芬·斯彭德、雷蒙德·阿伦这样的作家，还有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他还和大会的一位执行主席成了好朋友。那个人叫尼古拉斯·纳博科夫，是一个小说家的表兄弟，同时也是大家公认的作曲家，他基本上在巴黎和普林斯顿生活。他当然知道大会从中情局那里获得资金，奥本海默也知道这件事。"我很想知道有谁不知道？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秘密了。"劳伦

斯——一位驻德国的中情局情报人员——回忆说。当《纽约时报》在1966年春报道了这个消息时,奥本海默和凯南、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以及小阿瑟·施莱辛格一起联名写信给编辑,捍卫大会的独立性和这些"官员的正直"。奥本海默并不费神去否认与中情局的联系。那年的晚些时候,奥本海默写信给纳博科夫,并使他相信,他认为大会在战后时期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奥本海默变成一个越来越突出的国际名人,他出国的次数增多了。1958年,他访问了巴黎、布鲁塞尔、雅典以及特拉维夫。在布鲁塞尔,他和基蒂受到远房亲属比利时王室的热烈欢迎,而在以色列,招待他的东道主是总理大卫·本·古里安。1960年,他访问了东京,在机场,记者用一大堆的问题欢迎他。"我并没有为我在原子弹的技术成就上所做的一切感到后悔。我现在并没有感觉不好,至少我现在的感觉比昨晚好。"这个含蓄略带情感的表达可能是不太容易的。

利林塔尔非常钦佩奥本海默的思维能力,但对他所观察到的奥本海默的家庭生活感觉非常不理想。他后来说:"他的才华和他别扭的性格是个巨大的反差。他不知道如何与别人打交道,特别是和他的孩子。"利林塔尔后来无情地总结道,奥本海默"毁了"孩子的一生,"他严格地管教他们"。皮特长大后成了一个害羞但非常聪明且极有表现力的年轻人,但他和母亲的关系很疏远。弗朗西斯·弗格森知道罗伯特爱他的儿子,但他看到罗伯特似乎并没有能力保护皮特免遭母亲易怒性格的伤害。1955年,罗伯特和基蒂将他14岁的儿子送到在宾夕法尼亚市镇教会贵族寄宿制学校——乔治学校,希望这段地理上的距离能缓解儿子和妻子之间的紧张关系。

1958年,一场危机爆发了。当时奥本海默在巴黎作一个学期的访问教授,他和基蒂决定将13岁的托尼从她的普林斯顿私人学校里接出来并将她带在身边,但他们决定将17岁的皮特继续留在乔治学校。罗伯特写信告诉他的弟弟,皮特想拜访在牧场的弗兰克,可能想在新墨西哥的某个度假牧场里找份临时工作。"他仍处在易变的情绪当中,"罗伯特写道,"我恐怕无法预料将会发生什么。"

罗伯特的私人秘书弗娜·霍布森说:"将皮特遗忘是个巨大的错误。他非常伤感,我在他那边感受颇深。"霍布森告诉罗伯特她的想法,但很明白,基蒂已经作好决定了,霍布森看得出这是皮特和他父亲关系的一个真正的转折

点。“曾有一段时间,”霍布森说,“罗伯特不得不在他非常喜爱的皮特和基蒂之间做出选择。她造成了二者必取其一的状况。只有上帝才知道他那时在想些什么,他选择了基蒂。”

37 | “这里真是个世外桃源”

“罗伯特是个谦恭的人，我敬佩他。”

——因加·希利维尔塔

在1954年初，奥本海默一家在英属维京群岛的圣约翰岛上待了几个月。他们身处小岛的极吸引人的原始之中，而罗伯特喜欢这种形式的自我放逐。在他年轻时在哈佛大学写过的一首诗中，他说他喜欢圣约翰的“自我封闭的监狱”，这个经历使他充满活力，就像几十年前他在新墨西哥度过的夏天让他精力充沛一样。在前几次的度假中，奥本海默一家住在小岛北边的象鼻湾的小旅馆里，艾华·布兰是这座旅馆的主人。但1957年，罗伯特在小岛北部一角的鹰巢湾买了两英亩的土地。在那里，棕榈树点缀在温柔荡漾的白色沙滩旁，碧绿的水中徜徉着鹦嘴鱼、石斑鱼和梭鱼。

1958年，罗伯特聘请著名建筑家华莱士·哈里森——他曾设计了洛克菲勒中心、联合国大厦及林肯中心等著名建筑——帮助设计一个类似他们在佩罗卡连特样式的简朴的海滨小屋。最后建成时，这个小屋是一个长方形的房子，有六七十英尺长，上面是混凝土平板，一个四英尺高的墙将睡房与其他地方隔开，地面覆盖着漂亮的赤陶土瓷砖，后面是设备齐全的厨房和小卧室，装有百叶窗的窗子能让阳光从三面照到屋子里。小屋面对港湾，正面完全暴露在小港湾和小岛热带季风之中。这样的小屋只有三面墙，它的屋顶可以卷下来当一侧的围墙使用。他们叫它“复活节石头”，这是一个他们在和平山顶的大礁石后面找到的石头。

在距海岸一百码的地方住着他们唯一的邻居——罗伯特·吉布尼和南希·吉布尼。在奥本海默的请求下，他们不情愿地把自己在海滨的财产卖给

了他。吉布尼一家自从 1946 年就开始在这里居住了。那时,他们在鹰巢湾买了大概七十英亩的土地。罗伯特·吉布尼是前任《新共和》杂志的主编,很有文学理想,但在这个岛上住的时间越长,他写的东西就越少。

吉布尼的妻子南希来自于波士顿一个富裕家庭。这个漂亮高雅的女子曾在《时尚》杂志做编辑,有三个孩子和很少的定期收入。吉布尼一家只是土地富裕而没有多少现金。南希·吉布尼第一次见到奥本海默一家是 1956 年在象鼻湾的客房午餐会上。她后来写道:"他们穿着常见的旅行服装——棉衬衫、短裤和凉鞋,但他们看起来不像人类。对地球生物来说,他们太瘦、太脆弱,脸色苍白……基蒂在两个人当中更有人气一点,但是她看上去除了有黑眼圈以外没有什么特点。她发出来的声音低沉而沙哑。"

经介绍以后,基蒂对南希说:"留头发不热吗?"这个说法被南希认为是极其粗鲁的。然而,南希起初比较喜欢罗伯特。"他看上去像匹诺曹一样一脸茫然,走起路来像牵线木偶一样左右摆动,但他的表情一点也不木讷。他那只有名的烟斗飘出云雾,而他则流露出温暖、同情和有礼貌的神情。"当罗伯特礼貌地问南希她丈夫干什么工作时,南希说他曾经在卡尼尔湾的旅馆为劳伦斯·洛克菲勒做事。

"他曾经为洛克菲勒做过事?"奥本海默吸着他的烟斗问道。一会他低声俏皮地说道:"我也是,拿钱专干坏事。"

南希很惊诧,她从未见到如此奇怪的人。第二年,奥本海默说服了吉布尼一家卖给他能够盖一所房子的土地。1959 年春,当房子还在兴建时,基蒂写信给南希·吉布尼说,她们想 7 月份到圣约翰,但没有地方住。经过仔细权衡,吉布尼决定在她们到达海滨别墅时提供一个房间。

几个星期后,奥本海默夫妇出现了,随他们来的还有 14 岁的托尼和她的一名同学。基蒂说两个小姑娘可以睡在她们带来的帐篷里。随后,基蒂声明说,她们不会在这里住一个夏天,只是住上一个月。南希·吉布尼大吃一惊,她认为她们只会住几天。这样就像南希后来说的,"极好笑、极难堪的七个星期"里充满了分歧、误解和关系的恶化。

说起来,奥本海默一家并不是那么容易招待的。基蒂总是半夜起来,经常因为她自称的"胰腺疼痛"而呻吟,喝酒使她的病情变得严重。基蒂和罗伯特都喜欢在床上抽烟喝酒。每天夜里,吉布尼一家都能听到基蒂在厨房为她的酒翻找更多的冰块。南希·吉布尼经常被罗伯特的噩梦惊醒。由于失眠,奥本海默一家经常睡到中午才起床。

7月的一个晚上,南希三次被基蒂在厨房翻找东西的声音惊醒。她拿着一只手电筒在厨房里找冰块。最后,南希忍无可忍地爆发了:"基蒂,没有人晚上喝酒还用冰块的,你回到房间里去。"

基蒂看了她一会儿,使出所有力气用手电筒砸向南希。这一击只是擦伤了南希的脸颊。"我使劲推着她的肩膀,"吉布尼后来写道,"将她推回她们的房间,关上门,并堵上所有的门。"第二天早上,吉布尼到波士顿看望她的母亲,临走前她告诉自己的孩子,等到这些蠢货滚蛋后她就回来。奥本海默一家最后在8月中旬离开了。

第二年,他们回到已经建好的海滨小屋。他们和吉布尼一家的关系并没有和好,再也没有和奥本海默一家说过话的南希·吉布尼经常将"私人财产"的牌子放在她的那边海滩以激怒基蒂。吉布尼的孩子记得,基蒂经常在海滩上走来走去将牌子撕掉。

罗伯特从没有为事情争吵过。其实,除了记忆中的一次以外,没有人看过他生气。在他们搬到海滨小屋几年后,罗伯特和基蒂举行了一个迎新年晚会,而其中一个客人伊凡·亚丹突然唱起了歌剧。吉布尼受够了这首曲子,他怒气冲冲地向奥本海默家冲去。他随身带了一支枪,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朝天放了几枪。罗伯特大发雷霆地对他叫道:"吉布尼,从此以后别在我这儿出现!"从此以后,吉布尼一家和奥本海默一家没了联系。他们请了律师并为海滩权利争吵不休,这段恩怨成了小岛上的传奇。

吉布尼一家对奥本海默一家的看法并不被岛上伊凡·亚丹和多莉丝·亚丹夫妇所认同。他们1955年开始在岛上居住,他们很崇拜奥本海默,多莉丝后来回忆说:"你在他身上找不到缺点。"伊凡·亚丹1900年出生在俄国,20至30年代,他是左翼主要的男高音歌唱家。1949年,伊凡·亚丹设法从联邦德国移民到美国,并在1951年与多莉丝结婚。当这对夫妇在1955年游览小岛时,伊凡大叫道:"我要待在这里。"

在结识奥本海默一家时,亚丹一家很高兴地发现,他们这些新来者会德语。伊凡的英语水平很低,他和多莉丝经常说俄语。伊凡很活跃,也很爱说话,所以如果他喜欢唱歌,那并不奇怪。他也比较容易动怒,如果他发现自己与某人意见不合,就会起身离开桌子。伊凡是一个无人能比的反苏分子,但他知道所有关于奥本海默的经历时,他并没有发现奥本海默在道德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伊凡不喜欢政治,但他却愿意和罗伯特讨论。他们是一对奇怪

的组合——但很显然，他和罗伯特分享着彼此的友谊。

“当然，基蒂就是另一回事了，”多莉丝·亚丹写道，“她很令人焦虑，但他们总是相互保护对方，尽管有时是她不对……她可能是个喜欢找麻烦的人。她本质上有点邪恶，她知道这一点。”但是，多莉丝喜欢她。有一天，基蒂对多莉丝说：“你知道吗，多莉丝，我和你有些相似。我们都嫁给一个非常出色的人，这注定我们要承担和别人不同的责任。”

岛上的每个人都爱喝酒，但基蒂喝得非常多，并且在随后的几天里总是不停地呻吟。“我记得基蒂很多次都喝得烂醉如泥，”奥本海默家的邻居萨布拉·埃里克森说，“她是奥本海默人生的巨大麻烦。”多莉丝·亚丹说：“我想，她知道这一点。因为基蒂，他经历了好多他不应该经历的事……她爱罗伯特，这毫无疑问。她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我想以前她是奥本海默理想中的一个好妻子。”对于罗伯特来说，“他为她付出了所有，”另一位圣约翰岛的居民西斯·弗兰克说，“在他的眼里，她从未有错。”

因加·希利维尔塔是一个从 1958 年就开始游览小岛的漂亮的法国女人。她说：“罗伯特是个很谦恭的人，我敬佩他。我想他是某种意义上的圣贤。他的眼睛非常漂亮，就像他能看透别人想什么一样。”她和她丈夫是在 1961 年 12 月 22 日的圣诞晚会上认识奥本海默一家的。在走进鹰巢湾的房子时，25 岁的因加非常吃惊自己能在这块偏僻的地方碰到这位名人。她随后指出，他们的生活很美满。当罗伯特问她：“你要来点白酒吗？”他拿出一瓶很贵的香槟。奥本海默一家总是带着酒。

几天后，罗伯特和基蒂举办了一个新年宴会。他们雇用了一个叫“酸橙汁”理查德的当地居民，让他将客人从克鲁兹湾风沙飞舞的大路上接到他的春意浓浓的小屋。那晚，奥本海默一家提供了龙虾沙拉和香槟。理查德和他的“乐队”演奏了卡里普索小调。罗伯特和因加在音乐声中一起跳舞，随后每个人都去游泳了。“这真的很像个世外桃源，”因加说，“就像一场梦。”后来，他们在沙滩上散步，罗伯特给她指了天上不同的星座。

有一次，奥本海默一家正在拜访亚丹一家时欣赏了精彩的日落景象。罗伯特从座位上站起来，转向西斯·弗兰克说：“西斯，和我一起去小山那边吧。今晚你将会看到绿色的闪光。”然后，就像太阳落在地平线下一样确定，西斯看到了绿色的闪光。罗伯特在西斯看完后沉着地解释这个物理原理：从圣约翰看，地球上空的大气层起到了一个棱镜的作用，造成了这个仅仅一秒的绿色闪光。西斯被这阵绿光弄得心跳不已，为罗伯特的耐心解释所着迷。

“他是个谦逊的人。”萨布拉·埃里克森回忆道。每年的9月，奥本海默一家都会向他们岛上的朋友寄出三打邀请函，邀请他们来参加新年晚会。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来——黑的和白的，受过教育的和没受过教育的，罗伯特对他们没有任何区别。“他们那样就像真正的人类一样。”埃里克森说。

吉布尼一家在一旁时，罗伯特性格中的柔和部分就表露无疑。他对其他人挖苦式的评论不见了。“他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温柔、最善良的人，”约翰·格林说，“我从来没有认识过像他那样对其他人没有什么恶意的人。”他很少对别人提起他的苦难经历。但是有一天，当他们谈到肯尼迪总统许诺要送一个人去月亮上时，有个人问他：“你想去月亮上吗？”罗伯特回答：“是的，我确实知道有些人非常想让我把他们送上去。”

罗伯特和基蒂在这个岛上待得时间越来越多，经常为了过复活节、圣诞节和每个夏天的快乐日子而乘飞机去那里。

基蒂想成为一个好厨师，但是这意味着他们的饭菜将会很乏味。罗伯特在海湾那里有一个鱼锅，他们吃了许多海鲜沙拉、章鱼和烧烤小虾。他们就像本地人一样吃生海螺，那是一种从海滩上拾来的西印度蜗牛。在一次圣诞晚餐上，他们给客人喝香槟和吃一种日本海藻。罗伯特几乎没吃什么东西。“我的上帝，”多莉丝·亚丹回忆道，“如果他能在一天内吃下一千卡路里的东西，那真可谓是个奇迹了。”

皮特很少来圣约翰岛，他更喜欢新墨西哥那些陡峭的山；但是托尼把这座岛看作她灵魂的归宿。“她很温柔。”一位在此地居住多年的居民说。她通过本地方法很快就学会了一首卡里普索歌曲，这种歌曲是用在这个岛上常见的克里奥尔英语写成的。她喜欢这个岛上的重金属乐队。她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孩子，有着漂亮光滑的皮肤，闪着悲哀黑色的眼睛，一头有光泽的黑色长发，以及像一个公主一样谦逊而有礼貌。”她特别害羞，讨厌别人给她拍照片。她告诉她在圣约翰岛的朋友，她非常讨厌那些她和她有名的父亲到公共场合出行时一阵一阵的闪光灯。圣约翰岛是一个能够保护她隐私的完美场所。

“托尼非常顺从，非常端庄，”她的朋友因加·希利维尔塔回忆道，“她会去做你告诉她的任何事情。她在事后才会反抗。”基蒂对她非常不好，经常把她当作女仆，叫她去拿她的香烟。托尼总是在她母亲的监视下，于是不可避免地，她就像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一样开始与母亲作对。“托尼和她的母亲

总是吵架。”西斯·弗兰克回忆道。

一名在圣约翰的邻居回忆说:“罗伯特没有对托尼给予多少关心。她似乎是别人的孩子一样。”但是,另一名邻居史蒂夫·爱德华认为,罗伯特“对他的女儿非常关心……你也许能够看出来他为托尼感到骄傲。”在托尼 17 岁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她十分聪明,但是依然沉默、敏感和温柔。她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居家女孩。伊凡在俄罗斯出生的儿子亚历山大·亚丹曾经一度追求过托尼。“亚历山大迷恋托尼。”西斯回忆道。但是,当托尼对他也表现出好感时,罗伯特进行了干涉,他认为亚历山大对她来说年龄太大了。

由于她和亚丹一家的友谊,托尼决定认真地学习俄语。与她的父亲一样,她是一个出色的语言学家,她主修法语,但当她从奥柏林学院毕业时,她已经能够说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她经常用这些语言来写日记。

罗伯特、基蒂和托尼都是航海好手,或者是“疯狂的人”——这是岛上的居民对喜欢帆船和摩托艇的人的称号。他们有时会出去航海三四天。

在航行了一早上或是在沙滩上散步回来后,罗伯特会邀请他所遇见的人去喝上一杯。他仍是喝马提尼酒。“我从来没有看到罗伯特喝醉。”多莉丝回忆道。喝酒也许会变成吃晚饭,那时罗伯特会开始背诗。他会用低沉的声音背诵济慈、雪莱、拜伦甚至莎士比亚的诗。他喜欢《奥德赛》,而且能背诵很长的一段。他曾经是哲学圣人,被流亡分子、退休人士、“垮掉的一代”以及本国人民所敬仰。尽管他有着美好的理想,但他在这个小岛上生活得很安逸。在圣约翰岛上,“原子弹之父”找到了躲避内心邪恶势力的避难所。

38 | “它在原子弹试验后就应该完成了”

“总统先生，我想也许您今天授这个奖颇需一份博爱和勇气。”

——罗伯特·奥本海默致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信

1963 年 12 月 2 日

20 世纪 60 年代初，随着民主党重返白宫，奥本海默再也不是一个政治贱民了。肯尼迪政府不打算让他重新回到政府工作，但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士仍然认为他是一个值得别人敬重的人，何况他还受到了共和党极端主义分子的折磨。1962 年 4 月，麦克乔治·邦迪——那位前任哈佛大学的教务主任，现任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邀请奥本海默到白宫参加庆祝他获得第 49 届诺贝尔奖的晚宴。在这个庆祝活动中，奥本海默结识了一些知识渊博的人，像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宇航员约翰·格伦以及作家诺曼·库辛。当肯尼迪讲俏皮话的时候，每个人都笑了，“我觉得这是白宫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天才和人类知识的聚会。当然，托马斯·杰斐逊一个人在这里吃饭的时候除外。”奥本海默在顾问委员会的老朋友格伦·西博格现在是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他后来问奥本海默是否愿意为了回到顾问委员会再接受一次忠诚调查的听证会。罗伯特有些生气地说：“你这一辈子都不会看到那一天。”

奥本海默继续作公开性质的演讲，大多数是在大学。通常，他会讲一些与文明和科学相关的话题。自从他被剥夺了一切与政府有关的职务后，他已经完全投入到公共活动中了。他表现得像一个踌躇的人道主义者，在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代深入思考人类的生存问题。

1963 年，《基督教世纪》的编辑请他列出一些曾塑造他哲学观点的书目，奥本海默举出了十本。排在名单首位的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其次是《薄伽梵歌》，最后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1963年春，奥本海默得知肯尼迪总统打算授予他费米奖——一笔五万美元的免税奖金和奖章，以表彰他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贡献。每个人都明白这是一个象征性很强的、旨在恢复其政治名誉的举动。“真令人作呕！”当一名共和党参议员听到这则消息时嚷道。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共和党工作人员，散发了一份有关1954年听证会指控奥本海默的十五页的摘要。当记者追问奥本海默本人的反应时，他抗辩说：“看，这不是我夸夸其谈的日子。我不想伤害到那些干这行的伙计们。”他知道，他在政府里的朋友们——麦克乔治·邦迪和小阿瑟·施莱辛格——无疑是有责任的。

去年的费米奖获得者爱德华·特勒立刻给奥本海默写信祝贺：“我一直想要对你说些什么。这次我能充分确信我正在做正确的事。”事实上，许多物理学家都在肯尼迪政府中默默运作以恢复奥本海默的涉密权。他们想要为他们的老朋友争取一次真正的平反昭雪，而不仅仅是象征性的恢复名誉，但邦迪认为这样做的政治代价太大。事实上，即使是在政府宣布奥本海默将被授予费米奖后，在确定总统将亲自在白宫中举行颁奖典礼前，邦迪仍等着权衡来自共和党人的反应。

1963年11月22日，当奥本海默坐在办公室里，忙着修改他在12月2日白宫领奖仪式的发言稿时，他听到办公室外响起了敲门声。原来是皮特，他说刚刚在车里的广播中听到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遭到枪击的消息。罗伯特愣住了。就在那时，弗娜·霍布森冲了进来，惊呼道：“我的上帝呀，你听说了吗？”罗伯特看着她说道：“皮特刚告诉我。”当其他人到达时，罗伯特问他22岁的儿子皮特是否要喝一杯。皮特点点头，罗伯特走到弗娜的大橱柜前，他知道那里放着一些酒。但是不久，皮特就发现他的父亲仅仅是站在那里，“他的胳膊在身体两侧垂下，第四根手指反复摩擦他的大拇指，向下盯着那些收集的酒瓶”。最后，皮特含糊地说道：“好了，别再想了。”当他们一起走出去，经过他秘书的桌子时，弗娜·霍布森听到罗伯特说：“现在事情正在迅速地崩溃。”后来，他告诉皮特：“自从罗斯福死后，他从未有过像那天下午一样的感觉。”一周后，奥本海默像其他大多数国人一样，坐在一台电视机前观看悲剧一步一步地呈现。

12月2日，林登·约翰逊总统如期主持了费米奖的颁奖典礼。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站在约翰逊身旁的奥本海默近乎显得渺小。他站在那里像“一座石像，灰暗、僵硬，几乎没有生命，紧张得令人可怜”。与此相反，基蒂显

得十分兴高采烈，像是“沉浸在快乐中”。大卫·利林塔尔认为，整件事“是为了给奥本海默所蒙受的仇恨和丑恶的罪行赎罪而举行的仪式……”。在皮特和托尼的注视下，约翰逊致了辞并颁给罗伯特一块奖章、一枚徽章以及一张五万美元的支票。

在授奖仪式的发言中，奥本海默提到了一位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他多次写过‘兄弟般的科学精神’……”。然后，他又对约翰逊说道：“总统先生，我想也许您今天授这个奖颇需一份博爱和勇气。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预示着我们未来的好兆头。”

作为回应，约翰逊优雅地将基蒂称作“今天分享你荣誉的女士——奥本海默太太”，然后，他幽默地说道：“你可能注意到了，支票可是被她收起来了！”引起笑声一片。

特勒那天作为观众在场，两人面面相对的时候，众人都紧张地屏住了呼吸。奥本海默咧嘴笑了，并握了特勒的手，基蒂一脸严峻地站在他身旁。一位《时代》杂志的摄影师用他的相机捕捉到了这个瞬间。

后来，约翰·肯尼迪那位伤心的遗孀致信表示，她想在其私人住处与罗伯特会面。罗伯特和基蒂走上楼并受到杰奎琳·肯尼迪的接待。她说她只想让他知道，她的亡夫是多么想要颁这个奖给他。罗伯特在过后描述那一刻时，他坦言他已被深深地打动了。

尽管如此，奥本海默在华盛顿仍是一个两极化的人物。至少有一位共和党人——参议员布鲁克·汉克洛普——公开宣称，他将联合抵制白宫的仪式。而且为了回应共和党的批评，约翰逊政府同意在下一年将费米奖的奖金减少到两万五千美元。当然，刘易斯·斯特劳斯也被罗伯特的近似恢复名誉的行为伤害了感情，并且给《生活》杂志写了一封表达愤怒的信，信中称，为奥本海默颁奖已经给“保护这个国家的安全体制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斯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敌意自从1954年的审问以来就加深了。当1959年艾森豪威尔任命斯特劳斯为商务部长时，他所有的旧伤口都裂开了。在以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为核心的残酷的确认战场上，斯特劳斯以微弱的差距输了——投票结果为四十九比四十六。斯特劳斯责怪了参议员克林顿·安德森，以及参议员约翰·F. 肯尼迪，他的责怪没有错——前者已经被奥本海默的辩护者们，如麦克乔治·邦迪和施莱辛格等人给疏通过了。当肯尼迪表示“只能在极端的情况下才能投票反对总统”时，邦迪说道：“那么，这就是一种极端的情况。”邦迪为肯尼迪列举斯特劳斯在奥本海默案件中应受指责的行

为。肯尼迪被他说服了，他在最后一刻投了反对票。斯特劳斯在确认会上败北了。“这是一场令人愉快的表演，我从没想过能在有生之年报仇雪恨。”伯妮斯·布罗德在给奥本海默的电报中说道。

即使在罗伯特赢得费米奖之后，基蒂对特勒和其他人的忿恨仍旧没有消除。在1964年春的一个傍晚，她和奥本海默同大卫·利林塔尔喝酒。罗伯特刚从一场严重的肺炎中康复，他最终戒了香烟，但仍吸烟斗。他和基蒂已经上了年纪。罗伯特依然戴着他那标志性的平得像馅饼似的帽子，开着他那辆凯迪拉克在普林斯顿转来转去——这辆车已经风光不再。当利林塔尔提起上次在白宫的费米奖颁奖仪式上见过他们时，基蒂幽暗的眼神中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愤怒。“那真是糟透了，”她厉声说道，“发生了那些糟糕的事情。”罗伯特歪着头坐在那里柔和地喃喃道：“还有那些美妙的事情。”但过了一会儿，当特勒的名字被提起时，罗伯特失掉了他“像拉比一样和善的姿态”，他的眼中闪烁着真正的愤怒。利林塔尔记录道，那些伤口是“令人痛苦的”。利林塔尔通过他的日记评论道：“她（基蒂）燃烧着一种人所罕见的强烈感情，那是针对那些曾参与折磨罗伯特的人们的深深怨恨。”

对于一个在30和40年代曾如此涉及政治的人，奥本海默奇怪地与60年代的骚乱竟无联系。在这一个十年的开始，当许多美国人在自家的后院挖核弹防空洞的时候，奥本海默从没站出来反对这种歇斯底里的行为。当利林塔尔追问他时，他解释道：“我无法对正在发生的事做些什么；无论如何，对这种事我不宜说三道四。”同样，当越战在1965年至1966年逐步升级时，他在公开场合也一言未发——尽管从个人角度来说，当他和皮特讨论此事时，他显然对政府逐步升级的做法是持怀疑态度的。

在1964年，一位名叫海纳尔·基普哈特的德国剧作家兼精神病医生创作了一出叫作《关于J. 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戏剧。基普哈特的戏剧大量引用了1954年安全委员会听证会的记录，在德国的电视上首次播出，并接着在西柏林、慕尼黑、巴黎、米兰、巴塞尔为剧院观众进行现场演出。那些欧洲的观众们为基普哈特所描述的奥本海默所着迷，他在起诉面前显得脆弱和清瘦，就像一位现代的伽利略，一位被美国当局反共行动折磨的科学家英雄。由于得到评论家好评，该剧赢得了五项大奖。

但当奥本海默最终读到了剧本时，他对此非常反感，并愤怒地给基普哈

特写了一封信，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斯特劳斯和罗布紧接着对该剧表达了相同的感受，也明确打算控告伦敦皇家莎士比亚戏剧公司诽谤——但他们的律师劝他们放弃这个想法。）奥本海默尤其厌恶戏剧结束时的独白，在此处，作者让他为制造原子弹表示忏悔："我开始想要知道，我们是不是科学精神的叛徒……我们从事的是恶魔的工作……"这样的情节多少使他经历苦难的性格变得廉价了。简而言之，他认为戏剧的剧本很蹩脚，确切地说是因为其缺少模棱两可的话。

观众们并不这么认为。1966 年 10 月，英国剧团在伦敦上演这出戏，演员罗伯特·哈里斯饰演奥本海默这一角色，该剧一开始便大受欢迎。一位英国评论家称此剧"使一个人愤怒地去思考"。

奥本海默过后勉强承认，那位剧作家除了版权有点问题外并没有什么罪过。他更喜欢基普哈特的一部法文作品，因为该作品所描绘的几乎全部来自安全听证会的记录——但即使如此，他仍抱怨两部作品"把整部可恶的滑稽戏变成了悲剧"。不管怎样，基普哈特的作品把奥本海默重新介绍给了欧洲的新一代和美国的观众们。最后，该剧在纽约进行了首演，并促使英国广播公司拍了一部纪实电视剧，同时令许多表现奥本海默生平的电影问世。

还有其他媒体节目尝试深探奥本海默的生活。1965 年为纪念广岛原子弹爆炸二十周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播出了一部纪录影片，该片名叫《使用原子弹的决定》，由切特·亨特利担任旁白，记录了罗伯特对 7 月 16 日"三位一体"试验的回忆和他背诵的《薄伽梵歌》的名句："现在我变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还有一次，当一位记者在镜头前问他对最近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建议约翰逊总统开始与苏联进行停止核扩散谈判的看法时，奥本海默用力吸着他的烟斗说道："这晚了二十年……它在原子弹试验后就应该完成了。"

在这段时间，奥本海默得知，一个名叫菲利浦·斯特恩的联系广泛并富有同情心的记者正在写一部有关他 1954 安全听证会的书。尽管他们彼此共同的朋友为斯特恩担保，但奥本海默还是决定不接受采访。"这部书的主题，"他解释道，"我无法对其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并且我忽略了里面很多核心的部分。我不认为有比这个更有害的策划了。"他认为"不包括我的合作、建议和默许"，斯特恩将会写出一部更好的书。斯特恩的书《奥本海默事件：忠诚审判》在 1969 年出版并大受好评。

1965 年春，研究院的新图书馆落成，奥本海默看了很满意。图书馆建在

一个巨大的水池旁边，有数英亩的草坪环绕。罗伯特把它当作自己的遗产之一。

由新图书馆带来的愉快心情，仅仅部分补偿了他与几位数学系老师持续的冲突。研究院里的狭隘政治有时令他怒发冲冠。“问题是罗伯特喜欢争论，”一位理事向刘易斯·斯特劳斯报告说，“事实上他讨厌其他人。他应当被请走。”斯特劳斯乐于见到这样的报告，但他仍缺少撵走奥本海默所需的票数。

但在1965年的春天，奥本海默告诉研究院理事，他决定辞职的时刻已经到来，同时提出他将于1966年6月本学年结束时离开。斯特劳斯在场听到了这个消息。奥本海默给出了他做出该决定的三个理由：第一，他距6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只差两年，而且他没有必要“仅仅是等着丧钟敲响”。第二，他解释说基蒂已经“患上了一种被医生宣布为无法治愈的疾病……”。（在他文件的备忘录中，斯特劳斯刻毒地称基蒂的病为“嗜酒症”——对酒精无法控制的渴望。）罗伯特说，这让他现在无法为系里的成员和访客带来欢乐。第三，他说他与一些系里的成员，特别是数学系成员的关系“令人无法忍受并不断恶化”。

罗伯特本想要在当年晚些时候，比如秋季公布他的决定，但在他请一些系里的老师共进晚餐时，基蒂透露了这个消息。消息泄漏后，理事们迅速起草了一份公告，同时这件事见诸于1965年4月25日星期六全国各大早报上。

奥本海默对于离开没有什么遗憾，但他不得不搬出他在奥尔登庄园这个他和基蒂住了近二十年的家。值得安慰的是，理事们已决定在研究院给他建一所新房子——或者另外给他提供住房。奥本海默雇了一位名叫亨利·詹德尔的建筑师为他做了一个新房子的模型，那是一座由玻璃和钢铁构成的现代式的单层建筑，地址就在距奥尔登庄园两百码的地方。但斯特劳斯运用他作为一名重要理事的影响力，阻碍了计划的通过。这是一个只能被描述为带有个人抱复色彩的行为。1965年12月8日，斯特劳斯告诉他的理事同事们，他对这项计划持“怀疑的观点”。斯特劳斯迅速劝说理事们撤回了他们的承诺。当奥本海默在隔天得知这个消息时，他“被激怒了”。愤怒的基蒂向另一位理事和他的太太发泄了她的怒火，在该理事向斯特劳斯报告时称，接着发生了“一场非常令人不愉快的谈话”。斯特劳斯在暗中操纵一切，留给奥本海默一家的只有怀疑。这是当年12月发生的事情，但到了1966年2月，奥本海默劝说理事们再一次改变了决定。令斯特劳斯感到厌恶的是，理事会允许奥

本海默在他想要的地方建房。建造工程从1966年9月开始,到次年春天完工。但他却再也住不进去了。

在1965年的秋天,奥本海默拜访了他的医生并做了一次体检。他并不经常去体检的。他在那天回家后宣布已经得到了一张有关健康的明确诊断书。"我正在远离你们每一个人。"他诙谐地说道。但两个月后,他由吸烟引起的咳嗽明显恶化了。在圣约翰岛的圣诞节,他向西斯·弗兰克抱怨他"严重的喉咙痛",并沉思道,"也许我抽的烟太多了"。基蒂想他只是得了一场重感冒。最后,在1966年的2月,她带着他到纽约去看医生。诊断是明确的和带有破坏性的。基蒂打电话给弗娜·霍布森,并颤抖地告诉她"罗伯特得了癌症"。

四十年重度的吸烟是以他的喉咙为代价的。当小阿瑟·施莱辛格听到了这个"绝望的消息"后,立刻给他写信说:"我只能隐约地想象接下来的几个月对你将是多么的艰难。在这个可怕的年代,你已比大多数人面对过更多可怕的事,你已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一个道德勇气、意志、纪律的范例。"

尽管奥本海默不再抽香烟,但他依旧吸他的烟斗。在3月,他经历了一场痛苦的不彻底的喉部手术——接着他开始在纽约的斯隆—凯特琳医疗机构接受化疗。他对朋友们很坦率地谈起他的癌症。他告诉弗朗西斯·弗格森,他有"微弱的希望能阻止癌症"。可是到5月底,一切都表明他在"衰弱下去"。

在1966年的一个美丽春日,利林塔尔路过奥尔登庄园并找到罗伯特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秘书安妮·马克斯,和她一同拜访了奥本海默一家。罗伯特的外表令利林塔尔感到吃惊。"奥本海默自己第一次'对未来不确定',如他所说,如此的苍白和惊恐。"在花园周围和基蒂单独散步时,利林塔尔询问他的状况。基蒂呆住了,并咬着嘴唇,她一反常态,好像失去了语言一般。当利林塔尔弯下腰,温柔地亲吻她的面颊时,她发出一阵深深的呜咽声,然后开始了哭泣。过了一阵,她振作起来,擦干了眼泪,同时建议她们回到安妮和罗伯特那里。"我从没有如此佩服过一个女人的坚强,"那天晚上,利林塔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罗伯特不仅是她的丈夫,他是她的过去,既是快乐的也是痛苦的,他是她的英雄,也是她现在巨大的'问题'。"

1966年6月,罗伯特在普林斯顿的学位授予典礼上接受了一项荣誉学位。在那里他欢呼着,好像一个"物理学家兼水手,哲学家兼养马人,语言学

家兼厨师,喜爱好酒又好诗歌的人”。但他看起来筋疲力尽,由于神经的不适,他必须用手杖和腿部支架才能走路。

由于虚弱和疾病,罗伯特反而好像长高了。弗里曼·戴森评论道:“随着他体能的下降,他的精神变得更强大了……他欣然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他坚持自己的工作;他从不抱怨;他突然变得相当普通,并且不再试图引人注目。”他曾是一个具有改造自我才能的人,但现在,戴森评论道:“他朴素、率直,并且不屈不挠、勇敢无畏。”在那时,利林塔尔在日记中称,罗伯特看起来“精力充沛且似乎很快乐”。

在7月中旬,他的医生发现他的喉咙没有出现恶性肿瘤的迹象。化疗已令他疲惫不堪,但看起来像是见效了,所以在7月20日,他和基蒂返回了圣约翰岛。那些在岛上和他一年没见的朋友认为他就像是“一个幽灵,一个货真价实的幽灵”。在他想要去游泳时,她静静地抱怨着,圣约翰岛周围长年温暖的海水现在却使他感到寒冷。作为不能游泳的代替,他沿着海岸散步,同时谦恭并耐心地对待遇到的每个人——即使是陌生人。在得知西斯·弗兰克的丈夫卡尔正处于心脏手术后的康复阶段时,罗伯特前去拜访了他。“罗伯特对他十分温柔,”西斯回忆道,“并试图让他挺过这个严重创伤。”

罗伯特此时正控制饮酒,并用蛋白粉补充营养。他告诉西斯·弗兰克:“如果能吃到鸡肉沙拉三明治,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在去因加·希利维尔塔的新家共进晚餐时,罗伯特不能吃羊排,仅能喝下一杯牛奶。“看到他这样,我感到很难过……”因加说。

在近五个星期后,他和基蒂在8月底回到了普林斯顿。罗伯特感到好多了。他仍觉得喉咙痛,不过他觉得自己更强壮了。他的医生再次检查了他的喉咙,没有发现癌症的迹象。“事实上,他们确信我康复了。”奥本海默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回到普林斯顿仅仅五天后,他就前往伯克利并花了一周的时间拜访老朋友。到他9月返回时,他向医生抱怨持续的疼痛,“但他们不是非常清楚原因,并把它归咎于我对化疗的不适……”。

在秋天的早些时候,奥本海默一家不得不搬出他们心爱的奥尔登庄园,来为研究院的新主管卡尔·凯森让出地方。奥本海默和基蒂决定临时搬到梅塞路284号的一所房子里去,那以前是物理学家杨振宁所住的房子。由于多年无人居住,那是一个相当沉闷的地方。

直到10月3日,罗伯特才再一次去看医生。奥本海默在给朋友纳博科夫的信中说:“自那之后,癌症的症状十分严重,并扩散到了舌根的鄂部和左耳

咽管。"这种病是无法做手术的,因此他的医生建议他接受每周三次的化疗,这次还附加了一个电子感应加速器。"大家都知道,对一个仍在溃烂的喉咙再次进行化疗可不是闹着玩的。这还不算糟糕,但我对未来没有什么把握。"

他面对一个因放弃而过早死去的前景。在10月中旬,利林塔尔顺道拜访了他,并得知了这个消息。罗伯特曾经睿智的蓝眼睛现在因痛苦而变得模糊。"罗伯特·奥本海默最后的一段旅程,"利林塔尔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可能会非常短暂……基蒂尽她所能地抑制着泪水。"11月,罗伯特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现在几乎不能讲话和进食。"他曾想在12月访问巴黎,但他的医生们坚持要继续常规的化疗直到圣诞节。作为代替,他待在家中,和弗朗西斯·弗格森及利林塔尔这样的老朋友们会面。12月初,他的弟弟弗兰克从科罗拉多来看他。

1966年12月初,奥本海默收到了他过去的学生大卫·博姆的信,此人大部分时间在巴西工作,然后在英格兰工作。博姆写信称,他曾看过基普哈特的戏剧,并看过一个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接受采访的电视节目。"我真的被搅乱了,"博姆写道,"特别是由于你所作的一个表明感到自身有罪的陈述。我觉得被这样一种罪恶感束缚住,对你来说是在浪费生命。"

奥本海默立刻回信说:"这出戏剧以及与此相关的事已经困扰我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从没为我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所作所为表示过后悔;事实上,在这些各种各样的事上,我一再重申我的感受,无论黑与白,我对那些事都不感到后悔。"然后,在寄出信件前,他对文字进行了删减,他写道:"我仍旧厌恶基普哈特作品的主要原因,是我被假定曾作过那段冗长的演讲,而这段演讲在事实上肯定了我是后悔的。我对于责任和罪恶的感觉,到现在一直没变,并将在此生永远占据着我。"

12月初,当《展望》杂志的记者托马斯·摩根在他研究院的办公室采访他时,奥本海默可能已经和博姆在思想上做过很好的交流了。摩根发现他盯着秋天的树木和窗外的水池,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老照片,当中基蒂正骑马优雅地翻过一个栅栏。摩根能够看得出他将要死去。"他非常虚弱,并且不再是那个身体精干,头发平直,如一个牛仔天才般吸引着你的男人。"他的脸上有着深深的皱纹,头发就像是一团白雾,并仍保持着那种雅致的气质。"当他们的谈话转到哲学上时,奥本海默强调了"责任"一词——当摩根提醒他用的词几乎有一种宗教的感觉时,奥本海默承认这是一种"以世俗的方法来运用一个宗教概念,而不用把它附加在一个超验的事物上。我喜欢在这

里用'道德'这个词。我现在对道德的了解比以前更清楚——虽然我在制造原子弹时是非常坚定的。现在,如果不用像'责任'这样的词,我就不知道如何去形容我的生活。这个词必将伴随着选择和行动,以及做出选择时的紧张。我并不是在谈论知识,而是关于你被限制做所能做的事……没有力量的责任是无意义的。这可能是你在做自己时唯一的力量——不过知识的增长,财富和空闲的增加,都会令责任可信的范围增大。"

在这段自我独白后,摩根写道:"接着,奥本海默把手掌翻过来,修长而纤细的手指将他的聆听者包括在他的结论中。'你和我,'他说,'都不富有,但当责任起作用时,我们都能立刻缓和饥饿线上的人们最可怕的痛苦。'"

这只是他以前表述的一种不同说法,他是四十年前在科西嘉读普鲁斯特时学到的:"对一个人造成的苦难漠不关心……是残酷而可怕的。"非但不会漠不关心,罗伯特还敏锐地意识到在他的人生中给其他人造成的苦难——而又不让自己屈从于内疚。他将接受责任,从没想要推卸责任。然而,自从安全听证会后,他好像不再拥有和漠不关心的"残酷"作斗争的能力和动机。在这种情况下,拉比说的非常正确:"他们达到了目的。他们杀了他。"

1967 年 1 月 6 日,罗伯特的医生告诉他,对他的化疗被证明是无效的。第二天,他和基蒂同包括利林塔尔在内的一些朋友共进午餐。他们享用一块昂贵的鹅肝,基蒂表现得像一位完美的女主人。但当利林塔尔离开时,罗伯特帮他穿上外套并吐露道:"我并不感到很高兴,医生昨天给了我坏消息。"后来,基蒂在送利林塔尔出去时突然开始抽泣。"即将发生的死亡并不新奇,"利林塔尔在那晚的日记中写道,"但这次是相当折磨人,这很残酷。不过罗伯特至少在我面前是以别样的眼光看待它。他仿佛刚毅地看到了其内在的本质,抓住了那最后的真实。"

1 月末的一天,罗伯特拜访了给他当了十四年秘书的弗娜·霍布森,同时温柔地劝她离开普林斯顿。霍布森本打算在他作为主管辞职时就退休的,但当得知他生了病并且基蒂仍非常依赖她时,她推迟了这个打算。"我明白他是说他将很快死去,"霍布森说,"而且如果后来我没走,我将很难再离基蒂而去。"

到了 1967 年 2 月中旬,罗伯特知道他的死期将近。"我有些痛苦……我听声音和说话都变得非常困难。"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他的医生决定他不能再接受任何放射治疗,所以他们安排他接受一种强有力的化学养生疗法。但他依旧留在家里,并给一些他想会面的朋友写信。纳博科夫到他家拜

访过很多次,并且催促其他的朋友来看他。

2月15日,星期三,罗伯特尽了最大的努力去研究院出席一个委员会会议,来为明年的访问学者选拔候选人。奥本海默做足了准备工作,通读了申请者的成绩。"他讲话非常困难,"戴森过后写道,但他仍然"准确地记住了每个候选者的优缺点。我听他最后说的话是'我们应该选韦恩斯坦,他不错。'"

第二天,路易斯·费希尔拜访了他。近几年,费希尔和奥本海默已成为相互尊敬的朋友。作为一位受欢迎的全球旅行记者,费希尔写了二十多本书——其中包括像《圣雄甘地的一生》(1950)和《斯大林之死》(1953)这样的畅销书。罗伯特特别喜欢他1964年有关列宁的传记。基蒂鼓励费希尔从他正写的书中拿来几章,用以转移罗伯特的注意力。

可是,当费希尔按响门铃后,却在静默中等待了数分钟——然后就在他要放弃而准备离开时,他听到了二楼敲窗户的声音,抬头一看,是罗伯特提醒他回来。过了一会儿,罗伯特打开了前门。他丧失了大部分的听力,所以没有听到门铃声。罗伯特笨拙地帮费希尔脱下了外套,接着,两个朋友在一张空桌子前面对面地坐了下来。费希尔说他最近和托尼进行过一次谈话,她目前在用她的俄语技能研究乔治·凯南。当罗伯特想要讲话时,"他说话非常含糊,我猜我只能理解他五个词中的一个"。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基蒂正在小睡——她晚上睡得很不好——但在屋里并没有其他人。

费希尔递给罗伯特两章他的手稿,罗伯特看了几页。"那一刻,他冲我开心地笑了,"费希尔后来写道,"他看起来特别消瘦,他的头发又白又稀疏,嘴唇干裂。和平时一样,他读东西的时候,嘴唇看似在喃喃自语,实际并没有发出声音,也许是意识到了这样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他用那瘦骨嶙峋的手掌捂住了嘴;另外,他的手指甲是蓝色的。"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费希尔觉得该回去了。他在走出去的时候,在通往二楼楼梯的第二个台阶上发现了一盒香烟,有三根香烟从烟盒里掉了出来,散落在边上的地毯上。于是,费希尔弯腰把烟放回烟盒里。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发现罗伯特就站在他身旁。罗伯特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打火机并点燃了它。他知道费希尔并不抽烟,并且正打算离开这里,但罗伯特的姿势是出于本能做出的。他总是第一个为客人点燃香烟。"我有个深刻的印象,"费希尔几天后写道,"罗伯特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他甚至恨不得去死。"在坚持帮费希尔穿上外套后,罗伯特打开了屋门,含糊地说道:"欢迎再来。"

2月17日,弗朗西斯·弗格森顺道拜访了罗伯特的家。他能看得出罗伯

特已严重神志不清。他虽然还能走路,但已步履维艰,好像身上压了百余斤的重物。他们一起坐在餐厅里,过了一小会儿,弗格森觉得罗伯特太虚弱了,自己应该回去才是。“我陪罗伯特走回卧室,随后和他告别。第二天我就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

罗伯特于1967年2月18日星期六晚上十点四十分在睡梦中离去,享年62岁。基蒂后来向一个朋友透露说:“他死得很可怜。他先是变得像个孩子,随后又像是个婴儿。他又闹又吵,我不敢进他的房间,虽然我不得不进那间屋子,但我做不到。我忍受不了。”两天后罗伯特的遗体被火化。

刘易斯·斯特劳斯给基蒂发了封电报,声称“他对罗伯特的死表示深切的哀悼……”。国内外的报纸都刊登了长篇的充满敬意的讣告。伦敦《泰晤士报》把他描绘为“文艺复兴式人物”的杰出代表。大卫·利林塔尔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世界又丧失了一种崇高的精神——一位集合了诗歌和科学于一身的天才。”爱德华·特勒没有过多赞美的话:“我愿意记住他所做的一项伟大的工作,一项必需的工作……组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在莫斯科,苏联塔斯社报道说:“一位杰出的美国物理学家去世了。”《纽约人》纪念他为“一个具有特殊物理气质的人,一位不断探索的绅士和精英”。参议员富布莱特在参议院议员席上发表演说,提到了这位刚刚去世的物理学家,“让我们不仅仅记住他以特殊的才能为我们做出的一切,也记住我们对它做出的一切”。

在1967年2月25日的悼念仪式后,奥本海默在一个春天举办的华盛顿美国物理学会特别会议上又一次被人们深切缅怀。伊西多·拉比、罗伯特·塞培尔、维克托·韦斯科普夫及另外几个人作了发言。拉比为演说写了介绍,随后这些演说被结集成书并公开出版。“在奥本海默身上,”他写道,“粗俗的元素很少。本质上说就是精神品质,言行举止中表现的一种优点,构成了他魅力的基础。他从没有完整地表达自己,他总是给人留下一种感觉,像是还有强烈的感情和内涵还没有被发掘出来。”

基蒂带着她丈夫的骨灰盒来到鹰巢湾,随后在一个暴风雨的下午,她、托尼和两位圣约翰岛的朋友,以及约翰·格林和他的岳母伊万·德纳姆驾船朝卡瓦尔岩驶去。从岸边的房子望去,那是一座很小的岛。当他们到达卡瓦尔岩、刚果珊瑚礁和洛万哥珊瑚礁中间的某一点时,约翰·格林关闭了发动机。他们位于七十英尺深的水面上。没有人说话,基蒂只是把骨灰盒扔进了海

里，而没有把罗伯特的骨灰撒在海里面。它没有马上沉没，于是他们驾船绕着上下浮动的骨灰盒前进，不做声地看着它，直到它最终消失在波浪翻滚的海水中。基蒂解释说，她曾和罗伯特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他想要的归宿”。

尾声 | “只有一个罗伯特”

大约在罗伯特死后一两年，基蒂开始与塞培尔生活在一起，他是罗伯特以前的学生也是罗伯特的好朋友。当一个朋友误把塞培尔叫成罗伯特时，基蒂严肃地训斥了他：“你不能叫他罗伯特——只有一个罗伯特。”1972 年，基蒂买了一艘漂亮的五十二英尺长的柚木双轨帆船，命名为“月球探路者”。这个名字是指大型帆船上最顶部的帆。1972 年 5 月，基蒂说服塞培尔和她一起驾船周游世界。但是，他们并没有走很远。在离开了哥伦比亚海岸后，基蒂患了重病，塞培尔不得不掉头返回停靠在巴拿马。1972 年 10 月 27 日，基蒂在巴拿马城的戈加斯医院死于脑血栓。她的骨灰被撒在圣约翰岛海岸的卡瓦尔岩附近，1967 年罗伯特的骨灰盒就是投入了这里的海底。

1959 年，科罗拉多大学聘用弗兰克·奥本海默到物理系工作，而他也结束了十年的流放生活，重新返回了学术界。1965 年，他赢得了著名的古根海姆奖金在伦敦大学进行气泡舱研究。那年在欧洲，他和雅姬参观了许多科学博物馆，巴黎探索馆给他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那里用模型来展示基础科学原理。回到美国后，他和雅姬计划建造一座科技博物馆，使大人和小孩能经历亲自操作物理、化学和其他科学领域的实验。这个主意很受欢迎，于是，1969 年 8 月，在得到多家基金会拨款的支持下，旧金山的一座建于 1915 年的气势恢宏的美术馆被重新翻修，弗兰克和雅姬的探索馆就在此开门营业了。探索馆很快就在“公众参与探索馆活动”中一举成名，弗兰克成为了该活动中极具号召力的主管。雅姬和他们的儿子迈克尔一起与弗兰克共同努力

工作,探索馆成了一个家庭努力的成果——可能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科技教学探索馆。

罗伯特要是还活着,一定会为弗兰克感到骄傲的。兄弟俩在科学、艺术和政治方面的毕生所学都用在了这座探索馆上。“建造这座探索馆的全部意义,”弗兰克说,“就在于使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了解周围的世界。我觉得很多人都已经放弃去了解周围的事物,当他们放弃了物理世界时,他们也同时放弃了社会和政治世界。如果我们放弃理解事物,我想我们将会被历史所掩埋。”弗兰克在他1985年去世前就像一个慈善家一样运作他的探索馆。他的“人类的理解力将不再是权力的工具……不再只是为了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是成为所有人的权利和快乐的来源”这一平等主义的想法会一直存在下去。

皮特·奥本海默搬到了新墨西哥州,住在他父亲的佩罗卡连特小屋。在那里,可以俯视克里斯托山脉。在那些年里,他抚养了三个孩子。在第二次离婚后,他最终定居在圣达菲,以当承包人和木匠为生。皮特从没有对外透露过他的家庭以及他和“原子弹之父”之间的关系,即使当他经常以一名环境保护者的身份,挨家挨户地游说人们反对当地核废料污染的时候也没有。

在她父亲死后,托尼的生活很艰难。“托尼总是感觉低基蒂一等,”塞培尔回忆道,“基蒂很会照料自己的生活,而托尼始终也没有能够独立。”她意志坚定的母亲迫使她到研究所学习,但她很快就放弃了。她独自在纽约城的一间小公寓里住了一段时间,但她几乎没有什么好朋友。她最终从那里搬了出来,住进了塞培尔在河畔大道的公寓里的一间内室。她利用自己语言方面的天赋在1969年找到了一份临时性的工作,在联合国做一名三种语言的翻译员。“她能毫无问题地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埃里克森回忆道,“但她总容易受到打击。”这个工作需要进行忠诚调查。联邦调查局的人展开了全方位的调查,并且又重新翻出了很多年以前对她父亲的指控。在对这样一个柔弱的人进行了痛苦和讽刺的打击后,他们也没有批准她的安全许可。

托尼最终在辞职后回到了圣约翰岛,并在那里安了家。“她选择留在圣约翰岛是个错误,”塞培尔说,“我是说,这里很受限制。那里没有她能说得上话的人,真的……没有和她一个年龄段的人。”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托尼只喜欢享受短暂的幸福。自己选择的事业被联邦调查局的人否定后,她看起来再也没有从打击中恢复过来。

在她第二次离婚后,她与另一位刚到岛上的客人成为了好朋友。那个人

叫琼·凯瑟琳·芭拉斯,是一位比她大八岁的女士。托尼和芭拉斯及其他朋友在一起时,很少提到她的父母。"但当她真的谈到她父亲的时候,"芭拉斯回忆道,"总是充满了爱意。"她总爱戴着罗伯特送给她的马尾辫发卡——而且每当她把发卡放错地方的时候就会变得心神不宁。她努力避免谈论1954年听证会的事情,但有时她会说:"那些人毁了她的父亲。"

但是很显然,她对父母仍然心存芥蒂。她曾一度去圣托马斯接受心理治疗,她对她的朋友因加·希利维尔塔说,这段经历能帮助她理解"她怨恨父母像小孩一样对待她"。她患了抑郁症。有一天,她决定跳海自杀,于是她从鹰巢湾向卡瓦尔岩游去,罗伯特的骨灰盒就躺在那里的海底。她在海里游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她向一位朋友透露说——当时,她突然感到好多了,于是就掉头回到了岸上。

1977年1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在罗伯特建在鹰巢湾岸边的小屋里上吊自杀。她的自杀显然是事先计划好的。托尼在床上留下了价值一万美元的证券以及一份房子的遗嘱——她把房子赠给了"圣约翰岛的人们"。她备受岛上人们的爱戴。"每个人都爱她,"芭拉斯说,"但她并不知道这些。"数以百计的人参加了她的葬礼——事实上,来的人太多了,以至于克鲁兹湾那间小教堂都装不下,许多人不得不站到了外面。

那栋在鹰巢湾的小屋现在已经不在了,它在飓风中被刮倒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社区活动室,屹立在现在被称为奥本海默海滩的地方。

后记

"我与奥本海默的长途旅行"

——马丁·舍温

罗伯特·奥本海默是个高超的骑手,所以我在1979年夏天开始在马背上研究他的自传,以此来求得发现"坐住"这一学术概念的新解。我的冒险是从洛斯皮诺斯开始的,它位于距新墨西哥州考尔斯十英里的山上。1922年的夏天,奥本海默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对美丽的克里斯托山的第一次探险。保守地讲,我已经有几十年没骑马了,一想到前面漫长的旅途,多少让人有点畏缩。翻过了一万英尺高的草山,经过了马背上数小时的颠簸,我终于到了我的目的地——位于山腰上的佩罗卡连特小屋,也就是"奥本海默牧场"。这是奥本海默在20世纪30年代租下并于1947年买下的。

比尔·麦克斯威尼是洛斯皮诺斯的主人,是我们沿途的向导,也是当地的历史学家。他告诉了我们(我的妻子和孩子与我在一起)关于上一任牧场主凯瑟琳·查韦斯·佩奇的悲惨故事,她于1961年在圣达菲家中死于入室强盗之手。奥本海默在他第一次访问新墨西哥州时见过凯瑟琳,他与凯瑟琳年轻时犯下的糊涂事,是吸引他不断回到这片美丽土地上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买下了牧场后,奥本(奥本海默朋友们对他的称呼)每年夏天都要为他自己,还有他的弟弟弗兰克(从1940年后还有他的妻子基蒂)以及他们的客人们从凯瑟琳那里租几匹马。大多数物理学家除了自行车外没有独立地骑过别的什么东西。

我的旅行有两个目的:第一是稍稍体会一下奥本海默当年和他的朋友们在荒郊野岭里骑马的经历——那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快乐。第二是与奥本海

默的儿子皮特聊一聊——他住在家里的小屋中。在我帮他建畜栏的时候，我们就他的家庭和生活讨论了一个多小时。这是一个值得回忆的开始。

几个月前，我与出版商签署了关于出版奥本海默（物理学家、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理论物理学顶尖学院的创立者、早期的激进政治活动家、“原子弹之父”、杰出的政府顾问、高等研究院的主管、公共知识分子以及麦卡锡时代最著名的受害者）传记的合约。我向我后来的编辑安古斯·卡梅伦保证，手稿会在四到五年内完成。他是这本书的题献者之一。

在随后的六年里，我走访了国内外很多地方，在一个又一个的介绍中不断前进。我采访了很多我觉得不可能但确实认识奥本海默的人。我查阅了大量的档案馆和图书馆资料，搜集到了数以万计的信件、备忘录和政府文件——光是来自联邦调查局的就有一万页——最终我明白了，对奥本海默的研究会远远超过他自己的生活。他的个人故事及其在公共层面的影响更为复杂，他在他的时代所释放出的照耀整个美国的光芒，远比我和安古斯预期的还要多。这个中的复杂性、深度和广泛的共鸣代表了奥本海默的形象——自从他死后，有关他的书籍、电影、比赛、文章以及现在的戏剧（原子博士），都像他的故事一样流行了起来，将他的影子深深地刻在了美国和世界历史的篇章里。

在我启程前往佩罗卡连特的二十五年后，关于奥本海默的一生的著作让我对传记的复杂性有了全新的认识——有时，这是个既艰辛却又使人快乐的路程。五年前，在我的好朋友凯·伯德完成了有关麦克乔治和威廉·邦迪的共同传记《真理的颜色》后，我邀请他和我一起工作。奥本海默这个人的内涵对于我们两个来说都太庞大了，所以我知道，有凯做我的搭档我的步子就能快很多。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一漫长而艰巨的工作。

奥本海默是作为“原子弹之父”被人们所认识的，但他在去洛斯阿拉莫斯之前及其之后的经历却很少有人了解，本书的作者之一马丁·舍温教授在历经二十五年的研究之后，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极其完整的奥本海默。

——美国《出版人周刊》

此前有关奥本海默的书所涵盖的内容大都是支离破碎的——或者是科学的，或者是历史的，或者是政治的，或者是道德的，或者完全是个人的；而本书则将这些完美地融合在了一个框架之下，从而成就了奥本海默的“第一部完整传记”。

——《纽约时报书评》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且极具思想深度的著作，它非常出色地抓住了原子时代早期政治家与科学家之间的斗争。

——CNN前主席兼CEO，《时代》杂志前总编辑沃尔特·伊萨克森

本书是对奥本海默最为出色的研究……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传记作品，而且是美国政府在恐惧时代滥用权力的警示故事。任何对二十世纪的美国感兴趣的读者都不应该错过这本书。

——美国总统研究专家、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

罗伯特·J.奥本海默终于得到了他本应得到的一部深刻的、极具洞察力的、有见地的传记。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埃里克·方纳

上架建议：人物传记

ISBN 978-7-5447-1000-8

9 787544 710008 >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

定价：35.00元